

국제학술회의

역사적 관점에서 본

‘동아시아세계’의 아이덴티티와 다양성(I)

날 짜: 2009년 11월 6일(금)~7일(토)

장 소: 그랜드힐튼호텔(홍은동)

공동주최: 동아시아사연구포럼, 동북아역사재단

초대의 말씀

가을 하늘이 더없이 높고 푸르고 아름다운 계절입니다.

저희 동아시아사연구포럼과 동북아역사재단에서는 이번에 “역사의 시각에서 본 ‘동아시아 세계’의 아이덴티티와 다양성”이라는 주제로 국제학술회의를 개최하게 되었습니다.

‘동아시아’를 하나의 ‘세계’로서 인식하려는 논의는 오랫동안 이어져 왔으나, 정작 ‘동아시아 세계’가 무엇인지, 그 아이덴티티를 어떻게 정의할 수 있을지, 또 그것이 과연 존재하는지에 대해서는 뚜렷이 정리된 바가 없다고 할 수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이번에 ‘동아시아 세계’의 정체성 문제를 정면으로 다뤄보고자 합니다.

그렇다고 해서 ‘동아시아 세계’를 단일한 실체로 전제하려는 것은 아닙니다. ‘동아시아 세계’ 안에는 여러 가지 정치, 경제, 사회, 문화적 다양성을 내포하고 있습니다. ‘동아시아 세계’의 정체성이 존재한다면 그것은 다양성의 총합이라고도 할 수 있습니다. 이런 다양성의 측면에도 관심을 기울여야 ‘동아시아 세계’의 정체성이 제대로 드러날 것입니다.

저희는 동아시아 정체성의 문제를 역사적 시각에서 바라봄으로써, 동아시아의 밝은 미래를 위한 대화의 장을 마련하고자 이번 학술회의를 기획했습니다. 올해로 3회가 되는 이번 국제학술회의가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관련 연구자들이 모여 동아시아의 공동 번영과 평화를 위해 함께 고민하는 계기가 되고, 또한 진정한 소통과 교류가 이루어지는 기회가 되기를 희망합니다.

2009년 11월

동아시아사연구포럼 운영위원장

이태진

동북아역사재단 이사장

정재정

Invitation

It is that time of year when autumn skies are brilliantly blue and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The Forum for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History and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are holding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theme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World of East Asia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re have long been discussions on viewing East Asia as a single 'world,' but there are no clear definitions of what the 'World of East Asia' is, what its identity is, and whether it really exists. For this reason, the conference aims to take an in-depth look at the identity of the 'World of East Asia.'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World of East Asia' is presumed to be a single entity. The 'World of East Asia' embodies grea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f an identity of the 'World of East Asia' exists, it probably is an aggregation of diversity. The identity of the 'World of East Asia' will be properly defined only when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is aspect of diversity.

We are holding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so that it serves as an arena for discussions that will lead to a bright future for East Asia by addressing the matter of East Asia's identit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thir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ers in East Asia to come together to engage i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East Asian prosperity and peace.

YI Taejin

Chairperson, Forum for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History

CHUNG Jaejeong

President,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9

목 차

【Keynote Speech】

- 东亚的同一性与历史认识跨越国境) 步平 (BU Ping) 9

【Panel 1-1 ‘東아시아(Asia) 世界’에 관한 認識과 그 多樣性】

- 中日近代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对东亚地区认同的影响
..... 梁云祥 (LIANG Yunxiang) 54
- 日本近世史研究における「鎖国」の 見直しと東アジア
..... 木村直也 (KIMURA Naoya) 36
- 60年来不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姜义华 (JIANG Yihua) 78
- 近代韓國 東아시아 認識의 起源과 轉換 최덕수 (CHOI Deoksoo) 17

【Panel 1-2 東아시아(Asia)의 多文化主義: 談論과 政策】

- 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 岩渕功一 (IWABUCHI Koichi) 7
- 韓國社會의 多文化 談論에 對한 省察的 接近 설동훈 (SEOL Donghoon) 19
- ‘다문화주의’를 거슬러 다문화사회를 만드는 것은 가능한가
..... 김영옥 (KIM Youngok) 193

【Panel 2-1 東아시아(Asia)의 域內移動과 아이덴티티(identity)】

- 战后初期留日学生、华侨的选择和国家认同 王雪萍 (WANG Xueping) 219
- 19世紀函館外国人居留地と華商－函館華僑から北海道華僑へ
..... 小川正樹 (OGAWA Masaki) 2
- 1940年代後半における日韓間の人々の移動と米軍による監視
..... 小林聡明 (KOBAYASHI Somei) 5
- 同順泰文書を 통해 본 近代轉換期 朝鮮華商의 他者認識
..... 강진아 (KANG Jina) 3

【Panel 2-2 歷史 記憶과 解析】

- 中国的东亚意识与东亚叙述 徐秀丽 (XU Xiuli) 39
- 大东亚”想像：以近代中国话语为中心 雷 颐 (LEI Yi) 399
- 韓國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과 ‘東아시아史’ 科目 장세운 (CHANG Seiyoon) 7
- 歷史理解的單位－1930年霧社事件的記憶與詮釋 吳密察 (WU Micha) 49



东亚的同一性与历史认识跨越国境

■ 步 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东亚的同一性与历史认识跨越国境

步 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次〉

- 一 “东亚共同体”与东亚地区的认同性（identity）
- 二 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努力
- 三 历史问题对话的不同层面
- 四 历史认识如何跨越国境

一 “东亚共同体”与东亚地区的认同性（identity）

日本民主党取得政权后，首相鸠山由纪夫正式向中国建议建立以欧洲联盟为模式的东亚共同体，而且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作为“构建的东亚共同体的焦点”。中国也表示：致力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进一步深化东亚合作，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网络调查表明，“支持中日共建东亚共同体”比率达到63%。但是，也有对中日共建东亚共同体表示反对的意见，认为中日之间还存在待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人质疑：日本可能只是借此提议缓解其国内经济压力，并非真心想与中国坦诚合作，“对日本依然存有戒心”。¹⁾

其实，提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并非从鸠山首相开始。这些年来，关于在东亚或亚洲各国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协调地区经济、安全、政治等问题的主张有许多。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提出了打造类似欧盟的“亚太共同体”的构想，1991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提出过“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而在这些“构想”提出之前，亚洲地区其实也已经存在有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3等相对成熟且机制化的合作模式。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向前看一些，还会发现，日本在上个世纪的前期，曾经以推翻英美的殖民统治，解放东亚各民族为标榜，提出过建立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标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秩序”的主张，当然，当时还存在石原莞尔主张的“东亚同盟论”，也有三木清（Miki Kiyoshi）、尾崎秀实（Ozaki Hidemi）等人提出联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日本，进而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民众为主体，对东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东亚协同体论”的主张，²⁾等等。

作为历史学者回顾各种各样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固然存在对这些主张肯定或否定，抑或态度积极或是消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应从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角度，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进行深刻的思考。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目前欧洲确实是走在前面，而亚洲相对落后。其实，中世纪晚期西欧经历了剧烈的分裂的过程，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导致基督教“西方帝国”的瓦解和中世纪的结束，同时，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就变成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的主题，同时也

1) 时》，报报报报年9月18日。

2) [日田 弘(Uchida Hiroshi)：《三》，御茶房，2006年版，第2。

带动了世界的整体冲突, 造成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 欧洲近代史就是“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史。但是, 到了 20 世纪后期, 欧洲却突然走向了联合, 现在, 欧洲联盟 (EU) 已经成为事实。然而, 欧洲的模式却在亚洲, 特别是东亚引起了种种关于同一性的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 欧洲存在“我们是欧洲人” (We, Europeans) 的自觉, 即成功地创立了基于欧洲的认同, 而东亚却还没有建立这样的认同认识。³⁾ 也有的学者认为: 欧洲认同的建立与欧洲的历史相关, 认为欧洲虽然有诸多国家, 但是存在统一性的文明, 即如法国历史学家基佐 (Guizot, Francois-Pierre Guillaume) 所提出的“欧洲文明”。这种“欧洲文明”可使欧洲诸国形成一个“超民族主义”的政治体系, 保护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 同时也存在避免争斗的途径。而对于欧洲历史上发生的征战, 则被解释为三个层面 (区域、国家与民众) 认同的冲突。⁴⁾ 赞成这一意见的人认为: 欧洲本来就与亚洲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是欧洲人”的同一性自觉在亚洲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亚洲不可能实现欧洲那样的联合, 建立欧盟那样的共同体则也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也有人对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发展进行分析后认为: 近代欧洲的发展一直平行地存在两条脉络, “一条线是近代国家形态的出现, 即‘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普遍现实。另一条线反映欧洲人相互‘认同感’, 即‘欧洲观念’。前者通向主权国家, 后者通向所谓‘欧洲统一’过程”。“这两条线都承接于中世纪……所以, 要了解近代、乃至当代欧洲的政治哲学, 必须抓住这两个‘观念’: 民族观念和欧洲观念。或者称作‘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民族观念通向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 欧洲观念通向今天的欧洲联盟 (或欧洲一体化进程)’。”⁵⁾ 赞成这一意见的人认为所谓“我们是欧洲人”的同一性, 其实是为了欧盟的建立而特意被突出出来的。

无论对欧洲同一性的作用做如何的判断, 许多人在对东亚存在如欧洲那样的构成认同性的历史基础这一点上认识大体是一致的, 这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东亚地区确实处于汉字文化及儒教文化为标志的文明圈的影响之下。当然, 许多研究证明: 即使处于同一的文明圈中, 各民族与国家的价值观的差异仍然很大, 甚至派生出不同的文明。所以仅以此来证明东亚的认同性仍然缺乏说服力。从某种意义上, 从历史上东亚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东亚认同建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 其目的都在于建立维持东亚地区国际关系, 解决地区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某种特定范式, 亦即东亚秩序。在近代意义的国家产生之前, 古代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被费正清教授概括为“华夷秩序” (the imperial tributary system) 的国家间关系。尽管对“华夷秩序”的评价见仁见智, 但在“华夷秩序”被打破后, 东亚地区迄今为止仍没有建立过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称之为“共同体”的体制。

“华夷秩序”之所以能够成立, 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和“富有的”中国, 以及相对弱的周边。不过“华夷秩序”并不意味着, 甚至也并不谋求对周边实行直接的统治。作为“中央”的中国希望以册封周边国家君主的方式保持安定局面, 间接地发挥其影响力; 而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则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维持内政、外交的自主空间。这样的东亚秩序中不存在明确的支配从属的位阶关系, 与近代世界中的帝国主义对周边的支配关系不同。而且当时亚洲的一些国家, 如日本也仿照“华夷秩序”的模式, 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小规模朝贡体制”, 希望以此改变中国中心的秩序, 被视为是对这一区域秩序的挑战。⁶⁾ 到了 16 世纪末期以后, 以中国中心的秩序更受到来自周

3) 澤弘治 (Kakizawa Hiroji): 『「アジアは一つ」、いまこそ』、東海平究所編: 『東アジアに「共同体」はできるか』、評論社、2006 年。第 224-230 頁。

4) 木畑洋一 (Kihatake Youichi): 洲の性: EC』載蓮重彦 (Hasumi Sige-hiko)、昌之 (Yamauchi Masayuki): 『今、なぜ民族か』京出、1994 年, 第 204-21。

5) 陈民, 周弘: 洲文明』生活读·新知联, 2003 年, 第 106-110。

6) [日] 浜下武志 (amasita Takesh): 『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 年

边国家的批判，小中心自身的认同性逐渐体系化，“华夷秩序”被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央的“华夷秩序”虽然具有“帝国性”。⁷⁾，但确实是当时东亚世界的基本秩序，这种秩序也许并不是理想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模式，但也不失为探索替代帝国秩序方式的一种思想资源。

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借助与英国的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势力南下的同时，上升为地区的“中心”，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后，吞并台湾、朝鲜，进而进入中国东北。而日本的这一兴起恰好伴随着曾经处于地区中央位置的清朝的没落，于是东亚秩序被改变了。从表面上看，以主权观念为基础的“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国际关系秩序的原则有取代东亚传统秩序的倾向，各国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平等的地位。但平等原则在实际上很少被遵守，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及作为其强制手段的武力，即“弱肉强食”的原则。日本提出推翻英美的殖民统治，解放东亚各民族，实际上是企图取代传统的“华夷秩序”，突出日本的主体性，建立大日本帝国的自给自足的体系，这就是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标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秩序”，其思想基础是日本在摆脱中华秩序过程中形成的亚细亚主义。在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后，为了尽快结束持久的战争状态，“和平”地建设东亚的新秩序，还提出“东亚新秩序论”。这种标榜“万国公法”和文明的东亚国际秩序，似乎是尊重主权原则的理想状态，其实是由霸权国家来主导的。

战后的冷战期间，东亚的国际关系长期从属于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而美国通过经济、技术、军事合作等手段力图使东亚各国采用美国的社会体制，在经济方面，其实是部分复活了日本为中心的垂直地域分工体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联系网，在军事方面则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安全保护秩序，总之仍然不可能建立关于东亚的认同。

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在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其内部也在发生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中、日、韩三个东亚地区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东亚秩序的角度看，今天的东亚与历史上东亚的最大不同就是已经不存在“一强称雄”的局面。当代东亚国家间与民众间密切的往来与交流，正在突破建立共同体的三大障碍，即“地理障碍”、“历史障碍”与“同一性障碍”。⁸⁾对于建立东亚地区的认同来说，目前是公认比较好的时机。但是也有人相对冷静地指出：“尽管日、中、韩三个经济大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仍然没有培育起‘共同体意识’，尽管二战结束已经60年，但是在日中、日韩之间，围绕历史认识、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仍然存在政治性、感情性的鸿沟，阻碍了共同体意识的萌芽”。⁹⁾

因此，在培育共同体意识方面，首先需要解决历史问题带来的障碍。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则是其重要的一步。

二 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努力

这些年来，关于历史认识的国际间对话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题目，特别是德国与法国共同编写教科书（《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的努力和结果被认为是在这一方面比较成功的典范。¹⁰⁾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

7) 白永瑞：《东的地域秩序——超越，走向东共同体》，《思想》。第3期《天下东》，第12。白永瑞：《东的地域秩序：超越走向共同体》导批社，2005年，首尔。

8) [日一(Sintou Eichi)、平川均(Hirakawa Hitoshi)：《东共同体设》，日经济评社，2006年，第。

9) [日] 谷口(Taniguchi Makoto)：《东共同体》，岩波，2005年，第4。

10) Claudia Schneide: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 - 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 Asia

国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差异被凸显出来。那么，地处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间是否可以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进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呢？其实，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间也在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而进行着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

值得重视的是：东亚各国的多数历史学者和教师都已经注意在历史教育面向世界的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新的历史教育都力图把本国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以本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部分，尽量从世界性的视野认识本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一些大学分别组织了由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¹¹⁾

同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分别建立了共同研究的机制，如首尔市立大学历史教科书研究会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历史教育研究会组织的“日韩历史教科书讨论会”，两国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的10个团体建立的“日韩历史学会共同历史研究讨论会”等。这些研讨会以日本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和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向，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¹²⁾并分别提出了以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¹³⁾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各国学者与教师的共同研究的局面有了新的进展，并且出现了新的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

例如，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 and 市民团体的代表组织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共同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¹⁴⁾这本书以历史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现，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三国的学生还每年举办相应的历史学习夏令营等交流活动。现在，三国学者与教师组成的共同委员会仍在继续继续努力，对第一本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副教材中的缺陷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讨论与研究的基础上共同编写第二本和第三本。

2001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等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成立了“日中青年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经过数年努力，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就中日历史认识中涉及近现代史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¹⁵⁾

2007年，在经历了多次日本与韩国学者、教师间的共同研讨会后，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岛和彦与韩国学者共同出版了研究成果《日韩交流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¹⁶⁾此外，如日本广岛县教职员工会与韩国大邱市教职员工会还组成了日韩共通历史教材制作组，共同编写了《朝鲜通信使：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友好》，¹⁷⁾日韩两国的妇女团体组成共同历史教材编纂会，联合编写了《从女性的角度看日韩近现代史》等。

11) [日] 山室信：《国际研讨会文集——日本、韩、鲜的相认识与解的表象》，1998年；上育学东亚：《东史表象——与对》，2002年；二：《21世纪认识与国理解——韩、日本的》，2004年。

12) [日] 学会围绕的韩对——共研讨，大店，2004年。

13) [日] 和彦：《的思想——日与韩的近代史》，すずき店，1996年。：韩国日本——育的思想，すずき店，1998年。

14) 《面向史——东的代史》中文行12—13万部；日文行7万部文行5·5万部。

15) 《跨境认》中文版由出版社2006年出版；日文版京出2006年出版。

16) [日] 和彦等：《交流史——古代代》，明店，2007年。

17) 共材制：《通信使丰臣秀吉侵略到友好》，日本明店，2005年出版韩 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上述跨越国境的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共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一，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叙述的比重，二是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问题，在这里，“超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较常见的是从本国史开始向地域史扩大、开放，这种方法被有些人归纳为“同心圆史观”。但是这样的方法能否超越本国史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提出所谓“同心圆史观”的人，其实仍然是在强调本地区为单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¹⁸⁾针对这一现状，有的学者提出了“东亚视角”或“东亚史观”的概念。如有的韩国学者提出要从本国史的解体开始，首先废除国史的名称，将韩国史与世界史合一，思考“世界史中的韩国史”与“韩国史中的世界史”。作为中间阶段，提出“东亚史”，再实际一些，先思考“中日韩三国关系史”。¹⁹⁾

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认识共有的东亚历史，需要历史学家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这种关联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认真研究，才能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

这一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也拉开了序幕。先是日本与韩国在2002年开始了共同历史研究，在2005年告一段落后，于2006年开始了第二期的共同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共同研究在2006年末开始，到现在进行了近两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分为古代（包括中世纪）与近现代史两个组，拟定了共16个题目（古代史方面7个，近现代史方面9个）。特别是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一题目之下的关键词，双方都应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键词撰写文章，进行讨论，所以使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三 历史问题²⁰⁾对话的不同层面

对于上述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跨越国境的努力，各方评价大不相同。有的表示欢迎，有的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的提出批评，表示反对。究其原因，是对历史问题对话的不同层面没有加以区分。

东亚地区历史问题主要反映在政治、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厘清产生历史认识分歧与争论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就历史问题进行对话。

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对话，即明确关于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性质的政治判断。

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与东亚主要国家的关系就处于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首先，日本通过三次与韩国缔结的“协约”，逐渐把持了韩国的外交、内政及军队，到1910年在朝鲜设立总督府而强行实施了合并，在那里进行了殖民统治。进而又通过发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从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么，战后日本对这一战争是否进行了思考与反省呢？从1965年日本与韩国缔结《基本条约》，到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或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来看，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正面的积极表态。1993年担任首相的细川护熙明确认为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担任首

18) 曾担任育的杜胜了突出的同，提出的“同”杜《新生》，《新之路》，台北，三局，2004年。但正如者的是的中心”的民族的实际保持距离的“去化”的王晴佳：代湾述重》，《思想》，，台北，2006年，第120-12。

19) 白永瑞：为东和平史》，海文化》，2004年；东亚述的可能性》，城》，2004年。东的地域秩序——超越，走东共同体》，《思想》。第3期《天下东。》。

20) 里的中间，指存在于中两国就近认识域间，而不包与史，至今而或正在的中系中现实间，弃武间钓鱼海田间。

相的村山富市更发表了至今仍为历届日本首相所明确认可的关于战后50周年的谈话,²¹⁾如果不是日本社会右翼与保守势力,尤其是部分保守议员及官僚对上述反省的态度进行激烈的反对,政治层面的对话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不幸的是,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始终在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特别是“五五体制”确立后,日本社会始终活跃着复古主义的暗流,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观回潮现象极为普遍。有些政治家口头上关于“反省”的表态与其对侵略战争的真正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²²⁾这种态度对后来的日本政治家的影响很大,80年代对战后40年政治的“总清算”思潮,90年代的修正历史认识和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活动,以及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与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有密切联系。1995年105名自民党议员成立“历史研讨委员会”,否认日本合并朝鲜的强制与不合法性,制造“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声称“从军慰安妇”属于商业性质等等,全面否认战争中日本军队的责任,从而否认殖民统治的非法与战争的侵略性质。直到最近,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否认日本是侵略国家的文章还受到奖励。这些情况说明,政治层面的对话仍然是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大是大非的原则判断问题,而这一层面的对话主要是在政府与政治家的层面进行的。

其次是民众层面的对话,即解决东亚各国民众因不对称的历史体验而产生的认识的差异。

毋庸置疑,东亚各国民众,包括日本民众关于战争历史的记忆,最深刻的侧面是战争中的被害。例如,在中国,关于侵略战争的关键词,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概念,而在韩国,有“从军慰安妇”、“创氏改名”、“殖民统治”等概念,而在日本,则主要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这些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毫无疑问是事实,但是并不对称。对于同时具有战争被害与战争加害双重角色的日本国民来说,如果被局限在“本国内部的狭隘的视野”中,²³⁾就会导致“加害意识的缺失”的情况,不可能了解同一历史过程对于战争被害国国民的体验。如战后日本的反战、反核运动是日本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发展的重要的出发点,但在对加害于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强调原子弹爆炸伤害的“被害体验”,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理解。²⁴⁾战后50年的时候,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展览未能顺利地在美国展出,就是典型的证明。当然,日本民众对中国与韩国民众的战争被害情况的不了解,与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舆论控制有关,责任并不在民众方面。而战后以来两国民众未能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也导致了认识的差异。所以,由于不同的历史体验造成的两国人民的认识的差异,具有比较明显的感情因素,与解决政治层面的问题不同,需要民间的深入交往而达到相互理解。

第三是学术层面的对话,主要解决两国历史学研究中因资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历史体验的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差异问题。

东亚各国的近代历史都始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下的被迫“开国”,但是此后各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各国学者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学术研究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对于被迫向国际社会开放,出于对国家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虑,应对西方的挑战,争取中国的复兴,一次又一次地改革和与列强抗争,又一次一次失败,忧患意识不断加重,与列强的冲突与矛盾不断尖

21) 熙(Hosokawa Morihiro)首相明确表示日发战是“侵战”,是错战”。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首相表示:在不久去一期策错,走战的道路,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治和侵给家,洲人带了巨大害和痛苦了避免重错,我心待毫无史此再次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时向史中受到的所国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日】内(Takeuchi Minoru+21世紀国総編:『日交集』、蒼蒼社刊、2005年、第440-441頁。

22) 岸信介(Kishi Nobusuke)在时自辩,日本是“”。认为太平洋战争应反省,即使反省,也只是反战”【日】原彬久(Hara Yoshishisa)著:《岸信介—权的政治家》,岩波、第121-122頁,1995年。

23) 【日】大沼保昭(Onuma Yasuaki):判战争任任》,第14信堂(Tousintou),2007年。

24) 【日】吉田(Yoshita Hiroshi):『現戰責任』店,1997年,第183-18。

锐化。中国学术界关注近代中国面对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²⁵⁾和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抗争。韩国学术界同样关注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的主权的守护及外来的压迫与干涉，特别是在成为殖民地后的独立运动与斗争。²⁶⁾而这一时期日本以“脱亚入欧”的方式“摆脱了亚洲的卑陋，转移至西洋文明”，所以要“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用西洋人对待（支那朝鲜）的方式处理与亚洲的关系”。²⁷⁾与中国对待传统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不同，日本批评依恋“古风旧惯”、“表面虚饰”的“不知廉耻”，认为“接受世界各国通行的道理，……就会跨入国际法公约的门槛”²⁸⁾。相对中国与韩国来说，日本近代史研究关注从西方接受下来的“国际法秩序”所带来的利益。而到了1931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由于中日两国参加不同的国际集团，历史体验完全不对称，更形成了历史认识的不同的思维逻辑。对于中国来说，无论这一期间发生什么事件，面对的战争对手基本是日本，所以是抗日战争。而对于日本来说，“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后，其对手是中国，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主要的对手变成了美国与欧洲，最后期甚至有苏联。

上述历史认识问题的三个层面，在现实中并非泾渭分明，相反，三个层面的问题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这就是历史认识问题至今仍在困扰东亚同一性建立的重要原因。

四 历史认识如何跨越国境

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历史问题中，政治层面的问题涉及到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需要的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面前毫不含糊的明确判断。而民众层面与学术层面的认识的不同是由于历史体验的不同而产生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和两国学者间的共同研究。所谓历史认识跨越国境是指在这两个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当然，由于三个层面的问题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复杂。

如上所述，东亚各国国家与国民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战争期间的历史体验不同，而建立在这一不同基础上的认识的分歧，往往会被保守的政治力量利用而上升到政治层面。

战后审判与处理的不彻底导致的加害意识的缺失，使许多日本国民仅仅感到自己是军部的欺骗宣传的牺牲品，但是对包括殖民地统治、从军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及细菌战和毒气战等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则了解不多，战争责任感迟钝。于是，否认这些战争责任的言行的狭隘民族主义便可大行其道，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煽动历史体验本来就不对称的两国民众的感情，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感情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同样，一些“实证研究”方面的问题本来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²⁹⁾但是如果在研究过程中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尽管在“考证事实”的名义下，能提供一些史料来证实发生在这一历史断面的一部分事实的真相，但不可避免地被一些势力从政治层面加以利用，而且考虑到民众间不对称的历史体验的背景，那种“实证研究”的结果不仅不能得到民众感情上的接受。相反会加剧了国家间和民众间的对立。

正如日本历史学者指出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以所谓的历史事实的认识不同（如被害者的人数问题）为平台进行讨论，用历史认识问题取代责任问题，回避政治责任。一方面为掩盖政治目的而把历史事实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操作，挑起认识问题的争论；另一方面用历史观、历史认识问题

25) 章：筹海防折 《李文忠公》，《奏稿》，21。

26) 李元淳等：《韩史》，日本明道，2005年第2版。

27) 泽吉：《脱亚》，《泽吉全集》，第10卷，第24庆应，岩行。

28) 泽吉：《或随》，《泽吉全集》，第20卷，第1庆应，岩行。

29) 包括“田中奏折”文件的存否问，南京大的者具量问等，这。

取代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用所谓“人类历史上有战争就有民众的伤害”，“为什么只要求日本负责任”等言论回避战争责任。³⁰⁾

比如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有些日本学者不对发动珍珠港奇袭的责任进行深入的思考，却在寻找发生战争的客观理由：美国的铁屑禁运；对日经济封锁政策等，更有甚者则坚持战前军国主义政府宣扬的所谓“ABCD包围圈”的理论³¹⁾，另一方面则强调日本政府做出的避免日美开战的种种外交努力，认为1941年12月的“赫尔备忘录”是美国拒绝谈判的最后通牒和开战的原因。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是在学术层面，但是如果得出“这次战争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³²⁾结论，就直接触及民众的感情，甚至会影响国家关系了。

日本社会近年来反映在战争观上的“复合型战争”观被强化。有的政治家在国会的答辩时就认为日本“对中国有过侵略行为”，“对朝鲜半岛有过殖民统治”，但对美英荷的战争“能否说是侵略战争，我是有疑问的”³³⁾。这种认识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鼓吹的对美国、法国、荷兰的战争“自存自卫战争”即“大东亚战争”的认识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进而发展到认为1945年8月是苏联违背中立条约的原则“非法地”侵占了“满洲”。³⁴⁾90年代中期是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媒体、政界的论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生代政治家”往往认为“那场战争在我们出生前十几年前就结束了”，对过去战争的负疚感和赎罪感已不能与老一辈政治家相比。“战后已经结束”这一观念以及历史修正主义言论十分活跃，如鼓吹“已经结束的战后”，要求对太平洋战争等进行了“历史的重新评估”等。新民族主义更把矛头指向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日本战后出现的新现象，“不承认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发言与行动”³⁵⁾公然要求改写“战后”，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感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也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不同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需要思考不同的解决的方式。

政治层面的问题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紧密相联，或者说是两国结构性变动的结果。随着结构性的变动的延续和基本趋势的明朗化，特别是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真正的建立，政治层面的问题可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法。

作为学者，更需要关注感情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分歧与争论，在这一方面，学者应当通过对资料的掌握和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共同交流的经验，首先在学术层面对中日历史认识中的分歧与争论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而在这一方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 厘清学术研究、民众感情与政治外交三层面的问题

把政治层面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思考，就会失去方向，被导入无尽无休的争论。期望通过经院式的讨论使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获得缓解，也是理想主义的表现。但对于本来是属于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从学术问题衍生出来的涉及政治或感情方面的历史认识问题，学者也需要从学术领域进行研究，注意不要使这些分歧扩大到两民众的感情层面，更不要转化为政治问题。对于已经影响到两国民众的感情和两国政治外交的问题，如果存在学术因素的话，就应首先将其中的学术问题研究清楚，同时思考从感情与政治的层面加以解决的途径。

30) [日]口雄三(Mizoguti yuuzou)：《的京出，2004年。

31) 即太平洋战争开前政府国媒体竭力的“美英中日圈”的这论仅是传并有任何实据照江口圭一(Eguchi Kaichi) 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戦争』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5，2)。

32) 『太平洋への道』(7) (朝日新聞社、1963) 这的代表著作

33) [日] 《朝日》1994年10月25日。

34) [日] 中村(Nakamura Masanori)：后史』岩波，2005年版

35) [日] 荒井信一(Arai Sinichi)：《历史和解是否可能？》，第282页，岩波书店，2006年

2 注意民众的多数并未经历战争历史的背景

战争已经结束 60 年，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越来越少，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 70% 以上。40——60 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 20 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应当避免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的空洞化与抽象化的倾向。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久远的过去，而对于自己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就像游戏一样，只有在电脑的虚拟的空间中可以看到。³⁶⁾持有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战争认识的青年人，很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为消除这种危险的倾向，学者要引导青年一代对战争历史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通过历史教育使青年一代扩大视野，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东亚的历史与未来。

3 实现历史事实的共有，创造相互理解的条件

相互理解作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手段，需要时间与条件。其基础性的工作，首先就是历史事实的共有，只有在共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当然，即使是在本国的同胞之间，实现历史事实的共有也有相当多的困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安静的学术环境与冷静的学术思考。对于目前正在活跃地开展的东亚政府间与民间的学术交流，尽管评价不一，甚至也有批评，但建立在“本国史观”基础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已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的学术交流的重点，首先就要解决历史事实共有的问题，随着学者层面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历史事实共有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学术研究便越来越能够实现跨越国境。

* * *

总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不仅对于建立稳固的东亚各国间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也不仅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外交战略的互惠要求，更重要的实现东亚，乃至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包含社会、文化层次相互理解的基本条件。虽然不能期待一朝一夕的变化，但是必须扎扎实实地努力。

36) [日山田(Yamada Akira)史修正主義の克服』高2001年第10—1頁

동아시아의 아이덴티티와 역사 인식의 국경 넘기

부평(步平) (중국사회과학원 근대사연구소)

〈목 차〉

- I. “동아시아공동체”와 동아시아 정체성 (identity)
- II.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 구축을 위한 노력
- III. 역사 문제 대화의 각 층위
- IV. 역사 인식의 국경 넘기는 어떻게 가능한가

I. ‘동아시아 공동체’와 동아시아 정체성(identity)

민주당 집권 이후 일본 하토야마 유키오(鳩山由紀夫) 총리는 EU를 모델로 하는 동아시아 공동체 구축을 중국에 공식 제안하면서, “중국과 형제처럼 좋은 사이가 되어 동아시아 공동체에서 포커스”로서 역할하고 싶다고 밝혔다. 중국측도 이에 일본을 포함한 동아시아 각국과의 협력을 한층 심화시켜 동아시아 공동체를 목표로 계속 매진할 것이라고 화답했다. 최근 중국과 일본의 동아시아 공동체 구축에 찬성 의견이 63%로 나타난 중국 인터넷 여론 조사 결과가 눈길을 끈다. 그러나 중국과 일본 사이의 미해결 역사 문제를 이유로 이에 반대하는 견해도 있다. 또한 이를 빌미로 일본 국내의 경제 압력을 완화하려는 속셈일 뿐이라며, 일본이 진심으로 중국과 협력을 바라는 것이 아니라며 “일본에 대한 경계심을 늦춰서는 안 된다.”¹⁾는 입장도 있다.

사실 ‘동아시아 공동체’는 하토야마 총리가 처음 제안한 것은 아니다. 최근 동아시아 또는 아시아 각국의 긴밀한 관계 정립이나 역내 경제, 안보, 정치 등 분야의 협력에 관한 제안이 많았다. 2008년 호주 러드 총리는 EU와 비슷한 ‘아시아태평양 공동체’ 구상을 제안하였고, 1991년 말레이시아 마하티르 총리 역시 ‘동아시아 경제 공동체’ 구상을 내놓았다. 사실 이러한 ‘구상’이 나오기 전부터 아시아에는 이미 APEC, ASEAN+한중일과 같은 제도적 틀을 갖춘 협력 방식이 마련되어 있었다.

우리가 조금 더 예전으로 눈길을 돌려 본다면, 20세기 전반기 일본이 영미 식민 통치에 맞서 동아시아 각 민족의 해방을 표방하면서 ‘대동아 공영권’이라는 일본 중심의 ‘대동아 질서’ 구축을 주장했다는 사실을 발견하게 될 것이다. 물론 당시에는 이시하라 간지(石原莞爾)의 ‘동아연맹론’도 있었고, 미키 기요시(三木清), 오자키 히데미(尾崎秀實) 등의, 중국과 연합한 사회주의 혁명으로 일본을 개혁하여 일본을 필두로 동아시아 민중이 주체가 되어 동아시아를 사회주의로 개조한다는 ‘동아협동체론’²⁾도 있었다.

역사학자로서 ‘동아시아 공동체’에 관한 갖가지 주장을 되돌아보면, 나름 긍정적인 면과 부정적

1) Global Times時』 200년월1일

2) [日田弘(Uchita Hirosh) 『三,御茶,200년 판,2페이지

인 면이 모두 보인다. 하지만 중요한 것은 역사의 경험과 교훈을 종합하여 동아시아 공동체 구축 제안에 대해 깊이 있는 사고를 이끌어내는 작업이다.

지역 협력의 각도에서 볼 때, 현재 유럽은 확실히 앞서 가고 있고 아시아는 뒤처져 있다. 사실 중세말 서유럽이 극심한 분열을 겪는 과정에서 기독교 세계는 각각의 ‘민족 국가’로 분열되었고, ‘민족 국가’의 형성은 기독교 ‘서방 제국’의 와해시키고 중세를 마감하였다. 이와 함께 민족 국가 사이의 충돌이 근대 서구 국제 관계의 테마가 되었고, 이에 따라 세계의 총체적인 충돌, 즉 세계 대전을 배태했다. 어떤 의미에서 유럽 근대사는 곧 ‘민족 국가’ 사이의 전쟁사이다. 하지만 20세기 후반들어 유럽은 갑자기 통합의 길로 들어서, 이제 유럽연합(EU)은 기정사실이 되었다. 하지만 유럽의 모델은 아시아에서 특히 동아시아에서 정체성에 관한 일련의 논쟁을 불러일으키고 있다.

일각에서는 유럽에 “우리는 유럽인(We, Europeans)”이라는 자각이 있었기에 유럽에 기반한 아이덴티티를 성공적으로 구축했지만, 동아시아에는 이러한 정체성 인식이 형성되지 않았다고 본다.³⁾ 또한 유럽 정체성의 구축과 유럽의 역사와 관련하여, 유럽은 수많은 나라로 나뉘어 있었지만 통일된 문명, 즉 프랑스 역사학자 기조(Guizot, Francois-Pierre Guillaume)가 말한 ‘유럽 문명’이 존재했다고 보기도 한다. 이러한 ‘유럽 문명’이 유럽 각국을 하나의 ‘하이퍼 내셔널리즘’적 정치 시스템으로 묶어내 유럽 공동의 문화 유산을 지켜냈으며, 동시에 싸움을 회피하는 경로가 있었다는 것이다. 유럽 역사에서 일어난 정복 전쟁에 대해서는 세 가지 층위(지역, 국가, 민족)의 정체성 충돌로 해석한다.⁴⁾ 이러한 의견에 동의하는 학자들은, 유럽은 본래 아시아와는 완전히 다르고, ‘우리는 유럽인’과 같은 정체성 자각이 아시아에서는 매우 취약하여 유럽과 같은 통합은 실현 불가능하므로, EU같은 공동체 구축은 ‘유토피아’적인 환상에 불과하다고 본다.

반대로 근대 유럽의 정치 문화 발전을 분석한 결과, 근대 유럽의 역사는 늘 두 맥락이 평행선을 그렸는데, “하나는 근대 국가 형태의 출현, 즉 ‘민족 국가’가 유럽의 보편적 현실이 되는 것이고, 다른 하나는 유럽인의 상호 ‘정체성’, 즉 ‘유럽 관념’을 반영한다. 전자는 주권 국가를 지향했고, 후자는 소위 ‘유럽 통일’ 과정을 지향했다.”는 의견도 있다.” “두 선은 모두 중세기를 계승했다.....따라서 근대 나아가 현대 유럽의 정치 철학을 이해하려면 민족 관념과 유럽 관념이라는 두 개의 ‘관념’을 놓치지 말아야 한다. 후자는 이를 ‘민족주의’와 ‘유럽주의’라고 부르기도 한다. 민족 관념은 민족국가 및 다민족 ‘연방제 국가’를 지향하고, 유럽 관념은 오늘의 유럽 연합(또는 유럽 통합 과정)을 지향한다.”⁵⁾ 이 의견에 동의하는 이들은 소위 ‘우리는 유럽인’이라는 정체성이 사실은 EU 구축을 위해 일부러 강조된 개념에 불과하다고 본다.

유럽 정체성의 역할을 어떠한 판단하든, 동아시아에 유럽과 같은 아이덴티티를 구성하는 역사적 기반이 있는가에 대해서는 대체로 일치된 인식을 보인다. 그것은 바로 사람들이 늘 강조하는, 동아시아가 한자 문화와 유교 문화로 대표되는 문명권의 영향 아래에 있다는 사실이다. 물론 여러 연구를 통해 밝혀진 바와 같이, 동일한 문화권에 속해 있지만 각 민족과 국가의 가치관

3) 澤弘(Kakizawa Hiroj), 『「アジアは一つ」、いまこそ,東海平究所編: 『東アジアに「共」はできるか,評論,200년,2223페이지

4) 木畑洋(Kihatake Youich), 洲の性: E C, 重(Hasumi Sigeihik)昌(Yamauchi Masayuk) 엮음 『今、なぜ民族か,京出,199년,2021페이지

5) 民&周弘, 『洲文明』,生活讀·新知店,200년,1010페이지.

의 차이는 여전히 크며 심지어 서로 다른 문화를 파생시키기도 했다. 따라서 동아시아 정체성을 증명하기에는 이것만으로는 설득력이 부족하다. 어떤 의미에서 우리는 동아시아 질서가 변화하는 역사 속에서 동아시아 정체성 구축이 얼마나 어렵고 복잡한 과제인가를 확인할 수 있다.

역사적으로 나타난 갖가지 ‘동아시아 공동체’ 관련 주장들은 모두, 동아시아 국제 관계를 유지시켜 역내 국제 문제 해결에 적용 가능한 특정한 패러다임, 즉 동아시아 질서를 구축하려는 목적을 가지고 있다. 근대적 의미의 국가가 탄생하기 전에, 고대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 주도적 지위를 차지했던 것은 정청(正淸) 교수에 의해 ‘화이질서(the imperial tributary system)’로 개괄된 국가 관계였다. ‘화이질서’에 대한 평가는 다양하지만, ‘화이질서’가 무너진 이후 동아시아에는 아직까지 진정한 의미에서 ‘공동체’라고 부를 수 있는 체제는 구축되지 않았다.

‘화이질서’의 성립 배경에는, 우선 ‘강대’하고 ‘부강’한 중국과 상대적으로 약한 주변부가 있었다. 하지만 ‘화이질서’는 결코 주변부에 대한 직접적인 통치를 의미하지도 심지어 추구하지도 않았다. ‘중앙’으로서 중국은 주변국 군주를 책봉하는 방식으로 정세 안정을 유지하여 간접적으로 영향력을 행사하고자 했다. 이에 주변국과 민족은 중국과의 조공 관계를 통해 국가의 안전과 내정과 외교의 자주적 공간을 확보하고자 했다. 이러한 동아시아 질서 속에는 지배-복종과 같은 분명한 위계 질서는 존재하지 않으므로, 근대 제국주의의 주변부에 대한 지배 관계와는 구별된다. 게다가 당시 아시아 일부 국가, 예를 들어 일본의 경우 ‘화이질서’를 모델로 삼아 스스로를 중심으로 ‘소규모 조공 체제’를 형성하여 중국 중심의 질서를 바꾸려고 했는데, 이는 화이질서에 대한 도전으로 간주되었다.⁶⁾ 16세기 말 이후에 이르러 중국 중심의 질서는 주변 국가의 비판을 받게 되었고, 소중심 스스로의 정체성이 점진적으로 체계화되면서, ‘화이질서’는 흔들리게 되었다.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하는 ‘화이질서’는 비록 ‘제국성’은 있었지만⁷⁾, 당시 동아시아 세계의 기본 질서임에는 틀림없었다. 이러한 화이 질서는 이상적인 동아시아 질서의 모델은 결코 아니지만, 제국질서를 대체할 방식을 모색할 때 사상적 자원으로서는 부정될 이유도 없다.

근대 들어서 일본은 영국과의 동맹 체제를 강화해 러시아 세력의 남하를 저지하는 한편, 지역의 ‘중심’으로 자처하면서 미국의 지원을 업고 타이완과 조선을 병합하고 나아가 중국 동북 지역으로 진출했다. 이러한 일본의 대두는 공교롭게도 과거 이 지역의 중심이던 청나라의 몰락과 함께 진행되었고, 이에 따라 동아시아 질서가 바뀌었다. 표면적으로 살펴볼 때, 주권 관념을 기반으로 하는 ‘만국공법’으로 기술되는 국제관계 질서의 원칙이 동아시아 전통 질서를 대체하는 경향을 보여, 각국은 최소한 형식적으로는 평등한 지위를 가졌다. 하지만 평등의 원칙은 실질적으로는 거의 지켜지지 않았다. 주도적 지위를 차지한 것은 자본주의의 동력이자 그 강제 수단인 무력, 즉 ‘약육강식’의 원칙이었다. 일본은 영미 식민 통치에 맞선 동아시아 각 민족의 해방을 주장했다지만, 사실상 기존의 ‘화이 질서’를 대체할 일본이라는 주체를 내세워 대일본제국의 자급자족 시스템을 구축하고자 했다. 이것이 바로 ‘대동아 공영권’으로 나타난, 일본을 중심으로 하는 ‘대동아 질서’였다. 그 사상적 기반은 중화질서를 벗어나는 과정에서 형성된 아시아주의였다. 중국 침략 전쟁을 시작한 이후 지구전 양상으로 흐르는 전쟁을 조속히 마무리짓기 위해 ‘평화’적으로 새로운 동아시아 질서를 구축한다는 ‘동아신질서론’도 제안했다. ‘만국공법’과 문명적 동아시아

6) [日] 浜下武志(amasita Takeshi), 『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岩波書, 1999년

7) 백영서, 「동아시아의 지역질서, 제국을 넘어 동아시아 공동체로」, 『思想』, 第3期 『天下, 東, 』, 12페이지. 백영서, 『동아시아의 지역질서: 제국을 넘어 공동체로』 서론, 창비사, 2009년, 서울.

아 질서를 표방하는 이러한 주장은 마치 주권 원칙을 존중하는 이상적인 상태인양 보이지만, 사실은 패권 국가가 주도하는 질서였다.

전후 냉전 시기, 동아시아 국제 관계는 오랫동안 미국과 소련을 중심으로 하는 양대 진영의 대립에 종속되었다. 미국은 경제, 기술, 군사 협력 등의 방법으로 동아시아 각국이 미국식 사회 체제를 선택하도록 했고, 경제적으로는 사실상 일본을 중심으로 하는 수직 분업 시스템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대동아공영권 형태의 경제망을 부활시켰으며, 군사적으로는 미국을 중심으로 동아시아 안전보장 질서를 구축하여, 결과적으로 동아시아 정체성은 여전히 형성될 수 없었다.

탈냉전 시대에 들어선 동아시아는 세계화와 경제 글로벌화의 충격 속에서 내부적으로도 중요한 구조적 변화가 일고 있다. 동아시아의 주요국가인 한국, 중국, 일본의 역량 차이에도 큰 변화가 일어나고 있다. 동아시아 질서의 관점에서 볼 때, 오늘날 동아시아와 역사 속의 동아시아의 가장 큰 차이점은 바로 '1강' 헤게모니는 이미 불가능하다는 점이다. 현대 동아시아 국가와 민중 사이에는 긴밀한 교류와 왕래가 이루어지고 있으며, 공동체 구축의 3대 장애물인 '지리적 장벽', '역사적 장벽' 및 '정체성 장벽'을 뛰어넘고 있다.⁸⁾ 동아시아 정체성 구축에 있어 지금이 최적기라고 거의 모두가 동의한다. 하지만 "한중일 세 경제대국의 경제 의존 관계는 점점 더 긴밀해지고 있지만 '공동체 의식'은 키우지는 못했으며, 2차 대전이 끝나고 벌써 60년이지만 중국과 일본, 한국과 일본 사이에는 역사 인식, 교과서, 야스쿠니 신사 참배 등의 문제를 둘러싸고 여전히 정치적이고 감정적인 틈이 남아 있어 공동체 의식의 싹을 짓밟고 있다."⁹⁾는 냉정한 판단도 있다.

따라서 공동체 의식을 키우기 위해서 우선 역사 문제로 인한 장애물을 해결해야 한다. 이 가운데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 구축이 곧 가장 중요한 첫걸음이다.

II.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 구축을 위한 노력

최근 역사 인식에 관한 국제 대화에 사람들이 관심을 가지기 시작했다. 특히 독일과 프랑스의 공동 교과서[『1945년 이후의 유럽과 세계』(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 프로젝트의 노력과 성과물은 이 분야의 가장 성공적인 사례로 평가된다.¹⁰⁾ 상대적으로 아시아, 특히 동아시아의 한중일 간에는 역사 인식 차이가 보다 뚜렷하다. 그렇다면, 동아시아 지역에 속한 중일 양국은 역사 대화가 가능할까? 대화를 통해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 구축이 가능할까? 사실상 최근 한중일 학자들 역시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 구축을 위해 의미 있는 시도와 노력을 해왔다.

주목할 것은, 동아시아 각국의 수많은 역사학자와 교사들은 모두 역사 교육의 세계화를 위해 노력해 왔고, 새로운 역사 교육은 자국의 역사를 세계 역사 속에 넣어 자국사를 세계 역사의 일부로서 세계적인 시야에서 자국 역사의 발전과 변화를 인식하려고 노력한다는 사실이다.

1990년대 후반, 일본의 일부 대학에서는 일본, 미국, 중국(타이완 포함), 한국 학자가 참여하는

8) [日一](Sintou Eichi, 平川均(Hirakawa Hitoshi 역음, 東共設, 日評200년, 페이지

9) [日] 谷(Taniguchi Makot), 東共, 岩波, 200년, 4페이지

10) Claudia Schneide,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 - 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 Asi.

‘동아시아 상호 인식과 오해’ 연구 프로젝트를 각각 조직하여, 동아시아사 인식 문제를 논의하고 연구 보고서를 냈다.¹¹⁾

비슷한 시기, 일본과 한국의 교육 기관과 학술 단체도 각각 공동 연구의 틀을 구축했다. 서울 시립대학 역사교과서연구회와 일본 동경학예대학 역사교육연구회가 조직한 ‘한일 역사교과서 연구회’와 양국 역사학 및 역사 교육 관련 10개 단체로 조직된 ‘한일 역사학회 공동역사 연구회’ 등이 그것이다. 이들 단체는 90년대 중후반기 일본에 나타난 역사 수정주의 편향과 ‘새역사교과서’ 관련 극우주의 동향에 대해 동아시아 각국 민중의 상호 역사 이해를 목표로 활발한 토론을 벌인 결과, 동아시아의 공생과 역사 교과서 문제를 도출했다.¹²⁾ 또한 각자 공동 연구를 기반으로 하는 성과물을 내놓았다.¹³⁾

21세기 들어 동아시아 각국의 학자와 교사들의 공동 연구에 새로운 진전이 생기면서 새로운 성과가 나타났는데, 그 대표적인 성과물은 다음과 같다.

먼저, 2002년부터 한중일 학자, 교사, 시민단체 대표가 매년 한 차례 열고 있는 ‘역사 인식과 동아시아 평화 포럼’은 토론을 거쳐 한중일 세 나라의 공동 역사 편찬 위원회를 조직하였다. 3년의 공동 연구와 논의를 거쳐 2005년 세 나라는 『미래를 여는 역사—동아시아 3국의 근현대사』를 내놓았다.¹⁴⁾ 이 책은 역사 부교재의 형식을 취하면서, 세 나라 중고등학교에서 어느 정도 활용되고 있으며, 세 나라 학생들은 또한 매년 역사 여름 캠프와 같은 교류 활동을 갖고 있다. 현재 세 나라 학자와 교사들로 구성된 공동 위원회가 후속 작업을 진행하고 있다. 공동 역사 교과서를 1권으로 삼고, 그 부족한 부분을 연구하여 충분한 논의를 기반으로 2권과 3권을 공동 편찬할 예정이다.

2001년 일본 동경대학 미타니 히로시(三谷博) 교수 등과 류제(劉杰) 등 제일 중국학자들이 ‘중일 청년 역사학자 회의’를 조직하여, 역사 문제를 배경으로 중일 양국의 사회 변동을 다루었다. 다년 간의 노력을 거쳐 2006년 일본과 중국에서 동시에 출판한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을 통해 중일 역사 인식 가운데 근현대사 관련 주요 문제를 깊이있게 다루었다.¹⁵⁾

여러 차례 한일 학자 및 교사가 참여한 공동 심포지엄을 진행하면서, 2007년 동경학예대학 기미지마 가즈히코(君島和彦) 교수와 한국 학자들은 연구 성과물을 『한일 교류의 역사—선사부터 현대까지』¹⁶⁾로 펴냈다. 이 밖에도 일본 히로시마현 교직원 노조와 한국 대구시 교직원노조는 한일 공동 역사 교재 제작팀을 구성하고, ‘『조선통신사: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의 조선침략과 우호의 조선통신사』¹⁷⁾를 공동 편찬하였다. 한일 양국의 여성단체로 구성된 공동 역사 교재 편찬회 또한 『여성의 눈으로 본 한일 근현대사』를 함께 출판했다.

이와 같은 국경을 넘는 공동 역사 연구와 교재 편찬의 노력은 비록 표현 형식이 다르고 공동

11) [日] 山室信一 엮음, 『國討會文集—日本、の相識與解の表象』, 199년; 上育東, 『東史表象—二夫 엮음, 『21 史識與國理解—韓、の日本的』, 200년.

12) [日] 研, 『围史教的——共史研究討』, 大店, 200년.

13) [日] 和, 『教的思想——日與韓の近代史』, すすき, 199년. 정재정, 『韓國日本—史教育的思想』, すすき, 199년.

14) 『미래를 여는 역사—동아시아 3국의 근현대. 중국어판은 11만 부, 일본어판은 만 부, 한국어판은 만천 부 발간.

15)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 중국어판은 중국사회과학문헌출판사 文献出版에서 200년 출판하고, 일본어판은 동경대학출판회 京出에서 200년 출판하였다.

16) [日] 和 외, 『交流史——从古代到现代』, 明, 200년.

17) 한일공동역사교재 제작팀, 『조선통신사: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의 조선침략과 우호의 조선통신』, 한국은 한길사에서 200년 출판, 일본은 明에서 200년 출판.

연구의 수준도 차이가 있지만,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을 구축하려는 목표는 공통된 것이었다. 그 중 하나는 각국의 세계사 서술에서 과도한 서구 중심주의 영향에서 벗어나 아시아 기술의 비중을 높이는 것이고, 또 하나는 자국사와 동아시아사의 관계로서, 특히 ‘자국사의 틀을 뛰어넘는 동아시아사’ 구축의 가능성을 고민하는 것이었다. 여기서 ‘뛰어넘기’란 매우 중요한 개념이다.

자국사와 동아시아사의 관계에 대해 다양한 시각이 있을 수 있다. 비교적 보편적인 견해는 자국사에서 시작해 지역사로 확대 개방하는 방식으로, 이는 ‘동심원사관’으로 총칭되기도 한다. 하지만 이러한 방법으로 자국사를 뛰어넘는 것이 가능한가가 고민해야 할 문제다. 소위 ‘동심원사관’을 주장하는 이들은 사실상 이 지역을 단일 중심으로 하는 민족주의 사관을 강조하기 때문이다.¹⁸⁾ 이러한 현상에 대해 어떤 학자들은 ‘동아시아 시각’이나 ‘동아시아 사관’이라는 개념을 제시하기도 한다. 일례로 일부 한국 학자는 자국사의 해체에서 시작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한다. ‘국사’라는 이름부터 폐기하고 한국사와 세계사를 하나로 묶어 ‘세계사 속의 한국사’와 ‘한국사 속의 세계사’를 고민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중간 단계로서 ‘동아시아사’를 제안하지만, 보다 실질적으로는 ‘한중일 삼국 관계사’를 고민해야 한다고 본다.¹⁹⁾

자국사를 넘어서, 국민 국가의 역사 기억을 넘어서, 인식을 공유하는 동아시아 역사를 위해서는 역사학자들이 서로 다른 역사 기억을 통합하여 그 속에서 연관성을 찾아내고 공통성을 사고해야 한다. 이러한 연관성과 공통성이 아무리 취약하다 하더라도, 진지하게 연구할 때 우리는 역사 인식의 공유를 실현할 수 있다.

바로 이 때 정부 주도의 역사 공동 연구도 서막을 열었다. 먼저 한국과 일본이 2002년부터 공동 연사 연구를 시작해 2005년에 종료하고, 다시 2006년부터 2차 공동 연구를 시작했다. 일본과 중국의 공동 역사 연구는 2006년 말 시작되어 지금까지 거의 2년 가까이 진행되었다. 중일 공동 역사 연구는 고대(중세 포함)과 근현대사 두 그룹으로 나뉘어, 모두 16개 과제(고대사 7개, 근현대사 9개)를 선정하였다. 특히 근현대사 부분에서는 과제명뿐 아니라 그 밑의 키워드까지 결정하여, 양측은 같은 제목과 키워드를 가지고 각각 논문을 작성하고 토론을 진행하게 되어 관련 연구가 깊이를 더하게 된다.

III. 역사 문제²⁰⁾ 대화의 각 층위

이상의 역사 인식의 국경을 뛰어넘기 위한 노력은 다양한 평가를 받고 있다. 일각에서는 환영하고 있지만, 다른 한 편에서는 이해할 수 없다는 반응을 보이기도 하며, 심지어 비판하면서 반

18) 타이완교육부 장을 역임했던두정성柱)은 소위 타이완 정체성을 강조하면서, 동심원 사를 주장했다.柱, 一个新, 『新之路, 台, 三, 200년 참조. 하지만 일각의 비판처럼, 이는 타이완의 단일성을 강조하는 민족주의의 표현에 불과하며, 실질적으로는 중국 대륙과 거리를 두기 위한 소위탈중국화去의 절차에 불과하다.王晴, 当代台述的双重, 『思想, 2, 台, 200년, 1212페이지 참조

19) 백영서, 「동아시아 평화 구축을 위한 역사 읽기」, 『黃海文化, 200년; 矣東亞述的可能, 城, 200년. 동아시아의 지역질서, 제국을 넘어 동아시아 공동체, 『思想, 第3期 『天, 東, 台灣

20) 여기서 중일 역사 문제는 중일 양국 사이에 근대사 인식 영역의 문제를 가리키는 것으로, 일본이 버리고 간 화학무기 처리 문제, 다오위(센카쿠) 섬, 동해 석유가스 자원 등 역사와 관계 있으면서 지금까지 현안으로 남아 해결되지 못하였거나 지금 해결 중인 중국과 일본의 현실적인 영토 및 자원 문제는 포함하지 않는다

대하기도 한다. 그 이유는 역사 대화의 각 층위를 구분하지 않기 때문이다.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역사 문제는 주로 정치, 감정, 학술 연구라는 각각 다르지만 서로 관련된 층위에 반영된다. 따라서 역사 인식의 차이와 쟁점을 낳는 각 층위를 구분할 때 역사 문제에 대한 대화가 가능하다.

먼저 정치 층위의 대화는, 일본이 진행한 식민 통치와 침략 전쟁의 성격에 대한 정치적 판단을 명확히 내리는 것이다.

20세기 초부터 일본과 동아시아 주요 국가의 관계는 비정상적인 상황에 놓였다. 첫째, 일본은 3차에 걸쳐 한국과 ‘협약’을 체결하면서 한국의 외교, 내정 및 군대를 야금야금 장악했으며, 1910년에는 조선에 총독부를 두어 강제로 병합하고 식민통치를 하였다. 나아가 다시 1931년의 9·18 사변과 1937년의 루거우차오(蘆溝橋) 사건을 통해 중국 동북 지역을 차지하고 결국 중국을 상대로 전면전을 일으켰다. 그렇다면 전후 일본은 이 전쟁에 대해 사고하고 반성했는가? 1965년 『한일협정』부터 1972년의 『중일 공동 성명』 또는 1978년의 『중일 평화 우호 조약』까지의 내용으로 볼 때, 일본 정부는 이미 긍정적인 자세를 적극 보였다. 1993년 취임한 호소카와 모리히로(細川護熙) 총리는 당시 일본이 일으킨 전쟁은 ‘잘못된 전쟁’이며 ‘침략 전쟁’이라고 명확히 밝혔고, 1995년 취임한 무라야마 도미이치(村山富市) 총리는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 지금까지 역대 일본 총리로서는 가장 명확히 인정한 전후 50주년 담화²¹⁾를 발표했다. 일본 사회의 우익 보수 세력, 특히 일부 보수파 의원과 관료들이 이상과 같은 반성에 극렬히 반대하고 나서지 않았다면, 정치 층위의 대화는 거의 불필요한 것이다. 하지만 불행하게도, 전후 일본 정계는 시종일관 침략 전쟁의 성격을 부인했다. 특히 ‘55년 체제’가 확립된 이후 일본 사회 저변에 복고주의의 흐름이 흐르면서 ‘대동아 전쟁’을 긍정하는 사관 역류 현상이 극히 보편화되었다. 일부 정치가는 입에 올리는 ‘반성’과 침략 전쟁에 대한 스스로의 인식이 전혀 일치하지 않으며, 심지어는 대립하기도 한다.²²⁾ 이러한 태도는 이후 일본 정치가에 대해 큰 영향을 미쳤다. 80년대 전후 40년 정치에 대한 ‘충청산’ 물결, 90년대 역사 인식 수정과 ‘새역사교과서’ 작업을 한 ‘자유주의사관연구회’의 활동 및 계속되는 총리의 야스쿠니 신사 참배 등은 침략 전쟁의 책임을 부인하는 인식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 1995년 105명의 자민당 의원은 ‘역사 검토 위원회’를 조직하여, 일본의 조선 병합의 강제성과 위법성을 부인하고 ‘난징 대학살 허구론’을 만들어 내었으며 ‘종군위안부’는 상업적 성격에 속한다고 주장하는 등, 2차 대전 당시 일본 군대의 책임을 전면 부인하고 나아가 식민 통치의 위법성과 전쟁의 침략적 성격을 부인하였다. 최근까지도, 일본은 침략국가가 아니라고 부인하는 일본 자위대 항공 마료장 다모가미 도시오(田母神俊雄)의 논문이 상을 받았다.

21) 호소카와 모리히로, Hosokawa Morihiro) 총리는 일본이 일으킨 전쟁은 침략 전이며 잘못된 전이라고 분명히 밝혔다. 무라야마 도미이치, Murayama Tomiichi) 총리는 일본이 멀리 않은 과거에 한 때 국책이 잘못되어 전쟁의 길로 걸어가, 국민을 존망의 위기에 빠뜨리고 많은 나라를 식민 통치하고 침략했다. 특히 아시아 각국 국민들에게 큰 아픔과 상처를 주었다. 앞으로 잘못을 되풀이하지 않기 위해, 나는 솔직하게 의문의 여지가 없는 이 역사 사실을 직시하며, 이에 다시 한번 심각한 반성과 진심어린 사과를 표한다. 동시에 이 역사 속에서 피해를 입은 모든 국내외 인사들에게 침통한 애도를 표한다고 말했다 [日] 竹内 (Takeuchi Minoru + 21世紀総研, 『日交文献集』, 蒼蒼社, 200년, 4444페이지

22) 키시 노부스케, Kishi Nobusuke)는 감금 당시 스스로를 변호하면서, 일본은 정당 방위라고 주장하였다. 그는 태평양 전쟁을 반성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한 적은 한 번도 없고, 굳이 반성해야 한다면 왜 패했는가를 반성해야 한다고 생각했다. [日] 原彬 Hara Yoshishis), 『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 岩波, 199년 1212페이지 참고

이러한 상황은 정치 층위의 대화가 아직도 침략 전쟁의 성격과 근본적인 시비를 가리는 원칙적 판단 문제이며, 이 층위는 대화는 주로 정부와 정치가들 사이에서 진행되어야 한다는 사실을 보여준다.

다음으로 민중 층위의 대화는, 동아시아 각국 민중의 비대칭적인 역사 체험으로 인한 인식의 차이를 해결하는 것이다.

당연한 말이지만, 전쟁 역사에 대한 일본을 포함한 동아시아 각국 민중의 기억에서 가장 중요한 측면은 전쟁의 피해이다. 예를 들어 중국에서 침략 전쟁에 관한 키워드는 ‘난징 대학살’, ‘731 세균 부대’, 삼광(三光) 작전’ 등의 개념이고, 한국에서는 ‘종군 위안부’, ‘창씨개명’, ‘식민 통치’ 등의 개념이며, 일본에서는 주로 ‘히로시마 나가사키 원자탄’, ‘도쿄 대공습’, ‘오키나와 작전’ 등이다. 전쟁의 역사에 대한 이러한 기억들은 의문의 여지가 없는 사실이지만, 결코 대칭적이지는 않다. 전쟁의 피해자이자 가해자라는 이중적 역할을 한 일본 국민들은 ‘자국 내부의 협소한 시야’에 머물러 있는다면²³⁾, ‘가해 의식의 결여’를 초래해 같은 역사 과정에서 전쟁 피해 국민들의 체험을 이해할 수가 없게 된다. 전후 일본의 반전 반핵 운동의 경우, 일본 민주주의와 평화 운동 발전의 중요한 출발점이지만, 다른 민족에게 피해를 입힌 전쟁 책임에 대한 반성을 결여한 상태에서 원자탄 피해만을 강조하는 ‘피해 체험’은 광범위한 이해를 얻을 수 없다.²⁴⁾ 전후 50년 동안, 일본 히로시마 원자폭탄 자료관의 전시회가 미국에서 순조롭게 열리지 못하는 것이 바로 가장 전형적인 예이다. 물론, 일본 민중이 중국과 한국 민중의 전쟁 피해에 대해서 모르는 것은 전쟁 당시 일본 군국주의 정부의 여론 통제와 관련되므로, 책임이 민중에게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또한 전후 양국 민중이 이 문제에 대해 충분한 교류와 대화를 하지 못한 것 역시 인식의 차이를 초래했다. 서로 다른 역사 체험으로 인한 양국 민중의 인식 차이는 감정적 요인이 비교적 크다. 따라서 정치 층위의 문제 해결과는 달리, 민간의 깊이 있는 왕래를 통해 상호 이해에 도달해야 할 필요가 있다.

세 번째는 학술 층위의 대화로, 주로 양국 역사 연구 속에서 자료의 활용, 연구 방법론의 차이, 역사 체험의 차이 등으로 인해 나타나는 인식 차이를 해결하는 것이다.

동아시아 각국의 근대사는 모두 서구 열강의 무력 앞에서 ‘개국’을 강요당하면서 시작되었다. 하지만 이후 각국은 근대 발전 과정에서 상당한 거리를 노정했고, 당시 역사에 대한 각국 학자들의 학술 연구 측면에도 상당한 차이가 있다. 중국은 국제 사회에 개방을 강요당하면서, 국가의 미래와 민족의 운명에 대한 우려에서 출발해 서구의 도전에 대응했고, 중국의 부흥을 위해 싸운 끊임 없는 개혁과 열강과의 항쟁에서 계속 실패하면서, 우환 인식이 계속 가중되고 열강과의 충돌과 갈등 역시 계속 첨예해졌다. 중국 학계는 근대 중국이 직면했던 ‘수천년에 없었던 변고’²⁵⁾와 ‘불평등 조약 체계’에 대한 항쟁에 주목한다. 한국 학계도 마찬가지로 근대로 걸어가는 과정에서의 주권 수호와 외부의 압박과 간섭, 특히 식민지가 된 후의 독립 운동과 투쟁에 주목한다.²⁶⁾ 당시 일본은 ‘탈아입구’의 방식으로 “낙후한 아시아에서 벗어나 서양 문명으로 전이”하였으므로, “서양 문명과 진퇴를 함께 하여.....서양인이 (지나와 조선)을 대하는 방식으로 아시아

23) [日] 大沼保Onuma Yasuak), 京审判争责任后责任, 14페이지, Tousinnto, 200년

24) [日] 吉田(Yoshita Hirosh), 『現代歴と戦争責任』, 青, 199년, 1818페이지

25) 李鴻, 海防, 『李文忠公, 奏稿』, 2, 1페이지 참고

26) 李元 외, 韓史, 日本明店 200년 판

와의 관계를 다루어야²⁷⁾ 했다. 전통을 ‘중체서용’의 방식으로 대했던 중국과는 달리, 일본은 ‘구습’에 연연하면서 ‘겉’만 꾸미는 ‘염치를 모르는 행동’을 비판하면서, “세계 각국에서 통용되는 이치를 받아들여야, ...국제법 공약의 문턱을 넘어 들어갈 수 있다.”²⁸⁾고 보았다. 중국과 한국에 비해, 일본의 근대사 연구는 서구에서 받아들인 ‘국제법 질서’가 가져온 이익에 주목한다. 1931년부터 1945년의 전쟁 기간 중일 양국이 서로 다른 국제적 그룹에 참여하면서, 역사 체험이 완전히 비대칭적이 되고 나아가 역사 인식에 대한 서로 다른 논리와 사고를 형성하였다. 중국으로서는, 당시 어떤 일이 발생했든 맞서 싸우는 전쟁 상대가 기본적으로 일본이었으므로, 항일전쟁이다. 하지만 일본으로서는, ‘9·18사변’과 ‘루거우차오 사건’ 이후 적수는 중국이었지만, 태평양전쟁이 발발한 이후에 주적은 미국과 유럽으로 바뀌었고 마지막에는 심지어 소련까지 들어간다.

이상과 같은 역사 인식의 세 층위가 현실 속에서는 뚜렷하게 구분되지 않는다. 오히려 반대로 세 층위의 문제가 상호 교차하고 영향을 미치면서 매우 복잡한 양상을 보인다. 그래서 역사 인식 문제가 지금까지 동아시아 정체성 구축을 가로막는 중요한 요인이 되고 있는 것이다.

IV. 역사 인식의 국경 넘기는 어떻게 가능한가

상술한 세 층위의 역사 문제 가운데, 정치 층위의 문제는 침략 전쟁의 성격 인식과 관련한 것으로, 근본적인 시비를 가리는 원칙으로 모호함을 제거한 명확한 판단이 요구된다. 하지만 민중 층위와 학술 층위의 인식 차이는 역사 체험의 차이로 인해 생겼으므로, 이 문제 해결에는 양국 민중의 상호 대화와 이해 및 양국 학자의 공동 연구가 추진되어야 한다. 소위 역사 인식의 국경 넘기란 정치 층위가 아니라 이 두 층위를 말하는 것이다. 물론 세 층위의 문제가 서로 섞여 있고 영향을 미치기 때문에, 실천 과정은 상당히 복잡할 수 밖에 없다.

상술한 바와 같이 동아시아 각국과 국민들은 근대 이후 특히 전쟁 당시 역사 체험에 차이가 있다. 이러한 체험의 차이 위에서 형성된 역사 인식의 차이는 종종 보수 정치 세력들에 의해 이용당해 정치 층위로 변지기도 한다.

철저히 못한 전범 재판과 전후 처리로 인한 가해 의식의 결여로 인해, 많은 일본 국민들이 스스로를 군부의 사기 선전의 희생물로만 느낄 뿐, 식민지 통치, 종군 위안부, 난징 대학살, 세균 전, 독가스전 등 일본 군대의 전범 행위에 대해서는 별로 아는 것도 별로 없고 전쟁에 대한 책임감도 극히 무딘 편이다. 그리하여 전쟁 책임을 부인하는 언행을 하는 극우주의가 활개를 치고 사회적으로 상당한 영향력을 발휘하면서, 역사 체험이 원래 비대칭적인 양국 국민의 감정을 부추겨 쇼비니즘적 정서를 형성하면서, 감정 문제는 정치 문제가 된다. 또, ‘실증 연구’ 문제는 원래 학술 연구 층위에 속하지만²⁹⁾, 연구 과정에서 일부 측면만을 일방적으로 강조할 때 ‘사실 고증’이라는 명목으로 당시 역사의 부분적인 진상을 밝히는 일부 사료를 제공하는 행위조차 일부 세력에 의해 정치적 층위에서 이용되기도 한다. 게다가 민족의 비대칭적인 역사 체험이라는 배

27) 福, 亞, 『福吉全集, 1, 24페이지. 慶應 硯廬, 岩 출판

28) 福, 或云隨, 『福吉全集, 2, 1페이지. 慶應 硯廬, 岩 출판

29) 다나카 상주 田中奏의 문서로서의 존재 여부, 난징 대학살의 중국 피해자 숫자 등의 문제가 모두 이러한 예이다

경을 고려한다면, 이러한 ‘실증 연구’의 결과는 국민 감정상 받아들여지지 못할 뿐 아니라, 반대로 국가와 민중 사이의 대립만을 가중시키기도 한다.

일본 역사학자가 지적한 바처럼, 역사 수정주의자는 소위 역사 사실의 인식 차이(피해자 숫자 문제와 같은)를 주제로 토론을 진행하면서, 역사 인식 문제로 책임 문제를 대체하여 정치적 책임을 회피하려고 한다. 이들은 정치 목적을 숨기면서 역사 사실의 문제를 연구 대상으로 삼아 역사 인식에 관한 논쟁을 불러 일으키는 한 편, 역사관이나 역사 인식으로 정치 이데올로기 문제를 대체하면서 “인류 역사상 전쟁이 있으면 늘 민중의 고통이 있다”거나 “왜 일본만 책임을 지라고 요구하는가”와 같은 발언으로 전쟁 책임을 회피한다.³⁰⁾

또한 태평양 전쟁에 관한 연구의 경우, 일부 일본학자는 진주만 습격의 책임에 대한 깊이 있는 연구보다는, 미국의 고철 수출 금지, 일본에 대한 봉쇄 정책 등 전쟁이 일어나게 된 객관적인 이유들을 찾아내는 데 열중한다. 심지어 전전 군국주의 정부가 부르짖던 소위 ‘ABCD 포위권’ 이론³¹⁾을 견지하면서, 미국과의 개전을 피하기 위해 일본 정부가 쏟은 외교적인 노력들을 강조하면서 1941년 12월의 ‘헐(Hull) 비망록’을 미국이 협상을 거절한 최후 통첩이자 개전의 원인으로 보기도 한다. 이러한 연구는 표면적으로는 학술 충위로 보이지만, “이 전쟁은 도저히 참을 수 없는 상황에서 어쩔 수 없이 일으킨 것”³²⁾이라는 결론을 도출한다면, 이는 직접적으로 민중의 감정을 건드리고, 심지어 국가 관계에도 영향을 미칠 수 있다.

일본 사회에서 최근 전쟁관에 반영된 ‘복합형 전쟁’관이 강조된다. 일부 정치가는 국회 답변에서 일본이 “중국에 침략행위를 했고”, “한반도에 식민 통치를 했다”지만, 미국, 영국, 네덜란드에 대한 전쟁을 “침략전쟁이라고 할 수 있는지는, 나는 의문이다.”³³⁾라고 했다. 이러한 인식과 미국, 프랑스, 네덜란드를 상대하는 전쟁은 “스스로의 생존을 위한 자위 전쟁” 즉 ‘대동아 전쟁’이라는, 전쟁 당시 일본 군대가 고취한 인식과 근본적인 차이가 없으며, 나아가 1945년 8월 소련이 중립 조약 원칙을 위배하고 ‘불법적’으로 ‘만주’를 침략 점령했다는 인식으로 발전한다.³⁴⁾ 90년대 중반은 일본 신구 정치체제의 전환 및 신구 정치가의 교체기로서, 일본의 미디어와 정계 논조에 확실히 큰 변화가 나타났다. ‘새세대 정치가’는 “그 전쟁은 우리가 태어나기 십여 년 전에 이미 끝났다.”고 보기 때문에, 과거 전쟁에 대한 부채의식이나 속죄의식이 구세대 정치가와는 비교가 되지 않는다. “전후는 이미 끝났다”는 이러한 생각과 “이미 끝난 전후”를 고취한다든가 태평양 전쟁에 대해 “역사의 재평가”를 요구한다든가 하는 역사수정주의적 발언이 횡행한다. 뉴라이트는 한술 더 떠 직접 평화 헌법이나 민주주의 교육과 같은 일본 전후의 새로운 현상에 화살을 돌리면서, “역사 인식 문제에 대한 일본 정부의 발언과 행동을 인정하지 않는다.”³⁵⁾면서, ‘전후’를 다시 쓸 것을 공공연하게 요구하고, 헌법 제9조의 수정을 주장한다. 이러한 상황에서는 민중의 감정 충위와 학술 충위의 문제에까지 정치적 낙인이 찍히게 된다.

30) [日] 沟口雄三(Mizoguti yuuzo), 『的,京出,200년』

31) 즉, 태평양 전쟁을 일으키기 전에 정부와 국내 언론에서 고취하던미국, 영국, 중국, 네덜란드가 일본을 포위하는 이론을 말한다. 이 이론은 일종의 프로파간다로서 아무런 사실 증거가 없다. 江口圭一(Eguchi Kaichi, 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 岩波ブックス, 199년, 2페이지 참고.

32)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朝日新聞, 196)은 이러한 해석의 대표적 저작이다

33) [日] 『朝日, 199년1월2일』

34) [日] 中村(Nakamura Masanori, 后史, 岩波, 200년 판

35) [日] 荒井信一(Arai Sinichi, 史和解是否可能?, 岩, 200년, 28페이지

각 층위의 역사 인식 문제는 서로 다른 해결 방식을 고민해야 한다.

정치 층위의 문제는 중일 관계의 구조적인 변화와 긴밀히 연결되며, 양국의 구조적 변동의 결과라고도 말할 수 있다. 구조적인 변동이 쌓여가고 기본적인 추세가 점점 가시화되면서, 특히 거시적 국제 환경 속에서 중일 양국의 전략적 호혜 관계가 구축되면서, 정치 층위의 문제는 새로운 해결 방법을 찾게 될 가능성이 크다.

학자로서 우리는 감정 층위와 학술 층위의 역사 인식의 차이와 논쟁에 더 주목해야만 한다. 이 측면에서 학자들은 자료를 수집하고 문제를 이해하면서 공동 교류의 경험을 통해 먼저, 학술 층위에서 중일 역사 인식의 차이와 쟁점에 대해 대화하고, 이를 기반으로 양국 민중의 상호 이해를 도모해야 한다. 이 측면에서는 다음의 몇 가지 문제에 주의해야 할 것이다.

1. 학술 연구, 민중 감정, 정치 외교 세 층위의 문제 구별

정치 층위의 문제를 학술 연구의 문제로 사고한다면, 방향을 잃고 끝이 보이지 않는 논쟁으로 빠져들게 된다. 스콜라적인 토론으로 민중의 감정 층위의 문제 해결을 바라는 것 역시 지나친 이상주의에 불과할 것이다. 하지만 본래 학술 연구 영역에 속하는 문제나 학술 문제에서 파생되어 정치나 감정 층위로 번진 역사 인식 문제의 경우에는, 학자도 학술 분야에서 연구를 하면서, 이러한 견해차가 두 나라 민중의 감정 층위로 확대되지 않도록 특히 정치 문제로 비화되지 않도록 주의해야 한다. 이미 양국 민중의 감정이나 정치 외교에 영향을 미친 문제의 경우는, 학술적 요소가 존재한다면 먼저 그 학술 문제를 명확하게 연구하면서 감정과 정치 층위의 해결 경로를 함께 고민해야 할 것이다.

2. 민중의 대다수가 전쟁 역사를 겪지 않았다는 배경에 주의

전쟁이 끝난지 벌써 60년이 되었다. 직접 전쟁을 겪은 이들은 지금 점점 줄어들고, 그들의 전쟁 체험이 후세에 미치는 영향력 역시 점점 작아진다. 통계에 따르면 현재 인구 가운데 전후 출생자가 70% 이상을 차지하고 있다. 40~60세 인구는 어른들의 입을 통해 전쟁에 관한 감성적 지식을 얻을 가능성이 약간이라도 있지만, 20세 전후의 청소년은 심지어 부모의 입을 통해서도 전쟁에 관한 감성적 인식을 얻기란 힘들다. 따라서 그들에게 전쟁 역사에 대한 인식의 공동화와 추상화 경향이 필연적이다. 대다수 젊은이들에게 전쟁은 머나먼 과거이고, 전쟁은 게임처럼 컴퓨터 사이버 공간에서만 볼 수 있다.³⁶⁾ 이러한 공동화되고 추상화된 전쟁 인식을 가진 청소년들은 잘못된 길, 특히 극우주의적인 방향으로 경도되기 쉽다. 이러한 위험성을 해소하기 위해 학자들은 청소년들이 전쟁 역사를 보다 깊이 있고 총체적으로 이해하도록, 특히 역사 교육을 통해 청소년들의 시야를 확대하고 보다 넓은 시각으로 동아시아 역사와 미래를 고민하도록 이끌어야 한다.

36) [日山田(Yamada Akira, 『歴史修正主義の克服, 高文, 2001년 12월, 10~11페이지]

3. 역사 사실의 공유 실현과 상호 이해 창출의 조건

역사 인식 문제 해결의 수단으로서 상호 이해에는 시간과 조건이 필요하다. 그 기초적인 작업은 우선, 역사 사실의 공유가 되어야 한다. 역사 사실의 공유를 기반으로 할 때만이 국경을 넘는 역사 인식 구축이 가능하다. 물론, 자국 동포 사이에도 역사 사실 공유를 실현하기란 상당히 어려운 일이다. 이 문제 해결을 위해 안정적인 학술적 환경과 냉철한 학술적 고민이 필요하다. 현재 활발하게 진행되는 동아시아 정부 및 민간의 학술 교류의 경우, 비록 평가가 일치하지는 않고 심지어 비판의 목소리도 있지만, ‘자국 사관’에 기초해 구축된 폐쇄적인 상태가 이미 깨졌다는 사실은 논쟁의 여지가 없다. 지금까지의 학술 교류는 주로 역사 사실의 공유 문제를 해결하고자 하는 것이었다면, 앞으로 학자 층위의 교류가 점점 긴밀해지고 역사 사실 공유의 수준이 높아지면서, 학술 연구 자체의 국경 넘기도 점점 가시화될 것이다.

* * *

결론적으로, 국경을 뛰어넘는 역사 인식의 구축은, 안정적인 동아시아 국가 관계 구축에 긍정적인 기여를 한다는 측면에서 각국의 상생 외교 전략의 필요성에서만 출발하는 것은 아니다. 보다 중요하게는, 동아시아 나아가 아시아 및 세계의 사회, 문화 층위의 상호 이해를 실현하기 위한 기본 조건이다. 비록 하루 아침에 변화를 기대하기는 어렵지만, 착실하게 노력해 나가야만 하는 것이다.

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

歩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次〉

- 一 「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東アジア・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
- 二 国境を越えた歴史認識をつくるための努力
- 三 歴史問題に関する対話の異なる側面
- 四 歴史認識はどうすれば国境を越えられるか

一 「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東アジア・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

日本の民主党が政権を獲得すると、鳩山由紀夫首相は正式に中国に対してEUをモデルにした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を提案した。同時に「中国と兄弟のような友好関係を築きたい」と述べ、「これは私が構想している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焦点である」とした。中国側もまた「日本を含む東アジア各国と更に東アジア合作を深化させることに尽力し、東アジア共同体という目標に向かって絶えず迈进する」と表明した。注目すべきは中国のネット調査で「中・日が共に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立することを支持する」としたユーザーが63%に達していることだ。ただ中には反対意見もあって、中国と日本の間にはまだ解決できていない歴史問題が存在しているし、日本はただこの提案によって国内における経済的プレッシャーを和らげようとしただけで、本心から中国と協力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疑問を持つ者もあり、「まだ日本に油断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者もいた*1)。

実は「東アジア共同体」の主張をしたのは、鳩山首相が初めてではなかった。ここ数年、東アジアあるいはアジア各国の間でさらに密接な関係を築き、地域の経済・安全保障・政治問題について協調しようとする主張は多かった。2008年オーストラリアのラッド首相も、EUに似た「アジア太平洋共同体」構想を明らかにし、1991年にマレーシアのマハディール前首相も「東アジア経済共同体」構想を提案していた。これらの構想が出される以前、アジア地域にはすでにAPECやASEANプラス3などかなり成熟した組織的合作モデルが存在していた。

少し過去に目を転じれば、日本が20世紀前半かつて英米の植民地統治からアジア各民族を解放するとして、「大东亚共荣圏」を旗印に日本中心の「大东亚秩序」建設を主張したことに思い至る。当時はまだ石原莞爾が主張した「东亚连盟论」もあったし、三木清・尾崎秀実らは、中国の社会主义革命と连合して日本を改革し、そこから日本をはじめとする東アジアの民众を主体に、東アジアを社会主义に変革させようという「东亚协同体论」を主張していた*2)。

このように歴史学的に様々な「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を振り返ってみると、もとよりそこには肯定的な主張もあれば否定的なものもあるし、あるいはその態度が積極的なものもあれば消極的なものもあるが、より重要なのは、歴史の経験と教訓を总括し、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について

1) 『环球时报』, 2009年9月18日

2) 内田弘『三木清』, 御茶の水书房, 2006年版, 第28頁

深く考察を行うことであろう。

地域合作という面からみれば、目下のところヨーロッパが先を行き、アジアが遅れをとってい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実のところ中世後期にヨーロッパは熾烈な分裂状態を経て、キリスト教世界はそれぞれの「民族国家」に分裂していった。「民族国家」の形成はキリスト教「西方帝国」の瓦解と中世の終焉を導き、それら国家間が互いに衝突を繰り返したことが近代ヨーロッパの国際関係を生み出したのだが、同時にその衝突が世界全体に及ぶと、世界大戦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にもなった。ある意味ヨーロッパ近代史とは「民族国家」間の戦争史であった。しかし20世紀後半になると、ヨーロッパは突然、連合の方向に向かい、今やすでにEUが現実の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ヨーロッパモデルをアジアに当てはめようとしても、殊に東アジアにおいては様々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関する争いを引き起こすだけとなるだろう。

ヨーロッパには「我々ヨーロッパ人」(We, Europeans)という自觉があり、それがヨーロッパに共通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成立に成功をもたらしたが、東アジアにはこのよう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が存在していない、とする意見がある³⁾。またある学者は、ヨーロッ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成立はヨーロッパの歴史と関連しており、ヨーロッパには数多くの国家があるけれども、統一性を持った文明が存在していて、それはフランスの歴史学者ギゾー(Guizot, François-Pierre Guillaume)が提唱した「ヨーロッパ文明」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この「ヨーロッパ文明」は、ヨーロッパ諸国に一つの「超民族主義」的政治体系を形成させ、ヨーロッパ共通の文化遺産を保護し、争いを避ける道をもたらした。ヨーロッパ史上に起こった戦争は、三つのレベル(地域・国家・民众)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衝突だと解釈できる、とした⁴⁾。これに賛同する意見としては、ヨーロッパはもともとアジアと大変大きな違いがあり、「我々ヨーロッパ人」という同一性意識は、アジアではかなり稀薄であるから、アジアがヨーロッパのように連合することは実現不可能で、EUのような共同体建設もユートピア的幻想にしか過ぎないという。

またある者は近代ヨーロッパの政治文化の発展について分析し、近代ヨーロッパの発展にはずっと平行して二つの道が存在していた。「一つは『民族国家』としてヨーロッパにあまねく現実となった近代国家形態の出現につながるもの。もう一つはヨーロッパ人の相互『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すなわち『ヨーロッパ観念』を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る。前者は主権国家に通じ、後者はいわゆる『ヨーロッパの統一』に通じる道であった。」「この二つの道はいずれも中世からつながっているもので、……よって近代ないしは現代ヨーロッパの政治哲学を理解するためには、必ずこの二つの『観念』、民族観念とヨーロッパ観念を把握せねばならない。これらは『民族主義』・『ヨーロッパ主義』とも呼べるであろう。民族観念は民族国家および多民族の『連邦制国家』に通じ、ヨーロッパ観念は今日のEU(あるいはヨーロッパ一体化への道)に通じる。」⁵⁾この意見に賛同する人は、「我々ヨーロッパ人」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実際はEU成立のために特別に強調されたものだ、という。

ヨーロッパの同一性作用に対する判断はどうであれ、東アジアにもヨーロッパのよう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構成する歴史的基础は存在している、という認識は多くの人々でだいたい一致している。これはよく強調されることだが、東アジア地域は確かに漢字文化と儒教文化に代表さ

3) 柿澤弘治「『アジアは一つ』、いまこそ」、東海大学平和戦略国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に「共同体」はできるか』、社会评论社、2006年。第224-230頁

4) 木畑洋一「欧洲の統合と意識形態の重層性：EC」、蓮実重彦・山内昌之編『今、なぜ民族か』、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204-216頁

5)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6-107頁

れる文明圏の影響下にあった。だが多くの研究が証明しているように、たとえ同一の文明圏にあっても、各民族と国家的価値観の差がなお大きければ、甚だしい場合別の文明を派生させることもありえた。したがってわずかにこれだけでは、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証明するには十分な説得力を持っていない。历史上の東アジア秩序の変遷過程からは、東アジア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確立することの困難性・複雑性が見て取れる。

历史上出現した様々な「東アジア共同体」建設の主張は、その目的がみな東アジア地域の国際関係を維持させることにあり、地域の国際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適用するある特定のモデル、これがすなわち東アジアの秩序であった。近代的意味の国家が登場する以前、古代東アジア地域の主導的な地位を占めていたものとしては、費正清教授が概括した「華夷秩序」(the imperial tributary system)による国家関係があった。「華夷秩序」の評価は人によって異なるが、「華夷秩序」が崩壊して以降、東アジア地域には今に至るまで、本当の意味で「共同体」と称しうる体制は現れていない。

「華夷秩序」が成立し得たのは、まずもって一つの「強大」で「富裕」な中国と、相対的に弱い周辺地域が存在したことによる。しかし「華夷秩序」には実態は無く、周辺に対して直接統治を行おうと計画することすら全く無かった。「中央」としての中国は、周辺国家の君主を冊封することで、地域の安定を保持し、間接的にその影響力を発揮することを望み、周辺の国家と民族は、中国との朝貢関係を通じて国家の安全保障と内政・外交の自主性を維持することを望んだ。このような東アジア秩序には明確な支配・从属関係がなく、近代の帝国主义による周辺支配関係とは違っていた。その上当時日本など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いくつかの国家が「華夷秩序」を模倣して、自らを中心とする「小規模朝貢体制」をとり、中国を中心とした秩序を変えようとしたが、これはこの地域秩序に対する挑戦だと見なされた*6)。16世紀末以降、中国を中心とする秩序は周辺国家からの批判を浴び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ぞれの小さな「中心」自身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が次第に体系化して「華夷秩序」は動揺した。中国中心の「華夷秩序」は「帝国性」*7)を持っていたが、当時は確かに東アジアの基本秩序であったし、理想的な東アジア国際秩序モデル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帝国秩序方式に代わる思想体系を見出すことは出来なかった。

近代に入ると、日本はイギリスとの同盟体制を後ろ盾に、ロシア勢力の南下を阻止し、同時に地域の「中心」に上がった。その後アメリカの支持を得て、台湾・朝鮮を并吞し、中国の東北地方にまで侵出した。日本のこの伸張は、かつて地域の中心であった清朝の没落に伴うもので、これにより東アジア秩序は変化を来した。表面だけを見れば、主权観念を基礎とする「国際法(万国公法)」による国際関係秩序の原則が、東アジアの伝統的秩序に取って代わる傾向にあり、各国は少なくとも形式上は平等な地位を有していた。しかし平等原則が実際に遵守されることは稀で、主導的地位を占めたのは、資本主義の原動力とその強制的な手段である武力、すなわち「弱肉強食」の原則であった。日本は英米の植民統治から東アジアの各民族を解放することを標榜したが、実際には伝統的な「華夷秩序」に代わって日本の主体性を突出させ、大日本帝国の自給自足体系を成立させようと企図した。これこそが「大東亜共栄圏」に象徴される日本中心の「大東亜秩序」であり、その思想背景には、日本が中華秩序から脱するとき形成されたアジア主義があった。その後中国への侵略戦争を開始したのち、できるだけ速やかに持久戦状態を終わらせるため、「平和的」に東アジアの新秩序を建設する「東亜新秩序論」が提唱された。これら

6) 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年

7) 白永瑞「東亜的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東亜共同体」、『思想』第3期「天下、東亜、台湾」，第129頁。白永瑞『東亜的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共同体』導論，創批社，2005年，ソウル

「国際法」や文明的国際秩序を唱えることは、主権尊重の原則からすれば理想状態であったが、その実覇権国家によって主导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た。

戦後の冷战期、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は長い間アメリカとソ連をリーダーとする二大阵营の対立に巻き込まれた。アメリカは経済・技術・軍事面での協力によって、東アジア各国がアメリカ式の社会体制を採用するように仕向けた。経済面では実際は、日本を中心とした垂直的な地域分業体制である大东亚共栄圏の経済システムを復活させ、軍事面では、アメリカをリーダーとする東アジア安全保障秩序を構築した。結局まだ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成立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

冷战後の東アジアは、国際化と経済グローバル化の波を受け、その内部で重要な構造変化が生じた。主要国である中・日・韓の実力比が、現在につながるような形に変化したのだ。東アジア秩序の面から見ると、今日の東アジアは历史上初めて「一強」が存在しない状態にある。現在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家・民众間の往来・交流は密接で、共同体を建設する際の三つの壁、「地理の壁」「歴史の壁」「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壁」は崩れ始めている*8)。東アジア地域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成立の面から言えば、現在はこれを公認する比較的良好な機会であろう。しかし一部の人の中には冷静に次のように指摘する者もいる。すなわち「日・中・韓の三経済大国の間は、経済の相互依存関係はますます深まりつつ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共同体意識』は一向に育ってこない。第二次大战後六〇年になろうというのに、日・中、日・韓の間には、歴史認識、教科書、靖国神社参拝等の問題をめぐり、未だに政治的・感情的な溝があり、それが共同体意識の芽生えを阻んでいるのが現状である。」*9)

したがって共同体意識を育むためには、まず歴史問題から来る障害を解決する必要がある。国境を越えた歴史認識を確立することが、その重要な第一歩である。

二 国境を越えた歴史認識をつくるための努力

ここ数年、歴史認識についての国際間対話は、人々に注目されるテーマとなってきた。特にドイツとフランスが共同で教科書（『1945年以後のヨーロッパと世界』（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を編纂した努力と結果は、この方面における成功例であろう*10)。ヨーロッパの状況に比べ、アジア、特に東アジアの中国・日本・韓国の間における歴史認識問題の齟齬は突出している。それでは同じ東アジア地域に位置する中国・日本において、歴史問題の対話が進められ、共通した歴史認識を持つことは可能であろうか？近年、日・中・韓三国の学者間で共通した歴史認識を確立しようと、意義のある試みと努力が拂われてきている。

注目すべきは、東アジア各国の多数の歴史学者・教師が、すでに歴史教育の面で世界に目を向ける積極的努力をしており、新しい歴史教育は自国史を世界史の文脈の中でとらえようとし、自国史を世界史の一部として、世界的視野から自国の歴史的发展と変化を認識しようとしていた。

1990年代後半、日本のいくつかの大学が分担して組織した、日本・アメリカ・中国（台湾を含

8) 進藤栄一・平川均編『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する』, 日本経済評論社, 2006年, 第3頁

9) 谷口誠『東アジア共同体 経済統合のゆくえと日本』, 岩波新书, 2005年, 第46頁

10) Claudia Schneider,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 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 Asia*

む)・韓国の学者が参加する「東アジア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に関する研究が進められ、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認識の問題点について討論が行われ、その研究報告が出されている*11)。

同じ時期、日本と韓国の教育機関・学術団体がそれぞれ共同研究の機会をつくっている。ソウル市立大高等学校歴史教科書研究会と東京学芸大学歴史教育研究会が組織した「日韓歴史教科書シンポジウム」や、両国の歴史学・歴史教育に関わる10の団体が設立した「日韓歴史学会合同シンポジウム」などがそうである。これらのシンポジウムは、日本で90年代中頃に現れた歴史修正主義的な思潮と『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の編纂に見える狭隘な民族主義の動きに対し、東アジア各国の歴史認識を相互理解することを目標に活発な討論が行われ、東アジアの共生と歴史教科書問題について*12)、それぞれ共同研究の基礎的成果が発表された*13)。

21世紀に入り、東アジア各国の学者・教師による共同研究の面で新たな進展と成果が現れた。その中で代表的なものを挙げれば、2002年から始まった日・中・韓の学者・教師・市民団体を代表とする組織が、毎年一回「歴史認識と東アジア平和に関する論壇」で討論を行った。これを基に日・中・韓の共同歴史編纂委員会は、3年の共同研究・討論を経て、2005年に『未来を開く歴史—東アジア3国の近現代史』を三カ国共同で出版した*14)。この本は歴史の補助教材という形で出され、三カ国の中学校である程度利用された。各国の学生は毎年歴史学習夏合宿等で互いに交流をはかっている。現在、三カ国の学者・教師による共同委員会はおお継続しており、先に出版した『未来を開く歴史』の誤っていた箇所についてより深い研究が進められ、十分な討論と研究を踏まえた上で、第二弾・第三弾の共同出版を期している。

2001年東京大学教授三谷博氏など日本の学者と中国の劉杰教授らは「日中若手歴史研究者会議」をつくり、歴史問題を背景とした日中両国の社会変動状況について討論した。数年間の努力を経て、2006年『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を日本と中国で同時に出版し、日中の歴史認識のうち特に近現代史に関わる問題について、深い討論と研究が進められた*15)。

2007年、日本と韓国の学者・教師による几度もの共同シンポジウムを経たのち、研究結果『日韓交流の歴史—先史から現代まで』が東京学芸大学・君島和彦教授と韓国の学者によって共同で出版された*16)。その他日本の広島県教職員組合と韓国大邱市教職員組合が組織した日韓共通歴史教材制作チームは『朝鮮通信使 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から友好へ』を共同編纂し*17)、日韓の女性団体は歴史教材編纂委員会を組織して『日韓近現代史—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みる』を共同出版した。

ここに述べたような国境を越える共同歴史研究と教材編纂の努力は、表現の形式が違い、共同研究の深度も一定ではないが、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をつくるという目標は共通したものだ。

11) 山室信一編『日本・中国・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1998年。上越教育大学東アジア研究会編『歴史表象としての東アジア—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との対話』、2002年；二谷貞夫編『21世紀の歴史認識と国際理韓国・中国・日本からの提言』、2004年

12) 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日韓合同歴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大月書店、2004年

13) 君島和彦『教科書の思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すずさわ書店、1996年。鄭在貞『韓国と日本—歴史教育の思想』、すずさわ書店、1998年

14) 『面向未来の歴史—東亞三國の近現代史』、中国語版は12—13万部発行。日本語版は7万部、韓国語版は5.5万部

15) 『跨越国境の歴史認識』中国語版は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より2006年に出版。日本語版は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出版

16) 君島和彦『日韓交流の歴史先史から現代まで』、明石書店、2007年

17) 日韓共通歴史教材制作チーム編『朝鮮通信使 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から友好へ』、明石書店、2005年出版

一つには各国で世界史を叙述する際、影響を受けてしまっている西洋中心史論から脱し、アジアに関する叙述の比重を増やすこと、もう一つは自国史と東アジア史との関係を処理し、特に「自国史の枠組みを超える東アジア史」が可能かどうかを考えること、ここにおいて「超える（超越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重要な概念であった。

自国史と東アジア史との関係を処理するには、その方法に異なる方向が存在する。比較的良好に見られるのは、自国から地域史に拡大させる方法で、これを「同心圓史観」に归纳する者も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方法で本当に自国史を超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は、よく考えてみ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いわゆる「同心圓史観」の人は、実際は自らの地域を中心にした民族主義の歴史認識を強調するだけであることが多い*18)。この現状に対して「東アジア視角」あるいは「東アジア史観」の概念を持ち出すものもいた。例えば韓国の学者は自国史の解体から始めて、まず「国史」の名称をやめて、韓国史を世界史と合わせ、「世界史の中の韓国史」と「韓国史の中の世界史」を考えようとした。その中間段階として「東アジア史」を提唱し、より实际的にはまず「日・中・韓三国关系史」を考えようというものだった*19)。

自国史を超え、国民国家の歴史記憶を超え、共有の東アジア史を認識するには、歴史学が互いに異なる歴史記憶を統合し、その中の関連性を探り、その中の共同性を考察する必要がある。たとえこの関連・共同性がかなり希薄なものであったとしても、たゆまぬ研究によって歴史認識の共有化を実現せねばならない。

これと同時期に政府主導による歴史共同研究も開始された。まず日本と韓国が2002年に共同歴史研究を開始したが、2005年に一旦終了し、2006年第二期の共同研究が始められた。中国と日本の共同歴史研究は2006年末に始められ、現在まで三年近くが経っている。日中の共同歴史研究は古代史（中世を含む）と近現代史の二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られ、16のテーマ（古代史が7つ、近現代史が9つ）が設定された。特に近現代史グループでは、テーマを定めただけでなく、一つのテーマの中にキーワードを設定した。両グループともに共同のテーマ・キーワードに従って論文を制作し、討論を行い、その結果研究はさらに一步深められた。

三 歴史問題*20)に関する対話の異なる側面

上述したように歴史認識問題について国境を越える努力がなされてきたが、各方面からの評価は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た。ある者は歓迎の意を表し、ある者は理解できないと感じて、批判を行い、反対を表明する者もいた。その原因を探れば、歴史問題に関する対話の異なる側面に、きちんとした区分がな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にあった。

18) かつて台湾の「教育部長」であった杜正勝氏は、いわゆる台湾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強調するため、「同心圓史観」を提唱した（杜正勝「一个新史観的誕生」、『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しかしある学者が批判したとおり、この考えは台湾を「単一中心」とする民族主義を強調する表現に過ぎず、実質的には中国大陆と距離を保とうとする「去中国化」のための一段階であった。王晴佳「当代台湾历史论述的双重挑战」、『思想』、2号、台北、2006年、第120-121頁を参照

19) [韓] 白永瑞「为构筑东亚和平而读史」、『黄海文化』、2004年；「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东亚的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思想』。第3期「天下、东亚、台湾」

20) ここで言う中日歴史問題とは、両国で近代史の認識領域の問題を指し、歴史そのものと関わる部分は含まない。現在に至るまで懸案となっておりまだ解決していないのは、中日関係における現実問題、例えば遺棄化学兵器の処理問題・尖閣諸島（釣魚島）・東シナ海油田などの領土資源問題である

東アジア地域の問題は主に政治・感情・学术研究の三つの異なる、しかし互いに連携した側面が反映しており、歴史認識の齟齬・争論の異なる側面を整理しなければ、歴史問題について対話を行うことはできない。

まず政治面の対話とは、明らかに日本の行った植民統治と侵略戦争の性質に関する政治判断のことである。

20世紀初頭から日本と東アジア主要国の関係は、極めて異常な状況下にあった。まず日本は韓国との三度の「協約」締結により、韓国の外交・内政・軍務を支配し、1910年に朝鮮总督府を置いて日韓併合を強行し、植民統治を開始した。進んで1931年の満州事変（九・一八事変）と1937年の盧溝橋事件によって、中国東北部から全面的な中国侵略戦争を始めた。では戦後日本はこの戦争について考え直し、反省を行ったのだろうか。1965年に日本が韓国と結んだ「日韓基本条約」と1972年の「日中共同声明」あるいは1978年の「日中平和友好条約」の内容から見れば、日本政府はすでに積極的な態度を表明している。その後1993年細川護熙首相は、当時の日本が起こした戦争は「誤った戦争」であり、「侵略戦争」であったと再確認した。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は、現在まで歴代首相が継承している戦後50周年に関する談話を発表した*21)。もし日本の右翼と保守勢力、特に一部の保守議員・官僚が上述の反省態度に対して猛烈に反対しなければ、政治面での対話は必要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不幸なことに、戦後日本の政界は常に侵略戦争の性質を否認し続けた。特に55年体制が確立して以降、日本社会は復古主義の暗流が活発し続け、「大東亜戦争」の歴史観への後戻りを肯定することが広く行われてきた。一部の政治家は口では「反省」をとなえながら、侵略戦争に対する本当の認識は、その反省とは一致せず、あるいは対立するものであった*22)。この態度が後の日本の政治家に与えた影響は大きく、80年代の戦後40年政治「総精算」思潮や、90年代に歴史認識を修正しようと『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編纂した「自由主義史観研究会」の活動、首相の靖国神社参拝、侵略戦争の責任否認はすべてこれと密接な関係がある。1995年に105名の自民党議員が「歴史・検討委員会」を設置し、日韓併合の強制性と非合法性を否認し、「南京大虐殺虚構論」を言い出し、「从軍慰安婦」の商業的性格を唱えるなど、戦争中の日本軍の責任を全面的に否認し、ひいては植民統治の非合法性と戦争の侵略的性質を否認した。最近では日本の自衛隊航空幕僚長・田母神俊雄氏の日本は侵略国家ではないとする論文が表彰された。これらの状況は政治面での対話とは、やはり侵略戦争の性質に关して根本的な是非を判断する問題であり、この側面の対話が主に政府・政治家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続いて民众の感情面での対話であるが、これは異なる歴史体験によって生まれた東アジア各国民の認識の齟齬を解決することである。

疑いようもないことは、日本も含めた東アジア各国の民众にとって、戦争に関する歴史記憶のうち、最も深い側面が戦争中の被害に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例えば中国では、侵略戦争に关

21) 細川護熙首相は、日本が起こした戦争を「侵略戦争」「誤った戦争」であったと明確に表明した。村山富市首相は、「わが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戦争への道歩んで国民を存亡の危機に陥れ、植民地支配と侵略によって、多くの国々、とりわけアジア諸国の人々に対して多大の損害と苦痛を与えました。私は、未来に誤り無からしめんとするが故に、疑うべくもないこの歴史の事実を謙虚に受け止め、ここにあらためて痛切な反省の意を表し、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いたします。また、この歴史がもたらした内外すべての犠牲者に深い哀悼の念を捧げます。」と表明した。竹内実・21世紀中国総研編『日中国交文献集』、蒼蒼社刊、2005年、第440-441頁

22) 岸信介は戦犯として監禁されていたとき自己弁護を行い、日本の「正当防衛」を主張した。彼は太平洋戦争に対して当然なされるべき反省を認めず、「もし反省があるとすれば、それはただ一点、『敗戦』そのものにたいする反省である。」原彬久『岸信介一権勢の政治家』岩波新書、第121-122頁、1995年

するキーワードとして、「南京大虐殺」「731細菌部隊」「三光作戦」などの概念があり、韓国では「从军慰安婦」「創氏改名」「植民統治」などが、日本では主に「広島・長崎における原子爆弾」「東京大空襲」「沖縄戦」などがあった。これら戦争に関する歴史記憶は間違いなく事実であるが、それぞれウェイトが違うものだった。戦争の被害意識と加害意識が重なる日本国民の立場から言えば、もし「一国内部的な視野の狭隘さ」に限定すると*23)「加害意識が欠落」し、同じ歴史過程を経た被害国の国民体験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戦後日本の反戦・反核運動は、日本の民主主義と平和運動が发展する重要な出发点であるが、他の民族に被害を与えた戦争責任に対して反省を欠き、原子爆弾による「被害体験」のみを強調するため、広範な理解が得られていない*24)。戦後50年の年に広島と長崎の平和記念資料館（原爆資料館）の展示会が、アメリカでは出展されなかったことは、このことを典型的に証明している。当然ながら、日本の民衆が中国・韓国民の戦争被害状況に対して理解できないのは、戦時中の軍国主義政府が世論を制限していて、その責任が民衆にはなかったことに関係している。しかし戦後、各国民がこの問題について十分な交流を進め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が、認識の差に結びついた面もあった。したがって異なる歴史体験による各国民の認識の差には、比較的明確な感情要因を伴っており、政治面の問題解決とは違って、民間で深い交流を行い、相互理解につとめ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る。

三つ目の学術面の対話は、主に両国の歴史学研究における使用資料・研究方法の差と、歴史体験の違いによって生まれる認識の差の問題であった。

東アジア各国の近代史はどれも、西洋列強の武力に迫られた「开国」から始まるが、その後の近代史发展过程において大きく違いが生まれ、各国の学者がこの時期の歴史を研究する面でも相当大きな差が存在していた。中国は国际社会から门户開放を迫られると、国家・民族の命运と前途を忧虑することから、西洋の挑戦に迎战し、中国の复兴を勝ち取ろうとした。しかし列強に対抗しようとした几度かの改革で相次いで失敗すると、忧国の情はますます深まり、列強との冲突はさらに激しくなった。中国の学会では、近代中国が直面した「数千年来で初めての非常事态」*25)と「不平等条约体制」との抗争に注目してきた。韓国の学会も同じく近代化过程における主権の保護と外圧・干渉、特に植民地となって以後の独立运动・斗争に重きを置いていた*26)。それに対してこの時期の日本は「脱亞入欧」方式をもって、「亞細亞の固陋を脱して西洋の文明に移りたり」「西洋の文明国と进退を共にし、……まさに西洋人がこれ（支那・朝鮮）に接するの風に从て処分すべきのみ。」とした*27)。これは中国がその伝統に対し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の文化や制度を主体とし、西洋の技術を实用とする）」とした方法とは异なっていたし、日本は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も「その古风旧慣に恋々する」もので、「外見の虚饰のみを事とし」「不廉耻を極め」たものと批判し、「世界万国の事情に通じ、……万国公法宗と云へる宗门に入り度ものなり。」*28)とした。中国・韓国とは対照的に、日本の近代史研究は、西洋から受け入れた「国际法秩序」がもたらした利益を重視している。1931～45年の战争中、中日两国は异なった国际集団に属していて、歴史体験も全く异なっており、歴史認識についても異なる思考论理が形成された。中国では、この時期に发生したいかなる事件も、その相手が基本的に日本であったため、すべて抗日战争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しかし日本では「満州事变（九・一八事变）」と「卢

23) 大沼保明『東京裁判・戦争責任・戦後責任』、东信堂、2007年、第144頁

24) 吉田裕『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責任』、青木书店、1997年、第183～188頁

25)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2、1頁

26) [韓] 李元淳等『韓国的歴史』、日本明石书店、2005年第2版

27) 福澤諭吉『脱亞論』、『福澤諭吉全集』、第10巻、第240頁。庆应义塾編、岩波书店发行

28) 福澤諭吉『或云隨筆』、『福澤諭吉全集』、第20巻、第12頁。庆应义塾編、岩波书店发行

沟桥事件」の相手は中国であったが、太平洋戦争が勃発して以後は主な敵がアメリカ・ヨーロッパに変わり、最後にはソ連もそれに加わっていた。

以上述べた認識問題の三つの側面は、現実にははっきりと区別されておらず、それに反して三つの面の問題は互いに錯綜し、影響しあっていて、かなり複雑な状態が現れていた。これこそが歴史認識問題が現在まで続き、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成立を妨げている重要な要因であった。

四 歴史認識はどうすれば国境を越えられるか

先に述べた三つの面を持つ歴史問題のうち、政治面の問題は侵略戦争の性格認識に及んでおり、根本的な是非について曖昧な点を残さない明確な判断が必要となる。それに対して民众面と学術面の認識の差は、歴史体験の違いから生まれているものなので、両国民の相互交流・理解と学者の共同研究を促進することにより、こ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いわゆる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とはこの二つの面を指すもので、政治面は含んでいない。当然、三つの面の問題は互いに関連し、影響しあっているが、実際にこれを操作するにはかなり複雑なものだった。

東アジアの各国家・国民は近代以来、特に戦争中の歴史体験が異なっており、異なる基礎の上に認識の違いが生まれ、これが往々にして保守的な政治力に利用されて、政治的局面に引き込ま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戦後の裁判と処置が徹底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が加害意識の欠如につながり、多くの日本国民に自らが軍部の欺瞞の犠牲者であったことしか感じられなくしてしまった。植民地統治・从军慰安婦問題・南京大虐殺・細菌戦・毒ガス作战などを含む日本軍の戦争犯罪については、理解が乏しく、戦争責任については鈍感であった。こうなると、一連の戦争責任を否定する狭隘な民族主義は、大いに我が道を行くこととなった。その社会への影響力は相当強く、もともと歴史体験が異なっている両国民の感情を煽動して狭隘な民族主義的感情を生み出し、感情問題を政治問題にすり替えてしまうのだった。同じようにいくつかの「実証研究」面での問題は、本来は学術研究面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った*29)。研究過程においてある一つの側面を一方的に強調すれば、「考证事実」の名の下に、いくつかの史料を提示して、歴史の断面に存在するささいな事実の真相を実証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それでは他の勢力によって政治的に利用されることは避けがたい。そればかりか民众間の異なる歴史体験という背景を考慮すれば、その「実証研究」の結果は、民众の感情的に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ばかりでなく、かえって国家間あるいは民众間の対立を激化することもありえた。

日本の歴史学者が指摘するように、歴史修正主義者たちは、歴史の事実関係（例えば被虐殺者の人数）についての認識の相違という土俵をつくり、責任問題を歴史認識の問題にすり替え、政治的な責任の回避に利用している。一つは、政治目的を隠して歴史事実の問題として事実を操作し、「認識」についての論争を起し、もう一つは政治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を歴史観、歴史認識の問題にすり替え、「人類の歴史に戦争と民众の被害はつきもの」

「ぜ日本だけが責められるのか」などの言説で戦争責任を回避していた*30)。

29) 包括“田中奏折”作为文件的存在与否的问题，南京大屠杀的中国遇难者具体数量的问题等，均属于这种情况

30) 沟口雄三『中国の冲击』东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例えば太平洋戦争に関する研究では、日本の学者は真珠湾への奇襲を行った責任について深く考えることなく、かえってアメリカによる鉄屑輸出禁止や対日経済封鎖政策などといった戦争発生客観理由のみを探し出していた。さらには戦前の軍国主義が宣揚した「ABCD包囲網」の理論^{*31)}を堅持し続ける者もいた。一方で日本政府が行った、日米開戦を避けるための数々の外交努力を強調し、1941年12月の「ハル・ノート」をアメリカが交渉を拒絶した最後通牒であって開戦の原因であると認識する。このような研究は、表向きは学术面の事柄ではあるが、もし「このたびの戦争は忍びがたきを忍んで開戦したもの」^{*32)}という結論を出すのであれば、それは直接民众の感情に触れるもので、国家関係にも影響を与えかねないものだった。

日本では近年、戦争観として「复合型戦争」観が勢いを得ている。ある政治家は国会答弁で、日本は「中国に対しては侵略行為が」「朝鮮半島には植民地支配があった」が、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オランダと戦ったのは「侵略戦争と言いつてもいいが私には疑問が残る」と述べている^{*33)}。この認識は、戦争中に日本軍が鼓吹した、アメリカ・フランス・オランダとの戦争は「自存自衛の戦争」＝「大東亜戦争」という認識と、根本的には何も変わっていない。この考えはさらに1945年8月、ソ連は日ソ中立条約に違反して「不法に」「満州」を占領したという解釈に発展する^{*34)}。1990年代中盤は、日本の新旧政治体制と新旧政治家が入れ替わった転換期で、日本のメディア・政界の論調は確実に大きく変化した。「新生政治家」は往々にして「あの戦争は我々が生まれる十数年も前に終わっていた」として、過去の戦争に対する負い目や罪悪感、すでに一世代上の政治家とは比べようもなかった。「戦後はすでに終わった」という概念と歴史修正主義の言論は活発で、「すでに終わった戦後」に太平洋戦争などの「歴史の再評価」を行うよう求めた。新民族主義はさらにその矛先を平和憲法・民主主義教育など、戦後日本で行われた一連の政策に向け、「日本政府が行った歴史認識問題についての発言と行動は承認できない」とし^{*35)}、公然と「戦後」の書き直し、憲法九条の改正を要求した。このような背景の下、民众感情面と学术研究面の問題も政治的影響を色濃く受けてしまうのだった。

同じからざる側面を持つ歴史認識問題には、異なる解決方法を考える必要がある。

政治面の問題は、日中関係の構造変化と緊密な関係があり、あるいは両国の構造変化の結果であるとも言われている。このまま構造変化が継続して先行きがもっと明るくなり、大きな国際環境の下、本当の意味で日中の戦略的互惠関係が成立すれば、政治面の問題に新たな解決方法が見つかる可能性は大いにある。

研究者は、感情面と学術面における歴史認識の齟齬・争論に、より注意を拂う必要がある。この面では資料解釈と問題理解、及び共同交流の経験を通じて、まず学術面で日中の歴史認識における齟齬・争論についての対話を行い、これを踏まえて両国民の相互理解を促進せねばならない。そこでは注意すべきいくつかの問題がある。

31) すなわち太平洋戦争開戦前、日本政府とメディアがさかんに喧伝した「米英中蘭による対日包囲網」の理論である。この理論は一種の宣伝にすぎず、何の証拠事実も無いものだった。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ブックス1992頁参照

32)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6）はこの解釈を行う代表的著作である

33) 『朝日新聞』1994年10月25日

34) 中村政則『戦後史』岩波新書、2005年版

35) 荒井信一『歴史和解は可能か—東アジアでの対話を求めて』、岩波書店、2006年、第282頁

1 学術研究・民衆感情・政治外交という三つの面における問題を整理すること

政治的問題を学術研究面での問題として考えてしまうと、方向を誤り、际限のない論争に陥りかねない。またスコラ学的討論によって感情的問題を改善させようと期待するのも、希望的観測に過ぎない。これは本来、学術研究の領域に属する問題、あるいは学术問題から派生して政治的・感情的な历史认识問題に及んだものであるから、研究は学术領域から進めねばならない。ここで注意すべきはこの齟齬を民衆の感情面にまで扩大させてはならず、政治問題に转化してもいけないことである。すでに两国の民衆感情・政治外交問題に影響しているものについては、もし学术要素のある話であったら、まずその学术的問題についてのみこれを究明し、それとともに感情面・政治面から解決の道を探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2 国民の多くが戦争未体験者となっている時代背景に注意すること

戦争终结からすでに60年が経ち、戦争を直接体験した人は少なくなってきており、彼らの戦争体験が次代に与える影響力も小さくなってきている。統計によると、現在人口の約70%が戦後生まれで、40~60歳の人、上の世代の口から戦争に関する感性知識を得られるが、20歳前後の青少年は、両親の口から戦争の感性知識を得ることはなくなっている。したがって多くの人の中で、戦争の历史的知識が空洞化・抽象化する傾向にあり、これは回避されねばならない。若者にとっては戦争は遠い過去のことになり、私と同世代の者にとっても、戦争はゲームのようにただコンピュータの仮想空間でのみ見ることが出来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る*³⁶⁾。このように空洞化・抽象化した戦争認識を持つ若者は、誤った道、特に狭隘な民族主義の方向に簡単に陥ってしまう。この種の危険な傾向を取り除くため、研究者は若年層が戦争の歴史についてより深く全面的に理解できるよう、历史教育を通じて彼らの視野を広げ、大きな观点から东アジアの历史と未来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よう導かねばならない。

3 歴史事実の共有を実現し、相互理解の条件を創出すること

相互理解は历史认识問題を解決する手段であり、それには時間とある条件が必要となる。その基础的作業として、まず历史事実を共有し、その历史事実を前提とすることで、ようやく国境を越える历史认识を築くことができる。当然、自国人の中で历史事実を共有することでも、相当な困難があるだろう。こ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には、冷静な学术環境と学术思考が必要である。现在活発に展开されている东アジア政府間・民間の学术交流について、その評価は様々で、時に批判があるにしろ、「自国史観」にあった闭塞状態が打破されたことは、すでに争わぬ事実であろう。今までのところ学术交流の重点は、まず历史事実を共有するという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にあったが、研究者間の交流がより密接になり、历史事実の共有が深まれば深まるほど、学術研究は国境を越え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であろう。

* * *

以上をまとめれば、国境を越える历史认识の成立は、东アジア各国間の安定した関係を築くのに積極的意義があるだけでなく、各国の外交戦略の互惠要求に基づくだけでなく、もっと重要

36) 山田朗『历史修正主義の克服』高文研、2001年12月、第10-11頁

な、東アジアひいてはアジアや全世界の社会・文化面を含む相互理解を実現するための基本条件である。その変化が一朝一夕になされることは期待できないが、これは我々が着実に努力を重ねていか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である。

中日近代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 道路对东亚地区认同的影响

■ 梁云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

中日近代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对东亚地区认同的影响

梁云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目 次〉

- 一、认同与东亚地区认同
- 二、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导致了东亚的进一步分裂
- 三、冷战终结后东亚地区的重新整合

文章摘要：认同（Identity）是人类社会某一群体由于具有某些共性而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种共同意识。地区认同就是主要以一定地理范围为基础要素而形成的共同意识，但是同时还需要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国家在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认同才能够真正形成地区的认同。东亚地区认同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东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由于拥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经历以及相近或相互依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形成的共同意识。

然而，在近代之前的东亚，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意识的东亚地区认同，尽管这一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及其“华夷秩序”。近代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而“华夷秩序”解体，更由于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而严重分裂了东亚，导致东亚认同的缺失。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中日近代以来的不平等地位和东亚地区的殖民主义统治，但是由于冷战的开始而再次使东亚失去了地区认同的机会。

冷战结束前后，由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东亚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以及东亚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而形成的外在压力，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开始有了地区认同的意识，并且在建立这一认同的基础上推进了地区的合作，例如东亚10+3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的建立等。然而，由于东亚国家的多样性特点和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安全战略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矛盾，使得东亚地区认同与合作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东亚国家才更需要共同努力，在逐渐培育地区认同的基础上谋求东亚地区更为和平稳定繁荣的未来，其中中日两国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东亚认同 中日关系 地区合作

一、认同与东亚地区认同

认同（Identity）是人类社会某一群体由于具有某些共性而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种共同意识，即“行为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¹⁾。也就是说，认同既需要具有共同性的“自我”意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在“自我”之外所存在着的“他者”，这一意识主要强调的是行为体对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然，要区别“自我”和“他者”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认同可以有各种认同，形成认同这一共同意识的要素也可以有很多。一般而言，认同具有相对性、层次性和多元性。所谓相对性，即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是相对的，相对于另外感觉更为遥远的“他者”，某些“他者”可能

1) 胡亚丽：“试析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东亚认同”，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某一“自我”内部仍然可以分化出远近有别的更多“他者”。所谓层次性，与相对性有关，即认同可以是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所形成的，例如可以分为团体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甚至还可以有世界认同和人类认同等不同层次。所谓多元性，即形成认同的心理要素可以是多方面的或者是综合性的，例如可以有人种认同、地域认同、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历史认同、法律认同等等。

尽管有如此众多的认同，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地区认同，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东亚地区认同。那么，究竟什么是地区认同以及东亚地区的认同呢？有学者认为：“地区认同或意识是指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依存的国家在观念上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将其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²⁾或者“地区认同或区域意识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种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居住的人群所共同产生的认同意识与归属意识。”³⁾也就是说，地区认同就是主要是以一定地理范围为基本要素而形成的认同，即首先以地域范围来界定“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处于某一区域范围的国家被相互视为“自我”，在这一区域范围之外的国家则被视为“他者”。然而，要真正形成一种地区认同，仅仅依靠地域范围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地区不仅指地理的、经济和政治的构成，而且包括心理的、文化的认同。没有心理和文化的认同，地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牢固的。”⁴⁾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地区认同，除去处于相同地域范围这一基础性要素之外，一般还需要这一地域范围的国家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等认同，即这些国家之间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在历史上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对历史有着大致相同的记忆、在现实的政治或经济生活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利益，否则即使处于相同地域的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认同分裂甚至认同对立。

因此，东亚地区认同就是指东亚国家超越民族国家观念而以自己所处的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并明显同东亚地区之外的国家有所区别而形成的一种共同意识和归属感。当然，形成这种共同意识和归属感不仅仅依靠东亚地区这一地理范围的约束，而更多地是依靠东亚国家之间所具有的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大致相同的历史经历及其记忆，以及大致相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那么，东亚的地理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之间是否存在认同呢？从历史上来看，最初的所谓东亚地区并不是很清晰，因为在古代这一区域基本上被我们称之为“东洋”和“南洋”，大致分别指今天的东北亚和东南亚，然而到了近代之后，这一区域又被欧洲人称为“远东”，其范围界限仍然模糊不清，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地区的概念和范围才渐渐清晰起来，即逐渐从“远东”这一概念中分离出了“东南亚”和“东北亚”并逐渐整合成为今天的东亚地区。也就是说，今天的东亚地区，应该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具体地说应该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东盟10国。

至于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或存在过认同，即东亚地区的自觉共同意识，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东亚地域意识，并不是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早在周代就已有这种意识存在了，至汉唐时代则日臻完善。”⁵⁾日本学者崛敏一也认为：“东亚地区最初使高度文明产生的是中国。在中国产生的文明促使中国周边地区以及周边诸民族的勃兴，形成了包括诸民族的东亚世界。”⁶⁾当然，古代的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相互隔绝，在这一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一般被称为“华夷秩序”的中心环状国家结构，即中国占据了东亚的中心位置，形成了一个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大帝国，并将其势力

2) 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

3) 张蕴岭主编：《世界区域化的发展与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4) 俞新天：“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从文化的视角”，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5) 宋成有等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 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2页。

大致涵盖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国，并以所谓“朝贡制度”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秩序与制度下，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通过向中国的大规模学习和模仿，形成了同中国相近的文化，即主要以汉字、儒学和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共同文化背景，以及在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体制方面也大致相同。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地区认同，因为我们所说的地区认同是某一区域内部的国家彼此之间具有共同性的一种自觉意识，以及与地区外其他国家相比较而存在的彼此之间不同的自觉意识，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华夷秩序”下的国家彼此之间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或者即使有也是单方面的，对地区之外与自己相区别的世界则更没有自觉的意识，地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地区内国家具有某些共同性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所限制的一种无意识结果，因此还不能将其视为近代意义上的地区认同。

不过，不能够否认的是，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在“华夷秩序”下长期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对促成东亚地区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受其影响的国家之间具备了很多共同性，为形成地区认同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唯一短缺的就是在与外界的“他者”相遇时仍然还能够保持已有的共同性并且自觉地意识到“自我”和“他者”的区别。然而遗憾的是，近代欧美国家对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摧毁了东亚形成地区认同的可能性，其中尤其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日本未被殖民化却反而成为殖民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导致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地区的认同，甚至影响到了今天东亚地区的合作。

二、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导致了东亚的进一步分裂

19世纪中期，已经经过工业革命而迅速崛起的欧美国家开始了向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1840年2月，已经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并且很快打败中国，迫使中国清政府在1842年6月接受了中国近代同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据此英国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并获得了众多特权，而中国却开始逐渐丧失东亚地区的强国地位，并且相继同其他欧美殖民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几乎与此同时，1853年7月，美国军舰进入日本港口，并在次年3月迫使日本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据此日本长期封闭的国门同样被打开并丧失了众多权利。也是大约在此前后，东亚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了同样的命运，先后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

在殖民主义扩张的大潮之下，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开始解体，作为过去华夷秩序中心国家的中国已经不再具有维护这一秩序的能力，过去在这一秩序下生活的其他东亚国家也不得不生活在了欧美列强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中。如此一来，东亚地区不再是一个相对统一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其中被分割成了殖民者与殖民地两大部分，并且作为外来者的殖民者反而成了这一地区的主宰。即使同为殖民地的东亚各国，也被分别置于不同殖民国家的支配之下。因此，可想而知，东亚地区被分裂了，东亚国家在还没有感觉到“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而形成对“自我”的自觉意识时就被“他者”残酷地将其地区认同剥夺了。

然而，造成东亚地区更加严重分裂的应该说是东亚国家本身。同样面对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控制，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⁷⁾相对于中国东亚强国地位的丧失和一步一步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日

7)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月

本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不但没有像中国一样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反而按照欧美列强的近代规则既改变了国内的政治体制与结构，又对外迅速崛起，很快进入了西方列强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也开始按照欧美殖民国家同样的方式或者更为残酷的方式对待其他东亚国家。1885年，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书《脱亚论》中明确表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而且“对付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⁸⁾这一思想不幸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同其他东亚国家关系的主要政策，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同欧美国家争取更平等地位的同时，日本先后侵略中国的台湾，吞并了琉球王国，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与中国之间进行了“甲午战争”并迫使中国清政府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获得大量赔款和众多特权。由此，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开始长期处于一种殖民与被殖民、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之中，东亚地区也进一步被分裂。

面对欧美列强的殖民入侵与控制，以及面对日本更为残酷的殖民占领与控制，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所追求的目标首先主要是国家和民族认同，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唤醒民众，使其在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过程中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而地区认同还远远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需要和诉求。即使是日本，其主要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20世纪初，日本在1904年2月至1905年5月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欧洲国家俄罗斯，从而一跃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更加踌躇满志，在中国问题上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试图在中国获得更多权益并进而独占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亚洲联合论”等主张，想要将欧美列强排挤出亚洲，尤其是东亚，自己则成为这一地区永久的霸主。也正是因为如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为了排挤欧美国家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开始借助武力实现自己的“亚洲霸主梦”，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又挑起“芦沟桥事变”，试图肢解和占领中国，当然地引起了中国的全面抗战。之后不久，日本又提出要建立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11月召集亚洲国家的一些傀儡政权在东京举行了所谓“大东亚会议”。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也是一种东亚认同，即试图将整个东亚连成一体，但是其实质却是试图通过武力占领或外交压力奴役东亚其他国家的一种尝试，因此不可能得到其他东亚国家的认同，却反倒遭致这些国家更强烈的反对而进一步分裂了东亚。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人民的一致抗日，最终反而是中国联合了东亚地区之外的美国等国家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并最终战胜了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与日本之间近代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对抗关系终于结束，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也获得独立，这些变化都再次为东亚认同提供了历史的机遇。然而历史总是难遂人愿，战后不久爆发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再次撕裂了东亚，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分属了不同阵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不同阵营的主要认同，甚至国家认同的意识也被削弱，东亚地区认同就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了。在这一冷战结构下，中国和日本分属不同阵营，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甚至没有外交关系。日本虽然在战后明确放弃了近代以来的所谓“脱亚入欧”政策，1957年提出“亚洲一员”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实际上仍然将自己视为西方一员，同美欧国家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东亚国家的关系。即使在同东南亚国家、台湾、韩国的相对紧密关系中，日本也只是为了其经济利益。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森在20世纪70年代初指出的那样：“日本远在一个世纪之前即跃入西方技术文明的行列，一百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

版，第464页

8) 转引自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方思想和西方事务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⁹⁾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仍然被东南亚国家称之为“经济动物”。

1972年9月，中国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近代以来不平等的中日关系才真正开始得以发展。不过，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力主要是出于两国一定程度的安全认同，而当时能够左右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却并不是中国和日本，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整个东亚仍然笼罩在冷战结构下，意识形态也仍然是认同的主要标准，因此中日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带动东亚地区的认同。尤其是日本，长期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仍然认为：“日本在考察世界的时候，时而以东方为立足点，时而以西方为立足点，时而又以东西折衷的接触点为立足点。”¹⁰⁾

由此可见，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地区最大国家其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的不同，导致了东亚的分裂和地区认同的缺失。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东亚国家的不同殖民占领和统治又导致了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即东亚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不同的历史认识和记忆，甚至在文化、宗教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都使得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很难形成地区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中日对抗以及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统治，但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却继续分裂了东亚，使东亚地区认同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三、冷战终结后东亚地区的重新整合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苏缓和的大背景下，东亚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构成地区认同最主要的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意识形态渐渐地不再是构成认同的主要因素，经济利益与相互依存度以及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越来越成为构成认同的主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各种联系相应增加，地区认同问题开始成为东亚国家之间越来越多讨论的一个话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他大部分东亚国家也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因此，“东亚涌起了世界历史上声势空前的工业化、现代化大浪潮。到了80年代，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增长速度。东亚成为当代世界发展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并且带动世界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为‘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¹¹⁾尽管对世界是否将进入“太平洋时代”这一看法还有很多争论，但是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有目共睹和不容置疑的。而且，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也在加深，例如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长时间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目前已经超过2600亿美元。这种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客观上有利于东亚国家地区认同意识的出现与强化。

此外，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大幅度改善，例如中国和韩国建交、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中国和越南以及东盟国家关系全面改善，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倒退的形势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出现大幅度倒退。这种状况也促进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东亚地区认同的强化与形成。

另外一个有利于形成东亚地区认同的因素，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即在东亚“自我”意识增加的同时

9) 奥尔森著：《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页。

10) 沟口三：“现阶段及21世纪日本的中国研究课题”，载李玉等主编：《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11) 梁志明主编：《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也有来自东亚地区之外“他者”的刺激而迫使或促使东亚国家之间形成更强的地区认同。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进程进一步加快，1993年11月欧洲联盟（EU）建成，并且其成员国范围不断扩大，相互开放边界，实行统一货币，正在谋求实现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1994年1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美国为核心形成了世界上另外一个通过开放的经济贸易来深化国家间合作以促进地区全面发展的区域。这两大经济区的建立，对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和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对于处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地区的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压力。面对来自外界“他者”这一巨大的刺激和压力，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一般认为，地区认同是维护地区和平与深化地区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区域意识的不断上升，有利于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因为民族国家意识重要性的下降和区域意识重要性的上升是区域合作赖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¹²⁾因此东亚地区认同应该是东亚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尽管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增强地区认同的意识，但是追求地区认同的时间还比较短，而且这一追求还常常被东亚国家之间围绕某些现实利益或不同历史认识的冲突所打断，其中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关系，仍然常常成为影响东亚地区认同的重要因素。

中国和日本无疑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任何有关东亚地区的事务和合作，不可想象能够在排斥中国或者日本的前提下实现，当然包括东亚地区认同的实现也是如此。然而，虽然中国同日本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加深，经济法律制度也在逐步接近，政治关系也在持续改善，文化更是具有众多相同或相近的内容，但是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安全战略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甚至冲突，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并阻碍了两国的地区认同以及地区合作。例如，由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近代历史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导致中国民众对日友好感情的下降，在2002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两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加。”¹³⁾2005年4月甚至爆发了中国民众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其次，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彼此缺乏信任，对对方的发展心存疑虑，如日本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对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的担忧，中国对日本参与日美框架内的各种军事活动及本身军事力量的增长和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也表示不快和担忧；再次，意识形态虽然已经不再是左右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但是中日之间还是有可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产生摩擦，如李登辉、达赖、热比娅等人的访日，就造成了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摩擦。

因此，继续改善中日关系就成为增强东亚认同和深化东亚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中日关系的改善除去中日两国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将中日两国规范在一个东亚多边框架中，这样可以使中日两国在增加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增加共同责任。例如，目前已经实现的东亚10+3以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就会对改善中日关系以及促进地区认同的形成和地区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东亚国家的多样性特点，以及中日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决定了东亚地区的认同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也不会一帆风顺地实现。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东亚国家才更需要共同努力，在逐渐培育地区认同的基础上谋求东亚地区更为和平稳定繁荣的未来，其中中日两国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2) 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13) 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第13页。

중일의 상이한 근대역사경험이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아이덴티티에 끼친 영향

량원상 (베이징대학 국제관계학원)

〈목 차〉

1. 정체성 및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
2. 근대 이후 중일 양국의 서로 다른 역사적 경험과 발전의 길로 확대된 동아시아 분열
3. 냉전 종식 후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재통합

내용요약 : 정체성(Identity)은 인류 사회의 어느 집단이 어떤 공통점을 가짐에 따라 형성된 기타 집단과 구별되는 공동의식을 말한다. 지역 정체성이란 일정한 지리적 범위를 기본 요소로 형성된 공동의식을 말하지만, 이 지리적 범위 내의 국가들이 문화, 역사, 정치, 경제 등에서 정체성을 형성해야만 진정한 의미의 지역 정체성을 형성할 수 있다.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은 현대적인 의미에서의 동아시아 지리적 범위 내 국가들이 같거나 비슷한 문화적 배경과 역사적 경험, 가깝거나 상호 의존적인 정치, 경제적 이익을 바탕으로 형성된 공동의식을 말한다.

하지만 근대 이전의 동아시아에서는 의미 있는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이 형성되지 않았다. 이 지역이 중국을 중심으로 상대적으로 폐쇄, 독립적인 지역 및 ‘화이질서(華夷秩序)’를 형성하고 있었다고 하더라도 말이다. 근대 이후 서양 식민주의가 침략하고 ‘화이질서’가 해체되고 중일 양국이 서로 다른 역사 및 발전의 길을 걸으면서 동아시아는 심각한 분열의 시기를 맞이하게 되었고 결국 동아시아 정체성 상실이라는 결과를 초래했다. 2차 세계대전이 근대 이후 중일 간의 불평등한 지위 및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식민주의 통치를 종식시켰지만, 냉전이 시작되면서 동아시아는 또 다시 지역 정체성을 다질 수 있는 기회를 놓쳤다.

냉전 종식을 전후해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경제 발전, 동아시아 국가들 간의 상호의존성 강화, 정치 관계 개선, EU 탄생 및 북미자유무역협정 체결로 형성된 외재적 압력으로 중국과 일본 등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은 지역 정체성에 대해 의식하기 시작했다. 그리고 이 정체성을 기반으로 동아시아 10+3, 한중일 정상회담 메커니즘 구축 등과 같은 지역 협력을 추진했다. 하지만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다양성, 역사적 인식 및 안보 전략, 이데올로기 등에서의 중일 간의 갈등 때문에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과 협력은 느리게 진행될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런 이유 때문에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은 더욱 함께 노력해야 하고 지역 정체성을 확대해가면서 평화롭고 안정적인 번영을 이루는 동아시아의 미래를 구상해야 한다. 이중 중일 양국의 책임은 더욱 막중하다.

키 워 드 : 동아시아 정체성, 중일 관계, 지역 협력

1. 정체성 및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

정체성(Identity)은 인류 사회의 어느 집단이 어떤 공통점을 가짐에 따라 형성된 기타 집단과 구별되는 공동의식을 말한다. 즉 ‘행위체(行爲體)가 타자와의 비교 중에서 생산한 자아인지와 자아경계라고 할 수 있다’¹⁾. 다시 말해 정체성은 공통적인 ‘자아’ 의식을 가짐과 동시에 ‘자아’ 외부에 존재하는 ‘타자’를 의식해야 한다. 이 의식은 주로 ‘자아’와 ‘타자’ 사이에 대한 행위체의 상호 관계를 강조한다.

물론 ‘자아’와 ‘타자’의 경계를 구분하는 것은 어려운 일이다. 정체성에는 여러 정체성이 있고 정체성이라는 이 공동의식을 형성하는 요소 또한 많기 때문이다. 일반적으로 정체성은 상대성, 단계성, 다원성을 띄고 있다. 상대성이란 ‘자아’와 ‘타자’에 대한 구별이 상대적이라는 것을 말한다. 더욱 멀게 느껴지는 또 다른 ‘타자’에 상대적으로, 어떤 ‘타자’는 ‘자아’의 일부분이 될 수 있고, 혹은 반대로 어느 ‘자아’의 내부가 멀고 가까움으로 구별되는 더욱 많은 ‘타자’로 분화될 수 있다. 단계성은 상대성과 관련이 있다. 즉 정체성은 각각의 단계와 범위에서 형성된다. 예를 들어 단체 정체성, 지방 정체성, 민족 정체성, 국가 정체성, 지역 정체성으로 나뉘 수 있으며 때로는 세계 정체성과 인류 정체성 등으로 나뉘기도 한다. 다원성이란 정체성을 형성하는 심리적 요소가 여러 가지이거나 종합적일 수 있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즉 인종 정체성, 지역 정체성, 경제 정체성, 정치 정체성, 문화 정체성, 종교 정체성, 역사 정체성, 법률 정체성 등이 여기에 포함된다.

이렇게 많은 정체성 중에서 우리가 관심을 기울일 부분은 지역 정체성, 더 구체적으로 말하면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이다. 그렇다면 지역 정체성 및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은 무엇일까? 어느 학자는 “지역 정체성 혹은 의식은 지리적으로 가깝고 상호 의존적인 국가들이 사상적으로 해당 지역의 다른 국가들과 형성한 정체성 및 다른 국가들을 지역 전체의 일부분으로 보는 의식이다.”라고 말한다²⁾. 혹자는 “지역 정체성 혹은 지역 의식은 개인, 가족, 민족 의식 및 국가 사상을 초월해 생산된 일종의 집단의식이다. 즉 특정한 지리적 공간 내에 살고 있는 군중이 함께 생산한 공동체 의식 및 귀속 의식이다.”라고 말한다.³⁾ 다시 말해 지역 정체성은 바로 일정한 지리적 범위를 기본 요소로 형성된 정체성을 말한다. 먼저 지역 범위로 ‘자아’와 ‘타자’의 경계를 구분하고 일부 지역 범위 안에 있는 국가를 ‘자아’로, 범위 밖에 있는 국가를 ‘타자’로 보는 것이다. 하지만 진정한 의미의 지역 정체성을 형성하려면 지역 범위로 구분 짓는 것으로는 부족하다. ‘지역은 지리, 경제, 정치적인 정체성으로 구성되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심리, 문화적인 정체성도 포함하고 있기 때문이다. 심리 및 문화적 정체성이 없다면 지역의 개념은 불완전하며 견고하지 못하다’.⁴⁾ 다시 말해서 지역 정체성을 형성하려면 같은 지역에 있다는 기본적인 요소 외에 이 지역 내의 국가들이 비슷한 문화 정체성과 역사 정체성 및 경제, 정치, 법률 등의 정체성을 가지

1) 후야리胡亞麗 : 동아시아 통합 과정에서의 동아시아 정체성 시범 분석(試析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東亞認同, <구이저우사범대학 학보(貴州師範大學學報)>(사회과학판), 2004년 제3

2) 류상화劉興華 : 지역 정체성과 동아시아 지역주의(地區認同與東亞地區主義, <현대국제관계(現代國際關係)>, 2004년 제5

3) 장원링張蘊嶺 편집 : 《세계 블록화의 발전 및 유형(世界區域化的發展與模式)》, 세계지식출판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4년, 318쪽

4) 위신톈(魏新天) : 동아시아 정체성의 태동 문화적 시각에서(東亞認同感的胎動——從文化的視角, <세계 경제와 정치(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4년 제6

고 있어야 한다. 즉 이들 국가들이 같거나 비슷한 문화적 배경과 풍속 및 관습, 역사적 경험과 감정, 역사에 대한 기억이 있어야 하며 현실의 정치 혹은 경제 생활에서도 같은 이익을 가지고 있어야 한다. 그렇지 않으면 같은 지역에 있는 국가라도 정체성 분열, 심지어 정체성 대립이라는 상황에 맞닥뜨리게 된다.

따라서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은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민족 국가 사상을 초월해 자신이 있는 동아시아 지역을 전체로 보고 동아시아 지역 바깥에 있는 국가들과 분명하게 구별해 형성한 공동 의식이자 귀속감이라 할 수 있다. 물론 이러한 공동의식과 귀속감을 형성하기 위해서는 동아시아 지역이라는 지리적인 범위만 고려해서는 안 되며 동아시아 국가들간의 비슷한 문화적 배경이나 풍속, 관습, 역사적 경험 및 기억, 경제 및 정치적 이익을 고려해야 한다.

그렇다면 동아시아의 지리적 범위에는 어떤 국가들이 속하고, 이들 국가들 사이에 과연 정체성이 존재할까? 역사적으로 봤을 때 최초의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구분은 명확하지 않다. 고대에는 이 지역을 지금의 동북아와 동남아 지역을 가리키는 ‘동양(東洋)’과 ‘남양(南洋)’으로 불렀고, 근대 이후에는 유럽인들이 ‘극동’이라고 불렀다. 지리적 경계는 여전히 모호했다. 2차 세계대전 이후에서야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개념과 범위가 분명해지기 시작했으며 ‘극동’이라는 개념에서 ‘동남아’와 ‘동북아’를 분리하고 오늘날의 동아시아 지역으로 통합하기 시작했다. 즉 지금의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동북아와 동남아를 포함하는 모든 국가를 말하며 구체적으로 중국, 일본, 한국, 북한, 몽골, 아세안 10개국을 포함한다.

동아시아 지역에 정체성 즉, 동아시아 지역이 자각한 공동의식이 있는가 혹은 있었는가에 관해서 중국 학자는 “중국의 동아시아 지역 의식은 근대 이후에 형성된 것이 아니라 주(周)나라 때부터 존재했었고 한(漢), 당(唐) 시대에 이르러 완벽한 형태로 자리잡았다.”고 여긴다.⁵⁾ 일본 학자 호리 도시가즈(堀敏一) 역시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 최초로 고도 문명을 생산한 나라는 중국이다. 중국에서 발생한 문명은 중국 주변 지역 및 여러 민족의 발전을 이끌었고 여러 민족을 포함한 동아시아 세계를 형성했다.”고 여긴다.⁶⁾ 고대의 동아시아 지역은 세계 다른 지역과 단절되어 있었고, 이 지역에는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화이질서’라고 부르는 고리 모양의 국가 구조가 형성되어 있었다. 즉 동아시아 중심에 위치한 중국이 절대적으로 우세한 지위를 차지한 대제국으로 군림했다. 중국의 세력은 한반도, 일본, 베트남 등에까지 이르렀고 ‘조공 제도’로 이들 국가를 연결했다. 이 질서와 제도 하에 조선, 일본, 베트남 등은 중국을 배우고 모방해 중국과 비슷한 문화 즉, 한자, 유학, 불교를 주요 내용으로 하는 공통된 문화적 배경을 형성했다. 또한 풍습, 관습, 문학, 예술, 정치, 제도 등에서도 비슷한 문화를 형성했다. 그렇다고 해서 동아시아 지역에 지역 정체성이 형성되었다고 볼 수는 없다. 우리가 말하는 지역 정체성이란 어느 지역 내의 국가들이 서로 간에 공통성을 가지고 있는 일종의 자각의식이라고 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또한 지역 외의 기타 국가들과 비교해 존재하는 상호 간의 서로 다른 자각의식이라고도 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형성된 ‘화이질서’ 내에 있던 국가들 사이에는 이런 자각의식이 전혀 없거나 있었다고 하더라도 일방적인 것이었다. 지역 바깥에 있는 자신과 구별되는 세계에 대해 그 어떤 자각의식도 없었다. 지역이 상대적으로 독립성을 띠고 지역 내 국가들이 어떤 공통성 가지

5) 붕청유宋成有) 등 편집 : 《동아시아 지역 의식과 평화 발전(東亞區域意識與和平發展)》, 쓰촨대학출판사(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년, 1

6) 호리 도시가 : 《중국과 고대 동아시아 세계中國與古代東亞世界》, 이와나미쇼巖波書, 1993년, 2쪽

게 되는 것은 지리적 환경으로 한정된 무의식의 결과이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이 시대의 정체성을 근대 의미에서의 지역 정체성으로 볼 수 없는 것이다.

하지만 중국이 동아시아 지역의 핵심 국가로서 ‘화이질서’ 속에서 오랫동안 주변 국가들에 영향을 미쳤고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을 형성하는데 적극적인 역할을 했다는 사실은 부인할 수 없다. 또한 영향을 받은 국가들 사이에 많은 공통성이 부여해 지역 정체성이 형성되는데 큰 가능성을 제시했다. 유일하게 부족했던 점을 꼽자면 외부 세계의 ‘타자’와 접했을 때 자신의 공통성을 유지하며 스스로 ‘자아’와 ‘타자’를 구별하는 것이었다. 하지만 안타깝게도 근대 구미 국가들이 동아시아 지역에 식민지 확장을 꾀하면서 동아시아 지역에 지역 정체성이 형성될 수 있는 가능성을 파괴했다. 특히 중국의 반식민지화와 일본의 식민국가화라는 역사적 사실은 중일 양국간의 서로 다른 역사적 경험 및 발전의 길을 초래했고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정체성뿐만 아니라 오늘날 동아시아 지역 협력에까지 영향을 미쳤다.

2. 근대 이후 중일 양국의 서로 다른 역사적 경험과 발전의 길로 확대된 동아시아 분열

19세기 중엽, 산업 혁명을 거쳐 빠르게 발전한 구미 국가들이 동아시아 지역으로 식민 확장을 꾀하기 시작했다. 1840년 2월, 기존에 중국과 무역 관계를 형성했던 영국이 ‘아편 전쟁’을 일으키고 신속하게 중국을 격퇴시켰다. 이로써 청(淸) 정부는 1842년 6월, 근대 들어서 처음으로 서양 국가와 불평등 조약인 <난징조약(南京條約)>을 맺었다. 영국은 이를 근거로 닫혀 있던 중국의 문을 열고 많은 특권을 얻었으며, 중국은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강대국 지위를 서서히 잃어갔다. 게다가 다른 구미 식민국가들과도 일련의 불평등 조약을 맺어 서양 국가의 반식민지로 전락했다. 1853년 7월에는 미국 군함이 일본 항구에 진입했고 다음해 3월, 일본 막부는 강압에 못 이겨 <가나가와조약(神奈川條約)>을 맺었다. 이로써 일본 역시 오랫동안 닫혀 있던 문을 열고 많은 특권을 넘겨주었다. 대체적으로 이를 전후해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거의 모든 국가들이 똑같은 운명에 처했고 구미 국가의 식민지가 되었다.

식민주의 확장이라는 열풍 속에서 동아시아 지역의 화이질서는 서서히 해체되기 시작했고 과거 화이질서의 중심이었던 중국도 이 질서를 유지할 능력을 잃었다. 이 질서 속에서 생활하던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역시 어쩔 수 없이 구미 열강이 구축한 새로운 질서 속에서 살 수밖에 없었다. 이렇게 동아시아 지역은 상대적으로 통일, 폐쇄, 독립적으로 존재하던 상황에서 벗어났고 식민자와 식민지로 분할되었으며 외부인인 식민자가 이 지역을 지배하기 시작했다. 동아시아 각국은 같은 식민지였지만 서로 다른 식민국가 지배 하에 놓였다. 이 때문에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분열되었고, ‘자아’와 ‘타자’를 구별해 ‘자아’에 대한 자각의식을 형성하지 못한 채 ‘타자’에 의해 잔인하게 지역 정체성을 박탈당했다.

하지만 동아시아 지역을 더욱 분열시킨 것은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자신이다. 구미 열강의 식민 침략과 통제에 직면해 ‘두 극동 국가 중국과 일본 모두 근원적인 영향을 받았지만, 영향을 받은 방식은 완전히 다르다. 일본은 서양 강대국의 원칙을 수용하고 이용해 자위(自衛)와 이후의 세력

확장에 적용했다. 이에 반해 중국은 이미 변화한 서양 방식으로 자신을 재편하지 못했다.⁷⁾ 중국이 동아시아 강대국의 지위를 잃고 조금씩 구미 열강의 반식민지가 된 것에 비해, 일본은 완전히 다른 길을 걸었다. 메이지 유신을 거친 일본은 중국처럼 구미 국가의 식민지로 전락하지 않고 오히려 이들 열강의 근대적인 규칙에 따라 국내 정치 제도와 구조를 바꾸었다. 또한 대외적으로 빠르게 발전해 서양 열강 대열에 합류했다. 여기에서 심각한 문제는 동아시아 국가인 일본 역시 구미 식민국가와 똑같은 방식 혹은 더욱 잔인한 방식으로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를 대했다는 점이다. 1885년, 일본 근대 사상가 후쿠자와 유키치(福澤諭吉)는 자신의 저서 《탈아론(脫亞論)》에서 “우리나라는 주저해서는 안 된다. 이웃 국가들의 진보를 기다려 함께 아시아를 부흥시키는 것보다 그 대열에서 벗어나 서양 각 문명 국가들과 함께 진퇴를 거듭하는 것이 낫다.”라고 명확히 지적했다. 게다가 “중국, 조선을 대할 때 이웃 국가라는 이유로 주저할 필요 없으며 서양인이 이들 국가를 대하는 방식으로 대하면 된다.”라고 말했다.⁸⁾ 이 사상은 불행하게도 일본 정부가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들과의 관계를 다루는 주요 정책으로 자리잡았다. 일본은 1870년대부터 구미 국가들과 함께 더욱 평등한 지위를 얻고자 노력하는 한편, 대만을 침략했고 류큐왕국(琉球王國)을 삼켰다. 1894년 7월부터 1895년 3월까지 중국과 ‘청일전쟁(중국명 : 갑오전쟁)’을 벌여 청나라 정부로부터 대만과 뽕호열도(澎湖列島)를 할양받고 막대한 배상금과 수많은 특권을 얻었다. 이로써 같은 동아시아 국가인 중국과 일본은 오랫동안 피식민-식민, 피침략-침략의 관계에 놓이게 되었고,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더욱 분열되었다.

구미 열강의 식민 침략과 통제 그리고 일본의 더욱 잔인한 식민 점령과 통제에 직면해, 중국과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목표는 국가 및 민족 정체성을 확립하는 일이었다. 즉 민족을 일깨워 민족 혹은 국가 정체성을 구축하는 과정에서 어떻게 민족과 국가의 독립, 해방을 실현하느냐 하는 문제를 가장 먼저 해결해야 했다. 지역 정체성이 이들 국가의 목표가 되기에는 요원해 보였고, 일본 역시 국가 및 민족에 대한 정체성이 주요 부분이었다.

20세기 초, 일본은 1904년 2월부터 1905년 5월까지 벌인 ‘러일 전쟁’에서 유럽국가인 러시아를 물리치고 동아시아 지역의 패권으로 도약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더욱 득의양양해진 일본은 중국 문제에서 ‘21개조 요구안(對華二十一條)’을 제시해 중국에서 더 많은 권익을 얻고 나아가 중국을 점령하고자 했다. 이와 함께 일본은 ‘대아시아주의’, ‘아시아 연합론’ 등을 주장하며 구미 열강을 아시아, 특히 동아시아에서 쫓아내고 자신이 이 지역의 영원한 패권이 되고자 했다. 이런 이유로 1차 세계대전 후 일본과 미국이 첨예하게 대립한 것이다. 구미 국가들을 동아시아, 특히 중국에서 쫓아내기 위해 일본은 1930년대 초부터 무력으로 ‘아시아 맹주’의 꿈을 실현하려고 했다. 1931년 9월 ‘만주사변(滿洲事變, 9·18사건)’, 1937년 7월 ‘노구교사변(蘆溝橋事變)’을 일으켜 중국을 해체하고 점령하고자 했다. 물론 중국 전역에서 항전 물결이 일었다. 얼마 후 일본은 동아시아 지역 전체를 포함하는 ‘대동아공영권(大東亞共榮圈)’ 이론을 다시 내세웠고, 태평양 전쟁 발발 후인 1943년 11월 아시아 국가들의 꼭두각시 정권을 소집해 도쿄에서 ‘대동아 회의’를 열었다. 일본의 이 일련의 행동은 표면적으로는 동아시아 지역을 하나로 연결하려는 의도로 보여 동아시아

7) 스타브리아노스Leften Stavros Stavriano, 우상잉吳象嬰) : 《세계통사 1500년 이후의 세계(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 상하이사회과학원출판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년 1월, 464

8) 리원李文) 저작에서 재인용 : 《동아시아 협력의 문화적 형성원인(東亞合作的文化成因)》, 세계지식출판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년, 206

아 정체성이라고 할 수 있지만, 실질적으로는 무력 점령이나 외교 압력을 이용해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을 노예로 삼으려는 시도라고 할 수 있다. 이 때문에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인정을 얻지 못하고 오히려 강력한 반대에 부딪치고 동아시아 지역을 더욱 분열시켰다. 특히 일본의 중국 침략은 중국 민중들의 일치된 항일 운동을 불러 일으켰고, 마침내 중국은 동아시아 지역 바깥의 미국 등과 연합해 일본의 침략에 맞서 승리를 거두었다.

2차 세계대전 후, 중국과 일본 사이에 근대부터 구축된 피침략-침략 관계가 끝나고 동아시아 지역 대부분의 나라가 독립을 얻었다. 이런 변화는 동아시아 정체성에 새로운 역사적 기회를 안겨 주었다. 하지만 역사는 항상 사람들의 바람대로 이루어지지 않는다. 전쟁이 끝나고 얼마 지나지 않아 발생한 동서양 이데올로기 냉전이 또 다시 동아시아를 갈갈이 찢었다. 중국과 일본 및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은 알게 모르게 서로 다른 진영에 속하게 되었고 사회주의 혹은 자본주의 이데올로기가 각 진영의 주요 정체성으로 자리 잡았다. 심지어 국가 정체성 의식마저 약해져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 구축은 더욱 요원해졌다. 냉전 구도 속에서 중국과 일본은 각기 다른 진영에 속하게 되어 오랫동안 적대적인 상황에 놓였고 아무런 외교 관계도 맺지 않았다. 일본이 2차 대전 후에 근대부터 주장해 온 ‘탈아입구(脫亞入歐, 아시아를 벗어나 유럽에 편입한다)’ 정책을 포기하고 1957년에 자국의 세 가지 중요한 외교정책 중 하나로 ‘아시아의 일원’을 제시했지만, 실제로는 여전히 서양의 일원으로 행동했고 같은 동아시아 국가들보다 구미 국가들과 더 긴밀한 관계를 맺었다. 동남아 국가들, 대만, 한국과 상대적으로 긴밀한 관계를 맺었지만 이는 단순히 경제적인 이익을 위해서였다. 미국 학자 올슨(Olson)은 1970년대 초 다음과 같은 의견을 제시했다. “일본은 한 세기 전 서양 기술 문명 대열에 진입했고 100년 동안 서양 사상과 업무에 모든 역량을 집중했다. 그들은 아시아에 냉담했다.”⁹⁾ 이 때문에 1970년대 초 동남아시아 국가들은 일본을 ‘경제 동물’이라고 부르기도 했다.

1972년 9월, 중국과 일본이 국교 정상화를 이루면서 근대 이후 불평등한 관계였던 중일 관계가 진정한 발전을 거두었다. 하지만 중일 관계 개선 동력은 양국의 안보 정체성에서 기인하는 것이었지만, 당시에 동아시아 지역 안보 상황을 좌우하던 국가는 중국과 일본이 아니라 미국과 소련이라는 두 초강대국이었다. 게다가 동아시아에는 여전히 냉전의 먹구름이 드리워 있었고 이데올로기 역시 여전히 정체성의 주요 기준이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중일 관계 개선도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을 발전시키지 못했다. 특히 일본은 오랫동안 동서양 사이를 배회했고, 1990년대에 일본 학자 미조구치 유조(溝口雄三)도 여전히 “일본은 때로는 동양을 기반으로, 때로는 서양을 기반으로, 때로는 동서양이 절충된 접점을 기반으로 세계를 살펴본다.”고 주장했다.¹⁰⁾

이를 보아 근대 이후 중국과 일본이라는 두 동아시아 강대국의 역사적인 경험과 발전의 길이 서로 달라지면서 동아시아 분열과 지역 정체성 부재라는 상황을 초래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일본 및 기타 서양 국가가 동아시아 국가에 자행한 식민 점령과 통치는 또한 동아시아 지역의 다양성을 초래했다. 즉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서로 다른 정치, 경제, 법률 제도를 구축하게 되었고 역사 인식이나 기억, 문화 종교 등에서까지 서로 다른 입장과 태도를 취하게 되었다. 이런 상이성 때문에 동아시아 지역 국가들 사이에 지역 정체성을 형성하기가 어려웠다. 2차 세계대전으로

9) 올슨 저 : 《전후 아시아에 있는 일본日本在戰後亞》, 상하이인민출판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년, 97

10) 미조구치 유조 : 현 단계 및 21세기 일본의 중국 연구과제(現階段21實際日本の中究課題, 리(李玉 등 편 집의 《중국과 일본(中國與日本)》 에제, 베이징대학출판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년, 314

중일 대립 및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식민 통치는 종언을 고했지만, 동서양 이데올로기 냉전은 여전히 동아시아를 분열시켰고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의 구축을 저해했다.

3. 냉전 종식 후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재통합

1980년대 중반부터 미소 대립이 완화되면서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 큰 변화의 바람이 불기 시작했다. 과거 지역 정체성을 구성하는 가장 중요한 요소 역시 이와 함께 변화했다. 즉 이데올로기는 더 이상 정체성을 구성하는 중요 요소에서 밀려났고, 경제적 이익과 상호 의존성 및 국가 관계 정상화가 주요 자리를 차지하기 시작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동아시아 국가들 간의 각종 연계가 증가하고 지역 정체성 문제가 자주 논의되었다.

1980년부터 중국은 경제 건설 위주의 개혁개방 정책을 펼쳤고 다른 동아시아 국가들도 경제 발전을 국가 발전전략의 중심으로 삼았다. 이로써 ‘동아시아는 세계 역사에서 전에 없이 거대한 산업화, 현대화의 물결을 일으켰다. 80년대 중국을 포함한 광활한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경제 성장 속도는 서양의 산업화 초기 때의 성장 속도를 훨씬 뛰어넘었다. 동아시아는 당시 세계에서 발전이 가장 빠르고 경제적으로 활력이 가장 넘치는 지역이 되었다. 또한 세계 중심을 대서양 지역에서 환태평양 지역으로 이전했으며 ‘태평양 시대’의 서막을 열었다.’¹¹⁾ 세계가 ‘태평양 시대’에 진입할 수 있는가 하는 문제에 대해 여러 논쟁이 많지만, 80년대 이후부터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하는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고속 경제성장은 의심의 여지 없는 분명한 사실이다. 뿐만 아니라 중국과 일본 및 기타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사이의 경제 상호의존도 역시 증가했다. 현재 중국은 일본의 최대 무역파트너이고 일본 역시 오랫동안 중국의 최대 무역파트너였다. 양국의 무역액은 지속적으로 증가하고 있으며 현재 이미 2,600억 달러를 넘었다. 지속적인 경제성장과 상호의존도 강화는 객관적으로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지역 정체성 형성 및 강화에 유리하다.

이밖에, 냉전 종식 후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사이의 정치적 관계도 대폭 개선되었다. 중국은 한국, 싱가포르, 베트남과 수교를 맺었고 중국과 아세안 국가들의 관계도 전면 개선되었다. ‘천안문 사건’ 후 중국과 서양 국가들의 관계는 후퇴했지만 일본과의 관계에는 아무런 변화도 없었다. 이런 상황 역시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협력을 촉진했으며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 형성 및 강화에 유리하게 작용했다.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 형성에 유리한 또 다른 요소로는 외부 세계의 압력이 있다. 즉 동아시아의 ‘자아’ 의식이 커짐과 동시에 동아시아 지역 외부 ‘타자’의 자극을 받아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사이에 더욱 강한 지역 정체성이 수동적 혹은 적극적으로 형성된다. 냉전이 끝나고 유럽 국가들의 협력도 가속화되어 1993년 11월에 유럽연합(EU)이 탄생했다. EU 회원국은 계속 확대되고 있고 국경을 개방하고 화폐를 통일했으며 현재 공동 외교 및 안보 정책을 구상하고 있다. 1994년 1월, 미국, 캐나다, 멕시코 3국이 북미자유무역협정(NAFTA)을 체결했다. 이로써 미국을 중심으로 개방적인 경제 무역을 통해 국가간의 협력을 강화하고 역내의 전면적인 발전을 이끄는 지역을

11) 랑즈밍梁志明) 편집 : 《동아시아의 역사적 격변과 재도약(東亞的歷史巨變與重新崛起)》, 세계지식출판사, 2005년, 197

구축했다. 양대 경제구의 구축은 세계 2위 경제대국인 일본과 경제가 빠르게 성장하고 있는 중국에, 세계에서 경제성장 속도가 가장 빠른 지역인 동아시아의 다른 국가들에 큰 자극과 압력을 주었다. 외부 세계 ‘타자’에서 비롯된 거대한 자극과 압력에 직면해 동아시아 국가의 지역 정체성도 강화되었다.

일반적으로 지역의 평화를 유지하고 협력을 강화하는 중요한 요소 중 하나로 지역 정체성을 꼽는다. 즉 ‘지역 의식의 상승이 동아시아 협력을 강화하는데 도움이 된다는 것이다. 민족 국가 의식의 중요성이 하락하고 지역 의식의 중요성이 상승하는 것이 지역 협력이 성공하는 주요 조건이기 때문이다.’¹²⁾ 따라서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이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추구하는 목표가 되어야 한다. 그러나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이미 지역 정체성의 중요성을 깨닫고 강화하기 시작했지만, 그 시행해 온 시간이 매우 짧은 데다가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사이의 현실적인 이익 혹은 역사적 인식 차이에 따른 충돌로 종종 벽에 부딪힌다. 특히 중일 관계가 여전히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중요한 요소로 작용하고 있다.

중국과 일본은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 가장 중요한 국가임에 틀림없다. 동아시아 지역과 관련된 그 어떠한 사무와 협력도 중국 혹은 일본을 배제한 채 실현할 수 있다고는 상상할 수 없다. 물론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을 실현하는 데서도 마찬가지이다. 현재 중국과 일본의 경제 상호의존도가 높아지고 경제, 법률, 제도 역시 밀접해지고 정치 관계도 지속적으로 개선되며 문화 역시 같거나 비슷한 내용으로 채워지고 있다고 하더라도 중일 양국은 역사적 인식, 안보 전략, 이데올로기 등에서 여전히 인식의 차이나 충돌을 보이고 있다. 이런 상황은 양국 관계에 심각한 영향을 미칠 뿐만 아니라 양국의 지역 정체성 및 협력을 저해한다. 일부 일본 정치가들의 근대 역사에 대한 잘못된 인식과 방법 때문에 일본에 대한 중국 국민들의 우호적인 감정이 식고 있다. 2002년과 2004년, 중국사회과학원(中國社會科學院) 일본연구소에서 두 차례 중일 여론 조사를 진행한 결과, 첫째, ‘2년 동안 일본에 대한 중국 국민들의 불편한 감정이 눈에 띄게 증가했다.’¹³⁾ 2005년 4월에는 심지어 중국 국민들이 대규모 반일 시위도 펼쳤다. 둘째, 중일 양국은 안보 분야에서 서로에 대한 신뢰가 부족해 상대방의 발전에 우려를 표하고 있다. 일본에서 등장한 ‘중국위협론’과 중국의 군사역량 발전에 대한 우려, 일본이 미일 협력 틀 속에서 행하는 각종 군사 활동 및 자국 군사력 증강, 자위대 해외파병에 대한 중국의 불쾌감과 우려를 예로 들 수 있다. 셋째, 이데올로기가 더 이상 중일 관계를 좌지우지하지 않지만 중일 간에는 여전히 민주, 자유, 인권 등의 문제를 둘러싸고 마찰이 발생하고 있다. 리덩후이(李登輝), 달라이 라마, 러비야(熱比亞) 등의 방일 문제가 중국과 일본의 외교적 마찰을 초래했다.

이 때문에 중일 관계를 지속적으로 개선하는 것이 동아시아 정체성과 협력을 강화하는 중요한 요소라고 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중일 관계를 개선하기 위해서는 중일 양국의 노력뿐만 아니라 중일 양국이 속한 규범화된 동아시아 다자 틀이 필요하다. 그래야만 중일 양국이 공동의 이익을 확대하는 과정에서 공동의 책임을 강화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예를 들어 동아시아 10+3이나 한중일 정상회담 메커니즘이 중일 관계를 개선하고 지역 정체성 형성 및 협력을 촉진하는데 큰 역할을 할 수 있다.

12) 리원 : 《동아시아 협력의 문화적 형성원인》, 세계지식출판사, 2005년, 197

13) 장리펑蔣立峰 : 일본에 대한 중국 국민들의 불편한 감정이 눈에 띄게 증가했, <일본학간(日本學刊)> 2004년 제6기, 13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다양한 특성과 중일 관계에 여전히 존재하는 난제 때문에 동아시아 지역 정체성을 결정하는 과정은 매우 길고 험난할 것이다. 하지만 그렇기 때문에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더욱 노력해야 하며 지역 정체성을 형성하면서 더욱 안정적으로 평화롭게 발전하는 동아시아 미래를 모색해야 한다. 이를 실현하기 위해서 중일 양국의 책임은 더욱 막중하다.

日本近世史研究における 「鎖国」の見直しと東アジア

■ 木村 直也（産業能率大） ■

日本近世史研究における「鎖国」の見直しと東アジア

木村 直也（産業能率大）

〈目 次〉

- はじめに
- 1 かつての「鎖国」概念と教科書記述
- 2 「鎖国」の見直しと教科書記述
- 3 「鎖国」の見直しの背景
- おわりに

はじめに

日本の政权交代で成立した鳩山内閣は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を提唱し、2009年10月の日本・中国・韓国首脳会談でもこれについて議論されたと報道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た構想が提唱される背景には、日本における現状認識と歴史認識の変化があるだろう。日本が従来のようにアメリカに追随するばかりではなく、東アジア諸国との連携を深めるべきだとの現状認識は、西洋近代至上主義の相対化という歴史認識とも深く結びつき、相互に作用を及ぼし合っ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歴史学は、諸史料を分析するという手法によって、あくまで歴史事実を究明し、その意義を考察しようとする学問である。この手法と姿勢を放棄して語られる“歴史”は、「物語」なのであって歴史事実ではない。しかし、一方で歴史は書き換えられるものである。新史料の出現による歴史事実の新たな発見があるばかりではない。从来ある程度知られた歴史事象についても、異なった視点からの研究が行われ、それが新史料の発掘を誘発しつつ、新たな歴史像を描くことになる場合も多い。そうした視点の斬新さは、研究者の能力によることももちろんあるが、その研究者が生きている時代が新視点の獲得を後押しすることを忘れてはならない。また、ここで獲得された新たな視点と歴史像が、現状の捉え方を規定していくことにもなる。すなわち、現状認識と歴史認識の相互作用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本報告では、そのような新たな視点・歴史像の獲得の一例として、日本近世史研究における江戸時代の「鎖国」に対する見直しについて採りあげたい。ここ30年ほどで学校教科書の記述ま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きた事例であるとともに、グローバル化した社会を生きる我々の歴史認識、とりわけ東アジアをめぐる歴史認識にも深く関わるテーマであるからである(1)。

1) 本報告の内容は、木村直也「『鎖国』の見直しと教科書記述」（『歴史評論』71200月）、同「総論Ⅱ 近世中・後期の国家と対外関係」（曾根勇二・木村直也編『新しい近世史2 国家と対外関係』新人物往来社199年）、紙屋敦之・木村直也編『展望日本歴1 海禁と鎖国』（東京堂出版200年）の総説などをもとにしている。

1 かつての「鎖国」概念と教科書記述

「鎖国」という言葉について、長崎通詞の志筑忠雄によるケンペル「日本志」の译出(1801年)に際して用いられたのが初出である(2)ことは、今日の日本では通説となっている。すなわち「鎖国」概念は、18世紀末から日本周辺にもロシアをはじめとする欧米の艦船が現れ、それに対する警戒感が为政者・识者の間に広まりつつあった状況のもとで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り、1630年代(寛永期)の一連の对外政策(従来「鎖国」政策と呼ばれてきた海外渡航禁止やポルトガル船来航禁止など)がとられたときに存在していた概念ではない。1804年に長崎に来航したロシア使節レザノフに対する申渡しにおいて、中国、朝鮮、琉球、オランダ以外の国とは新たに通信・通商関係をもたないのが祖法であるとの觀念が成立し(3)、幕末・維新期の欧米列強に対する危機感を背景に「鎖国」概念が普及していった。この概念は、明治時代に「欧米に追いつき追い越せ」との意識のも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に向かっていった日本で広く国民の間に定着し、江戸時代の「鎖国」が西洋諸国からの“遅れ”をもたらしたとする認識につながった。文明開化の風潮とともに、藩閥政府などによる幕政批判の姿勢もそこには関与していよう。その一方で、日本独自の文化や産業が育ち、長期間の平和が実現したことなど“利点”も指摘され、「鎖国得失論」として議論さ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敗戦を経験した和辻哲郎が、日本人の欠点として科学的精神の欠如を指摘しつつ、「鎖国が何を意味していたかを十分に理解することが必要」として『鎖国—日本の悲劇』(4)を著したことからも、こうした「鎖国」による“遅れ”意識の根強さが窺える。

明治以来の「鎖国」に関する議論を踏まえ、それらを実証的历史研究の立場で集大成したのが、岩生成一である。岩生は1963年に「鎖国」と題する論文(5)を发表し、それがその後しばらく通説的位置を占めた。この論文では、「鎖国の概念」として、「鎖国とは、大体において江戸幕府がその中央集权的な封建支配体制を強化する过程において、当局者がこの方向と相容れない点が多いと考えたキリスト教を徹底的に禁压するために採用した強力な政策であって、海外交通貿易は極端な制限と取り締まりを受け、その結果おのずからわが国が国际的孤立状态に陥ったことを指している」と説明されている。具体的な措置としては、キリスト教禁止、海外交通貿易・通信の禁止、キリスト教关系の外国文献・器物への接触禁止、ポルトガル・スペインの来航貿易禁止と并んで、「对外交通貿易の门户を長崎一港に限り、外国人の居住をも同地に极限し、貿易にも特殊な取締規定を設けた」ことをあげ、これらの措置で「鎖国の体制ならびに觀念がほぼ完成した」として、「鎖国」とはポルトガル船来航禁止の1639年から1853年のペリー来航まで215年間の对外关系を指すとする(6)。岩生は一般人向けの著述として、『日本の历史14鎖国』(7)を刊行しており、岩生の「鎖国」像は一般にもかなり浸透したといえるだろう。

1960年代、70年代の学校教科書では、おおむねこの岩生说到沿った記述が展开される。1970年前後に发行された高校「日本史」教科書の「鎖国」に関する記述を分析してみると(8)、寛永「鎖国」

2) 板沢武雄「鎖国および鎖国論について」(同『日蘭文化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5年)

3) 藤田覚『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对外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0年)

4) 和辻哲郎『鎖国—日本の悲劇』(筑摩書房196年)。同書の「序」195年付けで、和辻6年に没している

5) 岩生成一「鎖国」(『岩波講座日本歴1』岩波書店196年)

6) 岩生論文では「しかしその他の諸外人の来港貿易は必ずしも制限または禁止しなかったが、実上シナ・オランダ両国民の来航貿易(および対馬を通じての朝鮮人との交易)が引き続いて行なわれただけで、後年には両国民以外の諸国民にはこれを許さないように变化した」との留保が付けられているが、論文全体として、西欧諸国との関係の叙述がほとんどである

7) 岩生成一『日本の歴1鎖国』(中央公論社196年)

に至る西欧諸国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た対外関係については、ごく一部を除いて、どの教科書もほぼ共通の項目に触れている。岩生成一の著作と同様、ポルトガル・スペイン・オランダ・イギリスとの関係、朱印船貿易と日本町、貿易統制、キリスト教禁止、一連の寛永「鎖国令」と島原の乱については、字数を使って丁寧に説明しており、おおむね充実した記述になっている。

また寛永「鎖国」に対する歴史的評価の記述については、大半の教科書が、寛永16年令（1639年）によるポルトガル船来航禁止やオランダ商館の出島移転（1641年）で鎖国が「完成」「成立」したとし、長崎が唯一の門戸で、来航を許されたのがオランダ・中国のみ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そうした「鎖国」によって封建制・幕藩制の維持・強化が実現して、日本は世界の情報から孤立して進歩から取り残された、とする記述になっている。一部の教科書では、外国との関係をすべて遮断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のちになって交渉を一切拒否する意味をもつ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を説明しているものの、それらも例えば「かくして、日本は長崎という小窗1つを残して世界の文明の光を自らさえぎることになった……」などという文が并記されており、すべての教科書が「鎖国」について、岩生の「国際的孤立」という表現に近似した、閉鎖性を強調した叙述になっている。さらに、日本独自の文化や産業の発展、長期間の平和の実現、日本人の海外発展の途絶、日本人の積極的精神が失われ視野が狭くなったことなど、鎖国得失論の議論を踏まえた記述もいくつかみえる。

西欧諸国以外との関係、すなわち幕藩制国家周辺の朝鮮・中国・琉球・アイヌ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叙述の薄さが明了である。朝鮮については、多くの教科書が徳川家康時代の復交に触れ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対馬藩宗氏が日朝関係に果たした役割が明確にされておらず、朝鮮から使節が来たとの簡潔な記述がいくつかの教科書に見えるものの、「通信使」の表記を使ったのは1冊のみで、ましてや通信使に伴う交流などには全く触れていない⁹⁾。家康時代の明との関係や明清交代については若干触れている教科書もあるが、寛永「鎖国」以後の清船との貿易関係についてはあまり書かれていない。独立国であった琉球については、島津氏による出兵が簡潔に触れられているが、具体的な交流の記述はほとんどなく、アイヌについては、少なくとも近世対外関係の部分では、すべての教科書において記述がない。

寛永「鎖国」以前の朱印船貿易などの充実した記述を踏まえつつ読み進めていくと、さかんに「海外発展」していた日本人が「鎖国」によって完全に国内に閉じこめられ、二百数十年の間に世界の動きから取り残され、ペリーによる「开国」でそれが打ち破られた、という歴史認識を明確に抱くことになる。現在、日本のある世代以上の人たちは、こうした教科書記述で「鎖国」を習ってきたのである。

8) 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付属の教科書図書館に架蔵されている197年前後の発行の奥付のある高校日本史教科1冊を調査した。調査した教科書は次の通り。坂本太郎『新編高等学校日本史』（好学社197年）、家永三郎『新日本史』改訂版（三省堂197年）、稲垣泰彦・川村善二郎・村井益男・甘粕健『日本史』三訂版（三省堂197年）、時野谷勝ほか5名『日本史』三訂版（実教出版197年）、西岡虎之助ほか4名『高校日本史』五訂版（実教出版197年）、小葉田淳・小沢栄一・赤松俊秀・小田泰正『新編日本史』改訂版（清水書院196年）、藤木邦彦『改訂日本史』（秀英出版196年）、竹内理三・小西四郎『日本史』新訂版（自由書房197年）、後藤陽一ほか4名『日本史』改訂（第一学習社196年）、豊田武『最新版要説日本史』（中教出版197年）、豊田武ほか5名『最新版日本史』（中教出版197年）、彌永貞三・安田元久ほか3名『高等日本史』初訂版（帝国書院196年）、安田元久・井上鋭夫・大石慎三郎・土田直鎮・尾藤正英ほか3名『高等学校新日本史』（帝国書院196年）、風間泰男・菱刈隆永・青木和夫ほか1名『新訂日本史』（東京書籍197年）、和歌森太郎・芳賀幸四郎『詳説新日本史』改訂版（二宮書店197年）、肥後和男・平田俊春『詳説高等日本史』三訂版（日本書院197年）、宝月圭吾・藤木邦彦『詳説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6年）

9) 好学社の教科書では、朝鮮からの使節について「幕府はその送迎に巨費をついやすだけでうるところは少なかった」との否定的な記述も付いている

2 「鎖国」の見直しと教科書記述

1970年には朝尾直弘「鎖国制の成立」⁽¹⁰⁾、山口啓二「日本の鎖国」⁽¹¹⁾が発表され、日本近世史研究における対外関係、とりわけ東アジア国際関係の意味を再考する気運が高まってきた。朝尾は、「鎖国」を西洋との関係だけで捉えるのでは不十分とし、「一六世紀における日本国内の社会的変動は、同時期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社会変動の一翼を形成していた」との認識をもとに、日本型華夷意識を含む諸問題について論じている。また、“特殊史”の地位に甘んじてきていた対外関係史研究のなかで、長崎、対馬・朝鮮、薩摩・琉球、松前・蝦夷地に関する地道な研究も進展してきた（例えば朝鮮通信使や日朝貿易、長崎における中国船貿易の研究の進展など）。

こうした研究状況をうけて、1980年代には荒野泰典やロナルド＝トビ⁽¹²⁾が、近世日本を「鎖国」と捉え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の見解を打ち出すことになる。とりわけ荒野は『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¹³⁾などにおいて、長崎・対馬・薩摩・松前の四つの「口」が存在して周辺諸国・民族との交流があったことを指摘し、従来の「鎖国」概念を否定して、日本近世の対外関係を、東アジア各国に共通にみられる「海禁」と「華夷秩序」の概念で捉えるべきであると主張した（荒野は中世対外関係史研究者の田中健夫の所説に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この問題提起は日本近世史研究者らに強いインパクトを与え、纯粹に国内史を専門とする研究者であっても対外関係を意識する傾向が現れた。また近世対外関係史を研究する者も増えて、この分野が“特殊史”ではなくなった。さらにマス・メディアを通じて一般の人たちにも、「鎖国」が国際的孤立ではないとのイメージがしだいに広がっていった。

こうした研究動向は、当然、学校教科書の記述に反映されていく。現在使われているすべての高校「日本史B」教科書（11冊）の「鎖国」に関する記述を分析してみると⁽¹⁴⁾、寛永「鎖国」に至る西欧諸国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た対外関係については、一部を除き、どれもほぼ共通の項目に触れており、その点は1970年前後の教科書と同様である。新研究を反映した記述が散見されるものの、内容的にも大差はないのだが、量的には1970年前後に比べるとやや少ない傾向がある。

異なってくるのは、まず寛永「鎖国」に対する評価の記述である。寛永年間に「鎖国」が「完成」したとする記述もなお多いが、幕府が外国との関係を統制した、あるいは情報や貿易を独占したという記述で代替しているものもある。「鎖国」という用語を使うにしても、カッコ付きにする、「いわゆる鎖国」という表現にする、見出しには出さないなどの配慮がみられるものも多く、また大半の教科書で「鎖国」という言葉が近世後期になって初出したことを載せている。さらには、見出しで「日本は「鎖国」したのだろうか」という挑発的な表現を使った教科書や、「鎖国」という用語

10) 朝尾直弘「鎖国制の成立」（『講座日本史4』東京大学出版会197年、のち『朝尾直弘著作集 三 将軍権力の創出』岩波書店200年、に再録）

11) 山口啓二「日本の鎖国」（『岩波講座世界史1』岩波書店197年）

12) ロナルド＝トビ『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訳、創文社199年）など

13)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8年）

14) 調査した教科書は次の通り（発行はすべて200年）。宮地正人は1名『新日本史B』（桐原書店）、青木美智男は1名『日本史B』改訂版（三省堂）、宮原武夫・石山久男は1名『高校日本史B』新訂版（実教出版）、脇田修・大山喬平は1名『日本史B』新訂版（実教出版）、加藤友康・荒野泰典・伊藤純郎ほか8名『高等学校日本史B』改訂版（清水書院）、尾藤正英ほか7名『新選日本史B』（東京書籍）、山本博文は1名『日本史B』（東京書籍）、村尾次郎・小堀桂一郎・朝比奈正幸は2名『高等学校最新日本史』（明成社）、石井進・五味文彦・笹山晴生・高埜利彦ほか9名『詳説日本史』改訂版（山川出版社）、石井進・五味文彦・笹山晴生・高埜利彦ほか9名『高校日本史』改訂版（山川出版社）、大津透・久留島典子・藤田寛・伊藤之雄『新日本史』改訂版（山川出版社）

を使わずに「外交制限」という表現で一连の歴史事象を説明したうえで、近世後期に初めて「鎖国」概念が現れたことに触れている教科書もある。大半の教科書で、対外関係の窓口が4カ所であることを明記しており、長崎についても、唯一の窓口との印象を与える記述はわずかで、おおむね配慮された表現になっている。1970年前後では主流であった、世界から孤立したとか、日本人の海外発展が抑圧されたとかの趣旨の記述は激減し、残っていたとしてもいくぶん控えめな記述に後退している。日本人の積極的な精神が失われたといったネガティブな国民性を示す記述は皆無である。ただし、鎖国得失論の名残のような記述は散見される。

幕藩制国家周辺の朝鮮・中国・琉球・アイヌ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叙述の充実ぶりは明らかである。細かい内容の違いはあっても、すべての教科書でそれなりの字数を割いており、朝鮮通信使についても、全教科書で「通信使」の表記があるの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ほとんどの教科書で通信使行列の絵図を載せ、通信使渡来時の盛んな文化交流にも触れている。ある教科書では、これら周辺諸国・民族との交流について3ページにわたって豊富な絵図による解説があるほか、近代史部分では2ページにわたってアイヌと琉球の文化を解説している。1970年前後と比べると、隔世の感がある。

3 「鎖国」の見直しの背景

このように教科書記述も変わったのは、研究の視点の変化と、それに基づく新たな研究成果の創出による。それでは、なぜ1980年代ころに「鎖国」に対する捉え方が変化し、それが多くの研究者や一般の人々に受容されたかについて、考察を加えておきたい。

「鎖国」概念は、そもそも近世後期に欧米諸国による東アジア進出の状況をうけて成立・普及したものであり、关心の対象は西洋である。キリスト教対策を中心とする寛永期の対外政策を「鎖国」の完成と捉え、欧米列強の外圧によって幕末に「开国」されるとの認識をみても、視野が対西洋に限定されていて東アジアへの視点が甚だ稀薄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また「鎖国」体制の二百年数十年間を固定的・静态的に捉えていて、その間の東アジアの変化を考慮に入れていない。

1955~73年に高度経済成長を達成してアメリカに次ぐ経済大国になった日本は、1980年代には安定成長を続けて日本型経営が賛美され、日本の自動車・電化製品などが大量に輸出されて日米間で貿易摩擦も深刻化し、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1979年) が大評判となるなどの状況にあり、日本人にとって欧米諸国をモデルとし、“崇拜”する意識は急速に失われていた。また70年代からはアジアNIEs（韓国・台湾・香港・シンガポール）の経済発展がみられ、その後には中国をはじめいくつかのアジア諸国がそれに続くことになる。こうしたことから、西洋中心の世界観、アジアに対する蔑視観から解放されて、東アジア地域に関心がよせ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のは自然なことである。70年代までは日本の大学の第2外国語履修（英語が必修）において、ドイツ語・フランス語の履修者が圧倒的に多かったのに対し、80年代以降は中国語の履修者が急激に増加し、70年代にはわずかの大学にしか設置されていなかった韓国（朝鮮）語の授業が、80年代以降には多数の大学で設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は、こうした思潮変化の典型的な現れであろう。こうした状況のなかで、江戸時代の対外関係の理解においても、東アジア諸国との関係をしっかり組み込むことにな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なお報告者の关心から付言しておく、近世中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変化を組み込んだ動的

な把握を追究していくことが、今後の課題であるとする。報告者はかつて、東アジア国際社会の変化と幕藩制国家・社会内部の変化を有機的に関連させつつ近世中期の位置づけを行う必要を提唱し、近世後期の人々が「鎖国」と捉えても仕方がないような状況への移行がみられたことを想定して、それを「鎖国」的な実態への接近」と表現したことがある。17世紀末から18世紀にかけて、日本の幕藩制国家、清国、朝鮮、琉球などの諸国は近世国家として確立し、それぞれ固有の展開をとげる。アイヌ社会も場所請負制の展開など社会の変化を経験する。それに伴って「四つの口」の意義もそれぞれ変質していった。そのうえで、18世紀末からのウェスタン・インパクトを迎えるのであり、東アジア諸国・諸民族の近代へ向けての対応もそれぞれ性格づけられるのである(15)。

旧来の「鎖国」概念は、幕藩制国家・社会を過度に閉鎖的・孤立的なイメージで捉えるものであった。1980年代には「国際化」が進み、人々の国際間の移動や通信が日常的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た。そうになると一国史的な視点にあきたらなくなるのは当然で、江戸時代に关しても、閉鎖的・孤立的な側面よりも開放的・能動的な側面に共感をおぼ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日本人の「島国根性」といった意識が拂拭され、死語にすらなっていた状況では、日本人の海外発展が抑えられて世界の進歩から取り残されたという「鎖国」認識には、あまりリアリティーを感じない。また80年代は、西洋的な近代を相対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の思潮がしだいに高まり、前近代の固有の価値体系も再評価されていった時期である。忌まわしき封建遺制の克服がなお现实的課題であった60年代までとは異なって“明るい近世”イメージが強くなり、江戸時代の“良い面”を積極的にとりあげる傾向が、研究者においても、マス・メディアにおいても显著になった。「鎖国」下における异国・異民族との活発な交流に人々が魅力を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所以である。このことは、从来遅れたものとみなされてきた東アジアの前近代の価値観を再評価する意識にもつながる。

旧来の「鎖国」概念では、近世の幕藩制国家を、そのまま近代国民国家の直接の前提として捉え、琉球・アイヌを「日本」の一部と認識し、自立した存在とはみていなかった。その背景には単一民族国家観があ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1980年代における冷战構造の崩壊、それに伴って生じた民族問題の深刻化（旧ソ連・旧ユーゴスラヴィアなど）という世界情勢のなかで、少数民族に対する認識が深まり、琉球・アイヌへの視点も変化して、その歴史と文化が広く認知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近世についても、琉球・アイヌを自立した存在とみて、异国・異民族との交流として描か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おわりに

1980年代ころの時代状況が多くの人々の現状認識を変化させ、研究者に斬新な視点を提供し、研究の進展を促して新たな歴史像を描かした。世界における日本の位置づけの変化と東アジアへの眼差しの変化が、対西洋に視野が限定された旧来の「鎖国」概念を打破し、近世の東アジア世界を重視した歴史認識をもたらした。それが教科書記述やマス・メディアの扱いに反映し、一般の人々の歴史認識にも影響を与えていく。

15) 前掲「総論Ⅱ 近世中・後期の国家と対外関係」、木村直也「東アジア華夷秩序と日朝関係の転回」（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話——日韓合同歴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大月書店200年）を参照

しかし実際は、国際的孤立としての「鎖国」概念は、急速にはなかなか消失しない。年配の教師に教わったせいか、学生諸君のなかにも旧来の「鎖国」概念を抱いている人は意外と多い。百年以上、人々の意識に染みついてきた概念だけに、その呪縛から容易には逃れられないともいえる。とくに西洋近代至上主義の意識のまま旧来の「鎖国」概念を受け入れていると、江戸時代は「鎖国」で遅れていたが、明治時代以降の近代化によって日本は世界の一等国となり、中国や朝鮮はそれができずに被侵略国に転落した、との歴史認識を抱く懸念もある。だが現在の世界情勢をみると、かつての西洋近代至上主義が相対化されて、東アジアを重視する価値観が拡大していくという方向性を否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い。そうした方向性に従って、旧来の「鎖国」概念はしだいに相対化され、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周辺諸国・民族との交流がより多くの人々の歴史認識に定着していくであろう。

日本史研究者レベルでは旧来の「鎖国」概念はほとんど拂拭されているといえるが、荒野泰典らの打ち出した問題提起については、現在ではより精緻な検討が行われており、「鎖国」概念を単純に切り捨てて事足りるとはせず、新たな歴史像を求めて研究が進められている。その際、第一に留意すべきは、当然のことではあるが、江戸時代の日本と周辺諸国・民族との交流が決してバラ色の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東アジア諸国・諸民族の社会のあり方や価値観には相違がみられ、それぞれの利害と体面が衝突し、熾烈な葛藤を伴いながらも、二百数十年にわたる安定的な関係を維持したのである。その歴史的実態から現在汲み取るべき教訓は、少なく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第二に留意すべきは、日本において近世後期に「鎖国」概念が登場し、その後、普及・定着していったという事実である。それは日本が置かれた歴史的環境（日本近世社会内部の状況と国際情勢）に起因する。これを解明することは、東アジア諸国・諸民族が、それぞれの近世社会の特質を踏まえつつ、近代化を模索していったことへの考察へとつながる。そしてその考察にあたっては、東アジア諸国・諸民族の西洋近代受容の迟速を競うのではなく、それぞれの近代化の性格の違いとして論じられるべきだと考える。

일본 근대사 연구에서의 「쇄국」의 재검토와 동아시아

키무라 나오키 (産業能率大)

〈목 차〉

머리말

1.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과 교과서 기술
2. ‘쇄국’의 재검토와 교과서 기술
3. ‘쇄국’의 재검토의 배경

맺음말

머리말

일본의 정권교체로 출범한 하토야마 내각이 동아시아 공동체 구상을 제창하여 2009년10월에 개최된 일본·중국·한국의 정상회담에서도 이에 대해 논의했다는 보도가 있었다. 이러한 구상이 제창된 배경에는 일본의 현재인식과 역사인식에 변화가 있었기 때문일 것이다. 일본이 예전처럼 미국만을 중시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동아시아 국가들과의 연대를 강화해야 한다는 현재인식은 서양근대지상주의의 상대화라는 역사인식과 밀접하게 연결되어 서로 상호작용을 하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역사학은 여러 가지 사료(史料)를 분석함으로써 어디까지나 역사적 사실을 규명하고 그 의의를 고찰하고자 하는 학문이다. 이와는 다른 방법이나 태도로 접근하는 “역사”는 하나의 ‘픽션’이며 역사적 사실이 아니다. 그러나 한편 역사는 다시 쓸 수도 있는 것이다. 새로운 사료의 출현에 따른 새로운 역사적 사실의 발견만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기존에 어느 정도 알려진 역사적 사실에 대해서도 다른 관점에서의 연구가 이루어져 이로 인해 새로운 사료가 발굴되고 새로운 역사상을 갖게 되는 경우도 적지 않다. 이러한 참신한 관점은 물론 연구자의 능력에 따라 생겨난 경우도 있으나 그 연구자가 살고 있는 시대가 새로운 관점을 제시하는 경우도 있다는 사실을 간과해서는 안 된다. 또한 여기에서 얻어진 새로운 관점과 역사상이 현재를 바라보는 방법을 규정하기도 한다. 즉 현재인식과 역사인식이 서로 상호작용을 한다는 뜻이다.

본 보고에서는 이와 같은 새로운 관점·역사상을 갖게 되는 하나의 예로서 일본 근대사 연구의 에도시대의 ‘쇄국’에 대한 재검토를 들고자 한다. 이는 최근 30년 동안 학교 교과서의 기술 내용까지 크게 바뀐 사례임과 동시에 세계화된 사회를 살아가고 있는 우리들의 역사인식 특히 동아시아를 둘러싼 역사인식과도 깊은 연관성을 가지고 있는 주제이기 때문이다(1).

1) 본 보고의 내용은 키무라 나오키 ‘쇄국의 재검토와 교과서 기술’ (『역사평론71,200』, 키무라 나오키·총II 근세 후기의 국가와 대외관소네 유키무라 나오키·새로운 근세사2 국가와 대외관신진부츠오라이,199) 가 미야 노부유키·키무라 나오키 전향 일본역1해금과 쇄』 도쿄도숫,200의 총설 등을 바탕으로 하고 있다.

1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과 교과서 기술

‘쇄국’이라는 말은 나가사키 통역사인 시즈키 다다오가 번역한 캠퍼의 ‘일본지’ (1801년) 에서 처음 사용되었다고⁽²⁾ 하는 것이 일본에서는 일반적인 통설이다. 즉 ‘쇄국’의 개념은 18세기말부터 일본 주변에도 러시아를 비롯한 구미의 함선이 출몰하여 이에 대한 경계감이 위정자·학자들 사이에 높아지고 있었던 상황하에 등장한 개념으로, 1630년대 (간에이키) 의 일련의 대외정책 (기존에 ‘쇄국’정책이라고 불리었던 해외도항금지와 포르투갈선 내항금지 등) 이 취해졌던 시대에 존재했던 개념이 아니다. 1804년에 나가사키에 내항한 러시아사절 레자노프에 대한 통보에서, 중국, 조선, 유구(琉球, 현 일본 오키나와), 네덜란드 이외의 나라와는 새로 통신·통상관계를 갖지 않는 것이 이 나라의 법이라는 관념이 생겨났으며⁽³⁾, 막부말기·메이지유신기의 구미열강에 대한 위기감을 배경으로 ‘쇄국’의 개념이 확산되기 시작했다. 이 개념은 메이지시대에 ‘구미를 따라잡고 추월하자’는 의식 하에 근대국민국가의 형태를 갖추기 시작했던 일본에서 널리 국민들 사이에 인식되기 시작하여, 에도시대의 ‘쇄국’이 서양국가들에 “뒤쳐지게 된” 하나의 원인이었다는 인식으로 발전하게 되었다. 이에 문명개화의 흐름과 함께 반벌정부(藩閥政府) 등의 막부정치에 대한 비판도 관련이 있다고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또 한편에서는 일본의 독자적인 문화와 산업이 육성되고 오랜 동안 평화를 누릴 수 있었다는 점 등의 “이점”도 지적되어 ‘쇄국득실론’이라는 관점에서 논의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제2차 세계대전의 패전을 경험한 와츠지 테츠로가 일본인들의 결점 중 하나로 과학적 정신의 결여를 지적하면서 ‘쇄국이 무엇을 의미하고 있었는지를 충분히 이해할 필요가 있다’ 라고 하며 『쇄국—일본의 비극』 (4)을 저술한 점 등을 보더라도 이러한 ‘쇄국’으로 인해 “뒤쳐졌다”는 의식이 얼마나 뿌리깊은가를 엿볼 수 있다.

메이지 이후의 ‘쇄국’에 관한 논의를 바탕으로 이러한 것들을 실증적인 역사연구의 입장에서 집대성한 사람이 이와오 세이치이다. 이와오는 1963년에 ‘쇄국’이라는 제목의 논문⁽⁵⁾을 발표하였으며, 이 논문이 그 후 한동안 통설로 간주되어 왔다. 이 논문에서는 ‘쇄국의 개념’을 ‘쇄국이란 에도막부가 자신의 중앙집권적인 봉건지배체제를 강화하는 과정에서 당국자가 그 정책방향과 맞지 않은 점이 많다고 생각했던 천주교를 철저히 금지하기 위해서 도입한 강력한 정책으로, 해외교통무역을 극단적으로 제한, 단속함에 따라 그 결과 자연스럽게 일본이 국제적 고립상태에 처하게 되었다는 사실을 뜻한다’ 라고 설명하고 있다. 구체적인 조치로는 천주교 금지, 해외교통무역·통신의 금지, 천주교 관련의 외국문헌·기물에 대한 점속금지, 포르투갈·스페인의 내항무역금지와 함께 ‘대외교통무역의 문호를 나가사키 항구로만 제한하고 외국인들의 거주 역시 나가사키 지역으로만 제한하는 한편 무역에 대해서도 특수한 단속규정을 만들어 적용했다’는 점을 들어 이러한 조치를 통해 ‘쇄국체제 및 관념이 거의 완성되었다’고 하며, ‘쇄국’이란 포르투갈선의 내항이 금지되었던 1639년부터 페리제독이 내항했던 1853년까지의 215년간의 대외관계를 가리킨다고 했다⁽⁶⁾. 이와오는 일반인 대상의 저술로 『일본의 역사 14 쇄국』 (7)을 간행하고 있어

2) 이타자와 다케쇄국 및쇄국에 대해이타자와다케일란문화협상사日蘭文化史)의 연구요시카와고분칸,195)

3) 후자타 사토근세 후기 정치사와 대외관』 도쿄대학출판회,200)

4) 와츠지 테츠쇄일본의 비』 (치쿠마쇼보,196) . 이 책의서은195년에 쓰여진 것으로, 와츠지는6년에 사망했다.

5) 이와오 세이쇄 (이와나미강좌 일본역1이와나미쇼텐,196)

이와오의 ‘쇄국’상은 일반인들에게도 상당히 익숙한 개념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1960년대, 70년대의 학교 교과서는 거의 대부분이 이와오설을 채택하여 기술하고 있다. 1970년대 전후에 발행된 고등학교 교과서 ‘일본사’의 ‘쇄국’에 관한 기술을 분석해보면(8)) 간에이 ‘쇄국’에 이르는 서구국가들과의 관계를 중심으로 한 대외관계에 대해서 극히 일부를 제외하고는 모든 교과서가 거의 똑 같은 항목에 대해 언급하고 있다. 이와오 세이치의 저술과 마찬가지로 포르투갈 · 스페인 · 네덜란드 · 영국과의 관계, 주인선(朱印船, 막부의 해외무역허가를 받은 무역선)무역과 니혼마치(日本町), 무역통제, 천주교 금지, 일련의 간에이 ‘쇄국령’과 시마바라의 난에 대해서 상당부분의 지면을 할애하여 자세히 설명하고 있다.

또한 간에이 ‘쇄국’에 대한 역사적 평가의 기술을 보면 대부분의 교과서가 간에이 16년령(1639년)에 의한 포르투갈선 내항금지와 네덜란드상관(商館)의 출도이전(出島移轉)(1641년)으로 쇄국이 ‘완성’ ‘성립’되었다고 기술하고 있으며, 나가사키가 유일한 문호로, 내항이 허용된 나라는 네덜란드와 중국뿐이라는 사실을 강조하고, 이러한 ‘쇄국’을 통해 봉건제 · 막번제(幕藩制)가 유지 · 강화되어 일본이 세계의 정보에서 고립되고 뒤처지게 되었다, 라고 기술하고 있다. 일부 교과서에서는 외국과의 관계를 모두 차단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나중에 교섭을 일절 거부한다는 의미를 갖게 되었다라고 설명하고 있으나, 이러한 부분도 예를 들면 ‘이렇게 해서 일본은 나가사키라는 작은 창 하나만을 남겨두고 세계문명의 빛을 스스로 차단하게 되었다.....’ 등과 같은 문장이 병기되어 있어, 모든 교과서가 ‘쇄국’에 대해서 이와오의 ‘국제적 고립’이라는 표현과 유사한, 폐쇄성을 강조한 내용으로 되어 있다. 또한 일본의 독자적인 문화와 산업의 발전, 장기간의 평화 실현, 일본인의 해외발전과의 단절, 일본인의 적극적인 정신이 사라지고 시야가 좁아졌다는 등 쇄국득실론의 논의를 바탕으로 한 기술도 몇 군데 보이고 있다.

이와는 대조적으로 서구국가들 이외와의 관계, 즉 막번제(幕藩制)국가 주변의 조선 · 중국 · 유구 · 아이누와의 관계에 대해서는 서술이 거의 이루어지지 않고 있다. 조선에 대해서는 많은 교과서가 도쿠가와 이에야스 시대의 국교회복에 대해 언급하고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츠시마번(對馬藩)의 슈씨가 일본과 조선의 관계에서 기여한 역할이 명확히 언급되어 있지 않고, 조선에서 사절이 왔다는 사실이 일부 교과서에 짧게 기재되어 있기는 하지만, ‘통신사’라는 표기를 사용한

6) 이와오의 논문에서그러나 외의 외국인들의내항무역에 대해 이를 제한하거금지한 것은아니었으나실제로 중국과 네덜란드 양국민의 내항무역및 츠시마를 통한 조선인들과의 무만이 지속적으로 이루어졌으며, 나중에는 양국민 이외의 다른 국가에게는 이를 허용하지 않는 것으로 바뀌게 되었다는 부분이 기재되어 있으나 논문의 전체적인 내용은 그 대부분이 서구국가들과의 관계에한 것이다.

7) 이와오 세이일본의 역사1쇄, 추오코론,196)

8) 교과서연구센터 부속의 교과도서관에 소장되어 있,197년 전후에 발행된고등학교 일본사 교과1권을 조사했다. 조사한 교과서는 다음과 같다. 사카모토 타로신편 고등학교 일본, 고가쿠샤,197) 이어나가사부신 일본개정산세이도,197) 이나가키 야스히가와무라 겐지무라이 마스아마카스 일본, 3판산세이도,197), 도키노야 마사루 외 일본, 3판잇쿄숫판,197), 나시오카 토라노스케 외 고교 일본, 5판잇쿄숫판,197), 고바타 아츠오자와 에이이아카마즈 토시히오다 야스마신편 일본개정시미즈쇼인,196), 후지키니히개정 일본, 슈에이숫,196), 다케우치 리고니시 시일본신지유쇼보,197), 고토 요이치 외 일본개다이이치가쿠슈샤,196), 도요다 타케최신판 요설 일본, 츄쿄숫판,197), 도요다 타케시 외 최신판 일본, 츄쿄숫판,197), 이어나가 테이야스다 모토히사 외고등 일본초데이코쿠쇼인,196), 야스다 모토히이노우에 토시오이시 신자부츠치다 나오히비토 마사히데 외고등학교 신일본, 데이코쿠쇼인,196), 가자마 야스히사카리 타카나야오키 카즈오 외신판 일본, 도쿄쇼세키,197) 와카모리 타하가 코시상설 신판일본개정니노미야 쇼텐,197), 히고 카즈히라타 토시하상설 고등일본, 3판니혼쇼인,197), 호게츠케이후지키 쿠니히상설 일본, 야마카와출판사,196)

곳은 한 권뿐으로, 더더구나 통신사와 관련된 교류 등에 대해서는 전혀 언급하고 있지 않다⁹⁾. 이에야스시대의 명나라와의 관계와 명나라와 청나라의 교체에 대해서는 약간 언급한 교과서도 있으나 간에이 ‘쇄국’ 이후의 청선(淸船)과의 무역관계에 대한 내용은 거의 기재하고 있지 않다. 독립국이었던 유구에 대해서는 시마즈(島津)씨의 출병(出兵)에 관해 간단히 언급하고 있으나 구체적인 교류에 관한 내용은 거의 없으며, 아이누에 대해서도 적어도 근세의 대외관계에 대한 부분은 모든 교과서에서 기재되어 있지 않다.

간에이 ‘쇄국’ 이전의 슈인선 무역 등에 관해 자세히 기술된 내용을 계속 읽어나가다 보면, 활발하게 ‘해외발전’을 하고 있었던 일본인들이 ‘쇄국’을 통해 완전하게 국내에 갇히게 되고 이로 인해 이백 수 십 년 동안 세계의 흐름에서 뒤쳐졌으며, 또한 이러한 상황이 폐리에 의한 ‘개국’으로 크게 바뀌게 되었다라는 역사적 인식을 확실하게 가질 수 있게 된다. 현재 일본의 일정 세대 이상의 사람들은 이러한 교과서의 기술을 통해 ‘쇄국’에 대해 배워왔던 것이다.

2 ‘쇄국’의 재검토와 교과서 기술

1970년에는 아사오 나오히로의 ‘쇄국제의 성립’⁽¹⁰⁾, 아마구치 케이지의 ‘일본의 쇄국’⁽¹¹⁾이 발표되었고 일본 근세사 연구에서의 대외관계, 특히 동아시아 국제관계의 의미를 재고하고자 하는 기운이 높아졌다. 아사오는 ‘쇄국’을 서양과의 관계만으로 파악해서는 안 된다고 하며 ‘16세기의 일본 국내의 사회적 변동이 같은 시기의 동아시아에서의 사회변동의 일익을 형성했다’라는 인식을 바탕으로 일본식 화이의식(華夷意識)을 포함한 여러 문제에 대해 논하고 있다. 또한 “특수 역사(特殊史)”라는 범주에 안주해있었던 대외관계연구분야에서도 나가사키, 츠시마·조선, 사츠마·유구, 마즈마에·화이지((華夷地)에 관한 연구가 꾸준히 이루어지게 되었다 (예를 들면 조선통신사와 일본과 조선과의 무역, 나가사키에서의 중국선 무역 연구의 진전 등) .

이러한 연구상황 속에서 1980년대에는 아라노 야스노리와 로널드=토비⁽¹²⁾가 근세일본을 ‘쇄국’이라고 보아서는 안 된다는 견해를 발표했다. 특히 아라노는 『근세일본과 동아시아』⁽¹³⁾등에서 나가사키·츠시마·사츠마·마즈마에의 4개의 ‘창’이 존재하였고 이 곳들을 통해 주변국가나 민족들과 교류를 했다는 사실을 지적하고 기존의 ‘쇄국’의 개념을 부정하면서 일본 근세의 대외관계를 동아시아국가들이 공통적으로 가지고 있었던 ‘해금(海禁)’과 ‘화이질서(華夷秩序)’의 개념으로 파악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아라노는 중세대외관계사 연구자인 다나카 다케오의 주장에 영향을 받았다) . 이 문제 제기는 일본근세사 연구자들에게 큰 충격을 주어 순수하게 국내 역사를 전문으로 하는 연구자들 사이에서도 대외관계를 의식하는 경향이 나타나기 시작했다. 또한 근세대외관계사를 연구하는 사람들이 많이 늘어나 이 분야를 더 이상 “특수 역사”라고 부를

9) 고가쿠사의 교과서에서는 조선으로부터의 사절단에 대해서막부는 사을 맞이하는 데 거액을 썼을 뿐 거의 아무것도 얻지 못했다고 부정적으로 기술하고 있다

10) 아사오 나오히로, 『쇄국제의 성립』 (강좌 일본사 4 도쿄대학출판회, 197, 후에아사오 나오히로 저작 3장군권력의 창이와바쇼텐, 200년, 에 다시 수)

11) 아마구치 케이, 『일본의 쇄국』 (이와바강좌 세계역1이와바쇼텐, 197)

12) 로널드=토비, 『근세 일본의 국가형성과 외』 하야미 아키나가즈미 요가와카즈 헤이타, 소분샤, 199등

13) 아라노 야스노리, 『근세 일본과 동아시아』 도쿄대학출판회, 198)

수 없게 되었다. 그리고 언론을 통해 일반 사람들 사이에서도 ‘쇄국’은 국제적 고립이 아니라는 인식이 확산되게 되었다.

이러한 연구동향은 당연히 학교교과서의 내용에도 반영되어 갔다. 현재 사용되고 있는 모든 고등학교 교과서『일본사B』(11권)의 ‘쇄국’에 관한 기술을 분석해 보면¹⁴⁾ 간에이 ‘쇄국’에 이르게 되는 서구국가들과의 관계를 중심으로 한 대외관계에 대해서 일부를 제외하고는 대부분 공통적인 항목에 대해 기술하고 있으며 이 점은 1970년 전후의 교과서와 똑같다. 새로운 연구를 반영한 기술이 몇 군데 발견되기는 하나 내용면에서는 큰 차이가 없으며, 양적인 면에서는 1970년 전후에 비해 다소 줄어든 경향이 있다.

다른 점은 우선 간에이 ‘쇄국’에 대한 평가 부분이다. 간에이 기간에 ‘쇄국’이 ‘완성’되었다는 기술도 여전히 많으나 막부가 외국과의 관계를 통제했다 또는 정보와 무역을 독점했다라는 기술로 대체한 것도 있다. ‘쇄국’이라는 용어를 사용했을지라도 괄호 안에 넣는 ‘이른바 쇄국’이라는 표현을 사용하거나 제목에는 사용하지 않는 등의 배려가 엿보이는 것도 적지 않았으며, 또한 대부분의 교과서에서 ‘쇄국’이라는 단어가 근세 후기에 비로써 처음으로 사용되었다는 사실을 기재하고 있다. 또한 제목에서 ‘일본은 ‘쇄국’을 한 것일까’라는 도발적인 표현을 사용한 교과서나 또는 ‘쇄국’이라는 용어를 사용하지 않고 ‘외교제한’이라는 표현으로 일련의 역사적 사실을 설명한 후에 근세후기에 처음으로 ‘쇄국’의 개념이 생겨났다는 점을 언급하고 있는 교과서도 있다. 대부분의 교과서에서 대외관계의 창구가 4곳이었다는 사실을 명기하고 있으며 나가사키에 대해서도 유일한 창구라는 인상을 주는 듯한 기술은 극히 소수로, 대부분 신중한 표현을 사용하고 있었다. 1970년 전후에는 주류를 이루었던, 세계로부터 고립되었다, 또는 일본인의 해외발전이 억압되었다는 등과 같은 취지의 기술이 현저하게 줄어들었고 남아있다고 하더라도 상당부분 조심스러운 표현을 사용하고 있었다. 일본인의 적극적인 정신이 사라졌다 등과 같은 부정적인 국민성을 나타내는 기술은 전혀 보이지 않고 있으며, 다만 쇄국독실론의 흔적과 같은 기술은 군데군데 남아있었다.

막번제국가 주변의 조선·중국·유구·아이누와의 관계에 대해서는 매우 상세히 서술하고 있었다. 세세한 부분에서 내용의 차이는 있으나 모든 교과서에서 상당한 지면을 할애하고 있으며 조선통신사에 대해서는 모든 교과서에서 ‘통신사’라는 표기가 있는 것은 물론 대부분의 교과서에서 통신사 행렬의 그림을 게재하고 통신사 방문시의 활발한 문화교류에 대해서도 언급하고 있다. 어떤 교과서는 이들 주변국가와 민족들과의 교류에 대해서 3페이지에 걸쳐 많은 그림을 사용하여 자세히 해설하고 있었으며, 근대사부분에서는 2페이지에 걸쳐서 아이누와 유구의 문화를 해설하고 있었다. 1970년 전후와 비교하면 격세지감이 느껴지는 대목이다.

14) 조사한 교과서는 다음과 같발행연도는 모두200). 『미야치 마사토 외1신일본사B』 기리하라쇼), 아오키 미치오 1일본사B개정산세이), 미야하라 타케이시야마 히사오 1고교 일본사B 신깃쿄쑤), 와키타 오사오야마 료헤이 1일본사B 신깃쿄쑤), 가토 토모야아라노 야스노이토 준로 외고등학교 일본사B개정시미즈쇼), 비토 마사히데 외신선 일본사B』 도쿄쇼세), 야마모토 히로후미 외1일본사B』 도쿄쇼세), 무라오 지고보리 케이이치아사히나 마사유키 외2고등학교 최신 일본』 메이세이), 이시이 스스고미 후미히사사야마 하루다카노 토시히코 외상설 일본개정야마카와출판), 이시이 스스고미 후미히사사야마 하루다카노 토시히코 외고교 일본개정야마카와출판), 오즈 토오구루시마 노리후지타 사토이토 유키신일본개정야마카와출판)

3 ‘쇄국’의 재검토의 배경

이처럼 교과서 기술내용이 바뀐 것은 연구관점이 변화되었고 이에 따라 새로운 연구성과가 나왔기 때문이다. 그렇다면 왜 1980년대경에 ‘쇄국’에 대한 관점이 바뀌었고 이것이 많은 연구자들과 일반사람들에게 받아들여지게 되었는지에 대해서 생각해보고자 한다.

‘쇄국’이라는 개념은 원래 근세후기에 구미국가들이 동아시아에 진출함에 따라 성립, 보급된 것으로 관심의 대상은 서양이다. 천주교대책이 중심인 간에이기의 대외정책을 ‘쇄국’의 완성으로 보고 구미열강의 외압에 의해 막부말기에 ‘개국’을 당했다라는 인식을 보더라도 관점이 서양에 한정되어 있고 동아시아에 대한 관점이 거의 결여되어 있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또한 ‘쇄국’체제의 이백 수 십 년간을 안정적·정적으로만 파악하고 있어 그 간에 있었던 동아시아의 변화를 전혀 고려하지 않고 있다.

1955~73년에 고도경제성장을 달성하여 미국 다음가는 경제대국이 된 일본은 1980년대에는 안정적인 성장을 지속하여 일본식 경영이 높은 평가를 받았으며, 일본의 자동차 및 전기제품 등이 대량으로 수출되어 미일간에 심각한 무역마찰이 발생하였고, 또한 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1979년) 이 크게 호평을 받는 등 상황이 크게 바뀌었다. 그리하여 일본에서는 구미국가를 모범으로 생각하고 숭배하는 의식이 급속하게 약화되었다.

또한 70년대부터는 아시아 N I E s (한국·대만·홍콩·싱가폴)가 경제발전을 하게 되고 그 후에는 중국을 비롯한 몇몇의 아시아국가가 이를 뒤따르게 된다. 이에 따라 서양중심의 세계관, 아시아에 대한 멸시관에서 해방되어 자연히 동아시아지역에 관심이 집중되게 되었다. 70년대까지는 일본대학의 제2외국어 선택 (영어가 필수)에서 독일어·프랑스어의 이수자가 압도적으로 많았던 반면에 80년대 이후에는 중국어 이수자가 급격하게 늘어났으며 70년에는 소수의 대학에서만 설치되어 있었던 한국 (조선) 어 수업이 80년대 이후에는 많은 대학에서 설치되게 되었다. 이는 이러한 사상변화의 전형적인 표출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러한 상황 속에서 에도시대의 대외관계를 이해하는 데 있어서도 동아시아 국가들과의 관계를 고려하기 시작한 것이라고 생각한다.

또한 보고자의 관점에서 덧붙이자면, 근세중기의 동아시아의 변화를 포함하여 동태적으로 파악하는 것이 향후의 과제가 될 것으로 생각한다. 보고자는 예전에 동아시아 국제사회의 변화와 막번제국가·사회내부의 변화를 유기적으로 연결시키면서 근세중기에 대해 연구해야 할 필요성을 제창하고 근세 후기의 사람들이 ‘쇄국’이라고 봐도 어쩔 수 없는 상황으로 바뀌었다는 사실을 상정하여 이를 “쇄국”적인 실태에 대한 접근이라고 표현한 적이 있다. 17세기말부터 18세기에 걸쳐서 일본의 막번제국가, 청나라, 조선, 유구 등의 국가들은 근세국가체제를 확립하고 각각 고유의 발전과정을 이루게 된다. 아이누사회도 장소청부제의 실시 등 사회의 변화를 경험한다. 이에 따라 ‘4개의 창’의 의의도 각각 변질되어 갔다. 그 후 18세기말부터 웨스턴 임팩트를 맞이하게 되며, 동아시아국가·여러 민족들도 각각 근대를 향한 대응을 하게 된다(15)).

15) 기무라 나오훈론Ⅱ「근세 후기의 국가와 대외관」, 기무라 나오훈 동아시아 화이질서와 일조관계(日朝關係)의 전회(轉回)」역사학연구회역사교과서를 둘러싼 일한대—일한합동역사연구 심포지오즈키쇼텐, 200을 참조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은 막번제 국가·사회를 지나치게 폐쇄적이고 고립적인 이미지로 파악하고 있었다. 1980년대에는 ‘국제화’가 진행되어 사람들의 국제적인 이동과 통신이 일상적인 것이 되었다. 그렇게 되자 국내역사의 관점에서만 역사를 바라보는 것에 대해 당연히 싫증을 느끼게 되었고 에도시대에 관해서도 폐쇄적·고립적인 측면보다는 개방적·능동적인 측면에 공감을 느끼게 된 것으로 생각된다. 일본인의 ‘섬나라 근성’과 같은 의식이 없어지고 심지어 그 단어가 사어(死語)가 된 상황에서는 일본인의 해외발전이 억압되고 세계의 진보에서 뒤쳐졌다고 하는 ‘쇄국’이라는 인식에 대해서는 별로 현실감을 느낄 수 없게 된 것이다. 또한 80년대는 서양적인 근대를 상대화하는 포스트모던의 사조가 점차 강해져 전근대(前近代) 고유의 가치체계도 재평가되어 갔던 시기이다. 일그러진 봉건유제의 극복이 여전히 현실적 과제였던 60년대까지와는 달리 “밝은 근세”의 이미지가 강해지고 연구자들과 매스미디어도 에도시대의 “좋은 면”을 적극적인 다루는 경향이 생겨나기 시작했다. ‘쇄국’하에서 다른 나라와 다른 민족들과 활발한 교류를 한 것에 대해 사람들이 매력을 느끼게 된 것도 이 때문이다. 이는 기존의 뒤쳐졌다고 간주되어 왔던 동아시아 전근대의 가치관을 재평가하는 의식으로도 이어졌다.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의 경우, 근세의 막번제 국가를 근대국민국가의 직접적 전제로 보았으며, 유구·아이누를 ‘일본’의 일부로 인식하고 독립된 존재로 간주하지 않았다. 이 배경에는 물론 단일민족국가관이 있었다는 것은 두말할 필요도 없다. 1980년대의 냉전구조의 붕괴, 이에 따라 더욱 심각해진 민족문제(구소련·구유고슬라비아 등) 등 세계정세의 변화로 인해 소수민족에 대한 관심이 높아져 유구·아이누에 대한 관점도 변화하여 그 민족의 역사와 문화가 더욱 널리 알려지게 되었다. 근세에 관해서도 유구·아이누를 독립된 존재로 보고 다른 나라·다른 민족과의 교류로서 기술되게 되었다.

맺음말

1980년대경의 시대상황은 많은 일본인들의 현재인식을 변화시키고 연구자들에게 참신한 관점을 제공하여 연구진전을 이루게 함으로써 새로운 역사상이 그려지게 되었다. 세계에서의 일본의 위상의 변화와 동아시아에 대한 관점의 변화가 관점이 서양에만 관점이 한정되어 있었던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을 타파하고 근세의 동아시아 세계를 중시한 역사인식을 가져왔다. 이것이 교과서 기술과 매스미디어의 관점에도 반영되어 일반 사람들의 역사인식에도 영향을 미치게 되었다.

그러나 실제로는 국제적 고립으로서의 ‘쇄국’의 개념은 좀처럼 사라지지 않고 있다. 이전 세대의 선생님께 배운 탓인지 학생들 중에도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을 가지고 있는 사람들이 의외로 많다. 백 년 이상 동안 사람들의 의식 속에 뿌리내리고 있었던 개념인 만큼 그렇게 빠리는 없어지지 않을 것이다. 특히 서양근대지상주의의 의식을 가진 상태에서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을 받아들이게 되면 에도시대에는 ‘쇄국’으로 뒤쳐져 있었으나 메이지시대 이후의 근대화로 인해 일본이 세계최고 수준의 국가가 되었으며 중국과 조선은 그렇게 하지 못하여 피침략국으로 전락했다, 라는 역사인식을 갖게 될 우려도 있다. 그러나 현재의 세계정세를 바라보면 과거의 서양근대지상주의가 상대화되고 동아시아를 중시하는 가치관이 확산되고 있다는 방향성을 부정할 수는 없

을 것이다. 이러한 방향성에 따라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은 점차 상대화되고 에도시대의 주변국가·민족들과의 교류가 보다 많은 사람들의 역사인식 속에 뿌리내리게 될 것이다.

일본사 연구자들 사이에서는 과거의 ‘쇄국’의 개념이 거의 사라졌다고 볼 수 있으나 아라노 야스노리 등이 제기한 문제제기에 대해서는 현재 보다 세밀한 검토가 이루어지고 있으며 ‘쇄국’의 개념을 단순히 버리면 된다고는 하지 않고 새로운 역사상을 찾기 위한 연구가 이루어지고 있다. 그때 가장 먼저 유의해야 할 점은 당연한 일이지는 않지만, 에도시대의 일본과 주변국가·민족들과의 교류가 결코 좋은 면만 있었던 것은 아니라는 사실이다. 동아시아 국가들과 여러 민족들의 사회방식과 가치관에는 상당한 차이가 있어 각각 이해와 체면이 충돌하여 심각한 갈등을 수반하면서 이백 수 십 년 동안 안정적인 관계를 유지해 온 것이다. 이러한 역사적 실태에서 우리가 얻어야 할 교훈은 적지 않다고 생각한다. 두 번째로 유의해야 할 점은 일본에서 ‘쇄국’이라는 개념이 등장한 것은 근세후기이며, 그 후에 보급·정착되었다는 사실이다. 이는 일본이 처해 있었던 역사적 환경 (일본 근세사회 내부의 상황과 국제정세) 에 기인한다. 이에 대한 규명은 동아시아국가들과 민족이 각각 근세사회의 특질을 고려하면서 근대화를 모색해갔다는 사실에 대한 고찰로도 이어진다. 그리고 이러한 사실들을 고찰할 때에는 동아시아 국가·민족들의 서양 근대화 수용시기의 빠르고 늦음에 주목할 것이 아니라 각각의 근대화의 성격의 차이로 바라보아야 한다고 생각한다.

日本近世史研究中“鎖国”之修正与东亚

木村直也 (産業能率大)

〈目 次〉

前 言
一、过去的“鎖国”概念与教科书记述
二、“鎖国”之修正与教科书记述
三、“鎖国”之修正的背景
结 语

前 言

据报道，因日本的政权交替而成立的鸠山内阁提倡东亚共同体构想，在2009年10月的日本、中国、韩国的首脑会议中也就此展开讨论。在这种构想之被提倡的背景中，也许存在着日本的现状认识与历史认识的变化。这也可以视为日本不应该像从来那样只追随日本、而应该深化与东亚各国合作的现状认识，与所谓西洋近代至上主义之相对化的历史认识深度结合而发生相互作用的产物。

历史学是运用分析各种史料之方法，彻底探明历史事实，并考察其意义的学问。放弃这种方法和态度而叙述的“历史”，只是“物语”，而不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历史也是可以改写的。这不只是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导致发现新的历史事实，更多的情况在于对原来已有某种程度之认识的历史事象，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从而一方面诱发新史料之发掘，另一方面促成描绘新的历史像。虽然这种视点之创新性系由研究者的能力所造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研究者生活的时代成为新视点之获得的后盾，这也是不能忘记的。再者，由此获得的新视点和历史像还规定了人们对现状的认识。换言之，现状认识与历史认识是相互作用的。

作为这种新视点和历史像之获得的一个例子，本文拟提出日本近世史研究中对江户时代之“鎖国”的修正问题。因为这既是近三十年时间连学校教科书的记述也发生巨大变化的事例，又是与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中我们的历史认识、尤其是围绕着东亚的历史认识密切相关的课题。¹⁾

一、過去の“鎖国”概念与教科書記述

所谓“鎖国”之词，最初是由长崎通词(译员)志筑忠雄翻译肯贝尔的《日本志》(1801年)时使用而创造出的²⁾，在如今的日本已经成为通说。换言之，“鎖国”概念，是由于18世纪开始以俄国为首的欧

1) 本内容以木村直<鎖之修正教科記>《历史评论711,200、木村直总近世中后期之国家与对外关系>曾根勇、木村直也编《新的近世2国家与对外关系》，新人物往来社199、纸屋敦之、木村直也编《展望日本历14海禁与锁国东京堂出版200的总论等为基础

2) 板泽武雄关于锁国锁国”，板泽武雄：《日荷文化交渉史之研究》，吉川弘文195年

美舰船出现在日本周边海域、对其之警戒感在执政者和有识之士中间持续扩散的状况而出现的，但在1630年代采取一系列对外政策(历来被称为“锁国”政策的禁止航海出国和禁止葡萄牙船来航等)时存在的概念。1804年在针对航行到长崎的俄国使节列萨诺夫的通告中，确立不再与除中国、朝鲜、琉球、荷兰以外的国家建立通信、通商关系乃是祖法的观念³⁾，幕末、维新时期以对欧美列强的危机感为背景，“锁国”概念逐渐普及。这个概念在明治时代所谓“赶超欧美”的意识基础上、在向着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日本植根于国民中间，江户时代的“锁国”逐渐被认为导致日本“落后”于西洋各国。随着文明开化的展开，藩阀政府等对幕政的批判姿势也与此不无关系。另方面，还有许多人提出“锁国得失论”并展开讨论，指出其培育日本独自の文化和产业，并实现了长时期的和平等“优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战败的和辻哲郎指出，日本人的缺点是科学精神之阙如，认为“必须充分认知锁国意味着什么”，从而创作《锁国——日本的悲剧》⁴⁾，从中可以窥见因“锁国”而“落后”意识之根深蒂固。

追踪明治以来关于“锁国”的论争并从实证的历史研究之立场集其大成的人，是岩生成一。岩生1963年发表题为“锁国”的论文⁵⁾，其观点在此后不久占据了通说的地位。这篇论文针对“锁国之概念”做出说明，“所谓‘锁国’，大体是指江户幕府在强化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过程中，当局者为了彻底地禁止被认为与其方向存在许多不相容之处的基督教而采取的强有力政策，海外交通贸易受到极端的限制和取缔，其结果自然是我国陷于国际的孤立状态”。其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基督教、禁止海外交通贸易和通信、禁止接触涉及基督教之外国文献和器物、禁止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航贸易等，“对外交通贸易的门户仅限于长崎一港，外国人的居住也仅局限于同地，对贸易也设定特殊的交易规定”，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锁国之体制及观念大致完成”，因此，所谓“锁国”是指从禁止葡萄牙船来航的1639年至1853年培理来航215年时间的对外关系。⁶⁾作为面向一般读者的著述，岩生刊行了《日本之历史14·锁国》⁷⁾，岩生之“锁国”像相当程度地渗透于一般民众之中。

在1960年代、70年代的教科书中，大部分是根据岩生的论点展开记述。分析1970年前后发行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关于“锁国”的记述可知⁸⁾，关于以宽永“锁国”之前与西欧各国的关系为中心的对外关系，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涉及共通的项目。与岩生的论著一样，几乎所有教科书都针对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关系，朱印船贸易与日本町、贸易统制、禁止基督教、一

3) 藤田觉：《世后期政治史与对外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年

4) 和辻哲郎：《锁—日悲剧》，筑摩书房196年。同书195年加的，和辻196年去世

5) 岩生成一，〈岩波讲座日本史1〉，岩波书店196年

6) 岩生的论文也有所保留，他指然而，虽然其他外国人之来港贸易未必需要限制或禁止，但是事实上只有中国和荷兰两国人的来航贸易以及通过对马之与朝鲜人的交继续行，后来变化为除这两国人以外的各国人都不得来航贸易，但是以论文整体而言，几乎都是叙述与西各的关系

7) 岩生成一：《日本之历史14·锁国》，中央公论社196年

8) 对教科书研究中心附设的教科书图书藏、版权页显示197年前后发行的高中日本史教科1种进行了调查。所调查的教科书如下：坂本太郎《新編高等学校日本史》（好学社197年）；家永三郎《新日本史修版（三省堂197年）》；稻垣泰彦、川村善二郎、村井益男、甘粕健《日本史》第三次修订版（三省堂197年）；时野谷及其5人《日本史》第三次修订版（实教出版197年）；西冈虎之助及其他4人《高校日本史》第五次修订版（实教出版197年）；小叶田淳、小泽荣一、赤松俊秀、小田泰正《新編日本史修版（清水书院196年）》；藤木邦彦修订日本史（秀英出版196年）；竹内理小西四郎《日本史》版（自由书房197年）；后藤阳及其4人《日本史》修订版（第一学习社196年）；丰田武《最新版要读日本史》（中教出版197年）；丰田武及其人《最新版日本史》（中教出版197年）；弥永贞三、安田元久及其人《高等日本史》第一次修订版（帝国书院196年）；安田元久、井上锐夫、大石慎三郎、土田直镇、尾藤正英及其人《高等学校新日本史》（帝国书院196年）；风间泰男、菱刈隆永、青木和夫及其《日本史》京书籍197年）；和歌森太郎、芳贺幸四郎《详说新日本史》修订版（二宫书店197年）；肥后和男、平田俊春《详说高等日本史》第三次修订版（日本书院197年）；宝月圭吾、藤木邦彦《详说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6年）

系列的宽永“锁国令”与岛原之乱，不惜笔墨认真说明，成为更加充实的记述。

再者，在关于“锁国”之历史评价的记述中，大半教科书认为因宽永十六年(1639年)令禁止葡萄牙船来航和将荷兰商馆迁移到出岛，“锁国”最终“完成”、“成立”；强调调味长崎成为唯一的窗口，被许可来航者仅为荷兰和中国；指出由于这种“锁国”，封建制和幕藩制得以维持和强化，日本孤立于世的信息之外并从进步的行列中落伍。一部分教科书中则说明“锁国”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外国的关系，但是后来意味着拒绝一切交涉，其记述写道：“于是，日本留下长崎这个小窗口，自然而然地遮蔽了世界文明之光……”所有教科书关于“锁国”的表述都与岩生之“国际的孤立”的表现形式相似，强调封闭性。进而，日本独自の文化和产业之发展、长时期的和平之实现、日本人海外发展之中断、日本人积极精神之丧失与视野之变狭隘，诸如此类根据锁国得失论观点的记述也多少可以看到。

关于与西欧各国以外的关系，即与幕藩制国家周边的朝鲜、中国、琉球、虾夷(阿伊努)的关系，其叙述之薄弱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朝鲜，许多教科书虽然触及德川家康时代的夏交，但是没有明确对马藩宗氏在日朝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尽管在若干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朝鲜使节前来的简洁记述，但是使用“通信使”之标记的教科书只有一种，而且完全没有触及伴随通信使而来的交流等⁹⁾。虽然也有教科书多少触及家康时代与明的关系以及明清交替，但是对于宽永“锁国”以后与清船的贸易关系则未曾论及。关于独立国琉球，虽然简单地触及岛津氏之出兵，但是几乎没有记述具体的交流。关于虾夷地(阿伊努)，虽然至少也是近世对外关系的一部分，但是所有教科书都没有记述。

追踪宽永“锁国”以前的朱印船贸易等充实的记述并进一步阅读可知，在教科书记述中明确存在这种历史认识，即积极“海外发展”的日本人因“锁国”而完全被困在国内，在两百数十年间从世界的前进行列中落伍，最后因培植“开国”才打破这种局面。时至今日，日本某些世代以上的人乃是在这种教科书记述中学习“锁国”的。

二、“鎖国”之修正与教科書記述

1970年代，朝尾直弘发表“锁国制之成立”¹⁰⁾、山口启二发表“日本之锁国”¹¹⁾，在日本近世史研究中重新思考对外关系、尤其是东亚国际关系之意义的风气高涨。朝尾认为仅从与西洋的关系认知“锁国”是不充分的，并以“16世纪日本国内之社会变动，构成为同时期东亚社会变动的一环”的认识为基础，论及包含日本型华夷秩序在内的诸问题。再者，在满足于“特殊的历史”之地位的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关于长崎、对马、朝鲜、萨摩、琉球、松前、虾夷地的地道研究也获得进展(例如，关于朝鲜通信使和日朝贸易、长崎的中国船贸易等研究之进展等)。

承续这种研究状况，1980年代荒野泰典和罗纳德·托比¹²⁾提出近世日本不应该视为“锁国”的见解。特别是荒野在《近世日本与东亚》¹³⁾等著述中指出近世日本存在长崎、对马、萨摩、松前之四个“窗口”并与周边各国、各民族进行交流，从而否定从来的“锁国”概念，主张应该以东亚各国共通的“海禁”和“华夷秩序”之概念认识日本近世的对外关系(荒野受到中世对外关系史研究者田中健夫的观

9) 在好学社的教科书中对于从朝鲜来的使节，还加上否定性的记述幕府为其迎送而消耗巨额费用的情况为数不少

10) 朝尾直弘锁国制之成，《讲座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后收入《朝尾直弘著作集将军权力之创出》，岩波书店200年

11) 山口启二日本之锁，《岩波讲座世界历1》，岩波书店1977年

12) 罗纳托比：《近世日本之国家形成与外交》，速水融、永积洋子、川胜平太译，创1999年，等等

13)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年

点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提出对日本近世史研究者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纯粹专攻国内史的研究者也展现其意识到对外关系的倾向。再者,研究近世对外关系史的人也增加了,这个领域不再是“特殊史”。进而,通过大众媒体,“锁国”不是国际孤立的印象(image)也逐渐扩散到一般人中间。

这种研究动向当然也逐渐反映在学校教科书中。分析现在使用的所有高中“日本史B”教科书(11种)关于“锁国”的记述可知¹⁴⁾,关于宽永之前以与西欧各国的关系为中心的对外关系,除一部分之外,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触及基本共通的项目,这点与1970年前后的教科书是一样的。尽管反映新研究进展的记述散见于各教科书中,其内容也没有大的差异,但是在数量方面较诸1970年前后有略微减少的倾向。

不同的是,首先是对宽永“锁国”的评价之记述。虽然记述为宽永年间完成“锁国”的依然居多,但是也有取而代之,记述为幕府统制与外国的关系、或者壅断信息和贸易。尽管还继续使用所谓“锁国”之词,但是多数提出修正的表述方式,或者加以引号,或者采用“所谓锁国”的表现,而且在大半教科书中明记所谓“锁国”一词是近世后期才初次出现的。进而,有的教科书因修正而采用诸如“日本是‘锁国’吗?”之类的挑战性表现,有的教科书不再使用所谓“锁国”一词而采用所谓“外交限制”之表现以说明一系列历史事象,然后再触及近世后期最初出现的“锁国”概念。大半教科书中明记对外关系是四个“窗口”,关于长崎,给人以所谓唯一窗口之印象的记述成为绝无仅有的、受人关注的表现。1970年前后成其为主流、以孤立于世界之外或压制日本人海外发展为主旨的记述激减,即使依然残存也后退为多少有所节制的记述。所谓日本人丧失积极精神之类展现消极的国民性的记述已经荡然无存。然而,类似锁国得失论之残余的记述依稀可见。

关于与幕藩制国家周边之朝鲜、中国、琉球、虾夷的关系,叙述的充实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也有细微的内容不同,但是在所有教科书中都占有恰如其分的篇幅,如关于朝鲜通信使,不仅全部教科书中都有“通信使”的表记,而且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有通信使行列的插图,并且还触及通信使来时兴旺的文化交流。在有的教科书中,与这些周边国家、民族的交流用多达3页的篇幅和丰富的插图进行解说,此外在近代史部分还用2页的篇幅解说虾夷和琉球的文化。与1970年前后相比,有恍如隔世之感。

三、“鎖国”之修正的背景

教科书记述之发生这种变化,是研究 viewpoint 的变化及以其为基础新研究成果的创出导致的。既然如此,为什么1980年代对“锁国”的认知发生变化呢?而且这又被多数研究者以及一般民众所接受呢?以下拟对此加以考究。

“锁国”概念毕竟是因应近世后期欧美各国之进出东亚的情势而成立和普及的,其关注的对象是西洋。将宽永时期以基督教对策为中心之对外政策视为“锁国”的完成,并且认为幕末因欧美列强之压

14) 所调查的教科书如 发行时间均200: 宫地正人及其1人《新日本史B》(桐原书店);青木美智男及其1人《日本史B》修订版(三省堂);宫原武夫、石山久男及其1人《高校日本史B》版(实教出版)田修、大山乔平及其1人《日本史B》版(实教出版);加藤友康、荒野泰典、伊藤纯郎及其他8人《高等学校日本史B》修订版(清水书院);尾藤正英及其他7人《新选日本史B》京书籍);山本博文及其1人《日本史B》京书籍);村尾次郎、小堀桂一郎、朝比奈正幸及其2人《高等学校最新日本史》(明成社);石井进、五味文彦、笹山晴生、高埜利彦及其他9人《详说日本史》修订版(山川出版社);石井进、五味文彦、笹山晴生、高埜利彦及其人《高校日本史》修订版(山川出版社);大津透、久留岛典子、藤田觉、伊藤之雄《新日本史》修订版(山川出版社)

力被迫“开国”，这种认识的视野显然局限于对西洋，其对东亚的视点是非常薄弱的。再者，这是从固定的、静态的视角认识“锁国”体制之二百数十年时间，而没有考虑到该时期东亚的变化。

1955~73年日本实现高速增长而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1980年代继续稳定增长，日本型经营备受赞扬，由于日本的汽车、电气制品等大量出口，日美之间贸易摩擦也日趋激化，面对傅高义《日本名列第一》(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1979年)大加评判等情势，对于日本而言，以欧美各国为模式加以“崇拜”的意识急速消失。再者，1970年代开始亚洲新兴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发展，随后包括中国等若干亚洲国家接踵而来。惟其如此，摆脱西洋中心的世界观以及对亚洲的蔑视观、增加对东亚地区的关心是自然而然的。直至1970年代，在日本大学选修第二外语(英语为必修)方面，德语、法语的选修者占压倒多数，相比之下，1980年代以后，中文的选修者急剧增加；1970年代，仅屈指可数的几所大学设置韩国(朝鲜)语专业，而1980年代以后，多数大学都已经设置，诸如此类是这种思潮变化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情势下，在认识江户时代之对外关系方面，也是密切地结合与各国的关系加以进行。

再者，从报告者的关注点出发而要提及的是，探求结合近世中期东亚变化的动态认识乃是今后的课题。报告者过去曾经提倡需要将东亚国际社会的变化与幕藩制国家及其社会内部的变化置于有机联系的近世中期，并预想其向近世后期人们视为“锁国”而没有办法的状况之过渡，而这可以表现为“对‘锁国’的实态之接受”。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日本的幕藩制国家以及清国、朝鲜、琉球等各国发展成为近世国家，并且各自达成其固有的发展。虾夷社会也经历了地方承包制之展开等社会变化。与其相伴随，“四个窗口”的意义也分别发生变质。惟其如此，在面对18世纪以来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的时候，东亚各国、各民族面向近代的回应也各具其性格。¹⁵⁾

旧的“锁国”概念是从过度闭锁的、孤立的印象(image)认识幕藩制国家和社会。1980年代，“国际化”与时俱进，人的国际移动和通信成为家常便饭。惟其如此，不满足于一国史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关于江户时代，也都感觉到必须从闭锁的、孤立的侧面转向开放的、能动的侧面。在所谓日本人的“岛国根性”之意识遭受清除，甚至成为死语的情形下，所谓压抑日本人海外发展并导致从世界进步的行列中落伍之“锁国”认识，令人感觉不到多少真实感。再者，1980年代是将西洋的现代相对化的后现代思潮逐渐高涨、前现代固有的价值体系也得到重新评价的时期。与依然将可恶的封建遗制之克服作为现实课题的1960年代相异其趣，“明朗的近世”印象逐渐加强，积极地认知江户时代之“优点”的倾向，无论是在研究者中还是在大众传媒中，都日益显著。在“锁国”体制下与异国、异民族的活跃交流令人倍感魅力无穷，原因即在于此。这与重新评价历来被视为落后之物的东亚前近代价值观的意识是密不可分的。

在原来的“锁国”概念中，近世的幕藩制国家被原封不动地视为近代民族国家的直接的前提，而琉球、虾夷则被视为“日本”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看作自立的存在。毋庸赘言，在其背景中存在着单一民族国家观。在1980年代冷战结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问题深刻化(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之世界情势中，对少数民族的认识逐渐深化，因此对琉球、虾夷的视点也发生变化，其历史和文化获得广泛的认知。在关于近世的认知中，琉球、虾夷被认为是自立的存在，与其交流被作为与异国、异民族的交流加以描写。

15) 参照木村直也总II近世中后期之国家与对外关，曾根通、木村直也编：《新近世2国家与对外关系》，新人物往来社199年；木村直也东亚华夷秩序与日朝关系之转，历史学研究会编：《围绕历史教科书的日韩对—日韩共同历史研究研讨会》，大月书店200年

結 語

1980年代的时代情势促许多日本人的现状认识发生变化，为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视点，从而促成研究的进展并新的历史像的描绘。日本在世界所处地位的变化与对东亚的视角的变化，打破了对西洋的视野而产生的旧的“锁国”概念，造就了重视近世东亚的历史认识。这反映在教科书记述以及大众传媒叙述，也对一般人的历史认识造成影响。

但是实际上，作为国际孤立之“锁国”概念并没有轻易地消失。抑或是因为由年长的老师所教授，在学生中怀有旧的“锁国”概念的人出乎意外地多。由此可见，只是在百年以上、渗透于人们意识中的概念中，摆脱其魔咒的束缚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惟其如此，这种忧虑也是存在的，即只要特别地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洋近代至上主义之意识的旧的“锁国”概念，也会形成虽然江户时代日本因“锁国”而落后、但是因明治时代以降的现代化而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而中国和朝鲜则因未能如此而沦落为被侵略国的历史认识。然而，在观察当代世界情势时，过去的西洋近代至上主义被相对化，重视东亚的价值观逐渐扩大，这种方向性也是不能否定的。顺应这种方向性，旧的“锁国”概念将逐渐被相对化，而江户时代与周边各国、各民族的交流也将植根于比较多人的历史认识之中。

虽然在日本史研究者层面上旧的“锁国”概念几乎被清除殆尽，但是以荒野泰典等提出的问题而言，现在比较精致的探讨尚在进行之中，不是满足于单纯地舍弃“锁国”概念，而是为追索新的历史像而推进研究。在此之际，第一个应该留意、也是理所当然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与周边各国、各民族的交流决不是玫瑰色的。东亚各国、各民族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互有差别，各自的利害和体面相互冲突，而且伴随着激烈的矛盾，但是同时也维持了长达两百数十年的稳定关系。现在应该从其历史实态中汲取的教训无疑不少。第二个应该留意的是，日本近世后期“锁国”概念之出现及其后之普及、扎根的事实。这起因于日本置身其中的历史环境（日本近世社会内部的状况与国际情势）。阐明这个问题是与考察东亚各国、各民族根据各自近世社会的特质而摸索近代化的进程密不可分。而在进行这种考察时应该论述的不是东亚各国、各民族竞争接受西洋近代的早晚快慢问题，而是各自近代化的性格差异问题。

60年来不同历史视角下的 中国与东亚世界

■ 姜 义 华 (复旦大) ■

60年来不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姜义华（复旦大学）

〈目 次〉

1. 全面学习苏联，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
2. 中苏对立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下的历史视角
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历史视角转换下的中国及东亚世界
4. 从人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切入，深化对中国和东亚世界的认识

历史视角，以其时序性、整体性、实证性，获得其他视角无可取代的特殊地位，能够帮助人们深入认识所考察的对象。然而，由于社会的巨大变迁，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历史视角本身前后就会非常不同。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不同的人历史视角也常常会有很大差别。这样，对于同一对象，观察的结果便不免产生许多歧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人们观察历史的视角有过几次重要转折，对于中国本身，对于东亚世界，观察的结果，都是既有不少共同之处，又有极为明显的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史学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全面学习苏联，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阶段；中苏对立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阶段；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总目标阶段。

1. 全面学习苏联，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置于国家行为这一重要地位，将历史学作为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的一条重要战线。这是出于构建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适应的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出于清除长时间来唯心史观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影响的需要，也是出于总结和吸取优秀历史遗产服务于新中国个巩固和建设这一需要。

全面学习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在史学领域，它的贯彻进一步强化了苏联史学理论和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不久，便在全国干部与群众中普遍开展了源于苏联的社会发展史教育。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¹⁾这一教育，核心是确立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推进的观

1)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98—399页。

念, 确认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 接受关于中国古代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中国, 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于东亚世界, 也用这一模式予以界定。

1953年,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4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 说: “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 现在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 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的第9章到第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这个学习计划, 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 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²⁾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为此开辟了专栏, 刊登辅导论文、资料、名词解释、问题解答、学习心得。学习者在学了一年以后都得进行考试, 还要写出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学习第9至第12章以后, 从1955年9月起, 各级干部又被规定要进一步学习《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第1至第8章。对一部外国的党史教科书如此仔细地研读、学习, 充分显示了全面学习苏联同当时中国的国家决策关系是何等密切。

为了在作为社会引领者的知识精英中清除各种与此相悖相异的思想意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还专门选择了一批“反面教员”、“反面教材”加以批判, 来强化和深化这一教育。于是, 就有了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有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有了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 以及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历史学界专门进行的反对右派历史学家的斗争。

对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批判,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导。毛泽东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阐明这一批判的意义就是树立一种新的历史观的支配地位。

毛泽东写道:

在许多作者看来, 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 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 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新的阶级力量, 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 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 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³⁾

1954—1955年开展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席卷整个学术界。中共中央宣传部秉承毛泽东意图发动了这场批判运动。根据当时议定的计划, 由历史学家郭沫若挂帅, 历史学家侯外庐负责胡适政治思想批判, 范文澜负责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 尹达负责评价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胡适思想批判同时展开的, 还有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 也都涉及历史观。1957年反右斗争中, 一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作为批判斗争对象。通过对这些“反面教员”的批判, 与新的历史观不相容的那些思想被摒弃, 被贬斥, 至少不能再公开宣扬, 统一的新的历史视角极为强势地被确立起来。

最为明显的成就,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胡绳等人的通史或断代史。专门史著作牢牢占领了各大学历史学系讲坛, 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全部重新编写。史学界环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

2)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 第141页。

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第316—317页。

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被称作历史学中“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环绕著如何将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运用于中国历史发展而展开。古代土地制度、农民战争及汉民族形成问题，所涉及的也是如何将马克思的土地问题理论、恩格斯的农民战争理论和斯大林民族问题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固然从不少方面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证明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都不能自外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2. 中苏对立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下的历史视角

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实现了普遍中农化，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当时，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少量流转，它们被夸大为在农村中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根据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普遍地、大量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的论断，中国的农村政策急速改变为抓紧改造和消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同时，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你死我活斗争时期的论断，特别是资产阶级要以十倍仇恨、百倍疯狂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的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对几乎囊括所有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所谓“不法资本家”开展火力极猛的斗争，城市政策也由此急速转变为抓紧改造和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不太长时间里就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

凭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崇高威信，依靠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权力对于全国城乡无所不在的支配，将战争年代已极为纯熟的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重大的根本性变化，农村基本还依靠手工工具和畜力的基础上，仅仅用了短短两三年时间，中国就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胜利的到来是如此顺利，便鼓动人们将大搞群众运动以及游击作风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运用于经济建设，由是发动了以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以及能够最大限度动员民众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以此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进一步根除农村中私有制残余。

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毛泽东在《三国志·张鲁传》上于1958年12月7日和10日两次写下长长的批语，高度赞扬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两千年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在12月7日的批语中，他写道：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了许多。……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

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⁴⁾

这个批语,强调了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化的历史渊源关系,透露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40年代曾一再尖锐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这时实际上已被肯定并得到高度赞扬。它也透露出,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关键作用的,与其说是科学社会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原始社会主义”。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原始社会主义泛滥,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强迫命令泛滥成灾,造成严重后果。在小生产广泛存在的基础上立即过渡到生产资料普遍的公有制,非但没有带来生产力真正的大解放,反而造成了对于农民基本生产资料乃至人身自由的普遍剥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使现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抗拒“五风”的群众和干部,反而被当作扛了“资产阶级白旗”遭到无情打击。

这时,又伴之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隐性竞争走到公开对立,所有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持异议者,包括农民们“包产到户”即每一农户对生产资料及产品有一定支配权的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修正主义倾向。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上、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分歧,压制所有不同的意见,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党内矛盾激化,而这反过来又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供了口实或根据。

中苏对立,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使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受到极大冲击。1957年反右斗争中,毛泽东就说过,大学里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历史系。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教授,不要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大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史学革命”,竞相批判重视史料的“唯史料论”、重视考据方法的“资产阶级考据学”,指责重视王朝盛衰更迭者为维护“王朝体系”,指责认为农民起义具有皇权主义倾向即反贪官不反皇帝者为诬蔑农民革命。在“兴无灭资”的名义下,“厚古薄今”、“以论带史”成为最为革命的口号,要编出以农民战争为纲的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最为急迫的任务。

范文澜1961年提倡“反对放空炮”,要求在历史研究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翦伯赞反对见帝王将相、剥削阶级就骂,见史书上所记得“盗”“匪”就捧的简单化做法,要求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说:“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⁵⁾历史学界的这些抗争,迎来的是对于这些历史学家猛烈的批判。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痛斥这些历史学家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他们“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社论特别指责说:“他们顽固的否定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的‘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的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诬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正常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就此完全停顿,代之而起的是强词夺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专门以势压人的“大批判史学”,以及高度政治化、和政治权力斗争紧密配合的隐射史学、阴谋史学。

在这一历史视角下,历史的中国被诠释成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中国,农民战争 与农民革命推动

4) 毛泽东:《为印发<张角传>写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7—628页。

5)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页。

了历史发展的中国。对东亚世界的诠释，也不例外。

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历史视角转换下的中国及东亚世界

“文化大革命”终止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路线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所取代，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总主题。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向前发展的闸门，推动人们从一个新的历史视角观察中国和东亚世界。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思想上政治上拨乱反正中，历史学界对于长时间来肆虐中国大地的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依托在“兴无灭资”名义下的反市场化、反工业化、反城市化、反知识化等种种反现代化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通过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历史学家们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指出生产斗争、生产活动、生产力发展方才是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阶级的存在、各阶级的地位与本质，必须同特定的生产力和特定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历史上真正进步的力量，是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集团。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无限度地夸大，更不能无原则地加以神化，尤其不应将暴力的作用神化，因为暴力充其量只能起到助产婆的作用，没有孕妇，没有受孕，胎儿没有在母体中成熟，助产婆再有能耐，也诞生不了健壮的婴儿。历史学的拨乱反正，使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历史真实决不可以随心所欲、轻率草率地对待。这对于整个历史研究重建严谨求实的学风，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激励。

在全国上下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历史研究在全面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方面，提供了真正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与事实的支持。历史学家们根据中国二千多年小农经济存在和演变的事实，说明了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之公社制更能适应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准，它同时也说明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及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说明了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功能。一段时间，“史学危机”声浪甚高，深入考察，是因为固守当年的一些所谓“规律”、“法则”，诠释不了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不休，也是因为要强行将中国历史演进纳入欧洲历史发展的框架。正如欧洲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特色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别国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方能找到能引导中国自身健康向前发展的正确道路。

为突破单一化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历史学进行了许多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是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国内市场史、国际市场史、区域市场史、铁路史、公路史、航空史、水运史、邮电史等交通史，货币史、汇率史、信贷史、证券史、期货史、保险史等金融史，劳动密集型、资源能源消耗型、资本密集型、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等产业史，经济结构变迁史、经济制度史、经济运行机制演变史、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史，以及部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史、山林草原经济史、海洋经济史等等，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都蓬勃展开。这些成果，对于有纵深感地把握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劳力、智力、技术、信息、资源的高速流动的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中国发展战略和策略，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路，提供了鉴戒。

这一时期历史研究成就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史领域。当人们专注于谋求经济高速增长时，历史学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与国外发展的教训，早就敏锐地开展了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的研究。这不仅

仅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人们观念的变革、思想的解放，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自身现代性的培育，还更因为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一旦缺失，人们极易陷入价值迷失、道德迷失、行为规范迷失，权力走向腐败，利益走向失范、失序、失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容主义会将人们变成权奴、钱奴、物欲之奴。历史学界从80年代前期开始，就开始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包括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观念文化、物化了的的文化、制度化了的的文化全面研究，推出了众多文化史研究论著，包括各种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民族文化史、各专门领域文化史新成果，为推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多彩多姿的传统文化资源、世界文化资源。

继文化史之后，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繁荣。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是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社会协调方式的更本性转折。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较早提出必须及早关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关注人口增长、大口大规模移动、老龄化、就业、独生子女成长等一系列中国特别突出的问题，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同步。人口史、移民史、流民史的研究深化了对于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问题的认识；从家族史、家庭史、婚姻史、宗姓史、谱系史到民族史、族群史的研究，深化了对于血缘网络关系的认识；政党史、社团史、商会史、行会史、学派史、黑社会帮派史的研究，深化了对于社群网络关系的认识；城市史、乡村史、社区史、地方史的研究，深化了对于地缘网络关系的认识；对于社会阶级、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生产者管理者决策者分层、不同单位不同部门利益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对于利益网络关系的认识。社会结构史、社会生活史、社会性别史、社会身份职业史、社会组织史、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演变史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和把握正经历着历史性巨变的中国社会以及正确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亚地区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要求了解亚洲“四小龙”“五小虎”崛起的过程与经验，要求了解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及其共同特征，要求了解东亚和世界各种文明的真实状况，这就推动人们

超越先前公式化、简单化、脸谱化、实用主义、先验主义、隐射比附以势欺人等等做法，使历史学同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展开交流对话及跨学科研究，开拓新研究领域，积极采用计量研究、比较研究、结构分析、语义分析、心理分析等多种新的研究方法，以了解真相，获得正确的认识。

4. 从人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切入，深化对中国和东亚世界的认识

21世纪到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纪，中华文明正在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半工业文明全方位地跃入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中华民族正在最终告别百年屈辱，真正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与此同时，中国又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的挑战，如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经济与文化发展严重失衡的挑战，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金融危机、农业危机、能源危机、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的挑战。经济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文化发展失衡，使得利欲、物欲不断膨胀，义理严重缺失。利益的追逐与浸淫，又严重腐蚀各级权力，造成大范围权力寻租，利多领域的权力越位，少利或无利领域的权力缺位，社会两极化取向亦因此难以遏制。

在上述这些挑战面前，人们必须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新文明观来重新认识自己，思考未来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将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的社会生活作为综合整体加以把握。人的知识传授、积累、更新、创造,不仅是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满足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人除了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还有情感生活、情感世界,意志生活、意志世界,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就要求工业化进程和生态化相结合,城镇化进程和人性化相结合,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公平化相结合,世界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结合,就要求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就要求真正协调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内涵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拓展和提升。从这一历史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与东亚世界,就要求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认知最普通的民众,转向认知人本身,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思维,普通人的风俗习惯、信仰、交往,了解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究竟怎么样生产,怎么样生活。了解中国人和东亚各国人们保有、传承、变革和创造了那些东西,他们是根据哪些条件,经由什么样的路径,来保有、传承和变革。由此明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们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人们怎样超越现有的状况,走向未来。

这一新的历史视角又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人们的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意志生活,或知性世界、情感世界、意志世界全方位地纳入考察的范围。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史与观念史的研究,即对于人们知识的积累和传输,知识结构和学科构成的演进,人们各式各样的观念,人们思维方式与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变迁的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这些知识和观念一经形成,在社会实践中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有利于人们既积极继承和利用既存的知识、观念和思想学术资源,又能自觉地从许多已经过时的、带有片面性甚至含有严重错误的知识、观念中释放出来,形成新的知识结构、观念体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人的感情生活、感情世界的研究。人除去知识和观念的传承、积累和变迁之外,还有极为丰富而多样的情感生活、情感世界,美感生活和美感世界,这就是人的诗性世界,它和人的知性世界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两者的运行法则可以说大相径庭。多年来,人的诗性几乎完全不被承认,人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人的喜怒哀乐,人在自然美和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人所创作的美中得到熏陶和享受,所有这些,都被一一纳入知识化范畴。现今,文学终于被确认为人学,艺术终于超越为政治服务而和人性相连接,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终于超越知识学体系,走向引导人们去开发和培育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人的诗性,人的情感世界和人的美感世界。

人的意志生活、意志世界,使人制约和改变自己身上所残存的兽性,推动人的野蛮状况一步步走向文明状态。人的意志,人的心理,人对更美好未来的追求,人的敬畏之心、向善之念,人的爱心、同情心、怜悯之心,先前很少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现在已为历史学越来越关注。宗教史、信仰史、习俗史、心理史研究之外,人们的价值追求,价值认同,价值传播,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的构成和演变,人超越动物性而独具的人性问题,包括民族性、民族精神问题,一一为人们所重视。

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中国,对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对整个人类,都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在这一层面上,人们更容易发现彼此的共同性以及差异性,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认同。

这一新文明观所提供的新的历史视角,将使我们的历史学在推动中国和整个东亚世界发展,推动东亚世界共同市场的形成和东亚走向一体化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60년래 상이한 역사 관점 하의 중국과 동아시아 세계

장이화 (姜義華)

〈목 차〉

1.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탄생과 확립 - 총체적으로 소련을 배우자
2. 중소대립과 계급투쟁의 확대 및 절대화 와중의 역사적 시각
3. 경제 건설 중심의 역사 시각 전환기 중국과 동아시아 세계
4. 인성과 인간의 총체적 성장에 주목하기 - 중국 및 동아시아 인식 심화

역사적 시각은 그 시간성, 통합성, 실증성으로 인해 다른 시야로는 대체 불가능한 특수한 지위를 가지면서 연구 대상을 보다 깊이 인식하도록 만든다. 하지만 사회가 급격히 변화하면서 생산 방식, 생활 방식, 사고 방식에 중대한 변화가 생길 때, 역사적 시각 자체도 이를 전후해 돌변하게 된다. 또한 같은 시대, 같은 환경에서 사람마다 완전히 다른 역사적 시각을 갖기도 한다. 이렇게 되면 동일한 대상에 대한 관찰 결과에 갇가지 이견이 불가피하게 된다. 중화인민공화국 수립 이후 60년 동안 역사를 바라보는 사람들의 시각에 여러 차례 전환이 이루어졌다. 중국 자체 그리고 동아시아 세계에 대한 관찰 결과에 많은 공통점이 있지만 동시에 매우 분명한 차이도 있었다.

중화인민공화국 건국 이후 중국 사학계는 모든 면에서 소련을 뒤따르고 배워 새로운 중국을 건설하고 다지는 단계, 중소 대립과 계급 투쟁 확대 및 절대화 단계, 경제 건설로 공산당 업무의 무게 중심을 전환한 단계, 인간의 총체적 발전을 총목표로 하는 단계라는 네 과정을 거쳤다.

1.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탄생과 확립 - 총체적으로 소련을 배우자

중화인민공화국은 탄생 초기부터 역사 연구와 역사 교육을 국가 행위라는 중요한 지위에 놓고, 역사 학습을 새로운 중국을 만들고 튼튼하게 다지기 위해 싸우는 중요한 전선(戰線)으로 보았다. 이는 새로 탄생한 중화인민공화국에 상응하는 통일된 이데올로기를 구축하기 위한 것이자 오랫동안 사상 문화 영역에서 광범위하게 영향을 미쳐온 유심론적 사관을 일소하지 위한 것이었으며, 동시에 우수한 역사 유산을 찾고 흡수하여 새로운 중국의 탄탄한 기반 확보라는 목표에 활용하기 위한 것이기도 했다.

소련에서 배우자, 이것은 중화인민공화국 탄생 직후의 중요한 구호였다. 이 구호가 역사학 영역에 적용되면서, 중국 사학계에 대한 소련 사학 이론과 역사관의 영향력이 한층 강화되었다.

중화인민공화국 수립 이후 중국은 전국 간부와 인민을 대상으로 소련에서 온 사회 발전사 교

육을 보편적으로 실시하였다. 1950년 6월 6일 마오쩌둥(毛澤東)은 중국 공산당 제7기 삼중전회(三中全會)에서 “지식인을 대상으로 각종 훈련반을 열어야 합니다. 군정대학과 혁명대학을 세워 지식인들을 활용하고 동시에 교육과 개조를 진행해 사회발전사, 역사유물론 등 몇 가지 과정을 학습하도록 해야 합니다. 우리는 유심론자들이 더 이상 우리를 반대하지 않도록 만들 방법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¹⁾ 이 교육의 핵심은 원시 사회, 노예제 사회, 봉건 사회, 자본주의 사회, 사회주의 및 공산주의 사회라는 5가지 사회 형태의 순서로 발전하는 것이 인류 발전의 보편 법칙이라는 생각을 확립시키는 데 있었으며, 중국 고대가 원시 사회, 노예제 사회, 봉건 사회의 중국이고 근대는 반식민지반봉건 중국이라는 생각을 받아들이게 하려는 것이었다. 동아시아 세계 역시 이 모델로 성격을 규정하였다.

1953년 마오쩌둥과 중국공산당 중앙은 과도기 당의 총노선과 총임무를 확립하고, 장기간 국가의 공업화와 개인 농업, 수공업 및 자본주의 상공업에 대한 기본적인 사회주의 개조를 실현하고자 하였다. 1953년 4월 23일, 중국공산당 중앙은 「1953~1954년 간부 이론 교육에 관한 지시」를 통해 “경제 건설 시기 총체적인 당의 수요에 발맞추어, 현재 모든 당 간부가 이론을 배우는 고급조와 중급조는 1953년 7월부터 1954년 12월까지 1년 안에 『소련공산당사』 9장~12장과 레닌과 스탈린의 사회주의 경제 건설에 관한 일부 저작을 학습하도록 결정한다. 이 학습 계획은 모든 주요 당간부가 국가의 공업화와 농업 합작화를 실현하고 사회주의 건설을 완료한 소련의 기본 법칙을 체계적으로 이해하는데 목적이 있으며, 중국의 경제 건설 과정에서 중국의 구체적인 여건에 따라 소련의 경험을 올바르게 활용하기 위한 것이다.”²⁾고 하였다. 중국공산당 중앙 기관지인 『학습』 지가 이를 위한 전문 칼럼을 신설해, 지도 논문, 자료, 용어 해석, 질의 응답, 학습 결과 등을 실었다. 학습자는 1년 동안 공부한 후에 시험을 치르고 다시 신문 잡지에 발표 가능한 논문도 써야 했다. 9~12장을 공부한 후, 1955년 9월부터 각급 간부는 다시 『소련 공산당 약사』 1~8장을 학습하도록 결정되었다. 외국의 당사를 이토록 자세하게 읽고 배웠다는 사실은 소련을 총체적으로 배우는 것이 당시 중국의 국가 정책 결정과 얼마나 긴밀한 관계가 있었는지를 충분히 보여준다.

사회 지도자로서 지식 엘리트 가운데 이와 배치되거나 이질적인 사상 및 이데올로기를 뿌리뽑기 위해, 중국 공산당과 마오쩌둥 본인은 ‘반면교사’ 그룹과 ‘반면교과서’에 대한 비판을 통해 교육을 강화하는 방식을 택했다. 이에 따라 영화 ‘우원전(武訓傳)’ 비판, 지식인 사상 개조, 후스(胡适) 사상 비판, 량수밍(梁漱溟) 사상 비판, 후평(胡風) 사상 비판이 진행되었고, 1957년 반우파 투쟁의 와중에서는 사학계를 대상으로 우파 역사학자 배격 투쟁이 벌어졌다.

마오쩌둥이 직접 ‘우원전’과 우원(武訓)에 관한 서적과 논문에 대한 비판을 시작하고 지도하였다. 그는 1951년 5월 20일 『인민일보』에 실은 「영화 ‘우원전’ 논쟁에 주목한다」는 제목의 논설에서 우원전에 대한 비판이 새로운 역사관의 지배적 지위를 수립하는 데 의미가 있다며 다음과 같이 설명하고 있다.

대다수 작가들은 역사의 발전이란 새로운 것이 낡은 것을 대체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낡은 것이 죽지 않고 이어지도록 여러 가지 노력을 하는 것으로 생각한다. 그들은 역사의 발전이란 마땅히

1) 泽, 사방으로 출격하지 말라(不要四面出击), 『泽文稿』, 第, 中央出版社, 198년, 398~39쪽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엮음, 『重要献选』 第, 中央出版社, 199년, 14쪽 참고

타도해야 하는 반동적 봉건통치자를 계급투쟁으로 몰아내는 것이 아니라, 우선처럼 피압박 인민의 계급투쟁을 부정하고 반동적 봉건통치자에게 투항하는 것으로 생각한다. 우리의 작가들은 또한 1840년 아편전쟁 이후 100여 년의 중국 역사에서, 옛 사회 경제 형태와 그 상층 구조(정치 문화 등)에 맞서 싸운 새로운 사회 경제 형태, 새로운 계급 역량, 새로운 인물과 새로운 사상에 어떠한 것들이 있었는지 연구하지도 않은 채, 어떤 것들을 칭송해야 하고 어떤 것들을 칭송해서는 안 되는 지 그리고 어떤 것들을 반대해야 하는 지 결정한다.³⁾

1954~1955년 진행된 후스 사상 비판 운동은 학술계 전반을 휩쓸었다. 중국 공산당 중앙선전부는 마오쩌둥의 의도를 받들어 이 비판 운동을 시작했다. 당시 미리 짜놓은 계획에 따라 역사학자 귀모뤄(郭沫若)가 앞장 서고, 후스 정치 사상 비판은 허우와이루(侯外廬)가, 역사관 비판은 판원란(范文澜)이, 그리고 역사학과 고전문학 연구자로서 그의 지위와 역할을 재평가하는 역할은 인다(尹達)가 맡았다. 후스 사상 비판과 함께 전개된 량수밍 사상 비판과 후평 사상 비판 역시 모두 역사관과 관련된 운동이었다. 1957년 반우파 투쟁의 와중에서 일군의 능력있는 역사학자들이 ‘자산계급 우파분자’로 분류되어 비판과 투쟁의 대상이 되었다. 이러한 ‘반면교사’들에 대한 비판을 통해 새로운 역사관과 공존 불가능한 사상이 폐기되고 배척되거나 최소한 공개적으로 입에 올리지 못하게 되면서, 하나의 새로운 역사적 시각이 거의 절대적인 지위를 확립하기 시작했다.

가장 뚜렷한 성과는 바로 중국 마르크스주의 역사학자인 귀모뤄, 판원란, 허우와이루, 뤼전위(吕振羽), 쟌보찬(翦伯贊), 후성(胡繩) 등의 통사 또는 시대사 및 분야사 저술들이 각 대학 사학과 강단에 자리잡게 되었고, 중고등학교 역사 교과서 역시 모두 다시 저술되었다. 사학계가 중국 고대사의 시대 구분, 중국 고대 토지제도, 중국 봉건사회 농민전쟁, 중국 자본주의 맹아, 한민족 형성 등의 문제를 둘러싸고 격렬한 논쟁을 벌이면서, 당시 사학계의 ‘다섯 송이 황금꽃’으로 불렸다. 고대사 시대 구분과 자본주의 맹아 문제에 대한 논쟁은 마르크스주의 기본 원리로 간주되는 5가지 사회 경제 형태 진화설을 가지고 중국 역사 발전을 설명하기 위한 것이었다. 고대 토지제도, 농민전쟁, 한민족 형성 문제 역시 모두 마르크스의 토지문제 이론, 엥겔스의 농민전쟁 이론, 스탈린의 민족문제 이론을 활용해 중국의 실제 문제를 분석하려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논쟁들은 물론 많은 측면에서 중국 역사 발전의 특징에 대한 인식을 심화시켰지만, 그보다는 중국 역사에 대한 재해석을 통해 다른 모든 나라들처럼 중국 역시 역사 발전의 일반 규율을 벗어날 수 없다는 사실을 증명하려는 데 더 큰 목적이 있었다.

2. 중소대립과 계급투쟁의 확대 및 절대화 와중의 역사적 시각

토지개혁 이후 중국 농촌에 보편 중농화가 실현되면서, 농업 생산이 빠르게 회복하고 발전했다. 당시 농업 생산 발전 과정에서 토지, 자금, 노동력 등 생산요소의 소량 유통이 일어나자, 농촌에 나타난 새로운 양극분화로 과장되었다. 소생산자가 매일 매시간 보편적으로 대거 자발적으로 자본주의를 만들어내면서 자본주의 복벽의 온상이 된다는 레닌의 논리에 따라, 중국의 농촌 정책은 농민과 수공업자의 개인 경제를 개조하여 소멸시키는 작업으로 급속하게 바뀌었다. 이와

3) 『译文稿』, 第, 中央出版社, 198년, 316~31쪽 참고

함께 과도기는 자라나는 공산주의와 망해가는 자본주의가 사투를 벌이는 시기라는 레닌의 이론에 따라, 특히 자산계급은 열배의 증오와 백배의 분노로 자신들의 잃어버린 유토피아를 되찾으려 한다는 논리에 따라, 전국적으로 대규모 군중 운동을 통해 모든 개인 자본주의 기업을 망라한 소위 ‘불법자본가’를 대상으로 맹렬한 투쟁을 벌였다. 도시정책 역시 이를 계기로 민족자본주의 상공업의 개조와 소멸 작업에 박차를 가하는 방향으로 빠르게 바뀌었고, 얼마 되지 않아 자본주의는 중국에서 멸종되었다.

중국 공산당과 마오쩌둥 개인의 높은 명망에 힘입어, 전국 도시와 농촌을 완벽하게 지배하고 있는 고도로 집중된 통일적 행정 권력의 힘으로, 전쟁을 겪으면서 이미 익숙해진 군중 동원 방식을 농업 합작화와 모든 업종의 자본주의 상공업의 반국유화에 적용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전반적 사회 생산력에 아직 근본적 변화가 없고 농촌은 기본적으로 수작업 도구와 축력에 의존하고 있는 상황에서, 겨우 2,3년이라는 짧은 시간 안에 중국은 개인 농업, 개인 공업 및 개인 자본주의 상공업에 대한 개조를 완료하고 거의 모든 요소를 포괄하는 통일된 계획 경제 체제를 구축하였다. 승리가 이렇게 순조롭게 달성되면서, 이에 고무된 사람들은 군중 운동과 유격 작풍 또는 유격전 전술을 경제 건설에 활용하였다. 이로써 강철 제련과 식량 생산 최대화를 중심 내용으로 하는 대약진 운동과 최대한도로 민중을 동원하려는 인민공사화 운동이 시작되어, 중국 공업화 실현을 가속화하면서 나아가 농촌에 남아 있는 사유제의 잔재를 뿌리뽑고자 했다.

대약진과 인민공사화의 물결 속에서 마오쩌둥은 『삼국지』 「장노전(張魯傳)」에 1958년 12월 7일과 10일 두 차례에 걸쳐 써넣은 비판 문구를 통해, 농민의 원시 사회주의와 2천여 년의 농민 혁명 투쟁을 크게 칭송하였다. 그가 12월 7일에 쓴 비판은 다음과 같았다.

여기서 말하는 군중적 의료 운동, 우리 인민공사의 무료 의료와 비슷하지만, 당시는 신도(神道)에 불과했다. 하지만 당시는 신도밖에 방법이 없으니 수궁이 가는 대목이다. 길에서 음식점에서 밥을 먹고 돈을 받지 않은 대목이 가장 재미있는데, 우리 인민공사의 공공식당의 효시인 셈이다. 약 1700년 전의 시간차가 있지만, 빈농과 중하농의 생산 및 소비와 인민들의 심정은 아무런 차이도 없이 예외없이 극도로 가난했다. 다른 점이라면 지금은 생산력이 훨씬 진보했다는 것이랄까. 역대 늘 크고 작은 규모의 수많은 농민 혁명 투쟁이 있었고, 그 성격은 물론 지금 마르크스주의 혁명 운동과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르다. 하지만 공통점이 있으니 바로, 극단적으로 빈곤한 광대한 농민 계층이 평등과 자유 그리고 빈곤을 벗어난 풍족한 생활을 꿈꾸었다는 점이다. 이는 자산계급 급진파의 성격과 함께 원시 사회주의 성격을 갖는데, 주로 호조(互助) 관계에서 나타난다. 또 봉건적 성격도 있는데, 이는 소농의 사유제와 천공장군(天公將軍) 장각(張角)부터 천왕(天王) 홍수전(洪秀全)까지의 상층 구조의 봉건제에서 나타난다. 위와 같은 성격 분석은 오류가 있을 수도 있다. 하지만 그들의 지도자(張角, 張魯, 黃巢, 方腊, 劉福通, 韓林兒, 李自成, 朱元璋, 洪秀全 등)가 아닌 빈곤 대중에게는 비자각적인 원시 사회주의적 색채가 뚜렷했다. 지금 진행되는 인민공사 운동은 우리 나라의 역사에 근원이 있다.⁴⁾

농민의 원시 사회주의와 인민공사화의 역사적 연원 관계를 강조하는 이러한 평가는, 마오쩌둥과 중국 공산당이 40년대 한 때 날카롭게 비판했던 농업 사회주의와 민중주의가 당시 사실상 공

4) 泽, 발간에 붙인 비판, 『泽文稿, 第, 中央出版, 199년6262쪽 참고

정되면서 대대적으로 칭송되었다는 사실을 보여준다. 이는 또한 농업합작화 운동에서 인민공사화 운동까지 핵심적 역할을 했던 원동력이 과학적 사회주의라기 보다는 일종의 ‘원시 사회주의’였다는 점을 드러낸다.

대약진 운동과 인민공사화 운동 속에서 원시 사회주의가 만연했고 주관주의, 의지유일론, 강제명령이 활개를 치면서 심각한 결과를 초래했다. 소생산이 광범위하게 존재하는 토대 위에서 그대로 생산 자료의 보편적인 공유제로 넘어가는 것은 생산력의 진정한 해방을 가져오기는커녕 오히려 농민의 기본 생산 자료 나아가 인신 자유에 대한 보편적인 박탈을 초래했던 것이다. 공산품, 과장허풍, 오류지휘풍, 강제명령풍, 특수화풍 등이 기존의 생산력을 심각하게 파괴하였다. 실사구시를 견지하면서 현실에 입각해 위와 같은 ‘오풍(五風)’에 저항하는 군중과 간부는 오히려 ‘자산계급의 백기’를 짊어지고 사정없는 공격을 받았다.

더불어 당시 중국과 소련의 당 및 국가 관계가 보이지 않는 경쟁에서 공개적인 대립으로 치달으면서, 생산 자료 및 생산물에 대한 일부 지배권을 요구하는 ‘가정 단위 도급 생산’ 농민을 포함해, 대약진이나 인민공사에 대해 다른 의견을 갖는 모든 이들을 자본주의를 부활시키려는 행위나 수정주의 경향으로 간주하였다. 계급 투쟁과 당내 투쟁의 방법으로 사상, 정치 및 실제 업무에서 나타나는 이견을 해결하면서 다른 의견을 억누르게 되자 사회 갈등과 당내 갈등이 격화되었고, 이것이 다시 계급투쟁의 확대와 절대화를 위한 구실이나 근거가 되었다.

중소 대립과 계급 투쟁의 확대 및 절대화는 역사 연구와 교육에도 큰 충격을 주었다. 1957년 반우파투쟁 속에서 마오쩌둥은 대학 안에 자산계급 지식인이 가장 많은 두 곳이 있는데, 하나는 중문과이고 다른 하나는 사학과라고 말했다. 1958년 3월 마오쩌둥은 쓰촨(四川) 청두(成都)에서 열린 중국공산당 중앙정치국 확대회의에서 미신 타파와 사상 해방으로 교수나 자산계급 지식인을 두려워하지 말고 압도해야 한다고 호소하였다. 각 대학에서 시끌벌쩍한 ‘교육 혁명’과 ‘역사학 혁명’이 일어났고, 사료를 중요시하는 ‘사료유일론’과 고증을 중요시하는 ‘자산계급 고증학’을 앞다투어 비판하면서 왕조의 흥망과 교체를 중요시하는 것은 ‘왕조 체제’를 옹호하기 위한 것이라고 지적하였다. 또한 농민봉기가 황권주의 경향이 있다고 보는 것, 즉 탐관오리를 반대했을 뿐 황제를 반대한 것은 아니라고 보는 것은 농민혁명을 멸시하는 생각이라고 지적했다. ‘부르주아 타도, 프롤레타리아 만세(興無滅資)’의 물결 속에서 ‘과거에 매몰되었다’는 비판이나 ‘역사에 새 이론을 불어넣자’는 호소가 가장 혁명적인 구호가 되면서, 농민 전쟁을 정통으로 삼는 새로운 중국 통사 편찬이 가장 시급한 과제가 되었다.

판원란은 1961년 ‘화약 없는 대포는 안 된다’며 역사학이 조사 연구를 진지하게 진행해야 한다고 요청했다. 쥬보찬(翦伯贊)은 왕후장상 등 착취계급만 보면 무조건 욕하거나 사서에 ‘도적(盜)’이나 ‘비적(匪)’이라고 적히면 무조건 받드는, 단순화된 작품에 반대하면서 계급관점과 역사주의의 결합을 요청하였다. 그는 “계급관점만 남기고 역사주의를 잊으면 일반적으로 모든 것을 부정하기 쉽고, 역사주의만 가지고 계급관점을 잊으면 일방적으로 모든 것을 긍정해버리기 쉽다. 양자를 결합할 때 비로소 역사 사실을 총체적으로 공정하게 다룰 수 있다.”⁵⁾고 하였다. 이러한 역사학계의 저항 결과는 역사학자에 대한 맹렬한 비판뿐이었다. 1966년 6월 3일 『인민일보』는 「자산계급이 차지한 사학의 진지를 되찾자」라는 사설을 통해 이러한 역사학자를 ‘자산계급의 대

5) 翦, 「目前学界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翦学集』, 人民出版社, 198년, 9쪽 참고

표자'로 맹비난하면서, 그들은 “역사학을 자신의 진지로 삼고 사회주의와 공산당에 반대하고 있으며.....자본주의의 부활을 위한 여론 준비를 하고 있다.”고 비판하였다. 사설은 특히 “그들은 수천 년의 문명사가 계급 투쟁의 역사라는 사실을 완고하게 부정하고 있다. 그들은 소위 ‘역사주의’ 곧 유심론적 역사관으로 마르크스 레닌주의의 계급 투쟁 학설을 반대하고 왜곡하고 있다. 그들은 인민 군중이 세계 역사를 창조하는 동력임을 완고하게 부정하면서, 노동 인민과 농민 전쟁을 완전히 깔보았다.”고 지적했다. 정상적인 역사 연구와 역사 교육이 이로써 완전히 중단되고, 이를 대신한 것은 논리 없는 강변, 전도된 시비, 흑백의 혼란 그리고 무조건 머리 숫자로 사람을 몰아붙이는 ‘역사학 대비판’이었고, 고도로 정치화되어 정치 권력 투쟁과 긴밀하게 협조하는 음모사학(陰謀史學)이었다.

이러한 역사적 시각으로 역사의 중국은 계급투쟁이 끊이지 않은 중국이자 농민 전쟁과 농민 혁명이 역사 발전을 추동한 중국으로 해석되었고, 동아시아 세계에 대한 해석도 마찬가지였다.

3. 경제 건설 중심의 역사 시각 전환기 중국과 동아시아 세계

‘문화대혁명’을 마감하면서 중국공산당 제11기 삼중전회는 ‘사상 해방과 실사구시’라는 사상 영역을 확립하였다. 이에 따라 계급 투쟁을 강령으로 하는 노선을 경제 건설을 중심으로 하는 노선으로 대체하면서, 경제 발전이 중국인민에게 보편적인 공감대를 갖는 총노선이 되었다. 개혁 개방이 앞으로 나아가려는 중국 앞에 놓인 문을 열어젖히자, 사람들은 새로운 역사적 시각으로 중국과 동아시아 세계를 바라보게 되었다.

실천이 진리를 검증하는 유일한 기준인가를 둘러싼 대토론이 벌어지고 사상 및 정치 분야의 정상 회복 과정이 진행되었다. 역사학계는 오랫동안 중국 대지를 유린해온 범정치주의와 범도덕주의에 대해, 그리고 ‘부르주아 타도, 프롤레타리아 만세’의 기치 하의 반시장화, 반공업화, 반도시화, 반지식화와 같은 반현대화 사조에 대해 심각하게 파헤치고 비판하였다. 역사 발전 동력에 관한 토론을 통해, 역사학자들은 이 문제를 둘러싼 혼란을 분석하고 명료한 결론을 도출했다. 그것은 바로 생산 투쟁, 생산 활동, 생산력 발전이 역사 변혁의 궁극적 원인이고, 계급의 존재와 각 계급의 지위 및 본질은 특정 생산력과 생산방식과 결합해 고찰해야만 하며, 역사적으로 진정한 진보적 역량이란 선진 사회의 생산력과 선진 생산 방식을 대표하는 계급이자 집단이라는 것이었다. 농민의 평균주의적 요구와 농업 사회주의 이상 그리고 농민 운동과 농민 전쟁은 역사적 합리성을 가지지만, 무한도로 과장해서는 안 되며 더욱이 무원칙적으로 신격화해서는 안 된다. 특히 폭력의 역할을 신화화해서는 안 되는데, 폭력은 기껏해야 산파의 역할을 할 뿐, 임신부가 없으면, 아기를 배태하지 않으면, 태아가 모체에서 충분히 자라지 않으면, 아무리 훌륭한 산파라도 건강한 아기를 탄생시킬 수는 없다는 점이 지적되었다. 이러한 역사학의 정상 회복, 즉 제자리 찾기 과정에서 사람들은 역사의 진실을 자기 마음대로 경솔하게 다루어서는 절대 안 된다는 사실을 절실하게 인식하게 되었다. 이는 전반적인 역사 연구 분야에 실증을 중시하는 학풍을 재구축하는데 큰 힘이 되었다.

거국적으로 일치 단결하여 경제를 건설하던 당시, 중국의 국정을 총체적으로 정확하게 인식하

고 중국 나름의 특징을 가진 발전 방향을 모색하는 측면에서 역사학은 중국의 현실에 맞는 이론과 사실을 뒷받침하였다. 역사학자들은 중국의 2천여 년의 소농 경제의 존재와 변화라는 사실에 근거하여 소생산자가 매일 매시각 자발적으로 자본주의를 만든다는 결론은 중국 실정에 부합하지 않고 가정 전면 청부제가 인민공사제에 비해 중국 농촌 생산력 발전 수준에 더 적합하다는 사실을 설명했다. 또한 농민 문제의 진정한 해결은 공업화, 시장화, 산업화 및 농업 생산력의 커다란 진보에 달려있다고 설명했다. 근대 이후 중국 근대화 과정의 우여곡절은 국가 자본과 개인 자본이 각자 상호 대체 불가능한 기능을 가지고 있음을 설명해준다. 한 때 ‘역사학의 위기’를 위치는 목소리가 드높았지만, 깊이 들여다보면 과거처럼 소위 몇 가지 ‘규칙’과 ‘법칙’을 고수해서는 중국의 역사적 실재를 해석할 수 없기 때문이었다. 중국 고대 노예제와 봉건제의 분기점 문제에 대한 논쟁이 끊이지 않는 것은 그 자체가 가짜 문제이기 때문일 가능성이 크다. 중국 영주 봉건제, 지주 봉건제, 아시아 생산양식 등의 논쟁 역시 중국 역사 변천을 유럽 역사 발전의 틀에 억지로 끼워맞추려했기 때문이다. 유럽의 역사 발전의 자신의 특징을 가진 것처럼, 중국의 역사 발전도 스스로의 특징이 있다. 중국의 실제에서 출발하여 다른 나라의 성공과 실패의 경험을 거울로 삼을 때, 스스로 건강하게 발전하는 올바른 길로 중국을 이끌 수 있다.

획일화된 공유제와 계획 경제 체제의 껍질을 깨기 위해 중국의 산업화, 시장화, 도시화, 세계화가 총체적으로 진행되었으며, 역사학은 전위적이며 진취적인 다양한 탐색을 모색했다. 이 분야에서 가장 큰 공헌을 한 것은 중국 경제사 특히 중국 근현대 경제사 연구였다. 국내 시장사, 국제 시장사, 지역 시장사 그리고 철도사, 도로사, 항공사, 수운사, 우전사 등의 교통사, 화폐사, 환율사, 신용대출사, 증권사, 선물사, 보험사 등의 금융사, 노동집약형, 자본에너지소모형, 자본집약형, 지식기술집약형 등 산업사, 경제구조 변천사, 경제제도사, 경제기제 변천사, 경제 발전에 대한 비경제적 요인의 영향사 그리고 분야 경제사, 지역 경제사, 민족 경제사, 산림초원 경제사, 해양 경제사 등, 모든 분야의 연구가 활발하게 전개되었다. 또한 그 성과는 현대화와 세계화 과정에서 자본, 노동, 지능, 기술, 정보, 자원의 급속한 흐름에 내재된 객관적 규칙을 깊이있게 파악하고 중국의 올바른 발전 전략을 확립하기 위해, 폭 넓은 시야와 사고로 뒷받침하였다.

당시 역사 연구 성과는 경제사 분야에만 국한되지 않았다. 사람들이 경제의 고속 성장에만 관심을 기울일 때 역사학은 과거의 역사적 경험과 다른 나라의 발전 교훈을 근거로 중국 문화사와 세계 문화사 연구를 일찍이 전개하였다. 이는 경제 체제 개혁과 경제 발전이 사람들의 생각 변화, 사상 해방과 불가분의 관계가 있기 때문에 근대화의 실현이 스스로의 근대성을 길러야 가능하기 때문이기도 하지만, 그보다는 산업화, 시장화, 도시화, 세계화 과정에서 문화에 일단 공백이 생기면 사람들이 너무나 쉽게 가치관, 도덕, 행위규범 등을 상실하고 권력이 부패하고 이익 추구가 균형과 질서와 규범의 상실로 이어져, 배금주의, 향락주의, 방임주의가 사람들을 권력의 노예, 돈의 노예, 물욕의 노예로 만들기 때문이다. 역사학계는 80년대 전반부터 엘리트 문화, 대중 문화, 관념 문화, 물화된 문화, 제도화된 문화를 포함한 중국 전통 문화와 세계 문화를 총체적으로 연구하여 많은 문화사 연구 저서를 내놓았다. 여기에는 각 시대의 문화사, 지역 문화사, 민족 문화사, 각 전문 영역 문화사 등에 관한 새로운 성과가 포함되며, 문화를 형성하고 발전하는데 특히 정신 문화 구축에 필요한 풍부한 전통 문화 및 세계 문화 자산을 형성하였다.

문화사에 이어 중국 사회사 연구가 되살아났다. 경제 발전과 관련된 것은 사회 구조, 사회 관계, 사회 생활의 큰 변화이고, 사회 동원, 사회 통제, 사회 협력 방식의 근본적인 전환이다. 역사

학자는 스스로의 연구를 통해 산업화, 시장화, 도시화 및 세계화 과정에서 도시와 농촌의 불균형, 동서부 지역의 불균형, 산업 불균형, 사회 계층의 불균형 등으로 인한 일련의 중요한 사회 문제에 더 시급히 신경써야 한다는 문제제기를 시작했다. 이는 인구 증가, 인구의 대규모 이동, 노령화, 일자리, 한자녀 문제 등 중국의 독특한 문제들로서, 경제 발전과 경제 체제 개혁이 사회 발전과 사회 체제 개혁과 함께 진행되어야 한다는 문제제기였다. 인구사, 이민사, 유민사의 연구가 인구 증가와 인구 이동 문제에 대한 인식을 심화시켰고, 가족사, 가정사, 혼인사, 종성사(宗姓史), 족보사부터 민족사, 종족사 등의 연구는 혈연관계에 대한 인식을 심화시켰다. 정당사, 사회 단체사, 상회사(商會史), 동업조합사, 학파사, 비밀결사조직사 등의 연구는 단체 관계에 대한 인식을 심화시켰고, 도시사, 농촌사, 지역사회사, 지방사 연구는 지연 관계에 대한 인식을 심화시켰으며, 사회 계급, 계층 각종 이익 집단, 생산자 관리자 정책결정권자 분류, 각 회사 부서별 이익 관계 연구 등은 사회 이해 관계 인식을 심화시켰다. 사회 구조사, 사회 생활사, 사회 성별사, 사회 신분 직업사, 사회 조직사, 사회 동원과 사회 통제 변천사 연구는 또한 역사적 격변을 겪은 중국 사회에 대한 총체적인 인식과 파악 그리고 올바른 정책 결정에 중요한 역할을 했다.

동아시아 지역 역사와 세계 역사 연구 역시 이 당시 큰 진전이 이루어졌다. 사람들은 아시아 ‘네 마리의 용’과 ‘다섯 마리의 호랑이’가 발전한 과정과 경험을 알고 싶었고, 세계 각국의 근대화 과정과 공통점을 알고 싶어했으며, 동아시아와 세계의 여러 문명의 진실된 상황을 이해하고자 원했다. 이는 역사학이 공식화, 단순화, 선입견, 실용주의 선형주의, 암시와 건강부회 그리고 권력에 빌붙기 등과 같은 기존의 방식을 넘어서 철학, 경제학, 인류학, 사회학, 정치학 등과 대화하고 학제간 연구를 진행하도록 자극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정량 연구, 비교 연구, 구조 분석, 의미 분석, 심리 분석 등 다양한 새로운 연구 방법론을 적극적으로 시도하면서, 역사학은 진실을 이해하고 올바른 인식을 얻기 위해 노력하였다.

4. 인성과 인간의 총체적 성장에 주목하기 - 중국 및 동아시아 인식 심화

21세기에 접어들면서 중화 민족의 역사 발전은 새로운 시대로 진입하였다. 중화 문명은 현재 기존의 농경 문명, 반공업문명에서 현대 산업 문명과 정보 문명으로 철저히 이행하고 있다. 또한 중화 민족은 최종적으로 백년의 굴욕에 이별을 고하고 위대한 민족 부흥을 진정으로 실현하는 동시에 일련의 심각한 도전에 직면했다. 이는 산업 구조의 심각한 불균형, 경제와 사회 발전의 불균형, 경제와 문화의 불균형 등과 모든 인류가 공동으로 직면한 금융 위기, 농업 위기, 에너지 위기, 자원 특히 물부족, 환경 위기 등의 도전을 말한다. 경제 발전이 이익의 극대화를 추구하면서, 문화가 균형있게 발전하지 못하면서, 물욕과 사리사욕이 무한하게 팽창하고 의리나 정의는 설 자리를 잃고 있다. 과도한 이익 추구는 또한 권력을 심각하게 부패시켰고, 대규모 권력 결탁, 이권이 달린 분야의 월권 행위, 이에 수반하는 이권이 없는 분야의 권한 부재 그리고 사회 양극화 등의 추세를 막을 수가 없게 되었다.

위와 같은 도전에 직면하여 사람들은 인간의 총체적인 성장을 궁극적인 목표로 하는 새로운 문명관으로 스스로를 재인식하면서 미래를 사고해야 한다.

인간의 총체적 성장은 인간의 물질 생활, 정신 생활, 정치 생활, 사회 생활을 총체적으로 틀어 쥐는 것이다. 지식 전수, 축적, 업그레이드, 창조는 경제 발전에도 필요하지만, 그보다는 사람들의 정치 생활, 사회 생활, 문화 생활이 필요로 하는 것이다. 사람은 지성 생활과 지적 세계 외에 정서 생활과 감성 세계, 의지 생활과 의지 세계가 있으며, 진리와 선함 그리고 아름다움에 대한 추구는 하나로 통합되어야 한다.

사람의 총체적인 성장을 궁극 목표로 할 때, 산업화와 자연 보호를 동시에 추구해야 하고, 도시화와 인간화가 결합되고 시장화와 사회적 형평성 추구가 결합되어야 하며, 세계화와 민족 국가의 주체성이 결합되어야 한다. 시장 경제 성장의 속도에 정치의 민주화와 사회적 불평등 해소 및 문화 발전이 긴밀하게 발맞추어야 하며, 공업과 농업, 도시와 농촌, 각 민족 사이의 관계가 진정으로 조화를 이루어야 한다. 인간의 총체적인 성장은 하나의 역사적 개념으로, 그 내재적 의미는 사회가 끊임없이 발전하는 데 발맞추어 함께 커나가고 고양되는 존재를 말한다. 이러한 역사적 시각으로 중국과 동아시아 세계를 재인식하려면 초점을 맞추는 대상을 가장 보편적인 민중으로, 인간 자체에 대한 인식으로 눈을 돌려야 한다. 보통 사람의 일상 생활, 일상적 사고 그리고 보통 사람의 풍습과 습관, 종교와 신앙, 사회 관계 등을 통해 인간의 본질이 과연 무엇이고 인간의 존재 가치는 무엇이며 어디서 와서 어디로 가며 궁극적으로 어떻게 생산하고 살아가는지 이해해야 한다. 중국인과 동아시아 각국 국민들이 보유하고 계승하면서 변화시키고 창조시킨 것들을 이해해야 하고, 그들이 어떠한 여건 속에서 어떤 길을 걸어서 그것들을 갖게 되고 이어 받고 변화시켰는지 알아야 한다. 이를 통해 세계 각국과 각 민족이 어떻게 자신의 가치를 실현하고 사람들은 어떻게 지금의 현실을 극복하고 미래를 지향하는 지 분명하게 알게 된다.

이러한 새로운 역사적 시각은 또 하나의 중요한 특징을 갖는데, 그것은 사람들의 지적 생활, 정서 생활, 의지 생활 또는 지성 세계, 감성 세계, 의지 세계를 총체적으로 고찰 범위에 집어 넣는다는 점이다.

특히 주목할 부분은 지식사와 관념사 연구로서, 사람들의 지식의 축적과 전수, 지식 구조와 학문 구조의 변화, 사람들의 다양한 관념, 사고방식과 관념체계의 형성과 변화에 관한 연구이다. 이 연구는 이러한 지식과 관념이 일단 형성되면 사회적 실천 속에서 어느 정도나 사람들의 사고와 행동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지 이해하는데 도움이 되며, 기존의 지식, 관념 및 사상 학술 자료를 적극적으로 계승하고 활용하는데 필요하다. 또한 이미 시대에 뒤떨어지거나 독단적인 심지어 심각한 오류를 가진 지식이나 관념에서 스스로 벗어나 새로운 지식 구조와 관념 체계를 형성하도록 돕는다.

마찬가지로 주목할 만한 부분은 인간의 정서 생활과 감성 세계에 관한 연구이다. 사람은 지식과 관념의 전승, 축적, 변화 외에도 극히 풍부하고 다양한 정서 생활, 감성 세계, 심미 생활, 심미 세계가 있는데 그것은 바로 인간의 미학(美學) 세계이다. 이는 인간의 지성 세계와 관련이 있지만 동시에 구별되어, 양자의 운행 법칙은 완전히 다르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동안 인간의 미학적 성격은 거의 인정되지 못 했다. 이는 가족 간의 사랑, 남녀 간의 사랑, 우정, 향토심, 희로애락 등이며, 사람은 자연의 아름다움과 그림, 음악, 춤, 연극 등 사람이 창조한 아름다움 속에서 배우고 즐긴다. 이러한 모든 것들은 모두 하나씩 지식화 범주에 끼워 맞추어 왔지만, 이제 문학은 드디어 인간에 대한 학문으로 인정받게 되었고 예술은 드디어 정치에 이용되기를 그치고 인성과 맞닿게 되었다. 문학사, 예술사 연구는 드디어 지식학 체계를 넘어서, 아직까지 대부분 무

의식 상태에 머물러 있는 인간의 시성(詩性)을 개발하고 키워 정서와 미의 세계로 사람들을 이끌고 있다.

인간의 의지 생활과 의지 세계는 자신의 육체에 남아 있는 동물적 본성을 억누르고 변화시키는 것으로, 사람들이 야만적 상태에서 한걸음씩 문명적 상태로 나아가도록 이끈다. 인간 의지, 인간 심리, 아름다운 미래에 대한 추구, 경외심, 선량함에 대한 염원, 사랑, 동점심, 연민 등은 과거 역사 연구의 시야에 들어온 적이 거의 없었지만, 이제 점점 더 많은 역사학의 관심을 모으고 있다. 종교사, 신앙사, 습관사, 심리사 연구 외에도 가치 추구, 가치관 형성과 전파 및 변화 그리고 이와 관련된 이데올로기의 구성과 변천, 동물을 넘어선 인간의 독특한 인성, 민족성과 민족 정신 등의 문제가 모두 주목받고 있다.

이러한 모든 것들을 통해 사람들은 중국에 대해, 동아시아 세계에 대해, 나아가 모든 인류에 대해 새로운 인식을 얻는다. 이 층위에서 사람들은 서로의 공통점과 차이를 발견하기 쉽고 서로 의사소통과 정체성 인식이 용이하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새로운 문명관이 시사하는 새로운 역사적 시각을 가진 역사학은, 중국과 동아시아 나아가 세계 전체를 발전하도록 이끌 것이며, 동아시아 공동 시장의 형성과 동아시아의 통합 추진에도 더욱 긍정적인 역할을 할 것이다.

近60年来、様々な歴史的視角下にある中国と東アジア世界

姜義華（復旦大）

〈目 次〉

1. 全面的にソ連から学び、新中国の建設とそれを強固にするために奮闘した段階
2. 中ソ対立や階級斗争の扩大化絶対化の下での历史視角
3. 经济建设を中心とする时代の历史視角の转换下での中国及び東アジア 世界
4. 人間性や人の总体的发展から切り込んだ、中国と東アジア 世界に対する 认识の深化

歴史的視角は、その時序性、总体性、实证性によって、代替不可能な特殊な立場にあり、考察対象をより深く认识するための手助けをする。しかし、社会の大きな移り変わりや、生産様式、生活様式、思维方法の重大な変化を原因として、歴史的視角そのものはその前後で非常に异なった様相を呈することとなる。たとえ同時代や、同じ环境下にあったとしても、人が异なればそれぞれの歴史的視角には、やはりしばしば大きなへだたりをとまなうも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に、同一対象に対する观察结果であったとしてもさまざまな解释が生じることとなるのである。中华人民共和国の成立より60年、人々の历史を观察する視角にはいくたびかの重要な转换があり、中国や東アジア世界に対する观察结果に多くの共通点が見られることもあれば、極めて明らかな相違を呈することもあったのである。

中华人民共和国の成立以来、中国史学はおおよそ四段階を経てきた。つまり、全面的にソ連から学び、新中国の建設とそれを強固とするために奮闘した段階、中ソ対立や階級斗争の扩大化絶対化の段階、中国共产党が活动の重心を经济建设に转换した段階、人としての总体的な发展を全体目标とした段階の四段階である。

1. 全面的にソ連から学び、新中国の建設とそれを強固にするために奮闘した段階

新中国建設の初めにあたって、历史研究と历史教育に国家行为という重要な役割を与え、历史学を新中国の建設とその強化に迈进するための重要战线とみなしたのである。これは、成立したばかりの新生の中华人民共和国にちょうど适应した統一イデオロギーによる需要、唯心史観が长期にわたり思想文化の領域に与えてきた広范な影响を一扫するためという需要、また优秀な历史遗产を总括し自らに取り込むことで、新中国の建設と強化に奉仕させるといふ、これらの需要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

全面的にソ連から学ぶというのは、新中国成立後に打ち出されたひとつの重要なスローガンである。史学の領域におけるその徹底化は、ソ連の史学理論と歴史観念の中国史学に対する影響をより一層増大させた。

新中国が成立して間もなく、全国の中共幹部と一般大衆に向けて、ソ連を来源とする社会发展史教育があまねく展開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1950年6月6日、毛澤東は中国共产党第七期三中全会における講話で次のように提起した。「知識人に対して、各種の訓練班を開設し、そして軍政大学や革命大学を設置して、そこで彼等を使用し、同時に彼等に対する教育と改造を進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また彼等に社会发展史や歴史唯物論などの諸課程を学ばせる必要もある。たとえばの唯心論者であっても、我々には彼等に反対させない方法があるのだ」¹⁾。ここにいう教育とは、原始社会、奴隷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資本主義社会、社会主義・共産主義社会という五段階の社会形態を順次展開させていくという観念を打ち立て、これが人類発展の普遍的法則なのだということを確信し、そして中国古代とはその原始社会、奴隷制社会、封建制社会の段階にある中国のことであり、近代とは半植民地半封建制の段階にある中国のこと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このような内容をその核心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東アジア世界に対しても、やはりこのモデルを用いて区分したのである。

1953年、毛澤東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中共中央）は、党の過渡期における総路線、総任務が、この非常に長い期間内において、国家の工業化と、個人経営の農業、手工業の、さらには資本主義的工商业の社会主義的改造を大体において実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定めた。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は「1953—1954年の幹部理論教育に関する指示」を発表し、その中で次のように記した。「全党が经济建设に入った段階の需要に対応するために、現在規定している全党の幹部理論学習の高級組と中級組は、1953年7月から1954年12月までの一年半の期間内において、『ソ連共産党史』（『聯共（布）党史』）の第9章から第12章までと、レーニン、スターリンが社会主義的经济建设について論じた著作とを全員が学習する。この学習計画においては次のことが要求される。すなわち、ソ連が国家の工業化や農業の共同化（合作化）を実現し、また社会主義建設を完成させ得た基本法則を全党の主要幹部たちが体系的に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そして我国が经济建设の途上において、我国の具体的条件に基づいてこれらソ連の経験を正確に利用するのに簡便ならしめることである」²⁾。中共中央機関刊行の雑誌『学習』はこのために特別欄を設け、補導論文、資料、名詞解釋、問題と解答、学習心得を掲載した。学習者は一年学んだ後に試験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た雑誌に発表することのできる論文を提出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った。また、各级の幹部には1955年9月からさらに第9章から第12章を学習した後『ソ連共産党史簡明教程』（『聯共（布）歴史簡明教程』）の第1から第8章までの学習も規定された。一冊の外国の党史を内容とする教科書をこれほどまでに仔細に研究学習することは、全面的にソ連を学ぶということが、当時における中国の国策決定とどれほど密接な関係にあるかを十分に明らかに表している。

社会的リーダーとしての知識人エリートから、この様な考えに悖反する様々な思想意識を一扫するために、中共中央と毛澤東は特に「反面教員」「反面教材」を選定し、彼らに批判を加えることで、この教育をより強化深化させた。ここにおいて、映画『武訓伝』に対する批判、知識人の思想改造、胡適思想への批判、梁漱溟思想への批判、胡風思想への批判が起り、さらには1957年の反右派斗争中において歴史学界が集中的に行った右派歴史家に反対する斗争が発生したのである。

1)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击」『建国以来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98—399頁。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編』、第4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頁、参照。

映画『武訓伝』及びその他の武訓に関する著作や論文への批判は、毛澤東自らの発動と指導によるものであった。毛澤東は1951年5月20日付『人民日報』の社論「应当重視映画『武訓伝』的讨论」において、この批判の意義は新しい歴史観の支配的地位の確立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そして毛澤東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多くの作家の立場からすると、歴史の発展とは、新しい物事で古い事物を取替えることではなく、種々の努力で古い事物を保存し、それを死亡から逃れさせることであり、階級斗争によって打倒さるべ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を打倒することでもなく、武訓にあるような、圧迫された人民による階級斗争を否定することであり、反動的封建統治者に投降することである。……我々の作家たちはまた、1840年のアヘン戦争以来の百数十年に、古い社会経済形态及び上部構造（政治、文化など）に対して斗ってきた、新しい社会経済形态や新しい階級の力、そして新しい人と思想が中国で生まれてきたことを研究せずに、いかなる物事が賞賛もしくは褒めたたえ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いかなる物事が賞賛もしくは褒めたたえられてはならないのか、いかなる物事が反対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を決めつけ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だ。

1954年から1955年にかけて展開した胡適思想への批判運動は、学术界全体を席卷した。中共中央宣伝部は毛澤東の意を受けてこの批判運動を発動した。当時議定された計画によれば、歴史家郭沫若が指導者となり、歴史家侯外廬が胡適の政治思想批判に責任を負い、范文瀾が胡適の歴史観批判に責任を負い、尹達が彼の歴史学と古典文学研究活動における立場や役割を評価したり考証したりすることに責任を負っていた。胡適思想批判と同時に展開したものに、また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風思想批判があり、やはりすべて歴史観に触れているのである。1957年の反右派斗争中には、すばらしい功績のある歴史家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と見做され、批判斗争の対象にされてしまった。これらの「反面教员」に対する批判を通して、新しい歴史視角と相容れない思想は废弃排斥され、少なくとも再び公然と宣揚さ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たのであり、統一された新しい歴史視角が極めて強制的に確立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る。

最も目立った成果としては、中国マルクス主義史学家の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呂振羽、剪伯贊、胡繩らの通史や断代史、さらには专门的研究書が各大学の歴史学部の讲坛をしっかりと占領してしまっただけでなく、中学高校（中学）における歴史教科書もすべて新たに編纂され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ある。史学界を取巻く中国古代史の時代区分問題、中国古代の土地制度問題、中国封建制社会の农民战争問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問題、汉民族形成問題は、活発な論争を展開し、歴史学中の「五本の金花（五朵金花）」と称された。古代の時代区分と资本主义萌芽に関する論争は、マルクス主義の基本原則として見做される五段階の社会経済构造からなる発展史的学説を、いかに中国史の発展と展開に応用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めぐる行われたのである。古代の土地制度、农民战争それに汉民族の形成問題が論及したのも、やはりマルクスの土地問題理論やエンゲルスの农民战争理論、スターリンの民族問題理論を中国の实际问题の分析にいかに応用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これらの問題をめぐる論争は、もとより中国の歴史的發展の特徴に関する認識を多方面から深化させたのであるが、しかしより重要なのは、やはり中国史に対する新たな解釋を通して、中国も他のあらゆる国家と同様に、歴史的發展の一般法則から逃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証明したことにあるのである。

2. 中ソ対立や階級闘争の拡大化絶対化の下での歴史視角

土地改革の後、中国の農村は普遍的な中農化を実現し、農業生産も急速に回復し、さらなる発展を成し遂げた。当時、農業生産の発展過程に、土地、資金、労働力などの生産要素にわずかな流動が生じ、それらが拡大して農村中に新たな二極化が出現した。小生産（個人経営による生産）が常時普遍的に、大量に、そして自発的に資本主義を生み出しており、資本主義復活の温床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レーニンの論断を根据に、中国の農村政策は急速に変化し、徹底的な改造が行われ、農民や手工業者による個人経済（个体経済）も消滅させられてしまった。同時に、過渡期というのは、成長過程にある共産主義と衰亡過程にある資本主義とが生きるか死ぬかの闘争をしている時期のことであるというレーニンの論断、特に資産階級は恨み十倍、狂気百倍の意気込みで彼等が失った楽園を奪い返そうとするという論断に基づいて、全国を舞台に大規模な大衆運動を起こし、あらゆる私的な資本主義企業を内包するもの、いわゆる「不法資本家」に対して激しい闘争を展開したのであり、さらに都市政策もまたこれによって急速に轉換し、徹底的な改造を実施したり、民族資本主義の工商業を消滅させたりすることで、比較的短期間のうちに資本主義を中国から絶滅させ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中国共産党と毛澤東本人の崇高なる威信と、高度に中央集権化された行政権力による普遍的な全国支配を据りどころにして、戦争時代にはすでに熟達していた大衆動員や、大規模な大衆運動の方法を、農業の共同化（合作化）や、資本主義的工商業の全職種における国家と民間資本の共同経営化（公私合営）に応用したのであり、また社会生産力にまだ重大な根本的変化はなく、農村も基本的にはまだ手工業や家畜の力に頼っている段階で、たった二三年で、中国は個人経営の農業（个体農業）、個人経営の手工業（个体手工業）及び私的資本主義的工商業に対する改造を完成させ、ほぼすべてを包括する大一統の計画経済体制を建設したのである。勝利の到来はこのように順調であり、人々を扇動し、大規模な大衆運動や游击の方法、或いは游击戦争の戦略戦術を経済建設に応用することで、制鉄運動（大煉鋼鐵）と食料生産（糧食高産）を中心とする大躍進運動と、最大限の大衆運動を可能とする人民公社化運動を發動し、それによって中国工業化の加速的な実現と、農村における私有制の残滓の根絶を企図したのであった。

大躍進と人民公社化の高まりの中で、毛澤東は『三国志』張魯伝に、1958年12月7日と10日の二度長々とコメントを書き添え、農民の原始社会主義や二千年来の農民革命闘争を褒め称えた。12月7日の批評に、彼は次のように記した。

ここにいう大衆的医療運動は、我が人民公社の無料医療の样相に似ている。もっともその時のものは鬼神にまつわる説（神道）にすぎないが、その時はただそれを利用しやすかっただけだといってもよからう。道路脇の飯屋でご飯を食べてもお金は要らないというのも、非常におもしろく、我が人民公社の共同食堂（公共食堂）の嚆矢である。おおよそ1700年という時間が過ぎたが、貧農下層中農の生産や、消費、そして人々の心情は相変わらずほぼ同じで、常に一に経済的貧窮、二に文化的空白といった状況だが、異なるのは生産力が非常に進歩したことである。……代々常に大なり小なり様々な多くの農民革命闘争があり、その性質は当然現今のマルクス主義革命運動と根本的に相違する。ただ同じ点は、巨大な極貧農民階層が平等自由を夢み、貧困から拔出し、衣食に満ち足り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資産階級急進民主派の性質を帯びる一方、また原始社会主義の性質もあるのであって、それは協同関係（互助関係）に表れている。第三には、封建の性質も帯びており、小農的私有制と上部構造の封建制——天公將軍張角から天王洪秀全まで——に表れている。……上述の性質についての分析は、もしかしたら間違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

い。しかし无自觉の原始社会主義の様相を呈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の点は、貧しい人民についていったもので、彼らのリーダー（張角、張魯、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など）についてい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のは、確かである。現在の人民公社運動は、我が国の歴史にその来源を有するものなのである。

この批評は、農民の原始社会主義と人民公社化の歴史的渊源との関係を強調しており、毛澤東と中共中央が四十年代にかつて何度も激しく批判した農業社会主義、ナロードニキ主義（民粹主義）がこの時すでに肯定され、并せて高い稱賛を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それはまた、農業共同化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から人民公社化運動へ向けてその、キーポイントとなる役割をしており、科学社会主義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一種の「原始社会主義」といったほうがよい、ということも表している。

大躍進運動と人民公社化運動の中、原始社会主義が泛滥し、主観主義や主意主義（唯意志論）はそれに対する強制命令が泛滥して災いとなり、深刻な結果を招いた。小生産が广泛に存在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の、生産手段の普遍的な公有制への急速な移行は、ただ生産力の真の大解放を将来しなかったばかりでなく、かえって農民の基礎的生產手段を、ひいては人身の自由を广泛に剥奪するという結果を引き起こしたのである。すべてを共同所有とするやり方（共产風）、大げさなやり方（浮誇風）、めちゃくちゃな指揮（瞎指揮風）、強制命令（強迫命令）、特別扱い（特殊化風）が、既存の生産力を徹底的に破壊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实事求是を堅持し、現実的立場からこの「五風」に抵抗した大衆や幹部は、かえって「資産階級の白旗」を荷わされ、无情なる攻撃を受けるに到ったのである。

その時には、これに合わせて中ソの両党兩國の關係が安定的な競争から公開対立へと向かっていた時期であり、大躍進と人民公社に異議を持つすべての者たち、そこには農民たちの「包産到戸」——すなわち各農家が生産手段及び產品に対して一定の支配権を要求する者——も含まれているのだが、この様な者たちはみな資本主義の復活や、修正主義的傾向のある者として見なされたのである。そして階級斗争と党内斗争を利用することで、思想上政治上さらには实际活動上の分裂を解決し、あらゆる様々な意見を抑圧したのであるが、社会矛盾や党内矛盾の激化を招いたことで、それがまた反轉して階級斗争の擴大化や絶対化のための口実と根据とを提供したのである。

中ソ対立と階級斗争の擴大化絶対化によって、歴史研究や歴史教育は極めて大きな壁に衝突した。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において、毛澤東は大学で資産階級知識人が最も多いのは、ひとつは中文系であり、もうひとつは歴史系であると言った。また1958年3月、毛澤東は四川成都にて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で、迷信を突破すること、思想を解放すること、教授を恐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こと、資産階級知識人に恐怖するのではなく、圧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呼びかけた。そして、各大学は盛大な「教育改革」「史学革命」を巻き起し、史料を重視する者を「唯史料論」者として、考証的方法を重視する者を「資産階級考証学」者として批判し、王朝の盛衰交替を重視する者を「王朝体系」を擁護する者として、農民起義には皇权主義の傾向があつて貪官に反対はするが皇帝には反抗しないものだとの認識を有する者を、農民革命を侮蔑している者として糾弾した。「興无灭資」の名目の下、「厚古薄今」「以論帶史」は最も革命的スローガンとなり、農民戦争を中心とする新しい中国通史を編纂することが、最も急務とされたのである。

范文瀾は1961年に「大言壮語に反対する」（反对放空炮）を提唱し、歴史研究においてまじめに調査研究を行った。剪伯贊は帝王将相や榨取階級を見てはすぐに罵り、史書に記された「盜」「匪」を見てはすぐに褒めそやすという単純なやり方に反対し、階級的观点と歴史主義を結合さ

せ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もしただ階級的观点があるだけで、歴史主義を忘れてしまえば、容易に片面的に一切を否定してしまい、ただ歴史主義があるのみで階級的观点を忘却してしまえば、容易に片面的に一切を肯定することとなる。ただ二者を結合して、はじめて歴史事実に対して全面的公平的に論断す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である」と論じた³⁾。歴史学界におけるこのような抗争が招いたのは、この様な歴史家に対する猛烈な批判である。1966年6月3日付『人民日報』は社論「資産階級が独占する史学の陣地を夺取する（夺取資産階級霸占的史学陣地）」を掲載し、このような歴史家を「資産階級の代表人物」として痛烈に排斥し、「史学を彼らの反共産党、反社会主義の重要な陣地としようとしており、……資本主義復活のために輿論の準備を行っている」と論じた。社論は特に「数千年の文明史は階級斗争の歴史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彼らは頑なにも否定している。彼らはいわゆる「歴史主義」すなわち唯心史観を用いて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の階級斗争学説に反対し、またそれを改竄している。彼らは頑なに人民大众が世界の歴史を創造する動力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否定し、労働人民と農民戦争とを心底侮蔑している」と指弾した。正常な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はこれによって完全に頓挫し、それに代わって起こってきたのが、強弁や屁理屈を弄し、是非を転倒し、黒白を混淆し、もっぱら人を強圧する「大批判史学」であり、さらに高度な政治化と政治権力斗争とが緊密に歩調を合わせた、暗にほのめかすような史学（隠射史学）であり陰謀史学であった。

この歴史視角の下に、歴史の中の中国は解釈し直され、不断に階級斗争が継続する中国、農民戦争と農民革命が歴史的發展を推進した中国、というように見な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れは東アジア世界に対する解釈についても、また例外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3. 経済建設を中心とする時代の歴史視角の転換下での中国及び東アジア世界

「文化大革命」が終結し、中共第十一期三中全会は「思想解放、実施求是」の思想分野を打ち立て、階級斗争を綱領とする方針路線は、経済建設を中心とする方針路線に取って代われ、現代化が中国人民に普遍的に認識された総合主題となった。改革開放が中国の前向きな発展への門戸を開き、それが新しい歴史視角によって中国と東アジア世界を観察するように人々を促したのである。

実践は真理を検証する唯一の基準であるという大討論と思想上政治上の混乱収束の中にあって、歴史学界は長期間中国の大地を恣に虐げてきた泛政治主義、泛道徳主義、「興无災資」の名目下の反市場化、反工業化、反都市化、反知識化など種々の反現代化の思潮に対する重大な暴露や強力な批判を推進したのであった。歴史的發展の動力に関する討論を通して、歴史家たちはこの問題にまつわる混乱を一掃して、生産斗争、生産活動、生産力の発展こそが歴史変革の究極の要因であるとし、階級が存在や各階級の地位と本質については、必ず特定の生産力と特定の生産様式とを合わせてこれに考察を加えなければならず、歴史における本当の進歩の力とは、先進の社会生産力や先進の生産様式を代表した階級や集団なのであると指摘した。農民による平均主義の要求や農業社会主義の理想、そして農民運動、農民戦争は、歴史的合理性を有してはいるが、しかし无制限に誇張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さらに无原則に神化することもできず、特に暴力的

3) 剪伯賛「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の幾個問題」『剪伯賛史学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頁

なやり方で神化してはならず、暴力はせいぜい産婆の役割ができるくらいで、妊婦もなく、妊娠することもなく、胎児が母体の中で成長してもいないのだから、産婆に腕前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健康な赤子を誕生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ある。歴史学の混乱が収束して、人々は歴史の真実を決して思いのままにしようとしたり、軽率草卒に取り組んだり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だとはっきりと認識するにいた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は歴史研究全体において、厳格な求実の学风を再建するための促進力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全国が上から下まで一意専心に经济建设に邁進していた時、中国の国情についての精确な认识と中国の特色を具えた発展への道を模索することに対して、歴史研究は中国の実際に適合した理論と事実によってそれを後押ししたのである。歴史家たちは中国に二千数百年にわたって小農経済が存在し変遷してきたという事実を根据に、小生産が常に自発的に資本主義を生み出しているという結論は全く中国の実際に合致しないこと、そして农家生産請負制の方が人民公社制度よりも中国の農村生産力の発展水準に適合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説明し、同時にまた農民問題の真の解決は、工業化、市場化、都市化、そして農業生産力の大いなる進歩如何にかかっていると主張したのである。近代以来、現代化への紆余曲折した過程は、国家資本と民間資本とが各々代替不可能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た。ある時期、「史学の危機」が声高に叫ば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が、当時における考察では、その考察に際していわゆる「規律」や「法則」を固守していたために、中国の歴史的现实を解釋しき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中国の古代奴隷制と封建制の時代区分をめぐる問題は、たえず論争的であったのであるが、それはそれがほとんど自身はうわべの問題（偽問題）だったからである。中国の領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アジアの生産様式論争も絶え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が、やはりそれも中国の歴史的發展をヨーロッパ史の發展の枠組みにむりやりはめ込もうとしたからである。ヨーロッパの歴史的發展にそれ自身の特色があるように、中国の歴史的發展にも固有の特徴が備わ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から、ただ中国の现实をよりどころとして、他国の成功や失敗の経験については単なる参考に資するだけに止めるという姿勢を堅持してこそ、はじめて中国自身の健康的で前向きな発展への正しい道を見出し、それへと誘っていくことが可能なのである。

単一化された共有制と計画経済体制から突破し、中国の工業化、市場化、都市化、そしてグローバル化を全面的に推進するために、歴史学是最前線のパイオニア的探求を進めてきた。この方面において最も多大な貢献を提供してきたのは、中国経済史であり、特に中国近現代経済史の研究である。国内市场史、国际市场史、地域市場史、鉄道史、道路史、航空史、水運史、郵便史などの交通史、貨幣史、為替史、貸付史、証券史、先物取引史、保険史などの金融史、労働密集型、資源エネルギー源消耗型、資本密集型、知識技術密集型などについての産業史、経済構造変遷史、経済制度史、经济运行構造の変遷史、非経済的要素による経済發展に対する影響史、および部門経済史、地域経済史、民族経済史、山林草原経済史、海洋経済史など、これらの領域におけるあらゆる研究が盛んに展開したのである。これらの成果によって、現代化やグローバリズムが進行している中で高度に流動的な資本、労働力、知識、技術、情報、資源の客観的法則を深く理解することに対して、精确な中国の发展战略と政策が定められ、視界が開かれ、構想が活発にされ、戒めが提示されたのである。

この時期の歴史研究が残した業績は、経済史の領域のみに限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に人々が心血を注いで高度経済成長を追求していた時、歴史学は過去の歴史的经验と他國の發展の教訓に基づいて、素早くそして敏感に中国文化史と世界文化史の研究を展開したのである。経済体制の改革や経済發展は、人々の觀念の變革や思想の解放と切り離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

現代化の実現も自身の現代性の育成と切り離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ただ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さらには、工業化、市場化、都市化、グローバリズムの進行する中であって、文化がひとたび失わ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人々は価値観、道徳、行為規範を見失い易くなり、権力は腐敗し、利益追求はその規範、秩序、均衡を失い、拝金主義、享乐主義、放任主義は人々を権力や金銭、そして物欲の虜と変えてしまうのである。歴史学界は、80年代の前半から、エリート文化、大众文化、觀念文化、物象化した文化、制度化した文化を包括した文化全般にわたって、中国传统文化や世界文化に対する研究を開始し、各種の断代文化史、地域文化史、民族文化史といった多くの文化史に関する研究書を生み出し、文化的建設や文化的发展、特に精神文明の建設を推進するために、豊富で多彩な中国传统文化や世界文化の材料を提供したのである。

文化史の後を継いだのは、中国社会史研究の復興と繁栄である。現代化された经济建设と関連するのは、社会構造、社会关系、社会生活の重大な変革であり、社会動員、社会コントロール、社会的調和方法の根本的轉換である。歴史家は自身の研究を通して、工業化、市場化、都市化、そしてグローバル化が進展する中で、都市と地方の発展の不均衡、東部中部西部に分かれた各地区間での発展の不均衡、産業発展の不均衡、社会階層間や社会集団間での発展の不均衡がもたらす、一連の重大な社会問題に、また人口増加、大規模な移動、高齢化、就職問題、一人っ子の成長など、一連の中国に特有な問題に対して必ず可能な限り早期に関心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比較的早い内から主張していた。それは、経済発展と経済体制の改革が、必ず社会发展や社会体制の改革を伴っていないからである。家族史、家庭史、婚姻史、同姓史、系譜史から民族史、族群史にいたるまでの研究は、血縁ネットワークに対する認識を深め、政党史、社団史、商会史、ギルド史、学派史、里社会の派閥の歴史に関する研究は、社会集団ネットワークに対する認識を深め、都市史、乡村史、社区史、地方史に関する研究は、地縁ネットワークに対する認識を深め、社会階級、階層、各種の利益集団、生産者管理者政策決定者の階層分化、様々な団体や部門の利益关系に関する研究は、利益ネットワークに対する認識を深めた。社会構造史、社会生活史、社会性別史、社会身分職業史、社会组织史、社会動員と社会的コントロールの變遷史の研究は、今まさに体験している歴史的に変化している中国社会を全面的に認識把握し、さらには正確に戦略を決定するの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である。

東アジアや全世界の歴史についても、この時期やはり非常に大きな発展が見られた。人々は、アジアの「四小龙」「五小虎」が崛起してきた過程と経験を理解することを、世界各国が現代化へ向かう道及びその共有する特徴を理解することを、東アジアと世界の様々な文明の本当の状況を理解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たのであり、これは公式化、简单化、实用主義、先驗主義、あてつけや無理な比較といった人を欺くような方法から人々を乗り越えさせ、歴史学に哲学、経済学、人類学、社会学、政治学などの学科との交流や対話、そして学際的研究を展開させ、新研究の領域を開拓し、計量的研究、比較研究、構造分析、語義分析、心理分析などの多种多样で新しい研究方法を積極的に採用させ、そして真相を理解し、正確な認識を獲得させたのである。

4. 人間性や人の總体的発展から切り込んだ、中国と東アジア世界に対する認識の深化

21世紀が到来し、中华民族の歴史的发展も、まったく新しい世紀に突入し、中华文明は、まさ

に伝統的农耕文明、半工業文明から現代工業文明、情報文明へ全面的に突入しつつあり、中华民族は、まさに百年の屈辱に最終的に別れを告げ、真に偉大な民族の復興を実現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れと同時に、中国はまた、一連の新たな峻厳な挑戦、たとえば産業構造や、経済と社会发展、経済と文化発展における深刻なバランスの崩壊、人類全体が共通に直面した金融危機、農業危機、エネルギー資源の危機、資源の中でも特に水資源の危機、生态环境の危機といった挑戦にさら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経済発展による利益追求の極限化や文化の発展におけるバランスの崩壊は、利欲物欲の絶え間ない膨張と道徳の深刻な喪失を引き起こした。利益の过剩な追求は、また深刻に各级の权力をむしばみ、广范围に权力のレントシーキング、つまり超过利润の追求（寻租）を引き起こし、利益分配を多くこうむる者の权力はその势力をさらに扩大し、逆に利益分配の少ない、もしくは皆无の者はその势力を失うに至り、社会の两极化傾向はこれによって抑制し難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上述のような挑戦を前にして、必ず人の总体的な発展を究极的目标とする新しい文明观から、自己认识や未来展望を新た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人の总体的発展とは、人の物質生活や精神生活、政治的生活、社会的生活を全体として、それを把握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人間の知識の伝授、蓄積、更新、創造は、ただ経済的発展の需要を満足させるためだけのものではなく、また人々の政治的生活や社会的生活、そして文化的生活の需要を満足させるためのものでもあるのである。人には知的生活や知的世界の外にも、また感情的な生活、情感の世界、意志的生活、意志の世界があるのであり、人の真・善・美に対する追及はそれでひとつの统一的全体た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人の总体的発展を究极目标とするということは、次のことを要求する。すなわち、工業化の進展と生態系の保護（生態化）との結合、都市化とヒューマニティーとの結合、市場化の進行と社会の公平化との結合、グローバリズムの進展と民族国家の主体性との結合、経済成長と政治の民主化、社会の強調及び文化の発展繁栄との密接な結合、真に工業と農業とが、都市と地方とが、また様々な民族相互が正しく協調することへの要求である。人の总体的発展とは、ひとつの历史的概念であり、その内包は不断なる社会の発展に従って、不断に扩大升华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の历史的视角から中国と东アジア世界に対する认识を新たにすることは、また次のことを要求する。すなわち、问题关心のあり方を方向转换して、最も普通の民众や人間そのものの认识へと向け、普通の人々の日常生活、日常の考え、风俗习惯、信仰、交际を通して、人間の本质とはつまり何なのか、人間存在の価値とは何なのか、人はどこから来て、どこへ行くのか、人はつまりどのように生産し、どのように生活するもの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理解を要求するのである。中国人と东アジア各国の人々が保有し、伝承し、创造してきた物事を理解することは、彼らがどのような条件に基づき、どのような道をたどって、保有、伝承、変革してき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によって、世界各国の各民族の人々が、どのように自己の価値を実現し、どのように現在の状況を乗り越えて未来へと向かっ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はっきりさせるのである。

この新しい历史的视角のもうひとつの重要な特徴は、それが人々の知的生活、情感生活、意志生活、あるいは知的世界、情感世界、意志世界をあらゆる角度から考察対象に取り込むことである。

特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知識史と观念史の研究、すなわち人々の知識の蓄積や伝達、知識構造と学問構造の発展、人々の様々な观念、人々の思维方法や观念体系の形成と变迁に対する研究である。この研究は、知識や观念が一度形成されれば、社会实践中において人々の思想や行動がそれによってかなり左右され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するのに役立ち、人々の既存の

知識や観念、思想学術資源を積極的に継承利用するということのみならず、また自覚的に多くのすでに時代遅れで、偏ったひいては深刻な誤りを含んだ知識や観念から人々を解放して、新しい知識構造や観念体系を形成することにも役立つのである。

同様に注目すべきは、人の感情生活、感情世界に対する研究である。人は知識や観念を伝承、蓄積、変遷し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の外にも、また極めて豊富で多様な感情生活、感情世界、美的生活や美的世界があり、これらはすなわち人々の詩的世界なのであり、人の知的世界と関連するものであるが、また相区別されたものでもあり、両者の働きには多に径庭があるとい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ここ数年来、人の詩性についてはまだ完全には承認されていないようであるが、人の親族感情、愛情、友情、郷土愛、喜怒哀楽については、自然美や絵画、音楽、舞踏、戏曲などの人々が創作した美の中で薰陶を受け、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るように、これらはすべてひとつひとつが、知的範疇の枠内に取り込まれているのである。現在、文学はついに人としての学問として認識され、芸術もついに政治的隷属から抜け出して人間性と結合し、文学史、芸術史の研究は、ついに知識学の体系を越えて、大部分がまだ無意識の状態にある人の詩性や人の情感の世界、そして人の美的感覚の世界を開发育成するよう人々を導かせる、といった方向へ向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人の意識生活や意識世界は、自分自身の中に残っている野生的なものを抑制改変させ、人の野蛮な状態を一步一步文明の状態に向かわせる。人の意志、人の心理、人のより良い未来への追求、人の畏敬の心、善に向かう心、人の愛情の心、同情心、怜悯の心は、これまで歴史研究の分野の中にほとんど入ってこなかった。現在の歴史学はしだいにそれへ関心を向けつつある。宗教史、信仰史、习俗史、心理史の研究の外、人々の価値の追求、価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価値の伝播、価値観の変遷、及びこれと密接に関係のあるイデオロギーの構成と発展変化、さらには人が動物的であることを乗り越えて人間のみが兼ね備えている人間性といったものの問題、民族性や民族精神の問題など、一つひとつが人々に重視されてきているのである。

これらのすべては、中国に対して、東アジア世界全体に対して、さらには人類全体に対して、まったく新しい認識を人々に獲得させるものである。この点によって、人々はより容易に互いの共通性や差異性を発見するだろうし、相互交流や相互認識をより容易にするであろう。

この新しい文明観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た新しい歴史的視角が、中国と東アジア世界全体の発展を、また東アジア世界共通の市場形成を、そして東アジア一体化に向けての歩みを促進させる役割を我々の歴史学に課すように、この歴史的視角はより積極的な役割を發揮させていくのであろう。

近代 韓國 東아시아 認識의 起源과 轉換

■ 최덕수 (고려대) ■

근대한국 동아시아인식의 기원과 전환

최덕수 (고려대)

〈목 차〉

1. 소중화론적 동아시아인식
2. 왜양분별론적 세계인식
3. 만국공법적 세계인식

1. 소중화론적 동아시아인식

이 글은 19세기 후반 조선이 오늘날과 같은 규모의 세계와 만났던 시기 집권세력의 동아시아 인식의 변화상을 검토한 것이다. 주지하다시피 19세기 중엽 동아시아지역에 밀어닥친 자본주의 열강의 통상 개방 요구는 그 전과 달리 최첨단 무기를 탑재한 포함을 앞세우고 국가가 주도하였다. 청국은 영국의 대중국 아편 수출금지 조치에 반발하여 영국이 도발한 전쟁에 패함으로써, 일본은 페리(Mathew C. Perry)가 이끄는 신흥자본주의 국가 미국의 최신에 함대의 무력시위에 미국의 무력시위에 굴복하여 국내 시장을 개방하였다.

1853년과 그 이듬해 페리가 타고 왔던 ‘흑선’은 2,500톤급 기함으로 당시로서는 지구상에서 2척 밖에 없었던 최강의 전함이었다. 당시 막부의 해군 선박은 100톤 내외의 것이었고, 대영제국의 동양함대의 전함도 1,800톤 정도였다고 한다. 무력시위를 통해 막부체제하의 일본을 개방 시켰던 페리는 일본과 화친조약을 체결한 다음해 미국 지리통계학협회가 주최한 공개강연에서 미국의 대외정책 가운데 향후 동아시아시장의 중요성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이 언급하였다.

세계의 통상은 전반적으로 늘어나고 확대되고 있으며 또한 캘리포니아와 오스트레일리아의 금광이 매년 산출하고 있는 자본은 항상적으로 증가를 계속하고 있어 이것을 활용할 필요에 직면하고 있다. 이와 같은 상황 하에서 아메리카합중국 정부가 새로운 무역관로를 여는 작업의 득실에 주목하는 것은 지극히 중요하다. 즉, 전면적으로 또는 부분적으로 유럽 열강의 지배로부터 독립을 확보하고 있으며, 주권을 인정받는 것이 타당성과 중요성을 가지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이는 동양의 제국이 사이와 통상조약체결을 체결해야 할 것이다. 주로 영국과 네덜란드 또는 한정되어 있지만 프랑스·스페인·포르투갈이 동양의 대부분에 세력을 확대하여 왔다. 그러나 이와 같은 열강의 강력한 정책으로부터 벗어나 비교적 독립을 유지하고 있으며 경작인구가 많은 국가가 광범위하게 남아 있다. 이러한 국가들은 반문명적 전제군주에 의해 지배되고 있지만 자연의 혜택은 풍부하다. 적절한 지도가 있다면 생산물로부터 얻는 수익은 이들 국가가 통상을 하는데 일반적인 원천이 될 것이다. (中略) 나의 제언에 대해 반론이 있을지는 알 수 없다. 곧, 전술한 유럽 여러 나라들 가운데 한나라 또는 수 개국이 이들 동양제국에 대하여 관할권을 주장하

기 때문에 동양제국의 군주가 우리나라와 조약을 체결하는 권리를 일체 허용하지 않을 것이라는 반론이다. 그러나 문명화된 금일에는 통치권이란 것은 그 권리를 주장하는 군주에 자기의 특권을 행사하는 힘이 있다는 것이 입증되는 것에 의해 비로소 국가의 법으로 인정되는 것이기 때문이다. 이것은 교전중의 봉쇄권에 대해서도 마찬가지지만 충분한 힘에 의해 유지되어야 비로소 나라의 법으로써 인정될 수밖에 없는 것이다. 그러므로 합중국정부가 다른 어떠한 나라로부터도 사실상 독립해 있다고 알려진 동양제국의 현지정부나 민족의 일부 내지 전부와 조약을 방해할 정당한 이유는 조금도 없다고 나는 주장하는 것이다.¹⁾

페리가 이와 같은 강연을 행한 시점으로부터 10년 후 대동강을 거슬러 조선의 평양에 미국 국적의 상선 제너럴서먼호가 출현하였다. 제너럴서먼호는 80톤급의 증기범선으로 12파운드 대포 2문과 소총으로 무장을 하고 있었으며, 여기에는 24명이 승선하고 있었다. 제너럴서먼호는 1866년 8월 9일에 중국에서 출항하여 조선으로 향했으며, 조선 지방관이 말렸음에도 불구하고 대동강을 거슬러 올라갔다. 이들은 조선 측에 통상을 요구하고, 약탈행위와 관리를 납치하는 등의 행위를 하였다가 9월 3일 평양감사 朴珪壽의 화공명령에 따라 선체는 불태워지고, 선원들은 몰살되었다. 그리고 9월 11일에는 “사람마다 정자(程子)와 주자(朱子)의 책을 읽고 선비마다 공자와 맹자의 교훈을 명심하게 된다면, 간사하고 과당을 짓는 무리들이 의지할 곳이 없게 되고 사설(邪說)과 난행(亂行)이 일어날 수 없을 것이다. 이에 우리 유교의 도는 밝히려고 하지 않아도 스스로 밝아질 것이며, 이단의 학문은 배척하려고 하지 않아도 스스로 배척될 것이다”라는 내용의 斥邪論이 반포되었다.²⁾

같은 해 10월 16일에는 강화도에 프랑스 함대가 상륙하여 강화부를 점령하였다. 프랑스 함대를 이끌고 있던 제독 로즈는 조선 내의 천주교 탄압을 구실로 원정에 나선 것이었다. 조선군과 프랑스군은 문수산성과 정족산성에서 교전을 벌였으며, 11월 18일 조선군의 강력한 저항에 부딪힌 프랑스군이 한강의 봉쇄를 풀고 퇴각하게 되면서 병인양요는 사실상 종결되었다.³⁾ 전투가 진행되는 동안 同副承旨에 임명되었다가 사직의사를 밝힌 李恒老⁴⁾는 다음과 같이 상소하였다.

오늘날의 국론(國論)은 두 가지 설이 서로 다투고 있는데, 서양 적과 싸우자는 것이 나라의 입장에 선 사람의 말이고 서양 적과 강화하자는 것이 적의 입장에 선 사람의 말입니다. 앞의 말을 따르면 나라 안에 전해 내려 온 문물제도를 보전할 수 있지만 뒤의 말을 따르면 인류가 금수(禽獸)와 같은 지경에 빠지게 될 것이니, 이는 커다란 분계점입니다. 몇몇한 양심을 조금이라도 지닌 사람이라면 모두 알 수 있는 일인데, 더구나 밝고 성스러운 전하께서 어찌 분별하지 못하고 받아들일 리가 있겠습니까. (中略) 나라의 입장에 선 논의를 주장하는 사람들도 또 두 가지 설이 있는데, 그 하나는 싸워 지키자는 설이고 또 하나는 오랜 도읍지를 떠나자는 설입니다. 신의 생각으로는, 싸워 지키는 것은 몇몇한 도리이고 도읍지를 떠나는 것은 임기응변의 방편입니다. 몇몇한 도리는 사람들이 모두 지킬 수 있지만 임기응변은 성인(聖人)이 아니면 제대로 할 수 없

1) 「ペリー提督意見書」, 田中彰 編,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 開國』, 岩波書店, 1991, 11~12쪽.

2) 金源模, 『開化期 韓美 交渉關係史』, 단국대학교 출판부, 2003, 92~93쪽; 김명호, 『초기 한미관계의 재조명』, 역사비평사, 2005, 23~80쪽.

3) 李光麟, 『韓國史講座 V: 近代編』, 一潮閣, 1981, 31~39쪽 참고.

4) 1792~1868. 字는 而述, 號는 華西. 조선 말기의 성리학자이며, 위정척사론자로 유명한 최익현, 김평묵, 유충교 등이 그의 문하에서 수학하였다.

는 것입니다.⁵⁾

이항로가 올린 상소내용의 핵심은 화이관에 입각하여 서양과의 조약 체결과 통상에 반대하고, 침입한 적은 실력으로 물리쳐야 한다는 데 있었다.⁶⁾ 이러한 주장은 당시 상소를 올렸던 奇正鎭의 주장과 맥을 같이 하는 것으로 대원군이 양이정책을 추진해 나가는데 힘을 실어주는 기반이 되었다.

한편 1871년 5월에는 주청 미국공사 로우(Frederick F. Low)와 아시아함대 사령관 로저스(John Rodgers)는 조선정부에 조약체결을 요구하기 위해서 콜로라도(Colorado)호를 비롯한 호위함 3척, 포함 2척, 대포 80문, 병력 1,230명을 이끌고 일본의 나가사키에서 조선으로 출발하였다. 조선에 도착한 로저스 함대는 6월 10일부터 조선에 대한 공격을 개시하여 초지진, 덕진진을 거쳐 광성보까지 점령하였다. 이 당시 미군이 타고 왔던 군함이나 무기는 남북전쟁을 마친지 얼마 되지 않은 시점이었으므로 최신식이었다. 양국군의 화력을 간단히 비교해 보자면 조선군이 사용하던 화승총은 전장식 총으로 1분당 한 두 발을 쏠 수 있었으나 미군들이 쓰던 레밍턴 소총은 후장식으로 10발을 발사할 수 있었다. 또한 대포의 경우 조선의 홍이포는 700m 정도의 사거리임에 비해 미군이 사용하던 9인치포는 3,154m, 곡사포는 980m의 사거리를 가지고 있었다. 즉, 화력면에서 조선군과 미군은 이미 비교가 되지 않을 정도로 차이가 났던 것이다. 조선 측의 포대를 점령하고 파괴한다는 본래의 목적을 달성한 미국 부대는 조선에 대한 위협과 보복이 달성되었다고 판단하고 6월 12일 철수하였다. 하지만 미군의 무력시위에도 불구하고 조선정부에서 교섭에 응하려는 태도를 보이지 않아 결국 7월 3일 조선을 떠나게 된다.⁷⁾

조선은 1866년과 1871년 프랑스와 미국의 무력도발로 다수의 사상자와 막대한 피해가 발생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끝내 이들의 개방요구를 거부하였다. 신미양요가 끝난 다음 우의정 홍순목은 경연자리에서 국왕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발언하였다.

우리나라가 예의의 나라라는 점에 대해서는 온 세상이 다 알고 있습니다. 지금 일종의 불순한 기운이 온 세상에 해독을 끼치고 있으나, 오직 우리나라만이 유독 순결성을 보존하는 것은 바로 예의를 지켜왔기 때문입니다. 병인년 이후로부터 서양놈들을 배척한 것은 온 세상에 자랑할 만한 일입니다. 지금 이 오랑캐들이 이처럼 침범하고 있지만 화친에 대해서는 절대로 논의할 수 없습니다. 만약 억지로 그들의 요구를 들어준다면 나라가 어찌 하루인들 나라 구실을 하며, 사람이 어찌 하루인들 사람 구실을 하겠습니까? 이번에 성상의 하교가 엄정한 만큼 먼저 정벌하는 위엄을 보이면 모든 사람들이 다 타고난 뚝뚝한 의리를 가지고 있는 이상 불순한 것을 배척하는 전하의 큰 의리에 대해 누군들 우러러 받들지 않겠습니까? 또한 저 적들이 이 소리를 듣는다면 간담이 서늘해질 것입니다.⁸⁾

이러한 홍순목의 발언은 당시 조선의 집권층이 서양에 대하여 가지고 있었던 인식이 어떠하였

5) 『承政院日記』 高宗3年 9月 12日; 『華西集』卷3 「辭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

6) 송병기, 「채국기의 대미인식」, 『한국인의 대미인식』, 민음사, 1994, 28~29쪽.

7) 金源模, 『근대한미관계사 : 한미전쟁편』, 철학과현실사, 1992; 이민식, 『근대 한미 관계사』, 백산자료원, 2001, 95~121쪽 참고.

8) 『高宗實錄』 高宗8年 4月 25日.

는가를 상징적으로 보여주고 있다. 이러한 인식의 연장선상에서 조선정부는 신미양요 직후 “서양 오랑캐의 침략에 맞서 싸우지 않는 것은 화의하는 것이며, 화의를 주장하는 것은, 곧 나라를 파는 것이다”(洋夷侵犯 非戰則和 主和賣國 戒我萬年子孫 丙寅作 辛未立)라는 내용의 척화비를 전국 군현에 세우도록 하였다.

이상에서 살펴본 바와 같이 청국과 일본이 각기 서양열강의 무력시위에 굴복하여 국내시장을 개방했으며, 그리고 조선은 두 차례의 양요를 거친 이후에도 소중화적 세계인식을 견지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2. 왜양분별론적 세계인식

1872년 일본 외무성은 부산에 있었던 왜관을 공관으로 이름을 바꾸면서 대조선 외교에서 대마도를 제외시키고 이곳을 완전히 외무성 관할하에 두었다. 일본의 외무성은 대마도의 조선통교권을 부정하면서 교섭의 주체로 부상하였던 것이다.⁹⁾ 쓰시마번 소속의 관원과 한정된 상인의 근거지였던 왜관을 중앙정부가 관할하게 되면서 쓰시마상인이 아닌 오사카와 도쿄의 상인들이 부산에 진출하기 시작했다. 이에 대해 조선정부는 쓰시마상인이 아닌 상인의 불법적인 상행위와 밀무역을 엄격히 규제할 것이라고 통고하였다.¹⁰⁾

일본 정부 내에서는 이를 기회로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조일 양국의 외교 현안이었던 소위 ‘書契問題’를 무력을 배경으로 해결할 것을 주장하는 강경론이 비등하였다. 각의에서 參義 사이고 다카모리(西郷隆盛)는 거류민 보호를 명분으로 사절을 파견하여 교섭하되, 교섭이 결렬되고 사절이 만일 조선에서 살해라도 당한다면 유신정부에 대한 국내 사족과 농민의 반감을 밖으로 돌릴 수 있는 호기가 될 것이라고 주장하였다.¹¹⁾

일본정부의 내각회의에서는 사이고를 조선에 파견할 대사로 결정하고 천황의 재가를 얻었다. 그러나 메이지정부의 중심 세력들이 당시 서구열강들과의 불평등조약 개정의 예비교섭 및 문물제도의 시찰을 위하여 구미에 체재 중이었던 관계로 이들의 귀국 이후로 실행을 미루었다. 그러나 9월 들어서 약 1년 10개월 만에 귀국한 주류세력은 征韓策이 성공할 경우 자국의 정치적 위상 약화를 우려하여 여기에 제동을 걸었다. 外遊派의 중심인물이었던 이와쿠라 도모미(岩倉具視)와 오쿠보 도시미치(大久保利通) 등은 樺太優先解決論, 內治優先論 등을 명분으로 공작을 벌인 끝에 천황의 동의를 얻어 사이고의 정한책을 좌절시켰다. 이에 정한론을 주장하였던 사이고 이하 참의 소에지마 타네오미(副島種臣) · 이타가키 다이스케(板垣退助) · 에토 신페이(江藤新平)

9) 咸東珠, 「明治初期(1868~1875) 일본 외무성의 조선침략론과 그 성격」, 『史學研究』54, 1997. 조선과 일본의 수교 교섭내용은 이 글에서 인용한 함동주의 최근 연구성과와 줄지, 『개항과 朝日관계』, 고려대학교 출판부, 2004의 1장을 바탕으로 하여 기술하였다.

10) 『日本外交文書』卷6, 282-283쪽, 「일본상인 조선무역에 대한 취체방법에 관한 초량공관수문장에 대한 전령서」. 이른바 정한론의 직접적인 계기가 된 이 ‘전령서’의 실재 여부에 대해서는 우리 측의 관련사료에서는 나타나지 않는 점 등을 들어 의문이 제기되기도 하였다. 李瑄根, 『韓國史：最近世篇』, 乙酉文化社, 1961, 332~334쪽.

11) 『大西郷全集』卷2 754-756쪽, 1873년 8월 17일자 板垣退助 앞 西郷隆盛 서간. 田村貞雄, 「「征韓論」政變の史料批判」, 『歴史學研究』615, 1991, 19쪽에서 재인용.

· 고토 쇼지로(後藤象二郎) 등은 일제히 사직하였다. 조선문제는 정부 내의 파벌 대립과 얽혀 마침내 메이지정부의 정변으로 비화하였던 것이다.¹²⁾

한편 정한론을 둘러싼 메이지정부의 분열이 있는 지 약 한 달 후, 조선에서도 집권세력이 교체되는 큰 정치적 변동이 있었다. 고종은 1873년 10월 최익현(崔益鉉)을 승정원의 同副承旨로 임명하였다. 이에 대하여 최익현은 동부승지를 사직하는 상소에서 대원군의 치세 전반에 대해 총체적으로 비판하고, 대원군의 하야와 고종의 친정을 요구하였다.¹³⁾ 그러면서 대표적인 실정의 사례로 만동묘철거, 서원폐쇄, 國賊의 伸冤, 淸錢의 사용 등을 들었다.

최익현의 상소에 대해 좌의정 강로(姜澔)와 우의정 한계원(韓啓源)과 같은 고위관료들을 비롯하여 호조·예조·공조·병조의 판서가 사직서를 제출하였다. 더 나아가 성균관의 유생들이 이른바 捲堂(맹휴)으로 고위관료들의 최익현규탄에 가담하였다. 계속하여 12월 16일에는 승정원의 구성원과 홍문관·사헌부·사간원의 대간들이 동시에 사임함으로써 최익현상소를 둘러싼 정치 문제는 중대한 고비를 맞이하게 되었다.¹⁴⁾ 그러나 결과적으로 최익현의 상소 이후 한 달여 안에 조정 내 대원군의 지지세력들이 축출되었다. 고종은 이와 같이 조정 내 집권세력을 교체하였고, 1874년에 들어서면서 각 지방에 암행어사를 파견하여 지방에 대한 중앙정부의 통제를 강화하고자 하였다.¹⁵⁾

이 시기 암행어사 파견의 정치적 목적을 크게 두 가지 점에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이는데, 경상좌도 암행어사로 파견되었던 박정양(朴定陽)이 대표적인 사례라 하겠다. 박정양의 암행어사 활동은 대체로 두 가지 면에서 주목할 수 있다. 그의 주요 활동은 크게 경상도관찰사 김세호(金世鎬), 동래부사 정현덕(鄭顯德), 왜학훈도 안동준 등 대일외교를 담당했던 관료들에 대한 조사와 다른 하나는 부산에 설치되어 있었던 왜관주재 일본관리와의 접촉이었다. 박정양의 활동에서 드러나는 사실은 신정권이 중앙과 지방에서 대원군의 기존세력을 약화시키면서 대외적으로 일본과의 관계 개선을 급속히 추진하였다는 점이다.

이와 같은 양국의 교섭자세의 변화는 臺灣問題를 성공적으로 종결지은 오쿠보 정권의 대외적 자신감을 반영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으나, 보다 직접적인 요인은 상술한 바와 같이 대원군 실각 후 조선정부의 對日外交의 변화를 틈탄 일본정부의 적극정책이라 할 것이다.¹⁶⁾ 여기에는 조선과의 교섭실무를 준비하는 가운데 지속적으로 조선침략론을 주장하고, 이것을 실행에 옮겼나갔던 일본 외무성의 역할을 빼놓을 수 없다.¹⁷⁾

12) 藤村道生, 「征韓論爭에 있어서 外因과 內因」, 『國際政治』37, 1967(『日本外交史の諸問題』3, 有斐閣); 毛利敏彦, 『明治六年政變研究』, 中央公論社, 1979. 일본정부가 征韓 정책 대신 주장된 화태 문제 해결에 착수할 즈음 일본국내에서는 사족의 반정부운동이 점차 강해지고 있었다. 사이고를 제외한 사직 참의들은 이타가키를 중심으로 민선의원설립 건백서를 제출하여 '자유민권운동'을 개시하였고, 또 조선의 무례를 심문한다는 명분으로 佐賀지방에서 무장봉기하였다. 충격을 받은 정부는 정한과의 불만을 국외로 돌릴 필요가 있음을 절감하고 마침 표류한 유구인을 대만원주민이 살해한 사건을 이유로 대만침공을 계획하였다. 그리하여 고토의 난이 3월 1일 진정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정부는 대만출병을 서둘러 5월 2일 대만을 무력으로 침공하였다.

13) 李瑄根, 위의 책, 338~340쪽.

14) James B. Palais, 李勛相 譯, 『傳統韓國의 政治와 政策』, 신원문화사, 1993, 295~332쪽.

15) 한철호, 「고종 친정초(1874) 암행어사 파견과 그 활동」, 『史學志』31, 1998, 193~244쪽.

16) 金基赫, 「강화도조약의 역사적 배경과 국제적 환경」, 『國史館論叢』25, 25~26쪽.

17) 메이지 정부 초기 외무성의 대조선정책과 조선침략론에 대한 분석으로는 威東珠, 앞의 논문, 217~230쪽을 참고.

앞의 합의에 따라 모리야마는 1875년 2월 하순에 釜山에 도착하여 서계를 제출하고 현지 조선 당국자들과 교섭을 시작하였다. 동래부의 보고에 대하여 조정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논의가 진행되었다.

상이 이르기를, “올라온 서계를 끝까지 받아 보지 않는다면 자못 성신(誠信)의 도리가 아닌 듯하다. 또한 저 왜인이 받아 본 뒤에 만일 따르기 어려운 일이 있으면 비록 백 번을 물리치더라도 마땅히 도로 받아서 가겠다고 약조를 하였으니, 이번에는 가져와 보게 해서 실로 격식을 어긴 점이 있으면 다시 물리치는 것이 불가하지 않을 듯하다.” (中略) 김병국이 아뢰기를, “왜정(倭情)이 본래 교활하니, 전의 말을 준거(準據)해 믿거나 서계에 진서(眞書)와 언서(諺書)가 서로 섞여 있는 것은 전에 없던 일입니다만 한번 자세히 살펴본 뒤에 과연 격식에 어긋난 점이 있으면 사리에 의거해 물리치는 것이 실로 일의 체모에 합당할 듯합니다.” 하였다. (中略) 상이 이르기를, “장계(狀啓)가 올라온 지 이미 여러 날 되었으니 즉시 품처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왜인의 실정은 별로 의심할 만한 것이 없음을 분명히 알 수 있겠다.”¹⁸⁾

위의 기록에서 드러나는 바와 같이 대략 두 가지 입장이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하나는 전통적인 조일외교의 형식을 주장하면서 이를 받아들여서는 안 된다는 입장이다. 다른 하나는 서계의 접수 자체를 거부해서는 안 된다는 입장이다. 1868년에 서계접수를 거부했던 시기의 논의와 다른 점은 외교문서를 일단은 접수하여 검토해보자는 입장이 새로 나타난 데 있었다. 여기서 주목되는 점은 이와 같이 서계를 접수하여 적극적으로 대일외교를 풀어가자는 입장의 선두에 고종이 있었다는 점이라 할 것이다.

고종은 서계의 내용에 문제가 있다하더라도 서계접수 자체의 거부는 ‘誠信에 어긋난다’, ‘왜인의 실정은 별로 의심할 만한 것이 없음을 분명히 알 수 있겠다’, ‘이번의 서계는 개수한 곳이 있다’라고 하면서 서계접수를 주장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의정부 대신 이용우와 시원임대신들은 고종의 태도와 달리 동래부 장계의 회답을 지연시키고 있었고, 여전히 ‘皇’·‘大’ 등의 용어와 新印의 사용 등을 들어 거부하고 있었다. 고종은 개인적으로 적극적인 태도를 분명히 하였으나, 조정대신들의 여론은 여전히 서계접수를 거부하는 쪽이 다수였다고 하겠다.

조선정부는 결과적으로 1875년 2월의 서계에 대해서 여전히 ‘大日本’·‘皇上’등의 용어와 그 本文이 日本語로 된 점, 그리고 조선에서 쓰시마에 주었던 圖書의 還納, 사신접대를 위한 연회석상의 양복 착용 등을 들어 접수를 거부하였다. 조선정부의 입장을 확인한 모리야마 시게루(森山茂) 일행은 그동안의 협상결과를 정부에 보고함과 동시에 4월 포함을 동원한 무력 개방 정책을 제안하였다.¹⁹⁾

이것은 서구 열강의 포함외교에 의해 개항하였던 일본의 경험을 조선에 적용한 것이었다. 이 결정에 따라 4월 20일 운요호가 부산에 입항하였다. 일본 측의 군함과견으로 조야에 위기의식이 고조되는 가운데 조정에서 서계문제에 대한 논의가 재개되었다. 부산에서 일본군함이 무력시위를 감행한 다음날인 5월 10일, 고종은 시원임대신과 6조의 3품 이상 고위관직자 전원을 불러 외무성 서계문제에 대한 회의를 진행하였다.²⁰⁾ 이 날 회의의 내용을 검토해 보면 대체로 박규수·

18) 『承政院日記』 高宗12年 2月 5日.

19) 『日本外交文書』卷8, 71~72쪽.

20) 『承政院日記』 高宗12年 5月 10日.

이최응 등은 서계접수를 주장하였고, 김병국 등 7명은 반대, 나머지 24명은 유보하거나 분명하지 않은 태도를 보이고 있었다. 일본의 무력시위가 시작된 이후에도 조정대신들의 주류의 입장은 여전히 서계 접수자체를 거부하고 있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서계접수를 주장하는 박규수 등 소수의 견해가 가장 중요하게 여겼던 근거는 일본 측과의 무력분쟁을 피하기 위해서 서계를 일단 접수하여야 한다는 것이었다. 일본의 무력동원 조짐에 대한 조야의 위기의식이 고조되는 가운데 우려하였던 사태가 실제로 발생하였다.

운요호가 8월 21일 한강 하구 강화도 해안에 정박하였다가 선원 일부가 작은배로 사전 예고 없이 한강하구를 거슬러 항해하자 초지진 포대에서 포격을 감행하여 이를 저지하고자 하였다. 초지진 대포의 사정거리 밖에 있던 운요호는 초지진의 포격으로 전혀 피해가 없었다. 그러나 운요호는 함포사격으로 초지진을 파괴한 뒤, 다음날 영종도에 상륙하여 다수의 민간인을 살상하고 관아와 민가를 노략질한 다음 일본으로 돌아갔다.

이른바 운요호사건은 앞에서 제시하였던 모리아마의 정책제안을 그대로 실행에 옮긴 것이었다. 일본은 미국의 강압에 의해 문호를 개방하였던 역사적 경험을 역으로 조선에 적용하였다. 일본정부는 운요호 사건을 빌미로 조선외교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한 정책을 구체적으로 추진하기 시작했다. 일본정부는 운요호사건 처리와 수교 교섭을 위해 육군중장겸 참의 쿠로다 기요타카(黒田清隆)를 특명전권대신으로, 원로원의관 이노우에 가오루(井上馨)를 특명부전권변리대신으로 임명하였다. 전권단 일행이 출발하기에 앞서 일본정부는 청국이 종주권을 구실로 개입할 것을 우려하여, 외무소록 모리 아리노리(森有禮)를 주청특명전권공사로 임명하여 청국과 교섭하도록 하였다. 또한 일본에 주재하는 서구 각국의 공사들에게 이를 알리고 동의를 얻었다.

운요호사건에 이어 일본함대의 출현으로 조선의 항간에서는 위기감이 확산되었고, 정부는 대응책을 마련에 고심하였다. 일본전권대표가 군함을 앞세워 경기연안에서 시위를 계속하는 사태에 대하여 조선정부도 계속하여 이를 외면할 수만은 없었다. 조선정부는 일본의 무력시위에 직면하여 두 차례 서양 열강의 무력침공을 치룬 경험자로서 무관 신헌(申櫟)을 접견대관으로 선정하였다. 회담은 공식적으로는 3차에 걸쳐 진행되었다. 1차 회담에서 일본 측은 운요호사건에 대한 조선 측의 책임을 제기하였고, 2차 회담에서 운요호사건에 대한 해결책으로 조약체결을 요구하였다.²¹⁾

일본 측의 조약체결 요구에 대하여 2월 14일 고종은 영돈령부사 김병학(金炳學), 영중추부사 이유원(李裕元), 판중추부사 홍순목과 박규수, 그리고 영의정 이최응, 우의정 김병국(金炳國) 등 시원임대신들을 소집하여 대응책을 논의하였다. 이 자리에서 김병학은 일본의 태도와 행동으로 보아 그 목적은 修好에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戰爭을 도발하는 데 있는 것이라고 비난하였다. 이유원·홍순목·이최응 등도 이에 동의하였으나, 누구도 구체적인 대응책을 제시하지는 못했다. 다만 박규수는 “일본이 수호를 칭하면서도 군함과 군사를 대동하고 왔으니 그 의도를 파악하기가 쉽지 않다. 그러나 수호를 위한 사신이라고 말하고 있으니 우리가 먼저 이를 공격할 수는 없는 일이다. 만약 예상치 못한 사태가 발생한다면 병사를 동원할 수밖에 없을 것”이라고 했다. 그의 주장은 일본이 무장호위병을 대동하고 강화부에 들어와 조약체결을 요구하고 있는 상황에 대하여 그들을 힘으로 제압할 수 없는 조선의 입장을 보여주고 있다.

21) 金基赫, 앞의 논문, 34~36쪽.

공식적인 묘당회의에서는 개항에 대한 어떠한 합의가 이루어지지 않은 상황에서 사흘 뒤 일본 측의 통상조약 체결 요구를 받아들일 것을 결정하고 이를 접견대관에게 통보하였다. 즉, '皇'과 '勅'의 용어와 新印의 사용 등 외교문서의 형식이 문제가 되어 8년 간 타협점을 찾지 못하던 조선과 일본과의 외교교섭이 새로운 전환점을 맞이한 것이었다.²²⁾

고종과 시원임대신들이 회의에서 개항에 대해 적극적으로 검토하기 시작했을 때 대원군 세력 및 재야유림측에서는 이에 대한 반대 여론이 비등하기 시작했다. 그 대표적인 인물이 바로 최익현(崔益鉉)과 前司諫 장호근(張皓根)이었다. 고종 친정의 결정적 계기를 마련했던 최익현이 고종이 선도하고 있는 대일수교에 적극적으로 비판을 하고 나선 것이다. 최익현의 개항반대론은 이른바 왜양일체론이 그 핵심을 이루고 있었다. 최익현은 상소에서 “‘전하의 뜻으로는 어찌 저들은 자는 왜인이고 양인이 아니며, 그 거듭 말하는 것이 이미 수호라 하였으니 왜인과 수구(修舊)하는 것이 무엇이 해로운가’ 하시지 않겠습니까?”라고 하여 고종의 개항 명분을 정면으로 비판하였다. 최익현의 이와 같은 비판에 대해 고종은 다음과 같이 자신의 입장을 분명히 밝히면서 최익현을 흑산도로 유배시킬 것을 명하였다.

왜인을 제어하는 일은 왜인을 제어하는 일이고, 양인을 배척하는 일은 양인을 배척하는 일이다. 이번에 왜선이 온 것이 양인과 합동한 것인 줄 어떻게 확실히 알겠는가. 왜인이 양인의 척후라 하더라도 각각 응변할 방도가 있을 것이다.²³⁾

고종은 일본과의 조약체결을 “洋人은 洋人이고 倭人은 倭人이다”라고 주장하면서 자신의 결정을 정당화하였다. 즉, 조선이 조약을 체결하는 것은 지금까지의 교린관계를 회복하는 것이 지나지 않는다는 것이었다. 이와 같이 고종을 비롯한 조선정부의 입장은 조일수호조규 전문에서 조약의 정신으로 제시하였던 ‘舊好重修’였던 것이다.

3. 만국공법적 세계인식

조선정부는 1880년 12월 삼군부를 폐지하였고, 이듬해 1월에는 통리기무아문에 도상을 설치하고 시원임대신으로 겸임케 함으로써 새로운 대외환경에 대처하기 위한 정부 기구의 개편을 일단락 하였다. 이 시기 조선정부가 개혁정책을 추진하게 된 배경으로는 김홍집이 수신사로 다녀온 사절의 보고서에 기반을 둔 것이었다. 특히 조선이 대외정책 방향에 대해서는 그가 일본에 체재하고 있을 당시 만났던 주일청국공사관의 참찬관 黃遵憲이 저술하여 건네준 『朝鮮策略』이 국내에서 큰 반향을 불러일으켰다.

조선의 대외정책 방향의 급선무는 러시아의 남하를 막는 것으로, 이를 위해서 ‘親中·結日·聯美’라는 조선책략적 조선외교방향의 핵심은 聯美를 통한 以夷制夷에 있었다. 이에 대해 국내 재야유생들은 「嶺南萬人疏」에 나타났듯이 격렬히 반대운동을 전개하였다. 실로 1881년은 개항

22) 『承政院日記』 高宗13年 1月 20日; 『承政院日記』 高宗13年 1月 24日.

23) 『承政院日記』 高宗13年 1月 27日.

이후 암중모색하고 있었던 조선정부의 개혁정책이 그 모습을 드러내는 시기였으며, 또한 개항에 반대하는 세력들의 반발이 전국적으로 확산되었던 시기이기도 하였다. 영남만인소에 나타난 개방 반대 움직임에도 불구하고 조선정부의 개혁정책에 대한 의지는 확고하였고 그것은 조미수호 통상조약의 체결(1882.4.6)로 나타났다.

조미수호통상조약 체결로부터 2개월 뒤 서울에서 무위영·장어영·어영청의 군인들이 급료체 불과 급여양곡의 변질되어 지급된 것을 기회로 집권세력에 대한 무장시위를 전개하였다. 구식군인들에 의한 반란은 곧 서울의 빈민층으로 확산되어 고종은 대원군의 복권을 통해 이를 수습하였다. 대원군의 재집권은 일시 개혁정책의 중단을 초래하였으나 청국이 전과달리 즉각적으로 3,000명이라는 대규모의 군사를 파견하여 정권을 되돌렸다. 일본 또한 거류민보호와 공사관 습격 등의 문책을 위한 외교사절을 보내면서 다수의 군대를 파병하였다. 이러한 상황 하에서 고종은 다음과 같은 주목할 만한 조치를 반포하였다.

우리 동방은 바다 한 구석에 위치해 있어 외국과 교섭을 한 적이 없다. 따라서 건문이 넓지 못한 채 삼가고 단속하면서 나라를 지켜온 지 거의 500년이 되었다. 근래 들어 세계의 대세는 이전과는 현격하게 달라졌다. 영국, 프랑스, 미국, 러시아 같은 구미 제국은 정예로운 무기를 개발하고 부국강병을 도모하는 사업을 극대화하고 있다. 그들은 육로와 해로로 지구상을 두루 다니며 세계만방과 조약을 체결하는데, 병력으로 서로 견제하며 공법을 상호간에 지켜 가고 있으니 이는 흡사 춘추열국시대를 방불케 한다. 그 결과 천하에 유아독존적 지위에 있던 중국도 오히려 평등하게 조약을 체결하고, 서양을 엄격하게 배척하던 일본도 종내는 우호 통상조약을 맺게 되었다. 이런 일들이 어찌 까닭 없이 생겨났겠는가? 실로 대세가 그럴 수밖에 없어서이다.

이런 상황에서 우리나라도 병자년 봄에 거듭 일본과 수호조약(朝日修好條規)을 맺어 세 곳의 항구를 개항하였고, 이번에 또 미국·영국·독일 등과 새로이 화약(和約)을 조인하였다. 이는 처음 있는 일이니만큼 너희 사민(士民)들이 의아해하며 비방하는 것도 이상할 게 없다. ... 이러쿵저러쿵 떠들어 대는 자들은 또 서양의 여러 나라와 수호를 맺는 것을 가지고 장차 사교(邪教)에 물들게 될 것이라고 말하고 있다. 이는 실로 우리 유학을 위해서나 세상의 교화를 위해서나 심원하고 장구한 염려이다.

그러나 수호를 맺는 것은 수호를 맺는 것이고 사교를 금하는 것은 사교를 금하는 것으로, 이는 별개의 문제이다. 조약을 체결하여 통상을 하는 것은 다만 공법에 의거할 뿐이고, 애초에 본토에 사교를 전도하는 것을 허가하지 않고 있으니, 평소 공맹(孔孟)의 가르침을 익혀왔고 오래도록 예의의 풍속에 젖어 온 너희들이 어찌 하루아침에 정도(正道)를 버리고 사교(邪教)를 좇아갈 리가 있겠느냐. 만에 하나 어리석은 백성들 가운데 남 몰래 전도하며 익히는 이가 있다면 나라에는 그에 해당하는 법이 있어 그들을 주벌하여 용서치 않을 것이니, 숭상하고 물리치는 문제에 대해 손쓸 방도가 없다고 무어 걱정할 게 있겠는가.

... 그들의 종교는 사교이니만큼 음성(淫聲)이나 미색(美色)처럼 여겨 멀리해야 하겠지만, 그들의 기계는 정교하니 그것으로 이용후생(利用厚生)이 가능하다면 농기구나 의약품, 무기, 운송 수단을 만드는데 무엇을 꺼려서 하지 않겠는가? 그들의 종교는 배척하되 그들의 기계는 본받는 것은 실로 상치되지 않고 병행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하물며 강약의 형세가 이미 현격하게 차이가 나는 상황에서 저들의 기계를 본받지 않고 어떻게 저들의 침략을 막고 저들이 넘보는 것을 막을 수 있겠는가. 진실로 안으로 정교(政教)를 닦고 밖으로 우호조약을 맺어 우리나라의 예의를 지켜 가면서 부강한 나라들과 어깨를 나란히 하여 너희 사민들과 함께 태평 성세를 누릴 수 있다면

이 어찌 아름답지 않겠는가?

... 이제 다행스럽게도 어느 정도 일이 처리되어 예전의 우호관계가 다시 회복되었고, 영국·미국 등도 장차 줄지어 이를 것이다. 조약을 체결하고 통상하는 것은 세계 만국의 통례로 우리나라에서 처음 실시되는 것이 아니니 결코 경악할 일이 아니다. 너희들은 두려워하지 말고 안심하라. 선비들은 부지런히 공부하고 백성들은 마음을 놓고 농사를 지어 다시는 ‘양(洋)’이다, ‘왜(倭)’이다’라고 하면서 소란을 피우며 와전시키지 말라.

아, 어리석으면서 제멋대로 하는 것은 성인이 경계한 바이고, 아랫사람이윗사람을 비난하는 것은 국법으로 보아 주벌하는데 해당한다. 그러나 가르치지도 않고 형을 가하는 것은 백성을 그물질하는 것이기에, 이에 기술하여 분명하게 깨우치는 바이다. 그리고 이미 서양과 수호를 맺은 만큼 경외(京外)에 세운 척양(斥洋)에 관한 비석들은 상황이 달라졌으니 모두 뽑아버리도록 하라. 너희 사민들은 각기 이런 뜻을 잘 양지하라.’는 내용을 의정부로 하여금 게시하고 팔도(八道)와 사도(四都)에 시행하도록 하라.²⁴⁾

고종의 이와 같은 대외인식은 일찍이 서계문제에 대한 조정의 완강한 수용불가론에 대해 선접수 후 검토라는 입장, 그리고 일본과의 수교 당시 집권층 내외의 倭洋一體에 대해 ‘왜는 왜이고, 양은 양이다’라는 왜양분별의 단계를 거쳐, 이제는 개방이 대세라는 것으로 전환하였음을 보여주는 것이다. 즉 정치와 통상을 분리하고, 나아가 정교분리를 통한 사교금압에 대한 자신감을 표방하면서 열강과의 수교가 불가피함을 주장하고 있다. 척화비의 폐기를 분명히 함으로써 조선 정부는 대외정책에 있어서 명분과 실질의 일체를 이루었다.

이상에서 조선이 현재와 같은 규모의 세계와 만나는 시기 고종을 비롯한 집권세력의 대서양 및 대일본인식의 변화과정을 주로 『承政院日記』, 『高宗實錄』 등을 자료로 검토해 보았다. 조선의 개항과정을 검토 해보면 동아시아의 인접국 청국 일본과 공통적으로 겪었던 경험과 아울러 다음과 같은 특수한 성격도 지적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1876년 일본과의 조약체결을 눈앞에 둔 시점에서도 국내에서는 집권관료들의 대부분과 재야지식인 및 그리고 하층민 사이에서는 광범위하게 개항 반대론이 존재하였다. 광범위한 개항반대론에 존재하는 가운데 조선정부는 고종 친정 이후 적극적으로 개방정책을 추진하였고, 그 결과가 조일수호조규 체결이었던 것이다.

고종은 재야의 이른바 ‘왜양일체론’에 대해 ‘왜’와 ‘양’을 분리하여 일본과의 수교정책을 추진하였고, 1880년대 초 서양열강과 특히 미국과의 수교를 앞두고는 기독교 국가로서의 미국을 내세우면서 척사론을 거부하였고, 또한 정치와 통상을 분리함으로써 미국과의 수교를 추진하였다. 그리고 이와같은 개방정책에 대한 저항과 반발이 임오군란으로 나타났으나 청국의 즉각적인 군사적 개입으로 정권을 회복한 직후 공식적으로 개방정책 추진을 분명히 하였다. 이와 같이 자본주의 세계체제 내에서 왜와 양의 분리하고, 자본주의 열강 가운데 특정 국가에 대한 예외적인 인식의 틀이야말로 한국근대사상에 있어서 이른바 동양평화론적 사고, 인종론적 세계관에 입각한 세계인식의 원형을 제공하는 것이었다고 생각한다.

24) 『承政院日記』 高宗19年 8月 5日.

近代韩国东亚认识的起源与转变

崔德寿 (高麗大學)

〈目 次〉

1. “小中华”的东亚认识
2. “倭洋分别”的世界认识
3. “万国公法”的世界认识

1. “小中华”的东亚认识

本文研究了19世纪后半期, 朝鲜遭遇与今日相同规模的世界时, 执政势力对东亚的认识变化。众所周知, 19世纪中叶东亚地区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西方列强一直向东亚国家要求“门户开放”, 但这次与之前不同, 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国家之门。清王朝正因在英国以反对清王朝的禁烟行动为借口而向中国挑起的鸦片战争中失败, 才被迫开放了国内市场。日本也在佩里 (Mathew C. Perry) 率领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之军舰大炮威吓下屈服, 不得不开放门户。

佩里分别在1853年和1854年来到日本。当时他所率领的“黑船”是达到2, 500吨级的旗舰, 是世界上只有两艘的战力最强的军舰。与此相反, 当时幕府海军的军舰仅为100吨左右, 而大英帝国东方舰队的军舰也只约为1, 800吨左右。在美国通过武力逼使日本打开国门, 并与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的第二年, 佩里在美国地理统计学协会主办的公开演讲中, 就强调今后美国对外政策中东亚市场的重要性。其具体内容如下:

随着世界通商不断扩大, 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金矿的年均产出日益增加, 我们有必要运用这些资本。在此情况下, 美国政府衡量开拓市场, 扩展销路中的得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 美国要选择完全或部分确保独立且不受欧洲列强统治的东方国家缔结通商条约。虽然大部分东方国家属于英国与荷兰的势力范围, 而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也在东方占领“一席之地”, 但是依然有很多东方国家不受这些列强的政策干涉, 保持较为独立的状态。这些国家一般实行反文明的君主专制, 但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若适当地指导利用天然的自然环境, 那么从中得到的收益可成为这些国家开展通商贸易的基本源泉。(中略)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可能会有人反驳称: 上述的欧洲国家都在主张东方国家的管辖权, 因此决不会允许东方国家君主与美国签署条约。然而, 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如今拥有统治权的人, 才有力量行使其特权, 而只有君主行使其权力, 才会得到国家法律的支持。因此, 我主张别的国家并没有理由阻碍美国与独立的东方国家政府或部分民族签署条约。¹⁾

1) 〈ペリー提監意见书〉, 田中彰 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 开国》, 岩波书店, 1991, 11~12页。

繼佩里发表演讲10年后，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出现在朝鲜平壤。谢尔曼将军号是80吨级的轮船，船上有两门12磅的大炮和步枪等武器，还有24名船员。1866年8月9日，谢尔曼将军号由中国出发，向朝鲜驶去。它们不顾朝鲜地方官的劝止，沿着大同江溯流而上。在那里，他们向朝鲜要求通商，并无理索要财物，还绑架了官员。最终9月3日在平安监司朴圭寿发起的火攻下，人船俱灭。此后，9月11日朝鲜颁布《斥邪纶音》称：“若人人都阅读程子与朱子的著作，每个书生都铭记孔子与孟子的教训，奸徒、朋党就找不到立足之地，不会发生邪说、乱行。从而，即使我们不去阐明儒教之道，儒教也会自己显现其道理，即使我们不去排斥旁门左道，异端邪说也会自然排除在外。”²⁾

同年 10月 16日，法国舰队登陆江华岛，并占领江华府。率领法国舰队的提督罗兹(Pierre-Gustave Roze)以朝鲜王朝政府迫害天主教为借口，企图攻陷江华岛。朝军与法军在文殊山城和鼎足山城交战。11月18日，法军遭到朝军的强烈抵抗，最终因士气沮丧而退却。于是，由法国发动的武力入侵——“丙寅洋扰”以失败而告终。³⁾丙寅洋扰时曾被任命为同副承旨，但之后表示辞职的李恒老⁴⁾在自己所提出的上疏文中即称：

今日国论，两说交战，谓洋贼可功者，国边人之说也，谓洋贼可和者，贼边人之说也。由此则邦内保衣裳之旧，由彼则人类陷禽兽之域，此则大分也。粗有秉彝之性者，皆可以知之，况以殿下之明圣，岂容左腹之入也？（中略）其主国边之论者，又有两说，其一，战守之说也，其二，去豳之说也。臣谓战守常经也，去豳达权也，常经人皆可宁，达权非圣人不能也。⁵⁾

此番上疏的核心内容是要立足于华夷观，反对与西方国家签署条约并建立通商关系，以实力来击退入侵本国的敌人。⁶⁾而他的主张正与奇正镇的主张一脉相通，为大院君推行“攘夷”政策提供了基础。

而在1871年 5月，美国驻清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 Low)同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John Rodgers)率领科罗拉多号(Colorado)等三只护卫舰、两只炮舰，从日本长崎出发，开往朝鲜，以便与朝鲜签署通商条约。到朝鲜后，他们就动员80门大炮和1,230名兵力开始对朝鲜进行攻击，并占领草芝镇、德津镇以及广城堡。当时，美国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因此他们的军舰与武器都比较先进。简单比较一下两国军队的火力，美国占据绝对的优势。例如，朝军的火枪是1分钟能发射1-2发的前装式枪，而美军的雷明顿(Remington)步枪却是1分钟能发射10发的后装式枪。不仅如此，朝军大炮“红夷炮”的射程仅为700米左右，与此相反，美军9英寸炮和曲射炮的射程分别达到3,154米和980米。美军击退朝鲜炮队后，就以为自己对朝鲜的威胁够大，并在6月12日从朝鲜撤军。然而，朝鲜王朝政府并不屈服于美军的武装威胁，还是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结果，美军在7月3日，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朝鲜。⁷⁾

2) 金源模，《开化期 韩美 交涉关系史》，檀国大学出版社，2003，92~93页；金明昊，《审察 早期的 韩美关系》，历史批评社，2005，23~80页。

3) 李光麟，《韩国史讲座Ⅴ：近代编》，一潮阁，1981，31~39页。

4) 1792~1868。字为而述，号为华西。朝鲜末期的朱子学家，以卫政斥邪运动为闻名的崔益铉、金平默、柳重教都在他门下学习。

5) 《承政院日记》高宗3年 9月 12日；『华西集』卷3 〈辞同副承旨兼陈所怀疏〉。

6) 宋秉起（音译），〈锁国期的对美认识〉，《韩国人的对美认识》，MINUMSA, 1994，28~29页。

7) 金源模，《近代韩美关系史：韩美战争》，哲学与现实社，1992；李敏植（音译），《近代韩美关系史》，白山资料院，2001，95~121页。

朝鲜在1866年和1871年由法国和美国发动的血战中，屡遭重创，造成人员伤亡，但还是坚拒他们的开放要求。“辛未洋扰”结束之后，右议政洪淳穆在庆宴上，对国王进言：

我国之为礼义之邦，天下之所共知。而见今一种阴邪之气，流毒四方，惟此青邱一片独保干净者，寔以礼义相守。故自丙寅以后，攘斥洋丑，又可以有辞于天下。今虽此夷，若是侵犯，和之一字，断非可论。苟或强许其所欲，国何以一日为国，人何以一日为人乎？今此圣教严到，先示鈇钺之威。凡厥含生之伦，皆具秉彝之天，孰敢不仰体我圣上廓辟之大义？亦可使彼贼闻此，而胆破骨寒矣。8)

洪淳穆的此番发言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朝鲜执政势力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如何？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朝鲜王朝政府结束“辛未洋扰”之后，便在全国郡县树立了斥和碑。碑文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丙寅作，辛未立。”

总之，清王朝与日本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屈服，被迫开放市场，而朝鲜经历了两次洋扰之后，也依然坚持“小中华”的世界认识。

2. “倭洋分别”的世界认识

1872年，日本外务省将位于釜山的倭馆之名改为公馆，在对朝外交上，将对马岛排除在外，将那里完全归外务省管辖。日本的外务省否定对马岛的朝鲜通交权，升格为交涉的主体。⁹⁾对马岛藩所属官员和曾经作为有限的商人根据地的倭馆被中央政府管辖之后，除了对马岛商人，大阪、东京商人也开始进入釜山。对此，朝鲜王朝通告，今后将严格控制除对马岛商人以外的商人进行非法商业活动和小麦贸易。¹⁰⁾

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内部主张以武力解决在明治维新之后朝日两国的外交悬案——“书契问题”的强硬论高涨。参议西乡隆盛主张，以保护居留民的名义先派遣使者交涉，若交涉破裂或使者被朝鲜杀害，则可以将对维新政府的国内士族和农民的反感转向国外。¹¹⁾

日本政府的内阁会议决定将西乡隆盛作为大使派遣到朝鲜，还得到了天皇的裁可。但是当时，明治政府的主流势力为了修改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进行预备谈判和考察文物制度，在欧美停留，所以要等到他们回国之后再实行。然而进入9月，时隔约一年十个月才回国的主流势力却担心征韩政策获得成功时会弱化他们的地位，所以对此进行阻挠。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所谓“外游派”的核心人物以“桦太有限解决论”、“内治优先论”等的名义从中作梗，得到了天皇的同意，使征韩论遭到失败。反之，坚持征韩论的副岛钟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一齐辞职。因

8) 高宗实录》。高宗8年 4月 25日。

9) 咸东珠，〈明治初期(1868~1875)日本外务省的朝鲜侵略论和其性格〉，《史学研究》54, 1997. 朝鲜与日本的建交交涉内容是参考本文所引用的咸东珠的最近研究成果和拙著《开港和朝日关系》高丽大学出版社 2004的一章记载的。

10) 《日本外交文书》卷6, 282~283页，〈向草梁公馆守门将提交的有关日本商人查禁朝鲜贸易的方法的传令书〉。对于成为征韩论直接契机的这件“传令书”的存在与否，因我方的有关史料上没有出现而被怀疑。李瑄根，《韩国史：最近世篇》，乙酉文化社，1961，332~334页。

11) 《大西厢全集》卷2 754~756页，1873年 8月 17日 送给板垣退助的西厢隆盛之信。从田村贞雄著 〈征韩论政变の史料批判〉，《历史学研究》615, 1991，19页中再引用。

此，朝鲜问题与日本政府的派别斗争绞在一起，最终导致明治政府的政变。¹²⁾ 而在明治政府对征韩论发生分裂之后，约过了一个月。朝鲜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动——政权交替。1873年10月，高宗将崔益铉任命为承政院的同副承旨。而崔益铉向高宗提出辞同副承旨一职的上疏，全面批判了大院君的治国，还要求大院君的下野和高宗的亲政。¹³⁾ 他将废除万东庙、撤销书院、复活国贼、使用清钱等看作代表性的失政例子。

面对崔益铉的上疏，包括左议政姜老、右议政韩启源等高级官僚在内的户曹、礼曹、工曹、兵曹判书，均上疏辞呈，进而成均馆儒生们通过卷堂，加入高级官僚领导谴责崔益铉的行列。接着，12月16日承政院的成员和弦文馆、司宪府、司谏院的台谏们同时辞职，从而围绕崔益铉上疏的政治问题面临了重大关头。¹⁴⁾ 但是最终，过了一个月后，朝政内支持大院君的势力被逐出。就这样，高宗交替了朝政内执政势力，接着到1874年，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派遣微行御使，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¹⁵⁾

在这个时期，派遣微行御使的政治目的有可能分为两点。被遣到庆尚左道的微行御使朴定阳是代表人物。朴定阳的微行御使活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他的主要活动大分为两种。一是，对庆尚道观察使金世镐、东莱府使郑显德、倭学训导安东峻等负责对日外交的官僚进行调查。二是，接触日本驻釜山倭馆的官僚。从朴定阳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知道，新政权对内削弱了中央和地方大院君的现有势力，同时对外迅速推进了与日本的关系改善。

这种两国谈判态度的变化，可以反映成功解决台湾问题的大久保政权对外展示的信心，而更直接的原因是像上述所说那样，在大院君退位后日本政府趁朝鲜王朝改变对日外交之际采取的积极政策。¹⁶⁾ 加上在准备与朝鲜的交涉实务的过程中，继续主张征韩论，并把它落到实处的日本外务省的角色也不可或缺。¹⁷⁾

按照上述的协议，森山茂在1875年2月下旬到达釜山，提交书契后，开始与朝鲜当局进行交涉。关于东莱府的报告，朝鲜朝政进行讨论：

王曰：“若没读完送来的书契，这很不是诚信的道理。而且那个倭人承诺，若阅读后有部分难以实行的话，即使拒绝一百次，也应该受拿回去，所以这次，我们先受看一看，若有部分不符常理，可以再次拒绝。”（中略）金炳国曰：“倭寇本来很狡猾，相信以前的说法或在书契上真书和谚书混杂是前所未有的。但臣认为，先仔细看看有没有不符常理，若有的话，应当按照事理拒绝，这是恰到好处的。”（中略）王曰：“接受状启后，已过了好几天，所以非得马上处理不可。我明明知道倭人的实情是毋庸置疑的。”¹⁸⁾

从上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朝鲜的两种立场。一派主张传统的朝日外交形式，不应该接受

12) 藤村道生，〈征韩论争上外因和内因〉，《国际政治》37，1967（《日本外交史の诸问题》3，有斐阁）；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变研究》，中央公论社，1979。日本政府在着手解决替征韩政策提出的桦太问题之际，日本国内士族的反政府运动逐渐高涨。除了西厢隆盛以外，辞参议职的前人议员以板垣退助为主提交了设立民选议员的建白书，展开“自由民权运动”，并以审问朝鲜无礼为借口在佐贺引起了武装起义。受到冲击的政府感觉到迫切需要将征韩派的不满转移到海外，最终以有琉球人在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为理由，计划侵略台湾。虽然3月1日江东起义被镇压，政府紧急准备出兵台湾，于5月2日以武力侵略台湾。

13) 李瑄根，《韩国史：最近世篇》，乙酉文化社，1961，338~340页。

14) James B. Palais, 李勋相译，《传统韩国的政治和政策》，SHINWON文化社，1993，295~332页。

15) 韩哲浩（音译），〈高宗亲政初(1874)派遣微行御使与其活动〉，《史学志》31，1998，193~244页。

16) 金基赫，〈江华岛条约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国史馆论丛》25，25~26页。

17) 在对明治政府初期外务省的对朝鲜政策和征韩论进行分析时，参考了咸东珠编的上述论文 217~230页。

18) 《承政院日记》高宗12年 2月 5日。

书契。另一派则主张不应该拒绝接受书契本身。与在1868年对拒绝接受书契的议论有不同点,即出现了先接受外交文书后进行研究的立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高宗率先主张接受书契来积极解决对日外交问题。

高宗说:“即使在书契的内容上有问题,拒绝接受书契本身是违反诚信道理的”,“我明明知道倭人的实情是毋庸置疑的”,“本次书契有部分修改。”主张接受书契。但是议政府大臣李龙佑和元老大臣都站在反对的一方,故意拖延东莱府状启德会谈,并以“皇”、“大”等的词汇和新印的使用为由,仍然拒绝接受。也就是说,高宗个人表示积极的态度,而多数朝政大臣却反接受书契。

对1875年2月的书契,朝鲜王朝以使用“大日本”、“皇上”等词汇,用日语记载本文,交还朝鲜曾发给对马岛的图书,参加接待使臣的欢迎宴会时穿西服等为由,最终拒绝了接受书契。确认朝鲜王朝立场的森山茂一行向政府报告协商的结果,同时提出在四月使用动员炮舰的武力开放政策。¹⁹⁾

这完全模仿西方列强要求日本开港时所使用的炮舰外交。结果,在4月20日云扬号军舰侵入了釜山港。朝鲜朝野对日本派遣军舰的危机意识逐渐高涨,此时朝廷再次进行对书契问题的讨论。在日本军舰在釜山对朝鲜进行武力挑衅后的第二天,即5月10日,高宗就召集元老大臣和六曹的正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进行了有关外务省书契问题的会议。²⁰⁾在此会议上,朴圭寿和李最应等主张接受书契,而金炳国等7人则站在反对一方,剩下的24人持保留或模糊的态度。日本开始进行武力示威后,多数朝政大臣还是拒绝接受书契本身。对主张接受书契的朴圭寿等少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根据是,要避免与日本的武力纠纷,首先需要接受书契。在对日本使用武力的朝野危机意识高涨的情况下,他们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云扬号军舰在8月21日停泊在汉江河口江华岛沿海,一些船员乘小船,出其不意地沿汉江而上。草芝镇炮台的炮兵们发现侵略者,立即开了炮。而停泊在草芝镇的大炮射程之外的云扬号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但是云扬号用舰炮轰击草芝镇,于次日登陆永宗岛,杀害大批居民,抢劫财产,以后回到了日本。

云扬号事件是日本将上述所说的森山茂政策建议直接落到实处的结果。日本曾经被美国逼迫开放门户,而今将这种经验适用于朝鲜。日本政府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开始推进能够解决朝鲜外交问题的具体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处理云扬号事件和进行建交交涉,任命陆军中将兼参议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并任命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办理副大臣。日本政府由于忧虑清王朝以宗主主权为借口介入朝鲜问题,在全权团一行出发之前,任命森有礼为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派他与清王朝进行交涉。同时,向西方各国驻日公使通知这一事实,并得到了同意。

继云扬号事件之后,又出现了日本舰队,从而使朝鲜的港口间危机意识逐渐扩散,政府为对策煞费苦心。面对日本全权代表调动舰队继续进行示威的事态,朝鲜王朝政府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朝鲜政府曾经历过两次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所以本次将武官申櫨选定为接见大官。朝日共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第一次会谈上,日方提出了对云扬号事件的朝方责任,在第二次会谈上还要求签订条约作为解决云扬号事件的方案。²¹⁾

面对日本的条约要求,高宗在2月14日召集了领敦宁府事金炳学、领中枢府事李裕元、判中枢府事洪淳穆与朴圭寿、领议政李最应、右议政金炳国等元老大臣,讨论了应对方案。在会议上金炳学指出,从日本的态度和行动来看,其目的在于挑衅战争,而不在于建交。李裕元、洪淳穆、李最应也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谁也没能提出具体的对策。只是朴圭寿说:“日本希望与我国建交,但又狡猾地带着军舰和军队来,所以很难把握日本的意图。但是日本说他们只是为建交派遣使臣,所以我

19) 《日本外交文书》卷8, 71~72页。

20) 《承政院日记》高宗12年 5月 10日。

21) 金基赫, 上述论文, 34~36页。

们不能先攻击他们。若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情，我们也不得不动员军队。” 从中可见，日本带着武装护卫队进入江华府，还要求建交，但是朝鲜无法用武力手段控制日本。

在正式庙堂会议上未能达成有关开港的任何协议，三天后决定了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并向接见大官通报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由于“皇”和“敕”等词汇、新印的使用等外交文书的形式与以往的外交惯例相悖，在8年间得不到妥协，而此次朝日的外交交涉才迎来了新的转折点。²²⁾

高宗和元老大臣在会议上开始积极考虑开港，但遭到大院君势力和儒林的严厉反对。其代表人物是崔益铉和前司谏张皓根。曾经为高宗亲政提供决定性契机的崔益铉，这次却积极批评高宗主动推进与日本建交。崔益铉的开港反对论核心在于倭洋一体论。崔益铉向国王上疏说：“殿下，您的意思是侵略者为何是倭人，而不是洋人，殿下屡次强调友好，那么您会说改变与倭人的关系有什么危害呢？”这样正面反驳高宗的开港理由。高宗对崔益铉的批评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还下令将崔益铉流放到黑山岛。

控制倭人是控制倭人，排斥洋人是排斥洋人，这是两回事。我们如何知道这次倭船登陆朝鲜的事是否与洋人合作？倭人即使为洋人当走狗，也有各个应对方案。²³⁾

高宗在与日本签订条约问题上主张“洋人是洋人，倭人是倭人。”，将自己的决定正当化。换句话说，朝鲜与日本签订条约只是恢复两个邻邦关系而已。这样，包括高宗在内的朝鲜王朝政府的立场是在《朝日修好条规》全文上作为条约精神提出的“重修旧好”。

3. “万国公法”的世界认识

朝鲜王朝在1880年12月废除了三军府，次年1月在统理机务衙门设立了都相，并命元老大臣兼任。这样，为了应对新的对外环境的政府机构的改组告一段落。在这时期，朝鲜王朝基于修信使金弘集赴日本后提交的报告，推进了改革政策。尤其在朝鲜的对外政策方向方面，他带回的一本清王朝驻日公使馆的参赞官黄遵宪所写的《朝鲜策略》，引起了朝鲜政局强烈的反响。

对朝鲜来说，对外政策方向的当务之急是防止俄罗斯的势力南下，为此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策略，即朝鲜外交方向的核心在于引进美国，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解除俄罗斯的威胁。但是国内儒生展开了激烈的反对运动，岭南地区儒生甚至上了“万人疏”。事实上，1881年是开港后一直在暗中摸索的朝鲜王朝的改革政策露出水面的时期，也是反对开港的声音扩散到全国各地的时期。虽然岭南万人疏显示出反对开放的立场，但朝鲜王朝对改革政策的意志很坚定，并在1882年4月6日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在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后两个月时，武卫营、壮御营和御营厅的军人由于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还不满在军米中掺入沙子与米糠，而在汉城发动了武装起义。旧式军人所引起的起义迅速扩散到汉城的贫困阶层，结果，高宗请大院君入宫来平息纷乱。大院君重新执政导致改革政策中断，但是清王朝与以前不一样，立即派遣3千名的大规模军队镇压动乱，恢复政权。日本也为了保护居留民和追究公使馆受到袭击的责任，派遣了外交使节和大批军队。在此情况下，高宗颁布了

22) 《承政院日记》 高宗13年 1月 20日；《承政院日记》 高宗13年 1月 24日。

23) 《承政院日记》 高宗13年 1月 27日。

以下的诏敕，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东方位于大海的角落，没有经验与外国交涉。因此，近500年来，我们见识浅薄，闭关锁国，过于坐井观天。如今世界的大势与过去有天壤之别。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帝国正在积极开发武器，谋求富国强兵。他们通过陆路和水路走遍天下，签订与世界各国的条约。他们以兵力相互牵制，相互遵守公法，仿佛回到春秋列国时代。结果，处于唯我独尊地位的中国也签订了平等条约，严厉排斥西方的日本也终于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是何故呢？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在丙子年春天多次签订朝日修好条约，开放三个港口，此次又与美国、英国、德国等签订了新的和约。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你们士民感到惊讶或进行诽谤是情有可原的。……对此议论纷纷的人又主张，若与西方各国签订修好条约，将来都会染上邪教。这实际上无论是为了我们的儒学，还是为了世界教化，都是深远和长远的忧虑。

但是，签订修好条约是签订修好条约，禁止邪教是禁止邪教，这两件事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签订条约来进行通商只是按照公法进行的，始终不允许在本土传播邪教。而且平时学习孔孟思想、习惯于讲究礼仪的你们怎么可能一朝突然放弃正道，追求邪教呢？万一有愚蠢的老百姓偷偷地传道和学习邪教，国家绝对不会容忍，按照有关法律，将诛伐他们。所以对崇尚或排斥邪教的问题，你们还有什么担心的？

……他们的宗教是邪教，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而他们的机械非常精巧，从他们那里可以学习制造农具、医药品、武器、运输手段。这样可以将之利用于厚生，何乐而不为？我们在排斥他们宗教的同时，可以模仿他们的机械，这两件事不是矛盾的，而可以并行的。何况在强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模仿大门的机械，如何阻挡他们的侵略，又守护他们所垂涎的东西？对内打下政教基础，对外签订友好条约，遵守我国礼仪，与富国、强国并肩行走，都能够享受太平盛世，这世界会多么美丽啊！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一定程度上收拾了混乱局面，恢复了以前的友好关系，还将与英国、美国等国家修好。签订条约、进行通商是世界万国的通例，不是我国首次实施的，所以毋庸置疑。你们不要怕，请放心。书生必须用功读书，老百姓必须安心干农活，千万不要对“洋人”或“倭人”说长说短，不要闹事。

啊，圣人警戒乱说乱动，国法将小辈批评长辈看作应当诛伐的对象。但是在没有教授的情况下，直接惩罚，这是使老百姓自投罗网，所以我在此以提醒你们。还有，我们已经与西方国家建交，所以要将在京外树立的斥洋碑都拿掉。我希望你们理解各个意义。议政府要揭示上述内容，使之在八道和四都积极实行。²⁴⁾

高宗的这种对外认识显示了早期在朝政顽强拒绝接受书契的问题上，站在先接受后检讨的一方，在与日本建交时，执政层内外提出“倭洋一体论”，而今他经过“倭是倭、洋是洋”的“倭洋分别论”站在开放是大势所趋的立场。也就是说，他将政治和通商分开处理，进而通过政教分离来禁压邪教表示自信，同时主张与列强的建交是不可避免的。加上明确下令拿掉斥和碑，从而在朝鲜政府的对外政策上实现了名分与实质的一体化。

以上内容是参考《承政院日记》、《高宗实录》等资料，研究包括高宗在内的执政势力在朝鲜接

24) 《承政院日记》高宗19年 8月 5日。

触与今日相同规模的世界时改变对西方的认识、对日本的认识的过程。研究朝鲜的开港过程，可以指出与东亚邻国的清王朝和日本同样的经历和特点。在1876年与日本签订条约之前，国内大部分执政官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仍然主张开港反对论。在反对论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朝鲜王朝自高宗亲政以来积极推进开放政策，结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

对所谓“倭洋一体论”，高宗将倭和洋的概念分开，推进与日本的建交政策，在1880年初与西方列强，尤其是与美国建交之前，尊重作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拒绝斥邪运动，并通过分离政治和通商来推进与美国的建交。对这些开放政策的反抗和反驳导致了壬午军乱，即请清王朝派遣军队，恢复政权，之后便正式推进开放政策。本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内区分倭人和洋人，在资本主义列强中摆脱对特定国家的偏见，这种认识框架才是为韩国近代史提供了基于东方和平论思维、人种论世界观的世界认识的原型。

近代韓国における東アジア認識の起源と転換

崔徳壽（高麗大学校）

〈目 次〉

1. 小中華論的東アジア認識
2. 倭洋分別論的世界認識
3. 万国公法的な世界認識

1. 小中華論的東アジア認識

本稿は19世紀後半、朝鮮が今日のような規模の世界と接していた時期、東アジアに対する支配勢力の認識が変化する姿を検討したものだ。周知のように、19世紀半ば、東アジア地域に押し寄せた資本主義的列強による通商開放の要求は以前とは異なり、最新鋭の武器を搭載した炮艦を前面に出し、国家が主導した。清国は、中国に対するアヘンの輸出を禁じたことに反発し英国が挑発した戦争に敗れたことで、日本はペリー（Matthew C. Perry）が率いる新興資本主義国家の米国の最新鋭の艦隊による武力行使に屈して国内市場を開放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1853年とその翌年、ペリーが率いる「黒船」は2500トン級の旗艦で、当時としては世界で2しかない最強の戦艦であった。当時、幕府の海軍船舶は100トン級前後であり、大英帝国海軍東洋艦隊の戦艦も1800トン級ほどだったという。武力行使を通じ幕藩体制下の日本を開国に追い込んだペリーは日本と和親条約を締結した翌年、米地理統計学会が主催した公開講演の場において、米国の対外政策のうち、今後の東アジア市場の重要性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触れている。

世界の通商は全体的に増大し、拡大しており、またカリフォルニアとオーストラリアの金鉱が毎年生んでいる資本は常に増加の一途をたどっているため、これを活用する必要性に直面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状況の下、アメリカ合衆国政府が新たな貿易ルートを確立する作業の損得に注目するのはきわめて重要だ。つまり、全面的或いは部分的に欧州列強の支配から独立を獲得しており、主権を認められるのが妥当でありながら重要であると認識している東洋諸国との通商条約を締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主に英国とオランダまた限定はされているものの、フランス、スペイン、ポルトガルが東洋の大半へ勢力を拡大してきた。しかし、こうした列強の強力な政策から脱却して比較的独立を維持しており、耕作人口の多い国が広範囲に残っている。こうした国家らは反文明的な専制君主によって支配されているものの自然に恵まれている。適切な地図があれば、生産物から得る収益はこれら諸国が通商を行う上で一般的な源泉になるだろう。（中略）私の提言に反論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つまり、前述した欧州諸国のうち、一カ国または数カ国がこれら東洋諸国に対し管轄権を主張しているため、東洋諸国の君主がわが国に条約を締結する権利を一切認めないという反論だ。しかし、文明化された今日において統治権というものはその権利を主張する君主に自らの特権を行使する力があることが立証されてから初めて国家の法で認められるためだ。これは交戦中の封鎖権についても同様だが、十分な力によって維持されてこそ国の法として認められる。したがって合衆国政府が他のいかなる国か

らも事実上独立していると知られている東洋諸国の現地政府や民族の一部、もしくは全部との条約を妨害する正当な理由は多少たりともないと私は主張しているわけだ。1)

ペリーがこのような講演を行った時点から10年後、大同江を溯上して朝鮮の平壤に米国籍の商船ジェネラル・シャーマン号が現れる。ジェネラル・シャーマン号は80トン級の蒸気帆船で12パウンドの大砲2門と小銃で武装していた。さらにこれには乗組員24名が乗っていた。ジェネラル・シャーマン号は1866年8月9日、中国から出航し朝鮮に向かっていて、朝鮮の地方官が引き止め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大同江を溯上した。彼らは朝鮮側に通商を求めると同時に、略奪を働いたり官吏を連れ去るなどの行為をした挙句、9月3日平壤監司の朴圭寿による火攻めの命令によって、船体が焼き討ちされ、乗組員は全員杀害された。そして9月11日には、「人々が程子と朱子の本を読み、ソンビ（学識はあるが官職につかない人、译注）が孔子と孟子の教訓を肝に銘じれば、よこしまで派閥を作る連中は頼るところがなくなり、邪説と乱行が起こらないこととなる。そこで儒教の道を明らかに使用としなくても、自ら明らかになるだろう。また、異端の学問は排斥しなくても自然と排斥されることとなる」との旨の斥邪論音が頒布された。2)

同年10月16日には江華島にフランス艦隊が上陸し、江华府を占領した。当時、フランス艦隊を率いていたローズ提督は朝鮮で起こったキリスト教弾圧事件を口実に远征に乗り出した。朝鮮軍は文殊山城と鼎足山城でフランス軍と交戦し、11月18日、朝鮮軍の強い抵抗にぶつかったフランス軍が漢江の封鎖を解除し、退却したことで丙寅洋擾は事実上終わりを迎えた。3) 战斗の途中、同副承旨に任命されたものの、辞職の意思を表明した李恒老は以下のように上疏した。

今日の国論については2つの意見が対立していますが、西洋の敵との戦いを求めるのが国の立場に立っている者の主張であり、西洋の敵との講和を求めるのが敵の立場に立った者の主張であります。前者に従えば、国内に受け継がれてきた文物・制度は保全できるものの、後者に従えば人類は禽獣と同じになりかねないため、これは重要な分かれ目であります。堂々たる良心が少しでもあるのなら、誰でもわかることであるのに、いわんや殿下におかれましては分別されず受け入れられるでしょうか。（中略）国の立場に立って論議を主張する者もまた二つに分かれています。一つは戦って守るべきだと主張する見解であり、もう一つは古くからの都を捨てようとする見解であります。臣が思うに、戦い守るのが正当な道理であり、都を捨てるのは一時しのぎにほかならなりません。正当な道理は人々が皆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が、一時しのぎは聖人でない限り、うまく実行できません。5)

李恒老の上疏の核心は華夷観に立脚し、西洋との条約の締結と通商に反対し、侵略した敵は実力で追い拂わ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にあった。6) こうした主張は当時、上疏を行った奇正鎮のそれと一脉相通するところがあり、大院君が攘夷政策を進める上で大きな力となった。

一方1871年5月には、駐清米国公使のロー（Frederick F. Low）とアジア艦隊司令官ロジャース

1) 「ペリー提督意見書」、田中彰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開国』、岩波書店、1991、p11～12。

2) 金源模、「開化期における韓米交渉関係史」、檀国大学校出版部、2003 p.92～93；キム・ミョンホ、「初期における韓米関係の再証明」、歴史批評社、2005、p.23～80

3) 李光麟、「韓国史講座Ⅴ：近代編」、一潮閣、1981、p. 31～39参考

4) 1792～1868. 字は而述、号は华西。朝鮮末期の性理学者であり正斥邪論者として有名な崔益鉉、金平默、柳重教などが彼の門下で修学した。

5) 『承政院日記』高宗3年9月12日；『华西集』巻3 「辞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

6) 宋炳基、「鎖国期の対米認識」、『韓国人の対米認識』、民音社、1994、p.28～29。

(John Rodgers) が朝鮮政府に条約の締結を迫るため、コロラド号をはじめとする護衛艦3只、炮艦2只、大炮80門、兵力1230名を率いて日本の長崎から朝鮮に向け出発した。朝鮮に到着したロジャースの艦隊は6月10日から朝鮮への攻撃を開始し、草芝鎮と徳津鎮を経て、広城堡までを占領した。当時、米軍が乗ってきた軍艦や武器は南北戦争が終わったばかりであったため、最新鋭のものだった。両国軍の火力を簡単に比較してみると、朝鮮軍の使用していた火縄銃は前装式の銃炮で1分あたり1発か2発を発砲できたのに対し、米軍の使っていたレミントン小銃は後装式で10発も発砲が可能だった。また、大炮の場合、朝鮮の紅夷炮の射程距離が約700mであったのに対し、米軍のインチ炮のそれは3154m、曲射炮は980mの射程距離を誇っていた。つまり火力の面において朝鮮軍と米軍はすでに比べ物にならないほどその差が大きかったのだ。朝鮮側の砲台を占領し、破壊するという本来の目的を達成した米部隊は朝鮮に対する脅威と報復に成功したと判断し、6月12日に撤退する。しかし米軍による武力行使にもかかわらず、朝鮮政府は交渉に応じる姿勢を示さず、結局7月3日米軍は朝鮮を去った。⁷⁾

朝鮮は1866年と1871年、フランスと米国の武力挑発により多数の死傷者や甚大な被害を被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最後まで彼らの开国要求を拒否した。辛未洋擾の後、右议政洪淳穆は宴の席で国王に次のように発言した。

わが国が礼儀の国であることは世界中で知られています。今一種の不純な気運が世界中に害を与え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わが国だけが唯一、純潔性を維持できたことは、まさしく礼儀を守ってきたためです。丙寅年以降、西洋を排斥したことは世界に誇れることです。今、洋夷がこうのように侵略に乗り出しているものの、和親については決して議論できません。もし彼らの要求を受け入れざるをえないこととなれば、国は一日も国の役割を果たせず、人も一日も本分を全うできません。今回に聖上の命令が厳しいだけにまず、征伐する威厳を発揮されれば、皆が堂々たる義理を生まれもっている以上、不純なものを排斥される殿下の大きな義理を誰もが仰ぐでしょう。また、あの敵が今の話を聞けば胸を冷やすでしょう。⁸⁾

このような洪淳穆の発言は当時朝鮮の支配層が西洋に対し、いかなる認識を持っていたのかを端的に示す。こうした認識の延長線上で朝鮮政府は辛未洋擾の直後に「洋夷侵犯するに戦いを非とするは則ち和なり。和を主とするは卖国なり」(洋夷侵犯非戦則和、主和卖国)という斥和碑を全国の郡县に建てさせた。

これまで検討したように、清国と日本は各々西洋列強による武力の行使に屈し、国内市場を開放しており、また朝鮮は二回に亘る洋擾を経験した後にも小中華論的世界認識を堅持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

2. 倭洋分別論的世界認識

1872年、日本の外務省は釜山に設置されていた倭館を公館と改称することで、朝鮮外国から対馬を外すとともに完全に外務省の管轄下に編入した。つまり日本の外務省は対馬の朝鮮通交権を

7) 金源模、『近代韓米关系史：韓米戦争篇』、哲学と現実社、1992；イ・ミンシク、『近代における韓米关系史』、ヒャクサン資料院、2001、p. 95～121参考。

8) 『高宗実録』 高宗8年 4月 25日。

否定したことで、交渉の主体として浮上することとなった。⁹⁾ 对马藩所属の馆員と限られた商人の根据地であった倭館を中央政府が所管するようになると、对马商人ではなく大阪や東京の商人が釜山に進出し始めた。これに対し朝鮮政府は对马商人ではない商人による不法の商行為と密貿易を厳しく規制すると通告した。¹⁰⁾

日本政府内では、これを機会に明治維新以降、日朝两国の外交悬案となつたいわゆる「书契问题」を武力を通じて解決しようとする强硬論がくすぶり始めた。閣議で西郷隆盛は居留民の保護を掲げ、使節を派遣し交渉するものの、交渉が決裂し、万が一使節が朝鮮で杀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すると維新政府に対する国内の士族と農民の反感を外に向ける好机となりうると主張した。¹¹⁾

日本政府の閣僚会議では西郷隆盛を朝鮮に派遣する大使として決めるとともに天皇から裁可を得た。しかし、明治政府の中心勢力が当時、西欧列強との間に締結した不平等条約の改正に向けた予備交渉及び文物・制度を視察するため欧米に滞在していたことで実行は彼からの帰国待ちとなり、先送りされた。ところで9月に入り約1年10月ぶりに帰国した中心勢力は征韓策が成功した場合、左派の政治における影響力の低下を懸念し、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た。外游派の中心人物であった岩倉具視と大久保利通などは樺太先決論、内治優先論などを名分として働きかけた結果、天皇の同意を得たことで西郷隆盛の征韓論は頓挫してしまう。これを受け、征韓論を主張していた西郷隆盛はじめ副島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诸参議が一齐に辞职した。朝鮮問題は政府内の派閥対立とからんで、ついに明治政府の政変へと展開したわけだ。¹²⁾

一方、征韓論をめぐる明治政府の紛糾が起こってから約一ヶ月後、朝鮮においても支配勢力が交代する政治の一大変化が起こっていた。高宗は1873年10月、崔益鉉を承政院の同副承旨に任命する。これに対し崔益鉉は同副承旨を辞职する上疏の中で、大院君の治世全般にかけて总体的に批判し、大院君の下野と高宗の亲政を求めた。¹³⁾ さらに、失政の代表例として万东庙の撤去、书院の闭鎖、国贼の名誉挽回、清钱の使用などを取り上げた。

崔益鉉の上疏に対し、左议政姜と右议政韩启源といった高官をはじめとする戸崔益鉉への糾弾に加わった。続いて12月16日には承政院の官吏、弘文館、司宪府の台諫らが一齐に辞职したことで崔益鉉の上疏をめぐる政治問題は重要な瀬戸際に立た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¹⁴⁾ しかし、結局崔益鉉の上疏以降、一ヶ月前後に大院君を支持していた勢力は朝廷から完全に追い出された。高宗はこのように、朝廷内の支配勢力を交代させており、1874年に入ると各地方に暗行御史を派遣

9) 咸东珠、「明治初期(1868~1875)における外務省の朝鮮侵略論とその性格」、『史学研究』54、1997.朝鮮と日本の修交をめぐる交渉の内容は本稿で引用した咸东珠の最近の研究成果と拙著、『开港と朝日关系』、高丽大学校出版部、2004の一章を基に記述した。

10) 『日本外交文書』巻6、p. 282-283「日本承認の朝鮮貿易に対する取締り方法に関する草梁公館守門将への伝令書」。いわゆる征韓論の直因となったこの「伝令書」が実在したかについては韓国側の関連史料では見当たらない点などを挙げ疑問が提起されたりした。李瑄根、『韓国史：最近世篇』、乙酉文化社、1961、p. 332~334。

11) 『大西郷全集』巻2、P. 754-756、1873年8月17日付け板垣退助宛の西郷隆盛の書簡。田村貞雄、「「征韓論」政変の史料批判」、『历史学研究』615、1991、P.19から再引用。

12) 藤村道生、「征韓論争における外因と内因」、『国際政治』37、1967(『日本外交史の諸問題』3、有斐閣);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研究』、中央公论社、1979。日本政府が征韓政策の変わりに主張された樺太問題の解決に乗り出した頃、日本の国内では士族の反政府運動が次第に激化していた。西郷隆盛を除き、辞职した参議らは板垣退助を中心に民撰议院設立建白書を提出し「自由民権運動」を開始した。また朝鮮の无礼を尋問するという名の下、佐賀地方では武装蜂起が発生した。冲击を受けた日本政府は征韓派の不满を国外にかわす必要性を痛感し、当時漂流していた琉球人を台湾の先住民が杀害した事件を理由に台湾侵攻を計画した。そして3月1日、収ま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政府は

13) 李瑄根、上掲書、p.338~340

14) James B. Palais、李勛相译、『伝統韩国の政治と政策』、シンウオン文化社、1993、P. 295~332

し地方に対する中央政府の統制を強化しようとした。

この時期、暗行御史の派遣の政治的目的を大きく二つに分けられるが、庆尚左道の暗行御史として派遣された朴定陽が代表的な事例だと言える。朴定陽の暗行御史の活動は大きく二つの側面に注目できる。彼の主な活動は大きく庆尚道觀察使の金世鎬、东来府使の郑显德、倭学訓導の安东峻など対日外交を担当していた官僚に対する調査と、もう一つは釜山に設置されていた倭館駐在の日本官吏との接触であった。朴定陽の活動から分かる事実是新政权が中央と地方で大院君の既存勢力を弱め、対外的には日本との関係改善を急速に推進したという点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両国の交渉姿勢の変化は台湾問題を成功裏に終結させた大久保政权の対外的な自信を反映するものだと言えるが、より直接的な要因は上述したように大院君の失脚後に朝鮮政府の対日外交の変化の機会を狙った日本政府の積極的な政策だと言える。ここでは朝鮮との交渉実務を準備する中、持续的に朝鮮侵略論を主張しこれを実行に移した日本外務省の役割が大変大きい。

前述の合意により森山は1875年2月の下旬に釜山に到着し、書契を提出し現地の朝鮮当局者との交渉をスタートした。东来部の報告に対し朝廷では以下のような議論が進んだ。

「届けられた書契を最後まで受け取らないことは誠信の道理ではないようだ。また、倭人が受け取った後に万が一、従わないことがあれば100回受け取らなくても戻させると条件つきで約束したので、今回は持ってこさせ、実際に格式に反する点があれば、再び追い払う事ができないこともないようだ。」(中略)金炳国は「倭情はもともと狡猾であるため、前の言葉に準拠し信じたり、書契に真書と謄書が混ざっていた事は前にもなかったけれども、一度詳しく検討した後、果たして格式に反する点があれば、道理に基づいて追い払うことが実に事の体面にふさわしいと思われます。」と、述べた。(中略)王曰く「状啓が上がってから既に何日経っている為、すぐに対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倭人の失政は別に疑いの余地が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るだろう」

上の記録から分かるように大きく二つの立場があ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一つは伝統的な日朝外交の形を主張しながら、これを受け入れてはならないとする立場である。もう一つは書契自体を拒否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立場である。1868年に書契の受け入れを拒否した時期の議論と異なる点は外交の文書を一度は受取り、検討しようとする立場が新しく出てきたことにある。ここで注目される点はこれと同様に書契を受取り、積極的に対日外交を解決しようとする立場の先頭に高宗がいたという点だと言える。

高宗は書契の内容に問題があったとしても書契を受け取ること自体の拒否は「誠信に反する」、「倭人の実状は別に疑う余地が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るだろう。」とし「今回の書契は改めるべきところがある」とし、書契の受け入れを主張している。しかし、議政府の代わりに李用雨と時原任大臣は高宗の態度とは異なり东来部の状啓の回答を遅らせており、依然として「皇」、「大」などの用語と新印の使用などを言及し拒否していた。高宗は個人的に積極的な態度を明らかにしたが、朝廷大臣の世論は依然として書契の受け入れを拒否する方が多数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朝鮮政府は結果的に1875年2月の書契に対し依然として「大日本」、「皇上」などの用語とその本文が日本語で書かれている点、そして朝鮮から対馬に与えた図書の还納、使臣を接待するための宴会席上での洋服の着用などを理由に受け入れを拒否した。朝鮮政府の立場を確認した森山茂の一行はそれまでの交渉の結果を政府に報告すると同時に、4月の炮艦を動員した武力の開放

政策を提案した。

これは西欧列強の炮艦外交により、開港した日本の経験を朝鮮に適用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の決定により4月20日、云揚号が釜山に入港した。日本側の軍艦派遣により、朝野に危機意識が高まる中、朝廷では書契問題に対する論議が再開された。釜山から日本軍艦が武力示威を敢行した翌日の5月10日、高宗は時原任の大臣と6曹の3品以上の高位官職者の全員を集め、外務省の書契問題に対する会議を進行した。同日の会議の内容を検討してみると、朴圭寿、李最応などは書契の受け入れを主張し、金炳国などの7名は反対、残りの24名は差し控えたり態度を明らかにしなかった。日本の武力示威が始まった後にも朝廷大臣の主流の立場は依然として書契の受け入れ自体を拒否していたと言える。書契の受け入れを主張する朴圭寿など少数の见解が最も重要と思われた根据は、日本側との武力紛争を避けるために、書契をまず受け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日本の武力の動員の動きに対する朝野の危機意識が高まる中、懸念していた事態が実際に発生した。

云揚号が8月21日汉江の河口の江華島の海岸で碇泊し、船員の一部が小さい船で事前の予告もなく汉江河口をさかのぼると、草芝鎮の砲台で砲击を敢行しこれを阻止しようとした。草芝鎮の砲の射程距離の外にあった云揚号は草芝鎮の砲击に全く被害を受けなかった。しかし、云揚号は艦砲射击で草芝鎮を破壊した後、次の日に永宗島に上陸し、多数の民間人を杀害し官衙と民家を略奪した後、日本に归った。

いわゆる云揚号事件は上記で提示した森山の政策提案をそのまま実行に移したものであった。日本は米国の強圧により門戸を解放した歴史的経験を逆に朝鮮に適用した。日本政府は云揚号事件を契機に朝鮮外交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の政策を具体的に推進し始めた。日本政府は云揚号事件の処理と修交の交渉のため、陆军中将兼参议の黒田清隆を特命全权大臣に、元老院の井上馨を特命副全权辦理大臣に任命した。全权団の一行の出发に先立って、日本政府は清国が宗主権を口実に介入することを懸念し、外務少輔森有礼を駐清特命全权公使に任命し、清国と交渉するようにした。また、日本に駐在している西欧の各国の公使にもこれを知らせ同意を得た。

云揚号事件に続き、日本艦隊の出現により朝鮮の巷間では危機感が広がり、政府は対応策に苦心した。日本全权代表が軍艦に乗り、京畿沿岸で示威を続ける事態について朝鮮政府も引き続きこれを無視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朝鮮政府は日本の武力示威に直面し2度にわたり、西洋の列強の武力侵攻をした経験者として武官の申櫨を接見大官として選んだ。会谈は公式的には3次にわたり進んだ。1次会谈では日本側は云揚号事件に対する朝鮮側の責任を提議し、2次会谈では云揚号事件に対する解決策として条約締結を要求した。

日本側の条約締結の要求に対し、2月14日の高宗は領敦寧府事の金炳学、領中枢府事の李裕元、判中枢府事の洪淳穆と朴圭寿、そして領议政の李最応、右议政の金炳国など時原任大臣を召集し、対応策を議論した。その席で金炳学は日本の態度と行動をみるとその目的は修好にあるのではなく、戦争を挑発することにあると避難した。李裕元、洪淳穆、李最応などもこれに同意したが、誰も具体的な対応策を提示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朴圭寿は「日本が修好を称しながらも軍艦と軍使を同伴してきた為その意図を把握することは難しい。しかし、修好を望む使臣だといふのだから我々が先に攻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万が一、予想できない事態が発生したら兵士を動員せざるを得ない」と述べた。彼の主張は日本が武装护卫兵を同伴し、江華府に入り、条約締結を要求している状況について彼らを力で制圧できない朝鮮の立場を見せている。

公式的な朝廷会議では開港に対し、いかなる合意も成立しない状況で3日後に、日本側の通商条約締結の要求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を決定し、これを接見大官に通報した。つまり「皇」と「敕」

の用語と新印の使用など、外交文書の形式が問題になり、8年間妥協点を見いだせなかった朝鮮と日本との外交交渉が新しい轉換点を迎えたと言える。

高宗と時原任大臣が会議で開港について積極的に検討し始めた時、大院君の勢力や在野儒林側ではこれに対する反対世論が沸き上がった。その代表的な人物がまさに崔益鉉と前司諫の張皓根であった。高宗の親政の決定的な契機を与えた崔益鉉が高宗がリードしている対日修交に積極的に批判した。崔益鉉の開港反対論はいわゆる倭洋一体論でその核心を成していた。崔益鉉は上疏で「殿下の意は開港するのは倭人で洋人ではなく、繰り返し曰く既に修好と言い、倭人との修交は何が害になるのかとおっしゃったではないですか?」と述べ、高宗の開港の名分を正面から批判した。崔益鉉のこのような批判について高宗は次のように自分の立場を明らかにしつつ、崔益鉉を黒山島に島流しすることを命じた。

倭人を制御することは倭人を制御することであり、洋人を排斥することは洋人を排斥する事である。今回、倭船が来たのは洋人と合同であることをどうやって確實視できるだろうか。倭人が洋人の斥候だとしてもそれぞれ応変する方法があるだろう。

高宗は日本との条約締結を「洋人は洋人で倭人は倭人である」と主張しつつも自分の決定を正当化した。つまり、朝鮮が条約を締結するのは、今までの交隣関係を回復することにすぎ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このように高宗をはじめとする朝鮮政府の立場は日朝修好条規の前文で条約の精神として提示された「旧好重修」であった。

3. 万国公法的な世界認識

朝鮮政府は1880年12月、三軍部を廃止し翌年の1月には統理机務衙門に都相を設置し、時原任大臣を兼任させることで、新しい対外環境に対処するための政府機構の改編を一段落させた。この時期、朝鮮政府が改革政策を推進することになった背景としては金弘集が修信使として帰国した使節の報告書に基づいたものであった。特に、朝鮮が対外政策の方向については彼が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るときに会った駐日清国公使館の参贊官の黄遵宪が著述し渡された『朝鮮策略』が国内で大きな反响を起こした。

朝鮮の対外政策の方向の急先務はロシアの南下を防ぐことで、このためには「親中、結日、联米」という朝鮮策略的な朝鮮外交方向の核心は联米を通じた以夷制夷にあった。これについて国内の在野儒生は「岭南万人疏」から分かるように激しい反対運動を展開した。実に1881年は開港以降、暗中摸索していた朝鮮政府の改革政策がその姿をあらわした時期であり、また開港に反対する勢力の反発が全国的に広がった時期でもあった。「岭南万人疏」に表出した開放反対の動きにもかかわらず、朝鮮政府の改革政策に対する意思は確固たるものであり、それは米朝修好通商条約の締結(1882.4.6)となった。

米朝修好通商条約の締結から2ヶ月後のソウルで武卫营、壯御营、御营厅の军人に対する給料の未拂いや、給料の谷物が変質したものが支給されたことを理由に執権勢力に対する武装示威が起きた。旧式军人による反乱はソウルの貧民層に広がり、高宗は大院君の復権を通じてこれを収集した。大院君の再執権は一時的に改革政策の中断を招いたが、清国が前とは異なり直に3,000名もの大規模な軍事を派遣し政权を取り戻した。日本もまた、居留民保護と公使館の袭击など問責

のための外交使節を送り、多数の军队を派兵し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もとで高宗は次のような注目に値する詔敕を頒布した。

我々東方は海の隅に位置しており、外国と交渉をしたことがない。従って、见闻を広めることがないまま、断续され国を守り500年が過ぎた。近来に入り、世界の流れは依然とは異なり懸隔て変わった。英国、フランス、米国、ロシアのような欧米の帝国は精锐な武器を開発し、富国强兵を図る事業を极大化している。彼らは陆路と海路で地球上を回り世界中と条約を締結するのに、兵力で互いに牽制し公法を相互間で守っているため、これは大変似た状況の春秋列国時代を彷彿させる。その結果、天下に唯我独尊的な地位にあった中国もむしろ平等に条約を締結し、西洋を厳格に排斥した日本も結局、友好通商条約を結んだ。このような事がなぜ起きたのだろうか？ 実に時代の流れだと言えるだろう。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中で我々も丙子年春に繰り返し日本と朝日修好条規を結び3个所の港口を開港した。今回は米国、英国、ドイツなどと新しい和約に調印した。これは初めてのことであるだけに士民は怪しげに思い诽谤し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あれやこれやと騒ぎたてる者はまた、西洋の国家と修好を結ぶことでこれから邪教に染まるだろうと言っている。これは実に我々の儒学や世の中の教化における深遠で長久な忧虑である。

しかし、修好を結んだことは修好を結んだことであり、邪教を禁ずることは邪教を禁ずることで、これは別問題である。条約を締結し通商することは公法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り、初めから本土に邪教の布教を許可していない為、平素から孔孟の教を習い、長い礼仪の风俗を持つ我々がどうして一朝一夕に正道を捨て邪教に従えるものだろうか。万が一、愚かな百姓のなかに人知れず布教し学ぶ者がいれば、国にはそれに該当する法があり、彼らを誅伐し許さないため、击退する問題について対策がないと心配する必要はない。

… 彼らの宗教は邪教であるだけに淫声や美色のように捉え遠ざけるべきだが、彼らの機械は精巧であるため、それをもって利用厚生が可能であれば、农机具や医薬品、武器、輸送手段などをつくるのに何をとまどう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彼らの宗教は排斥し、彼らの機械は見習うことは実に相反することなく并行できるものだ。ましてや強弱の形勢がすでに懸隔て差がある状況で彼らの機械を見習わず、どうやって彼らの侵略を防ぎ、彼らの目標を妨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真に内側では政教を習い、外側では友好条約を結び、我が国の礼仪を守りつつ、富強な国と肩を并べ、士民と共に太平盛世を享受できるならば、これはどれほど美しいことだろうか？

… 今や幸いにもある程度、事が処理され以前の友好関係が再び回復され、英国、米国などもこれからは減るだろう。条約を締結し通商することは世界万国の通例であり、我が国で初めて実施されたことではないため、決して惊愕することではない。おまえたちも怖がらずに安心してほしい。ソンビは勤勉に勉強し、百姓は安心して農業をし、二度と「洋だ」、「倭だ」と騒ぎたてず、讹伝させることがないようにしなさい。

ああ、愚かで自分勝手な振る舞いは聖人が警戒する行為であり、下の者が上の者を非難することは国法にみると誅伐に値する。しかし、教えもせず刑罚を与えるのは百姓を網で魚を捕らえることと同じであるため、ここに記述し明らかに教える。そしてすでに西洋と修好を結んだ為、京外に立てた斥洋に関する碑石は状況が変わったため、すべて除去するようにしなさい。士民は皆其々これを了承しろという内容を議政府から提示し八道と四都に施行するようにしなさい。

高宗の上記のように対外認識はかつて书契問題に対する朝廷の頑強な受容不可論について受け入れた後に検討するという立場、そして日本との修交当時、執権層の内外の倭洋一体について

「倭は倭であり、洋は洋である」という倭洋分別の段階を経て、これからは開放が流れであり、轉換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政治と通商を分離し、さらに政教分離を通じた邪教の禁圧に対する自信を標榜し、列強との修交が避けて通れなかった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斥和碑の废弃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朝鮮政府は対外政策において名分と実質の一体を成し遂げた。

以上で、朝鮮が現在のような規模の世界と出会う時期、高宗を初めとする執権勢力の大西洋及び対日本認識の変化の過程を主に『承政院日記』、『高宗実録』などの資料を検討した。朝鮮開港の過程を検討すると、東アジアの邻国の清国、日本と共通的に経た経験と共に次のような特殊な性格も指摘できる。1876年、日本との条約締結を目前にした時点でも国内では執権官僚の大部分と在野知識人及び、下层民間では広範囲に開港の反対論が存在した。広範囲な開港反対論が存在するなか、朝鮮政府は高宗の親政以後、積極的に開放政策を推進し、その結果が日朝修好条規として締結された。

高宗は在野のいわゆる「倭洋一体論」について「倭」と「洋」を分離し、日本との修交政策を推進し、1880年代の初めに西洋列強と特に米国との修交に先立ち、キリスト国家としての米国をあげ、斥邪論を拒否した政治と通商を分離することで米国との修交を推進した。そしてこのような開放政策に対する抵抗と反発が壬午軍乱の形で現れるが、清国の即刻的な軍事的な介入により、政权を回復した直後、公式的に開放政策の推進を明らかにした。このように資本主義の世界体制内で倭と洋が分離され、資本主義の列強の中で特定の国家に対する例外的な認識の枠組みこそ、韓国近代思想においていわゆる東洋平和論的な思考、人種論的な世界观に基づいた世界認識の原型を提供するものだと考える。

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

■ 岩瀬功一（早稲田大學） ■

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

岩渕功一（早稲田大学）

多文化主義の退場と多文化共生の台頭

「多文化主義は死に絶えた。」2006年4月27日の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スのコラムにこんなタイトルの記事が掲載された。それによれば、多文化主義の理念は実質を欠いた、過去のものとなったという。その理由として、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政治が硬直化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に加えて、エスニシティやセクシャリティといった文化をめぐる問題よりも経済的な不平等と格差拡大のほうに深刻化しており、労働者階級の人々への関心が政治的に高まっていること、そして、9.11以降、国民の統合があらためて強調されることとなり、多文化主義は国民を分断して統合を損なうとしてますます否定的に考え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これらはアメリカの文脈だけに当てはまるものでなく、この10年の間に世界の先進国のなかで、とりわけこれまで多文化主義を移民政策のなかに強く位置づけてきた国において共有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趨勢である。

しかし、最も力を得ているのは、多文化主義は国の分裂を促して一体感を失わせるとして、その発想自体を否定する国民再統合の言説である。多文化をめぐる包含の政治の段階はいわば終了したものとして、排除と同化を基盤とした国民の再統合が強化されて、差異を平等に扱うことへの意思が退行している。この傾向は特に9・11以後に境界管理が徹底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なかで、一層強固となってきた。グレアム・ターナーがオーストラリアに関して指摘したように、ナショナルな社会空間は多様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が表象され、交渉される場ではなくなり、国家が強い指導力をもって統治権を发动して、何がナショナル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核であり、誰が国民であり、何が国民の（不）利益であるかをあらためて明示し、それを損なうものは排斥する姿勢を強く打ち出す場へと転じている。国境と路上において移民や他者を選別し、監督し、そして「不審な者」は直ちに排斥するという国家管理が進められている他方、復古的で本質的なたちで国民文化があらためて見直されて、爱国心の重要性が強調される。欧米諸国では市民権取得にあたっては、テストを実施して適正な同化とその意思を確認するなど、国の領域内に住む移民や他者にも国の核たる文化と価値への服从と忠誠を求めることが制度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つまり、差異の尊重ではなく国への貢献とその支配的な国民文化への同化の表明が公的に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そして、このような国民の境界管理は、グローバル化がもたらす経済・雇用の不安定さやセキュリティ不安がナショナルな心情を排外的なたちで一層喚起させるなかで、多数の国民の支持をとりつけている。この点で国民統合の論理は、新自由主義による格差拡大とねじれた関係にある。経済格差の拡大と雇用不安の蔓延は、文化ではなく、まずは貧困・雇用の問題を最優先、という発想を一方では強めた。同時に、移民や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のなかにも経済的に恵まれた人が少なからずおり、そういう集団がマジョリティに属しながらも経済的に苦しい立場にある人たち以上に社会のケアの対象になることに対して強い反感が高まる。さらには、高度の技能や資産を持った人たちを国外から選別的に迎え入れんとする移民受け入れ政策が経済界の要望に則ってより強化されてもいる。自分達（つまりマジョリティ）の仕事や福祉を脅かす移民へ

の反感が高まる一方で、マイノリティのなかでは富める人と富めざる人の間の分断が起きて文化差異をめぐる問題は個人化されてしまし、それは集団内部の差異を蔑ろに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政治への批判とも相まって、集団として社会における不平等に対抗する力を失わせていく。

こうした状況のなかで、日本では多文化共生の議論がこれまで以上に盛んとなっている。世界の先進国の趨勢が多文化主義の終焉 / 周縁を強調する一方で、まさに日本では多文化をめぐる問題が浮上し、そして戦後初めて「多文化共生」という言葉が中央省庁の政策議論にも登場し、採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移民受け入れも多文化主義も政策化されておらず、日本に居住する外国籍の市民の比率も2%以下と比較的低く抑えられている日本を欧米先進国と同じ次元で比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移民政策を採用してい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では（そして韓国、台湾、香港でも）日本に居住する外国籍市民の数は80年代終りから増加し続けており、特に多くの外国籍市民は居住する都市では社会におけるその存在を無視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日本では国際結婚もいまでは毎年の全体婚姻数の4～5%、東京だけでは一割にものぼ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また、少子化と高齢化社会に対応すべく、今後はより多くの移民を受け入れる必要が論じられてもいる。高齢者介護のために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タイなどから介護士の受け入れを進めており、また2008年には「自民党外国人材交流推進議員連盟」が、少子化の危機から脱するために高度人材を中心に今後50年間で人口の10%にあたる1000万人の移民を受けいれるとともに、移民庁を設置して、公式に日本を移民国家へと轉換する提言を发表した。そして、2005年には総務省が国家省庁としてはじめて地方自治体の「多文化共生」政策推進の取り組みに乗り出した。

日本での多文化共生をめぐる言説にも世界の趨勢は色濃く反映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は欧米ほど反イスラムの気運は9. 11後に高まらなかったが、それでも「外国人犯罪」報道に見られるような、危険な不審者＝アジア系外国人という言説や国民を守るための不法滞在者の取り締まりの様子などがメディアをとおして繰り返し伝えられている。在留外国人の個人情報の国家による管理が強化されるとともに、入国管理もアメリカに追従するかたちで（おそらくは連携するかたちで）厳格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そして、国家統合の言説も高まっている。爱国心の強調と教育の場におけるその制度化が推し進められるとともに、あらたな日本人論といえるようなナショナリスティックな言説が台頭しており、日本文化の世界进出を賞賛し、それに一体化して国民の誇りを感じる心情が高まるなど、あらたなかたちで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情緒の一体感が排他的に喚起されて「日本人」なる主体が想像＝創造されている。そして、移民受け入れの議論が以前よりは高まったのは財界からの要請を受けたもので、優秀な労働人口の維持のために国家が選別的に「有益なミドルクラスの」労働者を外国から受け入れ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社会のあり方や「国民」の境界自体を、多文化状況を反映した、より包含的なものに変革するという取り組みではなく、いかにして外国人＝他者を管理・選別しながら、排他的なかたちで国民統合を推し進めようとする傾向は、日本でも強く見られる。

しかし、欧米先進国の状況との重要な相違点は、なんと言っても、日本では戦後一貫して移民政策を採用しておらず、したがって多文化主義というかたちで国家レベルでの社会統合政策が言説化されてこなかったことである。そのため、日本では国民を分断するという多文化主義批判の言説は見られないかわりに、日本がそもそも多くの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と移民をその構成員とする多文化社会であることの認識がいまだに社会で共有されていないし、文化差異の承認という問題がその批判も含めて社会全体の問題として論じられてはいない。ホールは多文化主義と多文化状況をめぐる一連の問いを分けて考える必要を論じた。多文化主義はあくまでも、移民

や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を社会に統合するための国家による文化差異の統治管理についての政策言説であり、それは実際に社会の日常のなかで発ち現れている文化差異をめぐる問題群の考察とは異なっている。しかし、日本においては、日常の多文化状況と分けられるような、国家レベルの多文化主義そのものがいまだ欠落しているのである。多文化共生も結局は、国家が地方における住民サービスの推進をとり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り、そこには日本が移民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や、多文化社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社会統合し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ビジョンがいまだに見えてはいない。そうした日本の状況においては、多文化共生を批判的に考察する議論には地域のローカルの現場における折衝、生活サービス・教育の提供、あるいは労働雇用、非正規ビザなどの問題に焦点をあてて批判的に論じているものが多くなる。これらはまさに根源的に重要な問題であるし、特に新自由主義が猛威をふるう現在の状況においては、こうした物質的かつ現実的な法的保障や資源分配の問題が文化差異の承認といった問題よりも緊要であるといえるだろう。また、こうした現場からたたき上げられる多文化共生の現実への取り組みは、美辞麗句で固められがちな抽象的な政策文言の発信よりも、より地に足の着いた実質的な多文化社会の現状の検証から、その改善に向けた提言や変革に結びつく可能性がある。しかし、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には限界もある。すでに起きている実践を押し進めるには、国レベルの基本的な権利の保障や文化差異の承認をめぐる問題への取り組みが欠かせない。日本という社会をより包含的なものへと変革していくためには、やはり多文化主義に基づいたシティズンシップの構想（それへの批判も含めて）が必要なのである。

この数年の間で、日本では、「多文化共生」ということばが政策論において使われることが定着した。この言葉はもともとフェミニズムの運動やアイヌの解放運動のなかで70年代から使われたことばであった。その後、増加する定住外国籍市民への政策の一环として多文化共生ということばが川崎市で90年代初頭から使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た、阪神淡路大震災の日本人と外国籍市民がともに復興支援に携わるなかで多文化共生ということばが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に、多文化共生は地方レベルでの政策や実践から積み上げられて生まれたことばであった。そして、2005年から総務省がはじめて国家省庁の政策提言の中にその言葉を採用して、委員会や提言書をたちあげた。2006年の総務省の「地域における多文化共生推進プラン」では、外国人を生活者と位置づけ、以下のように多文化共生を定義する。「国籍や民族などの異なる人々が、互いのちがいを認め合い、対等な関係を築こうとしながら、地域社会の構成員として共に生きていくこと」。これは国家がはじめて国内に居住する外国籍住民を生活者として位置づけて地域の共生推進の必要を認識したとして、日本における画期的な政策の轉換として肯定的に評価されている。その報告書では当初つけられていた「生活者としての外国人」問題への対応」というタイトルから『問題』が消えて『生活者』であることをより前面に出しており、それまで日本でかけていた社会の統合政策がやっと緒についたと評価されている。

その一方で、多文化共生は胡散臭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国家や地方の行政がそれを一般的に使用することとなったために、多文化主義のように「外国人」の管理と統治の言説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あるいは、文化の側面を中心にした「共生」ということばが持つ心地よい響きが、構造的な不平等の問題を覆い隠してしまうものとして批判される。それは文化差異にかかわらずすべての市民を平等な社会の一員として扱うという実質的な共生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ビジョンや政策が根本的に欠落しているため、あくまでもマジョリティによるマジョリティのための発想であり、社会の活性化の受益者と主体はいまだマジョリティの側に独占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うした批判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カナダ、イギリス、アメリカなどの文脈での批判と重なる。支配的

立場の「国民」は他者性を寛容する不可視の中心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周縁の人々のみが「エスニック」、「外国人」の看板を背負わされ、都合のいい多文化消費の対象としてのエキゾティックな文化（食・音楽・ファッションなど）だけが是認の対象とされてしまいがちとなる。ハージが論じたように、中心にいる不可視のマジョリティが所有し管理して自らを根本的に変革することなく、自分込に有益な文化多様性を許容する多文化状況所有の力学（having）は、社会の一員としてともに社会を構成しより包含的な社会へと変革していく共生の発想（being）とは切り離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れを抑圧さえするものである。

さらには、多文化共生言説における文化を中心に据えた視座への疑念は、共生をめぐる問題が文化差異に集約されて理解されたりしてしまうことで、実際に人々が経験している日常での文化差異との邂逅や共生への視点を見えにくく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とにも向けられる。こうした問題意識から、松宮・山本は、文化差異を前面に出した多文化共生の議論を問い直すべく「文化」の問題とは異なる次元の問題として「地域住民」としての外国人の位置づけられ方という視点からローカル・コミュニティにおける外国籍住民の包摂と排除をめぐる「共生の作法」に目を向けることの重要性を論じる。愛知県で行なった調査をもとに、多くの日本国籍の住民はいまだに意識的には外国人の受け入れを肯定的に捉えてはいないものの、対面的相互作用のレベルでは、实际的な必要から外国人を地域住民として受け入れ、さまざまな問題を解決すべく共に活動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た。地域住民という視点から考えれば、多文化共生の作法が少なくとも実践されているとして、「文化」の過度な政治化が実際に起きている共生の現実を見失わせてしまうと警鐘を鳴らしている。

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や都市空間などにおける日常での他者との邂逅に目をやることは単に抽象的な次元で文化差異や共生を理論的に理解するのではなく、矛盾を抱えながらも他者と共に暮らすことを受け入れていく共生の実践者に重きを置くことになる。この点は、上述の意識と対面折衝レベルの齟齬と関係する。多文化共生とは必ずしも完全な調和的な文化差異の受け入れや共存とは限らず、反発・疑念を含みながらも、それでも同じ社会空間を生き、構成していくという必要に駆られて、あるいはそうした意志を持つことで、たとえ意識的にはさほど肯定的ではなくとも「共生の作法」が差異との馴化という日々の実践から生成してくるのである。

「対面的相互作用」と「意識」レベルの面における誤差は、最近の都市の日常における多文化邂逅と折衝への関心の高まりとも重なっている。ナショナルな次元における表象をめぐる問題は、想像の共同体に誰が実際にどのように包含されており、誰がされていないのかという国民の抽象的な語りであり、支配的言説として社会における包摂と排除に大きな影響力を持つ。それに対して、都市の日常における実際の人々の邂逅と折衝に目をむければ、表象レベルでは捉えきれない、見落とされがちな、他者との関係性や「共生の作法」を浮き彫りにする。ひとたびそうした日常での多様な主体の間の（不均衡な）邂逅に目をやれば、想像の共同体のように明確な境界によって同質的に統一された表象の矛盾や不可能性に気付かされるし、そこから新たな社会のあり方へのより包含的な想像力を構築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もなる。最近のイギリス、アメリカ、オーストラリアなどの多文化状況をめぐる考察において、ますます都市における文化差異の邂逅と折衝のダイナミクスに目が向けられているのは、想像の共同体という呪縛から私たちの発想を解放して、すでに社会空間の内部で日々起きていることから、多文化社会のあり方についての新たな想像力を養うことを可能にするからである。

日常で起きている他者との邂逅に目を向けることは、特に日本においては重要である。前述したように、日本における多文化共生の議論は実際に多くの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や外国籍住

民を抱える地方自治体や市町村レベルで現実的な要請から推進されてきた。言語、教育、医療などの面における、生活していくうえでの最低限必要な行政サービスを、多くの地方自治体は国に先行して自ら多くの政策・サービスを施してきた。こうした日常生活と密接に関わるかたちで多文化共生という実践が生まれてきたことはやはり過小評価すべきではない。こうした日本における多文化状況に対する取り組みは、ナショナルな国民文化表象という次元からではなく、身体から、ローカルにおける実際の他者との邂逅と共生の現実的要請から、いわば下からの経験をもとにあらたな関係性や行政による生活の保障、共生の実践をもたらしている。地方自治体、市町村、NGP,NPO、町内会、学校、職場といったさまざまなコミュニティ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差異との共生が推進されてきたのかをていねいに見極めることは、さらに草の根から日本社会のあり方をより実質的に変え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だろう。

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を越えて：地域住民から市民へ

しかし、地方や地域での取り組みや実践の進展は、日本政府が多文化共生に参与しないていることの里返しであることは今一度思い出すべきであろう。日本では移民受け入れを想定した社会の統合政策がまだ欠如している。移民とはもっぱら日本から海外へと出て行く人たち、特に南米への移民の人たちを指し示すことばであり、日本の政策、そして法律には移民を受け入れるという発想が完全に欠落している。あくまでも一時滞在のひとたちを対象としたものであり、永久定住者として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そもそも念頭にない。出入国管理だけが突出して、定住・永住者としての移民受け入れる発想を欠いた当然の归结として、日本ではくまでも地域住民の生活サポート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総務省の2005年の研究会も、「地方自治法上の「住民」として地域社会に生活する「生活者」の視点から外国人住民に対して各種の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地方自治体をサポートするため、自治体向けの指針の提示を主たる目的として」発足している。ここでも明らかなように、2006年の提言は確かに「生活者」として外国籍住民をとらえたことに意義はあるが、それでも日本政府が移民政策採用についての態度を根本的には変えてい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おり、あくまでも国家ではなく地方自治体にいわば丸投げする形で移民の問題を考えている。いわば、統治しない統治であり、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だといえるだろう。

実は、安易な外国人の消費も国レベルの多文化共生への不関与を土台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モーリス・スズキはコスメティック多文化主義ということばを用いて、日本における他者の消費と管理の問題を批判した。日本の模範的な住民として言及されたり、日本文化を「日本人」以上に真摯に受け継ぐ姿がメディアで表象されたりする一方で、それは安易に「不審で危険な外国人」として扱われることに转化する危険を常に伴っている。彼女の議論は上述のコスモ多文化主義やブティック多文化主義と同等のものとしてしばしば言及されるが、そこでは移民や多文化状況をめぐる日本の特殊な状況が論じられていることが見落とされがちである。彼女が1899年体制と呼ぶ、血统主義の国籍法・市民権の発想を維持しており、日本国内に居住する人々に対して、国籍の有無にかかわらず、一定の市民としての権利を保障するという発想が日本においては依然として欠落しているため、あるときは日本に有益な外国人としてもはやされたとしても、次の日には日本にふさわしくなく、不審で危険な外国人として名指されるだけでなく、日本に居住する権利すら簡単に奪われてしまうのである。この点を蔑ろにして欧米と同じ次元で表層的な多文化消費を論じてしまうと、市民としての権利を保障しないまま地域の外国人住民として承認する、日

本における多文化主義なき多文化共生の構造的な問題が温存されてしまう。

あるいは、「文化」に重きを置きすぎていると批判される多文化共生がもたらしている外国人他者の消費は、実は80年代後半以降に推進されてきた地方における「国際化」の延長線上にあり、それは想像の共同体をめぐる表象の政治が色濃く反映されている。そこでは、日本人と外国人の暗黙の二分法が国際化という言説のなかで語られており、それはナショナルな想像の共同体についての本质主義的な言説であるいわゆる日本人論の影響を色濃く受けている。また、柏崎が指摘するように、その二分法は多文化共生を推し進めようとする多くの団体にも見られ、権利の保障、文化の尊重、社会参加の取り組みも「外国人」という集団カテゴリーが主に使われている。そして、排外主義や同化主義、国籍と市民権の一体化へ強い批判と変革の必要が訴えられる一方で、日本というネーションの単一民族言説や血统主義的国籍法については批判していても、それお変革していこうという主張はさほど強くないという。ここでも、外国人と日本人という二項対立が受け入れられ、そして再生産されることで、市民としてネーションに参加・帰属するという発想が後景化されて、図らずも日本政府の統治なき統治を支えてしまっている。

また、多文化共生の議論は日本人と外国人との関係にもっぱら目を向けるため、それはしばしば日本国内に長い間存在する文化的マイノリティの問題を蔑ろにすることと結びつく。在日コリアン、アイヌ、在日中国人など、長い間、あるいはもともと日本に住まう人々は「外国籍住民」を対象とする多文化共生の議論には実質的に含まれていないことが多い。長い間社会において差別や不平等を被ってきた人々への問題を棚上げにするかたちで、外国籍住民のケアが論じられている。

多文化共生をより実質的な包含的な社会の構築に結び付けるには、地方自治体、地域コミュニティ、NPO,NGOなどの市民団体など多様な社会の主体が推し進める実践や政策には自ずと限界がある、それは国家レベルで多文化主義に基づいた社会の統合政策がまず提唱され、推進される必要がある。日本が常に多文化社会であったことを公的に認めるとともに、これからも増えていくと予想される移民受け入れ政策に正式に取り組み、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も差別や不平等を解消するための施策、法改正、教育などの統合政策を速やかに実行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り、それを担うのはやはり国家レベルでの政策である。それは同時に、「日本」をさまざまな文化差異を有するな市民が構成する社会として、あらたに構想し表象する必要がある。地域住民であるだけでなく、日本社会の構成員としての市民としての平等な参加と帰属を保障して、日本をさまざまな文化差異にかかわらずともに包含的な公共空間へと変革していく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うしたビジョンを示し、社会で広く共有し、そして育んでいくには、法整備にとどまらず、さまざまな差異を尊重しながら同じ社会に帰属しているという意識を相互に高めて、包含的な公共空間を創造していくことに向けて教育とメディアの役割が大きい。教育やメディアの問題は国家政策に強く規制されており、また想像の共同体の表象の政治はナショナルなレベルで展開されるが、最近の地方中心の多文化共生の議論では特にメディアのあり方についての議論があまりされていない。正当な市民としての権利と義務の保障と、文化をめぐる承認と包含的帰属の促進の両面を同時に併せ持ったシティズンシップを制度化させ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そのためには、地方、地域、NPOなどにとどまらず、国家レベルでの取り組みが不可欠である。

日本以上に単一民族（神話を掲げる）といわれる韓国でもいち早く国家が文化差異の尊重を謳う法令を制定している。家父長制のイデオロギー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などの問題はあるにしても、日本の変化の速度と比べるとまさに云泥の差である。日本でもそうした声はすでに国家の外から高まっている。NGOである移住連は外国人という名称を移民へと変更し、「多民族・多文化共生

社会に向かうために欠かせないのは、日本社会そのものの変革であり、そのためのプログラムである」ことを最新の提言書で返っている。緊要な課題は、現状を直視しようとししない国家をいかに取り込むかである。日本を移民社会、多文化社会と公式に認めることから逃避して、問題を地方のものへと還元する姿勢をあらためさせで、日本全体の問題としてより平等な社会のビジョンと施策に取り組むことが求められる。統合とは同化とは異なるし、それはマイノリティの問題ではない。それは移民やマイノリティに一方的な変化や同化を求めるのではなく、双方向的にマジョリティもマイノリティもともに変化してより平等な社会の関係性を構築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のために日本において求められるのはまず、批判的議論の対象としての多文化主義をまずは国家を巻き込んで構想し制度化することである。日本の多文化共生の胡散臭さの正体は、多文化主義の欠如なのである。

다문화주의의 없는 다문화 공생

이와부치 고이치 (와세다대학)

다문화주의의 퇴장과 다문화 공생의 대두

「다문화주의는 멸종했다」2006년 4월27일자 뉴욕타임즈 칼럼에 이런 제목의 기사가 게재되었다. 이 기사에 따르면 다문화주의의 이념은 실체가 결여된 과거의 것이라 한다. 그 이유로 동일성 정치가 경직화되었고 거기다 민족성과 성별 같은 문화를 둘러싼 문제보다 경제적인 불평등과 격차 확대가 심각해지고 있으며 정치적으로 노동자 계층에 대한 관심이 높아진 점, 그리고 9.11테러 이후, 국민 통합이 새삼 강조되면서 다문화주의는 국민을 분단시키고 통합을 저해한다는 이유로 점점 부정적으로 여겨지게 됐다는 점을 들 수 있다. 이는 미국에만 국한된 얘기가 아니며 지난 10년 동안 전세계 선진국 가운데 특히 지금까지 이민 정책 속에서 다문화주의를 강하게 정립시켜 온 나라 사이에 공유되고 있는 추세다.

하지만 가장 큰 힘을 얻고 있는 것은 다문화주의는 나라의 분열을 촉진하고 일체감을 잃게 한다 하여 그 발상 자체를 부정하는 국민재통합 주장설이다. 다문화를 둘러싼 포함의 정치 단계는 소위 끝났기 때문에 배제와 동화를 기반으로 한 국민의 재통합이 강화되고 차이를 평등하게 취급하는 것에 대한 의사가 퇴행해 있다. 이런 경향은 특히, 9.11테러 이후에 경계관리가 더욱 철저히 되는 가운데 한층 더 강화되어 왔다. 그래엄 터너가 오스트레일리아에 관해 지적했듯이 국가적인 사회공간은 다양한 정체성이 상징적으로 나타나고 소통하는 장이 아니라, 국가가 강한 지도력을 가지고 통치권을 발동하여 무엇이 국가적인 정체성의 핵심이며 누가 국민이고, 무엇이 국민의 (불) 이익인가를 새삼 명시하고 이를 저해하는 것은 배척하겠다는 자세를 강조하는 장으로 변하고 있다. 국경과 노상(路上)에서 이민자나 타자를 선별하고 「수상한 자」는 즉각 배척한다는 국가 관리가 이루어지고 있는 반면, 복고적이며 본질적인 형태로 국민 문화가 재정비되고 애국심의 중요성이 강조된다. 구미 각국에서는 시민권을 취득할 때 시험을 통해 적정한 동화(同化)와 그 의사를 확인하는 등, 국가의 영역 내에 거주하는 이민자나 타자에게도 제도적으로 국가의 핵심인 문화와 가치에 대한 충성을 요구하게 되었다. 즉, 차이를 존중하는 게 아니라 국가에 대한 공헌과 그 지배적인 국민 문화에 대한 동화의 표명이 공적으로 요구되고 있는 것이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국민의 경계 관리는 글로벌화가 초래하는 경제·고용의 불안정과 보안에 대한 불안으로 인해 국가적인 심정이 한층 더 배외적인 형태로 강화되는 가운데 국민 다수의 지지를 얻고 있다. 이런 점에서 국민 통합이라는 논리는 신자유주의에 의한 격차 확대와 비틀린 관계에 있다. 경제 격차의 확대와 고용 불안의 만연은 문화가 아니라 일단은 빈곤·고용 문제를 가장 우선시해야 한다는 발상을 강화시킨 측면이 있다. 동시에, 이민자나 민족적 소수자 가운데에서도 경제적으로 윤택한 사람이 적지 않으며 그러한 집단이 다수에 속하면서도 경제적으로 어려운 형편에 처해 있는 사람들 이상으로 사회적 보호 대상이 된다는 데 대한 반감이 거세진다. 또한 경

제계의 요망에 따라 고도의 기능이나 자산을 소유한 사람을 외국으로부터 선별적으로 받아들이자는 이민수용 정책이 더욱 강화되고도 있다. 자신들(즉, 다수)의 일이나 복지를 위협하는 이민자에 대한 반감이 고조되고 있는 가운데 소수자들 사이에서는 가진 자와 그렇지 못한 자 사이의 분단이 발생하여 문화적 차이를 둘러싼 문제는 개인화 되고 말며, 이는 집단 내부의 차이를 소홀히 여기는 동일성 정치에 대한 비판과 맞물려 집단으로서 사회적 불평등에 대항할 힘을 잃어 간다.

이런 상황 속에서 일본에서는 다문화 공생에 관한 논의가 전에 없이 활발히 이루어지고 있다. 세계적 선진국들의 추세가 다문화주의의 종언 / 주변을 강조하는 한편, 일본에서는 다문화를 둘러싼 문제가 부각되어 전후 최초로 「다문화 공생」이라는 말이 중앙 부처의 정책 논의에서도 등장, 채택되고 있는 것이다. 이민자 수용과 다문화주의가 정책화 되지 못했고 일본에 거주하는 외국 국적 시민의 비율도 2퍼센트 이하로 비교적 낮은 일본을 구미 선진국과 같은 차원에서 비교할 수는 없겠지만 이민 정책을 채택하고 있지 않음에도 불구하고 일본에서는 (그리고 한국, 타이완, 홍콩 까지도) 일본에 거주하는 외국 국적 시민의 수가 80년대 말부터 증가 추세에 있으며, 특히 많은 외국 국적 시민은 거주 지역에서는 그 사회적 존재를 무시할 수 없는 상황까지 되었다. 일본에서는 국제 결혼도 현재로서는 매년 전체 혼인 수의 4~5 퍼센트, 도쿄에서만도 10퍼센트가 넘는다. 또한, 소자녀화와 고령화 사회에 대응해야 한다는 차원에서 앞으로는 좀 더 많은 이민자를 받아들여야 한다는 의견도 있다. 고령자 개호를 위해 필리핀, 인도네시아, 타이 등지로부터 간호사를 받아들이기 위해 준비하고 있으며 또한 2008년에는 「자민당 외국인재 교류추진 의원연맹」이 소자녀화의 위협으로부터 벗어나기 위해 고도의 인재를 중심으로 향후 50년간 인구의 10퍼센트에 해당하는 1000만 명의 이민을 받아들임과 동시에 이민청을 설치하여 공식적으로 일본을 이민국가로 전환시키겠다는 제언을 발표했다. 그리고 2005년에는 총무성이 국가 성정 가운데 최초로 지자체의 「다문화 공생」에 관한 정책추진 정리에 나섰다.

일본에서의 다문화 공생을 둘러싼 의견에도 세계적 추세가 짙게 반영되어 있다. 일본에서는 9.11 이후에 구미 정도로 반이슬람 기운이 거세지지는 않지만 그래도 「외국인 범죄」보도에서 느껴지는 것 같은 위험하고 수상한 자 = 아시아계 외국인이라는 표현이나 국민을 지키기 위한 불법체류자 단속 행태 등이 매체를 통해 반복적으로 전해지고 있다. 일본에 거주하는 외국인에 관한 개인 정보를 국가 차원에서 관리 강화함과 동시에 입국 관리 역시 미국을 따라하는 형태로 (혹은 제후하는 형태로) 엄격하게 실시하고 있다. 그리고 국가 통합설도 강화되고 있다. 애국심이 강조되고 그것이 교육의 장에서 제도화되고 있음과 동시에, 새로운 일본인론이라 할만한 국가주의적인 의견들이 대두되고 있으며 일본 문화의 세계 진출에 박수를 보내고 이와 더불어 국민적 긍지가 고양되는 등, 새로운 형태의 국가·정체성이나 정서적 일체감이 배타적으로 강조되어 「일본인」으로서의 주체가 상상=창조되고 있다. 그리고 이민 수용 논의가 이전보다 더 활발해진 것은 재개의 요청을 받아들였기 때문인데 우수한 노동인구를 유지하기 위해 국가가 선별적으로 「유익한 미들 클래스인」 노동자를 외국으로부터 받아들일 것을 제안하고 있다. 즉, 사회의 형태나 「국민」의 경계 자체를 다문화 상황을 반영한 보다 포괄적인 모습으로 변혁시키는 게 아니라 외국인=타자를 관리·선별하면서 배타적인 형태로 국민통합을 추진하려는 뚜렷한 경향은 일본에서도 강하게 드러나고 있다.

하지만 구미선진국과의 중요한 차이점은 누가 뭐래도 일본은 전후 일관적으로 이민 정책을 채

택하고 있지 않으며 다문화주의라는 형태로 국가 차원의 사회통합 정책이 논의되지 않았다는 점 일 것이다. 때문에 일본에서는 국민을 분단한다는 다문화주의 비평설은 찾아보기 어려운 반면, 일본이 원래 많은 민족·소수자와 이민자를 구성원으로 하는 다문화 사회라는 인식이 아직 사회적으로 공유되지 못하고 있으며 문화 차이의 인정이라는 문제가 그에 대한 비판까지 포함해서 사회 전체적 문제로서 다뤄지지 않고 있다. 혹은 다문화주의와 다문화적 상황을 둘러싼 일련의 물음을 나누어 생각해야 한다고 말해 왔다. 다문화주의는 어디까지나 이민이나 민족·소수자를 사회로 통합시키기 위한 국가에 의한 문화 차이의 통합 관리에 관한 정책설이며 이는 실제로 사회 속의 일상에서 나타나는 문화적 차이를 둘러싼 문제군에 관한 고찰과는 다르다. 하지만 일본에서는 일상의 다문화 상황과 분리되는 듯한, 국가 차원의 다문화주의 자체가 아직 존재하지 않는 것이다. 다문화 공생도 결국은 국가가 지방의 주민 서비스 추진 방안을 마련한 것이며 거기에는 아직 일본의 이민 수용이나 다문화 사회로서 어떻게 사회를 통합해 나갈 것인가 하는 비전은 없다. 이러한 일본적 상황에서는 다문화 공생을 비판적으로 고찰하는 논의에서는 지역 현장에서의 충돌이나 생활 서비스·교육 제공, 혹은 노동 고용, 비정규 비자 등의 문제에 초점을 맞춰 비판적으로 논의가 이루어지는 경우가 많다. 이런 논의는 그야말로 근원적으로 중요한 문제이며 특히 신자유주의가 맹위를 떨치는 현재 상황에서는 이러한 물질적이며 현실적인 법적 보장이나 자원 배분을 둘러싼 문제가 문화 차이의 인정이라는 문제보다 더 중요하다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또한 이러한 현장에서 만들어지는 다문화 공생의 현실에 대한 대책은 미사여구로 포장되기 쉬운 추상적인 정책적 제언보다 보다 현실적인 다문화 사회 현상이 검증된 것이라는 점에서 개선을 위한 제언이나 변혁으로 이어질 가능성이 더 크다. 하지만 다문화주의 없는 다문화 공생에는 한계가 있다. 이미 실천되고 있는 것을 추진하기 위해서는 국가 차원에서 기본적인 권리 보장이나 문화 차이 승인을 둘러싼 문제에 대한 조치를 취해야 한다. 일본이라는 사회를 보다 포괄적인 모습으로 변혁시켜 나가기 위해서는 역시 다문화주의에 기초한 시민의식에 관한 구상(이에 대한 비판도 포함해서)이 필요한 것이다.

다문화 공생에 대한 의심

최근 수년 동안 일본에서는 정책론에서 「다문화 공생」이라는 말이 정착되었다. 이 말은 원래 페미니즘 운동이나 아이누 해방 운동을 통해 70년대부터 사용된 말인데 그 후, 증가 추세에 있는 정착 외국 국적 시민에 대한 정책의 일환으로 다문화 공생이라는 단어가 90년대 초반부터가와사키시에서 사용되고 있으며 또한 한신·아와지 대지진 당시, 일본인과 외국 국적 시민이 함께 복구 지원에 나서면서 다문화 공생이라는 말이 사용되게 되었다. 이처럼 다문화 공생은 지방 차원에서 정책이나 실천을 통해 생겨난 말이다. 그리고 2005년부터 총무성이 처음으로 국가 성정 정책 제언 가운데 이 말을 채택하여 위원회를 조직하고 제언서를 작성했다. 2006년 총무성이 내놓은 「지역에서의 다문화 공생 추진 계획」에서는 외국인을 생활자로 규정, 다문화 공생을 다음과 같이 정의했다. 「국적이나 민족 등이 다른 사람들이 서로의 차이를 인정하고 대등한 관계를 만들어가며 지역사회의 구성원으로서 함께 살아가는 것」. 이는 국가가 국내에 거주하는 외국

국적 주민을 처음으로 생활자로 규정하고 지역에서의 공생을 추진해야 할 필요성을 인식한 것이라 하여 일본에서의 획기적인 정책 전환으로서 긍정적인 평가를 받고 있다. 이 보고서에서는 당초의 제목이었던 「생활자로서의 외국인 문제에 대한 대응」에서 『문제』가 빠지고 『생활자』임을 보다 강조하였으며 지금까지 일본에서 추진해 오던 사회 통합 정책이 비로소 시작되었다는 평가를 받고 있다.

한편, 다문화 공생에 대한 의심의 눈초리도 있다. 국가나 지방의 행정이 일반적으로 다문화 공생이라는 말을 사용하게 됨에 따라 다문화주의처럼 「외국인」의 관리나 통치를 위한 말이 되어 버린 건 아닌가, 혹은 문화적 측면을 중심으로 한 「공생」이라는 말이 갖는 긍정적인 느낌이 구조적인 불평등 문제를 덮어버리고 있다는 비판의 목소리도 있다. 이는 문화적 차이에도 불구하고 모든 시민을 평등한 사회의 일원으로 대한다는 실질적인 공생 사회의 실현을 향한 비전이나 정책이 근본적으로 빠져 있기 때문에 어디까지나 소수자에 의한 소수자를 위한 발상이며 사회 활성화의 수익자와 주체는 여전히 다수에 의해 독점되고 있다. 이러한 비판은 오스트레일리아, 캐나다, 영국, 미국 등에서 일고 있는 비판과 일맥상통한다. 지배적 입장에 있는 「국민」은 타자성을 관용해 주는 눈에 보이지 않는 중심으로 규정되고 주변 사람들에게는 「민족적」, 「외국인」이라는 간판이 걸리며, 자신들이 취향에 맞는 다문화 소비 대상으로서의 이국적인 문화(음식·음악·패션 등)만이 인정받게 된다. 가산 하지(Ghassan Hage)가 논했듯이, 중심에 있는 눈에 보이지 않는 다수가 소유하고 관리하면서 근본적으로 자신들을 변혁시키지 않고 자신들에게 유익한 문화 다양성을 허용하는 다문화 상황 소유의 역학(having)은, 사회의 일원으로서 함께 사회를 구성하고 보다 포괄적인 사회로 변혁시켜 간다는 공생의 발상(being)과는 동떨어진 것이며 이를 억압하고 있기까지 하다.

또한, 다문화 공생설에서 말하는 문화를 중심으로 하는 관점에 대한 의심은, 공생을 둘러싼 문제가 문화 차이로 집약되어 이해됨으로써 실제로 사람들이 경험하고 있는 일상에서의 문화적 차이와의 해후나 공생에 대한 관점을 흐리게 한다는 데 그 화살을 겨누고 있다. 이러한 문제의식에서 마쓰미야·야마모토(松宮·山本)는 문화적 차이를 전면에 내세운 다문화 공생에 관해 다시 철저히 논의해야 하는데 「문화」의 문제와는 다른 차원의 문제로서, 외국인을 「지역 주민」으로서 어떻게 자리매김해야 하는가 하는 관점에서 지역 커뮤니티에서 외국 국적 주민의 포섭과 배제에 관한 「공생의 예절」에 관심을 갖는 것에 대한 중요성을 논한다. 아이치현에서 실시된 조사를 기초로 대부분의 일본 국적 주민은 아직까지 의식적으로는 외국인 수용을 긍정적으로 받아들이고 있지는 못하나 대면적 상호 작용 차원에서는 실제적인 필요로 인해 외국인을 지역 주민으로 받아들여 다양한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함께 활동하고 있음을 지적했다. 지역 주민이라는 관점에서 생각하면 다문화 공생의 예절이 적어도 실천되고 있다며, 고도로 「문화」를 정치화하는 것이 실제로 발생하고 있는 공생의 현실을 놓치게 한다고 경종을 울리고 있다.

지역 커뮤니티나 도시 공간 일상에서 이루어지는 타자와의 해후에 관심을 갖는 것은 단순히 추상적인 차원에서의 문화 차이나 공생을 논리적으로 이해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모순을 안고 있으면서도 타자와 함께 산다는 것을 받아들여가는 공생의 실천자 쪽에 무게를 두는 것이다. 이 점은 위에서 말한 의식과 대면 절충 차원의 어긋남과 관계가 있다. 다문화 공생이란 반드시 완전히 조화롭게 문화 차이를 받아들이고 공존해야 하는 게 아니라, 반발·의심을 내포하면서도, 그래도 같은 사회 공간에 살며 함께 사회를 구성해간다는 필요에 의해, 혹은 그러한 의지를 지님

으로써 비록 의식적으로는 그다지 긍정적이지 않더라도 「공생의 예절」이 차이와의 순화라는 일상의 실천을 통해 만들어진다.

「대면적 상호 작용」과 「의식」 차원의 오차는 최근 도시의 일상에서 일어나는 다문화 해후와 절충에 대한 관심 고조와도 상통한다. 국가적 차원에서의 표상을 둘러싼 문제는 상상의 공동체에 누가 실제로 어떻게 포함되며, 누가 포함되지 않는가 라는 국민의 추상적인 착오이며, 지배적 의견으로서 사회에서의 포섭과 배제에 커다란 영향력을 갖는다. 이에 반해 도시의 일상에서 실제로 이루어지는 사람들의 해후와 절충을 보면 표상 차원으로는 간파할 수 없는, 간파하기 쉬운, 타자와의 관계성이나 「공생의 예절」이 두드러진다. 일단 이러한 일상에서의 다양한 주체 간의 (불평등한) 해후에 관심을 갖는다면 상상의 공동체처럼 명확한 경계에 의해 동질적으로 통일된 표상의 모순이나 불가능성을 깨닫게 될 것이고 거기서 새로운 사회의 모습으로 보다 포괄적인 상상력을 만들 수도 있게 된다. 최근의 영국, 미국, 오스트레일리아와 같은 다문화 상황을 둘러싼 고찰에서 점차 도시에서의 문화 차이의 해후와 절충의 역학에 관심의 눈길이 가고 있는 것은 상상의 공동체라는 속박으로부터 우리의 발상을 해방시켰고 이미 사회 공간의 내부에서 일상적으로 일어나고 있다는 점에서 다문화 사회의 존재 방식에 대한 새로운 상상력을 배양할 수 있도록 하기 때문이다.

일상에서 일어나고 있는 타자와의 해후에 눈을 돌리는 일은, 특히 일본에서는 더욱 중요하다. 앞서 말했듯이 일본에서의 다문화 공생에 관한 논의는 많은 민족·소수자나 외국 국적 주민이 존재하는 지자체나 시정촌 차원에서 현실적인 요청에 의해 추진되어 왔다. 많은 지자체가 영어, 교육, 의료 등 의 측면에서 생활에 필요한 최소한의 행정 서비스를 나라에 앞서 주체적으로 실시해 왔다. 이러한 일상 생활과 밀접하게 관계된 형태로 다문화 공생이라는 실천이 탄생되어 온 것은 역시 과소평가할 수 없는 부분이다. 이러한 일본의 다문화 상황에 대한 대처는 국가적인 국민 문화 표상이라는 차원에서가 아니라 몸으로부터, 지역 차원에서의 실제적인 타자와의 해후와 공생이라는 현실적인 요청으로부터 소위 아래로부터의 경험을 바탕으로 새로운 관계성이나 행정에 의한 생활 보장, 공생의 실천을 가져오고 있다. 지방자치단체, 시정촌, NGO, NPO, 지역 모임, 학교, 직장과 같은 다양한 커뮤니티에서 어떤 차이와의 공생이 추진되어 왔는가를 진지하게 살펴보는 일은 나아가 풀뿌리부터 일본사회의 모습을 보다 실질적으로 변화시키는 일이 될 것이다.

다문화주의 없는 다문화 공생을 넘어 : 지역주민에서 시민으로

하지만 지방이나 지역 차원의 대응이나 실천의 진전은 일본 정부가 다문화 공생에 관여하고 있지 않다는 반증이라는 사실은 다시 한번 상기해야 할 것이다. 일본에서는 이민 수용을 상정한 사회 통합 정책이 아직 결여되어 있다. 이민이란 오로지 일본에서 해외로 나가는 사람들, 특히 남미 이민자들을 가리키는 말이며 일본의 정책, 그리고 법률에는 이민을 받아들인다는 발상이 전혀 존재하지 않는다. 어디까지나 일시적으로 체재하는 사람들을 대상으로 하는 것이며 영구 정착자로 받아들인다는 생각은 애초에 존재하지 않는다. 출입국관리만이 강조되고 있으며 정착·영주자로서의 이민 수용 발상이 결여된 당연한 귀결로서 일본에서는 어디까지나 지역주민

의 생활 지원에 중점이 놓여 있다. 2005년에는 「지방자치법상의 「주민」으로서 지역사회에서 생활하는 「생활자」라는 관점에서 외국인 주민에 대해 각종 서비스를 제공하는 지자체를 지원하기 위해 지자체용 지침 제시를 주요 목적으로」 총무성 연구회도 발족했다. 여기서도 명확히 드러나듯이 2006년 제언에서 분명히 외국 국적 주민을 「생활자」로서 인지했다는 데 의의는 있으나 그래도 일본 정부가 이민 정책 채택에 대한 태도를 근본적으로 바꾸지는 않았다는 것을 보여주고 있으며 어디까지나 국가가 아닌, 지자체에 전가하는 형태로 이민 문제를 생각하고 있다. 말하자면 통치하지 않는 통치이며 다문화주의 없는 다문화 공생이라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사실은 안이한 외국인 소비도 국가 차원의 다문화 공생에 대한 무관여가 바탕이 된 것이다. 모리스 스즈키는 코스메틱 다문화주의라는 말을 이용해 일본에서의 타자의 소비와 관리에 관한 문제를 비판했다. 일본의 모범적인 주민으로서 언급되거나 일본 문화를 「일본인」 이상으로 진지하게 계승하는 모습이 매체를 통해 방영되는 한편, 그것은 「수상하고 위험한 외국인」 취급으로 쉽게 전환될 수 있는 위험성을 항상 동반한다. 그녀의 논의는 종종 위에서 말한 코스모 다문화주의나 부티크 다문화주의와 동등하게 언급되는데 여기서는 이민이나 다문화 상황을 둘러싼 일본의 특수한 상황을 논하지 않는 실수를 범하기 쉽다. 그녀가 1899년 체제라 부르는 혈통주의의 국적법·시민권적 발상을 유지하고 있으며, 일본에서는 일본 국내에 거주하고 있는 사람들에 대해 국적의 유무에 관계 없이 한 시민으로서의 권리를 보장한다는 발상이 여전히 결여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어떤 때는 일본에 유입한 외국인으로 추앙을 받다가도 다음 날에는 일본에는 어울리지 않는 수상하고 위험한 외국인으로서 지목될 뿐만 아니라, 일본에 거주할 권리조차 손쉽게 빼앗겨 버리고 마는 것이다. 이런 점을 무시하고 구미와 같은 차원에서 표면적인 다문화 소비를 논한다면 시민으로서의 권리를 보장하지 않은 채로 지역의 외국인 주민으로 승인하는, 일본의 다문화주의 없는 다문화 공생의 구조적인 문제가 온존하게 된다.

혹은, 지나치게 「문화」에 중점을 두고 있다고 비판받는 다문화 공생이 초래하는 외국인 타자의 소비는 사실, 80년대 이후에 추진되어 온 지방의 「국제화」의 연장선상에 있으며 여기에는 상상의 공동체를 둘러싼 표상의 정치가 짙게 반영되어 있다. 여기서는 국제화라는 이름 하에 일본인과 외국인의 암묵적 이분법이 이루어지고 있으며 이는 국가적인 상상의 공동체에 대한 본질주의적인 의견인 소위 말하는 일본인론의 영향을 강하게 받고 있다. 또한, 가시와자키(柏崎)가 지적했듯이 이 이분법은 다문화 공생을 추진하려는 다른 많은 단체에서도 볼 수 있으며, 권리 보장, 이익 보장, 문화 존중, 사회 참여에 관한 대책에서도 「외국인」이라는 집단 카테고리가 주로 사용되고 있다. 그리고 배외주의나 동화주의, 국적과 시민의 일체화에 대한 강한 비판과 혁명의 필요성이 강조되는 한편, 일본이라는 나라의 단일민족설이나 혈통주의적 국적법에 대해 이를 변혁해 가자는 주장은 그다지 강하지 않다고 한다. 여기서도 외국인과 일본인이라는 이항대립이 받아들여지고 또한 재생산됨으로써 시민으로서 국가에 참가·귀속된다는 발상이 깔려 있으며 공교롭게도 일본 정부의 정치 없는 정치를 지지하고 있기도 하다.

또한, 다문화 공생 논의는 일본인과 외국인 간의 관계에도 전적으로 관심을 두고 있기 때문에 이는 종종 일본 국내에 오랫동안 존재하는 문화적 소수자 문제를 소홀히 하는 것과도 연관이 된다. 재일 한국인, 아이누, 재일 중국인 등, 오랫동안 혹은, 원래 일본에 살고 있던 사람들은 「외국 국적 주민」을 대상으로 하는 다문화 공생의 논의에 실질적으로 포함되지 못하는 경우가 많다. 오랫동안 사회적 차별이나 불평등을 받아온 사람들에 대한 문제를 제쳐두는 형태로 외국 국

적 주민에 대한 보호와 지원을 논하고 있는 것이다.

지자체, 지역 커뮤니티, NPO, NGO와 같은 시민 단체 등 다양한 사회의 주체가 추진하는 실천이나 정책에는 당연히 한계가 있으며 다문화 공생을 보다 실질적이고 포괄적인 사회의 구축으로 이어가기 위해서는 일단 국가 차원에서 다문화주의에 기초한 사회의 통합 정책이 제창되고 추진되어야 한다. 일본은 항상 다문화 사회였음을 공식적으로 인정함과 동시에 앞으로 더욱 늘어날 것이라 예상되는 이민 수용 정책에 정식으로 착수하여 다양한 차원에서 차별이나 불평등을 해소하기 위한 시책, 법개정, 교육 등의 통합 정책을 신속하게 실행해 나가야 하며, 이를 담당하는 것은 역시 국가 차원의 정책이다. 동시에 「일본」을 다양한 문화 차이를 갖는 시민이 구성하는 사회로, 새로이 구상하고 정의 내려야 할 필요가 있다. 지역주민일 뿐만 아니라 일본사회의 구성원인 시민으로서의 평등한 참가와 귀속을 보장하고 일본을 다양한 문화차이에도 불구하고 함께 포괄적인 공공 공간으로 변형시켜 가야 한다는 필요성이 대두되고 있는 것이다. 이러한 비전을 제시하고 사회적으로 널리 공유하며 키워나가기 위해서는 법 정비뿐만 아니라 각종 차이를 존중하면서 같은 사회에 귀속되어 있다는 의식을 상호 고양시키고, 포괄적인 공공 공간을 창조해 가기 위해 교육과 매체의 역할이 크다. 교육이나 매체의 문제는 국가 정책에 의해 강하게 규제를 받고 있고 또한 상상의 공동체의 표상 정치는 국가적인 차원에서 전개되지만 최근의 지방 중심의 다문화 공생의 논의 속에서는 특히 매체의 역할에 대한 논의가 거의 이루어지지 않고 있다. 정당한 시민으로서의 권리와 의무의 보장과 문화를 둘러싼 승인과 포괄적 귀속의 촉진이라는 양면성을 동시에 갖는 시티즌십을 제도화시킬 필요가 있으며 이를 위해서는 지방, 지역, NPO등에 국한되지 않는 국가 차원의 역할이 불가결하다.

일본 이상으로 단일민족 (신화가 있음) 이라 일컬어지는 한국도 일찌감치 국가가 문화적 차이의 존중을 강조하는 법령을 제정했다. 가부장제의 이데올로기가 반영되어 있는 등, 다소 문제는 있지만 일본의 변화 속도와 비교해 보면 그야말로 천양지차다. 일본에서도 이런 목소리는 이미 나라 밖에서 높아지고 있다. NGO인 이주노동자와 연대하는 전국 네트워크(통칭 이주련)와 외국인이라는 명칭을 이민으로 변경하고 「다민족 · 다문화 공생사회로 나가기 위해 필수적인 것은 일본사회 자체의 변혁이며 이를 위한 프로그램」임을 최신 제언서에서 강조하고 있다. 가장 중요한 과제는 현실을 재검토하려 하지 않는 국가를 어떻게 끌어들이느냐이다. 일본을 공식적으로 이민 사회, 다문화 사회라고 인정하지 않으며 도피하고 문제를 지방으로 돌려보내는 자세를 바꿔 일본 전체의 문제로서 보다 평등한 사회의 비전과 시책을 마련하기 위해 노력해야 할 것이다. 통합이란 동화와는 다르며, 이는 소수자의 문제가 아니다. 이는 이민자나 소수자에게 일방적인 변화나 동화를 요구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양방향적으로 다수와 소수가 함께 변화함으로써 보다 평등한 관계성을 구축하는 일이다. 이를 위해 일본이 해야 할 일은 우선, 비판적 논의의 대상으로서의 다문화주의를 일단은 국가의 참여 하에 구상하고 제도화하는 일일 것이다. 일본의 다문화 공생이 의심받는 이유는 다문화주의가 결여되어 있기 때문인 것이다.

没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共生

岩濑功一（早稻田大学）

多元文化主义的退场与多元文化共生的抬头

“多元文化主义死绝了。”2006年4月27日，《纽约时报》的栏目登载了这一标题的文章。据此文章，多元文化主义缺乏实质内容，已经成为昔日黄花。作为其理由而列举的，除了身份认同政治完全僵硬化之外，还有围绕所谓种族和性别之文化的问题而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和差距扩大日益深刻化，对劳工阶级的关心从政治的角度逐渐高涨，以及9·11以后国民的统合重新得到强调，而多元文化主义则被从否定的角度视为分裂国民并有损于统合。这不只是适用于美国文脉的现象，而且在这十年间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此前在移民政策中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共有的趋势。

然而，最具说服力的是，由于多元文化主义促使国家分裂并丧失一体感，从而否定其构想本身的国民再统合之言说。由于围绕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政治阶段堪称已经终结，以排斥和同化为基础的国民再统合得到强化，平等地处理格差问题的想法每况愈下。这种倾向特别是在9·11后逐渐彻底地实施边境管理的情况下而进一步加强。诚如格雷姆·塔娜针对澳大利亚所指出，国家(national)的社会空间不再是多样的身份认同表现和交流的场所，而是转变为国家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并行使统治权，重新明确何为国家认同的核心、谁是国民、什么是国家利益，并且强硬地打出对损害国家者加以排斥的态势的场所。一方面，在边境和道路推进国家管理，对移民和他者进行甄别和监视，对于“可疑者”立即予以排斥；另一方面，以复古的本质性的方式重新评估国民文化，强调爱国心的重要性。在欧美各国，针对公民权的获取资格，实施考试，确认其合理的同化及其意志；对于在国内居住的移民和他者，也要求服从和忠诚国家核心文化和价值，诸如此类已经制度化。换言之，官方要求的不是对差异的尊重，而是表明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向其所支配的国民文化的同化。

再者，这种国民的境界管理，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雇佣的不稳定以及安全问题上的不安感以排外的形式进一步唤起国民情绪的情况下，获得多数国民的支持。在这方面国民统合的逻辑与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的格差扩大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格差的扩大和雇佣不安的蔓延不是文化问题、而首先是最优先的贫困和雇佣问题，这种认知获得强调。另一方面，移民和少数族群(minority)中在经济上受惠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类群体在归属于多数族群(majority)，而在经济上处境困难的人则更多地成为社会援助的对象，对此反感日渐增强。此外，从国外有选择地引进具有高技能和资产的人的移民接收政策，因应经济界的希望而获得强化。一方面是对威胁自己(多数族群)的工作和福祉的移民的反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少数族群中富裕者与贫困者之间的分裂愈演愈烈，围绕文化差异的问题被个人化，这与对轻视集团内部差异的身份认同政治的批判相结合，导致作为集团对抗社会不平等的力量逐渐丧失。

在这种状况中，在日本，关于多元文化共生的议论也比以前更加热烈。一方面，世界发达国家的趋势是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周边；另一方面，在日本围绕多元文化的问题确实已经浮现，所谓“多元文化共生”一词在战后初次出现并被采用于中央省厅的政策议论。由于无论移民接收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没有被政策化，在日本居住的外国籍公民的比率也被控制在比较低的2%以下，因此日本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相同的层次上进行比较。尽管没有推行移民政策，但是在日本(韩国、台湾

和香港也是如此),在日本国内居住的外国籍公民的人数从1980年代以后开始持续增加,特别是在许多外国籍公民居住的都市,已经是成为不能视而不见的社会存在。在日本,如今国际婚姻已占每年全部婚姻的4~5%,在东京高达10%。再者,为了应对少子化和高龄化社会,今后必须接收比较多移民的议题也正议论之中。为了看护高龄者,逐渐推进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引进护士。2008年“自民党外国人材交流推进议员联盟”发表建议,提出为了摆脱少子化的危机,以高级人材为中心,在今后50年时间接收相当于人口10%的1000万移民,同时设置移民厅,正式地将日本转变为移民国家。此外,2005年,总务省作为国家省厅,第一次出面解决地方自治体的“多元文化共生”政策推进的配合问题。

世界趋势也强烈地反映在围绕日本的多元文化共生的言说中。在日本,虽然反伊斯兰氛围在9·11后的高涨没有达到欧美那样程度,但是诚如“外国人犯罪”报道所示,所谓危险的嫌疑者=亚洲裔外国人之言说以及为了保卫国民而取缔非法滞留者的情况等通过传媒反复传播。随着国家强化对在留外国人个人信息的管理,入境管理也以追随美国的形式(也许是合作的形式)而转向严格。再者,国家统合的言说也不断高涨。在爱国心之强调和教育的场所,其制度化日益推进,堪称新日本人论的国民狂热(national-stick)言说抬头,赞赏日本文化之进军世界,并随其一体化而感受到国民自豪的情绪高涨,以诸如此类的新方式、在排他的情况下唤起国民身份认同以及情绪的一体感,并想像=创出所谓“日本人”之主体。再者,接收移民的议论比以前高涨,则是接受财界的要求,可见是为了维持优秀的劳动人口,由国家有选择地从外国接收“有益的中产阶级”劳动者。换言之,在日本蔚然可见的,不是对将社会生态和“国民”境界本身变革为反映多元文化状况的、比较包容的形式的配合,而是在管理、甄别外国人=他者的同时以排他的形式推进国民统合的倾向。

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情况的重要差别是,无论如何,在日本没有推行战后才一贯的移民政策,因此以所谓多元文化主义之形式、国家层次的社会统合政策未曾被言说化。惟其如此,在日本不见诸如分裂国民之类的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说,取而代之,日本原本是许多少数民族群和移民为其成员的多元文化社会的认识依然不是社会共有的,所谓文化差异之承认的问题包含其批判,也没有作为社会全体问题得到讨论。霍尔认为必须将围绕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状况的一系列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多元文化主义终究是为了将移民和少数民族群统合于社会之中、国家关于统治和管理文化差异的政策言论,而这与围绕实际上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文化差异之各种问题的考察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在日本,与日常的多元文化状况相分离的、国家层次的多元文化主义依然缺如。多元文化共生最终也是国家协调推进对地方居民的服务,从中依然看不到日本接收移民以及作为多元文化社会如何展开社会统合的愿景。惟其如此,在日本,从批判的视角考察多元文化共生的议论,多数是聚焦于地域性的地方折冲、生活服务和教育提供、或者劳动雇佣、非正规签证等问题,并且展开批判性的讨论。这些确实是根源性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当前在新自由主义施展威风的情况下,这种物质的和现实的法律保障以及资源分配问题无疑比所谓文化差异的承认之类的问题更加紧要。再者,从这种现场提炼出来的多元文化共生现实之配合,较诸措语华丽、优雅抽象的政策发言,来自更加脚踏实地的实质的多元文化社会现状的检验,不无与其改善方向一致的建议和变革相结合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共生也有局限性。在推进已经着手的实践方面,对基本权利保障和文化差异之承认等问题的国家层次的配合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将所谓日本之社会变革为比较包容的社会,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公民(citizenship)构想(也包括对其批判)是必要的。

多元文化共生之诡谲

这几年间,在日本,所谓“多元文化共生”之词在政策论中使用已经固定。该词原本是在女权运动和阿伊努解放运动中,从1970 年开始使用的。此后,作为对人数不断增多的定居外国籍公民的政策的一环,所谓多元文化共生之词于1990年代初开始在川崎市使用,接着在阪神淡路大地震日本人与外国籍公民携手支援复兴过程中,所谓多元文化共生之词被广泛使用。由此可见,多元文化共生是从地方层次的政策和实践中积累和产生的词汇。此后,2005年总务省初次在国家省厅的政策建议中采用该词,并提交委员会和建议书。在2006年总务省的《地域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中,将外国人置于生活者的地位,并对多元文化共生定义如下:“国籍和民族等不同的人们承认相互之间的差异并建构对等的关系,同时作为地域社会的成员共同生活。”这是国家首次将在国内居住的外国籍居民置于生活者的地位并认识到推进地域多元文化共生的必要性,因此作为日本划时代的变化而受到肯定性的评价。在其报告书当初提出的所谓“对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问题的回应”之标题中,“问题”一词已经消失,“生活者”则在比较前面出现,这被评价为此前日本所缺乏的社会统合政策终于就绪了。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共生还被批判为诡譎。由于国家及地方行政机关已经普通使用,因此恰如多元文化主义的情形,多元文化共生被批判为不是沦为“外国人”之管理与统治的言说,就是以文化侧面为中心的所谓“共生”之词所具有的感觉愉悦的效果掩盖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由于根本缺乏面向实现不管文化差异而将所有公民都视为平等的社会一员对待的实质性的共生社会的愿景和政策,因此终究还是由多数族群推行以多数族群为对象的构想,社会活性化的受益者和主体依然是由多数族群壟断的。这种批判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国的情况一脉相通。支配立场的“国民”占据着宽容他者性之看不见的中心,而周边的人背负着“种族的(ethnic)”、“外国人”的标签,往往只有作为合理的多元文化消费对象的异国情调文化(饮食、音乐、时装等)被视为肯定的对象。诚如哈吉所论,位居中心的看不见的多数族群拥有和管理一切,根本不可能对自己进行变革,但是容许对自己有益的文化多样性,这种多元文化状况所有的力学(having)gn wt o pywfr权断的。这样的批判与在作为社会的一员构成社会和向比较包容的社会变革之共生的构想(being)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抑制变革的。

再者,对于以多元文化共生言说的文化占据中心之视角的疑念是针对围绕着共生的问题往往聚焦于文化差异进行认识,而针对与实际上人们经验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差异的邂逅和共生的视点难以看到。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松宫、山本为了质问和修正在前面提出文化差异之多元文化共生言论,作为与所谓“文化”问题不同层次的问题,从将外国人置于“地域居民”的地位的视点出发,论述着眼于围绕着地域社群(local community)的外国籍居民之涵入与排斥的“共生之作法”的重要性。他们以在爱知县进行的调查为基础指出,多数日本国籍的居民依然不是积极地认同有意识地接收外国人,但是在面对面相互作用的层次上,从实际需要的角度将外国人作为地域居民接受,并为了解决各种问题而共同活动。从所谓地域居民之视点来考虑,多元文化共生的作法多少已经付诸实践,对“文化”的过度政治化没有看到实际发生的共生现实敲响了警钟。

关注在地域社群和都市空间等的日常生活中与他者的邂逅,不单纯是从抽象的层次对文化差异和共生进行理论性的理解,而是将重点放在既有矛盾又接受与他者共同生活之共生的实践者。这点与正视上述意识并进行折冲层次的齟齬不无关系。所谓多元文化共生并不局限于完全调和的文化差异之接受和共存,也包含着抗拒和疑念,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产生和构成同一社会空间的必要性所驱动的,或者是具有那种意志,纵使在意识中不是那么肯定,“共生之作法”也是从所谓差异与驯化之日常实践中产生的。

“面对面的相互作用”与“意识”层次的误差，与最近对都市日常生活中多元文化邂逅与折冲的关心高涨相连接。围绕着国家层次的表象问题是所谓在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中实际如何包含什么人和不包含什么人之国民抽象的论述，作为支配的言说对社会的涵入和排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对，只要将眼光转向都市日常生活中实际的人的邂逅和折冲，在表象层次没有注意的和被忽视的与他者的关系性及“共生之作法”将突显出来。一旦注意这种日本生活中多样主体之间(不均衡的)邂逅，就不仅能够认知诚如想像的共同体、因明确的境界而被同质性地统一的表象之矛盾和不可能性，而且还能够构筑以新的社会生态为方向的比较包容性的想像力。最近围绕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多元文化状况的考察，越来越多地将眼光转向都市文化差异之邂逅与折冲的力学关系(dynamics)，这使我们能够从所谓想像的共同体之魔咒的束缚中解放我们的构想，从每日在社会空间内部发生的事物，培养与多元文化社会的生态有关的新的想像力。

将眼光转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与他者的邂逅，特别在日本是很重要的。如前所述，在日本的多元文化共生议论，实际上是在具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及外国籍居民的地方自治体以及市町村的层级、从现实需要出发推进的。在语言、教育、医疗等维持生计之最低限度必要的行政服务方面，许多地方自治体比国家先行一步，实施许多的政策和服务。以与这种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形式，所谓多元文化共生之实践已经产生，对其评价过低是不应该的。这种对日本多元文化状况的配合，不是从所谓国家的(National)国民文化表象之层次，而且从身体、从与地域实际的他者的邂逅与共生的现实要求出发等何种差异的共生是一清二楚的，而这进一步是与从草根出发实质性地变革日本社会的生态相连接的。

超越没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共生：从地域居民到国家公民

然而，地方及地域的配合和实践的进展，是日本政府关注多元文化共生的另一侧面，如今也应该略加考虑。在日本，预想接收移民的社会统合政策依然欠如。所谓移民，是专指从日本出去前往海外的人、特别是移居南美洲的人，在日本的政策以及法律中，接收移民的构想完全欠缺。即彻底地以暂时滞留的人为对象，根本不考虑将其作为永久定居者接收。只是重视出入境管理、而欠缺接收作为定居者和永住者的移民的构想，其当然的归结是，在日本，即使山窝也是地域居民安身立命的地方。总务省2005年的研究会阐述其发起宗旨是：“为了支持从作为地方自治法上的‘居民’生活于域社会的‘生活者’的视点出发而对外国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的地方自治体，以面向自治体的政策方针之提示为主要目的”。诚如其所明示，2006年的建议确实表示，虽然将外国籍居民视为“生活者”对待不无意义，但即使如此日本政府也没有根本改变关于移民政策之采用的态度，终究不是国家而是地方自治体，以诸如投球的形式，考虑移民的问题。换言之，这是不治而治，是没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共生。

实际上，安逸的外国人消费也是国家层次之干预多元文化共生的基础。莫里斯·铃木采用所谓cosmetic多元文化主义之词，批判日本的他者消费与管理问题。一方面，作为日本的模范居民而被谈论，在传媒中展现比“日本人”更真挚地承继日本文化的姿态；另一方面，这也常常伴随着容易转化为被视为“可疑危险的外国人”对待的危险。她的观点经常被与cosmo多元文化主义和boutique多元文化主义相提并论，但是其中围绕移民和多元文化状况的日本特殊状况的论述是欠缺的。由于她称为1899年体制、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和公民权之构想继续维持，而对于在日本国内居住的人，无论国籍之有无，均保障作为公民的一定权利之构想在日本依然欠缺，因此，某日即使作为对日本有益的外

国人而备受称赞，但是次日却被视为不适合日本的可疑和危险的外国人，甚而且连在日本居住的权利也被简单地剥夺了。如果对这点视而不见却在与欧美相同的层次上论述表层的多元文化消费，只有在没有保障作为公民的权利的情况下承认作为地域居民的外国人居民地位的日本，将继续存在没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结构性问题。

抑或，被批判过于注重“文化”的多元文化共生所带来的外国人他者的消费，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后半期以来所推进的地方“国际化”的延长线上，这强烈地反映了围绕着想像的共同体之表象政治。在此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黯然的二分法是在所谓国际化之言说中阐述的，这受到关于想像的共同体之本质主义言说、即所谓日本人论的强烈影响。再者，诚如柏崎所指出，这种二分法也见诸许多欲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团体，权利之保障、文化之尊重、社会参与之配合也主要使用所谓“外国人”之群体范畴。一方面，针对排外主义和同化主义以及国籍与公民权之一体化的强烈批判和变革要求已被提出；另一方面，尽管对所谓日本之国民国家的单一民族言说及血统主义国籍法也展开批判，但是主张变革的呼声并不是那么强烈。由此可见，所谓外国人与日本人之二项对立是被接受和再生产的，因此作为公民参与、归属国民国家之构想被背景化，出乎意料地支撑着日本政府之没有统治和统治。

再者，多元文化共生议论主要将目光转向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因此这往往是与轻视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文化上的少数民族问题相联系的。在日朝鲜人(韩国人)、阿衣努人、在日中国人等长时间、抑或原来就住在日本人的人，在多数情况下实质上并不被包含在以“外国籍居民”为对象的多元文化共生议论之中。这些长期在社会上遭受差别和不平等待遇的人的问题被束之高阁，讨论的只是外国籍居民的援助问题。

在将多元文化共生与比较实质的包含性的社会构筑进行结合方面，地方自治体、地域社群、NPO、NGO等公民团体等多样社会主体所推进的实践及政策自然有其局限性，因此在国家层次首先提倡和推行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统合政策有其必要性。日本常常被正式地承认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随着其增加而来的是，必须正式地配合预想的移民接收政策，尽快在各种层次实行以消除差别和不平等为目的的施政、法律修订、教育等的统合政策，而其担当者依然是国家层次的政策。与此同时，“日本”作为由拥有各种文化差异的公民构成的社会，也有重新构想和表象的必要。保障不只是作为地域居民、而是作为日本社会成员之公民的平等参与和归属，将日本变革为尽管存在各种文化差异但是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指明这种愿景并且使社会广泛地共有以至培育这种愿景方面，不是停留在法律之健全，而是朝向在尊重各种差异的同时相互提高归属于社会的意识，并创造出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在此教育和传媒的作用重大。虽然教育和传媒的问题是被国家政策所强有力地规定和限制的，并且想像的共同体之表象政治也是在国家层次上展开的，但是在最近以地方为中心的多元文化共生议论中，特别是关于传媒生态的议论并不怎么特别热烈。同时具备保障作为正当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与促进围绕着文化的承认和包容之归属这两方面内容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必须制度化，惟其如此，不是停留在地方、地域、NPO等，国家层次的配合是不可缺少物。

在比日本更被视为单一民族(神话)的韩国，正在制定坚决主张国家应尽早尊重文化差异的法令。尽管也存在诸如父系家长制理念之类的问题，但是与日本的变化速度相比，确实是天壤之别。在日本，这种声音已经从国家之外高涨起来。非政府组织(NGO)“移住联”将所谓外国人的名称变更为移民，在最近的建议书中强调：“为了走向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不可缺少的是日本社会本身的变革以及以此为目标的计划”。迫在眉睫的课题是如何促使不愿正视现状的国家配合。逃避公开承认日本是移民社会、多元文化社会，并将问题归结为地方问题的态度需要改变，作为日本全体问题，比较平等的社会愿景和施策的配合措施是不可缺少的。所谓统合既与同化不同，也不是

少数民族群的问题。这不是向移民和少数民族群要求单向的变化和同化，而是通过多数族群和少数民族群双向的变化，构筑比较平等的社会关系性。惟其如此，日本迫切需要的是，首先以将国家卷入的方式，将作为批判性议论对象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构想和制度化。日本多元文化共生之诡譎的真相，是多元文化主义之缺如。

韓國社會의 多文化 談論에 對한 省察的 接近

■ 설동훈 (전북대) ■

한국사회의 다문화 담론에 대한 성찰적 접근

설동훈 (전북대)

1. 한국사회: 다문화사회의 진입 단계

한국은 지구상에서 매우 희귀한, 동질적 종족집단(ethnic groups)으로 구성된 나라다. 미국 CIA의 The World Factbook (2009)에서는 한국의 종족집단이 약 2만 명의 화교를 제외하고는 “동질적이다”(homogeneous)라고 기술하고 있다. 이 책에서 소수종족 인구 또는 그 비율이 낮은 나라를 찾아보면, 남·북한, 포르투갈, 아이슬란드, 일본의 다섯 나라를 발견할 수 있다. 북한과 남한은 그 중에서도 가장 동질적 나라다.

오랫동안 단일민족의 신화를 간직해 온 한국사회가 최근 “다문화사회”로 급격히 변모하고 있다. 한국사회가 동질적 문화를 가진 사회에서 이질적 문화를 아우르는 사회로 바뀐 직접적 원인은 외국인의 유입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1980년대 후반부터 이주노동자가 들어 왔고, 1990년대 초부터는 결혼이민자가 그 대열에 합류하였고, 2000년 무렵부터는 외국인 유학생의 수도 크게 증가하고 있다. 20세기 초부터 이 땅에 존재해 왔던 화교(華僑)뿐 아니라 다양한 외국인 집단이 늘어났다.

한국에서 주민으로 생활하는 ‘외국인·귀화자 및 그 자녀’ 수가 2009년에 100만 명을 넘었다. 2009년 5월 기준 행안부 자료에 의하면, 외국인 주민이 93만 명, 귀화자가 7만 명, 외국인 또는 귀화자의 자녀가 9만 명이다. 그 통계에는 단기 방문자 또는 관광객 명목으로 입국하여 90일 이상 국내에서 생활하고 있는 ‘불법체류자’가 포함되지 않았다. 불법체류자 19만 명의 67%인 단기체류 사증 소지자 13만 명을 추가하면, 국내 ‘외국인 주민’ 수만 106만 명에 달한다. 즉, 한국의 총인구 4851만 명의 2.5%에 달하는 외국인·귀화자 및 그 자녀가 국내에서 ‘주민’으로 생활하고 있다. 본격적인 다문화사회가 펼쳐지고 있다고는 보기 힘들어도, 다문화사회의 진입 단계에 있다고 말할 정도는 되었다.

그렇지만 여전히 한국은 ‘외국인 인구 비율’ 또는 ‘출생지가 다른 나라인 인구 비율’ 면에서 세계 최저 수준이다. 한국에 머무르고 있는 외국인과 귀화자의 구성을 살펴보면, 영주자와 귀화자를 아우르는 ‘정착 이민자’가 차지하는 비율은 매우 낮고, 나머지 대부분은 단기 교체순환 이주노동자 또는 방문자임을 알 수 있다. 한국의 정착 이민자로는 ‘한국인과 국제결혼을 통해 이주한 사람들’과 ‘중국 산둥성(山東省) 출신 이민자의 후손인 화교’가 거의 전부다. 그 중에서 ‘지배 집단’(dominant group)과 대립하는 ‘소수자 집단’(minority group)의 특성을 확연히 띠는 것은 화교뿐이다. 결혼이민자들은 주류사회에 동화되기 쉬운 존재이므로, 일반적으로 소수종족을 언급할 경우 포함하지 않는 경우가 대부분이다. The World Factbook의 “동질적”이라는 서술이 틀린 이야기가 아니다. 소수종족을 주류 사회에 쉽게 동화되기 힘든 집단으로서, 집합적 정체성을 갖고 있는 것으로, 엄격한 기준을 적용하여 정의하면, 2009년 한국사회의 소수종족 인구 비율은

0.04%에 불과하다.

요컨대, 한국 정부와 시민사회에서는 ‘다문화사회의 준비와 도래’를 강조하고 있으나, 그것은 자국사회의 과거 모습과 비교한 것일 뿐, 이민자 비율이 높은 다른 나라 사회와는 감히 견주기조차 힘들 정도다.

2. 다문화사회의 비전과 전략: 발전국가의 공업화·세계화 전략의 연장선

지구상에서 가장 동질적인 나라 한국에서 다문화사회 담론이 유행이다. 1990년대부터 학계와 언론에서 간헐적으로 거론하던 다문화사회라는 개념이 2006년에는 정부 정책을 기술하는 개념으로 들어왔고, 2008년에는 “다문화가족”이라는 단어가 법률 용어로 채택되었다. 보건복지가족부에는 다문화가족과라는 행정 부서가 설치되었고, 몇몇 대학에서는 다문화연구소 또는 다문화학과를 신설하기에 이르렀다. 중앙과 지방 행정부처에서 수많은 연구용역을 발주한 것은 물론이고, 한국여성정책연구원·한국교육개발원·한국보건사회연구원·한국청소년정책연구원·한국노동연구원 등 여러 국책 연구기관에서 연구 과제를 수행하였고, 한국연구재단과 국제교류재단에서도 국내외 학자들에게 다문화사회 관련 연구를 중점적으로 지원하였다. 그러다보니 다문화사회 관련 연구 실적도 대량 생산되고 있다. 또한 언론에서도 다문화사회 특집 기사를 양산하고 있다. 바야흐로 다문화사회 담론이 풍년이다.

다문화는 과거 개발연대의 근대화·공업화·정보화·세계화에 뒤이어, 한국사회의 핵심 키워드 중 하나가 되었다. “-화”(=-化, -ization)라는 단어는 원래 사회구조의 변동을 서술하는 개념이지만, 1960대 이후 한국에 등장한 발전국가(developmental state)는 사회발전 전략 개념으로 그것을 채택해 왔다. 다문화는 한글과 한자로는 “-화”의 족보에 등록되었지만, 영어로는 “-ization” 계열이 아니다. 그것은 단일문화·동질문화에 대비되는 개념으로서 복합문화·이질문화가 공존하는 상태를 묘사하는 개념이다. 구태여 과거 개념들의 연속선상에 그것을 자리매기고자 할 경우 “다문화화”(multiculturalization)라고 표현해야 한다. 다문화든 다문화화든, 한국정부는 1990년대 세계화 발전 전략의 연장선상에서 다문화사회 정책을 추진하고 있다. 그러다보니 “대학에서의 영어 강의” 등 세계화 정책을 다문화 개념에 뭉뚱그리는 현상도 나타나고 있다.

발전국가의 개발만능주의 내지 경제발전지상주의 사고방식은 공무원뿐 아니라 국민들의 의식마저 지배한다. 다문화사회 담론이 지배적인 상황에서, 국민들은 외국인 또는 이민자의 수용을 선진화의 동의어로 생각하는 경향이 있다. 정부가 공업화·정보화·세계화의 후속 단계인 선진화를 추구하는 데 이견이 별로 없는 한국인들은 다문화에 대해서도 매우 적극적이다.

‘국제 사회조사 프로그램’(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에서 2003년 국민정체성(National Identity)을 주제로 19나라 국민을 대상으로 표본조사를 실시했을 때, 한국인들은 이민자 수용에 대해 매우 개방적 태도를 견지하였다. “이민자들은 국민경제에 일반적으로 보탬이 된다”는 견해에 동의하는 비율에서 한국은 캐나다·뉴질랜드에 이어 3위였고, “이민자들이 내국인의 일자리를 뺏고 있다”는 견해에 반대하는 비율에서 한국은 스웨덴·스위스·덴마크·노르웨이·프랑스 다음인 6위였다. “이민자 범죄율이 증가하고 있다”는 견해에 반대하는 비율에서 한

국은 캐나다·미국·뉴질랜드에 뒤이어 4위였고, “귀하의 나라에서는 이민자 수를 어느 정도 늘리거나, 그대로 유지하거나, 아니면 얼마나 줄여야 한다고 보십니까?”라는 질문에 대한 응답 결과 한국은 이민자 수를 늘려야 한다는 응답 비율이 높은 나라로 나타났다. 그 순위는 캐나다·핀란드 다음인 3위였다.

유사한 결과는 미국의 ‘퓨 리서치 센터’(Pew Research Center)가 2007년 전 세계 46나라 국민을 대상으로 실시한 이민자에 대한 태도 조사에서도 발견되었다. 이 조사에서 한국은 ‘이민자에 대한 강력한 입국 통제 정책’에 반대하는 사람의 비율이 높은 나라로서, 조사 대상국 중 가장 개방적 태도를 가진 나라였다. 대부분의 나라는 외국인 입국규제 강화 찬성이 반대보다 많았다. 한국인은 외국인·이민자와 같은 땅에서 생활한 경험이 거의 없기 때문에, 이민자 수용에서 오는 고충과 불편함보다는 경제발전에 도움이 되는 인재를 흡수하는 기회를 더 중시하는 것으로 해석할 수 있다.

일반 국민의 태도뿐 아니라 정부의 정책도 외국인·이민자에게 매우 우호적이다. 국제적 기업 컨설팅 회사인 ‘프라이스 워터하우스 쿠퍼스’(PricewaterhouseCoopers)가 2005년 세계 131개 초국적기업 직원들을 대상으로 23나라 정부의 외국인 출·입국과 취업허가 체계에 대한 평가를 조사한 바에 따르면, 한국은 대만에 이어 두 번째로 ‘외국인에 우호적 정책을 펴는 나라’로 나타났다. 응답자들이 각국 정부의 이민정책에 대해 불만이라고 밝힌 비율을 측정한 결과, 대만은 1%에 불과하였고, 한국은 홍콩·캐나다와 동률인 2%였다.

한국에서 ‘다문화사회 이행’이란 ‘선진화’의 동의어다. 사실이 그렇다면, 어느 한국인이 그것을 반대하겠는가? 그것은 한국여성정책연구원에서 주도하고 있는 3년짜리 대형 연구 프로젝트의 제목이 “다민족·다문화사회로의 이행을 위한 정책 패러다임 구축”이라는 점을 통해서도 확인할 수 있다. 다문화사회는 그저 주어지는 것이 아니라 적극적으로 만들어나가야 할 그 무엇이라는 것이다.

다문화사회로 이행하기 위한 한국 정부의 전략은 무엇인가? 정부는 2008년 12월 외국인정책위원회를 열어 ‘외국인정책 5개년계획’을 심의·의결했다. ‘외국인정책 5개년계획’은 과거의 ‘경제개발 5개년계획’처럼 외국인정책에 관한 5년 단위 국가 계획으로서, 그간 각 부처가 개별적으로 추진해온 외국인 정책을 중장기적 관점에서 종합적·체계적으로 추진하려는 의도에서 마련된 것이다. ‘외국인과 함께하는 세계일류국가’를 외국인 정책의 비전으로 정하고, 적극 개방을 통한 국가경쟁력 강화, 질 높은 사회통합, 질서 있는 이민행정 구현, 외국인 인권 옹호 등 4대 정책목표와, 우수인재유치를 통한 성장 동력 확보, 다문화가족에 대한 이해 증진과 지원, 외국인 권익 보호 등을 골자로 하는 13개 주요 과제 등을 포함한다. 과거 국가 주도로 경제 개발 목표를 달성한 것처럼, 정부는 “발전 전략”의 일환으로 다문화사회 이행을 추진하고 있다.

3. 한국의 다문화사회정책

한국 정부는 ‘이민정책’(immigration policies)이라는 전문 용어 대신에 ‘외국인정책’ 또는 ‘다문화사회정책’이라는 수사(rhetoric)를 사용한다. 이민정책은 ① 국경통제, ② 외국인 체류관리, ③

이민자 사회통합의 세 부분으로 구성된다. 그것은 외국인이 어느 나라에 입국하여, 체류하다가, 정착하는 과정과 정확히 맞물린다. 다문화사회정책을 이민정책의 동의어로 사용하는 사람도 있고, ‘이민자의 사회통합 정책’만 지칭하여 사용하는 사람도 있다. 전자를 ‘넓은 의미의 다문화사회정책’, 후자를 ‘좁은 의미의 다문화사회정책’으로 부른다.

첫째, 국경통제 방식과 관련하여 한국은 사증(visa) 발급을 통해 외국인의 활동을 규제하는 방식을 취한다. 유럽 대륙의 여러 나라들이 ‘입국 사증’ 중심의 국경통제보다는 체류허가(residence permit)와 취업허가(work permit)를 통한 외국인의 활동 규제에 주력한다면, 미국과 캐나다 등은 사증 발급을 통한 외국인의 입국 통제를 중시한다. 유럽 대륙의 나라들은 국경이 사방으로 이웃 나라와 접해 있어서 외국인의 유입 자체를 통제하는 것이 불가능하므로, 입국은 사실상 자유롭게 허용하되 체류와 취업을 규제하는 방식을 취한다. 그러나 신대륙의 미국과 캐나다는 한두 개의 이웃나라와 국경을 부분적으로 공유하고 있으므로, 국경 지역에 설치한 이민국 사무소에서 외국인의 입국 심사를 통해 ‘국경통제’ 정책을 구현하고 있다. 말하자면, ‘섬나라’ 또는 ‘유사 섬나라’에서 사증제도를 국경통제의 핵심으로 채택하고 있다. 한국은 휴전선으로 인해 만들어진 ‘유사 섬나라’라 할 수 있다. 섬나라에서는 이웃나라와 육로를 통한 인적 교류가 불가능하므로, 국경통제가 상대적으로 용이하여, 사증 제도를 통해 외국인의 입국과 국내 활동의 범위를 규제하는 방식을 취한다.

둘째, 외국인의 체류관리 방식으로, 한국에서는 외국인의 정착을 유도하기보다는 ‘교체·순환’(rotation)을 강조해 왔다. 한국에서는 1980년대 후반부터, 노동시장에서 인력 부족 현상이 발생하였다. 그렇지만 두 나라 모두 정착 이민 수용은 전혀 고려하지 않은 채, “일정 기간 머무른 후 자국으로 돌아가겠다고 약속한” 이주노동자만 ‘교체·순환원칙’(rotation principle)에 입각하여 받아들이는 정책을 채택하였다. 한국 정부는 인구밀도가 세계 최고 수준에 근접할 정도로 높다는 점을 강조하였다. 사회 전체적으로 볼 때, 노동력 부족보다는 실업문제가 심각하다는 점도 고려 대상이었다. 정착 이민자를 수용할 경우 자국의 노동시장이 교란될 것이라고 우려하는 목소리가 컸다.

한국 사회가 동질적인 민족 구성을 갖고 있다는 점도 중요하다. 한국은 ‘단일민족의 신화’를 간직한, 세계적으로 매우 희소한 ‘동질적인 국민국가’를 이루고 있다. 한국사회에서는 이민자의 정착이 초래할 이질성을 포용할 준비가 덜 되어 있다. 그러한 점을 고려하여, 한국 정부는 ‘정착 이민자’보다는 ‘단기 이주노동자 또는 방문자’ 중심의 외국인 체류관리 정책을 채택해왔다.

이주노동자를 받아들이면서도, ‘재외동포의 후손’이 자국 사회와 문화적 마찰이 적을 것으로 보고, 그들을 우선적으로 충원하였다. 정부는 ‘방문취업제’를 실시하여 중국 조선족과 구소련 고려인을 받아들이고 있다. 타민족 이주노동자보다 자민족 이주노동자들이 문화갈등을 적게 야기할 것이라는 정책적 고려가 작용하였다. 그것은 한국사회의 외국인 이주노동자 수용 정책의 중요한 특성이다.

한편, ‘자국인의 배우자’에 대해서 정부는 인도주의적 원칙에 의하여 사증 발급에 거의 제한을 가하지 않고 있다. 재외공관의 사증 심사과정에서는 ‘혼인의 진정성’이 의심되는 위장결혼 혐의자만 가려낼 뿐, 국내에 와서 기초생활보장제도나 의료보호제도 등 공공부조 혜택을 받을 것인지 여부는 개의치 않는다. 그러다보니 결혼이민자 가구 중 상당수가 공공부조 수혜 집단임이 드러났지만, 외국인 신분을 갖고 있을 경우에는 “미성년 자녀를 양육하는 경우에 한해” 그 제도를

적용하고 있다. 선진 복지국가에서는 신규 이민자에게 일정 기간 복지혜택을 받지 않고 생활할 수 있음을 입증하는 경우에 한해서만 사증을 발급하고, 국내 체류 외국인에게 복지혜택을 제공하고 있는 관행과 동등한 수준에는 미치지 못한다. 한국은 ‘자국민의 배우자’조차도 복지 혜택에서 내국인 대우를 해주지 못하고 있다.

셋째, 한국 정부의 이민자 사회통합이 매우 중요하다. 이민자의 사회통합 또는 적응을 연구하는 사회학자들은 ‘이민자 사회통합 정책’을 흔히 ① 동화(assimilation)모형, ② 문화간주의(interculturalism)모형, ③ 다문화주의(multiculturalism)모형으로 구분한다. 한국 정부의 정책은 어느 유형에 속할까? 그 정답을 찾기 위하여, 세 가지 정책 모형의 특성을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다.

동화정책은 프랑스와 독일 등에서 채택하고 있는 방식으로 이민자는 체류국의 언어와 문화 관습을 익히는 것을 의무로 규정한다. ‘동화’(assimilation)는 소수 집단이 주류 문화의 관습과 태도에 점진적으로 적응해 가는 과정을 뜻하는데, 그 접근의 목표는 ‘단일 문화적’(monocultural) 양상을 지닌 통일성(unity)을 추구하는 데 있다. “로마에서는 로마법을 따라야 한다.”는 명제는 동화정책의 내용을 압축적으로 제시한다.

문화간주의정책은 이민자가 체류국 사회에 적응해야 함은 물론이고, 동시에 주류사회가 이민자의 유입으로 인해 초래된 상황 변화에 적응하여야 함을 중시한다. 아일랜드 정부가 표방하는 ‘쌍방향 적응’(mutual adaptation) 또는 ‘쌍방향 통합’(two-way integration)모형은 단일 문화적 기준을 토대로 하면서도 이민자와 수용국 사회 양자가 쌍방향으로 적응하도록 요구한다. ‘용광로’(melting pot)라 불리는 이 접근은 수용국 고유의 문화적 유산을 유지하면서 이민자로 유입으로 인한 다양성을 추구하는 것, 즉 수용국 사회와 이민자 양자가 공동 문화를 형성하는 것을 지향한다. 이방인에게 배타적인 자국 문화를 개조(改造)하려는 정부의 적극적 정책 의지가 특히 중요하다.

다문화주의정책은 캐나다에서 처음 만들어진 것으로, 소수민족지역의 분리 독립을 막기 위해 소수민족에게 주류사회와 마찬가지로의 권한을 부여하는 방식이다. 한 사회 내에서 한 개의 주류 문화 대신 많은 하위문화를 장려하고 촉진하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샐러드 그릇’(salad bowl) 또는 ‘무지개 연합’(rainbow coalition) 등으로 불리는 이 접근의 목표는 ‘다문화적’(multicultural) 특징을 보이는 다양성(diversity) 추구에 있다. 캐나다는 영어 사용 지역과 프랑스어 사용 지역으로 대별되는데, 프랑스어를 사용하는 사람들은 자신들이 주로 거주하는 퀘벡 지역이 낙후소외되어 있다는 점을 들어 연방에서 탈퇴하여 독립하려는 움직임을 보였다. 그러한 상황에서 캐나다 정부가 채택한 방식이 다문화주의다. 그 핵심은 소수민족의 문화적 자율성을 철저히 존중하는 데 있다.

다문화주의는 신규 이민자에게도 적용된다. 캐나다에서는 이민자의 사회통합을 단기간에 이루려는 것을 포기하고, 이민자들이 원래 갖고 있던 문화적 정체성을 유지하는 것을 오히려 권장한다. 동화정책의 경구를 응용하여 표현하면, “로마에서도 한국인들은 한국식으로 살 수 있는 권리가 있다.”는 것이다. 그러한 권리를 정부가 적극적으로 지원한다는 점이 캐나다 식 다문화주의 정책의 특성이다.

한편, 미국식 또는 영국식 다문화주의정책도 존재한다. 그것은 국가가 이민자들이 자국 문화를 유지하는 것을 방치 또는 방관하는 자세를 취하는 형태다. 영미식의 다문화주의는 ‘자유방임적 다문화주의’, 캐나다식의 ‘국가개입적 다문화주의’로 부른다. 보통 그 두 세부유형을 아울러

다문화주의라 한다.

동화정책, 문화간주의정책, 다문화주의정책은 특정 나라의 이민자 통합 정책에서 추출한 ‘이념형’(ideal type)일 뿐, 실제 각 유형의 정책을 비교해보면 유사한 내용이 매우 많다. 이를테면, 세 가지 유형 모두에서 정부는 이민자에 대한 자국어 교육을 강조하고 막대한 예산을 배정하고 있다. 이민자에 대한 관용의 태도를 간직하고 있는 프랑스 사회가 ‘동화’정책의 전형이라는 점을 고려하면, 동화정책에 대한 세간의 오해를 불식하는 게 필수적임을 깨달을 수 있다.

원래의 질문으로 돌아가서, 한국의 이민자 통합 정책은 어느 유형에 속할까? 이 세 가지 정책 중에서만 고를 경우, 한국의 이민자 통합 정책은 ‘동화정책’에 가깝다. 그러나 곰곰이 생각해 보면, 프랑스는 이미 100여 년 전부터 이웃나라로부터 정착 이민자를 적극적으로 받아들이고 있고, 21세기 접어들 후 독일에서는 유럽연합 회원국에서 오는 정착 이민자를 받아들이는 데 전혀 주저하지 않는다. 그러나 한국은 결혼이민자를 제외하고는 이민자를 거의 받아들이지 않고 있다. 그러한 사실을 알고서 “한국이 프랑스와 독일과 같은 동화정책 유형에 속한다.”고 주장하면 “소가 웃을 일이다.”

2009년 현재 한국의 이민정책 모형은 과거 독일의 그것과 닮았다. 20세기까지 독일은 ‘교체순환원칙’과 ‘자국의 노동시장 보완성의 원칙’에 입각하여 ‘단기 이주노동자’만 ‘노동력 부족이 심한 일부 일자리에 국한하여 취업을 허가하는 방식’을 취하였다. 학자들은 과거 독일의 이민정책을 이민자를 거의 수용하지 않았다는 점을 중시하여 ‘구분배제’(differential exclusion)모형이라 부른다. 외국인의 대다수가 일정 기간 체류하다가 자국으로 귀환하는 것을 지향하는 정책을 펴는 나라에서는 ‘이민자 사회통합’의 필요성이 거의 강조되지 않았다.

사회통합 정책에서 배제된 이민자 또는 이주노동자 집단은 ‘격리’(segregation)의 대상이다. 격리는 다양한 인종·계급·직업·민족 집단을 분리하는 정책 또는 행위로 정의되는데, 격리 모형에서 이민자들은 적응을 위한 최소한의 노력만 하도록 요구받고, 수용국의 단일 문화는 흔들림 없이 유지된다. 그들의 사회참여와 권리 행사는 극도로 제한된다.

그러던 독일이 21세기에 와서 이민정책의 기초를 ‘구분배제’에서 ‘이민자 적극 수용 및 동화정책을 통한 통합’으로 바꾸었다. 2005년 발효된 독일 이민법에서는 독일이 ‘이민국’(country of immigration)임을 명시적으로 인정하고 있다. 그러면서 독일의 이민정책의 기본원칙은 ‘구분배제 또는 격리’에서 ‘동화’로 전환하였다.

그러한 개념 틀에 비추어보면, 한국의 이민정책은 이민자 수용의 측면에서는 ‘구분배제’모형을 견지하고, 그나마 존재하는 극소수 이민자(거의 전원이 결혼이민자) 대상 사회통합 정책은 ‘동화’모형을 채택하고 있다. 주류사회가 이민자 유입으로 변화된 환경에 적극적으로 적응하려는 노력은 거의 없고, 단지 다문화사회 또는 다문화가족이라는 개념만 난무할 뿐이다.

법률 용어로 “다문화” 개념이 도입된 맥락은 제17대 국회 제269회 여성가족소위 제1차 다문화가족지원법안(대안) 심사 과정에서 소위원장이 발언한 내용을 통해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는 “다문화가족”의 개념을, “사실은 이주민가족이지만 사회적으로 낙인찍지 말자는 의미에서 다문화를 우리가 전체적으로 받아들인다.”라는 취지로 도입하였다고 밝혔다. 그러나 다문화가족지원법은 그 명칭이 의미하는 바와는 달리 ‘다문화가족 일반’이 아니라 “날 때부터”(生得的) 한국인과 결혼한 결혼이민자 또는 혼인귀화자 가족만 지원하는 법률이다. 귀화한국인이 국제 결혼할 경우, 그의 배우자는 다문화가족지원법의 적용을 받지 못한다. 유학생은 배우자 동반이 가능하

지만, 다문화가족지원법의 적용 대상이 아니다. 고용허가제·방문취업제를 통한 저숙련 이주노동자는 그가 비록 합법적으로 체류하고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그의 배우자를 동반하거나 초청할 수도 없다. 불법체류 이주노동자 가족이 적용 대상이 아님은 부언의 여지가 없다. 그것이 한국의 다문화사회 정책의 핵심인 ‘다문화가족 지원 정책’의 현실이다.

4. 한국사회의 “다문화주의” 담론의 문제점

수많은 논자들이 다문화, 다문화사회, 다문화주의를 언급하고 있는데, 그 개념 정의가 제 각각이라 의사소통이 어려울 정도다. 학계의 일부에서는 ‘다문화사’회는 외국인·이민자 등 사회의 이질성이 증가한 상태로, ‘다문화주의’는 정부에서 그들을 통합하는 정책의 유형으로 파악하는 반면; 다른 일부에서는 다문화주의 개념에서 다문화사회를 연역해 낸다. 전자의 입장을 견지하는 연구자들은 다문화주의를 이민정책의 하위 유형으로 보고, ‘동화’ 또는 ‘문화간주의’와 구별되는 정책으로 본다. 후자의 전통에 선 연구자들은 다문화주의를 소수자 집단의 시민권(citizenship)과 관련된 보편 개념으로 사용하려는 경향이 강하다. 말하자면, 전자의 입장에서 보면 한국은 다문화주의와는 거리가 먼 이민정책을 펴고 있는 나라로서 그러한 개념은 부적합한 것일 뿐이지만, 후자의 입장에서 보면 “한국식 다문화주의” 또는 “한국형 다문화주의” 개념도 충분히 가능하다. 다양한 학문 분야에서 여러 가지 이론적 입장이 존재함을 고려할 때, 어떤 개념을 사용하든 그것은 연구자의 자유고 그것은 철저히 존중되어야 한다. 그러나 두 개의 상이한 전통에서 도출된 개념을 무분별하게 섞어 쓰는 연구자들이 많다는 현실을 대하면 사정이 달라진다. 그러므로 나는 이 글에서 후자의 입장에 대하여 몇 가지 문제 제기를 하려고 한다.

후자의 입장을 견지하는 사람들은 캐나다의 정치철학자 킬리카(Will Kymlicka)의 ‘다문화주의’ 개념에서 다문화를 도출하는 경향이 강하다. 그는 여성·흑인·토착민·동성애자 등 소수자 집단이 지배집단과의 관계에서 사회적 소외감을 느끼는 것으로 보고 ‘문화적 다양성에 기반을 둔 시민권’ 개념을 강조한다. 이민자의 경우에도 사회통합은 ‘한 세대 안에 이루어지는 과정이 아니라 세대를 경유하여 달성할 수밖에 없는 과정’임을 중시한다.

또한 그들은 프랑스 정치학자 마르티니엘로(Marco Martiniello)가 일반 프랑스인 대상으로 문고본으로 작성한 책에 소개된 ‘다문화주의’ 개념을 빌려와서 다문화를 이해한다. 마르티니엘로는 이민자 동화정책의 이념형적 사례인 프랑스의 정책에도 다문화주의적 요소가 있음을 강조한다. 그는 이민자 통합 정책의 유형을 소개하면서, 카슬과 밀러(Castles and Miller)가 사용한 “다문화주의”라는 개념을 은근슬쩍 “다원주의적 접근”이라는 개념으로 치환해버린다. “프랑스는 전적으로 동화적 접근을 채택하고, 네덜란드는 전적으로 다원주의적 접근만을 택하며, 독일은 전적으로 구분배제적 접근만을 장려한다고 생각하는 것은 지나치게 단순한 입장이다.”라고 강조한다. 그러면서 “어떤 한 나라가 동화적 모형에 그대로 충실하면서도 동화적 접근 대신 다원주의적 유형의 정책들의 중요성을 증대시키는 것이 가능한 것이다.”라고 주장한다.

그렇지만 마르티니엘로는 다문화주의를 보편 개념으로 바꿔 놓고, 국가 유형론으로서의 다문화주의 개념을 파기하였으면서도, 프랑스도 “다문화주의 정책이 있다.”는 혼란스러운 주장을 하

였다. 이념형의 요건을 완벽하게 충족하는 사례가 없는 것은 지극히 당연하기 때문에, 그의 논리는 매우 취약하다. ‘공화주의적 동화 모형’을 당연히 여기는 프랑스 학계에서, ‘다문화주의’를 강조하는 그의 주장은 거의 받아들여지지 않는다.

그런데 마르티니엘로의 저서는 한국어로 일찍이 번역되었고, 다문화 담론의 열풍과 함께 한국의 연구자들에게 퍼져 나갔다. “다문화주의는 곧 다문화사회의 핵심 원리다”라는 명제를 받아들이는 국내의 논자들은 김리카와 마르티니엘로 등의 다문화주의 개념을 토대로 다문화사회를 파악한다.

국내의 일부 논자들은 다문화주의 개념을 마치 ‘민주주의’와 같은, 모든 사회에 적용 가능한 보편 개념으로 사용한다. 민주주의적 요소가 일부만 있어도 민주주의가 되고, 모든 사회에서는 민주주의를 추구해야 할 가치로 받아들이는 방식이다. 그러한 용법을 따르면, 1970년대 유신체제 하에서 박정희가 주창했던 “한국적 민주주의”는 민주주의의 한 유형일 수밖에 없다. 마찬가지로 용례로, 프랑스와 독일은 물론이고 한국과 대만 및 일본도 “다문화주의” 정책을 채택하고 있는 나라로 분류된다. 그렇다면 다문화주의 정책을 사용하지 않는 나라는 어디인가? 기존 국내 논의의 대부분이 사회현상의 본질을 헛짚게 된 데에는 정부에서 사용하는 “다문화사회” 개념을 “다문화주의”와 혼동한 탓이 크다.

지구상에서 극히 예외적일 정도로 종족적 소수자 집단 인구가 적은 한국사회의 결혼이민자 통합 정책을 다문화주의라 할 수 있을까? “정부에 의해 적극적으로 유통되는 ‘다문화주의’는 실질적인 ‘다문화사회’로의 변화를 거부하는 ‘거짓’의 포석으로 보인다.”라거나, “대상을 구별하고 차별하는 다문화는 진정한 다문화가 아니다.”라고 주장할 것이 아니라, 특수 조건을 가진 소수의 이민자만 엄격히 선별하여 받아들이고, 나머지 대다수 이민자는 배제하는 ‘구분배제정책’을 주로 하고, 소수의 결혼이민자에 대해서는 동화정책을 펴고 있다고 밝히는 게 이론적으로 훨씬 명료하고 바람직하다.

그들은 “다문화주의모형은 선(善)이고, 동화모형은 악(惡)이다”라는 주장을 과감히 설파한다. 동화모형이 ‘자문화중심주의’(ethnocentrism)와는 구분되는 것이고, 오히려 오늘날은 프랑스와 독일 사회에서 보듯이 ‘문화적 상대주의’(cultural relativism)와 잘 어울릴 수 있는 것임에도 불구하고, 동화모형 자체를 왜곡한다.

심지어 “장기 불법체류 외국인을 사면하지 않는 것은 다문화주의에 어긋난다”고까지 주장한다. 독일과 일본 등 시민의 법질서 준수를 강조하는 나라에서는 불법체류 외국인 사면을 전혀 실시하지 않았다. 여러 차례 사면 경험에 있는 미국에서도 그것을 다문화주의와 연계시키지는 않는데, 일부 논자들은 “만능 개념” 다문화주의로 사면의 정당성을 주장한다.

한국의 이민자 통합 정책을 “관(官) 주도형 다문화주의”로 파악하는 것은 개념 설정 자체가 잘못 되어 있다. 이민정책의 주체는 국가이니, 당연히 관이 주도하는 게 당연하다. 그런데 2006년 정부가 다문화사회 담론을 갑자기 가지고 나온 것이 아니라, 그 때까지 학계와 언론 등 시민사회의 담론을 수용한 것이었음을 고려하고서도, 과연 그것을 ‘관’이 주도했다고 주장할 수 있을까?

요컨대, 다문화주의는 ‘종족적 소수자 집단’과 지배집단의 갈등이 심각한 캐나다에서 출현한 개념으로 ‘종족적 소수자 집단’의 존재 자체가 미약한 한국사회에 적용하는 데는 문제가 매우 많다고 본다. “한국형 다문화주의” 또는 “한국적 다문화주의”는 결코 “진정한 다문화주의”가 아니라는 것을 이야기하기 위해 다문화주의 개념을 사용할 뿐이라면, 그 개념을 파기하는 게 바람직하다.

5. 맺음말

외국에서 수입한 “다문화주의” 이론을 한국의 ‘다문화사회정책’을 설명하는 데 무분별하게 적용하는 것은 반드시 피해야 한다. 역사적·사회적 맥락이 상이한 나라에서 만들어진 사회이론을 한국사회에 적용할 경우 그 전제 조건의 충족 여부를 잘 따져봐야 한다. 그리고 그 개념을 적용할 경우, 제한된 용도로 사용하는 게 바람직하다.

나는 다문화주의에서 다문화사회를 연역하는 방식의 담론에는 문제를 제기하지만, 정책적 결론은 그들과 거의 다르지 않다. 자국 경제에 도움이 되는 외국인 우수인재에 대해 특혜를 베푸는 이민정책은 ‘국익 추구의 원칙’에 의하여 정당화될 수 있지만, 출신국의 경제발전수준 또는 국민 자격이 생득적이나 귀화에 의해 얻어진 것이냐에 따라 외국인·이민자를 차별하는 정책은 그 유례를 찾기 힘들다. 외국국적을 가진 동포의 거주국의 경제발전수준에 따라 차별 대우하는 ‘방문취업제’와, “귀화한국인의 배우자”는 다문화가족지원법의 적용 대상에서 제외하는 제도 등은 시급히 시정하여야 한다. 경제발전지상주의, 순수혈통주의 등이 진정한 다문화사회로의 이행을 막고 있다는 해석에도 의견을 같이 한다.

다문화사회에는 빛과 그림자가 있다. 빛의 측면으로, 한국사회에는 사회적·경제적·문화적 다양성이 크게 증가하였다. 외국인 이주노동자는 국내 노동시장의 빈자리를 메워주어 경제 발전을 지속하도록 하는 역할을 하고 있고, 외국인 결혼이민자와 혼인귀화자는 농촌사회에 새로운 활력을 불어넣는 존재로 자리 잡았다. 어두운 측면도 있다. 일부 업종에서 한국인들과 이민자의 일자리 경쟁이 발생하고, 불법체류자가 많이 모여 사는 지역에서는 외국인 범죄가 문제가 되고 있다.

다문화사회는 그저 주어지는 것이 아니다. 긍정적 효과를 극대화하고, 부정적 측면을 최소화하도록 하는 노력이 중요하다. 다문화사회 준비는 정부만 하는 것이 아니다. 시민들의 태도와 행동도 다문화 시대에 걸맞게 바뀌어야 한다. 조사 결과에 의하면, 대부분의 한국인들은 이민자 수용에 대해 적극적 태도를 지니고 있다. 하지만 일부 시민들이 이민자에 대하여 배타적·차별적 태도를 취하고 있는 것 역시 현실이다.

다문화 시대를 사는 한국인과 이민자는 서로 상대방에게 적응해야 하는 과제를 안고 있다. 이 땅의 사람들은 이질적 외모와 문화를 가진 사람들이 같이 어울려 살아야 하는 과제를 완수해야 한다. 그 길은 다양성에 의해 야기된 갈등을, 대화를 통해 풀어나가는 사회적 과정을 정착시키는 데 있다. 다행히 아직까지는 종족적 소수자 집단의 인구가 별로 많지 않으므로, 다소간의 시행착오를 겪으며, 심각한 갈등 없이, 주류사회와 이민자가 상호적응의 지혜를 학습할 기회가 있다. 그것이야말로 다문화사회 한국의 이민자 사회통합의 핵심 과정이다.

对韩国社会多元文化谈论的省察

薛东勋（全北大学校教授，社会学）

1. 韩国社会：多元文化社会的进入阶段

韩国是由同一种族集团（ethnic groups）组成的国家，世所罕见，寥寥无几。美国CIA的*The World Factbook*（2009）指出，除约2万在韩华侨之外，韩国种族集团具有“单一性（homogeneous）”特点。据该书记载，少数种族人口或其比例偏低的国家共有五个，即南北韩、葡萄牙、冰岛和日本。其中，北韩与南韩的单一性最为典型。

长久以来，信奉着单一民族神话的韩国社会，如今正朝着“多元文化社会”方向急剧转变。韩国社会由单一文化社会转变为不同文化融合的社会，其直接原因在于外国人的涌入。自1980年代后期起，外国劳工纷纷入境，之后1990年代初配偶移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继而2000年前后外国留学生也大幅度增加。自从20世纪初开始，除在韩华侨之外，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集团在韩国落地生根，且有增无减。

2009年，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入籍者及其子女’人数已逾100万人。以2009年5月为标准的行政安全部资料显示，韩国国内居住外国人为92万人，入籍者为7万人，外国人或入籍者的子女为9万人。该资料不包括短期入境人员或以旅客之名入境却在韩国居住超过90天以上的‘非法滞留者’。再加上19万名非法滞留者中67%的持有短期居留证的13万人，韩国国内‘外国居民’人数则竟达106万人。换言之，以居民身份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入籍者及其子女竟达5851万韩国总人口的2.5%。虽很难说韩国社会是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社会，但可以说韩国社会正向多元文化社会迈开新的一步。

然而，韩国的‘外国人口比例’或‘异国出生人口比例’仍然停留在世界最低水平。通过分析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和入籍者，可以看出由永久居民与入籍者构成的‘定居移民者’的比例微乎其微，其余大部分均为短期外国劳工或访客。韩国定居移民者当中‘配偶移民’和‘中国山东省移民者的后裔华侨’占绝大多数。其中仅有华侨具有与‘支配集团（dominant group）’相对立的‘少数集团（minority group）’特点。一般而言，配偶移民很容易融入主流社会，故不包括在少数种族之内。*The World Factbook*里所说的“单一性”并无不妥。少数种族集团有自己的种族认同，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因此严格而言，2009年韩国社会的少数种族人口比例仅为0.04%。

简言之，韩国政府和市民社会虽然一直强调‘准备迎接多元文化社会的到来’，但这只不过是过去的韩国相比之下而言的，无法跟移民比例偏高的国家或社会一概而论。

2. 多元文化社会的蓝图与战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世界化战略的延伸

在全球单一性最强的国家——韩国正纷纷谈论着多元文化社会。自1990年代起，学界与舆论界断断续续地提及过多元文化社会。到了2006年，多元文化社会这个概念已成为政府政策的说明用语，2008年“多元文化家庭”这个词被采用为法律用语。保健福祉家族部内设立了被称为多元文化家族课的行政部门，若干个大学还设立了多元文化研究所或多元文化系。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公布许多关于多元文化的研究课题，并由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韩国教育开发院、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和韩国

劳动研究院等许多国策研究院完成了研究课题。韩国研究财团和国际交流财团也集中力量对国内外学者的多元文化社会相关研究予以支持。这样一来,有关多元文化社会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大量涌现。不仅如此,舆论界也大量刊登有关多元文化社会的专题报道。现在正是多元文化社会谈论的丰收之时。

多元文化继过去开发时期的近代化、工业化、信息化、世界化之后,成为了韩国社会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化”(zation)这个词本身就用来说明社会结构的变动,而1960年代以后出现在韩国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则将之作为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从韩字与汉字的角度来看,多元文化这个词虽归属于“~化”之类,而从英语的角度而言,却非“-zation”之类。它作为与单一文化、同质文化相对比的概念,描写复合文化、异质文化共存的状态。若硬要将之定位为过去概念的延伸,应称之为“多元文化化(multiculturalization)”。无论是多元文化还是多元文化化,韩国政府正在1990年代世界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推行多元文化社会政策。因此,难免出现将“大学里的英语授课”等世界化政策勉强纳入多元文化概念之中的现象。

发展型国家的开发挂帅或经济发展挂帅的思考方式,支配着公务员和整体国民的意识。多元文化社会谈论盛行之下,国民之间出现了将外国人或移民者收容看作为先进化表现的倾向。韩国政府继续推行工业化、信息化、世界化的后续阶段—先进化,韩国人对此无甚意见,自然对多元文化也持积极态度。

‘国际社会调查规划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于2003年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为主体针对19个国家的国民进行过抽样调查。那时,韩国人对移民者收容持极为开放的态度,同意“移民者对国民经济普遍有益”这一选项的比例继加拿大、新西兰之后位居第三,反对“移民者在抢夺本国人的工作”这一选项的比例则继瑞典、瑞士、丹麦、挪威、法国之后位居第六,反对“移民者犯罪率在增加”这一选项的比例继加拿大、美国、新西兰之后列第四。“有关移民者人数,您认为贵国应增加多少?或保持现状?或减少多少?”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显示,韩国是回答应增加移民者人数比例偏高的国家。列加拿大、芬兰之后,位居第三。

类似的结果在美国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7年以全球46个国家的国民为对象进行的对移民者的态度调查中也出现过。据调查,韩国是反对‘严格控制移民者入境政策’的比例偏高的国家,是在调查对象国当中态度最为开放的国家。在大多数国家,赞成加强对外国人入境控制的人比反对人多。由此可见,韩国因没有与外国人、移民者相处的经验,故与其说担心由移民者收容所带来的苦衷与不便,不如说看重其吸收有利于经济发展人才的机会。

不仅是普通老百姓,韩国政府也对外国人、移民者采取了友好的政策。世界知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于2005年以世界131个跨国企业职员为调查对象,让其对23个国家政府的外国人出入境及就业许可体系做出了评价。结果显示,韩国继台湾之后位居第二,被评为‘对外国人采取友好政策的国家’。分析应答对象对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抱有不满意的比,台湾仅为1%,韩国则和香港、加拿大相同,仅为2%。

在韩国,‘实现多元文化社会’与‘先进化’意义相同。果真如此,哪个韩国人会反对它?由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领头,完成期限为3年的以“构筑实现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机制”为题目的大型研究课题便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一点。在韩国,多元文化社会并非呼之即来,而应积极追求。

为实现多元文化社会,韩国政府采用哪些战略?2008年12月,韩国政府召开外国人政策委员会,审议表决‘外国人政策五年计划’。‘外国人政策五年计划’形同以前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是关于外国人政策的国家五年计划,即以中长期统筹的眼光有系统地推行各部门各自实行的外国人政策。该计划将‘与外国人共创世界一流国家’定为外国人政策的蓝图,并树立四大政策目标,分别为通过积极开放增强国家竞争力,实现社会的高度整合,实行井然有序的移民行政以及保障外国人的人权。其中还包含13个主要课题,如引进优秀人才确保发展动力,加深了解并支持多元文化家庭,保护外国人权益等。与过去由国家主导达成的经济开发目标一样,政府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正致力于实现多元文化社会。

3. 韩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政策

韩国政府不用‘移民政策 (immigration policies)’这个术语, 而以‘外国人政策’或‘多元文化社会政策’这个修辞 (rhetoric) 取而代之。移民政策由①国境控制、②外国人滞留管理、③移民者社会整合这三个部分组成。这与一个外国人入境某国、滞留、定居的过程正相吻合。有人认为多元文化社会政策是移民政策的同义词, 有人则认为它只意味着‘移民者社会整合政策’。前者被称之为‘广义的多元文化社会政策’, 而后者则被称为‘狭义的多元文化社会政策’。

第一, 有关国境控制方式, 韩国通过签证 (visa) 控制外国人的活动。反观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方式, 与其说以‘入境签证’为中心控制国境, 不如说以居留许可 (residence permit) 和工作许可 (work permit) 控制外国人的活动。而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则注重于以签证控制外国人入境。由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国境线犬牙交错, 根本不可能控制外国人入境, 因此事实上允许自由入境但对居留与工作加以控制。反之, 新大陆的美国与加拿大只跟一两个国家共享一部分国境线, 因此就在国境地区设立一两所移民事务所审批外国人入境, 实现‘国境控制’政策。如此说来, ‘岛屿国’或‘类似岛屿国’就是以签证制度为核心来控制国境。韩国堪称为由停战线构筑的‘类似岛屿国’。岛屿国无法通过陆路与邻国进行人员交流, 国境控制相对容易, 因此采用签证制度控制外国人的入境与国内活动的范围。

第二, 外国人居留管理方式。韩国不太致力于诱导外国人的定居, 而强调‘交替、循环 (rotation)’。自1980年代后期, 韩国劳动市场出现供不应求局面。两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定居移民, 而采取基于‘交替、循环原则 (rotation principle)’且“约定居留一定期限后返回本国”的外国劳工收容政策。韩国政府一再强调韩国的人口密度趋近世界最高水平。从整体社会角度而言, 也将劳动力不足远不如失业问题那么严重这一点作为考虑对象之一。因此, 出现了若收容定居移民人就将扰乱本国劳动市场的喊声。

韩国社会是由单一民族组成, 这也是重点之一。韩国拥有‘单一民族神话’, 是世上少见的‘单一性国民国家’。要包容移民者定居所带来的异质性, 韩国社会尚未做好齐全的准备。考虑到这一点, 韩国政府决定与其选择‘定居移民者’, 不如选择以‘短期外国劳工或访客’为主的外国人居留管理政策。

吸纳外国劳工的同时, 韩国政府优先吸纳‘在外同胞的后裔’, 认为他们与本国社会之间不会产生严重的文化矛盾。韩国政府实行‘访问就业签证’, 收容中国朝鲜族与旧苏联高丽人。在决定政策时, 韩国政府考虑到了文化矛盾问题, 认为本族外国劳工所引起的文化矛盾定会比他族外国劳工要少。这是韩国社会外国劳工吸纳政策的重要特点。

另一方面, 对‘本国人的配偶’, 韩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几乎无限制地签发签证。驻外公馆签发签证时, 只考虑‘婚姻的真实性’, 不管入境之后是否享有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保护制度等公共辅助。这样一来, 配偶移民中相当多的家庭虽享受公共辅助, 但若持有外国人身份的话, “仅限于养育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方能享受该公共辅助。在先进的福利国家, 申请移民的人应证明在一定期间内不享受福利优惠也能谋生, 方能得到签证, 但其福利水平不及居留在国内的外国人所享受的福利水平。在韩国, 连‘本国人的配偶’也无法享受内国人待遇。

第三, 韩国政府的移民者社会整合尤为重要。对移民者的社会整合或适应与否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将‘移民者社会整合政策’区分为①同化 (assimilation) 模式, ②跨文化主义 (interculturalism) 模式, ③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模式。韩国政府属于哪种类型? 为找出正确的答案, 有必要了解这三种政策模式的特点。

同化政策是法国和德国等国所采用的方式, 即强行规定移民者须学会居留国的语言与文化习惯。‘同化’ (assimilation) 意味着少数集团逐渐适应主流文化习惯与态度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追求具有‘单一文化 (monocultural)’特点的统一性 (unity)。“入境随俗”这句话便一语道破了同化政策的内容。

跨文化主义政策要求移民者适应居留国社会, 同时要求主流社会也要适应移民者所带来的情况变

化。爱尔兰政府提倡的‘相互适应 (mutual adaptation)’或‘互动整合 (two-way integration)’模式则基于单一文化基础，要求移民人与收容国社会双向适应。被称为‘熔炉 (melting pot)’的这种方法旨在维护收容国固有的文化遗产的同时，追求移民者流入所带来的多样性，即谋求收容国社会与移民者双方共同文化的形成。此乃借助异国人改造本国文化的举措，政府的积极政策意志重之又重。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始于加拿大，其内容是赋予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同等的权限，以防止他们的分离独立。简言之，在一个社会里鼓励、促进多种亚文化，并以此取代主流文化。名为‘色拉盘 (salad bowl)’或‘彩虹联盟 (rainbow coalition)’的该方式目的在于追求呈现出‘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特点的多样性 (diversity)。加拿大可区分为英语区和法语区，法语区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区魁北克被落后、忽视，并试图从联邦独立。在此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方式。其核心就是彻底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性。

多元文化主义还适用于新移民者。加拿大已放弃在短时间内实现移民者社会整合，而鼓励移民者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利用其同化政策的警句来表现的话，则是“韩国人有入境不随俗的权利”。所以说，政府积极支持这样的权利，才是加拿大式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特点。

此外，还有美国式或英国式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即移民者可保持本国文化，国家则对此采取放任的态度。英美式多元文化主义为‘自由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式则为‘国家介入的多元文化主义’。一般将这两种统称为多元文化主义。

同化政策、跨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只是从特定国家的移民者整合政策中抽取的‘理念类型 (ideal type)’而已。实际上，比较各类型政策，相似之处颇多。比如，三种类型均强调由政府教育移民者本国语言，并为此安排巨额预算。法国社会对移民者持宽容态度，但考虑到法国社会是‘同化’政策的典型，就可以看出必须先得消除人们对同化政策的误解。

言归正传，韩国的移民者整合政策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若要在上述三种类型中必选其一的话，韩国移民者整合政策更接近于‘同化政策’。然而细看究竟，法国早在100多年前起已积极收容来自邻国的定居移民者，进入21世纪后的德国则毫不犹豫地收容来自欧盟会员国的定居移民者。反观韩国，除配偶移民之外，几乎不收容移民者。如明白这一点后，还主张“韩国、法国和德国同属于同化政策类型”这种说法的话，那便会“贻笑大方”了。

2009年，现在的韩国移民政策与过去德国的政策大同小异。截至20世纪，德国基于‘交替循环原则’和‘本国劳动市场补缺的原则’，‘仅限于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部分岗位’允许‘短期外国劳工’就业。学者们注重过去的德国几乎不收容移民者这一事实，并将之命名为‘差别排斥 (differential exclusion)’模式。对于实施大多数外国人居留一段时期返回本国这类政策的国家，就没有强调‘移民人社会整合’的必要了。

在社会整合政策上，被排斥在外的移民者或外国劳工集团是‘隔离 (segregation)’的对象。隔离的定义是分离各种人种、阶级、职业、民族集团的政策或行为。在隔离模式下，移民者只能作出最小的努力去适应，而收容国的单一文化则可完好无损，毫不动摇。移民者的社会参与权与权利的行使也大受限制。

进入21世纪后，德国的移民政策由‘差别排斥’转为‘积极收容移民者并通过同化政策实现整合’。2005年生效的德国移民法明确承认，德国是‘移民国家 (country of immigration)’。同时，德国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也由‘差别排斥或隔离’转变为‘同化’。

综上所述，韩国移民政策在移民者收容方面尚在坚持实行‘差别排斥’模式，而在以寥寥无几的移民者（大多为配偶移民）为对象的社会政策方面则采用‘同化’模式。主流社会尚未积极努力适应因移民者的流入所产生的环境变化，只是滥用多元文化社会或多元文化家庭之类之词。

通过第17届国会第269次女性家族小委员会第1次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法案（代案）审查过程中小委员长的发言，可以确认法律用语采用“多元文化”概念的过程。关于“多元文化家族”概念，小委员长表示“其

实是移民家庭……但为防止社会给他们打上烙印，我们全面采用多元文化概念”。然而，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法却不名不副实，该法不支援‘一般多元文化家庭’，而只支援“一生下来”就与韩国人结婚的移民配偶或婚姻入籍者家庭。如果入籍者有涉外婚姻的话，其配偶则无法得到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法的支援。留学生可跟配偶同伴入境，但其不是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法的支援对象。由于雇佣许可制、访问就业制的限制，即便是合法居留的非熟练外国劳工，在韩国也无法申请‘同伴’签证或‘邀请’配偶。非法滞留外国劳工的家人更是不在话下。这便是韩国多元文化社会政策的核心——‘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政策’的现实。

4. 韩国社会“多元文化主义”谈论存在的问题

许多人都谈论着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但其概念定义各不相同，甚至已到了难以沟通的地步。部分学界认为‘多元文化社会’是外国人、移民者等社会异质性加大的状态，‘多元文化主义’是政府的整合政策类型。另有一些人则从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延伸出多元文化社会。支持前者的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移民政策的下位类型，是有别于‘同化’或‘跨文化主义’的政策。支持后者的学者则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与少数集团的公民权利(citizenship)有关的普遍概念。换言之，从前者的角度来看，韩国正在实行远离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政策，因而这些概念变得不切实际。而从后者的角度来看，“韩国式多元文化主义”或“韩国型多元文化主义”概念也可以落地生根。考虑到在各个学术领域里存在着各种理论立场，采用何种概念应由学者来决定，且其决定必须得到尊重。然而，如今很多学者模棱两可、两者混用，则应另当别论。因此，笔者站在后者的立场，在本文中提若干个问题。

坚持后者立场的人们从加拿大政治哲学家秦力克(Will Kymlicka)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中导出多元文化。秦力克认为女性、黑人、原住民、同性恋者等少数集团在与支配集团的关系中感到一种社会失落感，因而强调‘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公民权利’概念。至于移民者，‘社会整合不是在当代能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须经由几代方能完成的过程’。

此外，他们借用法国政治学家马蒂内欧(Marco Martiniello)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诠释多元文化。这概念是马蒂内欧针对普通法国人所写的书里介绍过的。马蒂内欧强调移民者同化政策的理想类型——法国政策也含有多元文化主义因素。他在介绍移民者整合政策类型时，悄悄以“多元主义的模式”概念替换卡斯特与米勒(Castles and Miller)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并强调指出“认为法国全面采用同化政策，荷兰全面采用多元主义的模式，而德国则鼓励差别排斥模式……是种极其单纯的看法。”同时还主张“一个国家可以在采取同化模式的同时，逐步以增强多元主义模式政策的重要性来取代同化模式。”

尽管马蒂内欧将多元文化主义改变成了普遍概念，摒弃了作为国家类型论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还主张法国也“有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其主张缺乏一贯性。理所当然，就不会有充分满足理念类型要素的例子，所以说他的逻辑缺乏根基。在视‘共和主义的同化模式’为当然的法国学界里，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马蒂内欧的主张，几乎不被人们所接受。

然而，马蒂内欧的著作早已在韩国翻译出版发行，并与多元文化谈论热潮一道传播到韩国的学界。同意“多元文化主义就是多元文化社会的核心原理”这命题的韩国学者，就基于秦力克与马蒂内欧等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去理解多元文化社会。

一些韩国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如同‘民主主义’一样，是一种可适用于任何社会的普遍概念。这与带一点点民主主义要素，就视为民主主义，且任何社会都要将民主主义视为向往追求的价值的那种观点同出一辙。照此逻辑，1970年代维新体制下，由朴正熙提倡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也当属民主主义的另一类型。

全球范围内，像韩国这样少数种族集团人口比例极少的例子少之又少，这样的韩国社会采取的移民配偶整合政策，称得上是多元文化主义吗？与其主张“由政府积极传播的‘多元文化主义’，看来是一种拒

绝转向实际‘多元文化社会’的‘隐瞒’举措。”，“区分并差别对象的多元文化并非真正的多元文化。”，不如更明确地表示出以‘区分排斥政策’为主，严格选拔收容特殊条件的少数移民者，排斥其余大多数移民者，并对少数配偶移民则实行同化政策。这才是更为明确适当的理论立场。

他们大胆主张“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是善，同化模式是恶”。而同化模式则与‘自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不同，察看现在的法国和德国社会便可发现它与‘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水乳相融。尽管如此，他们仍歪曲了同化模式。

甚至他们还主张“不赦免长期非法滞留的外国人，这则恰恰有违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公民应遵纪守法的德国和日本等国，从未赦免过非法滞留外国人。已有几次赦免经验的美国，也不与多元文化主义挂钩，而一些人却基于“灵丹妙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赦免的正当性。

他们认为韩国的移民者整合政策是“官方主导型多元文化主义”。但这一概念明显是个错误的定位。移民政策的主体是国家，理应由官方主导。然而，2006年政府提出的多元文化社会谈论，并非是一朝一夕能提出的，而是需要事先接纳学界与舆论界等市民社会的谈论。考虑到这一点，还能主张‘官方’主导吗？

简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始见于‘少数种族集团’与支配集团之间有着尖锐矛盾的加拿大，若将之适用于‘少数种族集团’极少的韩国社会，未免问题重重。为道出“韩国型多元文化主义”或“韩国式多元文化主义”并非“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而去运用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话，干脆摒弃其概念更为宜。

5. 结语

我们务必避免将由外国引进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无节制地适用于韩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政策’。若要将历史、社会迥异的他国社会理论适用于韩国社会，理应细细斟酌其前提条件充足与否。应用其概念时，也应在限制的范围内谨慎使用为宜。

我虽对有关从多元文化主义演绎出多元文化社会的谈论方式提出了意见，但尽管如此，其政策结论却大同小异。从‘国益追求原则’角度而言，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外国优秀人才能享受优惠的移民政策，固可体现其正当性。但，根据移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公民资格的与生俱来与否或入籍与否差别外国人、移民者的政策例子却史无前例。根据外国国籍的同胞居留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对待的‘访问就业制’和将“入籍的韩国人配偶”排除在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法的适用范围之外的制度等，应亟待修正。有人认为经济发展挂帅和纯血统主义等阻碍着韩国社会走上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道路，我对此深表同意。

多元文化社会具有正反两面的效应。从正面效应角度而言，韩国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多样性得以大幅度增强。外国劳工弥补国内劳动市场的空缺，并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移民配偶与婚姻入籍者则为农村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其反面效应也在所难免。在一些行业中，韩国人与移民者之间产生的就业竞争，以及非法滞留者聚居地的外国人犯罪问题已浮上台面。

多元文化社会并非呼之即来，需要扬长避短地努力。准备迎接多元文化社会绝非只是担负在政府肩上的任务。公民的态度与行动也要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韩国人对移民者收容问题持积极态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部分韩国人对移民者持排斥、歧视的态度。

在多元文化时代的道路上，韩国人应与移民者走在一起，互相适应。落根于韩国，人人都应与拥有异国相貌、异国文化的人和睦相处。这条道路上潜在着许多多样性，我们应以对话来解决多样性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并使该解决过程得到社会的认同。时到如今，幸好少数种族集团人口尚为数不多，只要我们走一点儿弯路，就能避免尖锐的矛盾，也有机会学习主流社会与移民者相互适应的智慧。这才是多元文化社会——韩国的移民者社会整合的核心过程。

韓国社会における多文化談論に対する省察的アプローチ

薛東勳（全北大学校）

1. 韓国社会：多文化社会への突入段階

韓国は地球上で非常に稀なことに同質的な民族集団(ethnic groups)から成り立っている国だ。米CIAの『ザ・ワールド・ファクトブック』(2009)では、韓国の民族集団は約2万名余の华侨を除けば「同質的だ(homogeneous)」と書かれている。同書から少数民族の人口またはその割合が低い国を取り上げれば、韓国、北朝鮮、ポルトガル、アイスランド、日本など五つの国である。その中でも北朝鮮と韓国は最も同質的な国だ。

長期間、単一民族の神話を受け継いできた韓国社会は最近「多文化社会」へ急速に変わりつつある。韓国社会が同質的な文化を有する社会から異質な文化を抱える社会へと変わった近因は外国人の流入である。1980年代後半から外国人移住労働者が入り始めており、1990年代初頭からは国際結婚移住者が加わる。さらに2000年頃からは外国人留学生の数も大幅に増加している。20世紀の初めからこの地に居住してきた华侨のみならず、多様な外国人の集団が増えているのだ。

韓国で住民として生活する「外国人・归化者及びその子供」の数は2009年に100万名の大台を超えた。2009年5月時点の行政安全部の資料によると、外国人の住民は93万名、归化者が7万名、外国人または归化者の子供が9万名である。同統計には短期訪問者若しくは観光の目的で入国し90日以上韓国内で生活している「不法滞在者」は含まれていない。不法滞在者19万名のうち67%を占めている短期滞在査証保持者13名を追加すれば、韓国内の「外国人住民」の数は実に106万名に達する。つまり韓国の总人口4851万名の2.5%に及ぶ外国人・归化者及びその子供が韓国内で住民として生活しているわけだ。本格的な多文化社会に直面しているとまでは言えないものの、多文化社会を迎え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しかし、韓国は依然として「外国人人口の割合」また「出生地が他国である人口の割合」の面から見ると世界最低レベルである。韓国に滞在している外国人と归化者の構成をみると、永住者と归化者を含む「定着移民」が占める割合が最も低く、残りの大半が短期交替循環の移住者または訪問者であることが読み取れる。韓国における定着移民としては、「韓国人との国際結婚により移住した人々」と「中国山东省出身の移民の子孙である华侨」がそのほとんどだ。その中、「支配集団(dominant group)と対立する「少数者集団(minority group)」の特性が目立つのは华侨のみだ。国際結婚移住者は主流の社会への同化が容易な存在であるため、一般に少数民族に触れる際、ほとんど含まれない。『ザ・ワールド・ファクトブック』の「同質的」という叙述が間違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少数民族について主流の社会に同化しにくい集団として、そして集合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有するものとして厳しい基準を適用すれば、2009年の韓国社会における少数民族の人口割合は0.04%にも満たない。

要するに韓国政府と市民社会では「多文化社会の到来とその備え」を強調しているものの、それは自国社会の過去の姿と比較したもので、移住者の割合が高い他国とは比べ物にならないほど低い水準だ。

2. 多文化社会のビジョンと戦略： 発展国家の工業化・グローバル化戦略の延長線

地球上で最も同質な国である韓国では多文化社会をめぐる谈论が流行っている。1990年代から学界とマスコミで断続的に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た多文化社会の概念は2006年に入り政府の政策を記述するものと取り入れられた。さらに2008年には「多文化家族」という言葉が法律用語として採用された。また、保健福祉家族部には多文化家族課という行政部署が設置されており、いくつかの大学では多文化研究所あるいは多文化学科を新設するに至った。中央と地方の行政機関も大規模の研究助成を行うとともに、韓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韓国教育開発院・韓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韓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韓国労働研究院など数々の政府関連研究機関で研究課題が進められており、韓国研究財団と国際交流財団でも内外の学者に対し多文化社会と関連した研究を重点的に支援している。そのため、多文化社会に関わる研究実績も大量に生産されている。また、マスコミも多文化社会についての特集記事を大量に掲載している。まさに多文化社会の谈论が溢れ返っているのだ。

多文化は過去開発を最優先に進めた年代における近代化・工業化・情報化・グローバル化に続き、韓国社会の重要なキーワードの一つとして浮上した。「-化」(-ization)という接尾語は元来社会構造の変動を叙述する概念であるが、1960年代以降、韓国に現れた発展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は社会発展の戦略概念としてそれを取り入れてきた。多文化はハングルと漢字では、「-化」のカテゴリーに入るものの、英語では「-ization」のカテゴリーに入らない。

それは単一文化・同質文化と対比する概念で、复合文化・異質な文化が共存する状態を描写するものだ。あえて過去 の 概念 の 延長 線上 で それ を 位置 づ ける なら ば、「多文化化(multiculturalization)と表現せねばならない。多文化にせよ、多文化化にせよ、韓国政府は1990年代から、グローバル化の发展战略の延長線上で多文化社会の政策を進めている。そのため「大学における英語讲义」などグローバル化の政策を多文化という概念とひっくるめてしまう現象も出ている。

発展国家の開発万能主義または経済成長至上主義の考え方は公務員だけではなく、国民の意識までも支配する。多文化社会の谈论が支配する時、国民は外国人あるいは移住者の受け入れを先進化の同義語として考える向きがある。政府が工業化・情報化・グローバル化の次の段階である先進化を進めるのに異論のほとんどない韓国人は多分化に対しても非常に積極的だ。

「国际社会調査プログラム」(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が2003年、国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National Identity)をテーマに19カ国を対象にサンプル調査を行った結果、韓国人は移住者の受け入れに対し非常に開かれた姿勢を堅持した。「一般に移民は国民経済に役立つ」という見解に同意する韓国人はカナダ、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について第3位だった。さらに、「移民は内国民の職場を奪う」という見解に反対する韓国人の割合もスウェーデン、スイス、デンマーク、ノルウェー、フランスに次ぐ第6位だった。また「移民による犯罪率が上昇している」との見解に反対する韓国人の割合は、カナダ、米国、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について第4位であり、「あなたの国では移民の数を増や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か、このまま維持すべき、それとも減ら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か」という問いに対する回答を見ると、韓国は移民の数を増やすべきだと答えた割合が高い国で、カナダ、フィンランドに次ぐ第3位だった。

米民間調査機関ピュー・リサーチ・センター(Pew Research Center)が2007年世界46カ国の国民を対象に実施した移民に対する姿勢の調査からも類似した結果が見られる。同調査によると韓国

は「移民に対する入国への厳しい統制政策」に反対する人々の割合が高い国で、調査対象国のうち最も开かれた姿勢を見せた。調査対象国の大半において外国人に対する入国の規制の強化に賛成する回答が反対を上回った。韩国人は外国人・移民と同じ土地で生活した経験がほとんどないため、移民の受け入れによってもたらされる問題と不便さよりは经济发展に役立つ人材を吸収する機会を一层重要視していると理解される。

一般国民の態度のみならず、政府の政策も外国人・移民に非常に友好的だ。世界有数のコンサルティング会社であるプライスウォーターハウスクーパース(PricewaterhouseCoopers)が2005年、世界131カ国の多国籍企業の従業員を対象に23カ国政府の外国人の出入国と就労許可に対する体制についての評価を調査した結果によると、韩国は台湾に次いで二番目に「外国人に友好的な政策を展開している国」だった。さらに各国政府による移民政策に対する不満度をチェックした結果、台湾は1%に過ぎず、韩国も香港、カナダと同様の2%だった。

韩国において「多文化社会への移行」とは「先进化」の同义语である。それが事実なれば、韩国人の谁がそれに反対するだろうか。これは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が主导している3年がかりの大型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のテーマである「多民族・多文化社会への移行に向けた政策パラダイムの构筑」という点からも确认できる。多文化社会はただ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く、積極的に构筑していくべきものである。

多文化社会に進むための韩国政府の战略は如何なるものであろうか。政府は2008年12月、外国人政策委员会を開き、「外国人政策5ヵ年計画」を审议・议决した。「外国人政策5ヵ年計画」とは従来の「经济开发5ヵ年計画」のように外国人政策に関する5年ごとの国家计画で、それまで各省厅が个别に進めてきた外国人政策を中长期的な观点に立ち、总合的・体系的に進めるべく作成されたものだ。さらに「外国人と共存する世界の一流国」を外国人政策のビジョンとして定めると同時に、积极的な开放を通じた国家の競争力の强化、质の高い社会统合、秩序ある移民の行政の实现、外国人の人权の拥护などといった4大政策目标と、優れた人材の诱致を通じた成长エンジンの确保、多文化家族に対する理解の増进と支援、外国人の权益の保护などを骨子とする13の主要课题などを盛り込んでいる。过去国の主导で经济开发の目标を达成したように、政府は「发展战略」の一环として多文化社会への移行を進めている。

3. 韩国の多文化社会政策

韩国政府は「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ies)」の专门用语に代わって「外国人政策」あるいは「多文化社会政策」というレトリックを使用している。移民政策は①国境统制、②外国人の滞在に対する管理、③移民の社会统合など三つの部分からなる。それは外国人がある国に入国し、滞在し、さらに定着する过程と完全に重なる。多文化社会政策を移民政策の同义语で使用する人もいれば、「移民の社会统合の政策」のみを指して使用する人もいる。前者は「广义の多文化社会政策」、後者は「狭义の多文化社会政策」と呼ばれる。

第一に、国境统制の方式と关联し、韩国は査证の发行を通じて外国人の活動を规制する方式を取っている。欧州诸国が「入国査证」中心の国境统制ではなく滞在许可(residence permit)と就労许可(work permit)を通じて外国人の活动への规制に取り組んでいるのに対し、米国とカナダなどは査证の发行を通じて外国人の入国への统制を重视する。なぜなら、欧州诸国は国境のすべてを

邻国と接しており、外国人の流入そのものを統制するのが困難であるため入国は事実上、自由に許可するが、滞在と就労を規制する方式を取っている。しかし、新大陸の米国とカナダは一国または二国と国境を部分的に接しているため、国境地域に設置した移民局事務所において外国人に対する入国審査を行うことで「国境統制」政策を実現している。言い換えれば、「島国」あるいは「有事の島国」では査証制度を国境統制の中核として取り入れている。韓国は休戦ラインにより形成された「有事の島国」だと言える。島国では邻国と陆路を通じた人的交流がなく、国境統制が比較的容易であるため、査証制度を通じて外国人の入国と国内における活動の範囲を規制する方式を取っている。

第二に、外国人の滞在を管理する方式として、韓国では外国人の定着を誘導するより「交替、循环」(rotation)を強調してきた。韓国では1980年後半から労働市場において労働力の不足が発生し始めた。しかし定着する移民の受け入れはまったく考慮せず「一定期間滞在した後、自国へ帰国すると約束した」移住労働者のみを「交替、循环原則」(rotation principle)に基づいて受け入れる政策を採用した。韓国政府は人口密度で世界最高レベルに迫るほど高いと強調した。社会全体から見て、労働力の不足より失業問題が深刻であった点も考慮された。定着する移民を受け入れた場合、自国の労働市場がかく乱しかねないと懸念する声が上がった。

韓国社会が同質的な民族構成を有している点も重要である。韓国は「単一民族の神話」を受け継いできており、世界でも非常に稀で「同質的な国民国家」を形成している。韓国社会では移民の定着がもたらす異质性を抱擁する用意がいまだに不十分だ。こうした点を考慮し、韓国政府は「定着する移民」より「短期の移住労働者または訪問者」を中心とした外国人の滞在管理政策を採用してきた。

移住労働者を受け入れながらも、「在外同胞の子孙」が自国の社会との文化摩擦を起こしにくいと見て、彼らを優先的に受け入れた。政府は「訪問就業制」を実施し、中国の朝鮮族と旧ソ連の高麗人を受け入れている。他民族の移住労働者より自民族のそれが文化の葛藤が少なく済むという政策的な考慮が働いた。これは韓国社会における外国人移住労働者の受け入れ政策の重要な特徴である。

一方、「自国人の配偶者」について政府は人道主義の原則に基づいて査証の発行に制約をほとんど課していない。在外公館における査証の審査過程を見ると、「婚姻の信凭性」が疑われる偽装結婚を取り締まるだけで、国内に入り、基础生活保護制度や医療保護制度など公的扶助の恩恵を享受するかどうかはまったく問題にしない。そのため、国際結婚移住者世帯の相当数が公的扶助の恩恵を受け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ものの、外国人という身分を有している場合、「未成年の子供を育てる場合に限り」その制度を適用している。先進福祉国家では新規の移民に対し一定期間福祉の恩恵を受けず生活できることを立証する場合に限って、査証を発行しており、国内に滞在している外国人に福祉恩恵を提供している慣行と同等のレベルには満たない。韓国は「自国人の配偶者」にさえ福祉の恩恵において内国人の待遇を与えていない。

第三に、韓国政府による移民の社会統合は非常に重要である。移民の社会統合あるいは適応を研究する社会学者は「移民の社会統合政策」をいわば①同和(assimilation)モデル、②文化間主義(Interculturalism)モデル、③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モデルに区分する。韓国政府の政策は如何なる類型に属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その答えを探るには、三つの政策モデルの特徴を検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同和政策はフランスとドイツで採用されている方式で、移民は滞在国の言語と文化、慣習を身につけるよう義務付けられる。「同和」(assimilation)はマイノリティが主流の文化における

慣習と態度に漸进的に适应していく过程を意味するが、そのアプローチは「単一文化」(monocultural)の様子を呈する統一性(unity)を目指す。「郷に入り手は郷に従え」という命題は同和政策の内容を端的に示す。

文化間主義政策は移民の滞在国への适应はもちろんのこと、主流の社会も移民の流入によりもたらされた状況の変化に适应することを重視する。アイランド政府が標榜する「相互适应性(mutual adaptation)」あるいは「双方向の統合」(two-way integration)モデルは単一文化における基準を基にしながら、移民と受入国の社会两者が相互に适应するよう求める。「人種のるつぼ」(melting pot)と呼ばれるこうしたアプローチは受入国特有の文化的遺産を維持しながら移民の流入による多様性を追及する、つまり受入国の社会と移民两者が共通の文化を形成することを目標にする。ここでは異邦人の排除する排他的な自国文化を改造しようとする政府による積極的な政策意志が特に重要だ。

多文化主義政策はカナダで初めて提唱されたもので、少数民族による分離独立を防ぐため、少数民族に対し主流の社会と同様の権限を与える方式だ。一つの社会内で一つの主流の文化に代わって多くのサブカルチャーを奨励し、促すことを意味する。「サラダボウル」(salad bowl)あるいは「虹の連合」(Rainbow Coalition)などと呼ばれるこうしたアプローチは「多文化的な」(multicultural)特徴を示す多様性(diversity)を目指す。カナダは英語を使用する地域とフランス語が公用語として採用されている地域に大別されるが、フランス語を使用する住民らは、居住するケベック州が立ち遅れている点を取り上げながら、連邦から脱退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を見せた。そうした中、カナダ政府が採用した方式が多文化主義である。その中核は少数民族の文化的な自主性を徹底的に尊重することである。

多文化主義は新しい移民にも適用される。カナダには移民の社会統合を短期間に成し遂げることを諦め、移民がもともと有していた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維持をむしろ勧奨している。同化政策の警句を応用し、表現すると「ローマにも韓国人は韓国式に暮らす権利がある。」というものだ。このような権利を政府が積極的に支援する点がカナダ式の多文化主義政策の特性である。

一方、米国式、或いは英国式の多文化主義政策も存在する。それは国家が、移民が自国の文化を維持することを放置または、傍観する姿勢を取る形である。英米式の多文化主義は「自由放任式の多文化主義」、カナダ式の「国家介入的な多文化主義」と呼ぶ。普通この二つの細部タイプを合わせて多文化主義と呼ぶ。

同化政策、文化間主義政策、多文化主義政策は特定の国の移民統合政策から抽出された「理念型(ideal type)」であるだけで、実際にそれぞれのタイプの政策を比較すると、似ている内容が大変多い。例えて言えば、3つのタイプにおいて政府は移民に対する自国語の教育を強調し、莫大な予算を割り当てている。移民に対し寛容な態度を大切にしているフランス社会が「同化」政策の典型であることを考慮すると、同化政策に対する世の中の誤解を拂拭することが必修であることを悟る。

元の問いに戻り、韓国の移民者統合政策はどのタイプに属するだろうか？この3つの政策の中から選ぶとすると、韓国の移民者統合政策は「同化政策」に近い。しかし、よく考えてみるとフランスは既に100年余り前から隣国から定着する移民者を積極的に受け入れており、21世紀に入り、ドイツではEU加盟国から来る定着移民者の受け入れに全く躊躇していない。しかし、しかし韓国は結婚移住者を除いては移民を殆ど受け入れていない。このような事実を知りつつ「韓国がフランスとドイツのような同化政策のタイプに属する」と主張することは「捧腹絶倒」である。

2009年現在、韓国の移民政策のモデルは過去ドイツと類似している。20世紀までドイツは「交替循環原則」と「自国の労働市場の補完性の原則」に基づき「短期移住労働者」のみ「労働力の不足がひどい一部の仕事に限り、就業を許可する方法」を取った。学者は過去ドイツの移民政策について移民を殆ど受け入れなかった点を重視し「区分排除」(differential exclusion)モデルと呼ぶ。外国人の大半が一定期間、滞在し自国に归还することを志向する政策をとる国では「移民社会統合」の必要性が殆ど強調されなかった。

社会統合政策で排除された移民または移住労働者の集団は「隔離」(segregation)の対象である。隔離は様々な人種・階級・職業・民族の集団を分離する政策或いは行為として定義されるが、隔離モデルにおける移民は適応のための最低限の努力だけするよう要求され、受け入れ国の単一文化は揺ぎ無く維持される。彼らの社会参加と権利の行使は極端に制限される。

そんなドイツが21世紀に入り、移民政策の基調を「区分排除」から「移民の積極受け入れ及び同化政策を通じた統合」に轉換した。2005年発効したドイツ移民法ではドイツが「移民国」(country of immigration)であることを明示的に認めている。そして、ドイツの移民政策の基本原則は「区分排除または隔離」から「同化」に轉換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概念の枠組みに照らし合わせてみると、韓国の移民政策は移民受け入れの側面では「区分排除」のモデルを堅持し、その上、存在する少数の移民(殆ど全員が結婚移住者)対象の社会統合政策は「同化」のモデルを採用している。主流の社会が移民の流入により変化した環境に積極的に適応しようとする努力は殆どなく、ただ、多文化社会または多文化家族という概念のみが飛び交うだけである。

法律用語に「多文化」概念が導入された経緯は、第17代国会第269回の女性家族小委員会第1次多文化家族支援法案(代案)審査の過程で、少委員の委員長が発言した内容を通じ、確認できる。かれは「多文化家族」の概念を、「実は、移住民家族であります……社会的に烙印を押さないようにという意味で多文化を我々が全体的に受け入れる」という趣旨で導入したと明らかにした。しかし、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はその名称が意味するものとは異なり「多文化家族の一般」ではなく、「生まれながらにして、韓国人と結婚した結婚移住者または、婚姻の归化者の家族にのみ支援する法律である。归化韓国人が国際結婚した場合、その配偶者は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は適用されない。留学生は配偶者が同伴であれば可能であるが、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の適用の対象にはならない。雇用許可制・訪問就業制を通じた低熟練の移住労働者は本人がたとえ、合法的に滞在しているにも関わらず、配偶者を同伴したり招請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不法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の家族が適用の対象ではないことは論を持たない。これが韓国の多文化社会政策の核心である「多文化家族支援政策」の現実である。

4. 韓国社会の「多文化主義」談論の問題点

多くの論者が多文化、多文化社会、多文化主義を言及しているが、その概念の定義がそれぞれ異なり、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難しくなるほどである。学界の一部では「多文化社会」は外国人・移民など社会の異質性が増大した状態で「多文化主義」は政府で彼らを統合する政策の類型として把握する一方で、他の一部では多文化主義の概念から多文化社会を演繹する。前者の立場を堅持する研究者は多文化主義を移民政策の下位の類型と捉えており「同化」または「文化間主

義」と区別される政策と見ている。後者の伝統に立った研究者は多文化主義を少数者の集団の市民権(citizenship)と関連した普遍的な概念とする傾向が強い。つまり、前者の立場から見ると、韓国は多文化主義とは距離が遠い移民政策をとっている国としてこのような概念は不適切なものであるが、後者の立場から見ると「韓国式多文化主義」または「韓国型多文化主義」の概念も十分に可能である。様々な学問の分野で様々な理論的な立場が存在することを考慮すると、如何なる概念を使おうとそれは研究者の自由であり、それは徹底して尊重すべきである。しかし、二つの相連する伝統から導かれた概念を無分別に混用する研究者が多い現実直面すると事情は異なる。それゆえ、筆者は本稿で後者の立場についていくつか問題提起をしようと思う。

後者の立場を堅持する人々はカナダの政治学者のウィル・キムリッカ (Will Kymlicka) の「多文化主義」概念から多文化を導く傾向が強い。彼は、女性・黒人・土着民・同姓愛者など少数者の集団が支配集団との関係において社会的な疎外感を感じる姿を見て「文化的な多様性に基盤を置く市民権」の概念を強調した。移民の場合にも社会統合は「一世代の中で成し遂げられる過程ではなく、世代を超えてこそ達成できる過程」であることを重視している。

また、彼らはフランスの政治学者マルコマルティニエッロ (Marco Martiniello) が一般のフランス人を対象にした文庫本の中で紹介された「多文化主義」の概念を借り多文化を理解する。マルティニエッロは移民同化政策の理念型的な事例であるフランスの政策にも多文化主義的要素があることを強調する。彼は、移民統合の政策の类型を紹介し、キャッスル(Stephen Castles)とミラー(Mark Miller)が使った「多文化主義」という概念をこっそり「多元主義的なアプローチ」という概念に置き換えてしまう。「フランスはもっぱら同化的なアプローチをし、オランダはもっぱら多元主義的なアプローチをし、ドイツはもっぱら区分排除的なアプローチのみを奨励している」と考えるのは…… 極めて単純な立場である」と強調する。そして「ある国が同化的なモデルに忠実でありながらも、同化的なアプローチの代わりに多元主義的な类型の政策の重要性を増大させるのは可能である」と主張した。

しかし、マルティニエッロは多文化主義を普遍的な概念に変え、国家の类型としての多文化主義概念を放棄しつつ、フランスも「多文化主義政策がある」と紛らわしい主張をした。理念型の条件を完璧に満たす事例が無いのは極めて当然なことであるため、その論理は大変脆弱である。

「共和主義的な同化モデル」を当然とするフランスの学界で「多文化主義」を強調する彼の主張は殆ど受け入れられない。

ところで、マルティニエッロの著書は韓国語で早くも翻訳され、多文化の谈论の熱と共に韓国の研究者に広まった。「多文化主義はまさに多文化社会の核心原理である。」という命題を受け入れる韓国の論者はキムリッカとマルティニエッロなどの多文化主義の概念を土台に多文化社会を把握する。

韓国の一部の論者は多文化主義の概念をまるで「民主主義」のように、すべての社会に適用可能な普遍的な概念として使っている。民主主義的な要素が一部だけあっても、民主主義になり、すべての社会では民主主義を追求すべき価値として受け入れられる方法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用法に則ると、1970年代の維新体制の下で朴正熙大統領が主唱した「韓国的な民主主義」は民主主義のひとつの类型に過ぎない。これと同様の用例として、フランスとドイツは勿論、韓国と台湾及び日本も「多文化主義」政策を採用している国に分類される。では、多文化主義の政策をとっていない国はどこであろうか。既存の韓国の議論の大半が社会現象の本质を誤解したのは政府で使った「多文化社会」概念を「多文化主義」と混同したことに大きな原因がある。

地球上で極めて例外的なほど種族的な少数者の集団人口が少ない韓国社会の結婚移住者統合

政策を多文化主義といえるだろうか。『政府により積極的に使われている「多文化主義」は 実質的な「多文化社会」への変化を拒否する「偽り」の布石に見える』や、『対象を区別し、差別する多文化は真の多文化ではない』と主張するのではなく、特殊な条件にある少数の移民のみ厳しく選別し受け入れ、残りの大半の移民は排除する「区分排除政策」を主にし、少数の結婚移住者に対しては同化政策を行っているとするのが理論的にはるかに明了であり、望ましい。

彼らは「多文化主義モデルは善で、同化モデルは悪である」という主張を果敢に説き伏せる。同化モデルが「自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とは区分されるもので、むしろ今日はフランスとドイツ社会に見るように「文化相対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と調和できるにも関わらず、同化モデルそのものを歪曲する。

さらに「長期不法滞在外国人を赦免しないことは多文化主義に反する」とまで主張する。ドイツと日本など、市民の法秩序の遵守を強調する国では不法滞在外国人の赦免を全く実施しなかった。几度か赦免の経験がある米国でもこれを多文化主義と関連づけることはないが、一部の論者は「万能の概念」の多文化主義を通じて赦免の正当性を主張する。

韓国の移民統合の政策を「官主導型の多文化主義」として把握するのは概念の設定自体が誤っている。移民政策の主体は国家であるため、当然官が主導するのが当然である。しかし、2006年、政府が多文化社会の談論を急に言及し始めたのではなく、それまで学会とマスコミなど、市民社会の談論を受け入れた点を考慮しても、果たしてこれを「官」が主導したと主張できるだろうか。

要するに、多文化主義は「種族的な少数者の集団」と支配集団の葛藤が深刻なカナダで生まれた概念であるため「種族的な少数者の集団」の存在自体が少ない韓国社会に適用するのには問題が大変多い。「韓国型の多文化主義」または「韓国的な多文化主義」は決して「真の多文化主義」ではないことを言及するために多文化主義の概念を使うだけならば、その概念を破るのが望ましい。

5. 結論

外国から輸入した「多文化主義」の理論を韓国の「多文化社会政策」を説明するのに无分別に適用するのは必ず避けるべきである。歴史的・社会的にも相違する国で考案された社会理論を韓国社会に適用する場合、その前提条件を満たすかどうかを検討するべきである。そして、その概念を適用する場合、限られた用途として使うのが望ましい。

筆者は多文化主義から多文化社会を演繹する方法の談論には問題を提起するが、政策的な結論は彼らを殆ど変わらない。自国の経済に役立つ外国人の優秀な人材に対し、特惠を与える移民政策は「国益の追求の原則」により、正当化されるが出身国の経済発展水準や国民の資格が生得的や帰化により得られるかどうかにより外国人・移民を差別する政策はその类例がない。外国国籍を有する同胞の居住国の経済発展水準によって、差別待遇する「訪問就業制」と、「帰化韓国人の配偶者」が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の適用の対象から除外される制度等は、至急、是正されるべきである。経済成長至上主義、純粋血統主義などが真の多文化社会への移行を妨害しているという解釈も意見を共にする。

多文化社会には光と影が存在する。光の側面としては、韓国社会に社会的・経済的・文化的な多様性が大きく増大し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外国人の移住労働者は韓国の労働市場の穴を埋め、

經濟发展を持续させる役割をしており、外国人の結婚移住者と婚姻归化者は农村社会に新しい活力を吹き込む存在として定着した。また、影の側面もある。一部の业种で韩国人と移民との間で仕事の奪い合いが発生しており、不法滞在者が多く集まり暮らす地域では外国人の犯罪が问题になっている。

多文化社会は単に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プラス効果を最大化する一方、マイナスの側面を最低限に抑えるよう努力が重要である。多文化社会の准备は政府だけが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市民の态度と行动も多文化の时代に対応し変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调查の結果によると大半の韩国人は移民の受け入れに対し、积极的な态度を有している。しかし、一部の市民は移民に対し排他的・差別的な态度をとっているのが现实である。

多文化时代を生きる韩国人と移民は互いに相手に慣れる课题を抱えている。この地の人々は异质的な外见と文化を有する人々が共に共存すべき课题を成し遂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道は多样性により引き起こされた葛藤を对话を通じて解决する社会的な过程を定着させることにある。幸いにも今までは种族的な少数者の集团の人口がさほど多く无いため、多少の试行错误を経て、深刻な葛藤なく主流の社会と移民が相互适应の知恵を学习する機会がある。それこそ、多文化社会の韩国の移民社会統合の核心过程である。(终)

‘多文化主義’를 거슬러
多文化社會를 만드는 것은
가능한가

■ 김영옥 (이주여성인권포럼대표) ■

‘다문화주의’를 거슬러 다문화사회를 만드는 것은 가능한가

- 이주문화활동가 ‘미누’의 표적단속을 계기로

김영옥 (이주여성인권포럼대표)

〈목 차〉

1. 이주관련 국내 환경과 다문화 정책의 구조적 모순
2. 신자유주의와 ‘고용허가제’
3. ‘미누’라는 문화적 아이콘의 의미: 이주노동자, 문제에서 존재로
보유(補遺): 근대 민족/국민국가의 모순을 넘어 탈근대 시민권으로

1. 이주 관련 국내 환경과 다문화 정책의 구조적 모순

<2009년 외국인 정책 시행계획>에 따르면 현재 국내 체류 외국인 수는 116 만 명으로 증가했으며 방문취업 26%, 단순기능인력18%, 국민의 배우자 11%, 유학생 6%, 전문 인력 3%, 영주자격자 2%, 투자자 1%, 기타 33%로 그 유형도 매우 다양해지고 있다. 그중 이주노동자는 72만이고, 결혼이민자는 16만 4천이다. 결혼이민자 중 국적취득자는 5만, 미취득자는 11만 3천 명이다. 한국사회에서 ‘외국인’에 대한 관심은 주로 1991년부터 산업연수생 제도와 더불어 한국에 들어오기 시작한 이주노동자들에 의해 촉발되었다. 이후 2000년 초부터 지속적으로 그 수가 늘고 있는 결혼이주여성들에 의해 이 관심은 본격화된다.

1980년대 초까지만 해도 다른 아시아 국가들처럼 적극적인 노동력 수출국가였던 한국의 정황을 고려해 볼 때 이것은 한국사회가 이주현상을 대단히 짧은 시간 내에 압축적으로 경험하고 있음을 의미한다. 한국사회는 저출산·고령화 현상이 중요한 정치적 의제로 등장하기 전까지는 ‘외국인’의 문제를 이주정책, 더 나아가 이민정책이라는 차원에서 심각하게 고민하지 않았다. 이것은 국제결혼이 저출산 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있는 중요한 열쇠가 될 수 있다고 판단한 정부에 의해 결혼이주여성이 주요 이주정책 대상으로 떠올랐음을 의미한다. 이러한 사실은 이후 한국정부가 ‘다문화사회’를 화두로 내세우며 법안을 마련하고 정책들을 세울 때 지속적인 영향을 끼치게 된다. 한국인들이 이주민들과 함께 구성해 나가는 다문화 사회가 요청하는 변화의 핵심은 무엇인지, 그 정치적·인권적 정당성은 어디에서 찾을 수 있는지에 대한 시민적 논의를 거치지 않은 상태에서 한국정부는 2006년 4월 ‘다문화·다민족 사회로의 전환’을 선언하면서 국가주도형 다문화주의 담론을 도입하고 이후 결혼이주여성들과 그 자녀들을 대상으로 하는 각종 다문화 사업들을 벌이기 시작한 것이다. 이것은 한국정부가 이주노동자와 결혼이주여성, 유학생, 동포, 난민 등 제한 외국인 전반을 포괄하는 이민·다문화정책을 아직 고민하고 있지 않음을 의미한다.

다문화주의를 채택하고 있는 국가들에서 오랜 시간 소수집단의 시민권과 귀속 등의 문제를 둘러싸고 벌어졌던 인권차원의 협상과 토론, 심의 등을 한국정부가 얼마나 진지하게 참조하는지에 대해서는 논쟁의 여지가 많다. 이주관련 활동가들이나 연구자들은 특히 이주 노동자의 철저한 배제를 한국정부의 다문화 정책에서 가장 문제적인 것으로 지적하고 있다. 특히 ‘불법’의 범주에 묶여 일체의 논의에서 제외되는 미등록/초과체류 이주노동자의 경우 이러한 배제현상은 더욱 극심하다. 재한외국인의 법적 지위를 다루고 있는 「재한외국인 처우 기본법」에서 ‘재한외국인’은 “대한민국의 국적을 가지지 아니한 자로서 대한민국에 거주할 목적을 가지고 합법적으로 체류하고 있는 자”로 명시되고 있으며, 두 개의 문화가 만나 이룬 가족을 지원하는 「다문화가족지원법」에서 ‘다문화가족’은 “결혼이민자와 출생시부터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취득한 자로 이루어진 가족”과 “귀화허가를 받은 자와 출생시부터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취득한 자로 이루어진 가족”이라고 정의되고 있다.

또한 2003년 입법되고 2007년부터 산업연수제의 완전 폐지와 함께 시행되고 있는 “고용허가제”(「외국인 근로자 고용 등에 관한 법률」)는 이미 그 명칭에서도 드러나듯이 노동자 당사자들이 아닌 고용주를 대상으로 하는 법이다. 이주노동자의 인권이 아니라 고용주의 이윤창출을 보호하기 위한 이 법에서 노동자의 신분은 철저하게 고용주에 종속되어 있으며, 노동자들은 자신들을 배제함으로써만 호명하는 이 법에 의해, 역설적이게도, 손쉽게 법을 위반하는 사람이 된다. 정부의 주장과는 달리 고용허가제가 이주노동자들의 착취적 노동환경을 전혀 개선하지 못하고 오히려 ‘불법체류자’만 늘게 만드는 현실은 바로 이러한 모순에 기인하고 있다. 즉 불법체류자일 때 노동자들은 비로소 (대단히 소박하게나마) 노동자로서의 권리와 자유를 누릴 수 있다는 역설이 존재하는 것이다.

이러한 상황은 결혼이주여성과 이주노동자의 위치에서 볼 때 각각 다음과 같은 질문들을 낳는다. 이주민들을 노동이주자와 결혼이주여성, 2개의 서로 만날 수 없는 범주로 구분하고, 결혼이주여성을 한국사회의 저출산 위기를 해결하고 전통적인 가족 형태를 유지시켜주는 ‘한국인 배우자’로 범주화시키는 것이 다문화 정책의 주요 목표라면¹⁾ 이 정책이 실현시킬 수 있는 다문화사회의 내용은 어떠한 것인가. 이때 결혼이주여성 당사자들의 귀속은 어디에 위치되는가?²⁾

이중의 배제를 겪고 있는 ‘불법 체류 / 초과 체류’ 이주노동자는 다문화사회 형성의 동반적 주체가, 결코, 될 수 없는가? 그렇다면 신자유주의 노동 유연화 정책의 틀 안에서 암묵적으로 용인되어 온 ‘불법체류자’에게는 그 어떤 주체적 위치성도 주어질 수 없다는 것인가. 만일 현실적으로 그러한 ‘불법체류자’가 10년 이상 장기 체류하면서 주체적 행위성을 발현해 온 것이 확인된다

1) 이와 관련해 김현미는 한국의 결혼이주여성에 대한 법과 정책은 ‘다문화주의’라는 말의 빈번한 사용에도 불구하고, 진정한 다문화주의 정책이라기보다는 결혼이주자와 그의 가족을 지칭하는 ‘다문화가족’ 정책이라고 볼 수 있다고 말한다(김현미, 2008).

2) 신자유주의 지구화의 흐름 속에서 추동된 이주의 성별화된 한 형태로서 결혼이주 역시 노동이주와 구별될 수 없다. 결혼이주여성들의 이주 또한 근대화론에 의해 생물학적-사회문화적 의미에서 삶의 근간이었던 것들을 빼앗기고(Bauman, 2005) 지구화가 가동시킨 소비문화의 전지구적 확산 속에서 소비를 향한 욕망에 포섭된 제3세계 국가들의 상황에 기인한다. 결혼이주는 가능한 적은 비용으로 점점 더 강화되는 유입국의 국경봉쇄를 피해 이주를 실현할 수 있는 가능성으로 선택된다. 여성들의 결혼이주 선택에 ‘송금’이 차지하는 중요성은 이것을 잘 말해주고 있다. 또한 한국 정부가 부족한 노동력을 메우기 위해 이주노동자를 들여오는 것처럼 한국인을 낳고 키우는 재생산 노동을 맡기기 위해 외국인 신부를 들여오고 있다는 점에서도 노동자와 결혼이주여성들은 이주노동의 맥락 속에 위치한다.

면 이 행위성은 ‘법’에 어떤 방식으로 맡겨질 수 있을 것인가?

배제에 기반을 둔 ‘위로부터의 다문화주의’를 거슬러 아래로부터의 다문화실천을 활성화시키는 것, 그리고 그로써 ‘이방인’이 누릴 수 있는 문화권의 외연을 확장시키는 것은 어느 정도까지 가능한가?

처음부터 철저히 배제에 기반을 두고 고안된 한국정부의 일방향적인 다문화정책에 대해 활동가들이나 연구가들은 그동안 지속적으로 이와 유사한 질문들을 제기해 왔다. 그러나 이 글에서 제기되고 있는 이러한 질문들은 최근에 일어난 ‘초과체류 이주노동자 미누’ 사건에서 구체적으로 태동되었다. 따라서 본 발표문은 특히 이주노동자의 위치에서 발생하는 질문을 중심축으로 해서 한국의 다문화정책을 성찰하고자 한다.

2. 신자유주의와 ‘고용허가제’

이주는 신자유주의와 긴밀하게 연관되어 있다. 왜 ‘불법 이주자’가 늘고 있는가를 이해하기 위해서는 신자유주의가 전 지구적 차원에서 이주정책을 어떤 방식으로 변형시켜 나가고 있는가를 이해해야 한다. 신자유주의는 노동력의 유연화를 가속화시키는 제도이며 경제적 능력이 있는 사람들의 정치적 권리를 옹호하고 확장시킨다. 신자유주의적 이주노동 정책의 특징은 자본과 상품의 이동을 위해서는 가능한 국경을 활짝 열고 노동자를 향해서는 국경을 봉쇄한다는 것, 다시 말해서 복지나 교육, 의료 문제 등 영구이민자들에게 들어가는 통합비용을 피하기 위해 단기 순환 이주 노동자들을 선호한다는 것이다. 수용국과 송출국 간에 MOU를 체결하고 쿼터 확장과 노동자의 권리 축소를 맞바꾸는 수-권리 상쇄 정책(Number-Right Trade Off Policy)으로 수렴되는 이러한 노동이주정책은 그러나 불법 이주자들을 막지 못한다. 오히려 노동의 유연화를 강화하는 신자유주의와 주권의 이름으로 경찰력을 동원하는 국가의 통치전략은 불법 이주자들을 양산해낸다. 이들은 제도적으로 사업주들에게 유리한 이주노동자 고용 환경을 만들어주고 또한 불법 노동자들의 사용을 암묵적으로 용인해주고 있다.

“고용허가제”(「외국인 근로자 고용 등에 관한 법률」)를 조금 자세히 들여다보자. 고용허가제의 ‘사업, 또는 사업장 변경의 허용’을 보면 기본적으로 사업주(사용자)의 입장에서만 사업장 변경의 허용이 언급되고 있다. ‘사용자가 정당한 사유로 근로계약기간 중 근로계약을 해지하고자 하거나 근로계약이 만료된 후 갱신을 거절하고자 하는 경우’와 ‘휴업·폐업 그 밖에 외국인근로자의 책임이 아닌 사유로 그 사업장에서 근로를 계속할 수 없게 되었다고 인정되는 경우’가 바로 그것이다. 차별이나 임금체불처럼 실제로 이주노동자의 입장에서 볼 때 가장 중요한 사업장 변경의 동기가 되는 것은 변경허가 조항에 포함되지 않고 ‘외국인 근로자의 보호’ 조항에 포함되어 있다. 그렇다면 과연 이 조항과 관련해 정부가 사용주를 얼마나 계도하고 또 감시하는지가 관건일 것이다. 그러나 현실적으로 노동자가 사용주에게 전적으로 종속되어 있는 현 상황에서 이 조항은 단순한 수사에 지나지 않을 뿐이다. 그리고 사업장 변경이 가능한 경우에도 그 기간이 변경 신청 날부터 2개월 이내로 제한되어 있고, 3년 동안 3회를 초과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노동자는 이동의 자유를 누리기가 힘들며, 손쉽게 미등록 이주노동자로 전락할 수 있다.

한 연구결과에 따르면 소위 합법 이주 노동자들의 이동에 대한 법적·제도적 통제는 궁극적으로 임금이나 노동조건에 큰 영향을 끼친다. 미등록 이주노동자에 비해 이들은 시장 임금을 받을 확률이 매우 낮다. 이들의 임금은 "산업연수생이나 연수취업자에 비해 최소 20%이상 낮은 것으로 드러난 반면, 불법 취업자의 경우 거의 내국인 근로자 수준에 다다랐다"(조원광, 2007). 고용허가제 5주년을 맞이해서 앰네스티는 한국이 이주노동자를 착취하고 이용하다가 버리는 '일회용'으로 사용한다고 비판하는 보고서를 발표했다. '사업장에서의 차별과 언어, 신체적 폭력, 안전 교육과 안전장비 미비로 빈번한 산업재해, 여성이주노동자에 대한 성폭력 및 인신매매, 한국 정부의 불충분한 사업장 근로 감독, 과도한 무력을 사용한 단속 과정 등의 현실'을 지적하면서 또한 이주노동자들의 사업장 이동제한 문제와 미등록 이주노동자의 체포, 구금, 출국 과정에서 벌어지는 인권침해 문제의 해결도 권고했다.³⁾

고용허가제의 근저에 놓여있는 단기 이주노동 정책의 근본적인 문제는 성찰하지 않은 채 의례적으로 반복되는 집중단속과 강제추방을 통해 '불법체류자'의 수를 줄이려고 하는 정부의 시도는 앞서서도 이야기했듯이 유연한 노동력을 찾는 신자유주의와 공조체제를 이루고 이주노동자들의 초과체류를 암묵적으로 용인하는 정부의 '호의적인 방관'과 모순된다. 그리고 이 모순을 견디는 것은 불법/초과체류 이주노동자들의 몫이다. 한국의 이러한 이주노동정책과 관련해 독일에서 지난 50년간 진행된 이주노동/자 정책의 변화는 좋은 시사점을 던져준다. 독일의 이주 노동자 정책은 크게 노동시장 정책, 사회통합 정책, 그리고 문화사회(Kulturgesellschaft) 정책의 관점을 보여준다. 단기순환원칙에 따라 가족동반을 금지하던 노동시장 정책은 '사회통합'이 이루어지는 만큼 '좋은 노동력'이 제공되어 사회갈등도 줄고 산업평화도 유지된다는 입장으로 관점을 바꾼다. (여기에는 다년간의 경험을 통해 숙련된 노동을 제공하게 된 노동자들의 장기체류를 지지한 중소기업의 이해관계도 중요한 기여를 했다.) 독일은 여기서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 이주자들을 더 이상 '노동력'이나 '이방인'이 아니라 엄연한 사회구성원으로 수용하고, 다양한 문화적 배경을 지니는 이주민들과 선주민들 사이에 사회적·문화적 공존과 조화를 꾀하는 문화사회 정책을 채택하게 된다(강수돌, 2007). 독일의 사례는 아무리 노동자를 불러도 사람이 오게 되는, 그리고 아무리 국경을 봉쇄해도 국경을 넘어오는 노동자들의 수는 증가하기 마련인 이주노동의 현실을 합리적으로 수용하고, 장기체류 이주노동자와 그 가족의 시민권을 인정하는데 50년이라는 긴 시간이 요구될 정도로 출입국관리주권에 집착하는 국민국가의 완고함을 보여주는(이철우, 2008a: 68) 동시에 그 집착의 불완전성을 보여준다. 한국의 경우 독일 같은 나라들의 예를 거울로 삼아 좀 더 일찍 그러한 집착의 부조리를 깨닫고 허구가 아닌 실질적인 다문화사회를 향해 자기변신을 꾀할 수는 없는 것일까. 미등록/초과체류 노동자를 포함해 이주노동자들을 '문제'가 아닌 함께 공존하는 '존재'로, 인권침해로부터 자유로울 권리와 자신들의 관점에서 적극적으로 다양한 인권의 내용을 표현하고 주창할 권리를 가지고 있는 존재로 인식하고 인정하는 것은 언제쯤 가능해질 것인가.

다음에서 나는 '미누'의 경우를 상세히 리뷰하면서 이 질문에 좀 더 구체적으로 접근하고자 한다.

3) "앰네스티 '한국, 이주노동자 '일회용' 취급', <한겨레>, 2009.10.22.

3. ‘미누’라는 문화적 아이콘의 의미: 이주노동자, 문제에서 존재로

네팔 출신 미노드 목탄, 일명 ‘미누’는 한국에 아직 외국인 취업제도가 생기기 전인 1992년 한국에 들어와 18년 동안 한국사회에서 ‘살아 온’ 이주노동자로서 특히 2003년 다국적 밴드 <스톱 크랙다운 StopCrackDown>을 결성해 활동을 하기 시작한 이래로 다양한 형태의 이주문화활동가 역할을 수행해 왔다. 외국인 예능대회에서 대상을 받은 경력으로 문화부 장관 감사패까지 받은 그는 한국사회에서 이주노동자들의 존재가 당사자들의 목소리를 통해 알려질 수 있도록 이주노동자방송국을 만들었고, 이주노동자의 인권과 관련된 다큐멘터리를 제작했으며 이주노동자들과 한국사회 간의 문화적 소통을 위해 정부의 지원을 받아 이주노동자영화제를 개최했다. 그가 소속되어 있는 <스톱크랙다운>은 이주민은 물론 언론매체, NGO, 문화활동가들에게 가장 잘 알려진 이주민 문화활동그룹이었다. 그는 정부나 서울시나 주최한 각종 외국인 관련 행사에 언제나 섭외 1순위였다. 그는 또한 성공회대학교 노동대학의 학생으로 공부했고, 문화체육관광부 주최로 열린 ‘다문화 정책 토론회’에서 유창한 한국어로 질문해 참석자들의 큰 박수를 받기도 했다. 이 모든 정황이 가리키는 것은 그가, 혹은 한국사회가 원하는 원치 않았던 ‘미누’는 ‘다문화사회’를 표방하는 한국에서 일종의 문화적 아이콘이 되었다는, 그리고 이러한 과정에 정부 역시 암묵적 승인과 지원으로 협력했다는 사실이다.

그의 다양한 문화적 활동들은 이주노동자들이 한국에서 돈만 버는 것이 아니라⁴⁾ 지역사회 주민으로서 소비도 하고 이웃들과 감정적·문화적 교류도 나누며, 동료 노동자들과 연대하고 또한 한국의 다문화사회 논의에 적극적으로 의견도 피력 하면서 ‘다중적 삶을 산다’는 것을 보여주고자 한다. 이로써 한국사회가 이주노동자들을 동정의 대상이나 위협의 대상으로만 보는 맹목성을 넘어설 수 있도록 돕고자 한 것이다.

그러나 그는 지난 10월 초, 법무부의 ‘관계부처 합동집중단속’ 발표 직후 출입국관리소의 표적단속 대상이 되어 현재 화성보호소에 머물고 있다.⁵⁾ 그의 강제추방이 ‘합당하지’ (혹은 ‘합법하지’) 못하다고 판단한 시민단체들은 ‘미누 석방을 위한 공동대책위’를 구성해 강제퇴각명령에 대한 이의신청, 특별체류 허가 청원서와 탄원서를 제출하고 법무부의 답변을 기다리고 있는 중이다. 공동대책위는 초과 체류자의 불법성에서 출발하는 ‘미누’의 단속에 맞서 그가 “사실상” 한국사회의 성원이 된 지 오래되었음을 지적한다(홍석재, 2009). 그리고 그동안의 그의 문화활동은 ‘한국사회에 기여한 바가 큰 외국인에게 부여한다’고⁶⁾ 현행 출입국관리법이 언급하고 있는 특별

4) 2008년 이주노동자영화제 관련 인터뷰에서 그는 “이주 노동자들이 한국 사회에서 돈만 버는 게 아니라 한국사회와 소통하고 결합하려고 애쓰는 모습을 보여주고 싶습니다”라고 말한다(연합뉴스, 2008.07.19).

5) 그동안 한국정부의 표적단속은 주로 이주노동조합의 지도자들을 겨냥하고 있었다. 그러나 올해 2009년의 표적단속은 노조활동의 범위를 벗어나 문화활동으로까지 확산되고 있다. 미누 외에도 한국에서 최초로 창작동화 ‘돌 깨는 아이들’을 써서 출판한 (이 책은 인천문화재단 ‘2009 인천우수도서’로 선정되었다) 범 라우띠 역시 단속돼 현재 화성외국인보호소에 머물고 있다. 범 라우띠는 네팔 공동체 NCC의 전 회장이었다(<http://saladtv.kr>).

6) 새로 바뀌는 국적법에 따르면 “국익에 기여할 우수외국인재”는 국내 거주기간 요건 없이 국적 취득을 허용하고, “외국국적 포기하지 않아도” 한국 국적을 유지하게 한다(신설 7조1항3호 10조). 또한 50만 달러 이상 고액 부동산 매각 외국인에게 영주권 부여를 검토한다고 한다. “국적법 개정안”과 연동되어 있는 <외국인 정책 위원회>의 <2009년 외국인 정책 시행계획> 역시 비슷한 경제주의 원칙을 강조하고 있다. 국내법과 관련해서는 기존의 “재한 외국인 처우 기본법”을, 그리고 국제적 동향과 관련해서는 2008년 EU

체류허가를 받기에 충분하다고 강조한다.⁷⁾

“다문화사회로의 변신”을 강조하는 한국사회에서 바로 그 변신의 살아있는 증인으로 각종 다문화 행사에 초대되어 “We love Korea”를 부른 ‘미누’의 전격적인 단속은 ‘강제추방’과 ‘다문화’라는 모순된 정책 사이에서 줄타기를 하고 있는 한국정부의 실상을 상징적으로 잘 보여준다. 그리고 불법과 합법의 경계가 정부의 통치 전략에 따라 얼마나 유동적으로 움직일 수 있는가를 여실히 증명한다. 화성보호소에서 그가 “17년 8개월 유통기한 상품”이 되어버린 상황에 직면해 “나도 한국에 책임이 있고, 한국도 나에게 책임이 없다고 생각하지 않는다. 나는 한국으로부터 대답을 듣고 싶다”고 말한 것은⁸⁾ 그동안 한국정부가 불법과 합법의 경계를 두고 초과체류 이주노동자들과 벌인 게임이 진지한 답변을 요구하는 정치적 행위였음을 환기시킨다.

‘미누’의 사건은 내용은 없는 채 효력만 발생시키는 법, 그러나 자신의 정당성을 위해 (즉, 효력을 발생시키기 위해) 신체를 필요로 하는 법을 너무나 적나라하게 폭로하고 있다(아감벤, 2008). 18년간 한국사회의 ‘실질적’ 성원으로 살아왔던 ‘미누’의 신체를 요구함으로써 갑자기 자기 정당성을 획득하는 ‘법’.⁹⁾ 그러나 한국에서 산 18년간의 자신의 삶을 두고 한국의 책임을 묻는 ‘미누’의 질문은 동시에 삶이 그렇게 단순히 ‘벌거벗은 상태’가 되어 법에 의해 버림받을 수는 없음을 강변한다.

근대 주권국가의 설립을 예외적 상황과 법-정치 질서의 관계 속에서 살피고 있는 아감벤은 법이 삶과 맺는 근본적인 관계는 법이 삶을 예외적 상황으로 만드는 것, 즉 버리는 것에 있다고 말한다. 여기서 주권자의 권리를 특징짓는 추방령의 가장 내밀한 구조는 외부의 사실상황이 예외를 선포하게 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예외의 선포가 사실상황을 낳는다는 데 있다. 이로써 법률문제

의 <이민과 난민에 관한 유럽협정> 중 ‘제3세계 우수인재의 적극 유치’ 및 ‘불법 이민강력 차단’을 준거로 하고 있는 이 시행계획이 밝히고 있는 부처별 정책은 적극적 개방, 사회통합, 이민행정, 외국인인권옹호 등 크게 네 가지 범주로 나뉘는데, 예산의 대부분은 적극적 개방과 사회통합에 사용되고 있다. 2009년 재원투자 규모는 총 111,1억원인데 이중 적극적 개방으로 534억원, 사회통합으로 502억원, 이민행정으로 23억, 외국인인권옹호로 50억원이 배당되었다.

적극적 개방을 통해 ‘우수인재’를 유치함으로써 국가경쟁력을 강화하겠다는 아이디어는 대통령직속기관인 <국가경쟁력강화위원회>의 2차 회의 ‘글로벌 고급인력 유치방안’에서 결정된 사항이다. 교육과학기술부가 해외 우수인재를 모아오면, 법무부가 이들의 체류를 안정시키기 위해 비자제도를 개선하고 모든 편의를 제공해준다는 게 주요 골자이다. 구체적으로 보자면 우수인재에게 고용계약 없이도 비자를 발급해서 입국할 수 있게 해주고, 이중국적을 허용하며, 필기시험도 면제해 주겠다는 것이다. 이들은 “우리사회의 동화, 통합을 저해할 우려가 없”기 때문이다.

그렇다면 ‘미누’ 같이 ‘우리사회의 동화, 통합을 저해’하지 않았을 뿐만 아니라 10년이 넘도록 다채로운 방식으로 통합에 기여한다고 정부가 비공식적으로 승인한 사람은 ‘우수인력’인가 아닌가. 이 질문에 대한 답변의 권한은 누구에게 있는가.

7) 대책위의 구성원인 ‘아시아의 친구들’은 성명서에서 “우리는 특별체류허가가 권력과 재산, 학식 있는 사람들만을 위한 법의 도구가 되지 않아야 한다고 생각한다. 정부가 그동안 강조해 온 100만이 넘는 이주자들의 시대에 그는 노래로 이주자들의 아픔과 사랑, 권리를 알려 온 노래하는 노동자였음을 기억해야 한다”라고 밝히고 있다.

8) www.daum.net/freeminu 참조.

9) 15, 16일 행해진 경향신문과의 인터뷰에서 그는 법무부가 자신의 표적단속을 “반정부 활동” 때문이라고 하는 것에 대해 “사람이 아프면 아프다고 하고, 싫으면 싫다고 말할 수 있는 게 표현의 자유라고 알고 있다. 이걸 반정부 활동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건지 묻고 싶다”고 말했다. 이어 “한국인과 이주민이 함께 어울려 살아갈 수 있도록 문화활동을 했을 뿐이다. 이주노동자뿐 아니라 한국인을 위한 것이기도 하다. 숨어서 한 것도 아니고 범죄를 저지른 것도 아니다. 이주민들이 한국 사회가 좋은 곳이라고 느낄 수 있도록 활동했다. 이걸 (정부가) 이해 못하는 게 아쉽다”고 했다(김지환, 2009).

와 사실문제 사이의 구별도 사라지고 합법이나 불법이나도 사라진다(아감벤, 2008).

‘불법 체류자’라고 불리는 이주노동자들의 존재는 내부 안에 외부, 즉 예외적 상황을 만듦으로써, 다시 말해 법의 보호를 전혀 받지 못하는 ‘벌거벗은 삶’을 설정함으로써 유지되는 주권 공동체의 구성적 원리를 가리킨다. 이들은 재판을 통해 ‘불법’ 여부를 심판받는 사람들이 아니다. 처음부터 재판을 받을 권리도 없다고, 처음부터 추방의 형태로만 존재할 수 있다고 명령된 사람들이다. 법을 어긴 사람들이 아니라 법 안에서 법의 바깥을 이루고 있는 사람들이라는 뜻이다. 따라서 ‘유죄냐, 무죄냐’는 물음은 이들 존재와는 아무런 관련이 없다. 단지 법의 내부와 외부를 가르는 경계선을 어디에 긋느냐의 문제일 뿐이다. 그러나 국민 정체성(national identity)으로 환원되지 않는 바깥 요소인 이들은 한국이 국민국가 안에 이미 받아들인 지구적(global)/초국적(transnational) 차원의 이질성이고 다양성이다(고병권, 2009). 지구화가 가져온 이러한 현실적 상황은 민족의 문화적 정체성과 영토의 일치가 마치 본질적인 것인 양 간주하며 그 토대 위에서 운영된 근대 민족/국민국가(nation-state)의 우연적 성격을 드러내고 탈근대적 시민권 제도와 초국민적 정치공동체를 상상할 수 있는 기회를 제공한다. 그리고 아래로부터의 다문화 실천은 기본적으로 초국가적/초국민적 정치공동체를 향한 이러한 상상력을 공유한다.

보유(補遺): 근대 민족/국민국가의 모순을 넘어 탈근대 시민권으로

이주가 영토와 민족, 시민권의 분리를 가속화시킴에도 불구하고 국경을 향한 주권국가의 집착이 여전하고, 이중국적이나 영주권 같은 명백히 탈근대적(postmodern), 초국가적(transnational) 제도가 탈국가적(postnational) 시민권 제도로 이어지지 못하는 것, 다시 말해 이주민의 시민권이 여전히 국민국가의 통치권력에 종속되는 현 상황은(이철우a, 2008; 이철우b, 2008) 근대 국민국가 및 인권사상의 탄생과 관련된다.

역사적으로 볼 때 영토적 주권을 문화적 동질성이라는 생각과 함께 민주적 입헌 정부와 결합시키는 국가, 즉 국민을 민족으로 이해하는 민족/국민국가는 정치적 근대화가 진행되는 과정에서 생긴 독특한 산물이다(벤하비브, 2008; 최현, 2008; 이철우, 2008a; 이철우, 2008b). 그리고 모든 인간은 태어나면서부터 남에게 양도할 수 없는 성스러운 권리를 갖는다는 인권선언은 시민권과의 연동 속에서 탄생했다(아감벤, 2008; 최현, 2008; 조효제, 2007). 예를 들어 프랑스 공화국이 ‘인간과 시민의 권리 선언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을 공포하고 그것을 뒷받침하는 시민권의 법과 제도를 만듦으로써 프랑스 공화국의 시민은 인권을 가지게 되었다. 근대적 세계에서 인간으로 인정받기 위해서 (즉 인권을 누릴 수 있기 위해서) 인간은 무엇보다도 특정 국민국가의 시민이 되어야 했다.

국민국가 체계를 공고히 하려는 시도의 일환으로 국민국가는 시민권 제도를 확립하여 시민들의 권리를 보호하고 문화적 동질성과 정체성을 유지하기 위해 자국 시민의 범위를 확정했다. 이를 위해 여권과 다양한 신분증, 그리고 국민등록제도를 개발하는 한편 국제협약을 통해 자국 시민들과 외국인이 국경을 넘어 이동하는 것을 통제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자국 영토 내에서 외국인과 자국 시민의 경계를 분명히 했다(Torpey, 2000: 최현, 2008에서 재인용). 이로써 국민이 국가와 자신을 동일시할 수 있는 조건이 마련된다. 즉 시민권이 근대적 국민 정체성의 기초가 되었던

것이다.

최근에 우리가 경험하고 있는 교통과 정보, 통신 기술의 발달은 전지구적 상호의존성을 높이며, 지구적 이민의 확대와 시장 통합의 요구는 초국민적/초국가적(transnational) 정체성이 형성될 수 있는 환경을 조성한다. 그러나 현재 단초를 내보이고 있는 이러한 지구시민 정체성이 실질적인 다문화적, 다종족적 공동체로 발전할 수 있기 위해서는 근대적 시민권을 넘어서 탈근대적, 지구적 시민권을 발전시켜야 한다(최현, 2008). 앞서서도 말했듯이 기존의 국민국가는 문화적 단일성의 전제 하에 유지되어 왔기 때문에 문화적, 민족적 다양성과 관계 맺을 수 있는 원리나 제도를 충분히 갖추고 있지 못하다. 그리고 여전히 국민과 비-국민의 경계를 확정짓거나 (영토와 국민이 더 이상 일치하지 않는 경우에도) 영토 외부의 국민을 국가 안으로 포섭함으로써 권력의 영역을 확장시키고자 한다. 그러나 “민족국가는 너무 작아서 새로운 환경이 조성하는 경제적, 생태적, 국민 위생적, 정보적인 문제들을 다룰 수가 없으며, 또 다른 한편으로는 너무 커서 정체성을 지향하는 사회적이고 지역적인 운동들을 만족시킬 수 없다”(벤하비브, 2004: 27). 그런데 자본은 ‘민족적이지 않고 국가에 의해 결정되지도 않으면서 결정적인 역할을 하는 그 무엇’이다(버틀러·스피박, 2008). 이런 상황에서 지구적, 탈근대 시민권은 자본의 지구적 흐름과 이주의 지구적 확산이 유인하는 새로운 동력에 전략적으로 대응하면서 국민국가의 시민권 내부에서 노동자, 여성, 흑인, 동성애자, 장애인, 이주민 등 사회적 약자들의 투쟁을 통해 이루어져야 한다. 이미 이중국적이나 영주권의 증가는 배타적인 자국 시민의 규정 위에 유지되었던 근대적 시민권 제도가 탈근대적 변형을 겪는다는 것을 가리키고 있으며 문화적 공동체와 정치적 공동체의 동일성에 대한 근대 국민국가의 주장이 신화에 불과함을 좀 더 근본적으로 성찰할 수 있는 계기를 마련해주고 있는 상황에서 그러한 연대는 상상력 이상의 효력을 발휘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참고문헌

- 조원광 (2007), 「이주노동자와 이동」, 부커진 R.1 『소수성의 정치학』
- 최현 (2008), 「탈근대적 시민권 제도와 초국민적 정치공동체의 모색」, 『경제와 사회』, 가을 호 (통권 제 79호)
- 서철원 (2004), 「이중국적자의 법적 문제」, 『서울국제법연구』 11권 1호, 19-56
- 이철우 (2004), 「이중국적의 규범적 평가」, 『법과 사회』, 27호 249-279.
- 조효제 (2007), 『인권의 문법』, 서울: 후마니타스.
- 강수돌 (2007. 11. 6), 독일의 이주노동자 정책과 시사점, 국가인권위원회 이주인권포럼
- 김현미 (2008), 「결혼이주여성의 사회통합: 가부장제와 다문화주의 사이에서」, 제1회 이민학회 학술대회 자료집.
- 김지환 (2009), “18년 살며 정든 고향 됐는데 ‘국외자’라며 연행 소름끼쳐”, <경향신문>
- 세일라 벤하비브 (2004), 『타자의 권리』, 이상훈 옮김, 서울: 철학과현실사
- Zygmunt Bauman (2005), 『Verworfenes Leben: Die Ausgegrenzten der Moderne』, Hamburger Edition HIS Verlagsges. mbH.

조르조 아감벤 (2008), 『호모 사케르』, 박진우 옮김, 새물결

주디스 버틀러, 가야트리 스피박 (2008), 『누가 민족국가를 노래하는가』, 주해연 옮김. 서울:
산책자

“앰네스티 ‘한국, 이주노동자 ‘일회용’ 취급”, <한겨레>, 2009.10.22.

www.daum.net/freeminu

www.saladtv.kr

追溯“多元文化主义”，能否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 对移民文化劳动家‘米努’的严打为例

金英玉（移民女性人權論壇代表）

〈目 次〉

- 一. 以移民相关的国内环境及多元文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 二. 新自由主义和‘雇用许可制’
- 三. ‘米努’－文化形象（icon）的意义
- 补遗：跨越现代民主、国民国家的矛盾，面向后现代公民权

一. 以移民相关的国内环境及多元文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据《2009年外国人政策实施计划》统计，到目前为止在韩外国人竟达116万名，其中访问就业占26%、单纯职能劳动力占18%、韩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占11%、留学生占6%、专业劳动人力占3%、投资者占1%、其他占33%，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居住类型。其中，移民劳动人数为72万、结婚移民人数为16万4千名。结婚移民者中已取得韩国国籍的达5万名，还未取得国籍的人达11万3千名。

自从1991年实施产业进修生制度以来，移民劳动者就开始进入韩国，从此韩国社会也开始对‘外国人’予以关心。到2000年初，随着结婚移民女性的持续增加，对外国人的‘关心’也急剧增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止，韩国如同其他亚洲国家，还是一个净劳务输出国。考虑到韩国过去的劳务市场情况，上述数据充分说明，韩国社会在很短暂的时间内，正经历着很多形式的移民现象。直到低生育率、老龄化现象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之前，韩国社会对‘外国人’问题，没有在移居政策及移民政策的立场上深入考虑。这意味着韩国政府判断，跨国结婚将成为能够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根本钥匙，就把结婚移民女性看成主要移民政策的对象。这些事实，之后每当韩国政府以“多元文化社会”为热门话题制定法案、政策时，持续带来很多影响。

2006年4月，韩国政府根本没有与公民谈论，韩国人与移民者一同构建的多元文化社会所要求的变化核心是什么，在何处可以寻找其政治的、人权的正当性，就宣布‘向多元文化、多元民主社会的转变’，引进国家主导型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谈论，开展了针对结婚移民女性及其子女的各种多元文化活动。这又意味着韩国政府还未考虑，包括移民劳动者、结婚移民女性、留学生、同胞、难民等全部在韩外国人在内的移民·多元文化政策。

韩国政府对采纳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在漫长的时间围绕少数集团的公民权及归属等问题，进行人权领域的协商、讨论、审议等一系列活动内容，是否认真参考、借鉴，还有很多争论。移民活动家或研究人员都特别指出，韩国政府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彻底排除移民劳动者。尤其是因属于‘非法’范畴，未登记、超签证日期滞留的移民劳动者，在一切审议范围内彻底排除在外的现象更为严重。《在韩外国人待遇基本法》明确指出，‘在韩外国人’是指‘不属于大韩民国国籍的人，以居住大韩民国为目的，合法滞留在韩国的人’。在支援生长在两个不同文化圈的人结婚成为家庭的《多元文化家族支援法》明确指出，‘多元文化家族’是指‘结婚移民者与在大韩民国出生

并取得国籍的人，形成一个家庭的家族。’

‘雇用许可制’（《外国人劳动者雇佣许可制度》）是2003年立法、2007年完全废除产业研修生制度的同时就实施制度。其名称中也可以得知，‘雇用许可制’并非是一个针对劳动者本身的法律，而是以雇主为主的制度。此法律并非是一个为移民劳动者人权的制度，而是为了保护雇主的利益而制定的制度。在‘雇用许可制’上的劳动者，其身份彻底归属与雇主。其制度完全排除劳动者，因此根据此法劳动者就容易被成为违法者。与政府主张相反，‘雇用许可制’没有改善移民劳动者所处的被剥削的劳动环境，反而增加‘非法滞留者’的现实，都是因这些矛盾而造成的。换句话说，存在劳动者成为非法滞留者时，才（微不足道）享受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的悖论。

这些情况，从结婚移民女性和移民劳动者的立场来看，各提出如下疑问。如果移民群分为劳务移民者和结婚移民女性—这两个相互根本不能相配的范畴，而且多元文化政策的主要目标¹⁾是，把结婚移民女性归属与解决低生育危机，又是维持韩国传统家庭形态的‘韩国人配偶’的范畴，那这些政策可以实现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内容又是什么？此时，结婚移民女性当事人到底属于哪一范畴²⁾？

难道受到双重排斥的‘非法滞留及超期滞留’移民劳动者，真正成不了形成多元文化社会的伙伴主体吗？那么在新自由主义劳动灵活性政策的框架上，暗地容忍的‘非法滞留者’，就没有任何主体性的地位吗？如果这些‘非法滞留者’实际在韩停留10年以上，发现并确认到他们已发挥主体的行为时，那这些行为又用何等方式与‘法律’接轨呢？

那么，不是基于排除的‘自上而下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是采取自下而上推动并实践多元文化，然后再扩大‘外国人’能够享受的文化圈外延的范围，能够扩大到什么程度？

对韩国政府一开始就彻底基于排除而研究制定的单方向多元文化政策，很多活动家及研究家提出类似如上所述的提问。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最近发生的‘超期滞留移民劳动者米努’事件而具体萌发浮出水面的问题。因此今天发表的文章，就站在移民劳动者的立场上，以已提出的问题为主，要反省韩国的多元文化政策。

二. 新自由主义和‘雇用许可制’

移民与新自由主义密切地连在一起。为能够理解为什么持续增加‘非法移民者’这一问题，首先要理解自由主义对全球的移民政策带来何等的变形。新自由主义是加速劳动力灵活性的制度，拥护并扩张具有经济能力人群的政治权利。新自由主义性的移民劳动政策之特征是，对资本和商品的移动敞开国境，而相对劳动者要封锁国界。即：就是为了不承担由于永久性移民者而发生的福利、教育、医疗等综合费用，就愿意选择短期循环移民劳动者。劳务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签订MOU及扩大配额，降低劳动者权利相兑换的方法—权利抵消政策(Number-Right Trade Off Policy)来收敛的这

1) 对此金璇美（音译）称：韩国对结婚移民女性的法律和政策，虽然频繁使用‘多元文化主义’，不过它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可以看成是一个针对结婚移民者与其家庭的‘多元文化家庭’政策。（金璇美2008）。

2) 结婚移民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潮流中而被出现的一种性别化的形式，因此不应把结婚移民和劳动移民另眼相待。结婚移民女性大多数来自于，由于现代化而被侵占生物学及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生活‘园地’（Bauman, 2005），而且因全球化而向世界扩散的消费文化欲望而被成为奴隶的第三世界国家。结婚移民是一个以最少的费用，躲避越来越难以入境的流入国的过境封锁，而可以实现移民的一种选择。女性选择结婚移民时的‘汇款’所占的重要性，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同时，如同韩国政府为了弥补不足的劳动力而引进移民劳动者一样，为了生育韩国人而迎接外国人新娘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和结婚移民女性都属于移民劳动者的范畴。

些劳动移民政策，就无法阻挡非法移民者的入境。反过来，强化劳动灵活性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以主权的名义动员警察的国家统治战略，更大量产生非法移民者。这些国家从制度上，给业主创造一个雇用移民劳动者的有利环境，同时暗地容忍雇佣非法劳动者。

下面再仔细看一下‘雇用许可制’（《外国人劳动者雇佣许可制度》）。

从雇用许可制的‘有关允许变更事业或事业场’条款来看，主要站在业主（使用者）的立场上，提及允许事业场的变更。即；就是‘使用者以正当理由在劳动合同期内，要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期满后，要拒绝更新的’，以及‘被认为因休业、停业及其它并非因外国劳动者的责任为由，在其事业场无法继续劳动的’。就像歧视及工资滞付一样，实际站在移民劳动者的立场来看，变更事业场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没有包括在变更许可的条款内，而包括在‘保护外国劳动者’的条款上。那么关键就在于，政府对于这些条款，对使用者进行什么程度的教导与监控。可是，目前劳动者完全附属于使用者的情况下，这些条款只不过是单纯的为搜擦而已制定的制度。而且变更事业场时，从申请变更之日起限制在两个月以内，而且三年内不能超过三次。因此劳动者很难享受移动自由，又容易转变为未登记移民劳动者。

据研究报告，所谓的对合法移民劳动者移动的法律、制度上的控制，最终将给工资或劳动条件带来很大的影响。与未登记的移民劳动者相比，他们受市场工资的几率非常低。他们的工资‘与产业研修生或研修就业者相比，最少低于20%’，相反非法就业的劳动者所拿的工资已达国内劳动者的水平‘。

（赵元光－音译 2007）迎接雇用许可制出台五周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发表了韩国压榨移民劳动者，‘一次性’地利用它们之后就抛弃的批判性的报考书。报告书暴露‘事业场内发生歧视及语言、身体暴力；因不充分的安全教育及安全装备而发生的工伤事故；对女性移民劳动者的性暴力及贩卖人口；韩国政府对事业场的不充分的监管及过度使用武力而进行管制的现实。’同时，劝告亟待要解决对移民劳动者限制移动事业场的问题，以及对未登记移民劳动者进行逮捕、扣押、出国过程中所发生的侵害人权的行爲。³⁾

如上所述，处在雇用许可制根底的短期移民劳动政策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没有反省而惯例反复进行集中严打或强制驱逐，并以此来企图减少‘非法滞留者’人数的政府意图。这又同寻找灵活的劳动力的新自由主义构筑协作体系，而又暗之容忍移民劳动者的超期滞留的政府‘好意的旁观’互相矛盾。而且忍受这一矛盾的又是非法或超期滞留的移民劳动者份儿。

德国过去50年的移民劳动及移民劳动者政策之变化，给韩国的移民劳动政策留下很好的启示。德国的移民劳动政策大体呈现如下几个方面：劳动市场政策、社会融合政策、文化社会（Kultergesellschaft）政策。按照短期循环原则，禁止家属同伴入境的劳动市场政策，转变为通过‘社会融合’提供更‘优秀的劳动力’，从而能够减少社会纠纷、维持产业和平的观点。（为此贡献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他们了解到通过多年的经验，长期停留的劳动者可以提供熟练的劳动力。）基于此，德国进一步采纳并非把移民者看成‘劳动力’或‘外国人’，而把他们包容为真正的社会成员，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者与原住民之间，能够形成社会及文化性质共存和相协调的文化社会政策（姜水夏 2007）。

德国事例中可以看到，德国长达50年的时间，了解到虽进口很多劳务人员也依旧有很多的劳动者入境，再封锁国境也依旧增加跨境劳动者的移民劳动现实，并承认长期滞留移民劳动者与其家属的公民权。这体现了执著于出入境管理主权的国民国家顽固性，同时也呈现出其执著的不健全性。

难道韩国就不能借鉴德国，更早领悟到这些执著的不合理性，为了实现不是虚体的而是面向实际的多元文化社会，谋求自身的变化吗？！难道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并承认，包括未登记、超期滞留劳动者

3) 国际特赦组织“韩国像‘一次性’对待一名劳动者”《hankyoreh》 2009.10.22.

在内的移民劳动者，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共存的‘存在’；什么时候移民劳动者才能从人权侵害中摆脱出来，真正享受自由的权利，并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表达并主张各种人权的内容与权利的存在！

下面我以‘米努’事件为例，详细谈一谈上述疑问。

三. ‘米努’－文化形象 (icon) 的意义

－移民劳动者从问题走向存在

尼泊尔出身的minode moktan又称为‘米努’，1992年在韩国还没有外国人就业制度时赴韩，生活18年的移民劳动者。2003年，他成立多国组合“StopCrackDown”，参加各种形式文化活动的一位移民文化活动家。在外国人综艺大会上荣获金奖，授文化部长官的感谢奖牌。他为了想让韩国社会通过自己的声音，更多了解移民劳动者的存在，成立了移民劳动者广播台，制作代言移民劳动者人权的相关纪录片，同时为了移民劳动者与韩国社会之间的文化沟通，受政府的支援举办了移民劳动者电影节。

他所属的“StopCrackDown”不仅是在移民群，在言论媒体、NGO、文化活动家之间，名声享誉的移民文化活动组合。不管是政府或首尔市举办的各种外国人活动中，他们总是一个被邀请的第一组合。他曾在圣公会大学校劳动大学念过书，在文化体育观光部举办的‘多元文化政策讨论会’上，以流利的韩国语提出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喝彩。这些都说明不管韩国社会愿不愿意，‘米努’在标榜‘多元文化社会’的韩国已成为一种文化图标，而且在这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政府也暗地承认并以支援的形式与他们进行了协作。

他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向社会披露移民劳动者并非只是在韩国挣钱的人⁴⁾，而是作为区域社会的成员，不但进行消费，也同邻居一起交流感情与文化，同劳动者合作，也积极参加讨论韩国对多元文化社会的争论，阐述自己的意见，从而体现移民劳动者的‘过多种性的生活’立场。同时，希望改变韩国社会盲目地把移民劳动者看成同情或威胁对象的现实。

但是今年10月初，法务部发表对非法滞留者与‘有关部门一起要进行集中严打’之后，他被成为出入境管理处的严打目标对象，现在被拘留在华城保护所。⁵⁾ 市民团体判断对他的强制性驱逐是‘不合理’的（或不合法的），就组成‘为释放米奴的共同对策委员会’，递交异议书、特别停留许可请愿书、恳求书，正等着法务部的答辩。共同对策委对超期滞留者的非法性出发而约束‘米努’的事实明确表示，他‘实际’就是韩国社会的一个成员（洪石材2009）。同时又强调期间他所作的文化活动，完全符合于在现行出入境管理法中指出的‘对韩国社会的有很大贡献的外国人发给’的⁶⁾特别停留许可证。⁷⁾

4) 2008年他在移民劳动者电影节采访中说：“我想表现移民劳动者在韩国不只是挣钱，而是努力想和韩国社会沟通、相结合的形象。”（联合新闻 2008.07.19）。

5) 以前韩国政府的严打目标主要在移民劳资组合的领导人，而今年2009年的严打目标范围扩大到文化活动中。除了米努以外，在韩国最初出版创作动画“打碎石头的孩子们”（本书被选为仁川文化财团‘2009年仁川优秀图书’）的范酪迪，也被拘留在华城外国人保护所。范酪迪是尼泊尔共同体NCC的前任会长。（<http://saladtv.kr>）。

6) 根据新的国籍法，“对有助于国家利益的优秀外国人才”，没有国内居住期间的要求，允许取得国籍，而且“不抛弃外国国籍”也可以拿韩国国际。（新设7条1项3号10组）同时，研究对销售50万美元以上高额房地产的外国人，是否赋予永久居住权问题。与“国籍法修改案”连在一起的《外国人政策委员会》的《2009年外国人政策实施计划》，也强调类似的经济主义原则。

与国内法有关的就以“在韩外国人待遇基本法”为准、与国际动向有关的就以2008年EU的《与移民和难民有关的欧洲协定》中的“积极引进第三世界优秀人才”及“坚决断绝非法移民”为依据，实施的本《实施

在强调‘向多元文化社会变化’的韩国社会上，而且不仅是其变化的活生生的证人，又是被邀请到各种文化活动中，热唱“we love korea”的米努，进行闪电般的严打拘留，表现了‘强制驱逐’和‘多元文化’—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中，走钢丝的韩国政府的实情。同时，如实证实了非法和合法的境界，在政府的统治战略之下，多有流动性的事实。在华城保护所，他说‘我已成为有17年8个月流通期限的商品，但我想我对韩国有责任心，韩国也并非对我没有责任。我想从韩国得到一个答复。’⁸⁾他的话充分说明，其间韩国政府在非法和合法的境界内，与超期滞留移民劳动者进行的游戏，是一个需要认真答复的一个政治行为。

米努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没有内容只有发生效力的法律、且为自己的正当性（即为了发生效力）需要身体的法律（Agamben 2008）。为获得自身正当性⁹⁾，그리‘法律’在韩国社会以‘实质性’的成员生活18年的米努要求身体。对在韩国生活18年的一生，米努向韩国追究责任，同时又强烈地呼吁，一个人在韩18年的生活，不能就因法律制度而‘赤裸裸地’被抛弃在外。

Agamben对当代主权国家的建立，从例外的情况和法律—政治秩序的关系中观擦并表示，法律与生活结成的根本性的关系，就是法律把生活成为例外的情况，即在于抛弃。这里确定主权者的权力特征的驱逐令最隐居的结构，不是外部的情况宣布例外的情况，而是例外的宣布造成实际的情况。因此法律问题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也被消失，同时是否合法与是否非法的概念也被消失。（Agamben 2008）

被称之为‘非法滞留者’的移民劳动者的存在，指的是内部之中的外部，即形成例外的情况，再说通过设定一个‘赤裸裸的生活’状态，能够维持主权共同体的结构性原理。他们并不是一个通过审判，判决‘非法’与否的人群。一开始他们就是没有受审判的权利，只不过是以驱逐的形式而存在的、被命名的人群。就是说，不是违法的人，而是在法律内部形成法律外部环境的人。因此‘是否有罪无罪？’的问题，与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毫无相关的提问，只是存在一个法律的内外境界线划在何处的问题。

而无法回归与国民民族特性（national identity）的外在因素—移民劳动者，已成为韩国在国民国家中已接受的全球性（global）、后国家性（transnational）的异质性和多样性（高炳权 2009）的存

计划》说明的各部门别政策可分为4个范畴。即：积极的开放、社会的统一、移民行政、外国人人权拥护等。大部分的预算都使用在积极的开放和社会的统一政策上。2009年财源投资总规模为1111亿韩币，其中分配给积极的开放政策为534亿韩元、社会统一为502亿韩元、移民行政为23亿、外国人人权拥护为50亿韩元。通过积极的开放引进‘优秀人才’，加强国际竞争力的意见，是在总统直属机关《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引进全球高级人才方案”中被决定的事项。主要的内容是，教育科学技术部从海外召集优秀人才，法务部为让他们稳定地滞留在韩国，改善签证制度，提供各种便利。具体地讲，优秀人才没有雇用合同，也发给签证，使他们入境，允许拿双重国籍，免除笔试。因为“他们没有阻碍我们社会的融合与统一的忧虑”。

那么像米努一样，不仅“没有阻碍我们社会的融合与统一”，而且政府通过非正式的方法承认，他在过去10年多的时间，通过各种方式为统一和融合做出贡献的人，难道并不是“优秀的人才吗”！对这一提问，谁有权限给予回答？！

7) 对策委组成员“亚洲的朋友们”在声明书上表示，“我们希望特别滞留许可，不应成为只为有权利、财产、学问的人的法律工具。政府一直强调已经进入超过100万以上的移民时代，那么应记住米努是一位用歌声来表达移民者的痛苦、爱情、权力的劳动者。”

8) 参照 www.daum.net/freeminu

9) 15日、16日，米努在京乡新闻采访中说：法务部严打的目标是因为做了‘反政府活动。对此他说“人觉得疼痛的时候说疼，不喜欢的时候能说不喜欢，才是一个表现的自由。真想问，难道这就是反政府活动？！”。“我只是做了韩国人与移民者能够一起生活的文化活动而已。不仅仅为了移民劳动者，也是一个为韩国人而举办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不是暗地进行的，也没有犯罪。为了让更多的移民，感到韩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而进行的文化活动。遗憾的是韩国政府没有理解这一点。”（金志寰 2009）

在。全球化带来的这些现实情况，把民族的文化特性和领土的一致性，看成像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露出在此基础上运行的现代民族及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偶然性的特征，提供想象后现代（postmodern）的公民权制度和后民族国民性的政治共同体的机会。同时，自下而上的多元文化实践，让大多数的人们共享这些面向后国家的（transnational）、后民族国民的政治共同体的形象力。

补遗：跨越现代民主、国民国家的矛盾，面向后现代公民权

虽然移民加快领土和民族、公民权的分离，而主权国家依然执著于国境，没有把像双重国籍或永久居住权一样的明面白白的后现代（postmodern）、后国家（transnational）制度，与后民族国家（postnational）公民权制度上连在一起。再说，目前移民的公民权仍然归属与国民国家统治权利的现实（李哲雨a 2008，李哲雨b 2008），与现代国民国家及人权思想的诞生紧紧地连在一起。

从历史来看，与领土主权看成文化同质性的想法是，与民主的立法政府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即把国民理解为民族的民族、国民国家是，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产物（李哲雨 2008a，李哲雨 2008b）。同时，所有的人从诞生的那一瞬间起，就具备不能转让给他人的神圣的权利的《人权宣言》，也是从公民权的联动中诞生的（Benhabib 2008，崔铉 2008，赵晓志 2007）。例如，法国发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后，制定公民权法和制度，使所有法国共和国的公民都具备人权。在现代社会为被承认为人（即为享受人权），无论如何人首先应属于特定国民国家的公民。

为了巩固国民国家体系，国民国家确立公民权制度来保护公民权利，为维持文化同质性和民族性，确定本国公民的范围。为此开发了护照及各种身份证、国民登记制度，并通过国际协议控制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跨国移动，并在本国领土内清楚地划外国人与本国公民的界限（Torpey 2000年：崔铉在2008年在引用），从而形成国民把国家与自己同等相待的条件。即：公民权就成了现代国民民族特性的基础。

最近我们所经验的交通、信息、发达的通信技术，不仅提高全球的相互依赖性，而且全球性范围扩大的移民及统一市场的要求，营造一个形成后国民性和后国家（transnational）民族特性的环境。不过，目前刚刚出现的这些全球公民民族特性苗头，为了发展实际意义的多元文化及多元种族的共同体，应超越现代的公民权，发展成后现代的、全球性的公民权（崔铉 2008）。

如上所述，现有的国民国家在文化单一性的前提下维持到至今，因此没有充分具备与文化、民族的多样性相互联在一起的原理及制度，而且依然确定一个国民和非国民的境界（领土与国民再也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或把领土外部的国民包容在本国内，来企图扩张权力的领域。不过“民族国家太小，无法解决新的环境所带来的经济的、生态的、国民卫生的、信息而产生的问题；另一方则太大，无法满足民族特性所追求的社会的、区域性的运动（Benhabib 2004：27）。

可是资本是“不属于民族的，也不可能被国家而决定，但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Butler Spivak 2008）”。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的、后现代公民权，应积极应对由资本的全球性趋势与向全球扩散的移民而带来的新的动力，在国民国家的公民权内部，通过劳动者、女性、黑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移民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斗争来实现。日趋增加的双重国籍或永久居住权已充分说明，在具有排他性的自国公民规定上维持下来的现代公民权制度，要经历后现代的变形；对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现代国民国家提出的各种主张，只不过是神话，并以营造一个认真反省的契机；这样相互的联动将会发挥超越想象力的效力。

「多文化主義」に逆らい多文化社会の構築は可能であろうか

- 移住文化活動家「ミヌ」の標的取締りを機に -

金英玉（移住女性人権フォーラム代表）

〈目次〉

1. 移住と関連した韓国内の環境と多文化政策の構造的な矛盾
2. 新自由主義と「雇用許可制」
3. 「ミヌ」という文化的アイコンの意味: 移住労働者、問題から存在に
補遺: 近代民族/国民国家の矛盾を越え脱近代の市民権に

1. 移住と関連した韓国内の環境と多文化政策の構造的な矛盾

「2009年外国人政策施行計画」によると現在、韓国に滞在している外国人の数は116万名に増加しており、さらに訪問就業26%、単純技能労働18%、韓国民の配偶者11%、留学生6%、専門的労働力3%、永住資格者2%、投資者1%、その他33%とその類型も非常に多样化しつつある。そのうち、移住労働者は72万名であり、国際結婚移住者は16万4千名だ。国際結婚移住者のうち、国籍取得者は5万名、未取得者は11万3千名だ。韓国社会において「外国人」に対する关心は主に1991年から産業研修生制度に伴い韓国に流入することになった移住労働者によって触发された。その後、2000年初頭からその数が持続的に増加している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によってその关心は本格化した。

1980年代初頭まで他のアジア諸国のように労働力を積極的に輸出してきた韓国の状況からすると、これは韓国社会が移住という現象を非常に短時間で濃密な経験をし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する。韓国社会は少子高齢化が政治上、主要課題として浮上するまでは「外国人」問題を移住政策、また移民政策という観点から深刻に考えたことがない。つまり、国際結婚が少子化問題を解決する鍵となり得ると判断した韓国政府によって、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が主な移住政策の対象になったと言えるだろう。こうした事実はその後、韓国政府が「多文化社会」をテーマに掲げながら法案を整備し、政策を打ち出す時、持続的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になる。韓国人が移住民と一緒に構成していく多文化社会にとって求められる変化の核心や、その政治的・人权的な正当性の模索に対する市民による議論も経ずに、韓国政府は2006年4月「多文化・多民族社会への转换」を宣言し、国家主導による多文化主義の谈论を受け入れており、その後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とその子供らを対象とした各種の多文化事業を展開し始めた。これは韓国政府が移住労働者と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留学生、同胞、難民など韓国に居住する外国人全体を含む移民・多文化政策をめぐり依然として苦心していないことを意味する。

多文化主義を採用している国で長期間、少数集団の市民権と归属などの問題をめぐり展開された人権レベルでの交渉と讨论、审议などを韓国政府がいかに真剣に参考したかについてはまだ议论の余地がある。移住問題に関わる活動家や研究者は特に、移住労働者に対する徹底した排除を

韓国政府の多文化政策における最大の問題点だと指摘している。その中でも「不法」のカテゴリーに縛られ、一切の議論から外されている未登録/超過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の場合、こうした排除現象は一层深刻である。在韓外国人の法的地位を定めた「在韓外国人処遇基本法」によると、「在韓外国人」とは「大韓民国の国籍をもたないが、韓国に居住する目的をもって合法的に滞在している者」と明示されている。さらに、二つの文化が相互接触して形成された家族を支援する「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でいう「多文化家族」は「結婚移住者と生まれた時から大韓民国の国籍を取得したものからなる家族」だと定義づけられている。

また、2003年に制定され、2007年から産業研修生制度の全面的な廃止に伴い施行されている「雇用許可制」（「外国人労働者の雇用などに関する法律」）はすでにその名称が示すように、労働者当事者ではなく雇用主を対象としている。移住労働者の人権ではなく雇用主の利潤創出を保護するための同法では、労働者は徹底して雇用主に从属してしまい、自らを排除した時のみ、同法では、皮肉にも簡単に法を犯してしまうこととなる。政府の主張とは違って、雇用許可制が移住労働者の搾取する労働環境をまったく改善するどころか、かえって「不法滞在者」のみを増加させる現状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うした矛盾に起因している。つまり、不法滞在者であるときこそ、労働者は（わずかながらも）労働者としての権利と自由を享受できるパラドックスが生じる。

こうした状況は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と移住労働者の地位から見て、各々次のような問いを生む。移住民を労働移住者と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すなわちお互いに共通項が見当たらないカテゴリーに分け、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を韓国社会の少子化危機を解決し、伝統的な家族形態を維持する「韓国人配偶者」として範疇化することが多文化政策の主要目標だとすれば、1)この政策による多文化社会はいかなるものになるのだろうか。この時、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本人の帰属はどこに位置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だろうか。2)

二重の排除に直面している「不法滞在/超過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は多文化社会を形成する上で、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主体には決してなれないのか。すると、新自由主義による労働市場の柔軟化政策の中で、暗黙に容認されてきた「不法滞在者」にはいかなる主体的な地位も与えられないのか。もし現にそうした「不法滞在者」が10年以上、長期滞在しながら主体的な行為性をあらわしたことが確認されたとすれば、この行為性は「法」にいかなる方法でアプローチできるのだろうか。

排除に基盤をおく「上からの多文化主義」に逆らって下からの多文化実践を活性化すること、そしてそれを通じて「異邦人」が享受できる文化圏の外延はどこまで拡大できるのだろうか。

当初から徹底した排除に基盤をおいて作成された韓国政府による一方的な多文化政策に対し、活動家や研究者はこれまで類似した問いを提起し続けてきた。だが、本稿で提示しているこうした問いは最近起こった「超過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であるミヌ」事件によって顕著化した。したがっ

- 1) これに関連し、キム・ヒョンミは韓国の結婚移住女性に対する法律と政策は「多文化主義」という言葉の頻繁な使用にも拘わらず、真の多文化主義の政策よりは国際結婚移住者とその家族を対象とする「多文化家族」政策だと考えられると述べている（キム・ヒョンミ、2008）。
- 2) 新自由主義のグローバル化の中、進められた移住の性別化された一形態として結婚移住も労働移住と区別できない。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も近代化によって生物学的一社会文化的な意味から生活の根幹を奪われ(Bauman, 2005)、グローバル化が稼働させた消費文化が地球規模で拡大される中、消費への欲望に抱き込まれた第3世界諸国の状況に起因する。結婚移住は最も低費用で、次第に強化されつつある流入国による国境封鎖を回避し、移住を実現できる選択肢である。女性の結婚移住の選択に占める「送金」の重要性はこれをよく物語っている。また、韓国政府が労働力不足を解決するために移住労働者を受け入れているように、韓国人を産んで育てる再生産労働を任せるため、外国人の新婦を受け入れている点においても労働者と国際結婚女性移住者は移住労働の脈絡に位置づけられる。

て本稿では特に、移住労働者の地位から発生する問いを中心に韓国の多文化政策を省察してみたい。

2. 新自由主義と「雇用許可制」

移住は新自由主義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なぜ「不法移住者」が増加しているかを理解するには、まず、新自由主義により移住政策が地球規模でいかなる方法で変形しているかを理解せねばならない。新自由主義は労働力の柔軟化を加速化する制度で、経済力を有する人々の政治的権利を擁護し、拡大させる。新自由主義における移住労働政策の特徴はカネとモノの移動のためには、できるだけ国境を開放する一方、労働者に対しては国境を封鎖する、つまり福祉や教育、医療問題など永久の移住者に所要される統合費用を回避すべく、短期間の循環移住の労働者を好む。ところで、受入国と送出国間でMOUを締結し、クォーターの拡大と労働者の権利の縮小を取替える数—権利相殺政策(Number—Right Trade Off Policy)で収斂されるこうした労働移住政策は不法移住者を阻止できない。かえって労働の柔軟化を強化する新自由主義と主権の名の下、警察力を動員する国の統治戦略は不法移住者を量産する。これらは制度上、事業主に有利な移住労働者の雇用環境を醸成するとともに不法労働者の使用を暗黙に容認している。

「雇用許可制」（「外国人労働者の雇用に関する法律」）をより具体的に検討してみよう。雇用許可制の「事業又は事業場の変更の許可」の条項を見ると、基本的に事業主（使用者）の立場のみから事業場の変更が可能であると明示されている。「使用者が正当な理由で労働契約の中、労働契約を解除しようとしたり、労働契約が終了した後更新を拒否しようとする場合」と「休業・廃業その他外国人労働者の責任ではない理由として、その事業場では労働が持続できないと認められる場合」がまさにそれにあたる。差別や賃金未拂いのように、实际移住労働者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事業場の変更の理由は、変更の許可の条項ではなく「外国人労働者の保護」の条項に盛り込まれている。するとこの条項と関連し、果たして韓国政府が使用者をいかに启发し、さらに監視できるかにかかっている。しかし、労働者が使用者に完全に从属されている現状では、こうした条項は単なる言い回しにすぎないわけだ。さらに、事業場の変更が可能な場合でも、その期間が変更の申し出から2ヶ月以内と制限されている上、3年間3回を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め、労働者は異動の自由を享受できないだけでなく、未登録移住労働者に転落しかねない。

ある研究結果によると、いわゆる合法的移住労働者の異動に対する法的・制度的統制は究極的に賃金や労働環境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未登録移住労働者に比べ、彼らは市場の賃金を受け取る可能性は非常に低い。彼らの受け取る賃金は「産業研修生や研修就業者に比較して少なくとも20%以上低いと知られている反面、不法就労者の場合、ほとんど韓国人労働者のレベルに達している」（チョ・ウォンカン、2007）。雇用許可制の施行から5年目を迎え、アムネ스티は韓国が移住労働者を榨取し、ポイ捨てする「使い捨て」のように扱っていると批判する報告書をまとめた。「事業場における差別と言語、身体的暴力、安全教育と安全装置の不足による労働災害の多发、女性移住労働者に対する性的虐待及び人身売買、事業場に対する韓国政府の労働への監督の不十分さ、過剰な武力を使用した取り締まりなどの現状」を指摘するとともに、移住労働者による事業場の異動への制限や未登録移住労働者の逮捕、拘禁、出国過程で行われる人权侵害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よう勧告した。³⁾

雇用許可制の根底にある短期的な移住労働政策の根本的な問題は放置したまま、繰り返される

形だけの取締りと強制送還を通じて「不法滞在者」の数を減らそうとする政府の政策は前に述べたように労働力のフレキシビリティを求める新自由主義との協調体制を形成し、移住労働者の超過滞在を黙認する「好意的な傍観」と矛盾する。さらに、この矛盾を耐えねばならないのは、不法/超過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である。韓国のような移住労働政策と関連し、ドイツで過去50年にわたり進められた移住労働/者政策の変化は有益な示唆を与える。ドイツの移住労働者政策は大きく労働市場政策、社会統合政策、さらに文化社会（Kulturgesellschaft）政策の観点を示している。短期循環の原則の下、家族連れを禁じていた労働市場への政策は、「社会統合」が達成されてこそ「質の高い労働力」が提供されるとともに、産業の平和も維持されるという立場へと観点を定めることとなる。（ここでは、多年に及ぶ経験を通じて熟練した労働力を提供する労働者を支持した中小企業の利害関係も主に貢献した。）ドイツはさらにもう一步進んで移住者を「労働力」あるいは「異邦人」ではなく社会を構成する主体の一人として受け入れており、多様な文化的背景を有する移住民と先住民の間で社会的・文化的な共存とハーモニーを目指していく文化社会政策を採用することになる（カン・スドル、2007）。ドイツの事例はいくら労働者の流入を防いでも人が来てしまう、さらにいくら国境を封鎖しても国境を越える労働者の数が増加し続ける移住労働の現実を合理的に受け入れ、長期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やその家族に市民権を与えるのに50年という年月がかかるほど出入国管理の主权にこだわる国民国家の頑固さを示す（イ・チョルウ、2008a: 68）と同時にその執着の不完全性を示している。韓国の場合、ドイツのような国の事例を反面教師として、より早い段階でそうした執着の理不尽に気づき、虚構ではなく地に足のついた多文化社会へ轉換できないだろうか。またいつになったら未登録/超過滞在の労働者をはじめとする移住労働者を「問題」ではなく、一緒に共存する「存在」として、さらに人権侵害から自由であるべき権利と自ら積極的に多様な人権の内容を表現し、主張する権利を有する存在として認識するとともに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ろうか。

次に筆者は「ミヌ」の事例を詳細に検討しながらこの問いにより具体的にアプローチしたい。

3. 「ミヌ」という文化的アイコンの意味: 移住労働者、問題から存在に

ネパール出身のミノドモクタン、一名「ミヌ」は韓国でまだ外国人の就業制度ができる前の1992年、韓国に入国し、18年間韓国社会で「暮してきた」移住労働者として、特に2003年の多国籍バンド<StopCrackDown>を結成し、活動を始めて以来、様々な移住文化活動を通じ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外国人の芸能大会で大賞を受けた経験があり、文化部長官の感謝牌まで授与した彼は、韓国社会で移住労働者の存在が当事者の声を通じ伝わるように移住労働者放送局をつくり、移住労働者の人権と関連した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を制作した。また、移住労働者と韓国社会間の文化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ため、政府の支援を受け、移住労働者映画祭を開催した。彼が所属している<StopCrackDown>は移住者はもちろん、マスコミ、NGO、文化活動家に最もよく知られた移住者の文化活動グループだった。彼は政府やソウル市や主催した各種外国人関連イベントにいつでも一番に最初に関与された。彼はまた、聖公会大学の労働大学の学生として勉強し、文化体育観光部の主催で開催された「多文化政策の討論会」で流暢な韓国語で質問し、参加者の大きな拍手を受けた。このすべての状況が示しているのは彼が、或いは、韓国社会が望もうが望まない

3) アムネ스티「韓国、移住労働者の「使い捨て」扱い」、《ハンギョレ》、2009.10.22.

が関係なく「ミヌ」は「多文化社会」を标榜する韓国で、一种の文化的アイコンになり、そしてこのような過程で韓国政府もやはり暗黙的な承認と支援で協力したことは事実である。

彼の多様な文化的な活動は移住労働者が韓国でお金だけ稼ぐのではなく⁴⁾地域社会の住民として消費し、隣人と感情的・文化的交流も分かち合い、同僚の労働者と連帯し、また韓国の多文化社会に対する論議に積極的に意見も披瀝しつつ「多重的な暮らしする」姿を見せようとした。これによって、移住労働者を同情や脅威の対象として捉える韓国社会の盲目性を克服させ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しかし、彼は今年の10月初め、法務部の「关系机关の合同集中取締」の発表直後、出入国管理所の取締の标的となり、現在、華城保護所に留まっている。⁵⁾彼の強制追放が「正しくない」或いは（「合法ではない」）と判断した市民団体は「ミヌの解放のための共同対策委」を構成し、強制退却命令に対する異議申請、特別滞在の許可の請愿書と嘆愿書を提出し、法務部の答えを待っている。共同対策委は超過滞在者の不法性から出発する「ミヌ」の取締に対し、彼が「事実上」韓国社会の的一员になってから、長い月日が経過した事を指摘する(ホンソクチェ、2009)。そして今までの彼の文化活動は「韓国社会に大きな貢献を果たした外国人に与えられる」⁶⁾という現行の出入国管理法が言及している特別滞在許可を受けるのに充分であると強調した。⁷⁾

「多文化社会への変身」を強調する韓国社会でまさにその変身の生き証人として各種多文化イベントに招待され「We love Korea」を歌う「ミヌ」の電撃的な取締は「強制追放」と「多文化」という矛盾した政策の間で綱渡りをしている韓国政府の現状を象徴的に示している。そして不法と合法の境界が政府の統治戦略によってどれだけ流動的に動くのかを如実に証明している。華城保護所で彼が「17年8ヶ月の賞味期限付きの商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状況に直面し「私も韓

4) 2008年、移住労働者映画祭関連のインタビューで彼は「移住労働者が韓国社会でお金だけ稼ぐのではなく韓国社会と疎通し、溶け込もうと努力する姿を見せたい」と述べている(連合ニュース、2008. 07. 19)。

5) これまで韓国政府の取締の標的は主に移住労働組合の指導者を狙っていた。しかし、今年2009年の取締の標的は労働組合の範囲を越え、文化活動まで拡大されている。ミヌ以外にも韓国で初めの創作童話「石を割る子供たち」を書き、出版した(この本は仁川文化財団「2009仁川優秀図書」に選定された)ボムラウチも取締の対象となり、現在華城外国人保護所にいる。彼はネパール共同体のNCCの前会長であった(<http://saladtv.kr>)。

6) 新しく変わる国籍法によると「国益に寄与した優秀な外国人材」は国内の居住期間と条件なく、国籍の取得を許容し、「外国国籍を放棄しなくても」韓国の国籍を維持できる(新設7条1項3号10条)。また、50万ドル以上の高額の不動産の売却外国人には永主権の付与を検討している。「国籍法の改正案」と連動している<外国人制作委員会>の<2009年外国人政策の施行計画>はやはり同様の経済主義の原則を強調している。国内法と関連しては既存の「在韓外国人の処遇基本法」を、そして国際的な動向と関連しては2008年EUの<移民と難民に関するEU協定>中で「第3世界の優秀人材の積極的な誘致」及び「不法移民の強力な遮断」に準拠しているこの施行計画が明らかにしている機関別(省庁別)制作は積極的な解放、社会統合、移民行政、外国人人権の擁護など、大きく4つの範疇に分けられるが、予算の大半は積極的な解放と社会統合に使われている。2009年、財源投資の規模は計111,1億ウォンであるが、この中で積極的な開放に534億ウォン、社会統合に502億ウォン、移民行政に23億ウォン、外国人の人権擁護に50億ウォンが割り当てられた。

積極的な開放を通じ、「優秀人材」を誘致することで国家競争力を維持するというアイディアは大統領直属機関である<国家競争力強化委員会>の2次会議の「グローバルエリート人材の誘致方策」で決定された事項である。教育科学技術部が海外の優秀人材を集めると、法務部が彼らの滞在を安定させるためにビザの制度を改善し、すべての便宜を提供するというのが主な柱である。具体的にみると、優秀な人材に雇用契約がなくてもビザを発給し、入国できるようにし、二重国籍を許容し、筆記試験も免除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彼らは「韓国社会の同化、統合を阻害する懸念がない」ためである。

では「ミヌ」のように「韓国社会の同化、統合を阻害」しなかっただけでなく、10年以上、多彩な方法で統合に寄与すると政府が非公式的に承認した人は「優秀な人材」ではないのだろうか。この問いに対する権限はだれにあるのだろうか。

7) 対策委員の構成員である「アジアの友達」は声明書で「我々は特別滞在許可が権力と財産、学識のある人々だけの法の道具となってはならないと考える。政府がこれまで強調してきた100万を越える移住者の時代に彼は歌で移住者の痛みと愛、権利を伝えた歌を歌う労働者であったことを記憶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国に責任があるし、韓国も私に責任がないとは思わない。私は韓国から答えを聞きたい。」と述べたのは⁸⁾これまで韓国政府が不法と合法の境界で、超過滞在の移住労働者と繰り返したゲームが真摯な答えを要求する政治的な行為であったことを喚起させる。

「ミヌ」の事件の内容はないまま、效力だけ発生させる法、しかし自分の正当性のため、(つまり效力を発生させるため)身体を必要とする法は余りにも赤裸々に暴露している(Agamben, 2008)。18年間、韓国社会の「実質的」一員として暮してきた「ミヌ」の身体を要求することにより、急に自分の正当性を獲得する「法」。⁹⁾しかし、韓国で暮した18年間の自分の暮らしをめぐり韓国の責任を問う「ミヌ」の質問は同時に暮らしがこんなにも順々に「丸裸の状態」になり、法により見捨てられない事を強弁する。

近代主权国家の設立を例外的な状況と法-政治秩序の関係の中で、考察しているAgambenは法が暮らしと結ばれる根本的な関係は法が暮らしを例外的な状況にすること、つまり捨てることにあるという。ここで主权者の権利を特徴づけるのは追放令の最も内密な構造は外部の事実状況が例外を宣布することではなく、例外の宣布が事実状況を生み出すことにある。これによって法律问题と事実問題の間の区別もなくなり、合法か不法かも无くなる(Agamben, 2008)。

「不法滞在者」と呼ばれる移住労働者の存在は内部の中で外部、つまり例外的な状況を作ることによって、言い換えると、法の保護を全く受けられない「丸裸の人生」を設定することで維持される主权共同体の構成的な原理を指す。これは裁判を通じ「不法」であるか否かの審判を受ける人々ではない。初めから、裁判を受ける権利もなく、初めから追放の形だけ存在し得る命令を受けた人々である。法を破った人々ではなく、法の中で法の外側を成している人々という意味である。従って「有罪か无罪か」の問いは、彼らの存在とは何の関連がない。ただ、法の内部と外部を分ける境界線をどこに引くの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だけだ。しかし、国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national identity)を還元しない外側の要素である彼らは韓国が国民国家の中で既に受け入れた世界的(global)/超国籍(transnational)レベルの異質性で多様性である(コピョンゴン、2009)。世界化がもたらしたこのような現実的な状況は民族の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と領土の一致がまるで本質的なものであるかのように思われ、その土台の上に運営された近代民族/国民国家(nation-state)の偶然的な性格をあらわし、脱近代的な市民権の制度と超国民的な政治共同体を想像できる機会を与える。そして、下部からの多文化の実践を基本的に超国家的/超国民的な政治共同体に向けたこのような想像力を共有する。

補遺：近代民族/国民国家の矛盾を越え脱近代の市民権に

移住が領土と民族、市民権の分離を加速化させ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国境に向かう主权国家の執着は以前として強く、二重国籍や永住権のような明らかに脱近代的(postmodern)、超国家的(transnational)制度が脱国家的(postnational)な市民権制度につながらない事、つまり、移住者の市

8) 参照。

9) 15、16日に行われた京郷新聞とのインタビューで彼は法務部が自分の取締の標的を「反政府活動」の為であるとしたことに対し「人が痛ければ痛いと言ひ、嫌であれば嫌だと言ひえるのが表現の自由である。これを反政府活動だといえるのか問ひたい」と述べた。続いて「韓国人と移住者が共に暮せるよう文化活動をしただけである。移住労働者だけでなく、韓国人の為でもあった。隠れてしたことでもなく、犯罪を犯したわけでもない。移住者が韓国社会がよいところだと思えるよう活動した。これを(政府が)理解できないのは残念である」と述べた。(キム・ジファン、2009)。

市民権が以前として国民国家の統治权力に从属する現状は(イ・チョルウa, 2008; イ・チョルウb, 2008) 近代国民国家及び人权思想の诞生と关联がある。

歴史的にみると領土の主権を文化的な同質性という考えと共に民主的立憲政府と結合させる国家、つまり国民を民族として理解する民族/国民国家は政治的な近代化が進む過程で起きた独特の産物である(Benhbib, 2008; チェヒョン, 2008; イ・チョルウ, 2008a; イ・チョルウ, 2008b)。そしてすべての人間は生まれながらにして、他人に譲渡できない高潔な权利を有する人权宣言は市民権との连动の中で生まれた(Agamben, 2008; チェ・ヒョン, 2008; ジョ・ヒョジェ, 2007)。例えば、フランスの共和国が「人間と市民の权利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を公布しそれを支える市民権の法と制度をつくることによって、フランス共和国の市民は人权を有することができた。近代的な世界で人間として認められるために(つまり人权を享受するために)人間は何よりも特定の国民国家の市民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国民国家の体系を確固たるものに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の一环として国民国家は市民権の制度を确立し、市民の权利を保护し、文化的な同質性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維持するために自国市民の範囲を確定した。この為、旅券と様々な身分証明書、そして国民登録制度を開発する一方で、国际协約を通じ自国の市民と外国人が国境を越えて、移动する事を统制しただけでなく、自国の領土内で外国人と自国市民の境界を明らかにした(Torpey, 2000; チェヒョン, 2008から再引用)。これによって、国民が国家と自分を同一視できる条件が整った。つまり市民権が近代的な国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基础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最近我々が経験している交通と情報、通信技术の发达は世界的な相互依存性を高め、世界的な移民の扩大と市场统合の要求は超国民的/超国家的(transnational)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が形成される环境をつくりあげた。しかし、現在の端初を見せ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地球市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が実质的な多文化的、多宗族的共同体に发展させるためには、近代的市民権を越え脱近代的、地球的市民権を发展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チェ・ヒョン, 2008)。今後も言及したように既存の国民国家は文化的な単一性の前提の下に维持されてきたため、文化的、民族的な多様性と关系を结べる原理や制度を十分に整えていない。そして、依然として国民と非一国民の境界を確定し(領土と国民が一致しない場合にも)領土外部の国民を国家の中に包摂することで权力の领域を扩张させようとする。しかし「民族国家はあまりにも小さく、新しい环境がつくられる経済的、生态的、国民卫生的、情报的な問題を扱うことができず、また、一方ではあまりにも大き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志向する社会的で地域的な运动を満足させうることができない」(Benhabib, 2004:27)。しかし、资本は「民族的ではなく、国家により决定されることもなく、决定的な役割をするそのなにか」である(Bulter・Spivak, 2008)。このような状況で世界的、脱近代市民権は资本の世界的な流れと移住の世界的な扩大が诱因される新しい动力に战略的に対応しつつ、国民国家の市民権の内部で労働者、女性、黒人、同姓爱者、体の不自由な人、移住者など社会的な弱者の斗争を通じ得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既に、二重国籍や永住权の増加は排他的な自国市民の規定の上に维持された近代的市民権の制度が脱近代的の変形を経るという事を示しており、文化的共同体と精神的共同体の同一性に対する近代国民国家の主张が神话に過ぎないことをさらに根本的に省察する契機をつくっている状況でそのような连带は想像力以上の效力を発揮できるだろう。

战后初期留日学生、华侨的选择和国家认同

— 生活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中国人 —

■ 王雪萍（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

战后初期留日学生、华侨的选择和国家认同

— 生活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中国人 —

王雪萍（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目 次〉

前言

- 一，战争中在日本的体验和中国人意识
 - 二，战胜国民意识的形成和对国府的态度转变：1945年8月～1949年9月
 - 三，留日学生支持新中国的行动和回国潮的形成：1949年10月～1955年
 - 四，知识分子的回国潮：1956年
 - 五，回国潮的减退和归国学生、华侨的身份问题：1957年以后
- 结语

前 言

1945年8月，二战结束后，尚有众多的中国人生活在日本。虽然没有关于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的确切统计数字，但可以根据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遣返数据来推断。根据战后从日本送还本国的外国人统计数据，包括台湾人在内，战争结束时仍居留在日本的中国人至少有85692人。同时根据该资料显示，1945年至1948年间、虽然有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65885人）回国¹⁾，但在1949年以后、仍有2万至4万中国人生活在日本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中国）建国。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在战争时期，从台湾、旧满洲国、中国大陆的沦陷区到日本的自费留学生和汪伪政权等日本的傀儡政权和旧殖民地政府等派遣到日本的公费留学生³⁾。

包括留学生在内，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面临着四种选择。一，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人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二，回到中华民国政府（以下：国府）统治下的台湾。三，继续留在日本。四，迁居日本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从结果来看，1949年至1958年之间、共有4000至5000名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和劳工选择回归祖国大陆⁴⁾。在这一时期归国的中国人中，也包括了3000名左右的台湾省籍华侨、留学生⁵⁾。值

1) (日) 竹前荣中村隆英监《GHQ日本占领史 第16卷 办理外国人事务》(日) 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2042页。

2) 根据(日) 竹前荣中村隆英监《GHQ日本占领史 第16卷 办理外国人事务》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2042页，1949年有19807名中国居在日本。根据《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2页、1950年代有4万人左右的华生在日本。

3) [日]河路由佳《芦沟桥事变以后(1937年—1945年)的在日中国人》[日]河路由佳、渊野雄二郎野本京子《战时体制下的农业教育和中国人留学生农林统计协会、2003年，41—57页，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 日本侨报社、2004年30—32页

4) 根据《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2页、1949年至1958年

得一提的是, 从1953年至1955年, 在留日学生、华侨之间, 出现了一次回归祖国大陆的集体回国潮, 仅此期间就有3178名留日学生、华侨回归祖国⁶⁾。

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包括台湾省籍留学生、华侨在内的中国人选择回到人民政府统治的中国大陆地区呢? 是什么原因使在留日学生、华侨之间, 出现了集体回国潮呢?

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 他们的历史认识和身份的变化有关吗? 另外, 中国政府是如何接待这些从曾经是敌对国家的日本回国的同胞的呢? 留日学生在敌国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中国政府给他们的待遇造成影响了吗? 回国以后的境遇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民族意识呢?

本文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 分析1949年至1958年回国的留学生的归国过程。同时, 在分析他们战后仍长时间居留在日本的原因, 和决定回国的理由的同时, 还希望讨论他们每个时期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为此, 本文中还将作为研究的背景讨论1949年以前的部分。

关于在抗战期间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研究, 在日本有川岛真⁷⁾和河路由佳、渊野雄二郎、野本京子⁸⁾等的研究。关于留学生回国的研究, 陈焜旺的著作⁹⁾最为详细。但是陈焜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华侨、留学生在日本的革命运动, 对他们回国后的叙述则极少。

下面首先对建国初的留学生的定义进行一下说明。笔者参考中国政府教育部回国委员会对留学生所作的定义¹⁰⁾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留学生的统一组织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以下: 同学总会)¹¹⁾会员的范围¹²⁾, 本文将在日本的大学(包括大专)作为正规生毕业或肄业的中国大陆及台湾省籍的学生和华侨学生定义为留学生。另外, 将建国初期归国的、虽然没有在日本大学的学习经历、但在日本的高中或中专有过学习经验的归国华侨也作为参考。

留日学生回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50年—1952年, 为个别回国时期; 第二阶段: 1952年—1955年, 集体回国时期; 第三阶段: 1956年—1958年, 知识分子定向回国时期¹³⁾。本文使用的史料如下。在第一部分的对留学生的时代认识和归国理由进行分析的内容中, 主要参考了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中国留日学生报》¹⁴⁾, 为纪念中国建国初期回国的留日学生集体回国50周年编辑并记录着78名留日学生和华侨归国情况的纪念文集《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

大约有400留日华侨、留学生归国。根据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 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405—416页, 1953年至1957年归国留学生、华侨、劳工达到5000人。

- 5) 旅华留学联书曾葆盛(1950年)的、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 6) 郭平陈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况》,《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 2003年, 498—510页。
- 7) [日川岛《日本期北的留日学生向》《中国研究200月号1
- 8) [日河路由佳、渊野雄二郎、野本京战体制下农教育和中国人留学生[日财法统计200年。
- 9) 陈焜《日华留学生史[日日侨社200年。
- 10) 根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记录,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6—9页,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的归国留学生事责范围(1950年3月): ①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为进修目的出国者②华侨回国大学毕业生有专门技能者③国内高中毕业曾去国外大学肄业者④大学毕业在国外工作的知识分子
- 11) 从1946年5月22日成立时至1949年8月称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 1949年9月以后改称为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 12) 根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日本侨报社、2004年54—165页, 林连德《留日同学总会侧记》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 397—404页,《同学总会具备全国规模》[日《中华留日学生报》1947年5月15日等资、从1946年5月22日成立时至1966年5月会会员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及华侨
- 13) 郭平陈富《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状况》,《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 2003年, 498—510页。
- 14) 根据笔者确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机关1947年3月10日~1947年4月30日的名称叫《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 1947年5月1日~1948年1月30日叫《中华留日学生报》, 1948年5月4日以后的名称是《中国留日学生报》

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另外笔者还采访了17名战后初期回归祖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和积极推进留学生归国活动的同学总会原主席韩庆愈。

再有，关于建国以后中国的接待回国留学生政策的研究，鉴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既往研究极少。最近，中国外交部公开了1949年至1966年的外交部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教育部在同期送达外交部的档案及留学生归国时外交部与外国政府的交涉过程的相关档案。另外北京市档案馆也保存着教育部送达北京市政府的1949年至1969年的与促进留学生回国相关的档案，而回国后在北京就职的留学生的相关档案也公开了。除了这些档案资料，教育部的一部分相关资料也刊登在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里。本文希望利用以上资料，分析中国政府对待归国留日学生的态度等问题。

一，战争中在日本的体验和中国人意识

从战后初期到1950年代，留日学生、华侨作为战胜国国民留在日本从制度上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有上文叙述得如此众多的留日学生、华侨选择了离开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呢？认为作为中国人回国是理所当然的留日学生、华侨占大多数，但也有许多人是受到在日本的生活情况的影响而选择离开日本归国的。笔者以对当时的留日学生、华侨进行的采访调查和他们的一些回忆录为基础，通过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分析，来解析留日学生、华侨归国选择的根源。

1949年之后仍然留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华侨基本上是战前或战争期间去日本活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可以说战争期间的记忆对于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从笔者进行的采访和留日学生、华侨写的回忆录中，许多人提到，有很多日本人在战败前对从殖民地或沦陷区去日本的留日学生、华侨采取了歧视态度。

比如，留日华侨陈永华在《回国五十年》（2003）中回忆自己10岁以前的小学生活，就曾写到，“在日本垂水小学上小学时，有一次作业得了五重圈（即优等），同班的日本地主少爷看到后，竟然将我的作业本甩向空中，气得我全身发抖，但只是双手紧握拳头，咬紧牙关，不敢作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的学生不一样，是个中国人。日本的小孩骂中国人：‘支那人’、‘抢克弱（清国佬）’、‘南京虫’等，这是带有歧视和蔑视的称呼。日本人孩子的眼里，我们都是被他们瞧不起的‘支那人’”¹⁵⁾。在《回国五十年》（2003）的78人的回忆录中有13人写下了类似的语句。许多华侨虽然出生在日本、日语是他们的母语，有些华侨甚至连中文也不会说。可是在日本战败前，日本社会中的这种歧视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反而增强了在日华人的中国人意识，甚至使那些在日本出生、长大本来认为自己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华侨，在上学以后认识到了自己的劣等国民-中国人的身份，促使他们战后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团体的活动¹⁶⁾。以上的这些经历成为促使众多的留日学生、华侨在战后热切盼望回归祖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缺乏回国手段而未能实现¹⁷⁾。

虽然这些都是归国留日学生、华侨在五十余年以后按照记忆回想写下或者叙述的语句，有可能和当时的情况有一定差距。但是从这些词语里可以看出他们对当时情况的一种想法，所以本文使用这些资料作为参考。

15) 陈永华：《时局与命运》，《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291
29页

16) 对留日华侨学生陈富美的采访，2009年8月28日，北京市对留日华侨学生N的采访，2009年9月1日，北京市

17) 对留日学生的采访2007年11月2日北京市【日大善类《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在日华韩庆愈经历的‘另一个昭和史’》，【日《星火方正 燎原之火从方正开始》第3号，2006年12月1日，35—45页。

二, 战胜国民意识的形成和对国府的态度转变：1945年8月～1949年9月

1. 战后作为战胜国国民的喜悦

正如前文所述，留日学生及华侨在战争中被日本人称作“支那奴”、“抢克弱（清国佬）”，受到了很多不公平待遇。这种情况在日本战败后彻底改变了。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作为战胜国民可以得到特殊配给，有了优越于日本人的特权，也有了战胜国国民的意识¹⁸⁾。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守卫作为中国人的权利。例如，在战后的日本报纸上出现歧视中国人的词语时，一些留日学生、华侨就马上举行抗议活动，强调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再如，根据留日学生王家鼎的回忆，当住在金泽的留日学生们得知西尾港的400多名中国劳工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被监禁时，就伪装成盟国的监察员，去保卫中国劳工的权利，并帮助他们回国。还有，因为他们可以以盟国国民身份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到特别配给品，许多人从这一点上感到比日本人优越¹⁹⁾。当时大部分人的留日学生都有这种优越感²⁰⁾。

当时许多留日学生认为，抗战的胜利是国民党的功绩，崇拜国民党、蒋介石的风气在留日学生中广泛存在，很多人认为自己在日本地位的提高是托国民党的福。留日学生韩庆愈氏曾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战胜日本的是国民党。将中国人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也是蒋介石，在在日华人中的蒋介石的声望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也曾想过加入国民党”²¹⁾。1947年的《中国留日学生报》上就曾连续刊登了介绍蒋介石留学日本的报道，这可以看出当时留日学生对蒋介石的崇尚程度之高²²⁾。

2. 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和留日学生救济金

战后还留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华侨，多数是战争期间来到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国内的生活状况逐渐恶化，不仅是日本人、就连在日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也被强迫参加劳动，他们的生活十分困苦²³⁾。

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作为战胜国的国民，在日华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GHQ占领下的日本，作为从中国来的战胜国国民的留日学生可以得到特别配给，甚至一部分留日学生还得到了日本政府、国府的留学生救济金，过上了较为宽裕的生活²⁴⁾。但是，尚有众多的留日学生依然生活困苦，为了使这些留日学生能够继续学习，华侨们为贫困留日学生募捐奖学金，同学总会创立了留日学生奖学金，并把这些奖学金分发给贫困的留学生们²⁵⁾。

18) [日]川岛真：《过去的净化与将来的选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的历史认识尝围绕〈终战进的日中对话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31～51页》

19) 王家《告别日本六十年后的回忆》，《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50～62页。

20) 对留日华侨E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21) 大类善《滞留并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在日华韩庆愈经历的‘另一个昭和史’第2回》，《星火方正 燎原之火从方正开始》第4号，2007年5月25日，25～3页，对留日学生韩庆愈的采访2007年12月10日本东京都。

22) 《蒋主席的求学时代（一）》《留日学生旬报》1947年3月10日，《蒋主席的求学时代（二）》，《留日学生旬报》1947年3月30日。

23) 对朝留日学生D（1943年到中定）的采访、2007年11月24日、北京市。

24) 对留日学生B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焜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日本侨报社、2004年66～74页

1949年以后中国内战的情况向着中共胜利的方向发展，GHQ和日本政府对与亲中共的同学总会相关的留日学生的态度逐渐严厉，生活困难的留日学生也逐渐增多。再加上国府要求领救济金的留日学生必须在向蒋介石表忠心的誓约书上签名并盖章，如果拒绝则不能领取救济金²⁶⁾。

当时留日学生、华侨生活困难的原因，还有战后初期在日本就业困难的问题。1945年至1950年代初，战后被遗留在海外的日本人逐渐撤回日本。为此，日本人都很难找到工作，就更不用说没有专业技术和知识的留日学生和华侨了。虽然没有关于留日华侨失业的正式统计，但是从留日华侨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留日华侨黄惠英和甘丽娟的归国理由，就是父亲和自己的失业问题²⁷⁾。还有，留日华侨学生吴千代子毕业后，在参加就职活动时，就是因为“国籍是中国”的理由而失去就业机会²⁸⁾。

1953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计划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理由中，最多的就是“日本是‘外国’，我们觉得辛苦学到的知识，在日本没有发挥的余地。看到先辈（华侨）们的生活方式，有的开餐馆、有的开杂货铺，好不容易学到的知识都白白浪费了”²⁹⁾。

可以看出，当时作为外国人在日本想求得一个好的职业是很困难的，生活艰难是他们选择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担心曾经留学敌国的行为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留日学生的作为战胜国国民的优越感并没有持续多久。战争结束后，国府派遣驻日代表团（以下：代表团）赴日。因为当时尚不能设立大使馆，代表团就起到了驻日大使馆的作用。保护在日华人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所以留日学生不可避免地要与代表团接触。通过与代表团代表的交流，留日学生意识到了自身的身份问题。韩庆愈曾担任过同学总会主席，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之一去拜访过代表团。他回顾当时的经历时说留日学生不能选择国府的原因，正如代表团代表的如下发言，是因为国府不欢迎日伪政权派遣到日本的留学生。

“代表团对留学生代表说，你们是伪政权派来的，与傀儡一样。我很吃惊，听到这样的话，与说我们是‘日本间谍’没有什么不一样。国民党将从旧满州国来的留学生看作是‘中国的变节者’。至少在国民党中占主流的一伙人是那样看留日学生的。我们好不容易满心喜悦回归祖国的怀抱，但见到代表团代表时，却说我们是日本的合作者。本来是抱着回归祖国的热情来欢迎代表团的，但结果完全相反。之前还想过加入国民党，可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留学生们没有政治上嫌弃国民党，可他们却不被国民党欢迎。现在让我仍然不能忍受的就是，代表团的这种‘国民党是解放者，留学生是被解放者’的高高在上的态度”³⁰⁾。

从韩庆愈的这些言语中可以了解到，通过与代表团的接触，他们认识到留日学生被看成“背叛祖国里通外国的汉奸”的现实。

25) 《留日学生奖学金会成立》，载《中国留日学生报》1949年8月15日，王家鼎《告别日本六十年后的回忆》，《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50—62页。

26) 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74页

27) 黄惠《难忘的中学生活》，《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218—223页，甘丽《一衣带水半世情》，《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352—360页。

28) 吴千代《心中充满对还未见到的祖国的憧憬》，《中国留日学生报》1953年5月5日

29) 《希望回国大陆的理由》，《朝日新闻》1953年6月14日

30) 大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在日华韩庆经历的‘另一个昭和史’第2回》，《星火方正 燎原之火从方正开始》第4号，2007年5月25日，25—36页留日学生韩庆愈采访2007年12月10日本东京都。

这种现实，在后来国府发表的对留日学生的教育政策中也可以看得出。战后，国府虽然对日本的华侨留学生的生活也表示关心³¹⁾，对他们的归国要求也表示出给予协助的姿态，但由于怀疑对留日学生、华侨的思想认识，政府内部出现了需要派遣特别教育代表团，对日本各地的留日华侨、学生进行教育的呼声³²⁾。

其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7年1月8日发表了《留日学生召回办法》和《抗日战争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其中，对于归国的留日学生提出了以下要求，推出了对他们进行政治再教育的方针。

“前条登记学生，其曾在日本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应即研读国父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之命运，并在书内加以圈点，另作读书报告一份，于三十六年 月 日以前呈送留日学生甄审委员会审查，合格者由部按其原毕业学校性质程度发给证明书”³³⁾。

这个《留日学生召回办法》出台以后，留日学生中出现“不会强制留日学生归国吧？”的担心。他们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报》上刊登出来，表现出他们对强制归国的担忧³⁴⁾。

如此，诸如代表团成员把留日学生当作汉奸对待的态度，对留日归国学生实施特别教育政策等这些国府的行为，造成了留日学生对政府不信任、认为即使回国也不会受到重视的思想倾向。这些成为在国府迁往台湾以后，众多留日学生拒绝去国府统治的台湾的主要原因³⁵⁾。

4. 国府停止向日本派占领军问题

关于战后占领日本的办法，盟国之间曾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也要作为盟国的一员派遣占领军赴日。派军计划在1945年至1946年间进行了具体筹划。为中国军队进驻日本做准备，蒋介石也派遣了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赴日³⁶⁾。

听到中国将派遣占领军赴日的消息，留日学生和华侨兴奋异常。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向日本派遣占领军，会使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更加稳固。可以预想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日本生活的留日学生、华侨的地位也就会得到提升。因此，留日学生、华侨热切期盼着占领军的到来³⁷⁾。

但是，中国驻日占领军在正式进驻日本之前，因为内战爆发，被派往内战战场之后被解放军歼灭，向日本派军的计划未能实现³⁸⁾。这种结果让留日学生极其失望³⁹⁾。可以说这种不派兵赴日却开始内战的行为增进了留日学生、华侨对国府的反感。

31) 《在日我战俘侨胞待救》，载《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0月1日，《接运留日战俘侨胞返国 我代表六人抵东京》，载《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0月29日，《接运留日战俘侨胞返国 各有关机关已商定办法 利用日本侨回国回国空船接运》，载《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1月27日。

32) 留日华侨之特别教，《申报》1946年12月15日

33) 《留日学生召回办法》，抗日战争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李《中华留学教育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583—584页。

34) 《学生召问将如进》，《中华留日学生报》1947年5月1日。

35) 《在日本的中国人》，《朝日新闻》1953年6月14日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82—188页，《盟国将共同管制日本》，载《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0月1日，《四国共同占领日本 苏英中亦将派兵前往》，载《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0月15日。

37) 对留日学生B的采2007年11月23北京市。

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80—188页。

39) 对留日学生B的采2007年11月23北京市。

5.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华侨的态度

造成留日学生、华侨对国府认识恶化的另一事件，就是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对于台湾人的抗议游行，政府派军队镇压致使众多台湾人被杀害。事件在日本被广泛报道，因为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华侨中有很多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对事件极其关注⁴⁰⁾。

受到事件的冲击，华侨联合会副会长杨春松马上到代表团进行抗议。另外，他们还无视代表团的反对，在留日华侨总会里设立了“二·二八惨案处理委员会”，通过集会等活动控诉国府的暴行。以二·二八事件为契机，众多的台湾华侨对国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出现向中共倾斜的态势⁴¹⁾。同学总会机关报《留日学生旬报》也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在留日学生中，事件被广泛关注⁴²⁾。可以说此事件使留日学生、华侨对国府的认识进一步恶化。

6. 中国内战战况的发展与留日学生的思想变化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的征候显现。在留日学生、华侨中反对内战的意见根深蒂固⁴³⁾。但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向共产党军开始了全面进攻，国共内战正式爆发。一部分留日学生对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持反对态度，开始展开反内战运动⁴⁴⁾。但是，内战初期大部分留日学生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取胜，既然国民党政权不会改变，中国内战就与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⁴⁵⁾。

可是战况出乎预料，逐渐向共产党胜利的方向发展。留日学生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化，或者说开始出现希望中共胜利的言论是在1947年下半年⁴⁶⁾。一部分留日华侨于1947在日本创立中国通信社，在日本即时报道中国内战的战况⁴⁷⁾。

1948年以后，中国内战的战况越发向共产党胜利的方向转变，留日学生、华侨对内战的关注也日益高涨。另外，日本共产党也经常召开有关中国内战的演讲会，宣传国民党的腐败、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胜利情况等。当时，虽然亲国府的报纸也经常被送到留日学生手中，但同时《文汇报》、《工人日报》等报纸也接连不断的被寄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受这些报纸的影响，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⁴⁸⁾。

再者，战后共产主义的书籍在日本解禁，在日本共产党等的努力下，许多共产主义的相关书籍在日本出版。另外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书籍也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相继出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则成为众多留日学生的热读书目。受其影响，一部分留日学生开始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⁴⁹⁾。《中国留日学生报》也从

40) 对台籍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7年11月25日，中国北京市。

41) 杨国《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11页。

42) 《献给台湾省诸同学—关于台湾二八事》，《留日学生旬报》1947年3月30日。

43) 杨国《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记杨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11页。

44) 王毓《报效祖国 初衷未改》，《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4—49页。

45) 对留日学生韩庆愈采访2007年12月10日本东京都。

46) 历史转变》，《中华留日学生报》1947年7月15日。

47) 杨国《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记杨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11页。

48) 对留日学生B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49) 杨国《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记杨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11页，对留日学生B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对留日华侨凌星光

1948年11月开始，每期都对解放区的生活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报道，同学总会也转为支持共产党⁵⁰⁾。1949年5月1日的劳动节，同学总会的学生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参加了东京的劳动节大游行⁵¹⁾。通过这些行动也可以了解到，在1949年5月，同学总会已经有了明确的支持共产党的态度。

三，留日学生支持新中国的行动和回国潮的形成：1949年10月～1955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直属机关“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以下：回国委员会）⁵²⁾。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放了号召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的邀请。同时，周恩来总理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呼吁留学生回国⁵³⁾。1950年6月18日，同学总会收到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来信，内容为代表人民政府欢迎留日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后，一部分留日学生也分别收到了由教育部回国留学生招待处直接发来的回国邀请信。在邀请信中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您及其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⁵⁴⁾。

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一部分留日学生开始秘密回国。当时，日本政府与新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中国与日美两国转为敌对关系，留日学生回归祖国大陆，必须办理复杂的手续，而且需要利用各种途径才能回国⁵⁵⁾。所以，1949年至1952年间的归国留日学生人数只有102～300人⁵⁶⁾。

由于大部分留日学生是在战争期间就开始在日本的旧制中学就读的，这些学生1951年以后陆续从大学毕业。随着留日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加，希望回国的人也逐年递增，到1953年已经达到数百人的规模。另外，在华侨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希望回国。到1953年6月为止办完回国手续的中国人就达到807人之多⁵⁷⁾。而且，在战争期间从台湾去日本的劳工，由于难以在日本维持生计，又不愿意回到国府统治的台湾去，希望回到中国大陆的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⁵⁸⁾。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不公开的个别回国的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当时的局面了。

的采2007年12月12东京都。

50) 《中国留日学生报》1948年12月1日～1949年9月15日。

51) 王毓《报效祖国 初衷未改》，《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4—49页。

5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页

53) 许《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98～111页

54) 郭平、陈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况》，《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98—510页，焜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108页

55) 根据郭平陈富《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况》，《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98—510页，手东京华侨总会统一办理留学生本到东京华侨总填写申请书东京华侨总递送国民驻日代表团侨务处侨务无权扣留，必须送至盟总部由盟军总部批留学生出境理由只能写赴香港探亲旅游，由香港有关旅行社担保因为没有直接去中国的客也只能搭乘去中国的货船、或经香港或其他国家绕道回国。因此，费用非常高、也相当费时间。出国时的审查也特别严格。

56) 根据《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留学生情况》，李《中华留学教育史—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59—69页、1949年8月至1952年12中国教育部归国学生人数为102人根《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98—510与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 111页的资1953年前归国留日学华侨的人数为300人左右。

57) 《在日本的中国人》，《朝日新闻》1953年6月14日

58) 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405—416

1952年,中日两国已经开始就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撤回问题进行交涉⁵⁹⁾。日本政府也通过媒体报道了将派遣船只到中国迎接要撤回的日侨的消息,留日学生和华侨也希望能利用此次日侨撤回船实现他们的归国愿望。1952年12月、东京华侨总会等亲中国的团体就留日学生、华侨归国及送还中国俘虏遗骨的要求提交给日本政府和三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连络会),并向人民政府提出了要求。之后,人民政府便积极地在撤回日侨的谈判中将留日学生、华侨的归国问题和遗骨送还问题提出来。会谈的结果,是将中方提出的利用撤侨船前往中国的航程中搭载希望归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和遗骨这一要求委托给了日本红十字会,而具体的实施方法双方也秘密达成了口头谅解,日本政府外务省也对此表示了理解⁶⁰⁾。但是,在那之后由于国府反对等原因,在日中国人利用撤侨船回国一事未能实现⁶¹⁾。为此,留日学生、华侨举行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人民政府也进行了配合⁶²⁾。经过一连串的抗议活动,日本政府与国府进行交涉,国府的态度软化,同意准备在1953年6月出港的第四次撤侨船上搭乘中国留日学生、华侨⁶³⁾。

1953年6月27日由舞鹤港起航出港的第4次撤侨船成为留日学生、华侨的第1班归国船,551名留日学生、华侨实现了回国愿望。到1955年为止共有3178名留日学生、华侨归国,可以称之为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热潮时期⁶⁴⁾。

据日报报道1953年,留日学生、华侨,可以利用从中国撤回日侨的船集体回国的消息在留日学生、华侨中传开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据说许多不会说北京话的台湾籍华侨和不会说汉语的他们的日本妻子,众多的留日学生、华侨都笼罩在可以回到祖国大陆的喜悦之中⁶⁵⁾。为什么他们对回归祖国大陆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呢?他们当时又是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呢?以下来分析一下留日学生、华侨回国热潮的形成原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同学总会的表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同日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明书》,表示“我们要在新政府的领导下,……为能与祖国人民共同奋斗而兴奋”,表达了支持

59) 大泽武《围绕在华回国问题的战后日中关以日中民协的“三团体方式”为中心》,《亚洲研究》49(3), 2003年7月, 54-70页。

60) 吴日《1950年代日台关系的构以送还在日华遗骨交涉遗骨的“三团体方式”为中心》,《筑波法政》2006年3月, 153-176页, 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405-416, 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1953年4月28日-7月4日) 大泽武《围绕交涉在华日本人回国问题的战后日中关以日中民间交涉的“三团体方式”为中心》,《亚洲研究》49(3), 2003年7月, 54-70, 《与国府方面的关系微妙 日本政府也希望送还》,《朝日新闻》1953年5月21日

61) 《不能回国的中国人》, 载(日)《朝日新闻》1953年5月9日, 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405-416页。

62) 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1953年4月28日-7月4日) 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405-416页, 《谋求国家的帮助 希望归国者大会》,《朝日新闻》1953年5月23日,《中国人代表要求 为了归国问题去外务省》,《朝日新闻》1953年6月6日

63) 《国府表示理解 在日中国的送还问题 部仗日本红十字会的力量》,《朝日新闻》1953年6月2日,《中国人送还问题有结果 政府全权委托日本红十字会》,《朝日新闻》1953年6月7日。

64)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 2003年, 511-512页

65) 《充满喜悦的华侨公寓 奔赴梦中的光明祖国》,《国际新闻》1953年6月9日。

新中国的态度⁶⁶⁾。同学总会与各地同学会分别召开代表委员会，通过了支持新中国的决议⁶⁷⁾。10月10日是纪念中华民国建国的双十节，在1949年10月10日留日华侨总会、东京华侨联合会和留日同学总会本来计划共同召开庆祝双十节的大会，大家决定临时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⁶⁸⁾。这是留日学生与华侨的三个组织正式表明支持新中国的行动。

1950年3月25日，同学总会主席李桂山代表同学总会给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信，介绍了留日学生支持共产革命的活动情况，并表明了留日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意愿，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⁶⁹⁾。因为同学总会是各地留日学生联合的组织，同学总会明确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影响了日本全国留日学生的动向。

2. 人民政府的回国邀请与救济金

引起留日学生回国热潮的原因之一是人民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救济金。正如前文所述，战后留日学生生活贫困⁷⁰⁾。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在1952年9月给同学总会寄来了7900美元的救济金。之后，连续有救济金从中国寄来，仅1952年一年就寄来了5万美元。救济金的提供一直持续到1957年⁷¹⁾。同学总会为了发放救济金，设立了运营委员会专门负责。从1952年10月开始，不仅发给在大学学习的留日学生，还发给了一些正在读高中的华侨学生⁷²⁾。

1952年中国建国尚不到三年，正是国内建设需要资金的时期。同时，因为朝鲜战争还在继续，也是大量需要军费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民政府给贫困留日学生寄来救济金，可以说是让许多留日学生的内心感到温暖。许多留日学生都曾回忆他们对政府的援助感激之情。特别是对于曾受到过国府冷遇的留日学生来说，救济金正表明了人民政府欢迎留日学生的态度，更加刺激了留日学生和华侨的归国热情⁷³⁾。救济金可以说成为留日学生回国的促进剂。

3. 同学总会、华侨总会和中国媒体的宣传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同学总会、东京华侨总会等留学生、华侨组织表示了对新中国的支持。之后，留日学生、华侨的组织就积极展开了对新中国的政策、情况的宣传活动。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中国留日学生报》和东京华侨总会的机关报《东京华侨报》几乎每期都登载中国的消息，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之间宣传新中国⁷⁴⁾。特别是《中国留日学生报》，经常登载介绍中国大学教育的情况、回国留日学生来信等信息，介绍了在中国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的情况和回国留学生

6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明书》，] 《中国留日学生报》19411日

67) 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83页

68) 郭平陈富《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状况》，《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98—510页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84页。

69) 中国留学日本同学总会致毛泽东主席函（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105—00012—01、1950年3月25日）

70) 《依然情况百出 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中国留日学生报》1950年2月1日

71) 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101页

72) 《心中充满对还未见到的祖国的憧憬》，《中国留日学生报》1953年5月5日，《不必再多费宝贵的钱》，《中国留日学生报》1953年5月5日。

73) 对留日学、原同学总会主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陈旺《日本华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103—105页

74) 对留日学生原同学总会主席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对留日学生原同学总会主席、原《华侨报》编韩庆愈的采访，2007年12月10日本东京都。

快乐的大学生活⁷⁵⁾。生活艰苦的留日学生、由于经济原因不能上大学的华侨学生被这些报道所感动。这些宣传对于促进留日学生回国颇具效果⁷⁶⁾。

另外，当留日学生们收到已经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寄给同学总会朋友的书信时，有时也会将书信内容登载到《中国留日学生报》上⁷⁷⁾。留日学生从朋友的来信中了解中国的情况，其信赖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进而，人民政府为了在日本宣传新中国，当1953年7月第一批留日学生、华侨乘撤侨船归国时，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接见了乘船代表、当时的同学总会主席韩庆愈，拜托韩在日本创建宣传中国的中文报纸⁷⁸⁾。韩庆愈回到日本后，马上开始准备，争取留日华侨的支持，中文报纸《大地报》于1954年3月1日创刊。《大地报》一直刊行到1970年1月12日，为宣传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⁷⁹⁾。特别是连载了归国留日学生、华侨学生的来信、对他们的采访、以及介绍中国教育的现状等，都对留日学生、华侨的归国起到了促进作用⁸⁰⁾。

除以上介绍的在日本的媒体之外，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等中国媒体也向海外进行宣传活动，可以说1950年代，留日学生、华侨是生活在可以迅速得知中国的信息、新政策的环境里的。

4. 从中国回国的日本归国者的介绍

留日学生、华侨还有一个获得中国信息的信息源，那就是从中国大陆回国的日本归国者的活生生的叙述。1949年以前就有许多日本人陆续从中国大陆回到日本。这些人中也有从解放区回来的人。所以，希望了解共产党统治情况的留日学生及华侨也经常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聚会，听他们讲关于中共地区情况的介绍。这些信息也有一部分刊登在《中国留日学生报》上⁸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日本人集体归国是从1953年开始的。日本媒体对他们的归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许多媒体刊登了对他们的专题采访。其中有很多都介绍了新中国的生活，比如不需要顾虑有没有钱，那里的生活是平等、公平的，市场稳定商品丰富、强调了在中国的生活是幸福的⁸²⁾。进而，经常举行有归国者参加的座谈会，给留日学生、华侨说明中国的现状⁸³⁾。这些报道和经验之谈应该对留日学生、华侨的归国决定起到促进的作用。

75)《学习经费有保障的学生政策 归国者讲述的新中国现状》，《中国留日学生报》1949年10月11号《新中国的学生生活》，《中国留日学生报》1953年1月5号《国外华侨团结起来！爱护祖国保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中国留日学生报》1953年11月25日等

76) 对留日华侨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77)《归国同学的来信》，《中国留日学生报》1955年4月20日。

78) 大善《滞留并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在日华庆愈经历的‘另一个昭和史’第2回》，《星火方正 燎原之火从方正开始》第4号，2007年5月25日，25—36页。

79) 对留日学生韩庆愈采访2007年12月10日日本东京都。

80)《华侨学生在唐山》，《大》1955年6月1号《献出一切建设祖国 深感生为中国人的光荣——访问一个回国的留法学生》，《大》1955年6月1号《中国的大学教育》，《大》1955年7月1号等

81)《学习经费有保障的学生政策 归国者讲述的新中国现状》，《中国留日学生报》1949年10月11日

82)《访问归国者 在新中国结婚 不需要担心钱》，《国际新闻》1953年6月22号《稳定的人民生活 合理的小学教学方法》，《朝日》1953年3月6号《讲述建设的体验 归国者看到的矿山炼铁 作为社会的主人 就鹤冈的建设采访》，《日本与中国》1953年5月5号《今晨兴安丸到达舞鹤港 服装光鲜 异口同声称赞中共的归国者》，《朝日新闻》1954年9月27日晚刊。

83)《中国劳动者的生活 归国者座谈会》，《日本与中国》1953年4月20日。

四, 知識分子的回国潮：1956年

1953年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总数上升到2650人,可以说这是留日学生、华侨的集体回国潮的顶峰。那之后,1954年13人、1955年519人、与1953年相比回国人数大幅减少⁸⁴⁾。1954年以后回国人数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热切希望回国的人基本上都搭乘1953年的撤侨船回国了。另外,通过一部分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寄来的书信和媒体上的报道,归国者生活困难的消息也逐渐传到了日本。这也是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热下降的原因⁸⁵⁾。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了国家的建设,要求要切实注意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方法,并阐述了高级知识分子不足的状况⁸⁶⁾。参加该会议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为了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不足的问题,要号召吸引1万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回国⁸⁷⁾。为了落实这一提议,高教部拟定了《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并发表了在1956年内至少要争取1000名留学生归国的工作计划,要求各部门通力合作⁸⁸⁾,并希望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行促进留学生归国的活动⁸⁹⁾。

关于促进留日学生归国的活动,则制定了在1956年底前要争取150名留日学生回国的目标⁹⁰⁾。1956年2月同学总会接到了国务院侨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来信,委托同学总会配合争取留日学生归国的活动⁹¹⁾。

之后,同学总会和东京华侨总会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促进留日学生、华侨归国的宣传活动⁹²⁾。其盛况在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报》和《大地报》上也可以看到。

1956年3月1日的《中国留日学生报》上,刊登了1月14日周恩来总理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全文,传达了1月30日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盛况,并介绍了郭沫若在该会议上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为题所作的报告的内容等⁹³⁾。这些

84)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511页。

85) 对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北京市。

86) 周恩《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二)》,载《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87) 郭平陈富《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状况》,《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98—510页。

88) 《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李《中华留学教育史—1949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4—25页

89) 例根据《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的方针任务措施等意见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111—00239—01956年1月27日)》,《外交部关于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事给驻外使馆的指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118—00852—01956年3月1日10月4日)外交部从1956年1月开始就有关促进留学生归国的方法研讨,同年3月向中国驻外国大使馆、领事馆电下达了劝说留学生归国的命令。根据争取还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归国工作的有关文》(北京市档案馆档2—10—719512日19511)北京市政府建立了北京市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研讨并实促留学生归国工作的方法

90) 《外交部关于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事给驻外使馆的指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8—00852—05、1956年3月1910月4日)

91) 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405—416

92) 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405—416《祖国欢迎留日知识—勿多顾虑赶快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载《大地报》1956年4月21《同学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祖国建设》,《大地报》1956年5月1

93)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3月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期全国委员会第二回全体会议》,《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3月1《中国科学十年赶上世界水平

都是介绍新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可以把它看成是促进留日知识分子回国活动的开端。

同年4月1日和5月15日的《中国留日学生报》都是介绍新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可以把它看成是促进留日知识分子回归国专辑，刊登了《祖国需要你们 学好了就回国》、《勿多顾虑，赶快回国来参加建设》、《现在是回国的好机会 人才不足》、《在和平中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 期待海外精英做贡献》、《祖国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 把我们所学的技术贡献人民吧》、《光荣的事业等待着我们》等显赫的标题辉映着纸面。在这些报道中，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祖国是多么需要留日学生，号召他们尽快归国⁹⁴⁾。

还有，面向留日华侨发行的中文报纸《大地报》也在1956年4月21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祖国欢迎留日知识分子——勿多顾虑赶快回来参加建设》的文章，与《中国留日学生报》的号召相呼应⁹⁵⁾。在5月1日和11日的报纸上也刊登了相关文章，踊跃促进留日学生、华侨回国⁹⁶⁾。

正在日本的留学生、华侨组织的归国促进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为了迎接被中国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兴安丸号撤侨船也于1956年6月18日在舞鹤港待命出港⁹⁷⁾。留日学生、华侨为了实现利用兴安丸回国，6月15日的《中国留日学生报》从第1版到第4版再度刊登了回国特辑。通过这些努力，167名留日学生、华侨登上了6月18日出港的兴安丸，踏上了归国的旅途⁹⁸⁾。

同学总会的归国促进活动在这之后仍在继续。但一部分留日学生、华侨对于同学总会的归国促进活动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他们认为同学总会将许多留日学生和华侨送回国，让他们去过艰苦的生活，而同学总会的干部们却留在日本，过着富裕的生活。接受这种批评，当时的同学总会主席郭平坦决定作为留日学生的归国先锋带着妻子和孩子于1956年8月20日登上出港的兴安丸回国⁹⁹⁾。也许是被同学总会主席的行动所感动，乘坐8月20日出港的兴安丸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达到了220人之多¹⁰⁰⁾。

五，回国潮的减退和归国学生、華僑的身份問題：1957年以后

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回国热潮的推动下，一年就实现了420名留日学生、华侨归国，远远超出了人民政府设定的目标¹⁰¹⁾。到1956年为止，中国实现了号召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量回国的愿望。留学生回国促进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具体表现是，1956年11月30日负责促进留学生回国的部

钱学森教授论证其可能性》，《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3月1日。

94)《祖国需要你们 学好了就回国》，《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4月1日；吴《现在是归国的好机会 人才极度缺乏》，《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4月1日；谢秋《在和平中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 期待海外精英做贡献》，

《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4月1日；张《祖国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 把我们所学的技术贡献人民吧》，《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4月1日；林连王兆《光荣的事业等待着我们》，《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年5月15日等

95)《回国留学生来信述 祖国欢迎留日知识分子——勿多顾虑赶快回来参加建设》，《大地报》1956年4月21日。

96)《同学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来信祝贺 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祖国建设》，《大地报》1956年5月1日；《海外知识分子祖国欢迎你们》，《大》1956年5月11日；金慕《华侨青年指导的重要性》，《大地报》1956年5月11日。

97)《大批华侨回国参加建设》，《大地报》1956年6月11日。

98)《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 511页

99)对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市，郭平坦《强大祖国是我夙愿得偿》，《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 375—380页

100)《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511

101)《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511 512页。

门“回国委员会”宣布解散，该会工作转交给国务院专家局¹⁰²⁾。1957年2月12日国务院专家局制订了《1957年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计划》¹⁰³⁾。但是，受1957年6月8日开始的反右派运动的影响，归国留学生的人数剧减¹⁰⁴⁾。从1956年的420名，减少到1957年的145名、1958年的65名¹⁰⁵⁾。

回国潮减退的主要原因是经过1953年到1956年的回国潮和知识分子的回国高峰时期，战后仍留在日本的爱国学生和华侨大部分都已经回国。同时，正如上文所述，一些回国留日学生、华侨在国内生活困难，就业情况不好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这些情况都使在日本华人社会里的回国气氛大幅度减退。而回国留日学生、华侨人数的大幅度减少，还和中国政府对日本华侨的政策相关。

对于回国留日学生的就业安排问题，笔者已经通过分析200名建国初期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安排情况的档案和个别采访一些回国留学生进行了了解。从现有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与欧美各国的归国留学生相比，在分配工作方面没有看出对留日学生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对待，从敌国日本归国的行为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就业的障碍¹⁰⁶⁾。

由此可见，吸引留日学生、华侨回国是作为人民政府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的一环进行的，可是这一情况在1957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1957年2月12日国务院专家局发布的《1957年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在1957年以后除了一部分特殊人才以外，不再争取留日学生回国。如果有留日学生、华侨希望回国，必须通过东京华侨总会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¹⁰⁷⁾。从这条规定上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在1957年改变了欢迎留日学生、华侨归国的政策。据当时归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归国留日学生、华侨的水平低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和华侨，更因为1957年建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分子、大学生也已经逐渐增多，对海外知识分子的需求逐渐降低。而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华侨大部分是文科专业毕业的，更有许多华侨的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回国后的工作安排困难，所以争取留日学生、华侨的工作降温，这与东南亚的华侨的情况相近，并不是针对日本一个国家的¹⁰⁸⁾。

那么，对留学生的工作情况与其后的命运影响较大的是什么呢？根据笔者所进行的对归国留日学生、华侨的调查采访，他们都强调了“历史”和“海外关系”的问题。即，归国之后留学生所写的自传及之后的政治审查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海外关系”，是指在海外有亲戚或朋友，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海外关系”问题，不仅是日本，可以说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所有留学生和华侨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个别的特殊情况以外，几乎全部居住在北京的回国留学生和华侨以“海外关系”为由被下放¹⁰⁹⁾。可以说“海外关系”影响到了从海外归国的所有人。

与“海外关系”问题相比，“历史”问题具有鲜明的个人差别。特别使留日学生痛苦的，恐怕就是“历史”问题了。“历史”问题，是指其本人或者亲属朋友在过去曾经有过反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的行为，或者榨取过无产阶级血汗等。

102) 《国务院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工作交由国务院专家局管理的通知》，李《中华留学教育史—1949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8

103) 《1957年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计划》（中华日民共和国外交部档111-00251-01957年2月4-8月20日）

104) 《取留学生归国及留学生归国后的状况等文件》（中国北京市档案馆档案2-20-331959年-1960年）。

105)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 511-512页

106) 拙论《留日学生的选择 “爱国”与“历史”》，刘杰、川岛真《1945年的历史认识—尝试围绕〈终战〉进行的日中对话》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203-232页

107) 《1957年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251-02，1957年2月4日-8月20日）

108) 对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市，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109) 对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市，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回国五十年》（2003）的78名归国留日学生、华侨的归国回忆录中，介绍了71名归国后的工作情况。从笔者对他们归国后被分配的第一份工作进行的简单统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6名归国留学生中，有14名（53.8%）就业于学校、研究机关等从事研究工作，而使用日语做与日本相关的交流、外事、信息收集工作的只有5名（19.2%）。45名归国华侨中，有18名（40%）使用日语就职于与日本相关的交流、外事、信息收集工作，而在学校、研究机关等担任技术职务的为13名（28.9%）。归国华侨比留学生更多地从事对日交流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审查的结果¹¹⁰⁾。归国留日华侨中的多数是还未从学校毕业就回国的，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亲属和学校以外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与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人有过任何关系。因为家属都在日本生活，与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人也极少有关系，所以，政治审查中被查出“历史”问题的就很少，因而可以从事与日本相关的外交等交流工作。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日语翻译而知名的林丽韞、黄世明等建国初期活跃在对日外交领域的日语翻译，大都是留日华侨出身。从日本归国的华侨能够活跃于重要的外交场合的事实说明，从日本回国的行为本身并不是影响他们在中国发展的原因。

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能充分发挥自己所学的机会不多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因为留日学生大部分是从台湾、旧满州国、汪伪政权等日本殖民地或日伪政权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所以其中许多留学生及家属与殖民地政府、日伪政权有些微关系的可能性极大。再有，因为在战争期间就在日本留学，有不少人在回国之前曾在日本有过工作经历。由于工作关系，其中许多人难免有与包括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在内的国民党的有关机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有过接触。这些问题在归国后的政治审查时都要进行调查并记入档案。按中国的人事工作的惯例，档案中记述有“历史”问题的，或记载着政治审查未能得出结论的，原则上是不能从事与外事有关的或保密工作的。所以，多数归国留日学生建国初期未能从事使用日语的与日本相关的工作。另外，从事研究工作的归国留学生，如果所从事的研究被定为绝密时，原则上也要从该工作中退出¹¹¹⁾。

虽然归国留学生的人事档案基本上尚未公开，但笔者在北京市档案馆已经公开的归国留学生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住在北京市的归国留学生的两份档案《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调查表》¹¹²⁾和《北京市回国留学生调查票》¹¹³⁾。这两份资料中，记录了关于住在北京市的一些归国留学生的简历、家庭构成、收入、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结果等。这些资料不是留学生本人写的，而是留学生的单位制作的。所以，还记录了单位对留学生的政治审查结果、对回国后的政治态度的评语等。《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调查表》中，很多留学生在1963年以前没有给出政审结果。其理由大多是“无法调查”。比如，在1953年从日本归国的洪清淡的政治审查结果栏中是这样写的：

“该同志的政治历史，没有结论，原因是无法调查，他原籍是台湾，留学日本，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爱人是日本人，岳父母内兄内弟均在日本，父亲、哥哥、姐姐、妹妹现在台湾¹¹⁴⁾”。

虽然归国留学生中多数本人并没有问题，但正如洪清淡，因为主要社会关系在海外或台湾，中国政府无法调查，“历史”方面的政审也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参加工作时就受到了政审结果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改善。1970年代以后，在政府的对日工作的活动中看到了很多1950年代回国的留日学生的身影。

真因为如上分析有“海外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影响，许多归国留日学生、华侨在1957年的反右

110) 对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市，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111) 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112) 《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调查表》（北京市档案馆档007-001-00151963年1月1日—12月31日）

113) 北京市回国留学生调查票》（北京市档案馆档007-001-00141962年1月1日—12月31日）。

114) 《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调查表》（北京市档案馆档007-001-00151963年1月1日—12月31日）

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迫害，这也就导致改革开放后，一半以上的归国留日学生、华侨选择了离开祖国大陆回到日本或到其他国家、地区生活。这主要是因为祖国对他们的爱国热情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无法发挥自身的能力，为祖国的国家建设做贡献的愿望没能得以实现等原因造成的¹¹⁵⁾。

結 語

战后，大批留日学生、华侨没有立即回国是因为没有完成学业，中国内战爆发等原因。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担心曾经在日本留学和生活过的经历会给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这也是在1949年以后还有很多中国人仍留在日本的原因之一。

1949年至1950年代，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以及受亲中共媒体、从中国回来的日本归国者对中国的宣传及介绍的影响，在日本怀有热切归国愿望的留日学生和华侨非常多。特别是1953年的留日学生、华侨的大量归国可以说是集体回国潮¹¹⁶⁾。留日学生、华侨离开日本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前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为了摆脱战后日本的艰苦生活等。这些经历和战后成为战胜国民的优越感也使留日学生、华侨的中国人意识增强。

留日学生、华侨归国时，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地区。众多归国的留日学生最初并没有选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了解，留日学生和华侨在战后初期对国府是赞不绝口，对蒋介石也是绝对崇拜的。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国府统治的地区的最大理由是因为战后国府的官僚把留日学生看成“汉奸”的一部分，不大愿意接受他们。这些行为使留日学生认为，即使去了台湾，国府也会关闭他们“成为政府官员的仕途大门”¹¹⁷⁾。再加上在内战中暴露出来的国府的腐败、对国民镇压的态度、中止向日本派兵等，都成为留日学生反感国府的原因。

进而，最终形成留日学生、华侨集体回国热潮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中国政府通过留日学生及华侨团体宣传中国的现状及政策所起的作用了。因为同学总会、东京华侨总会等团体受到留日学生及华侨的广泛支持，所以，通过这些团体的宣传活动，可以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本文的论述还可以了解，集体回国潮是战后在留日学生、华侨中对中国进行正面宣传，对爱国学生和华侨的热情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通过中国政府的宣传，留日学生、华侨了解到了政府希望留学生和华侨回国的热切愿望。这也使他们摆脱了对历史问题的担忧，成为促成回国潮的原因之一。众多的留日学生、华侨怀着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又影响到其他的留日学生，于是就形成了集团回国潮。很多留日学生在回国之前，对于共产主义中国具有很强的憧憬，其中一部分留日学生、华侨对于现实的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比如，笔者进行的调查采访中，也有以“希望免费上大学”、“想去苏联留学”为由回国的¹¹⁸⁾。还有很多华侨以“因为在日本不能就业，生活困难，想回到所有劳动人民都平等的中国过好日子”的理由选择了回国¹¹⁹⁾。

对留日学生在中国工作方面影响最大的是与“海外关系”和“历史”问题相关的政治审查。由于受旧日

115)曹石堂《祖国、不要怀疑我！-从政治犯到大学教授的“兵队太郎”的战后》日本经济评论，2006。
对留日学生B的采2007年11月23北京市

116)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北京市。对留日学生B的采2007年11月23北京市。

117)《在日本的中国人》，《朝日新闻》1953年6月14日

118)对留日华侨E的采2007年11月23北京对留日华侨G的采访，2007年11月26日，北京市。

119)对留日学生韩庆愈采访2007年12月10日本东京都。

本殖民地政府、日伪政权的派遣，亲戚、朋友等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阻碍了他们在中国职场上的发展方面也是不争的事实。背负着这样的难以确认的“海外关系”和“历史”问题的留日学生、华侨从1957年以后的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长时间里受到了种种迫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个别例外，几乎都被强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有过艰苦生活的经历¹²⁰⁾。这一点，其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归国留学生、华侨也几乎相同。但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海外关系”及“历史”又成为给中国的外交活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要素之一，这使他们得以更多地活跃在中央政府及各种对外交流场合。例如，在中日系正常化谈判时，中国的日语人才显著不足，1950年代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华侨的很多人被借调，参与事前准备，在与日本政府、财界、媒体等有关方面进行交流时担任翻译工作。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的政府及民间的访日代表团的翻译中，也有很多人是1950年代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华侨¹²¹⁾。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并没有把留日学生和华侨在抗战中在日本留学和生活的经历视为问题。反而为了改善中日关系，起用了很多回国留日学生和华侨。这就表明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追究与日本的战争历史。

而使留日学生、华侨回国以后的发展在到文革为止的长时间受到限制的“海外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后又为他们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在长时间不愿意与人提及的“海外关系”成为他们发展的有利材料。这也让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强调自己的日本出身、与日本的关系¹²²⁾。

120)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121) 对留日学生B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122)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对留日学生郭平坦的采访20012日，中国北京市，对留日华侨曾葆盛的采访，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

전후 초 일본 체류 중국유학생 및 화교의 선택과 국가적 일체감

- 중일 양국에서 생활하는 중국인 -

왕쉐핑 (간사이대학)

〈목 차〉

서 론

1. 전쟁기간 일본에서의 경험과 중국인의 의식
2. 승전국 국민의식의 형성과 국부의 태도변화 : 1945년8월 ~1949년 9월
3. 신중국 지지와 함께 붙어 닦친 귀국 열풍 : 1949년 10월~ 1955년
4. 지식인들의 귀국 열풍 : 1956년
5. 귀국열기 냉각과 귀국 유학생 및 화교들의 신분 문제 : 1957년 이후
결 론

서 문

1945년8월, 2차 세계대전이 종식되었지만 아직도 많은 수의 중국인들은 일본영토를 떠나지 않았다. 당시 일본에 살았던 중국인들에 관한 정확한 통계수치는 찾을 수 없지만 GHQ (연합군 최고사령부) 의 송환수치를 근거로 추정이 가능하다. 전후 일본에서 본국으로 송환된 외국인(대만인 포함) 통계수치를 근거해 보면 전쟁이 끝날 당시 일본에 거주하고 있던 중국인은 적어도 8만 5692명에 달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동시에 이 자료를 근거로 1945년부터 1948년까지 대만인을 포함한 대부분의 중국인들 (6만 5885명) 이 귀국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¹⁾. 하지만 1949년 이후에도 여전히 2만에서 4만 명 가량의 중국인이 일본에서 생활했다.²⁾

1949년10월1일, 중화인민공화국 (이하 : 중국) 이 건국되었다. 당시 일본에 있던 중국 유학생들의 절대다수는 전쟁 당시 대만, 구 만주, 중국대륙의 피 점령지구에서 일본으로 건너간 자비 유학생과 왕위정권(汪偽政權) 등 일본의 괴뢰정권이나 구 식민지 정부가 일본에 파견한 국비 유학생이었다.³⁾

유학생을 포함해 당시 일본에 거주하던 중국인들에게는 4가지 선택권이 주어졌다. 첫째, 중화

1) (日) 竹治, 中村隆英 감수 : 《GHQ일본 점령사 제16권 외국인사무처리》 (日일본도서중, 1996년, 24.

2) (日) 竹治, 中村隆英 감수 : 《GHQ일본 점령사 제16권 외국인사무처리》 일본도서중, 199, 241949년 19807명의 중국인이 일본에 거주함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1-쪽, 1950년대 4만 명 가량의 화교가 일본에서 생활함

3) [日] 河路由佳거우차오 사건 이 (1937년-1945년의 제일 중국》, [日] 河路由, 野雄, 野本京子 : 전시체제 하의농업교육과 중국인 유학》 [日농림통계협, 2003년, 41-5쪽, 천쿤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일본 교보, 2004년 30~3쪽

인민공화국 정부 (이하 : 인민정부) 통치하의 중국 대륙으로 돌아가는 것. 둘째, 중화민국정부 (이하 : 국부国府) 통치하의 대만으로 돌아가는 것. 셋째, 일본에 남는 것. 넷째, 일본 이외의 국가나 지역으로 거주지를 옮기는 것.

결론부터 말하자면 1949년에서 1958년까지, 총 4천에서5천 명의 일본체류 중국유학생과 화교, 노동자들이 조국을 선택했다. 4) 이 시기에 귀국했던 중국인들 중에는 대만에 적을 둔 화교와 유학생이 3천 명 정도 포함되어 있었다. 5) 덧붙여 1953년에서1955년까지 일본에 체류하고 있던 유학생과 화교가 대거 조국으로 귀국하면서 이 기간 동안 3178명이 귀국했다.6)

대만에 적을 둔 유학생들과 화교 등 중국인들이 왜 인민정부 통치하의 중국대륙을 선택했을까? 유학생과 화교들에게 귀국열풍이 일어난 이유는 무엇일까?

전후 상황의 변화, 그들의 역사관과 신분의 변화가 이런 상황과 관계가 있을까? 또 중국정부는 적대국이었던 일본에서 귀국한 국민을 어떻게 대했을까? 적대국인 일본에서 생활하던 중국 유학생들에게 중국정부가 보여준 대우가 그들의 결정에 영향을 미쳤을까? 귀국 후의 처지가 그들의 민족의식에 영향을 미쳤을까?

본고는 이런 의문점에서 출발하여 1949년부터 1958년까지 귀국 유학생의 귀국과정을 분석하고, 전후 그들이 오랜 기간 일본에 계속 머물렀던 원인과 귀국을 결정한 원인을 분석하고자 한다. 아울러 시기별로 국가에 대한 정체성 및 민족의식에 대해서 논의하고자 한다. 이를 위해 본고는 1949년 이전 상황을 부분적으로 언급했다.

항전기간부터 일본에 건너온 중국 유학생에 관해 일본의 有川島真, 7)河路由佳, 渊野雄二郎, 野本京子8)등이 연구했다. 유학생의 귀국 연구는 천쿤왕(陈焜旺)의 저서에 가장 상세하게 기록되어 있다.9) 그러나 천쿤왕의 연구는 주로 일본에서의 화교와 유학생의 혁명운동을 주로 다루었고 귀국 후의 부분은 극히 적다.

우선 건국 초기의 유학생의 정의는 다음과 같다. 필자는 중국 정부교육부 귀국위원회의 유학생 정의를 참고하여10) 재일 중국 유학생조직인 중국유일(留日)동학총회 (이하 : 동학총회) 11)회

4)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1-쪽, 1949년부터 1958년까지 약 4천 명의 재일 화교와 유학생들이 귀국. 귀평 (동학총회 전 회장) : 《동학 회 우리를 귀국의 길로 인도한》 전국정협北京,上海,天津,福정협 문사자료위원 편찬 : 《건국 초 유학생 귀국 기록중국문사출판, 1999년405-41, 195년부터195년까지 귀국유학생, 화교, 노동자 포함 총 5천명재 일 화교, 유학생 친목회 회장 쯔바오성(曾葆盛)195년 귀인터뷰,2007년11月23日,北京市.

5) 귀평단, 천푸메이 : 《건국 초기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귀국상황》,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498-51쪽

6) [日] 川 : 《일본 점령 화북지방의 재일 유학생 동향》, [日] 중국연구월200,1쪽 연재

7) [日] 河路由佳,野雄, 野本京子 : 전시체 하의농업교과중국인유학 [日재단법인 농림통계협200년.

8) 천쿤왕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日侨社200.

9) 정무원 문교위원 유학생 귀국업무 처리위원회 제2차 회의(회의록》, 리타오 편 : 중화유학교육사—194년 이고등교육출판, 2000년, 6-, 유학생 귀국업무 처리위원회의 귀국유학생 업무 책임범위 (1950년3월) : ①국내외의 전문대 이상 졸업자가 진학을 목적으로 출국하는 자.귀국한 회교 중 대졸자로 전문기능보유자 국내에서 고등학교를 졸업하고 해외대학을 이수한 자대학졸업 후 해외에서 근무한 경험이 있는 해외에서 일한 지식인

10) 1946년5月22日 립되어1949년8까지중화유일동학총라 불렀, 1949년9月 이후중국유일동학총로 개칭되었다

11) 천쿤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일본교보2004년54-16린렌재일 동학 방청기》 전국정과北,上,天,福정협 문사자료위원 : 건국 초기 유학생 귀국 기록중국문사출판, 1999년, 397-40, 동학총회 전국규모 갖추》 [日중화유일학성》 1947년5月15 등 자료.1946년5月22에 설립되어1966년5까지 이 위원회의 회원은중국대과대 유학생과 화였.

원들 중에서 12)일본 대학 (전문대학 포함) 을 정규 졸업했거나 이수한 중국 대륙 및 대만 적을 가진 학생 그리고 화교학생을 유학생으로 정의했다. 그밖에 비록 일본에서 대학을 다니지는 않았지만 일본의 중학교나 고등학교에서 공부한 경험이 있는 건국 초기 귀국한 화교도 참고대상에 포함시켰다.

일본의 유학생 귀국은 크게 3단계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다. 1단계는 1950년-1952년으로 개별 귀국시기이다. 2단계는 1952년-1955년으로 집단귀국시기이다. 3단계는 1956년-1958년으로 지식인들의 귀국 시기이다.¹³⁾ 참고문헌은 다음과 같다. 첫 번째 부분인 유학생의 시대적 인식과 귀국 이유에 대한 내용은 주로 동학총회의 기관보 《중국유일학생보(中国留日学生报)》¹⁴⁾와 중국 건국 초기 귀국한 유학생들의 집단귀국 50주년을 기념하기 위해 78명의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을 기록하고 편집한 기념문집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사, 2003년) 을 참고했다. 그밖에 필자는 17명의 전후 초기 조국으로 귀국한 일본 유학생 및 화교와 유학생들의 귀국을 적극 지원한 동학총회의 (전)회장 한칭위(韩庆愈)를 취재했다.

또 건국 이후 중국의 귀국 유학생 관리정책에 관한 연구는 문헌자료의 부족으로 연구가 미흡하다. 최근 중국 외교부는 1949년부터 1966년까지의 외교부 문서자료를 공개했는데, 여기에는 교육부가 당시 외교부에 송달한 문서와 유학생 귀국 당시 외교부와 외국정부의 교섭과정이 담겨 있는 문서가 포함되어 있다. 그밖에 베이징시 당안관(档案馆)도 교육부가 베이징시 정부에 송달한 1949년부터 1969년까지의 유학생 귀국을 촉진하는 관련 문서와 귀국 후 베이징에 취업한 유학생들의 관련 문서도 공개되었다. 이런 문서자료 외에 리타오(李滔)가 주편한 《중화유학교육사록—1949년 이후》 (고등교육출판사, 2000년) 에 교육부의 관련 자료가 부분 포함되어 있다. 본고는 상기 자료를 기반으로 중국 정부가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을 대하는 태도 등에 관해 분석했다.

1. 전쟁기간 일본에서의 경험과 중국인의 의식

전후 초기부터 1950년까지 승전국의 국민으로써 제도적으로 아무런 문제가 없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왜 그렇게 많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일본을 떠나 조국으로 돌아왔을까? 중국인으로써 어찌 보면 귀국은 당연한 것이지만 일본에서의 생활에 영향을 받아 귀국을 선택한 사람이 많은 것으로 보여진다. 따라서 필자는 당시의 일본 유학생과 화교를 대상으로 한 인터뷰와 그들의 일부 회고록을 토대로 당시 사회상황을 분석하고 일본 유학생과 화교가 귀국을 선택한 원인을 분석하고자 한다.

12) 귀평탄, 천푸메: 《건국 초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귀국 현황》,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498-510쪽

13) 필자 가 확인해본 결과 중국의 재일 유학생 동학총회의 기관보는 1947년3월10일~1947년4월30일까지의 명칭이 중화민국유일학생순》였고, 1947년5월1일~1948년1월30일까지는중화유일학생》라 불렸다. 1948년5월4일 이후의 명칭은 중국유일학생》이

14) 천용: 시국과 운》,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291-29쪽

1949년 이후 계속 일본에 머물렀던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다수가 전쟁 전 혹은 전쟁 기간 일본에 갔거나 일본에서 태어나고 자란 사람들이다. 즉 전쟁기간의 기억이 그들에게 상당한 영향을 미쳤다고 할 수 있다. 필자의 인터뷰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회고록을 보면 일본인들이 전쟁에서 패하기 이전 식민지 혹은 피 점령지구에서 일본에 온 유학생이나 화교들을 차별했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예를 들면 재일 화교 천용화(陈永华)는 《회고 50년》(2003)에서 10세 이전 초등학교 시절을 이렇게 회고했다. ‘일본 다루미(垂水) 소학교를 다닐 때 숙제를 5점(매우 잘함) 받은 적이 있었다. 같은 반의 일본 지주의 손자가 이를 보더니 내 숙제공책을 뺏어 허공으로 던져버렸다. 나는 화가 나서 몸을 부들부들 떨렸지만 두 주먹을 불끈 쥐고 이를 악무는 것 외에는 아무런 소리도 내지 못했다. 그때 나는 나와 다른 친구들이 다르다는 것을 깨달았다. 나는 중국인이었다. 일본 아이들은 중국인을 ‘지나인’, ‘창코로(청국노)’, ‘남정충’이라고 놀렸다. 모두 중국인을 멸시하고 차별하는 말들이었다. 일본 아이들 눈에는 우리가 하찮은 ‘지나인’이었다.’¹⁵⁾ 《회고 50년》

(2003)에는 78명의 회고록이 수록되어 있는데 그 중 13명이 유사한 표현을 썼다. 많은 화교들이 일본에서 태어났고 일본어가 그들의 모국어이며 일부 화교는 아예 중국어를 할 줄 모른다. 그러나 일본이 패전하기 전까지 일본사회에서 중국인을 차별하는 이런 행위는 중국인으로서의 의식을 더 강화시켰다. 심지어 일본에서 태어나고 자라 자신이 일본사람과 아무런 차이가 없다고 느끼던 화교들도 초등학교에 입학하면서 자신은 열등국민, 즉 중국인이라는 신분을 깨닫게 되었고 이런 이유 때문에 전후 그들은 더욱 적극적으로 중국 유학생 단체활동에 참여했다.¹⁶⁾ 이것이 또한 많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귀국을 열렬히 희망하게 되었던 중요한 요인이기도 하다. 그러나 열정을 뒷받침해줄 만한 귀국 방법이 없어 실현하지 못했다.¹⁷⁾

이는 귀국유학생과 화교가 50여 년이 지난 후 당시의 기억을 회상한 것이기 때문에 당시의 실제 상황과 다소 차이가 있을 수 있다. 하지만 그들이 당시에 어떤 생각을 하고 있었는지는 충분히 알 수 있다. 따라서 본고는 이런 자료를 참고자료로 사용했다.

2. 승전국 국민의식의 형성과 국부의 태도변화 : 1945년8월~1949년9월

(1) 전후 승전국 국민으로서의 회열

앞에서 언급했듯이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일본에서 ‘지나인’, ‘창코로(청국노)’라고 불리며 차별 대우를 받았다. 그러나 일본이 전쟁에서 패하면서 이런 상황은 완전히 바뀌었다. 유학생과 화교는 승전국 국민으로써 특별 배급을 받았다. 일본인 보다 우월한 특권이 생겨났고 승전국 국민으로

15) 재일 유학생 천푸메이 인터뷰 2009년 8월 28일, 北京市. 재일 유학생 N 인터뷰, 2009년 9월 1일, 北京市. 등.

16) 재일 유학생 B 인터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 [日] : 일본에 거주하는 중국인-재일 화교 한칭유가 경험한 또 다른 쇼와 역》, [日] 《星火方正-燎原之方始》 第, 2006년 12월 1일, 35-4쪽에 기재

17) [日] 島 : 과의정와미의선중국인, 대만인 유학》 杰, 岛真 《1945의认-终을 둘러싼 중일대화 시京出, 2009年, 31-5쪽 王家鼎 : 60년 기과의 이》,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年, 50-6쪽

씨의 의식도 생겨났다. 18) 동시에 그들은 중국인으로써의 권리를 지키기 시작했다. 예를 들면 일본 신문에 중국인을 무시하는 내용이 실리면 일부 유학생이나 화교들은 항의시위를 벌이며 중국인으로써의 존엄을 강조했다.

또 당시 일본 유학생이었던 왕자딩(王家鼎)의 기억에 따르면 가나자와(金澤)에 살고 있던 유학생들이 니시오(西尾) 항구의 400여명의 중국 노동자들이 일본인들과 싸워 수감됐다는 소식을 듣고 우방국의 감찰원으로 위장하고 가서 중국 노동자들의 권리를 보호하고 그들의 귀국을 도왔다고 한다. 그 밖에도 우방국의 국민신분으로 일본정부로부터 특별 배급품을 받았고 이 때문에 일본인보다 더 우월하다고 느끼는 사람도 많았고, 19) 이는 당시 대부분의 유학생들이 느낄 수 있었던 우월감이었다. 20)

당시 많은 유학생들은 항전의 승리는 국민당의 공로라 여겨 국민당과 장제스(蔣介石)를 숭배하는 분위기가 유학생들 사이에 널리 퍼졌다. 그리고 일본에서의 자신의 신분상승도 모두 국민당이 있었기에 가능했다고 여겼다. 유학생 한칭위는 당시를 이렇게 회상했다. ‘나는 일본을 이긴 것이 국민당이라고 생각했다. 중국인을 일본인들의 손아귀에서 해방시킨 것도 장제스라고 생각했다. 일본에 있는 중국인들 사이에서 장제스의 위상은 실로 대단했다. 그래서 국민당에 가입할까 생각한 적도 있었다.’ 21) 1947년 《중국유일학생보》에는 과거 장제스가 일본을 유학했던 기사를 연속 시리즈로 실었다. 당시 유학생들이 장제스를 얼마나 숭배했는지 알 수 있는 단면이다. 22)

(2) 일본에서의 고된 생활과 유학생들의 구호금

전후 일본에 남아있던 유학생과 화교들 중에는 전쟁 중에 일본에 온 경우가 많았다. 태평양전쟁이 발발한 후 일본 국내상황이 어려워지면서 일본인들뿐만 아니라 일본에 유학하고 있는 외국 유학생들까지도 강제노동에 참여하게 되어 생활은 매우 고달프고 힘들었다.

1945년 일본이 전쟁에서 패하자 중국은 승전국이 되었다. 승전국의 국민으로서 일본에 있는 중국인들의 생활은 개선되었고, 특히 GHQ가 점령하고 있는 일본에서 중국 유학생들은 특별배급을 받았다. 심지어 일부 유학생들은 일본 정부와 국부로부터 유학생 구호금을 받아 여유 있는 생활을 보냈다. 그러나 여전히 생활이 어려운 유학생들이 많았고 이들이 학업을 지속할 수 있도록 화교들은 장학금을 모금해 주기도 하고 동학총회는 유학생 장학금을 설립하여 어려운 유학생들을 도왔다. 23)

1949년 이후 중국 내전은 중공의 승리로 가닥을 잡아가고 있었다. GHQ와 일본정부는 친 중

18) 재일 유학생 인터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

19) [日: 일본에 거주하는중국인-재일화교 한칭위가 경험한 또 다른 쇼와 역사第2回] [日《星火方正》第, 2007년 5월 25일, 25-3쪽 기재. 재일 유학생 한칭위 인터뷰, 2007년 12월 10일, 日.

20) 장주의時代(一)》 [日유일학생순] 1947년 3월 10일 게재, 장주석時代(二)》 [日유일학생순] 1947년 3월 30일 게재.

21) 조선 재일 유학생D (1943년 중국에 거주인 인터뷰, 2007년 11월 24일, 北京市)

22) 재일 유학생 인터뷰, 2007년 11월 23, 北京市 천쿤: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일본교보, 2004년 66-7

23) 재일 유학생 장학금 설》, 중국유일학생》 1949년 8월 15일 게재왕자60년 후 기억과의 이》,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50-6쪽

공 성향의 동학총회와 관련된 유학생들에게 점차 엄격한 잣대를 들이댔으며, 생활이 어려운 유학생들이 점점 늘어났다. 게다가 국부는 구호금을 받는 유학생들에게 장제스에게 충성을 맹세하는 서약서에 사인과 도장을 찍으라고 강요했고 거절할 경우 장학금을 받을 수 없다고 했다.²⁴⁾

당시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생활이 어려웠던 원인 중의 하나는 전후 초기 일본의 취업상황이 어려웠기 때문이다. 1945년에서 1950년대 초 사이 전쟁이 끝나고 해외에 머물던 일본인들이 고국으로 돌아오면서 일자리가 부족해졌다. 일본인들이 취직이 어려워지자 전문기술이나 지식이 부족했던 유학생들이나 화교들에게 취직은 그야말로 하늘의 별 따기였다. 비록 당시 유학생들의 실업과 관련된 공식적인 통계자료는 없지만 그들은 당시 상황을 기억하고 있다. 예를 들면 일본에 유학중인 화교 황후이잉(黃惠永)과 간리취안(甘麗娟)의 귀국이유는 아버지와 자신의 실업 때문이었다.²⁵⁾ 그밖에 일본에 유학중인 화교 吳千代子는 졸업 후 취업을 시도했지만 ‘국적이 중국’이라는 이유로 번번히 실패했다.²⁶⁾

1953년 《아사히신문》이 취재한 귀국을 준비한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이유 중 가장 많은 것이 ‘일본은 ‘외국’이라서 힘들게 공부한 지식을 일본에서 제대로 발휘할 수 없을 것 같다. 선배(화교)들의 생활을 봐도 식당이나 잡화점을 운영하면서 힘들게 배운 공부를 써히고 있다.’였다.²⁷⁾

이를 통해 당시 일본에서 외국인이 좋은 직업을 갖기란 하늘의 별 따기만큼 힘들어 생활의 어려움을 해결하고자 귀국을 선택했다고 볼 수 있다.

(3) 적대국가에 유학한 경험이 자신의 미래에 영향을 미칠까 우려

승전국으로써의 유학생들의 우월감은 오래 지속되지 않았다. 전쟁이 끝난 후 국부는 주일대표단(이하:대표단)을 일본으로 파견했다. 그때까지 아직 대사관이 없었기 때문에 대표단은 주일대사관의 업무를 했다. 업무 중의 하나는 재일교포 보호였기 때문에 유학생들은 대표단과의 접촉을 피할 수 없었다. 대표단장과의 접촉을 통해 유학생들은 자신의 신분 문제를 의식하게 되었다. 동학총회 회장을 역임한 적이 있는 한칭위는 중국 유학생 대표로 대표단을 찾아갔다. 그는 그때를 회상하며 당시 유학생들이 국부를 선택할 수 없었던 이유를 이렇게 설명했다.

“대표단은 저에게 ‘당신들은 왕위정권이 파견한 유학생이므로 괴뢰와 같다.’ 고 했다. 우리가 ‘일본 간첩’과 다름없다는 말을 듣고 너무나 놀랐다. 국민당은 구 만주국에서 온 유학생을 ‘중국의 변절자’라고 치부했다. 적어도 국민당의 주류들은 재일 유학생들을 이렇게 평가했다. 우리는 설레는 가슴을 안고 조국의 품으로 돌아갔으나 대표단장으로부터 들은 말은 우리가 ‘일본의 협력자’라는 것이었다. 원래는 조국으로 귀국한다는 기쁜 마음에 대표단을 환영하러 갔으나 결과는 정반대였다. 그 전에 국민당 가입을 고려한 적이 있지만 이는 그것과는 본질적으로 전혀 다른 문제였다. 유학생들은 정치적으로 국민당을 싫어하지 않았지만 그래도 국민당에게 환영 받지

24) 천쿤왕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日일본교보, 2004년 7쪽】

25) 황혜메 : 잊지 못할 중학생생활》,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대해출판, 2003년, 218-22간리 : 바다를 사이에 둔 50년 간의 감》,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년, 352-36쪽

26) 千代子 : 마음속에 그리던 조국에 대한 동》【日중국유일학생》1953년 5월 5일 개재

27) 대륙으로 귀국을 원하는 이》【日《아사히신문》1953년 6월 14일 개재

못했다. 지금까지도 참을 수 없는 것은 대표단의 ‘국민당은 해방자, 유학생은 피해방자’라는 도도한 태도이다.’²⁸⁾

한청위의 이런 증언을 통해 대표단이 일본에 있는 유학생들을 ‘조국을 배반하고 외국과 내통한 간신’이라고 보는 현실을 이해할 수 있었다.

이런 현실은 후일 국부가 발표한 재일 유학생들의 교육정책을 통해서도 엿볼 수 있었다. 전후 국부는 비록 일본의 화교 유학생들에게 관심도 보였고²⁹⁾ 그들의 귀국요구에 대해서도 협조적인 태도를 보였지만 유학생과 화교에 대한 의구심 때문에 정부 내부에서는 특별대표단을 파견해 일본 각지에 퍼져있는 화교와 유학생들을 교육해야 한다는 의견이 있었다.³⁰⁾

그 후 국민정부의 교육부는 1947년 1월 8일 《재일 유학생 호소방법》과 《항일전쟁기간 재일유학생 심사방법》을 발표했다. 그 중 귀국유학생들에게 다음과 같은 요구를 제시하고 정치적 재교육 방침을 발표했다.

‘등록학생 중 일본 전문대학 이상을 졸업한자는 즉시 국부유교 (삼민주의 건국방침과 건국대강 포함) 와 ‘중국의 운명’을 책에 밑줄을 그으면서 읽고 리포트를 작성해 0년 0월 0일까지 재일 유학생 심사위원회의 심사를 받는다. 합격자는 기존 학력을 고려해 증명서를 발급한다.’³¹⁾

이 《재일 유학생 호소방법》이 발표된 이후 재일 유학생들 사이에서는 ‘강제로 귀국해야 하는 것은 아니겠지?’라는 우려의 목소리와 함께 그들의 의견을 《중국유일학생보》에 실어 강제귀국에 대한 우려를 나타냈다. ³²⁾

이렇게 대표단들이 재일유학생을 ‘간신’으로 치부하는 태도와 귀국하는 학생들에게 특별재교육을 실시하는 국부의 행동으로 유학생들은 정부에 대한 불신의 골이 깊어갔고, 설사 귀국한다 해도 존중 받지 못할 것이라는 의식이 팽배해졌다. 이런 이유 때문에 대다수의 유학생들은 국부가 통치하는 대만을 선택하지 않았다.³³⁾

(4) 국부가 점령군 파견 중지에 관한 문제

전후 일본을 점령하는 방법에 대해 우방국간에 이미 협의가 있었다. 그 중에는 중화민국도 우방국의 일원으로 점령군을 일본에 파견했다. 점령군 파견계획은 1945년에서 1946년까지 구체적으로 준비됐다. 중국군대가 일본 주둔을 위해 장제스도 주일군사대표단을 일본으로 파견했다.³⁴⁾

중국이 점령군을 일본에 파견한다는 소식을 듣고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예상외로 흥분했다. 왜냐

28) [日 : 일본에 거주하는중국인-재일화교 한청유가 경험한 또 다른 쇼와 역사第2回] [日 《星火方正》 第2007年5月25日, 25-3쪽 개재. 재일 유학생 한청위 인터뷰, 2007년12월10일, 日.

29) 일본에 있는 전쟁포로와 교민 대》, 대공보(총칭판) 1945년10월1개, 《포로와 교포 영접을 위한 도교》, 대공보(총칭 1945년10월29개, 포로와 교포 귀국방법-일본 교포 귀국선 이》, 대공보(총칭 1945년 11월27개재

30) 재일 화교의 특별한 교》 신1946년12월15개재

31) 재일 유학생 소환방》, 항일전쟁 기간 재일 유학생 심사방》 리타오 주 : 중화유학교육사1840-1949고등 교육출판2005年, 583-58쪽

32) 학생소환문제, 어떻게 될 것인》 [日 중화유일학생1947年5월1개재

33) 일본 속의 중국》 [日 아사히신] 1953年6월14개재

34) 중국 제2 역사당안 : 중국 전쟁지역 실》人民出版社2005年, 82-18우방국이 일본을 공동 관리한》, 대공보(총칭판 1945년10월1개4개국이 일본을 공동점령-소련,영국,중국도 점령군 파》, 《대공보(총칭) 1945年10월15개

하면 중국이 일본에 점령군을 파견하게 되면 중국의 승전국 지위가 더 확고해지면서 자신들의 위상도 올라갈 것이기 때문이었다. 따라서 유학생들과 화교들은 점령군이 오기를 손꼽아 기다렸다.³⁵⁾

그러나 중국의 점령군이 일본에 발도 들여놓기 전에 내전이 발발했고 내전에서 해방군에게 섬멸되어 점령군 파견계획은 물거품이 되고 말았다.³⁶⁾ 유학생들을 크게 실망했다.³⁷⁾ 파병은 무산되고 내전까지 발발하자 국부에 대한 유학생들과 화교들의 반감은 더욱 커져갔다.

(5) 2.28 사건과 대만 화교의 태도

유학생과 화교가 국부에 대해 반감을 사게 된 또 다른 사건은 바로 1947년 발생한 2.28 사건이다. 정부가 군대를 동원해 대만인들의 항의시위를 진압하는 과정에서 수많은 대만인들이 목숨을 잃었다. 일본에는 대만에서 온 유학생들이나 화교가 많았기 때문에 이 사건이 낱알이 소개되면서 많은 주목을 받았다.³⁸⁾

충격을 받은 화교연합회 부회장 양춘송(楊春松)은 곧 대표단으로 달려가 항의했다. 그 밖에도 그들은 대표단의 반대를 무시한 채 재일화교총회에 ‘2.28 참사 처리위원회’를 발족하고 집회활동을 통해 국부의 만행을 고발했다. 2.28 사건을 계기로 대만 화교들은 국부를 다시 보기 시작했고 중공으로 편향되는 경향을 보였다.³⁹⁾ 동학총회 기관보인 《유일학생순보(留日學生旬報)》도 사건을 보도하고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주목을 받았다.⁴⁰⁾ 이 사건으로 국부에 대한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인식이 더 악화되었다.

(6) 중국 내전상황의 발전과 재일 유학생의 사상 변화

항전이 끝나면서 국공 내전의 징후는 점차 뚜렷해졌다.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 사이에는 내전에 반대하는 의견이 확고했다. ⁴¹⁾ 그러나 1946년 6월 26일 국민당 군대가 공산당 군대를 향해 전면공격을 시작 함으로서 국공 내전이 정식 발발했다. 일부 유학생들은 내전을 일으킨 국민당에 반기를 들며 반 내전운동을 전개했다. ⁴²⁾ 그러나 내전 초기 대부분의 유학생들은 공산당의 승리를 예상하지 못했다. 어차피 국민당 정권이 바뀌지 않는다면 중국내전이 자신과 직접적인 관계가 없다고 여겼다.⁴³⁾

35) 재일 유학생인터, 2007년11월23일, 北京市.

36) 중국 제2역사당안 : 중국전쟁지역 실》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0-18쪽

37) 재일 유학생인터, 2007년11월23일, 北京市.

38) 대만성에 적을 둔 재일 유학생 귀평탄 인터, 2007년11월25일, 北京市.

39) 양귀광(楊) : 신중국의 탄생을 영접하》,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대해출판, 2003年, 1-1쪽

40) 대만성 동학들에게 바친대만2.28사건에 관하》 [日유일학생순1947年3月30개재

41) 양귀 : 신중국의 탄생을 영접하 양춘송(楊)의 일본 혁명활동 기록》,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 台海出版社, 2003年, 1-1쪽

42) 왕류성(王) : 초심대로 조국에 보답하》,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 台海出版社, 2003年, 44-4쪽

43) 재일 유학생 한칭위 인터, 2007년12월10일, 日本.

그러나 전쟁은 예상을 뒤엎고 공산당이 승리하는 방향으로 가닥을 잡아갔다. 유학생들은 이런 변화를 감지하기 시작했고 1947년 하반기부터는 중공의 승리를 바라는 말들이 들려오기 시작했다. 일부 화교들은 1947년 일본에 중국 통신사를 세워 일본에서 중국 내전에 관한 소식을 보도했다.⁴⁴⁾

1948년 이후 중국내전 상황이 갈수록 공산당 승리 쪽으로 기울자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내전에 점점 더 많은 관심을 보였다. 그 밖에도 일본 공산당도 중국 내전과 관련된 강연회를 개최하여 국민당의 부패, 중국 공산당의 민주정책, 승리상황 등을 홍보했다. 당시 유학생들은 친 국부 성향의 신문들을 받아보기는 했지만 동시에 《문화보(文匯報)》, 《공인일보(工人日報)》 등의 신문들도 계속 일본으로 보내졌다. 유학생들은 이런 언론보도의 영향으로 사상적으로도 많은 변화가 생겼다.⁴⁵⁾

또 전후 공산주의 서적이 일본에서 금지였으나 일본 공산당의 노력으로 많은 공산주의 서적들이 일본에서 출판되었다. 그 밖에도 중국 공산당, 마오쩌둥(毛澤東)의 서적도 일본어로 번역되어 출판되었다. 마오쩌둥의 《신민주주의론》, 《논연합정부》 등의 저서는 유학생들 사이에서 베스트 셀러가 되었다. 이 영향으로 일부 유학생들은 국민당의 독재통치를 반대하며 중국의 미래를 마오쩌둥과 공산당에 걸었다.⁴⁶⁾ 《중국유일학생보》도 1948년 11월부터 해방구의 생활과 중국 공산당의 정책에 대해 보도했고, 동학총회도 태도를 바꾸어 공산당을 지지하기 시작했다.⁴⁷⁾ 1949년 5월 1일 노동절에 동학총회의 학생들은 마오쩌둥의 초상화를 높이 들고 도쿄 노동절 시위행렬에 참여했다.⁴⁸⁾ 이를 통해 1949년 5월 동학총회가 이미 공산당을 지지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3. 신중국 지지와 함께 불어 닥친 귀국 열풍 : 1949년 10월~ 1955년

1949년 10월 1일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 건국되었다. 같은 해 12월 13일 중앙인민정부 정무원 문화교육위원회는 직속기관인 ‘유학생 귀국업무 처리위원회’를 설치했다.⁴⁹⁾ 28일 베이징인민방송국은 해외 유학생들이 귀국하여 국가건설에 참여할 것을 국내외에 호소했다. 동시에 저우언라이(周恩來) 총리도 중국 공산당과 인민정부를 대표해 유학생들의 귀국을 호소했다.⁵⁰⁾ 1950년 6월 18일 동학총회는 중화전국학생연합회의 서한을 받았다. 내용은 인민정부를 대표해 재일 유학생들의

44) 양귀 : 신중국의 탄생을 영접하 양춘송(楊春松)의 일본 혁명활동 기록》,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1-1쪽

45) 재일 유학생인터, 2007년11월23日、北京市.

46) 양귀 : 신중국의 탄생을 영접하 양춘송(楊春松)의 일본 혁명활동 기록》,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1-1쪽재일 유학생인터, 2007년11월 23日, 北京市재일 화교 링싱광(凌星光) 인터뷰, 2007년12월12日.

47) [日중국유일학생1948년12월1日~1949년9월15日.

48) 왕류 : 초심대로 조국에 보답하》, 《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 대해출판, 2003년, 44-4쪽

49) 중국학구 : 중화인민공화국 교육기1949-1982育出版社1984年, 쪽

50) 쉬룽(許) : 영광의 시간-건국 전후 유학생 귀국 열풍에 관한 기》 유학생총서편찬위원회 사》 出版公司 1992年, 98~11쪽

귀국을 환영한다는 내용이었다. 그 후 다른 유학생들도 교육부 귀국유학생 관리처에서 직접 보내온 귀국 초청장을 받았다. 초청장에는 ‘중화인민공화국은 귀하와 다른 유학생들의 조국 사회주의건설 참여를 위한 귀국을 환영합니다’라고 쓰여 있었다.⁵¹⁾

인민정부의 호소에 답하기 위해 일부 유학생들은 비밀리에 귀국을 서둘렀다. 당시 일본정부와 신중국은 외교관계를 수립하기 전이었고 게다가 1950년 6.25전쟁이 발발해 중국은 미, 일 양국과 적대적인 상태였다. 그래서 재일 유학생들이 귀국하려면 복잡한 수속을 밟아야 했다.⁵²⁾ 따라서 1949년부터 1952년까지 귀국한 유학생 수는 102~300명에 불과했다.⁵³⁾

대다수의 유학생들은 전쟁기간 일본의 구제도 하에서 중학교를 다녔기 때문에 1951년 이후에야 대학을 졸업하기 시작했다. 졸업생 수가 증가하면서 귀국을 희망하는 학생수도 늘어나 1953년에 이르러 수백 명 규모에 이르렀다. 이 밖에도 화교학생 중에도 귀국을 희망하는 사람이 적지 않았다. 1953년 6월까지 귀국수속을 마친 중국인은 807명 정도 되었다.⁵⁴⁾ 게다가 전쟁기간 대만에서 일본으로 건너간 노동자들은 일본에서의 생계유지가 어렵고 국부가 통치하는 대만으로 돌아가는 것도 원치 않아 중국대륙으로 가길 희망하는 사람의 수가 수천 명에 달했다.⁵⁵⁾ 그러다 보니 비공개적으로 개별적인 방법으로 귀국하는 것으로는 당시의 수요를 감당할 수가 없었다.

1952년 중일 양국은 중국에 체류하고 있는 일본인 철수 문제를 교섭 중이었다.⁵⁶⁾ 일본정부도 언론매체를 통해 교포 철수를 위해 중국에 철수선을 보낸다는 소식을 보도했고, 이 소식을 접한 재일 유학생들은 그 배를 이용해 귀국하게 되기를 희망했다. 1952년 12월 도쿄화교총회 등 친중국단체는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 중국포로 유해 송환요구를 일본정부와 3개 단체(일본 적십자회, 중일우호협회, 일본평화연락회)에 전달하고 인민정부에도 의사를 전달했다. 그 후 인민정부는 일본 교포 철수 협상에서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문제, 유해송환문제를 적극적으로 제시했다. 회담 결과 철수선을 이용해서 귀국을 희망하는 유학생과 화교 및 유해 송환 문제는 일본 적십자회에 위임하기로 하고, 구체적인 방법은 쌍방이 구두로 양해를 얻었으며, 일본정부

51) 귀평탄, 천푸메: 《건국 초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귀국 현》,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台海出版社, 2003년, 498-51천쿤왕: 일본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 日侨社2004년10쪽

52) 귀평탄, 천푸메: 《건국 초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귀국 현황》,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台海出版社, 2003년, 498-51쪽에 따르면 출입국 수속은 도쿄 화교총회가 일괄 처리했다. 유학생 본인이 도쿄 화교총회에 가서 출국 신청서를 작성하고 도쿄 화교총회가 국민당 주일대표단 교무처(僑務處)에 송달한다. 그러나 교무처는 구류 권한이 없기 때문에 반드시 연합군 본부로 보내 비준을 받아야 한다. 유학생의 출국 이유로는 홍콩으로의 친지방문과 여행만 쓸 수 있었기 때문에 홍콩 관련 여행사가 담보를 썼다. 중국으로 직접 가는 여객선이 없어 화물선을 이용하거나 홍콩이나 다른 국가를 경유해서 귀국했다. 따라서 비용이 많이 들었고 시간도 많이 걸렸다. 게다가 출국 심사도 매우 엄격했다.

53) 사회주의 건설에 참여한 귀국 유학생 상》, 리타오: 중화 유학교육사194년 이》高育出版社2000년, 59-6쪽에 따르면1949년8부터1952년12까지 중국 교육부에 등록된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 수는10명 이다.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台海出版社, 2003년, 498-51쪽과 천쿤왕의: 《日华运史 [日] 日侨社2004년 11쪽 자료에 따르면1953년 전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과 화교는 300명 가량이다.

54) 일본 속의 중국》[日야사히신] 1953년6월14개재

55) 귀평동학총회 전 회》: 재일 동학은 우리를 조국 건설로 이끌 것이》, 과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文料员: 건국 초기 유학생 귀국 기》文史出版社1999년405-41쪽

56) [日武: 일본교포 귀국문제에 관한 전후 중일관중일 민간 협“体方式을 중심의》[日究49(3), 2003년7월, 54-7쪽 개재

도 이해를 표명했다.⁵⁷⁾ 그러나 그 후 국부의 반대 등 몇 가지 이유로 철수선을 이용한 귀국 문제는 실현되지 않았다⁵⁸⁾ 이 때문에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항의시위를 벌였고 인민정부도 이에 합세했다. ⁵⁹⁾ 일련의 항의활동 이후 일본정부와 국부는 교섭을 진행해 마침내 국부의 태도가 다소 누그러졌고,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가 1953년 6월 출항하는 제4차 철수선을 이용하는 것에 동의했다. ⁶⁰⁾

1953년 6월 27일 무학항(舞鶴港)에서 출항하는 제4차 철수선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제1호 귀국선이 되었으며, 551명을 태우고 귀국길에 올랐다. 1955년까지 총 3178명의 귀국을 도왔다.⁶¹⁾

1953년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철수선을 타고 단체로 귀국한다는 소식이 신문을 통해 전해지면서 많은 사람들은 감격의 뜨거운 눈물을 흘렸다. 북경어를 할 줄 모르는 대만에 적을 둔 화교나 중국어를 못하는 그들의 일본인 아내, 재일유학생과 화교들 모두 조국의 품으로 돌아간다는 기쁨에 휩싸였다.⁶²⁾ 그들은 왜 조국 대륙으로 돌아가는 것에 이렇게 큰 기대와 희망을 품고 있었던 것일까? 그들은 그때 신중국을 어떻게 바라보고 있었을까? 다음에서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귀국 붐을 형성한 원인에 대해 논의해 보겠다.

(1)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성립과 동학총회의 태도

1949년 10월 1일 마오쩌둥이 천안문 광장에서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탄생을 알리는 소식은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 사이에서 커다란 반향을 불러 일으켰다. 도쿄 동학회는 같은 날 《중화인민공화국 건국에 관한 성명서》를 발표하여 ‘우리는 신정부의 영도 하에 조국 인민들과 함께 분투할 것이다.’라고 하며 신중국을 지지했다. ⁶³⁾ 동학총회와 각 지역의 동학회는 모두 대표위원회를 개최하여 신중국을 지지하는 결의를 통과시켰다. ⁶⁴⁾ 1949년 10월 10일은 중화민국 건국을 기념하는 쌍십절날 재일화교총회와 도쿄 화교연합회, 재일동학총회는 쌍십절 축하행사 대신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탄생을 축하하는 대회를 열었다.⁶⁵⁾ 이는 재일 유학생과 3개 화교단체가 처음으로

57) 《1950년대 중일, 일대만 관계 구재일 화교, 유골 송환 교섭“体方式를 중심으로》 [日《筑波法政》 2006년3월, 153-17쪽 개귀평동학총회 전 회) : 재일 동학은 우리를 귀국의 길로 이끈》, 과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文料员 : 건국 초기 유학생 귀국 기문사출판1999년405-41, 재일 화교, 유학생 귀국문제 관련자인민공외교문105-00250-02, 1953년4월28일-7월4일) [日武 : 재중 일본인문제 교섭을 둘러싼 전후 중일관중일 민간협“体方式를 중심으로》 [日究49(3), 2003년7월, 54-7쪽 개, 국부와의 미묘한 관계-일본정부도 송환을 희망한》 [日] 아사히신》 1953년5월21개재

58) 귀국하지못하는 중국》, (日) 《아사히신》 1953년5월9개귀평동학총회 전회) 재일 동학이 우리를 귀국의 길로 인도한》, 과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文料员 《건국 초 귀국 유학생 기》 文史出版社1999년405-41쪽

59) 재일 화교, 유학생 귀국문제 관련 자 (人民共外交 문서, 105-00250-02, 1953년4월28일-7월4일) 귀평동학총회 전 회) : 재일 동학이 우리를 귀국의 길로 인도한》, 과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文料员 : 건국 초기 유학생 귀국 기》 文史出版社1999년405-41, 국가의 도움으로 귀국자 대회를 희망한》 [日아사히신》 1953년5월23개, 중국인 대표 귀국문제 해결을 위해 외무성 방문을 요구하》 [日아사히신》 1953년6월6개재

60) 국부는 이해한다, 일본의 중국인 송환문제는 일본 적십자회를 통해》 [日아사히신》 1953년6월2개, 중국인 송환문제-일본 적십자회에 전권을 위임하》 [日아사히신》 1953년6월7개.

61)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511-51쪽

62) 기쁨이 가득한 화교 가정-꿈에 그리던 조》 [日国1953년6월9개재

63)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성립에 관한 성명》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49년10월11개재

64) 천쿤왕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 日侨社2004년8쪽

신중국을 공식 지지한 활동이다.

1950년 3월25일 동학총회 회장 리레이산(李桂山)은 동학총회를 대표하여 마오쩌둥 주석에게 서한을 보내 공산혁명을 지지하는 유학생들의 활동을 소개했으며, 유학생들이 혁명활동에 참여하고자 하는 의사를 전달했고, 중화인민 공화국의 성립을 축하했다.⁶⁶⁾ 동학총회는 각 지역의 유학생들을 연결하는 연합조직으로 동학총회가 중화인민공화국을 지지한 행동은 일본 전국에 있는 유학생들의 동향에 직접적인 영향을 미쳤다.

(2) 인민정부의 귀국초청과 구호금

유학생의 귀국열풍이 일어난 원인 중의 하나는 인민정부가 유학생들에게 지급한 구호금 때문이다. 앞에서 언급했듯이 전후 재일 유학생들의 생활은 가난했다.⁶⁷⁾

이런 상황에서 인민정부가 1952년 9월 동학총회에 7900달러의 구호금을 전달했고, 그 후 계속해서 중국에서 구호금이 전달되었다. 1952년 한 해에만 5만 달러를 보내왔다. 구호금은 1957년까지 계속 제공되었다. ⁶⁸⁾ 동학총회는 구호금을 나눠주기 위해 전문운영위원회를 설립했다. 구호금은 1952년 10월부터 대학을 다니고 있는 유학생들뿐만 아니라 고등학교를 다니고 있는 화교 학생에게도 지급되었다. ⁶⁹⁾

1952년은 건국한지 3년밖에 안 되는 때라 국내에서도 건설을 위한 자금이 필요했다. 동시에 6.25전쟁이 아직 진행 중이었기 때문에 군사비용도 많이 필요로 했다. 이 시기 인민정부가 가난한 유학생들에게 보내온 구호금은 재일 유학생들을 감동시키기에 충분했다. 많은 유학생들은 정부의 원조를 기억하며 매우 감격해 했다. 특히 국부에게 냉대받은 경험이 있는 유학생들은 인민정부가 자신들을 환영한다고 생각했고, 이것이 귀국에 대한 열정에 불을 붙였다.⁷⁰⁾ 구호금은 유학생들의 귀국을 부추긴 촉진제라고 할 수 있다.

(3) 동학총회, 화교총회 중국 언론매체의 선전

앞에서 언급한 바와 같이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성립 이후 동학총회, 도쿄 화교총회 등 유학생과 화교단체는 신중국을 지지했다. 그 후 유학생과 화교단체는 신중국에 대한 정책과 상황을 적극 선전했다. 동학총회의 기관보 《중국유일학생보》와 도쿄 화교총회의 기관보 《도쿄화교보》는 거의 매회 중국관련 뉴스를 실었고, 유학생과 화교들에게 신중국을 선전했다.⁷¹⁾ 특히 《중국유일학

65) 귀평탄, 천푸메 : 《건국 초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귀국 현황》,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498-51쪽. 천쿤왕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 日侨社2004년8쪽

66) 재동학총회가 마오쩌둥 주석에게 보낸 편 (外交 문서, 105-00012-01, 1950년3월25일)

67) 재일 유학생 구제에 관한 문제 백》 [日중국유일학생1950년2월1日 개제

68) 천쿤왕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 日侨社2004년10쪽

69) 꿈에 그리던 조국에 대한 동》 [日중국유일학생1953년5월5개, 아까운 돈을 더 이상 낭비하지 마》 [日중국유일학생 1953년5월5개.

70) 재일 유학생, 전 동학총회 회장 귀평탄 인터, 2007년11월25日, 北京市.천쿤왕 편 : 일본 화교, 유학생 운동 [日] 日侨, 2004년103-10쪽

71) 재일 유학생 전 동학총회 회장 귀평탄 인터, 2007년11월25日, 北京市.재일 유학생 전 동학총회 회장,

생보》는 중국 대학교육을 소개하거나 귀국한 유학생들의 편지를 자주 실었다. 내용은 중국에서 무료로 대학교육을 받을 수 있다는 내용과 귀국한 학생들의 즐거운 대학생활 등을 소개하는 것이었다.⁷²⁾ 생활이 어려웠던 유학생들과 경제적인 이유로 대학에 진학하지 못했던 화교학생들은 이런 기사에 마음이 흔들렸고 귀국을 결정하는데 영향을 미쳤다.⁷³⁾

그 밖에도 《중국유일학생보》에 실린⁷⁴⁾ 귀국한 동학총회의 학생들이 보내온 편지를 통해 재일 유학생들은 중국의 상황을 이해할 수 있었다. 당시 유학생들 친구들이 보내온 편지를 얼마나 신뢰했을지 상상이 간다.

더 나아가 중국을 선전하기 위해서 1953년 7월 제1호 철수선이 귀국할 때 화교사무위원회 부주임 라오청즈(廖承志)는 철수선 대표인 당시 동학총회 회장 한칭위를 만나 일본에서 중국을 선전할 수 있는 중국어 신문을 창간해 달라고 부탁했다.⁷⁵⁾ 한칭위는 일본으로 돌아온 후 곧 준비작업에 들어가 재일 화교들의 도움을 받아 1954년 3월 1일 중국어 신문 《대지보(大地報)》를 창간했다. 《대지보》는 1970년 1월 12일까지 간행되었고, 신중국을 선전하는데 중요한 역할을 했다.⁷⁶⁾ 특히 귀국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편지, 그들을 인터뷰한 기사, 중국 교육현황을 소개하는 기사 등을 연재해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귀국을 촉진했다.⁷⁷⁾

위에서 말한 일본의 언론매체 이외에도 신화사, 베이징방송국 등 중국의 매체도 해외 선전활동을 했다. 1950년대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가 중국의 정보와 새로운 정책을 쉽게 얻을 수 있는 환경에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4) 일본으로 귀화한 사람들의 소개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중국 정보를 얻을 수 있는 또 다른 채널은 바로 중국 대륙에서 일본으로 귀화한 사람들의 생생한 증언이었다. 1949년 이전 많은 일본사람들이 중국대륙에서 일본으로 돌아왔다. 이들 중에는 해방구에서 돌아온 사람들도 있었다. 그래서 공산당 통치상황을 알고 싶어했던 유학생들과 화교들은 그들과의 모임을 통해 그들이 들려주는 중국 소식에 귀 기울이고, 수집한 정보를 《중국유일학생보》에 실었다.⁷⁸⁾

중화인민공화국 건국 후 일본사람들이 집단으로 귀국한 것은 1954년부터이다. 일본의 언론매체에서는 그들의 귀국을 대대적으로 보도했고 특집 인터뷰 기사를 실었기 때문이다. 기사의 대부분은 신중국의 상황을 소개하는 것이었다. 예를 들면 ‘돈 걱정 할 필요 없다. 그곳의 생활은

전 《華僑報편집장 한칭위 인터뷰, 2007년12월10일, 日本.

72) 학비가 보장되는 학생정책-귀국자가 말하는 신중국 현》【日중국유일학생1949년10월11개황시우평】: 《(新生生活)》【日중국유일학생1953년1월5개재해외교포여 단결하라! 조국을 사랑하고 자신의 정당한 권익을 수호하】【日중국유일학생1953년11월25개재 등

73) 재일 화교인터뷰.2007년11월23일, 北京市.

74) 귀국한 동학으로 부터의 편》【日중국유일학생1955년4월20일 개재.

75) 【日: 일본에 거주하는 중국재일 화교 한칭위가 경험한 또 하나의 쇼와사第2回】【日《星火力》第2007년5월25일, 25-3쪽 개재

76) 재일 유학생 한칭위 인터뷰, 2007년12월10일, 日本.

77) 당산의 화교학》【日대지》1955년6월1개재모든 것을 바쳐 조국 건설에 참여한 경험귀국 유학생 인터뷰】【日대지》1955년6월1개재의학】【日대지》1955년7월1개재.

78) 학비보장되학생정책-귀국자말하신중국 현》【日중국유일학생1949년10월11일 개재

평등하고 공평하다. 시장은 안정되어 있고 물건은 풍족하다.’라고 하면서 중국생활이 행복하다는 것을 강조했다.⁷⁹⁾ 더 나아가 귀국자가 참석하는 좌담회를 개최해 유학생들과 화교들에게 중국의 상황을 설명해 주었다.⁸⁰⁾ 이런 보도나 경험들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귀국 결정에 적지 않은 영향을 미쳤다.

4. 지식인들의 귀국 열풍 : 1956년

1953년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과 화교 수는 무려 2650명으로 귀국열풍이 정점에 이르렀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 후 1954년 13명, 1955년 519명으로 1953년과 비교해 볼때 크게 감소했다.⁸¹⁾ 1954년 이후 귀국자수가 감소한 이유는 귀국을 갈망하던 사람들이 어느 정도 철수선을 타고 모두 귀국했기 때문이다. 게다가 귀국한 학생들이 보내오는 편지나 언론의 보도를 통해 귀국자들의 생활이 어렵다는 소식이 일본으로 전해지면서 귀국 열기가 주춤하게 되었다.⁸²⁾

1956년 1월 14일 중공중앙은 지식인과 관련된 회의를 열었고 저우언라이 총리는 《지식인에 관한 보고서》를 발표했다. 그는 국가의 건설을 위해서 지식인들을 어떻게 활용할지 주의를 기울여야 하고, 고급 지식인이 부족한 상황을 설명했다.⁸³⁾ 이 회의에 참석했던 중국과학원 원장 귀모뤄(郭沫若)는 고급 지식인의 부족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서 1만 명 가량의 해외유학생들을 미국, 영국, 일본 등 자본주의 국가로부터 귀국할 것을 호소하자는 의견을 제시했다.⁸⁴⁾ 이 건의를 실행에 옮기기 위해 고등교육부는 《고등교육부의 자본주의 국가로부터 중국 유학생 귀국을 위한 업무 통지》를 초안작성하고 1956년 한해 동안 적어도 1천명 귀국목표를 발표하면서 각 부처의 적극 협조를 부탁했다.⁸⁵⁾ 아울러 중앙정부 각 부서와 각급 지방정부가 유학생 귀국활동에 적극 참여할 것을 요청했다.⁸⁶⁾

재일 유학생 귀국활동에 관해서는 1956년 말 까지 150명을 목표로 정했다.⁸⁷⁾ 1956년 2월 동학

79) 귀국자인터뷰-신중국에서 돈걱정 필요 없는 결》【日국제신1953년6월22개재안정적인 인민생활, 합리적인 소학교 교육방】【日아사히신】1953년3월6일개재.건설체험-귀국자의 광산체》【日일본과 중1953년5월5개재새벽에 상안완호를 타고 무학항에 도착하다중공의 귀국자 칭찬 일】【日아사히신】1954년9월27일 석간 개재.

80) 중국의 노동자 생활-귀국자 좌담》【日일본과 중1953년4월20일 개재.

81)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台海出版社, 2003년, 51쪽

82) 재일 유학생 귀평탄 인터뷰, 2007년11월25일, 北京市.

83) 저우언라이: 지식인에 관한 보고 (一)》, 지식인에 관한 보고 (二)》, 인민일1956년1월30개재

84) 귀평탄, 천푸메: 《건국 초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귀국 현》,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台海出版社, 2003년, 498-51쪽

85) 《고등교육부 자본주의 국가의 중국 유학생 귀국 촉진을 위한 통》, 리타오 주: 중화유학교육사—194년 이고등교육출판2000년, 24-2쪽

86) 예를 들면 《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흡수를 위한 조치 등 저우언라이 총리의 보중화인민공화국 외교부 문, 111-00239-05, 1956년1월27일》, 《외교부 해외 유학생 귀국에 관한 해외 사관 지시 전》중화인민공화국 외교부문, 118-00852-05, 1956년3월19일-10월4일에 근거해 외교부는 1956년 1월부터 유학생 귀국방법에 관한 토의를 시작했고 같은 해 3월 해외 대사관과 영사관에 전보를 보내 유학생 귀국권 유 명령을 하달했다.《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귀국 촉진에 관한 문》(北京市문, 2-10-76, 1956년12월20일-1959년12월18일에 근거해 베이징시 정부는 베이징시 유학생 귀국촉진 전담반을 신설해 유학생 귀국 촉진을 위한 구체적인 방법을 논의했다.

87) 《外交部 해외 유학생 귀국 업무에 관한 외교사관 지시문》(人民共 外交部 문서, 118-00852-05,

총회는 국무원 교무(僑務)위원회 주임 라오칭즈(廖承志)가 보낸 동학총회가 귀국활동에 적극 협조해 달라는 내용의 편지를 받았다.⁸⁸⁾

그 후 동학총회와 도쿄 화교총회는 공동으로 유학생 귀국 선전활동을 전개했다.⁸⁹⁾ 당시의 상황은 《중국유일학생보》와 《대지보》를 통해 볼 수 있다.

1956년 3월 1일자 《중국유일학생보》는 1월 14일 저우언라이 총리의 《지식인에 관한 보고서》 전문을 실고, 1월 30일 개최된 인민정치협상회의 제2회2차 전체회의 상황을 전했으며, 귀모뤄가 이 회의에서 《사회주의 혁명에서 지식인의 사명》을 제목으로 발표한 보고내용도 실었다.⁹⁰⁾ 이는 모두 신지식인 정책에 관한 내용들로 지식인들의 귀국을 호소하는 신호탄이라 할 수 있다.

같은 해 4월 1일과 5월 15일자 《중국유일학생보》도 신지식인 정책을 소개하는 글을 실었다. 이들은 일본에 있는 지식인들의 귀국을 촉진하고자 특집으로 《다 배웠으면 돌아오라! 조국이 원하고 있다》, 《고민하지 말고 하루빨리 돌아와 조국 건설에 참여하자》, 《지금 귀국할 절호의 기회-인재부족》, 《평화롭게 사회주의 사회로의 전환-해외 엘리트들의 공헌을 기대한다》, 《조국은 지금 눈부시게 발전하고 있다-우리가 배운 기술로 인민에게 봉사하자》, 《영광스런 사업이 우리를 기다리고 있다》 등 자극적인 제목으로 지면을 장식했다. 기사의 내용은 구체적인 사례를 들어 조국이 유학생들을 얼마나 필요로 하고 있는지에 대해 설명하면서 빠른 귀국을 호소했다.⁹¹⁾

그밖에 제일 화교가 발행한 중국어 신문 《대지보》도 1956년 4월 21일 전체 지면을 할애해 《조국은 일본에 유학하고 있는 지식인을 환영한다-고민하지 말고 하루빨리 돌아와 조국 건설에 참여하자》라는 글을 실어 《중국유일학생보》의 호소에 호응했다.⁹²⁾ 5월 1일과 11일자 신문에 도 관련 글을 실어 제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을 활발하게 전개했다.⁹³⁾

일본의 유학생과 화교단체의 귀국 촉진활동이 활발하게 진행되고 있을 무렵인 1956년 6월 18일 중국에서 석방된 일본 전범들의 귀국을 맞이하기 위해 상안완(兴安丸)호 철수선도 무학항에

1956년3월19日-10月4日)

88) 귀평동학총회 전 회) : 《留日学爱的道路》, 과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文料员 편찬 : 건국 초 유학생 귀국 기》文史出版社1999年405-41쪽

89) 귀평동학총회 전 회) : 제일 유학생이 우리를 조국의 길로 인도한》, 과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文料员 편찬 : 건국초기 유학생 귀국 기》文史出版社1999年405-41쪽 《조국은 제일 지식인을 환영한다고민하지 말고 하루빨리 돌아와 조국 건설에 참여하》, [日] 대지1956年4月21개재 《동학총회 10주년 기념 대화-지식인의 조국 건설 호소》 [日] 대지1956年5月1日 개재. 등

90) 《지식인에관한 저우언라이 중공중앙서》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3月1日 개재. 《중국인민정치협상회의 전국위원2차 전체회》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3月1日 개재. 《중국과학 10년후 세계 수준으로-첸쉐린钱森) 교수의 논증》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3月1日 개재.

91) 다 배웠으면 돌아오라! 조국이 원하고있》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4月1日 개재. : 지금이 귀국할 절호의 기회-인재부》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4月1개재. 秋 : 평화롭게 사회주의 사회로의 전환-해외 엘리트들의 공헌을 기대한》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4月1개재. 张 : 조국은 지금 눈부시게 발전하고 있다-우리가 배운 기술로 인민에게 봉사하》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4月1개재. 王兆元 : 영광스런 사업이 우리를 기다리고 있다》 [日] 《중국유일학생1956年5月15개재. 등

92) 귀국 유학생이 보내온 편지, 조국은 제일 지식인을 환영한다 고민하지 말고 하루빨리 돌아와 조국 건설에 참여하》 [日] 대지1956年4月21日 개재.

93) 《学总 十周念 国가 보내온 축하메시지-지식인의 조국건설 참여 호소》 [日] 대지1956年5月1日 개재. 해외 지식인들이여, 조국은 당신을 환영한》 [日] 《大》 1956年5月11日 개재. 金慕箴 : 화교 청년지의重要性》 [日] 《大1956年5月11日 개재.

서 출항명령을 기다리고 있었다.⁹⁴⁾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싱안완 호를 이용해 귀국하기 위해서 6월 15일자 《중국유일학생보》 1면부터 4면까지 또 다시 귀국에 관한 특집 기사를 실었다. 이런 노력을 통해 167명의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6월 18일 출항하는 싱안완 호를 타고 귀국 여정에 올랐다.⁹⁵⁾

동학총회의 귀국 촉진활동은 이 후에도 계속되었다. 하지만 일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동학총회의 귀국 촉진활동에 비난의 목소리를 내기 시작했다. 그들은 동학총회가 많은 유학생과 화교를 귀국시켜 힘든 생활을 하게 만들면서 정작 동학총회의 간부들은 일본에 머물면서 부유한 생활을 한다고 비난했다. 이런 비난을 받자 당시 동학총회의 회장 귀핑탄은 재일 유학생의 귀국 선봉으로 아내와 아이들을 데리고 1956년 8월 20일 출항하는 싱안완 호에 올라타기로 결정했다.⁹⁶⁾ 동학총회 회장의 행동에 감동되어 8월 20일 출항하는 싱안완 호를 타고 귀국하는 학생과 화교수는 220여명에 달했다.⁹⁷⁾

5. 귀국열기 냉각과 귀국 유학생 및 화교들의 신분 문제 : 1957년 이후

1956년 지식인들의 귀국열기에 힘입어 한 해에만 인민정부의 목표를 훨씬 초과해 420명에 달하는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가 귀국했다.⁹⁸⁾ 1956년까지 중국은 자본주의 국가에서 생활하고 있는 유학생들을 대거 귀국시키는데 성공했고, 이로써 유학생들의 귀국 촉진활동은 잠시 일단락 되었다. 구체적으로 1956년 11월 30일 유학생들의 귀국 업무를 담당할 ‘귀국위원회’가 해산을 선포하고, 관련 업무를 국무원 전가국(專家局)에 이양했다.⁹⁹⁾ 1957년 2월 12일 국무원 전가국은 《1957년 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흡수 계획》을 제정했다.¹⁰⁰⁾ 그러나 1957년 6월 8일 시작된 반우파운동의 영향으로 귀국 유학생들의 수가 급감했다.¹⁰¹⁾ 1956년의 420명에서 1957년에는 145명으로 감소했고 1958년에는 65명으로 급감했다.¹⁰²⁾

귀국열기가 잠잠해진 주된 원인은 1953년부터 1956년까지 귀국열풍과 지식인들의 귀국이 정점을 지나면서 전후 일본에 있던 애국학생들과 화교들이 대부분 귀국했기 때문이다. 동시에 앞에서 언급했듯이 일부 귀국유학생들과 화교들에게 중국에서의 생활이 어렵고 취업도 어렵다는

94) 많은 화교가 국가건설에 참여하》 [日대지1956년6월11일 개재.

95)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51쪽

96) 재일 유학생 귀핑탄 인터뷰, 2007년11월25일, 《北京市귀핑탄은 강한 조국을 원한》,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375-38쪽

97)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51쪽

98)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511-51쪽

99) 국무원 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귀국 촉진을 위한 국무원 전가국 관리 통》 리타오 : 중화유학교육사—194년 이》 高育出版社, 2000년, 2쪽

100) 《1957년 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흡수 업무 계획》 (日民共 外交部 문서, 111-00251-02, 1957년2월 4-8월20일)

101) 유학생 귀국 및 귀국 후 상황에 관한 문》 (北京市 문서, 2-20-339, 1959년-1960년)。

102)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년 511-51쪽

사실이 전해지면서 귀국에 대한 열기가 크게 식었다. 그리고 귀국학생수가 크게 감소한 데에는 중국정부가 취한 일본화교정책도 영향을 미쳤다.

필자는 200명의 건국 초기 귀국한 유학생들의 취업과 관련된 문서 및 단독 인터뷰를 통해 귀국 유학생의 취업문제를 이해할 수 있었다. 기존의 자료를 토대로 얻은 결론은 구미각국의 귀국 유학생들과 비교해서 취업에서 불평등 대우를 받거나 적대국인 일본에서 귀국했다는 점이 그들의 취직에 걸림돌이 되지는 않았다.¹⁰³⁾

이로써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은 인민정부가 자본주의 국가의 유학생들을 흡수하려는 업무의 일환이었다. 그러나 1957년에 이르러 상황은 다시 변했다. 1957년 2월 12일 국무원 전가국이 발표한 《1957년 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흡수 계획》에 명확히 제시되어 있다. ‘1957년 이후 일부 특별한 인재 외에는 더 이상 재일 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지 않는다. 만일 재일 유학생이나 화교가 귀국을 희망한다면 반드시 도쿄 화교총회를 통해 중국정부의 승인을 얻어야 한다.’¹⁰⁴⁾ 이 규정을 통해 알 수 있는 것은 인민정부가 1957년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환영 정책에 변화가 생겼다는 점이다. 당시 귀국한 학생들의 의견을 분석해 보면 우선 재일 유학생이나 화교들의 수준이 구미국가에서 귀국한 학생들보다 떨어졌고, 더 더욱이 1957년 건국 후 어느 정도 시간이 흘렀기 때문에 신중국이 스스로 지식인이나 대학생들 배출해낼 수 있게 되었다. 그러다 보니 해외 지식인에 대한 수요가 점차 줄어들게 되었다. 그리고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과 화교들 대부분은 문과 출신이었고, 또 많은 수의 화교들은 별다른 교육도 받지 않은 상태여서 귀국 후 직업 배치에 어려움이 따랐다. 따라서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를 흡수하는 작업이 시들해졌다. 이는 비단 일본 화교만이 아니라 동남아 화교들에게서도 비슷하게 나타난 현상이다. ¹⁰⁵⁾

그렇다면 유학생들의 직업이나 그 후의 인생에 가장 큰 영향을 미친 것은 무엇일까? 필자가 귀국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을 대상으로 인터뷰한 결과에 따르면 그들은 모두 ‘역사’와 ‘해외관계’를 강조했다. 즉 귀국 이후 유학생들이 쓴 자서전이나 그 후의 정치심사결과가 많은 영향을 미쳤다. ‘해외관계’라고 하는 것은 해외에 친지나 친구가 있어 그들에게 번거로움을 줄 수 있음을 말한다. 특히 문화대혁명 기간 특수한 상황을 제외하고는 베이징에 거주하고 있는 거의 모든 귀국 유학생들과 화교들이 ‘해외관계’를 이유로 농촌으로 보내졌다.¹⁰⁶⁾ ‘해외관계’는 해외에서 귀국한 모든 사람들에게 영향을 미쳤다고 할 수 있다.

‘해외관계’문제와 비교해 ‘역사’문제는 확실히 개인차이가 있었다. 특히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은 ‘역사’문제 때문에 고통 받았을 것이다. ‘역사’문제는 본인 혹은 친지나 친구가 과거에 공산당이나 공산주의를 반대한 적이 있는 경우 와 무산계급을 착취한 경우를 말한다.

《회고 50년》 (2003) 은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과 화교 78명의 귀국과 관련한 회고를 소개했는데 그 중 71명이 귀국 후의 취업 상황을 언급했다. 그들이 귀국 후 가장 처음 지정 받은 직업을 간단히 통계 내어 보니 다음과 같은 결론을 얻을 수 있었다. 26명의 귀국 학생들 중에서

103) 재일 유학생의 선택애과역》 杰, 岛 《1945년의 역사인식종을 둘러싼 중일대화 시京出, 2009年, 203-23쪽

104) 1957년 자본주의 국가 유학생 흡수 업무 계획》 (人民共 外交 文111-00251-02, 1957年2月4日-8月20日) .

105) 재일 유학생 귀탄평 인터뷰, 2007年11月25日, 北京市, 재일 유학생 정바오성 인터뷰, 2007年11月23日, 北京市.

106) 재일 유학생 귀탄평 인터뷰, 2007年11月25日, 北京市, 재일 유학생 정바오성 인터뷰, 2007年11月23日, 北京市.

14명(53.8%)은 학교나 연구소 등 연구와 관련된 일을 했고, 일어를 이용해 일본과 관련된 교류, 대외사업, 정보수집 등의 일을 한 사람은 5명(19.2%)에 불과했다. 45명 귀국 화교 중에 18명(40%)은 일본어를 이용해 일본과 관계된 교류, 대외사업, 정보수집 등의 일을 했고, 학교나 연구소 등 기술직에 종사한 사람은 13명(28.9%)이었다. 유학생들보다 화교가 대일교류 업무에 더 많이 종사한 것은 ‘역사’심사 결과 때문일 것이다.¹⁰⁷⁾ 귀국한 재일 화교 중 다수는 학교도 졸업하지 않은 상태였기 때문에 업무경험이 없는 것은 당연했다. 그래서 그들은 친지나 학교 이외의 다른 사회관계가 별로 없었고, 공산주의나 공산당을 반대하는 사람과의 관계도 거의 없었으며, 가족이 모두 일본에서 생활했기 때문에 공산당이나 공산주의에 반대하는 사람과 접촉할 기회도 극히 적었다. 따라서 정치심사에서 ‘역사’문제가 발견될 확률이 거의 없다. 따라서 이들은 일본과의 교류업무에 종사가 가능했다. 저우언라이 총리의 일어통역사로 유명한 린리윈(林麗韞), 황스밍(黃世明) 등은 건국 초기 대일 외교분야에서 활약하던 일본어 통역사인데, 모두 재일 화교 출신들이다. 일본에서 귀국한 화교들이 중요한 외교무대에서 활약했던 사실을 미루어 볼 때 일본에서 귀국했다는 사실 자체가 그들이 중국에서 역량을 펼치고 발전하는데 영향을 미치지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들이 배운 것을 충분히 발휘할 기회가 별로 없었던 원인은 다음 몇 가지로 분석할 수 있다. 우선, 유학생들은 대부분이 대만, 구 만주국, 왕위정권 등 일본 식민지나 일본의 괴뢰정권이 파견한 유학생들이었기 때문에 식민지 정부나 괴뢰정권과 약간이라도 관계가 있을 가능성이 농후했다. 둘째로 전쟁기간 일본에서 유학하던 학생들은 일본에서 일한 경향이 있다. 업무 상 중화민국 주일 대표단 등 국민당의 유관기관이나 반공산주의 인사들과의 접촉을 피할 수 없었을 것이다. 귀국 후 정치심사 때 이런 문제를 조사받고 문서에 기록했다. 중국인들의 인사업무 관례를 보면 문서에 ‘역사’문제가 기록되어 있거나, 정치심사에서 결론이 나지 않은 경우 원칙적으로 대외업무나 기밀업무를 맡을 수 없다. 따라서 귀국한 재일 유학생들 중 다수는 건국 초기 일본과 관계된 업무를 할 수 없었다. 그 밖에도 연구업무에 종사한 귀국 학생들도 만일 하던 연구가 보안으로 분류되면 원칙적으로 그 연구에서 퇴출당해야 했다.¹⁰⁸⁾

비록 귀국 유학생의 인사 문서가 아직 공개되지는 않았지만 필자는 베이징시 당안관에서 공개한 귀국 유학생 관련 문서 중 베이징시에 거주했던 귀국 유학생 문서 《해방 후 자본주의 국가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 조사표》¹⁰⁹⁾와 《베이징시 귀국 유학생 조사표》¹¹⁰⁾ 2부를 찾아냈다. 이 자료에는 베이징시에 거주했던 일부 귀국유학생들의 간단한 이력, 가정환경, 소득, 정치역사문제를 조사한 내용들이 기록되어 있다. 이 자료는 유학생 본인이 작성한 것이 아니라, 유학생 직장에서 작성한 것이다. 따라서 직장에서 유학생들을 상대로 정치심사를 한 결과, 귀국 후의 정치적 태도 등에 관한 평가도 기록되어 있다. 《해방 후 자본주의 국가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 조사표》에는 많은 유학생들이 1963년 이전까지 정치심사 결과를 받지 못했다. 결과를 받지 못한 이유는 대부분이 ‘조사할 수 없음’이었다. 예를 들면 1953년 일본에서 귀국한 홍청옌(洪淸淡)의 정치심

107) 재일 유학생 귀탄평 인터뷰, 2007년 11월 25일, 北京市, 재일 유학생 정바오성 인터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

108) 재일 화교 정바오성 인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

109) 해방 후 자본주의 국가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 조사표》(北京市문, 007-001-00155, 1963년 1월 1일—12월 31일)

110) 베이징시 귀국 유학생 조사표》(北京市 문서, 007-001-00149, 1962년 1월 1일—12월 31일) .

사 결과란에는 이렇게 적혀있었다.

‘이 동지의 정치역사는 결론을 내릴 수 없다. 이유는 조사가 불가능하기 때문이다. 그의 원적은 대만이고 일본에서 유학했으며 사회관계가 복잡하다. 부인은 일본사람이고 장인, 장모와 아내의 형제자매는 모두 일본에 있다. 아버지와 형, 누나, 여동생은 현재 대만에 있다.’¹¹¹⁾

비록 귀국 유학생 중 대부분은 별 문제가 없다. 하지만 홍칭옌처럼 사회관계가 해외나 대만에 있는 경우 중국정부는 ‘조사할 수 없음’을 이유로 ‘역사’와 관련한 정치심사도 결론을 내지 못했다. 이런 경우 대부분 직업상 정치심사 결과의 영향을 받았다. 그러나 중일관계 정상화가 이루어지고 개혁개방이 실시되면서 이런 상황은 개선되기 시작했다. 1970년대 이후 정부의 대일업무 활동에서 1950년대 귀국한 재일 유학생들을 볼 수 있게 되었다.

앞에서 말한 귀국한 유학생과 화교는 ‘해외관계’와 ‘역사’문제 때문에 1957년 반 우파운동과 문화대혁명 기간에 박해를 받았고 이 때문에 개혁개방 이후 그들 중 절반 이상이 조국 대륙을 떠나 일본으로 돌아가거나 다른 나라나 지역으로 이주해 갔다. 국가가 그들의 애국 열정을 의심하자 그들은 자신의 역량을 발휘할 수 없었고, 조국의 국가건설에 기여하고자 했던 열정도 실현하지 못했기 때문에 내린 결론이다.¹¹²⁾

결론

전쟁이 끝난 후 일본에 있던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즉각 귀국하지 않은 것은 학업이 끝나지 않았거나 중국 내전이 발발한 이유도 있지만, 또 일부는 자신이 일본에서 생활하고 유학했던 경험이 귀국 후 직업이나 생활에 문제가 될까 봐 걱정했기 때문이기도 하다. 그래서 1949년 이후까지도 여전히 많은 중국인들이 돌아가지 않고 일본에 남아있었다.

1949년부터 1950년대에 들어서면서 중국정부의 초청이나 친 중공 언론매체,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사람들이 전해오는 중국에 관한 선전과 소개로 일본에는 고국으로 돌아가고 싶은 염원을 가득 품은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점점 늘어나기 시작했다. 특히 1953년 유학생과 화교의 대규모 귀국은 집단 귀국열풍이라 할 만큼 거셌다.¹¹³⁾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일본을 떠나고자 했던 이유는 전쟁 전에 받았던 차별대우나 전후 일본에서의 궁핍한 생활에서 벗어나고자 함이었다. 이런 경험과 전후 승전국 국민으로서의 우월감도 중국인으로서의 의식을 강화하는데 일조했다.

당시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귀국에는 2가지 가능한 선택권이 있었다. 즉 중화민국이나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 통치하는 지역 중 둘 중 하나를 선택하는 것이다. 대부분의 귀국 유학생들은 처음에는 공산당이 통치하는 중국대륙을 선택하지 않았다. 본고에서도 언급했듯이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전후 초기 국부를 침이 마르도록 칭찬하고 장제스를 절대적으로 숭배했다. 하지만 그들은 국부가 통치하는 지역을 선택하지 않았다. 이유는 전후 국부의 관료들이 일본 유학생들을 ‘간신

111) 해방 후 자본주의 국가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 조사표》(北京市 문서, 007-001-00155, 1963년 1월 1일—12월 31일)

112) 曹石堂조국이야, 나를 의심하지 마라! 정치범에서 대학교수가 된“의 전후 이야기》日经济评2006. 재일 유학생인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

113) 재일 화교 정바오성 인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재일 유학생 인터, 2007년 11월 23일, 北京市.

배'의 일부로 여기며 그들을 달가워하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국부의 이런 행동은 재일 유학생들에게 설사 대만으로 가더라도 국부는 그들이 '정부관리가 되는 대문'은 닫아걸 것이라는 느낌을 주었다.¹¹⁴⁾ 게다가 내전을 통해 드러난 국부의 부패, 국민을 진압하는 태도, 일본에 대한 파병 중단 등이 국부에 대한 반감을 부추겼다.

나아가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의 집단 귀국 열풍을 형성한 결정적 원인은 중국 정부가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 단체를 통한 중국의 현황과 정책 선전이다. 왜냐하면 동학총회, 도쿄 화교총회 등은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의 전폭적인 지원을 받았기 때문에 이 단체를 통한 선전활동은 상당한 효과를 발휘했다.

본고의 내용을 통해 알 수 있듯이 집단 귀국열풍은 전후 유학생과 화교에게 중국을 직접 선전함으로써 애국학생과 화교들의 열정에 불을 붙인 결과이다. 중국정부의 선전으로 유학생과 화교는 정부가 자신들의 귀국을 열렬히 원하고 있다고 여겼다. 이 또한 그들이 '역사' 문제라는 굴레에서 벗어나 귀국 대열에 합류할 수 있었던 원인 중의 하나이다. 신중국 건설에 기여하겠다는 유학생과 화교의 애국열정은 또 다른 유학생들에게까지 영향을 미쳤고, 그 결과 집단 귀국열풍을 형성하게 된 것이다. 귀국하기 전까지 많은 유학생들은 공산주의 중국에 강한 동경심을 갖고 있었다. 그 중 일부 유학생과 화교는 중국의 현실을 제대로 파악하지 못했다. 예를 들면 '무료로 대학진학', '소련으로 유학' 등의 꿈꾸며 귀국한 사람도 있었다.¹¹⁵⁾ 그 밖에도 많은 화교들은 '일본에서 취업도 안되고 생활도 어려우니 모든 노동자가 평등한 중국으로 가서 살고 싶다'는 이유로 귀국을 선택하기도 했다.¹¹⁶⁾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들이 취업하는데 가장 큰 영향을 미친 것은 '해외관계'와 '역사'문제 관한 정치심사였다. 구 일본식민지 정부와 일본의 왕위정권이 파견했다는 과거의 배경과 친지와 친구 등 복잡한 사회관계가 그들이 중국에서 취업하고 발전하는데 장애가 되었음은 명백한 사실이다. 이렇게 확인하기 어려운 '해외관계'와 '역사'문제라는 굴레에 갇힌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은 1957년 이후의 반 우파운동에서 문화대혁명에 이르기까지 긴 세월 동안 각종 박해를 받았다. 특히 문화대혁명 기간 특별한 예외가 아니면 거의 모두가 강제적으로 농촌으로 내려가거나 '오칠(五七) 간부학교'에서 고단한 생활을 보냈다.¹¹⁷⁾ 이는 다른 자본주의 국가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들이나 화교들에게서도 공통적으로 나타난 현상이다. 그러나 중일관계 정상화 이후 특히 개혁개방 이후 그들의 '해외관계'와 '역사'는 다시 주목 받으면서 중국의 외교활동과 경제발전에 중요한 기여를 했다. 그들은 중앙정부와 각종 대외교류 장소에서 활발히 활동했다. 예를 들면 중일관계 정상화 협상 때 일본어를 잘 하는 인재가 부족해 1950년대 귀국한 재일 유학생과 화교들이 동원되어 준비작업에 참여했고, 일본 정부나 재계, 언론매체 등과의 교류에서도 통역업무를 맡았다. 중일관계 정상화 이후 정부와 민간차원의 방일대표단 통역은 대부분이 1950년대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유학생이나 화교였다.¹¹⁸⁾ 이런 현상을 통해 알 수 있는 점은 중국 정부가 유학생과 화교가 항일전쟁기간 일본에서 유학하거나 생활한 것을 문제삼지는 않았다는 것이다. 오히려 중일관계

114) 일본 속의 중국》【日아사히신】1953년6월14일 개재

115) 재일화인터,2007년11월23일,北京市재일 화교 인터, 2007년11월26일,北京市.

116) 재일 유학생 한청위 인터, 2007년12월10일, 日本京.

117)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台海出版社, 2003년.

118) 재일 유학생인터뷰2007년11월23일, 北京市. 재일유학생 정바오성 인터뷰,2007년11월23일, 北京市.

개선을 위해 이들을 많이 기용했다. 다시 말하면 건국 초기 중국 정부가 모든 문제에서 일본과의 전쟁역사를 문제삼지는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유학생과 화교가 귀국한 이후부터 문화대혁명까지의 긴 시간 동안 그들의 발목을 잡았던 ‘해외관계’ 특히 일본과의 관계는 개혁개방 이후 그들의 발전에 오히려 도움이 되었다. 오랜 기간 남들에게 알리고 싶지 않았던 ‘해외관계’는 그들이 발전할 수 있는 원동력이 되었으며, 개혁개방 이후 다시 한번 자신의 일본 출신과 일본과의 관계를 강조하는 계기가 되었다.¹¹⁹⁾

119) 《회고 50년-건국초기 일본에서 귀국한 일본 여행객, 화교, 유학생들의 문집》 台海出版社, 2003年 재일 유학생 귀평탄 인터뷰, 2007年11月25日, 北京市재일 유학생 정바오성 인터뷰, 2007年11月23日, 北京市

戦後初期の留日学生・華僑の動向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中国と日本の挟間に生きる中国人—

王雪萍（関西学院大学）

〈目 次〉

はじめに

一、戦争中の日本体験と中国人意識

二、战胜国民意識の形成と国府に対する態度の轉換：1945年8月～1949年9月

三、留日学生が新中国を支持する行動と帰国ブームの形成過程：1949年10月～1955年

四、「知識分子」中心の帰国ブームと帰国熱の減退：1956年以降

五、帰国熱の減退と帰国留日学生・華僑の身分問題：1957年以後
おわりに

はじめに

1945年8月、日中戦争終結時、日本には数多くの中国人が滞在していた。当時、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中国人の人数に関する確かな統計はないが、GHQ（連合国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による送還のデータを参考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同資料によると、少なくとも85,692人の中国人(台湾人を含む)が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また、1945年から1948年までの間に、大多数(65,885人)の中国人(台湾人を含む)が帰国したが、1949年以後も2万から4万人程度の中国人が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という記録もあ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国（以下：中国）が建国された。当時、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大部分は戦争中、台湾、満州、中国大陆の日本占領地域からの自费留学生と汪兆銘政权などの傀儡政权と旧植民地政府に派遣された国費留学生であった。

留学生を含めて、当時、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中国人には自らの将来に関して四つの選択肢があった。第1に中国統治下の中国大陆への帰国。第2に中华民国(以下：国府)統治下の台湾への帰国。第3に日本での継続滞在。第4に日本以外の国への移住であった。

結果として、1949年から1958年までの間に、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4,000～5,000人の中国人留学生、華僑、労働者が第1の選択肢、すなわち中国大陆へ帰国した。この時期に帰国した中国人の中に約3,000人の台湾籍の華僑・留学生も含まれていた。特に1953年から1955年には、留日学生・華僑の間で、中国大陆への帰国ブームが起これ、3,178人の留日学生・華僑が帰国した。

なぜこれほど多くの台湾籍留学生・華僑を含めた中国人が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人民政府）統治地域への帰国を選択し、また、留日学生と華僑の間に中国への帰国ブームが起きたのか。

その要因は、戦後、時間が経過にともなって、彼らの歴史認識や身分が変化したことと関係が

あるのだろうか。他方、中国政府は敌国であった日本から帰国した彼らをどのように受け入れたのか。また、日本での滞在経験を持つ彼らは、帰国後どのような生活を送ったのか。帰国後の経験は、彼ら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に影響を与えたのだろうか。

本稿は上記の課題に応じるべく、1949年から1958年まで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の帰国過程を分析し、その段階まで日本に留まった理由及び帰国を決断した理由とともに、各時期の彼らの国家意識、民俗意識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たい。そのため、本稿は1949年までの期間についても本論の背景として検討する。

次に先行研究について見てみよう。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人の留学について、日本では、川島真と河路由佳・淵野雄二郎・野本京子などの研究があるが、日中戦争時に日本に留学した中国人の帰国に関する研究は、陳焜旺の著書が最も詳しい。しかし、陳の研究は華僑・留学生の日本での運動に主眼を置き、中国へ帰国後の動向に関わる论述は極めて少ない。

議論を進めるに当たり、1949年当時の留学生について明確に定義しておきたい。筆者は中国政府教育部回国委员会の留学生に対する定義と日本に留学していた中国人留学生統一組織である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以下：同学总会）の会員の範囲を参考とし、日本の大学（短期大学を含む）で正規生としての学習年数を終了した（卒業できなかった留学生も含む）中国大陆及び台湾出身の学生と華僑学生を留日学生と定義する。また、日本の大学、高校や専門学校で学習経験をもつが、卒業せずに建国初期に帰国した留日華僑の事例も取り上げる。

また、ここで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帰国過程の時期区分について述べておこう。それは、第一段階：1949年～1952年の秘密里におこなわれた個別帰国；第二段階：1952年～1955年の集団帰国ブーム；第三段階：1956年～1958年の「知識分子」中心の帰国の三段階である。

本稿で用いる資料は次の通りである。ま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の機関紙である『中国留日学生報』、中国建国初期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が集団帰国50周年を記念するために編集し、78名の留日学生と華僑の帰国状況を記録した『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また、筆者がおこなった1949年から1958年までの間に中国に帰国した留学生17名と留学生の帰国の促進活動を積極的に行っていた同学总会の元主席である韓庆愈氏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である。

そして、近年、中国外交部が公開した1949年から1960年までの外交部档案に見られる、同時期の教育部が外交部に送付した教育部档案や留学生の帰国に際する外交部と外国政府との交渉過程に関連する档案、北京市档案馆に保存されている1949年から1969年までに北京市政府に送付された留学生の帰国促進に関連する档案、及び帰国後北京市で就職した留学生に関連する档案、および李滔編『中華留学教育史録—1949年以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などを用いる。

一、戦争中の日本体験と中国人意識

戦後初期から1950年代までの時期、留日学生・華僑が戦勝国民として日本に残ることは制度上何の問題もなかった。では、何故これ程多くの留日学生・華僑が日本を離れ、中国大陆へ帰国したのだろうか。帰国するのが中国人として当然であると考えた留日学生も多くいたが、日本での生活状況から判断して、帰国を選択した者も多かった。本章では、留日学生・華僑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と留日学生・華僑の回想録をもとに、当時の日本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とりまく社会状況と

彼らの帰国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い。

1949年以后、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留日学生のほとんどが戦前に日本に来ていたため、戦時中の記憶が彼ら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ことは想像に难くない。筆者が行ったインタビューや、帰国留学生・华侨によって書かれた回顧録では、戦争終結前、日本では多くの日本人が植民地であった台湾や日本占領地域であった中国大陆からの留日学生・华侨に対して、差別的な態度を取っていたことが述べられている。

例えば、『回国五十年』（2003）の中で、在日华侨の陈永华は10岁以前の小学校时代について、「小学校に行って、自分が周囲の学生たちと違い、中国人であることを感じた。日本人の子供たちは中国人を『支那人』、『チャンコロ』、『南京虫』などと呼んだ。これらは差別的な呼び方だ。日本人の子供たちの目に我々は轻蔑されるべき『支那人』として映っていた」と回想している。『回国五十年』（2003）に回想録を記載している78人の内、13人がこれと同様の体験を語っている。多くの华侨学生は、日本生まれで、母国語も日本語であった。中国語が少しも話せない华侨も一部いた。しかし、日本が敗戦する前、日本社会のなかの、中国人を差別する考え方、行動などの存在は、逆に在日留学生・华侨の中国人意識を強く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また、一部の日本で生まれ、日本で育って、幼少期において、日本人となんら違いもないと思っていた华侨でさえ、小学校などの日本の学校に入学してから、自分が二等、三等国民—中国人である身分を強く意識しはじめた。このような経験こそが、戦後彼らが積極的に中国留学生団体の活動に参加させた理由で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体験から、多くの留日学生・华侨が戦争終結直後から帰国を热望していながら、帰国の手段がなく实现できなか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る。

もちろん、これらの語りは留日学生・华侨の青少年期の記憶を50年以上のちの、回想であるため、当時の状況と乖離している可能性もある。しかし、当時の状況に鑑みれば、回想もあながち同時代の状況と乖離したものと断定できないと思われる。

二、戦勝国民意識の形成と国府に対する態度の転換：1945年8月～1949年9月

1. 戦後直後の戦勝国民としての喜び

前述のように、留日学生と华侨は戦時中日本人から「チャンコロ」、「支那奴」と呼ばれ、差別的な対応を受けたことが多かった。日本の敗戦によってその状況は一変した。中国留日学生・华侨は战胜国民として特別配給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日本人より高い特権をもらえたため、战胜国民の意識を持ち始めた。同時に、中国人としての権利を守るようになった。例えば、日本の新聞で中国人を差別する言葉が使われた場合、すぐに抗議活動をし、中国人としての自尊心を強調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また留日学生王家鼎の回想によると、金澤在住の留日学生たちは、西尾港で400人以上の中国人劳工が日本人と衝突し監禁されたことを知り、連合国の監察員を装い、中国人劳工の権利を守り、中国への帰国を帮助したという。また、連合国民として日本政府から特別な配給品を给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によって、日本人に対して优越感を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当時の留日学生の多くが、このような优越感を持っていた。

当時、日本との戦争で勝利を収め、日本での自らの地位が向上したのは、国民党の功績だと考える留日学生が多く、国民党や蒋介石を崇拝する気持ちが留日学生の中に多く存在した。留日学生の韓庆愈氏は当時の状況を「日本に勝ったのは国民党だと認識している。中国人を日本から解放してくれたのは蒋介石だから、蒋介石の人气は絶大だった。私も国民党に入党しようと思った」と振り返っている。1947年の『中国留日学生報』には蒋介石の留学時代を紹介する記事が連載されており、留日学生の蒋介石に対する憧れをかいま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2. 日本の生活の苦しさと留学生救済金

戦後、日本に残っていた留日学生・华侨の多くは、戦争期間中に来日した学生である。太平洋戦争開始後、日本国内の状況は好ましくなく、日本人だけではなく、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外国人学生も強制労働を強いられる状況に陥り、彼らは苦しい生活を強いられた。

1945年の日本敗戦をきっかけに、中国は战胜国となり、战胜国民としての中国人の生活は一部改善された。特にGHQの占領下で、中国からの留日学生も战胜国民として特別配給を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また一部の留日学生は日本政府、国府の留学生救済金を給付されたため、僅かではあるが余裕を持って生活していた。しかし、それでも多くの留日学生が苦しい生活を送っていたため、その留日学生たちが勉学を継続できるように、华侨の間で募金をして、貧困留日学生のために、同学总会のなかに留日学生奨学会を创设し、それを貧困学生に分配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しかし1949年に入り、国共内戦が中共側の勝利に傾くと、GHQと日本政府が中共よりの同学总会に関わる留日学生に対して厳しい態度をとるようになり、生活困難に陥る留日学生が多くなった。また国府は留日学生に対して救済金を支拂う条件として、蒋介石に対する忠誠を表す誓約書に署名捺印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た。署名捺印を拒否した留日学生は救済金を受給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

留日学生・华侨の生活が困難な理由の一つは、戦後日本での就職が極めて難しいからである。1945年から1950年代初期にかけて、日本人の引揚があり、日本人でさえも就職難だった、ましてや専門技術や専門知識がない留日学生と华侨が就職することは非常に難しかった。在日华侨の失業問題に関する正式な統計データはないが、在日华侨の回想録からその状況の一部が読み取れる。例えば、在日华侨だった黄惠美と甘丽娟が归国理由として挙げたのは、父親と自分の失業問題であった。また、在日华侨学生だった吴千代子は卒業後、就職活動を行った時、「本籍が中国だ」という理由で就職を断られたとしている。

また、『朝日新聞』のインタビューを受けた1953年に归国予定の留日学生・华侨が归国理由として最も多く上げたのは、「日本は『外国だ』、我々は苦しい思いをして知識を身につけたが日本で役立て得る望みはない。先輩の生き方を見ても、料理屋とか杂货商とかになっていて、せっかく仕入れた学识をまったくムダにしてい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

归国理由は、以上のように、外国人であるため日本で良い職に就くことが困難で、生活が困難であったことであることが伺える。

3. 敵国に留学した行為に対する懸念

留日学生が战胜国民としての优越感を持つ状態はそれほど長くは続かなかった。戦争終結

後、国府は驻日代表团（以下：代表团）を派遣した。代表团は居留民保护もその职掌としていたので、留日学生とも接触した、学生たちは、代表团の中国官僚との交流を通じて、自分たちの身分問題を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った。元同学总会主席である韩庆愈は、中国人留学生の代表の一人として代表团に面会した時の経験を以下のように回想し、留日学生が国府を選ばなかったのは、国府が傀儡政权によって日本に派遣された留学生を歓迎しなかったからだと述べている。

「代表团は留学生代表に、傀儡政权から派遣されてきたお前たちも、傀儡と同然だと言った。私は惊いた。それは『日本のスパイ』と言われたのと同じだった。国民党は旧満州からの留学生を『中国の里切り者』だと見なしていた。少なくとも、国民党の主流を占める连中は、留学生をそういう眼で見えていた。やっと祖国に戻ったという喜びがあるのに、代表团に実際に会ってみると、お前たちは日本の協力者だという。よくぞ祖国に帰ってきたと抱きかかえるかのように迎えられようと思っていたが、まるで正反对だった。それ以前は国民党に入党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たが、この状態ではなろうにもなれなかった。留学生たちは、政治的に国民党が嫌いではなかった。しかし、彼らは国民党に歓迎されなかったのだ。いま一つ我慢できなかったのは、代表团が『国民党は解放者で、留学生たちは被解放者だ』という歴然たる差別を作ったことだった」。

韩の言葉から、代表团との交渉によって、自分たちが「祖国を里切った汉奸」だと見なされていたという現実を認識したことが分かる。

この現実には後に国府が発表した留日学生に対する教育政策にも現れている。戦後、国府は日本在住の华侨や留学生の生活に关心を示し、彼らの归国に対して協力的な姿勢を示したが、留日学生・华侨の中国に対する思想問題に疑いをもち、政府内に特別教育団を日本に派遣して、日本各地で留日华侨・学生に対する教育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と訴える声もあった。

また、国民政府教育部は1947年1月8日に『留日学生召还弁法』と『抗日战争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弁法』を発表し、その中で归国した留日学生に対して以下のように要求し、政治的な再教育を行う方針を示した。

「日本の专门学校以上の学校を卒業した者は、すぐに『国父遗教』（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を含める）及び『中国の运命』を読み、研究する必要がある。……また读书报告书を作成、留日学生甄审委员会に提出し、审查を受ける。合格者は元卒業学校の性质と程度によって、证明书を发给する」。

この『留日学生召还弁法』が発表されてから、留日学生は、「強制的に归国させることにならないだろうか」という声が『中国留日学生报』に掲載され、強制归国になる悬念も示された。

以上のように、代表团の留日学生を汉奸扱いする態度や、留日学生に対して特別な教育を実施する政策の発表などといった国府の行动に対して、留日学生は不信感を抱き、归国しても重視さ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は後に国府が台湾に移转してからも、留日学生が台湾への归国を拒んだ大きな理由でもあった。

4. 国府の日本への占領部隊の派兵問題

戦後、連合国の間で日本の占領方法が协议され、日本を占領するために国府も連合国の一員として占領部隊を派遣することになり、1945年～1946年の派兵計画についても具体的な议论がな

された。蒋介石は占领部隊の駐在を准备するために、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を日本に派遣した。

中国から日本占领部隊が派遣されるニュースを聞いて、留日学生と华侨は兴奋した。それは日本へ占领部隊を派遣すれば、中国政府は正式に日本を占领する战胜国としての地位を固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中国の国際的地位の向上によって、日本で生活している留日学生・华侨の地位も向上することが予想できた。そのため、留日学生・华侨は占领部隊の来日を熱望した。

しかし中国驻日占领軍が、日本に进驻する前に内戦が勃発したため、国内の戦場へと派遣され、後に中共の解放军に歼灭されたため、日本への派遣が実現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この結果に、留日学生は強い失望感を覚えた。派兵せずに内戦を開始した国府に対する認識も悪化したと言えよう。

5. 二・二八事件と台湾華僑の態度

1947年に発生した二・二八事件も留日学生・华侨の国府への認識を大きく左右した事件の一つである。国府が軍隊を派遣して台湾人の抗議デモを鎮圧したことで、数多くの台湾人が殺された。事件の状況は日本で広く報道され、日本で生活していた留日学生・华侨の中にも台湾出身者が多くいたので、事件に対する関心はかなり高かった。

事件に衝撃を受け、华侨連合会副会長の楊春松はすぐに代表团に出向き、抗議を行った。また、代表团の反対を無視して、留日华侨总会に「二・二八惨案処理委員会」を設立し、集会を開くなどの活動を通じて、国府の暴行を訴えた。二・二八事件をきっかけに、多くの台湾华侨が中共よりの姿勢を見せ始めた。同学总会の机关紙『留日学生旬報』も事件について報道し、留日学生の中で事件についての関心が広まった。これも留日学生・华侨の国府に対する認識悪化につながったと言える。

6. 中国内戦の進展と留日学生の思想変容

戦後直後から、国共内戦の兆しは現れていた。日本の留日学生・华侨の中には、戦争直後の内戦に対する反対意見が根強かった。しかし、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軍は共产党軍に対する全面攻撃を開始、国共内戦が勃発した。留日学生の一部は内戦を发动した国民党に対して批判的な態度を示し、反内戦運動を展開し始めた。しかし、大部分の留日学生は当初、共产党が勝てるはずがないと考え、国民党政権が変わらなければ、自分たちの生活と大きく関係すること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た。

戦況は予想に反して、共产党の勝利へと傾き始めた。留日学生がこの情勢を意識し始めたか、あるいはその希望を表現し始めたのは1947年後半である。一部の留日华侨が1947年に日本で「中国通信社」を設立し、中国内戦の戦況を日本で随时、報道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1948年に入ると、中国の内戦の状況はますます共产党优利となり、留日学生・华侨の内戦に対する関心も高まった。また、日本共产党も中国の内戦の状況について講演会などを開催し、国民党の腐敗や、中国共産党の民主的な政策、その優勢な状況について宣伝していた。当時、時おり国府系の新聞が留日学生に送られていたが、同時に『文汇报』、『工人日报』などの新聞も次第

に日本に送られてきた。留日学生もこれらの新聞に影響され、考えが大きく変わるようになった。

また、戦後直後から、日本での共産主義の書籍に対する禁止が解かれ、日本共産党などの努力によって、多くの共産主義関連の書籍が日本で出版された。他にも、中国共産党、毛澤東の書籍も日本語に翻訳され、日本で出版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毛澤東の『新民主主義論』や『連合政府論』などの書籍は、多くの留日学生の愛読書になり、その影響を受けた留日学生の一部が国民党の独裁統治を反対し、中国の未来を毛澤東と共産党に托すようになる傾向が見られた。『中国留日学生報』も1948年11月から、每期、解放区の生活や、中国共産党の政策について報道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同学总会は共産党支持に転向したと言えよう。1949年5月1日のメーデーに、同学总会の学生たちは毛澤東の絵を持って、東京のメーデーのデモに参加した。この行動からも、1949年5月の時点で、同学总会が共産党支持の態度をと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

三、留日学生が新中国を支持する行動と帰国ブームの形成過程：1949年10月～1955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国が成立した。同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会直属の「弁理留学生回国事務委員会」（以下：回国委員会）が発足した。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は国内外に、海外に滞在している留学生が帰国して、国家建設に参加することを要請する放送を行った。また、周恩来総理は中国共産党と人民政府を代表して留学生の帰国を求めた。1950年6月18日、同学总会は中華全国学生联合会からの手紙を受け取った。その内容は、人民政府部門を代表して留日学生に帰国して祖国の建設に参加するように呼び掛けたものであった。その後、一部の留日学生には教育部帰国留学生招待処から帰国要請書が直接送られた。その要請書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は貴方及び他の留学生が帰国して祖国の社会主义建設事業に参加することを歓迎する」と書かれていた。

人民政府からの呼びかけを受け、留日学生は個別帰国を開始した。当時、日本政府と新中国との間には国交がなく、また1950年に朝鮮戦争が勃発し、中国と日米両国は敵対関係となっており、留日学生が中国へ帰国するには、複雑な手続きと煩雑な帰国ルートが求められた。そのため、留日学生は秘密里に個別帰国することを余儀なくされた。そのため、1949年から1952年まで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の人数は102～300人程度であった。

留日学生の大部分は戦争中に日本の旧制中学に在学しており、戦後になって大学に進学した者も多かった。総じて、1951年から留日学生たちが大学を卒業し始めたといえる。卒業する留日学生の人数が増えるにしたがって、帰国を求める者も増え、1953年になると帰国を希望する留日学生は数百人規模になり、多くの華僑学生も帰国を希望していたため、1953年6月に帰国手続きを終えた中国人は807人に及んだ。さらに、日本での生活は維持しにくい、国府が統治している台湾へは帰国したくないという理由から、戦争時に台湾から日本に来た労働者が数千人規模で中国への帰国を希望した。それまでの秘密里に行われた個別帰国方式とは異なる状況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1952年、日中両国は中国に残された日本人の引揚について交渉し始め、日本政府が引揚船を中国に派遣するニュースが日本で報道されると、留日学生と華僑はこの机に留日学生と華僑の日僑引揚船を利用した帰国を実現しようとした。そこで東京華僑总会などの中国関連団体は、

1952年12月、留日学生・华侨の归国及び中国人捕虜の遺骨送还を日本政府と三団体（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平和连络会）、人民政府に求めた。人民政府はその後、積極的に日侨引揚交渉の中で留日学生・华侨の归国及び遺骨送还を要求した。会谈の結果、「引揚船を利用して往航に归国希望者の华侨および遺骨を乗せてほしい」という中国側の要望を日本赤十字社が受入れ、実施するという秘密口头了解が成立し、日本政府外务省もそれを了解した。しかし、その後国府の反対などの理由で、在日中国人の引揚船による归国は実現できなかった。これに対して、留日学生・华侨は一連の抗议活动を行い、人民政府も協力した。この一連の活动を受け、日本政府は国府と交渉し、その态度を软化させ、1953年6月に出港予定の第4次引揚船への中国留日学生・华侨の乗船を認めた。

1953年6月27日に舞鶴港から出港した第4次引揚船が中国人の第1次归国船となり、551名の留日学生・华侨が归国した。その後も様々な困难を克服し、1955年までに3,178人の留日学生・华侨が归国した。まさに归国ブームだったと言える。

1949年以降、日本を离れて归国する中国人留日学生には二つの行き先があった。しかし、上述したように、1955年までに多くの留日学生・华侨は中国大陆への归国を選択した。その选择に际しては、国府统治地域の台湾と人民政府统治地域の中国大陆に対する认识が重要となる。特に内战を経て、中国大陆の统治权を勝ち取った人民政府に対する考え方の変化は留日学生の归国选择に大きく影响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こでは、留日学生の意识の过程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1. 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成立と同学總會の支持表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を宣言したニュースは、留日学生と华侨の間に、大きな反响を呼んだ。中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は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に関する声明书」を发表し、「われわれは新政府の指导の下、……祖国の人民とともに斗うものであることを、感激を以て表明する」と新中国支持の意思を表し、同学总会と各地の同学会でもそれぞれ代表委员会を開き、新中国支持の决议を采择した。10月10日は、中华民国の建国記念日である双十节なので、1949年10月10日に、留日华侨总会、东京华侨联合会と留日同学总会の共催で双十节祝贺大会を開催する予定だったが、急き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に切り替えた。これは、留日学生、华侨の三组织が新中国を支持することを正式に表明した行动である。

1950年3月25日、同学总会主席の李桂山は同学总会を代表して毛泽东国家主席へ手紙を出し、同学总会によるそれまでの共产革命への支持活动を紹介した上で、留日学生の革命活动への参加意欲を表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を祝った。同学总会は、各地の留日学生をまとめた组织であるため、同学总会の明确な中华人民共和国への支持表明は、日本全土の留日学生の支持政党の选择に影響を与えたと言えよう。

2. 人民政府からの帰国要請と救済金

留日学生の归国ブームを引き起こした原因の一つは、中国から留学生に送られた救済金である。前述したように、戦後留日学生の生活は贫穷していた。

この状況下で、人民政府は1952年9月に同学总会あてに7900ドルの救済金を送ってきた。中国からは継続的に救済金が送られ、1952年一年間だけで5万ドルに達した。救済金の送付は1957年ま

で続けられた。同学总会は、運営委員会を設置し、救済金を貧困留日学生に支給した。1952年10月から、大学に在籍している留日学生だけでなく、高校に通っていた华侨学生にも救済金を支給した。

建国してまだ三年も経っていない1952年は、国内建設においても、また、朝鮮戦争のために、莫大な予算が必要だっ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人民政府が貧困留日学生に救済金を送ったことは、留日学生の心を温めることとなった。多くの留学生が中国の留日学生に対する気持ちに感動したと回顧している。特に、国府の駐日代表团に冷遇をされた留日学生の眼には、この救済金の送付は人民政府が留日学生を歓迎するという意思表示であると映り、留日学生と华侨学生の帰国熱が高まった。救済金の送付は、留日学生が中国へ帰国する重要な促進剤となったと言える。

3. 同学総会、華僑総会と中国系メディアによる中国宣伝

前述したよう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同学总会、东京华侨总会などの留学生・华侨の組織は中华人民共和国への支持を表明した。その後、留日学生・华侨の組織は新中国の政策、状況について積極的に宣伝するようになった。同学总会机关紙『中国留日学生報』と、東京华侨总会机关紙『東京华侨会報』はほぼ毎期、中国の情報を掲載し、留日学生と华侨に対して新中国を宣伝した。特に、『中国留日学生報』では、中国の大学教育事情や、帰国留日学生からの手紙など数多くの記事を掲載し、中国では大学教育を無料で受けることができ、学生たちが楽しい大学生生活を送っていることなどを紹介した。苦しい大学生活を送っている留日学生や、経済的な理由で日本の大学に進学できない华侨学生がこれらの記事に惹きつけられた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これもまた留日学生の帰国に拍車をかけたのであろう。

また、すで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华侨から同学总会の友人宛に手紙が送られてきた場合、『中国留日学生報』でそれを掲載することもあった。留日学生・华侨の知人が手紙の中で紹介する中国の状況は信頼度が高いものとして受け止められたことが想像できる。

さらには、华侨事務委員会副主任・廖承志は、1953年7月に第1次留日学生・华侨の归国船代表として归国した同学总会主席・韩庆愈と面会し、新中国を日本で宣伝すべく、中国よりの中国語新聞の創立を韩に依頼した。韩庆愈は日本に戻ってから、すぐに留日华侨の支持を集め、1954年3月1日に中国語紙『大地報』を创刊した。『大地報』は1970年1月12日まで刊行され、中国の宣伝に努めた。特に、归国した留日学生や、华侨学生からの手紙や、彼らへのインタビュー、中国における教育の現状についても連続して掲載し、留日学生・华侨の归国を促進する役割も果たした。

このほかにも、日本に対して、国营通信社・新华社や北京放送局などの中国メディアも宣伝活動を行い、1950年代以降、留日学生・华侨は、中国関連のニュースや、新政策についての情報を迅速に取得できる環境にあったと言える。

4. 引揚者による中国紹介

留日学生・留日华侨の中国情報のもう一つの情報源は中国大陆から引揚げた日本人であっ

た。日本人引揚者は1949年までに中国大陆から断続的に日本に归ってきた。彼らの中には中共地域から引き揚げた者もいた。そのため、中共統治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知りたい留日学生や、华侨は時々中国からの引揚者を招き、集会を開催し、中共地域について語ってもらった。その情報の一部は『中国留日学生報』にも掲載された。

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後の日本人の集団引揚げは1953年から始まり、多くの引揚者が帰国した。そのニュースや彼らのインタビューを多くのメディアがとり上げた。そのほとんどが新中国の生活はいかに経済的な心配がなく、平等・公平であり、市場が安定して、商品が豊富であり、幸せ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た。さらに、帰国者を招いて座談会を開催し、留日学生・华侨に中国の現状を説明してもらうこともたびたびあった。これらのニュースや経験談が留日学生・华侨の帰国決定にも影響を与えたことであろう。

四、「知識分子」中心の帰国ブームと帰国熱の減退：1956年以降

1953年は、帰国した留日学生・华侨は全部で2650人に上り、まさに留日学生・华侨の帰国ブームだったと言える。その後帰国したのは、1954年が13人、1955年が519人となっており、1953年の2650人と比べると大幅に減少している。この減少は帰国を熱望した人々のほとんどが1953年の帰国船で集团的に帰国したことによる。また、一部帰国した留日学生・华侨からの手紙や、メディア報道によって、帰国した中国人の生活苦が日本に伝えられ、留日学生・华侨の帰国熱が下がったことも原因である。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は知識分子に関する会議を開催し、周恩来总理が「知識分子の問題に関する報告」において、国家建設の上での世界レベルの高級知識人の不足状態を訴え、知識人を適切に用いるように要求した。同会議に参加した中国科学院院長・郭沫若は高級知識人不足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イギリス、日本といった資本主義国家から中国人留学生1万人程度を帰国させることを提言した。この提案を受け、高等教育部は「資本主義国家に残っている我が国の留学生の帰国促進に関する通知」を作成し、1956年中に少なくとも1,000人の留学生の帰国を促進する計画を発表し、各部門に協力を要請した。この要請を受け、各中央政府部门や、地方政府は留学生の帰国促進活動を積極的に行った。

そして、人民政府が留日学生の帰国促進に关して、1956年末までに150人の留日学生を帰国させるという目標を立てた。1956年2月に国务院侨務委员会主任・廖承志が同学总会に書簡を送り、留日学生の帰国促進に協力するように要請した。

同学总会は廖承志から留日知識人の帰国を促進するよう要請を受け、東京华侨总会、同学总会を中心に帰国促進活動が行われた。その様子が当時の『中国留日学生報』と『大地報』から読み取れる。

1956年3月1日の『中国留日学生報』には、1月14日に周恩来总理が発表した「知識分子の問題について」を全文掲載し、1月30日に開催された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期全国委员会・第二回全体会议の様子を伝え、郭沫若が同会議で行った「社会主义革命の高まりにおける知識分子の使命」という報告の内容についても紹介した。これらの記事は中国の新しい知識人政策を紹介するもので、留日知識人の帰国促進活動の契機となったと見ていいだろう。

さらに、同年4月1日と5月15日の『中国留日学生報』は留日学生の帰国特集を掲載し、「祖国はあなたたちを必要としている 学んだら帰ろう」、「何も心配せずに早期の帰国を」、「現在

は归国の好机会 人材があまりにも足りぬ」、「平和里に社会主义社会に行こう 海外インテリは期待されている」、「祖国は猛スピードで发展している 学んだ技術を人民に贡献しよう」、「荣誉な事业が我々を待っている」などの见出しが跃り、紙面を賑わせた。それらの記事は具体的な事例を挙げながら、留日学生が必要性、一日も早い归国を促すものだった。

『大地报』も1956年4月21日のトップ記事に「祖国は留日知识分子を欢迎している 心配せずに早く归って建设に参加しよう」という記事を掲載し、『中国留日学生报』に呼应した。その後の5月1日と11日にも関連記事を掲載し、留日学生の归国を促进した。

日本の留日学生・华侨组织の归国促进活动が大々的に行われているなか、中国で释放された日本人戦犯を迎える兴安丸が、1956年6月18日の出港を控え舞鶴港に停泊していた。この兴安丸で留日学生・华侨の归国を実現するために、6月15日の『中国留日学生报』は1面から4面に大々的に归国特集を組んだ。その結果、167名の留日学生・华侨が乗船し、归国の途に着いた。

同学总会の归国促进活动はその後も继续されたが、一部の留日学生・华侨からは批判の声もあった。同学总会は多くの留日学生・华侨を中国に送り返し、彼らに苦しい生活を送らせているのに、同学总会の干部たちは日本に残り、豊かな生活を送っていると言われた。この批判を受け、当時、同学总会主席・郭平坦は自らも留日学生归国の先頭に立ち、妻子を連れて1956年8月20日に兴安丸で归国した。この行动の影響もあり、主席の乗船した兴安丸には220人の留日学生・华侨も归国した。

五、帰国熱の減退と帰国留日学生・華僑の身分問題：1957年以後

1956年の「知识分子」の归国ブームの下、420名の留日学生・华侨が归国した。中国では1956年までに资本主义诸国にいる留学生の大量归国を実現させ、留学生归国促进の仕事は一段落したが、このことは1956年11月30日に留学生归国促进の担当部门の回国委员会が解散され、当該作业が国务院专家局に移ったことにも、あらわれている。1957年2月12日、国务院专家局は「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に滞在している留学生の归国を促进する計画」を制定した。しかし、1957年6月8日に始まった反右派运动のため、归国留学生数は激減した。1956年に420名とは対照的に、1957年には145名、1958年には65名と減少の一途を辿った。

归国ブームの減退の主な原因は、1953年から1956年までの归国ブームと知识分子の归国ブームの際、戦後日本に残っていた爱国学生と华侨の大部分は、ほとんど归国したからである。また、上述したように、一部の归国留日学生・华侨は中国国内での生活が貧しく、就職しにくい状況も日本の华人社会に伝わった。これらの状況によって、日本の华人社会の归国に関する情熱が大幅に減退した。さらに、归国留日学生・华侨の人数減少は、中国政府の日本华侨に関する政策とも関係があると言える。

归国留日学生の就職问题に关しては、笔者は建国初期に归国した200名の留学生の职业分配に关する档案と归国留学生に対するインタビュー调查を通じて、すでに分析した。现有の资料を通じて得られた结论として、人民政府は、欧米诸国からの归国留学生と日本归りの留学生を区別して、対応していた事实を確認できなかった。敌国日本から归国した行为は、彼らの就職の障害になってい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

总じて言えば、留日学生・华侨に対する归国促进活动は、人民政府は资本主义诸国に在住し

ていた留学生に対する行った帰国促進活動の一环として行われた。しかし、その政策は1957年に変化が見えた。1957年2月12日、国务院专家局が配布した「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の帰国业务に関する計画」には、「1957年以降では、一部の特殊人材を除いて、留日学生に対する帰国促進をやめる。もし留日学生・华侨が帰国したいなら、東京华侨总会を通じて、中国政府の同意を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明確に要求した。以上の規定から、1957年に人民政府は留日学生・华侨に対する帰国促進政策を改めたことがわかった。当時帰国した留日学生・华侨の分析によると、その原因の一つは、それまで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华侨は、欧米諸国から帰国した留学生と华侨より、レベルが低いである。いま一つの理由は、1957年というのは、新中国が建国して、すでに8年近くの年月が経ったため、共产党が育成した知識人や、大学生の人数が少しずつ増えており、海外の知識人に対する需要が低くなったからである。日本からの帰国留学生・华侨学生の大部分は、文科系出身である。また多くの留日华侨の教育レベルが非常に低かった。ゆえに、帰国後の仕事分配到非常に困難であった。結局、中国政府は、留日学生・华侨の帰国促進に対する態度を降下させた。この状況は、東南アジアからの帰国华侨の状況と似ているため、日本からの帰国者の特有の問題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

それでは、帰国留学生のその後の人生を決定づけた要因は何であったか。筆者が行った帰国した留日学生・华侨に対する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によれば、それは「歴史」と「海外関係」であった。つまり、2.1の冒頭で述べた帰国直後に作成した自伝とその後の政治審査の結果が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海外関係」を持つとは、海外に親類や、友人がある場合である。特にその親類や友人に共産党政権に反対する人物がいれば、問題が大きいとされる。「海外関係」の問題は日本だけではなく、资本主义諸国から帰国したすべての留学生と华侨に影響を与えた。特に、文化大革命に、「海外関係」を理由に、特別なケースを除いたすべての帰国留学生と华侨は北京から下放されたと言われている。

「海外関係」とは対照的に、「歴史」には個人差があり、特に留日学生を苦しめた。ここでは、その人自身やその家族が、共产党あるいは共产主义に反対したことや、无产阶级を榨取した経歴などを指している。

『回国五十年』（2003）に采録されている78名の帰国留日学生・华侨の帰国記の内、71名が帰国後の仕事に関する記述がある。その最初は、26名の帰国留学生のうち14名（53.8%）が学校、研究机关などの研究職であり、日本語を使った日本関連の交流、外事、情報収集の仕事に就いたのは5名（19.2%）のみであった。他方、45名の帰国华侨のうち、18名（40%）が日本語を使った日本関連の交流、外事、情報収集の仕事に就き、学校、研究机关などの技術職は13名（28.9%）であった。帰国华侨が留学生より多く対日交流の仕事に就いたのは、「歴史」に対する審査の結果だと言われている。帰国留日华侨の多くは学校を卒業しないうちに帰国したので、就職経験がなかった。そのため、彼らは家族と学校以外の社会関係がほとんどなく、共产主义や共产党に反対する人との接点がほとんどなかった。家族も日本に生活していたことから、家族も共产主义や共产党に反対する人と関係を持つことが少なかった。周恩来总理の日本語通译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林丽韞、黄世明などの建国初期の対日外交分野で活躍した日本語通译のほとんどが留日华侨出身であった。日本から帰国したという事実それ自体は問題とはなっていないのである。

日本からの帰国留学生の活躍の場が少なかったとされるのは以下の理由に依ると考えられる。前述したように留日学生のほとんどが台湾、旧満州国、汪精卫政权といった日本の植民地、傀儡政权から派遣された留学生であったため、本人およびその家族に植民地政府、傀儡政权と何

らかの関係がある場合が多い。また戦争中に留学したことから、帰国する前に日本で就職した経験がある人も多く、仕事の関係で、国府の駐日代表团を含めた国民党関連の机关、日本の共産主義に反対している人と少なからず関係を持つことも多かった。これらの問題はすべて帰国後の政治審査の時に調べられ、「档案」に記入された。中国における人事の慣例では、「档案」に「历史」について問題があるとか、政治調査の結論が出ていないと記述されてしまうと、基本的に对外関連や秘密の仕事に従事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ある。また、帰国留学生と華僑が研究職に就いても、従事した研究が極秘事項である場合、原則的にはその仕事から外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帰国留学生の人事档案が公開される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いが、北京市档案馆で公開している留学生の帰国を促進することに関する資料の中に、北京市在住の帰国留学生についての「解放後资本主义国家から帰国した留学生の調査表」と「北京市帰国留学生調査票」の二つの資料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の二つの資料には北京市に在住する一部の帰国留学生の略歴、家族構成、収入、政治历史問題についての調査結果などが记录されている。同資料は留学生本人が書いたものではなく、留学生の所属机关によって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そのため、所属机关による政治審査の結果や、帰国後の政治態度に対する判断なども记录されている。

それに依ると、数多くの留学生の政治審査の結果が、「調査の手段がない」ことを理由にして出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がわかる。たとえば、1953年に日本から帰国した洪清淡の政治審査の結果欄には以下のように書かれている。

「当該同志の政治历史については結論がない。原因は調査できないからである。彼の本籍は台湾で、日本に留学した。社会関係が比較的复杂で、配偶者は日本人で、义父母兄弟は日本にいる。父亲、兄、姊、妹は现在台湾にいる」。

帰国留日学生 of の多くは本人に問題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く、洪清淡と同じように、主要な社会関係が海外や台湾にあるため、中国政府にはそれについて調べる術がなく、「历史」についての政治審査を終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そのため、彼らは就職などで政治審査の結果に影響さ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は日本と国交正常化以後、あるいは改革・开放後に改善され、1970年代以降は対日関連の仕事で1950年代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 of の姿が多く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おわりに

終戦後、多くの留日学生・華僑は、学业が終わらなかったことや、戦後直後の中国における内战勃发などを理由として帰国しなかった。また、日本に留学・滞在したという経歴を理由に、帰国後の仕事や生活に不安を抱いていたことも理由の一つであった。

1949年から1950年代にかけて、非常に多くの留日学生と華僑が、中国政府の要请を受けた中国系メディアや、中国から帰国した引揚者からの中国宣伝、紹介を受け、帰国を热望した。特に1953年には帰国ブームが到来した。留日学生・華僑が日本を離れた理由としては、战前日本で受けた差別的な待遇や、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苦しい生活が挙げられる。

留日学生には、国民党统治地域と共产党统治地域 of の二つの帰国 of の选择肢があった。戦後直後には留日学生と華僑も国府を赏賛し、蒋介石に対する憧憬があった。しかし、戦後の国府 of の官僚は留日学生を「汉奸」 of の一种と见なし、好ましく受け入れなかったため、留日学生に台湾に行っても、「役人になる途が闭ざされている」と思われた。さらに内战で露呈した国府 of の腐败や、国民

に対する強圧的な態度、日本への派兵中止などによって留日学生の反感をかった。

さらに、人民政府が留日学生と华侨の団体を通じて中国の現状、政策を宣伝したことも、华侨や留学生も帰国を促した。同学总会や、東京华侨总会などの留日学生と华侨の団体は留日学生や华侨に広く支持されていた。そのため、これらの団体を通じた宣伝活動は非常に効果が高かったと言えよう。しかし、当時人民政府と留日学生・华侨の団体との具体的な連絡方法や、指令関係について、資料の制限で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今後の課題としたい。

数多くの留日学生・华侨が中国建設に貢献する爱国精神を持ち、その精神がまた他の留日学生に影響を与えたことも看過できない。

他方、中国側からの宣伝により、留日学生・华侨が日本留学したという歴史に対する懸念がだいぶ拂しょくされたことも重要である。また、留日学生の多くは、共产主义の中国に対して強く憧れていたが、その一部とも言える現実の中国の状況についてあまり理解せずに、帰国を選択した。例えば、「無料で大学に入学したい」、「ソ連へ留学したい」といった帰国理由を挙げた者もいた。また数多くの华侨が「日本で就職できずに、生活が困難なので、労働者を全部平等に対応する中国へ帰国して良い生活を送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を理由に帰国を選択したが、帰国した直後に国内の状況を見て、後悔した人も多くいたと言われている。

帰国した留日学生に対する中国政府の受入政策については、欧米諸国からの帰国留学生と比べて、就職の面で留日学生が著しく差別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は確認できなかった。それは日本から帰国した华侨が日中两国間の外交の場で、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た事実から見ても一目了然であろう。

留日学生の中国での就職先を左右したのは、「海外关系」と「历史」に関する政治審査である。旧日本植民地、傀儡政权による派遣や、亲类、知人などの複雑な社会关系が彼らの中国での職業上の発展を妨げる面があった。このような「海外关系」と確認しにくい「历史」を背負った留日学生・华侨は1957年以降の反右派运动から文化大革命までの長期に亘って、様々な被害を受けた。特に文化大革命の期間中に、特別な例を除いてほぼ全員が农村や、「五七干校」に下放され、苦しい生活を強いられた。この点は、おそらく他の资本主义诸国から帰国した留学生と华侨も同じであろう。しかし、日中国交正常化後、特に改革・開放後は、彼らの「海外关系」や「历史」は中国の外交活动や、经济发展に貢献し得る重要な要素となり、中央政府や各对外交流の场面で多いに活跃した。

例えば、日中国交正常化の谈判に际して、日本語のできる人材が著しく不足する中、1950年代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と华侨の多くが借り出され、事前准备や、日本政府、财界、メディア关系者との交流の场における通译・翻译として働いた。日中国交正常化後の政府や民间の访日团の通译の多くも1950年代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と华侨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に中国政府は、留日学生・华侨が持つ战争中の日本留学・滞在经验を问题视したのではなく、最終的には、日本との外交关系を改善するために、多くの帰国留日学生・华侨を起用した。建国直後の中国政府は日本との战争の历史をあらゆる面で追及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さらに、留日学生・华侨が帰国してから、文革までの长期间に、彼らを苦しめ、发展を制限していた「海外关系」、特に日本との关系は、改革・解放後に、一転して、彼らの仕事上での发展を促进できる要素になった。よって、长期间に人に言及しなくなった「海外关系」も、彼らが发展するための有利な状況になった。そのゆえ、彼らは、改革・解放後に、自分の日本出身、日本との关系を再度强调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竹前栄治・中村隆英監修『GHQ日本占領史 第16巻 外国人の取り扱い』（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年）20-42頁。

前掲竹前栄治・中村隆英監修『GHQ日本占領史 第16巻 外国人の取り扱い』20-42頁によると、1949年に19807名の中国人が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1-2頁によると、1950年代には4万人程度の華僑が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たとされる。

河路由佳「盧溝橋事件以後（1937年～1945年）の在日中国人留学生」河路由佳・淵野雄二郎・野本京子著『戦時体制下の農業教育と中国人留学生』（農林統計協会、2003年）41～57頁、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日本僑報社、2004年）30～32頁。

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1-2頁によると、1949年から1958年までにおおよそ4000人の留日華僑・留学生在が帰国した。郭平坦（中国留日同学總會元主席）「留日同学会引導我們走愛國回國的דרך」全国政協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建国初留学生帰国記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405-416頁によると、1953年から1957年までに帰国した留学生、華僑、勞工は5000人に上る。

旅日華僑・留学生聯誼會副秘書長曾葆盛（1953年帰国）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1月23日、中国北京市。

郭平坦・陳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華僑帰国状況」『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498-510頁。

川島真「日本占領期華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動向」『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8月号、4-18頁。

河路由佳・淵野雄二郎・野本京子『戦時体制下の農業教育と中国人留学生』（財団法人農林統計協会、2003年）。

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

「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弁理留学生回国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記錄）」李滔編『中華留学教育史録—1949年以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9頁によると、辦理留学生回国事務委員會における帰国留学生業務の担当範圍（1950年3月）：①国内外の短期大学以上の学校を卒業し、更に学習を目的とする出国者②大学学部以上の教育機関を卒業した帰国華僑③国内の高校を卒業してから外国の大学の正規学習年数を終えたが、卒業できなかった者④大学卒業後、外国で就職した者。

1946年5月22日の成立時から1949年8月までは中華民國留日同学總會と称していたが、1949年9月に中国留日同学總會と改称した。

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54～165頁、林連德「留日同学總會側記」前掲全国政協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建国初留学生帰国記事』397-404頁、「同学總會の全国体制整備」『中華留日学生報』1947年5月15日などの資料によると、1946年5月22日に設立時から1966年5月までの同会会員は中国大陆と台湾出身の留学生と華僑学生である。

前掲郭平坦・陳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華僑帰国状況」。

筆者の確認によると、中国留日同学總會の機関紙は1947年3月10日～1947年4月30日の名称が『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1947年5月1日～1948年1月30日が『中華留日學生報』、1948年5月4日以降の名称が『中国留日學生報』である。

留日華僑學生陳富美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9年8月28日、北京市。留日華僑學生N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9年9月1日、北京市。など

留日學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1月23日、中国北京市、大類善啓「日本に残留し定住したある中国人—在日華僑・韓慶愈が生きた『もう一つの昭和史』」『星火方正～燎原の火は方正から～』第3号、2006年12月1日、35－45頁。

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所収、2009年、31－51頁。

王家鼎「告別日本六十年後の回憶」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50-62頁。

留日華僑E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1月23日、中国北京市。

大類善啓「日本に残留し定住したある中国人—在日華僑・韓慶愈が生きた『もう一つの昭和史』第2回」『星火方正—燎原の火は方正から』第4号、2007年5月25日、25－36頁、留日學生韓慶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2月10日、日本東京都。

「蔣主席の求学時代（一）」『留日學生旬報』1947年3月10日、「蔣主席の求学時代（二）」『留日學生旬報』1947年3月30日。

韓国人留日學生D（1943年中国に渡った）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1月24日、中国北京市。

前掲留日學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66－74頁。

「留日學生獎学会成立」『中国留日學生報』1949年8月15日、王家鼎「告別日本六十年後の回憶」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50-62頁。

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74頁。

黃惠美「難忘的中学生活」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218-223頁、甘麗娟「一衣帶水半世情」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352-360頁。

吳千代子「まだ見ぬ祖国への憧れで胸が一ぱい」『中国留日學生報』1953年5月5日。

「大陸へ帰還を希望する理由」『朝日新聞』1953年6月14日。

前掲大類善啓「日本に残留し定住したある中国人—在日華僑・韓慶愈が生きた『もう一つの昭和史』第2回」、前掲留日學生韓慶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在日我戦俘僑胞待救」『大公报（重慶版）』1945年10月1日、「接運留日戦俘僑胞返国 我代表六人抵東京」『大公报（重慶版）』1945年10月29日、「接運在日戦俘僑胞返国 各有関機関已商定弁法 利用日本僑回国空船接運」『大公报（重慶版）』1945年11月27日。

「留日華僑之特別教育」 『申報』 1946年12月15日。

「留日学生召回弁法」、「抗日戦争期間留日学生甄審弁法」李滔編 『中華留学教育史録1840-1949』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583-584頁。

「学生召還どうなる」 『中華留日学生報』 1947年5月1日。

「日本にいる中国人」 『朝日新聞』 1953年6月14日。

中国第二歴史档案館 『中国戦区受降紀実』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2-189頁, 「盟国将共同管制日本」 『大公報(重慶版)』 1945年10月1日, 「四国共同占領日本 蘇英中亦將派兵前往」 『大公報(重慶版)』 1945年10月15日。

前掲留日学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中国第二歴史档案館 『中国戦区受降紀実』 134-145頁。

前掲留日学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台湾籍留日学生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1月25日、中国北京市。

楊国光「為了迎接新中国的誕生」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1-11頁。

「獻給台湾省諸同学—關於台湾二·二八事件」 『留日学生旬報』 1947年3月30日。

前掲楊国光「為了迎接新中国的誕生—記楊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動」。

王毓声「報效祖国 初衷未改」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 44-49頁。

前掲留日学生韓慶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歴史轉變了」 『中華留日学生報』 1947年7月15日。

前掲楊国光「為了迎接新中国的誕生—記楊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動」。

前掲留日学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楊国光「為了迎接新中国的誕生—記楊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動」, 前掲留日学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留日華僑凌星光へのインタビュー、2007年12月12日、東京都。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48年12月1日~1949年9月15日。

前掲王毓声「報效祖国 初衷未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編 『中華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記1949-1982』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 6頁。

許瓏「奔向光明的時刻—記建国前後の留学生回国潮」留学生從書編委會編 『中国留学史萃』 (中国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 98~111頁。

前掲郭平坦・陳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華僑帰国状況」，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108頁。

前掲郭平坦・陳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華僑帰国状況」によると、出国手続きは東京華僑總會を通じて統一的去る必要があった。留学生本人が出国申請書に記入し、東京華僑總會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僑務處に提出する。さらに僑務處はGHQ總部に審査書類を提出し、批准してもらう。中国への帰国と記入すると批准されないため、香港や台湾あるいは他国への渡航を出国目的と書かざるを得なかった。出国申請が批准されても、直接中国に行く定期客船がないため、中国行きの貨物船を待つか、或いは香港や他国を経由する帰国ルートを探るしかない。故に、費用が非常に高く、時間もかかった。また出国する時の審査もかなり厳しかった。

「回国参加社会主義建設的留学生情况」前掲李滔編『中華留学教育史録—1949年以後』59—69頁によると、1949年8月から1952年12月までに中国教育部で登録した帰国留学生は102人である。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498—510頁と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111頁の資料によると、1953年前までに帰国した留日学生・華僑の人数は300人程度である。

「日本にいる中国人」『朝日新聞』1953年6月14日。

前掲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導我們走愛国回国的道路」。

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アジア政経学会）49(3) 2003年7月、54—70頁。

呉日煥「1950年代日中・日台関係の構造--在日華僑・遺骨送還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に」『筑波法政』2006年3月、153—176頁、前掲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導我們走愛国回国的道路」，「旅日華僑、留学生帰国問題有關材料」（中華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1953年4月28日～7月4日），前掲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国府側と微妙な関係 日本政府も送還は希望」『朝日新聞』1953年5月21日。

「帰れぬ中国人」『朝日新聞』1953年5月9日，前掲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導我們走愛国回国的道路」。

前掲「旅日華僑、留学生帰国問題有關材料」，前掲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導我們走愛国回国的道路」，「国家の協力求む 帰国希望者大会」『朝日新聞』1953年5月23日，「中国人代表押掛く 帰国問題で外務省へ」『朝日新聞』1953年6月6日。

「国府、了解の模様 在日中国人の送還 すべて日赤の手で」『朝日新聞』1953年6月2日，「中国人送還決る 政府、日赤に一切を委す」『朝日新聞』1953年6月7日。

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511—512頁。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に関する声明書」『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年10月11日。

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83頁。

前掲郭平坦・陳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華僑帰国状況」，前掲陳焜旺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84頁。

「中国留学日本同学總會致毛沢東主席函」（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105—00012—01、1950年3月25日）。

「まだ波紋多し 留日学生救済問題」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50年2月1日。

前掲陳焜旺編 『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 101頁。

「まだ見ぬ祖国への憧れで胸が一ぱい」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53年5月5日, 「不必再多費宝貴的錢」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53年5月5日。

前掲留日学生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陳焜旺編 『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 103-105頁。

前掲留日学生元同学總會主席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留日学生元同学總會主席、元『華僑報』編集者韓慶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学資の保証される学生政策」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49年10月11日, 黄秀鳳「新中国の学生生活」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53年11月5日, 「国外華僑團結起来! 愛護祖国保衛自己的正当權益」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53年11月25日など

留日華僑E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呂同学より帰国便り」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55年4月20日。

前掲大類善啓「日本に残留し定住したある中国人—在日華僑・韓慶愈が生きた『もう一つの昭和史』第2回」。

前掲韓慶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華僑学生在唐山」 『大地報』 1955年6月1日, 「献出一切建設祖国 深感生為中国人的光荣—訪問一個回国的留法学生」 『大地報』 1955年6月1日, 「中国の大学教育」 『大地報』 1955年7月1日など

「学資の保証される学生政策 引揚者の語る新中国の現状」 『中国留日学生報』 1949年10月11日。

「帰国者から話を聞く 新中国の結婚について 金の心配はいらぬ」 『国際新聞』 1953年6月22日, 「安定した人民の生活 合理的な小学校の教え方」 『朝日新聞』 1953年3月6日, 「建設の体験を語る 帰国者のみた鉱山製鉄 “社会の主人として” ツルオカの建設をきく」 『日本と中国』 1953年5月5日, 「興安丸けさ舞鶴入港 服装も色どり豊か 口々に中共賛える帰国者」 『朝日新聞』 1954年9月27日夕刊。

「中国労働者の生活 帰国者の座談会から」 『日本と中国』 1953年4月20日。

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 511頁。

前掲留日学生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周恩来「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之一）」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之二）」 『人民日報』 1956年1月30日。

前掲郭平坦・陳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華僑帰国状況」。

「高等教育部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 前掲李滔編 『中華留學教育史録—1949年以後』 24-25頁。

例えば、「關於爭取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生回國的方針任務措施等意見給周恩來總理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11-00239-05、1956年1月27日），「外交部關於爭取海外留學生回國事給駐外使館的指示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18-00852-05、1956年3月19日～10月4日）によると、外交部は1956年1月から留學生の歸國促進の方法について検討し、同年3月に中國駐外國大使館、領事館に電報を打ち、留學生に歸國を説得するように命じた。「爭取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歸國工作的有關文件」（北京市檔案館檔案、2-10-76）によると、北京市政府は北京市爭取留學生歸國工作組を設立し、留學生歸國の促進方法を検討し、実施した。

前掲「外交部關於爭取海外留學生回國事給駐外使館的指示電」。

前掲郭平坦「留日同學會引導我們走愛國回國的道路」。

「知識分子の問題について 周恩來中共中央書記」『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3月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二期全國委員會第二回全體會議」『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3月1日，「中國科學を十年で世界水準に 錢學森教授可能性を論証」『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3月1日。

「祖國需要你們 學んだら歸ろう」『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4月1日，吳曙「現在是歸國的好機會 人材はあまりにも足りぬ」『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4月1日，謝秋生「平和裡に社會主義社會に移行 海外インテリは期待されている」『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4月1日，張賢「祖國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 把我們所學的技術貢獻人民吧」『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4月1日，林連德・王兆元「光榮的事業等待着我們」『中國留日學生報』1956年5月15日など

「回國留學生來信述 祖國歡迎留日知識分子—勿多顧慮趕快回來參加建設」『大地報』1956年4月21日。

「同學總會十週年紀念大會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來信祝賀 号召知識分子參加祖國建設」『大地報』1956年5月1日，「海外知識分子祖國歡迎你們」『大地報』1956年5月11日，金慕箴「華僑青年指導的重要性」『大地報』1956年5月11日。

「大批華僑回國參加建設」『大地報』1956年6月11日。

前掲『回國五十年—建國初期回國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511頁。

前掲留日學生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郭平坦「強大祖國使我夙願得償」『回國五十年—建國初期回國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375-380頁。

前掲『回國五十年—建國初期回國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511頁。

「國務院關於爭取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回國工作交由國務院專家局管理的通知」前掲李滔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28頁。

「1957年爭取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生工作計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11-00251-02、1957年2月4～8月20日）。

「爭取留學生歸國及留學生歸國後的狀況等文件」（中國北京市檔案館檔案、2-20-339、1959年～1960年）。

前掲『回國五十年—建國初期回國旅日華僑留學生文集』511-512頁。

拙著「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所収、2009年、203-232頁。

「1957年争取資本主義国家留学生工作計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11-00251-02、1957年2月4日—8月20日）。

前掲留日学生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前掲留日華僑曾葆盛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同上
同上。

前掲留日華僑曾葆盛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解放後從資本主義国家回国留学生調査表」（北京市檔案館檔案、007-001-00155、1963年1月1日—12月31日）。

「北京市回国留学生調査票」（北京市檔案館檔案、007-001-00149、1962年1月1日—12月31日）。

前掲「解放後從資本主義国家回国留学生調査表」。

留日学生Aへのインタビュー、中国北京市、2007年11月23日。

前掲留日華僑曾葆盛へのインタビュー，前掲留日学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日本にいる中国人」。

前掲留日華僑Eへのインタビュー，前掲留日華僑G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韓慶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前掲『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

前掲留日学生Bへのインタビュー，前掲留日華僑曾葆盛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華僑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年。

前掲留日学生郭平坦へのインタビュー。前掲留日華僑曾葆盛へのインタビュー。

19世紀函館外國人居留地と華商

－ 函館華僑から北海道華僑へ －

■ 小川正樹（北海道函館ラ・サール高等學校） ■

19世紀函館外國人居留地と華商

－ 函館華僑から北海道華僑へ －

小川正樹（北海道函館ラ・サール高等學校）

〈目 次〉

1. はじめに
2. 函館華僑
3. 北海道華僑
4. おわりに

1. はじめに

1858年の日米修好通商条約締結後、江戸幕府は日本の5つの開港場と2つの開市場を外国に開き、外国との貿易を開始した。開港当初は、アメリカの捕鯨船や、イギリスの貿易船が来航し、日本商人との取引を行なったが、こうした貿易船には多くの中国商人も乗船してきた。中国商人は当時、通譯や买弁（仲買人）として欧米商人に付属して来航したが、後には欧米商人から独立して店舗を構え、日本商人と取引するようになった。中国商人は当初、外国人付属という有利な地位を利用して不平等条約下での商業活動を展開したが、1871年の日清修好条規締結後、中国人（清国人）として日本政府に把握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うして、鎖国体制下では長崎にのみ居住していた中国商人が国内の開港地・開港場にも来航するようになり、各地に中国人居住区域を形成していった。例えば、函館の場合、中国商人は最初イギリス商人の付属として来航し、日本商人と取引を行ない、その後、次第に人数や店舗を増やしながら、後には函館の外国人居留地の最大勢力に成長し、長崎や神戸、横浜や上海の商社の支店が函館にも開設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開港地に移住してきた中国商人は、活動が港から約40km以内の游歩区域に制限されていた。中国商人は日本商人を代理人として海産物の生産地に派遣して取引を行なおうとしたが、規定によって外国人居留地のある游歩区域を越えて外国商人が取引をすることは認められず、日本国内市場への進出は外国人居留地というシステムにより阻まれてきた。中国商人は中国大陆市場の販路を掌握しているという有利さから、開港当初より日本と中国の貿易、特に海産物貿易を独占してきたが、海産物の生産地は次第に函館から遠く離れた道内各地の漁場に移っていき、道内の漁場については現地に進出していた日本商人が掌握しており、明治年間の函館では日本商人と中国商人の激しい主導権争いが展開された。中国商人は資本力、情報量、商取引において日本商人を凌駕していたが、生産地への支配を強化することができず、生産地からの仕入れについては日本商人に依存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さらに、日本の商社が上海に支店を開設し、中国大陆市場に進出するようになると、中国商人の圧倒的優位性は失われていき、中国商人の中には日本での取引を諦め、本国に帰国する者も現れてくる。

2. 函館華僑

函館は1854年に締結された日米和亲条約等により外国に対して港を開くことになり、1858年の日米修好通商条約の締結後は、アメリカ船やイギリス船が来航して貿易を開始し、こうした外国船に乗ってきた中国人が买弁として来航し、これが函館華僑の始まりとなった。当初は、中国人は外国人付属という有利な立場で商業活動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が、1871年の日清修好条規締結後は日本人と対等な立場として日本の政府に把握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函館には海産物を取り扱う中国人商社が進出し、主に广东地方や三江地方の出身者が中国大陆や長崎、神戸、横浜とのネットワークを武器にして函館の海産物貿易を独占した。函館港における国际贸易は、中国に対する海産物輸出が中心であり、函館における開港とは中国貿易の本格的な開始を意味していた。外国人居留地といわれると无条件に欧米諸国との交流というイメージで語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が、その実態はアジアとの貿易であり、外国人居留地にはアジアとの交流の窓口という側面があることを認識する必要がある。各居留地ではロシア人やイギリス人などよりも中国人の占める割合は高く、居留地=欧米社会と一面的に考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今後、従来の外国人居留地像の修正が必要である。

函館の外国人居留地は当初、大町の海岸に埋立地（筑島）を造成し、わずか2千坪余りの敷地に外国商人を居住させる予定であった。しかしこの場所では狭く、また水の確保が不便な場所であったため外国商人たちは反発し、函館の奉行らは新たに地藏町（現在の豊川町）に埋立地を造成し、約2万3千坪あまりの外国人居留地を用意したが、ヨーロッパで発生した恐慌の影響から欧米商社が函館から撤退し、ここは日本人が店舗を構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して大町居留地には中国人（華僑）が居住するようになり、華僑はさらに大町居留地から函館市街に居住地域を拡大していき、大町の居留地から函館山にかけての地域に小規模ながら中国人居住地を形成した。華僑人口の増加や商取引の活発化から、華僑は相互扶助や事務所として同徳堂を設立し、のちにはこれを同徳堂三江公所と改称し、当時の富岡町3番地（現在の豊川町1番地）にあった洋館4棟（トーマス・ブラキストンが最初に借地した場所に建てられていた）を購入した。この場所には現在も函館中華会館が建っている。この三江公所が1907年の大火で焼失したので、当時の函館華僑の中心人物であった張尊三が、同じ敷地内に純中国様式の中華会館建設を計画し、函館華僑の資金の他に北海道および樺太在住の華僑の協力を得て、現在も残る函館中華会館を完成させた。この函館中華会館の敷地はもともと国有地であり、華僑の所有地ではなかったが、1942年、函館商工会议所が政府から土地を購入し、これを函館華僑に貸与することで事実上の土地の取得を達成した。この時も、土地の購入資金は全道の華僑から資金の提供を受け、まさに全道華僑の連帯の象徴として函館中華会館は維持されてきた。

1894年の条約改正により、1899年以降日本国内が外国人に開放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れ以前は、外国人の活動は、商業取引も含めて外国人居留地に限定されていた。函館の場合、張尊三が昆布取引のため代理人を根室に派遣したことが违法行为にあたるかどうかで裁判で争われ、日清通商章程第十五款の解釈が争点となった。函館の裁判所では有罪判決が出され、最終的には大審院により代理人派遣は违法行为と認定された。つまり、外国人が居留地を越えて商取引を行なうことは認められなかった。こうした事例は東京の華僑にもあり、条約改正以前には外国人の商業活動は条約に従ってある程度制限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また、日本政府は、条約改正により中国人単純労働者が大量に来航し、日本の労働市場に脅威を与える恐れがあるとして、原則として日本国内を開放しながら実際には外国人、特に中国人の入国を制限する法律を制

定した。(敕令352号、内务省令42号) その中で、中国人は从来から国内で活動していた海産商や三刀業(仕立業・理发業・料理業) 以外には杂货商や行商のみが認められ、日本人労働者と競合する可能性のある中国人单纯労働者の入国は拒否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こうして、制限はつきながらも华侨は开港場の外国人居留地を越えて日本の国内を移動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杂货商や呉服行商などは外国人居留地から都市部、さらに郡部へと进出して自分たちの商圈を拡大し、华侨社会は次第に日本列島内に拡大していった。しかし、国内が開放されたとしても外国人の国内移動には大きな制限が付けられ、县境を越えて行商を行なう場合には事前に役所への届出が必要であり、届出を忘れた場合には、スパイ容疑により警察に拘束され、厳しい寻问を受けた。その寻问の中で命を落とす場合もあり、现实には国内移動は命がけの行动であった。さらに、函馆の場合には、1899年の要塞地带法の制定により、函馆港およびその周辺での外国人への監視が強化され、旅行で函馆を訪れた日本人でさえも港内を写真撮影することはできず、この法律に違反した外国人の報告が外务省に残されている。また、函馆华侨は北海道内で行商にでかける時は、行先、取引相手、移动経路などを詳しく记录して家族に连络していた。もし、特別高等警察が家に来て、こうした行商中の行动を说明できない場合には、すぐに警察に连行され、厳しい寻问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った。华侨の家族は特別高等警察の刑事が家に来ると生きた心地がしなかったと当时を振り返る。しかし、函馆华侨はさまざまな制約を受けながらも国鉄などの移动手段を用いながら函馆を据点に道内各地へと呉服行商の活动を展開していった。

3. 北海道華僑

1899年に内地杂居が行なわれると、函馆华侨は北海道各地へと进出し、小樽や室兰、钏路、根室、稚内などの港湾都市のみならず、札幌、旭川、带广、北见などの内陆都市へと移住していった。1930年代には道内主要都市のみならず、上川や胆振、网走などの郡部にも移住し、ほぼ北海道全域に移住していった。こうして道内各地に形成された华侨社会はそれぞれ性格が异なっており、それを一つのまとまりとして考えることは適切ではなく、それぞれの地域で形成された华侨社会の性格を个别に检讨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こでは北海道内の华侨社会において、その規模が大きい函馆・札幌・旭川の3つの都市の华侨社会について检讨してみる。

函馆华侨は、开港当初の广东省出身者から次第に浙江省などの三江地方出身者の海産商が中心となり、昆布などの海産物取引を行なった。商业习惯の違いや中国市场的情報独占など日本商人や开拓使と激しい対立を経験し、時には不买运动にまで发展したこともあったが、明治时代においては概ね华侨商人が中国向け海産物输出の主导权を握り、日本商人は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函馆の経済的繁荣は海産物取引と中国市场への输出に依存しており、北海道厅や函馆市、地元経済关系者は函馆华侨の活动を評価し、その中心人物であった张尊三に対しては、海産物贸易のみならず、道南地方の渔村において高级食材となるフカヒレの制造过程を具体的に指导し、渔民の生活向上に多大な贡献があったことを显彰し、张尊三の归国直前には当时の函馆市长や商工会议所などの官界、财界の有力者が盛大な送别会を開催するなど、地元函馆ではその活动や人物が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た。さらに日本政府も、张尊三の长年の活动や日本社会への贡献を高く評価し、第2次大隈重信内阁は蓝绶褒章の授与を决定した。こうして函馆华侨は度重なる日本商人との対立や冲突を乗り越えて日本社会に定着し、地元の信赖を獲得していった。ま

た、この函館华侨は海産物の生産据点北海道と巨大な市場中国大陆を結ぶ役割を果たすと同時に、中国大陆や神戸、横浜と道内各地を結ぶ役割を果たした。

1907年の大火で函館の同徳堂三江公所が焼失すると、函館华侨は地元のみならず北海道、さらに樺太の华侨の協力により、純中国様式の函館中华会馆を建設し、北海道・樺太の全华侨の連帯のシンボルとして維持してきた。函館中华会馆は、关帝坛を中心に設けるなど宗教的施設としての性格の他、貿易のための事務手続や領事館に代わる外交手続などをおこなう、経済的・政治的施設としての性格を併せ持ち、北海道华侨の生活全てに関わる機関としての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の中华会馆の運営は戦前から日本国内に居住している华侨1世、2世などいわゆる老华侨によって行なわれ、上記事務関係のほか、新年会や結婚式なども執り行なわれ、函館华侨の生活に密接に結びついていた。しかし、この函館华侨も日中国交正常化以降、世代交代が進み华侨としての意識、考え方、生活にも少しずつ変化が現れてきた。さらに、中华人民共和国との国交樹立にとともに、国内华侨は中华人民共和国か中华民国の国籍を選択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戦前は日本に渡航して定住する場合にもパスポートは必要なく、日本国内の警察署での簡単な手続によって生活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ったが、国交正常化後は国籍選択によ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と中华民国国籍に分裂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た国交正常化と同時に留学生として中国人が来日することになり、こうした留学生は留学終了後も技術職や研究職などの専門職として日本国内に滞在し、新华侨とよばれる中国人が増加することになる。さらに外国人研修制度が開始されると、函館やその近郊の町村においては中国人研修生の受け入れが始まり、多くの研修生が来日した。この研修生は3年間という限られた期間で来日するが、市の統計上は外国人として把握されている。新华侨は戦前の老华侨とは生活、習慣、考え方、教育など相違点が多く、华侨总会に入会するものはほとんどいない状況である。こうして函館の华侨社会は大きく2つの集団に分かれることになり、この現象は道内各地域においても問題となっている。

札幌华侨は、开拓使が中国华北の农业技術を北海道开拓に利用するために雇った「お雇い外国人」がそのきっかけであった。开拓使は山东省から10名の农民を2年契約で雇い入れ、現在の札幌市丘珠付近の开拓を担当させた。この事业は多くの問題があり、結果としては失敗したが、归国せずに日本に残った许士泰は、丘珠付近の开拓を继续し、後に归化申请を行なって日本国籍を取得し、农业経営を顺调に進めてこの地区の大地主に成長した。彼は成功した後、乡里の山东省から农业留学生を受け入れ、こうした农业留学生が札幌华侨の始まりとなった。統計上は1904年以降、『北海道庁统计书』の华侨の职业栏には学生の记录があり、それは1910年代まで继续している。恐らくはこれが山东省から札幌にやってきた农业留学生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留学生は1920年代に入り増加していくが、これは中华民国になってからの留学生であり、许士泰との关系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内地开放以降は料理职や行商人も札幌に移住し、1930年代には札幌华侨の人口は100人を超えた。また北海道帝国大学への留学生も増加し、札幌は留学生と行商・料理人を中心に华侨社会が形成された。しかし、1930年代後半には华侨人口が激減し、多くの华侨が札幌から姿を消した。终戦後、北海道帝国大学に留学していた学生が中心となって北海道札幌华侨总会を設立したが、その时、战前からの华侨は学生以外ほとんど残っておらず、战前の华侨社会と戦後の华侨社会は断絶していると考えざるを得ない。札幌の华侨总会は、戦後、函館に代わって华侨社会の中心的役割を果たし、国交正常化以前には中国大陆に渡航するための手続きを、北海道のみならず青森・秋田・岩手の东北三県の华侨社会を対象に行なってきた。国交正常化後、札幌に总领事馆が开设され、パスポートやビザの申请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华侨总会は外交手続の窓口という役割をほぼ终えることになった。1980年代には中国大陆から多くの留学生

が来日することになり、彼らは新华侨と呼ばれ、彼らは直接総領事館と連絡をとり、华侨总会に依存することなく生活することができた。彼らは老华侨とは別に北海道华侨華人連合会を組織し、老华侨との交流はほとんど行なわれてこなかった。近年、北海道札幌华侨总会と北海道华侨華人連合会の婦人部が関係強化を目的に連携することを発表した、具体的な活動は今のところなく、依然として老华侨と新华侨の隔たりは大きいといえる。老华侨の内部でも、总会の運営や相互親睦を重視する戦前からの老华侨と、時代の変化に対応し、組織としての活動を重視する戦後の老华侨の間には意識の上で差が存在する。しかも、戦前からの老华侨については、その人口が減少し、戦前の华侨社会の伝統や習慣、つまり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の中国社会の伝統が急速に失われている。札幌华侨总会は札幌市内の墓地に1基の华侨公墓を所有しており、維持費を支拂うことで公墓への埋葬が可能であり、これまで札幌华侨社会の共有財産として維持されてきた。老华侨にとっては精神的拠り所であるが、こうした公墓への墓参などの行事も参加者が減少し、これまでの札幌华侨が維持してきたいくつかの华侨社会の習慣が失われてきている。こうした华侨总会に対し、新华侨の华侨華人連合会は、留学生の増加にともない入会者が増加し、その規模は华侨总会を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る。新华侨は来日や帰国の手続きは直接札幌総領事館を通して行なうため、札幌华侨总会に依存する必要がなく、総領事館とのつながりを重視している。しかし、华侨華人連合会も加入者の増加や会員の他地域への移動など、従来の华侨社会とは異なる問題を抱えている。今後は、こうした道内新华侨についての調査が必要である。

旭川华侨は内地開放後、函館から呉服行商が進出して定住したことが始まりである。旭川は軍隊が駐屯する軍都として発展し、それに伴い人口も増加していった。こうした旭川に福建省出身の呉服行商が定住し、のちには料理業や杂货商なども増えていった。一般的に来日した华侨は、初期の海産物取引商以外には、いわゆる三刀業が中心となり、この他に杂货商や呉服行商に就く人々がいた。横浜や神戸の場合、この三刀業に従事する人々の割合が高いといわれているが、北海道の場合は若干傾向が異なり、料理業に従事する人々は多いが、理髪業・仕立業に従事する人はほとんど存在せず、代わりに毛皮製造や販売に従事する华侨の存在が多いことが特徴的である。华侨の職業については、一般的な傾向は確かに認められるが、地域や時期によって職業の内容が異なり、単純化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さらに、北海道においても函館・札幌・旭川の三都市はそれぞれ成立背景が異なり、この三都市の华侨社会も性格、出身地、主要職業が異なり、一つの集団として扱うことは困難である。旭川华侨は函館から移住してきた人々が中心で、移住後も华侨同士の結婚など函館华侨との関係を維持してきた。北海道内には函館の福建省福清県出身者のネットワークがあり、こうしたネットワークは旭川その他、苫小牧、釧路、北見、室蘭などに広がっており、職業は主に呉服行商であった。旭川华侨は市内に定住後、他業種へ転換する事例などあるが、基本的には現在に至るまで大規模な人口変化はおきていない。他地域からの流入も少なく、また他地域への移動も少なく、旭川に定住した人々がそのまま华侨社会を維持してきた。旭川の华侨社会は移動や規模の変化が少なく、また总会としての行事・活動もそれほど多くはない。世代が2世・3世と進むにつれ日本社会とのつながりが強くなり、墓地も总会として所有せず個人で所有しており、墓参りなどの行事を总会として実施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道内他都市との交流や移動が少ない旭川华侨は道内で孤立化の道を歩んでおり、总会の存続も厳しい状況である。

北海道の华侨社会は札幌を除いて会員の減少と高齢化という問題を抱えている。かつて、北海道の华侨は全道华侨連帯のシンボルとして函館中華会館の建設資金を提供し、その団結力を示した。ついで、戦争中の非常に困難な時期に、事実上の土地取得資金を、資金力のある人も少ない

人も自分のできる範囲で資金援助し、念願の会馆の土地取得を果たした。さらに、1968年の十勝沖地震により函館中华会馆の壁面の一部が破損した時も、华侨总会が全道を駆け回って全道の华侨の資金援助を受け、修復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うして函館中华会馆は三度、全道华侨の協力を仰ぐことで現在まで維持されてきた。また、3度目の資金協力の時には、同時に全道一圓の华侨の詳細な名簿を作成し、全道华侨の連帯を強める努力がなされた。

4. おわりに

北海道华侨は日本列島を北上して、长崎や横浜、神戸から北海道に移住して独自のコミュニティを形成した。しかし、当時の北海道は政府による開発が進行中で、日本人の移住も引き続き行なわれており、地域の需要には限界があり、その職業についても多くの制約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り、横浜や神戸と比較すると理发师や仕立屋についてはその姿を見つけ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北海道には、海産商のほか、料理人、杂货商、呉服行商、そして毛皮商が統計記録に残されており、大きな資本をもった商人としてではなく、開発が進行中の北海道で需要のある職種に适应した移住が行なわれ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大正10年以降、統計資料から女性や子供の数が増加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の頃には单身ではなく家族での移住も進んだと考えられる。これは、北海道にやってきた华侨が短期滞在としてきたものではなく、定住を覚悟して移住してき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こうして移住してきた华侨はその後、北海道内にとどまらず樺太や千島列島など日本領内を移動した可能性も否定できない。外交史料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資料によると、日本の会社の蟹工船に乗組員として雇われていた中国人の存在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华侨の活動範囲は陸上のみならず海上にまで広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つまり、华侨の活動範囲は从来考えられてきた北海道のみならず、樺太や千島列島など広く北東アジア海域にまで拡大し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と言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日本の敗戦により樺太と千島はソ連の軍事占領下に置かれ、樺太や千島列島など北東アジア海域への進出の道が閉ざされた。日本の統治が停止し、行政や警察機能が麻痺し、この海域での日本人の生活環境が激変した中、华侨はそれまでの友好国人としての立場から战胜国人としての立場に変わり、一方では联合国軍から特配をうける権利を認められながら、一方では北海道から樺太などへの移動は極めて困難な状況となった。ソ連に軍事占領された樺太では、日本人は函館や敦賀に引揚げてきたが、それ以外には朝鮮半島出身者の引揚げが一部記録上には見られるが、樺太华侨の移動については公式な記録は残されていない。ただ、2名の樺太华侨が戦後、日本人の内縁の妻を頼って上海や香港経由で北海道にやって来た事例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それ以外の樺太华侨の戦後の動向については、日本国内の資料からは追迹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戦後の北海道では、华侨は道内でのみ移動し、都市部のみならず郡部を含む全道一圓に移動していった。戦前と異なり、北海道から樺太や千島へ移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り、活動範囲は北海道だけとなり、华侨は道内各地に定住していった。中国からの留学生を除き、北海道の华侨社会は移動性を失い、ほぼ道内で华侨集団を維持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北海道华侨は何度か名簿を作成して华侨の連帯を維持してきたが、次第に名簿作成も困難になった。北海道は1つの行政区分としてはあまりにも面積が广大で、道内の华侨が定期的に集まり、構成員の親睦を図り、集団を維持していくには戸すぎる。その結果、华侨も2世から3世へと世代が交代して

いくにつれ、华侨同士のつながりが薄れていき、国内他地域の华侨との交流も少ない道内各地の华侨は次第に孤立し、その規模の縮小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現在において、华侨总会を維持している函館と札幌、旭川では、定期的に总会を開催して华侨同士の親睦をはかっているが、华侨社会の維持は困難を極めており、函館や旭川では华侨社会の存続そのものが危ぶまれている。かつて、北海道华侨の連帯のシンボルであった函館中华会馆は、来年に創立100周年を迎えるが、北海道の华侨社会はその維持・継続という極めて現実的でかつ困難な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る。

参考文献

- 『函館市史』（函館市）
- 『札幌市史』（札幌市）
- 『旭川市史』（旭川市）
- 『根室市史』（根室市）
- 『桦太终战史年表』（未定稿）北海道总务部、1968年
- 陈上梅「异国に生きて」『私の中の历史』7 北海道新闻社、1987年
- 林同春『二つの故乡 在日华侨を生きて』エピック、2007年
- 斯波义信「函馆华侨关系资料集」『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2号』、1982年
- 「在日华侨と文化摩擦－函馆の事例を中心に－」
- 山田信夫編『日本华侨と文化摩擦』岩南堂书店、1983年
- 许 淑真「日本における労働移民禁止法の成立～敕令352号をめぐって」
- 『东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
- 「函馆における福清帮」『华侨・华人史研究の现在』汲古书院、1999年
- 小川正树「明治・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北海道华侨社会の形成」『史朋』41号、2008年

19세기 하코다테 외국인 거류지와 화교 상인

— 하코다테 화교에서 홋카이도 화교로 —

오가와 마사키 (하코다테 LA SALLE고등학교)

〈目 次〉

1. 시작하며
2. 하코다테 화교
3. 홋카이도 화교
4. 마치며

1. 시작하며

1858년에 미일수호통상조약이 체결된 후, 에도 막부는 일본 내에 있는 5개의 개항장(開港場)과 2개의 개시장(開市場)을 외국에 개방하면서 외국과의 무역을 시작했다. 개항 초기에는 미국의 포경선을 비롯한 영국의 무역선이 내항하여 일본 상인과 거래를 했는데 이러한 무역선에는 중국 상인도 다수 승선하고 있었다. 중국 상인들은 당시, 구미 상인에게 고용된 통역이나 중개인으로서 내항했으나 훗날에는 구미 상인들로부터 독립하여 점포를 차리고 일본 상인과 거래를 하게 되었다. 중국 상인들은 당초 외국인에게 고용되어 있다는 유리한 지위를 이용하여 미일수호통상조약 하에서의 상업 활동을 전개했으나 1871년에 청일수호조규가 체결된 후 일본 정부는 이들을 중국인(淸國人)으로 파악하기 시작했다. 이리하여 쇄국 체제 하에서는 나가사키에서만 거주하던 중국 상인들이 국내의 개항지·개항장에도 내항하게 되면서 각지에 중국인 거주 구역을 형성해 갔다. 예를 들어 하코다테의 경우, 중국 상인은 처음에는 영국 상인에 고용된 신분으로 내항하여 일본 상인과 거래를 하다가 차츰 인원수와 점포를 늘리면서 나중에는 하코다테의 외국인 거류지의 최대 세력으로 성장하였고 나가사키와 고베, 요코하마와 상하이 상사의 지사가 하코다테에도 개설되었다.

개항지로 이주해 온 중국 상인들은 항만으로부터 약40km이내의 유보구역에서만 활동하도록 그 범위가 제한되어 있었다. 중국 상인들은 일본 상인을 대리인으로 내세워 해산물 생산지로 파견하여 거래를 이루려고 했으나 규정에 따라 외국인 거류지가 있는 유보 구역 이외의 지역에서는 외국 상인의 거래가 금지되었다. 외국인 거류지라는 시스템이 일본 국내 시장 진출의 장벽이 된 것이다. 중국 상인들은 중국 대륙 시장의 판로를 장악하고 있다는 유리한 위치에 있었기 때문에 개항 초기부터 일본과 중국의 무역, 특히 해산물 무역을 독점해 왔으나 해산물 생산지는 점차 하코다테로부터 멀리 떨어진 도내 각지의 어장으로 이동해 갔고 도내의 어장은 현지에 진출해 있던 일본 상인들이 장악하고 있어 메이지 시대의 하코다테에서는 일본 상인과 중국 상인 간의 격렬한 주도권 싸움이 전개되었다. 중국 상인은 자본력, 정보량, 상거래에 있어 일본 상인을 능가했으나 생산지에 대한 지배력을

강화시키지 못했다. 따라서 생산지로부터 물품을 구매하기 위해서는 일본 상인에게 의존할 수 밖에 없었다. 또한, 일본의 상사(商社)가 상하이에 지점을 개설하고 중국 대륙 시장 진출에 나서자 중국 상인들의 압도적 우위성에 금이 가기 시작, 중국 상인 중에는 일본에서의 거래를 포기하고 본국으로 돌아가는 자들도 생겨났다.

2. 하코다테 화교

하코다테는 1854년에 체결된 미일화친조약에 의해 외국에 항구를 개방하게 되었고, 1858년에 미일수호통상조약이 체결된 후에는 미국이나 영국 국적의 배가 내항하면서 무역이 개시되었는데 이러한 외국선을 타고 온 중국인들이 중개인으로서 내항했다. 이것이 바로 하코다테 화교의 시작이다. 처음에 중국인들은 외국인에 고용된 유리한 입장에서 상업 활동을 했으나 1871년에 청일수호조규가 체결된 후에는 일본 정부에 의해 일본인들과 대등한 입장으로 여겨지기 시작했다. 하코다테에는 해산물을 취급하는 중국 상사가 진출해 있었고 주로 광둥 지역이나 짬장 지방 출신이 중국 대륙이나 나가사키, 고베, 요코하마 등과의 네트워크를 무기 삼아 하코다테의 해산물 무역을 독점했다. 하코다테항에서 이루어진 국제무역은 주로 대중국 해산물 수출이었으며 하코다테에 있어서 개항이란 중국 무역의 본격적인 개시를 의미하는 것이었다. 외국인 거류지라 하면 무조건 구미 제국과 교류가 이루어졌던 것처럼 여겨지는 경우가 많으나 그 실체는 아시아와의 무역이었으며 외국인 거류지에는 아시아와의 교류 창구라는 측면이 있음을 인식해 둘 필요가 있다. 각 거류지에서는 아시아인들이나 영국인들보다 중국인이 차지하는 비율이 더 높았기에 거류지=구미사회라는 식의 편파적인 견해는 옳지 않다. 앞으로는 외국인 거류지에 대한 지금까지의 이미지가 수정되어야 할 것이다.

하코다테의 외국인 거류지는 당초, 오마치(大町)의 해안에 매립지를 조성하여 겨우 약 6600 평방미터(약 2 천평) 가량의 부지에 외국 상인을 거주시킨다는 계획이었다. 하지만 이 정도 규모로는 협소한 데다 물을 확보하기에 불편한 장소였기 때문에 외국 상인들이 반발하여 하코다테의 봉행들은 다시 지조마치(地蔵町, 현재의 도요카와마치)에 매립지를 조성하여 약 7600 평방미터(약 2 만 3 천 평) 가량의 외국인 거류지를 마련했으나 유럽발 공황의 영향으로 구미 상인들이 하코다테로부터 철수함으로써 일본인들이 이곳에 점포를 차리게 되었다. 그리고 오마치 거류지에는 중국인(화교)들이 거주하게 되었고, 화교들은 점차 오마치 거류지에서 하코다테 시가로 거주 영역을 확대해 나가 소규모이기는 하지만 오마치의 거류지에서 하코다테산에 걸친 지역에 중국인 거주지를 형성했다. 화교 인구의 증가와 상거래의 활성화에 힘입어 화교들은 상호부조 겸 사무소로 동덕당(同德堂)을 설립했고 훗날에는 이를 동덕당삼강公所(同德堂三江公所)라 개칭, 당시의 도미오카쵸 3번지(富岡町, 현재의 오마치 1번지)에 있던 양옥 건물 4동(Thomas Wright Blakiston이 처음으로 토지를 임대했던 장소에 세워진 건물)을 구입했다. 이 장소에는 지금도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이 자리하고 있다. 이 삼강공소가 1907년에 발생한 대화재로 인해 소실되었기 때문에 당시의 하코다테 화교 가운데 중심인물이었던 장존삼(張尊三)이 같은 부지 내에 순수

중국 양식의 중화회관 건설을 계획하고 하코다테 화교 자금 외에 홋카이도 및 사할린에 주재하는 화교들의 협력을 얻어 현재도 남아있는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을 완성시켰다. 이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 부지는 원래 국유지였으며 화교 소유가 아니었으나 1942년, 하코다테 상공회의소가 정부로부터 토지를 매입하여 이를 하코다테 화교에게 대여하는 형태로 사실상의 토지 취득을 달성했다. 이때도 토지 구입 자금은 전국의 화교로부터 제공받았고 또한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은 화교 연대의 상징으로서 유지되어 왔다.

1894년의 조약 개정에 따라 1899년 이후 일본 국내가 외국인에게 개방되게 되었다. 그 이전에는 외국인의 활동은 상업 거래까지 포함하여 외국인 거류지로 한정되어 있었다. 하코다테의 경우, 장존삼이 다시마 거래를 위해 대리인을 네무로(根室)에 파견한 사실이 위법 행위에 해당하느냐의 여부가 재판에 부쳐졌는데 청일통상장정 제15관의 해석이 쟁점이 되었다. 하코다테 법원에서는 유죄 판결이 내려졌고 최종적으로는 대심원(大審院)에 의해 대리인 파견은 위법 행위라 인정되었다. 즉, 외국인이 거류지 영역을 벗어나 상거래를 하는 것은 인정되지 않았다. 이러한 사례는 도쿄에 사는 화교에게도 있었으며 조약 개정 이전에는 외국인의 상업 활동은 조약에 의해 어느 정도 제한을 받고 있었다고 생각해야 한다. 또한 일본 정부는 조약 개정으로 많은 중국인 단순 노동자가 내항하여 일본의 노동 시장을 위협할 우려가 있다고 하여 원칙적으로 일본 국내를 개방하면서 실제로는 외국인, 특히 중국인의 입국을 제한하는 법률을 제정했다. (칙령352호, 내무성령42호) 이 안에서 중국인은 전부터 일본 국내에서 활동해 오던 해산물 거래나 3도업(三刀業, 재봉·이발·요리) 이외에는 잡화상이나 행상만이 인정을 받았고 일본인 노동자와 경쟁할 가능성이 있는 중국인 단순 노동자는 입국이 거부되었다.

이리하여 제한적이기는 하나 화교는 개항장의 외국인 거류지 영역을 벗어나 일본 국내에서 이동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잡화상이나 오복행상은 외국인 거류지로부터 도시부, 더 나아가 군부(郡部)로 진출하면서 자신들의 상권을 확대하였고 화교 사회는 점차 일본 열도 전역으로 확대되어 갔다. 하지만 국내가 개방되었다 해도 외국인의 국내 이동에는 커다란 제약이 뒤따라 현(県)의 경계를 넘어 행상을 하는 경우에는 사전에 관공서에 신청서를 제출해야 했으며 이를 잊은 경우에는 스파이 혐의로 경찰에 구속되어 까다로운 심문을 받았다. 이런 심문 과정에서 목숨을 잃는 경우도 있었기 때문에 현실적으로 국내 이동은 목숨을 건 행위였다. 또한, 하코다테의 경우에는 1899년에 제정된 요새지대법으로 하코다테항 및 그 주변의 외국인에 대한 감시가 강화되어 여행 목적으로 하코다테를 방문한 일본인일지라도 항구 내에서의 사진 촬영은 불가했으며 이 법을 위반한 외국인 보고 사례가 외무성에 남아 있다. 그리고 하코다테 화교는 홋카이도 내에서 행상에 나설 때는 목적지, 거래 상대, 이동 경로 등을 상세히 기록하여 가족에게 알렸다. 만약 특별고등경찰이 집을 방문했는데 어떤 행상 중인지 설명하지 못하는 경우에는 곧장 경찰에 연행되어 고된 심문을 받아야 했다. 화교 가족들은 특별고등경찰 형사가 집에 들이닥치면 오금을 퍼지 못했다고 당시를 회고한다. 하지만 하코다테 화교는 각종 제약을 받으면서도 국철 등의 이동 수단을 이용하여 하코다테를 거점 삼아 도내 각지로 오복행상의 활동 무대를 넓혀나갔다.

3. 홋카이도 화교

1899년에 내지잡거(内地雜居)가 실시되자 하코다테 화교는 홋카이도 각지로 진출, 오타루(小樽)와 무로란(室蘭), 구시로(釧路), 네무로(根室), 왓카나이(稚内)와 같은 항구 도시뿐만 아니라 삿포로(札幌), 아사히카와(旭川), 오비히로(帯広), 기타미(北見) 등 내륙 도시로 이주해 갔다. 1930년대에는 도내의 주요 도시뿐만 아니라 가미카와(上川)나 이부리(胆振), 아바시리(網走) 등의 군부로까지 이주 영역을 넓혀 거의 홋카이도 전역으로 퍼져나갔다. 이렇게 도내 각지에 형성된 화교 사회는 각각의 성격이 달랐기 때문에 이를 하나의 집단으로 여기는 것은 적절하지 않고 각 지역에서 형성된 화교 사회의 성격을 개별적으로 검토할 필요가 있다. 여기서는 홋카이도내의 화교 사회 가운데 규모가 컸던 하코다테·삿포로·아사히카와 이 3대 도시의 화교 사회에 대해 검토해 보고자 한다.

하코다테 화교는, 개항 초기에는 광둥 성(廣東省) 출신이 많았으나 점차 저장 성(浙江省) 등 삼장(三江)지방 출신 해산물 상인이 중심이 되어 다시마 등의 해산물 거래가 이루어졌다. 상거래 관습의 차이나 중국 시장에 관한 정보 독점 등 일본상인이나 개척사(開拓使)와의 극심한 마찰을 경험했고, 때로는 불매운동으로까지 번진 경우도 있었으나 메이지 시대에는 대체적으로 화교 상인이 중국향 해산물 수출의 주도권을 잡고 있어 일본상인들은 이에 대항할 여력이 없었다. 하지만 하코다테의 경제적 번영은 해산물 거래와 대중국 시장 수출에 의존하고 있어 홋카이도청이나 하코다테시, 현지 경제 관계자들은 하코다테 화교들의 활동을 높이 평가했고 그 중심 인물이었던 장존삼에게는 해산물 무역뿐만 아니라 도 이남 지역 어촌의 고급 식재인 상어지느러미의 제조 과정을 구체적으로 지도하여 어민의 생활 향상에 지대한 공헌을 했음을 표창하여 장존삼이 귀국하기 직전에는 당시의 하코다테 시장과 상공회의소 등의 관계자를 비롯 재계 유력자가 모여 성대하게 송별회를 열어주는 등, 현지 하코다테에서는 그 활동상과 인물이 높은 평가를 받았다. 또한 일본 정부도 장존삼의 오랜 세월을 걸친 활동과 일본 사회에 대한 공헌을 높이 평가하여 제2차 오쿠마시게 노부(大隈重信)내각은 남수포장(藍綬褒章)을 수여하기로 결정했다. 이리하여 하코다테 화교는 거듭되는 일본 상인과의 대립과 충돌을 극복하고 일본 사회에 정착하여 현지의 신뢰를 얻게 되었다. 또한, 이 하코다테 화교는 해산물의 생산 거점인 홋카이도와 거대 시장인 중국 대륙을 잇는 역할을 함과 동시에 중국 대륙과 고베, 요코하마와 도내 각지를 연결해주는 역할도 수행했다.

1907년의 대화재로 하코다테의 동덕당삼강공소가 소실되자, 하코다테 화교는 현지뿐만 아니라 홋카이도, 나아가 사할린 화교의 협력을 얻어 순수 중국 양식의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을 건설, 홋카이도·사할린 모든 화교의 연대의 상징으로서 유지해 왔다.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은 관제(關帝)단을 중심으로 건축하는 등, 종교적 시설로서의 성격 외에 무역을 위한 실무 절차나 사령관을 대신해 외교 절차를 담당하는 경제적·정치적 시설로서의 성격을 동시에 갖고 있으며 홋카이도 화교의 모든 생활과 관련된 기관으로서의 역할을 다했다. 이 중화회관은 전전부터 일본 국내에 거주해 온 화교 1세, 2세 등 소위 말하는 노(老)화교에 의해 운영되었으며 위에서 언급한 사무 관계 외에 신년회나 결혼식 등도 이곳에서 이루어져

하코다테 화교의 생활과 밀접한 관계를 맺어왔다. 하지만 이 하코다테 화교도 중일국교정상화 이후 세대 교체가 이루어져 화교로서의 의식과 사고방식, 생활적인 측면에서도 조금씩 변화가 나타나기 시작했다. 또한 중국인민공화국과의 국교수립과 더불어 일본 내의 화교들은 중화인민공화국, 혹은 중화민국의 국적을 선택해야 하는 기로에 놓이게 되었다. 전전에는 일본으로 도항하여 정착하는 경우에도 여권 필요 없이, 일본 국내 경찰서에서 간단한 절차만 밟으면 생활할 수가 있었는데 국교정상화 후에 국적 선택이 의무화 됨에 따라 중국인민공화국 국적과 중화민국 국적으로 분열되고 말았다. 또한, 국교정상화와 동시에 유학생의 신분으로 중국인들이 일본에 들어오게 되었는데 이러한 유학생은 유학 생활이 끝난 후에도 기술직이나 연구직으로서 일본 국내에 체재하게 되면서 신(新)화교라 불리는 중국인이 증가하게 됐다. 또한 외국인 연수제도가 실시되자 하코다테나 이 근교에서 중국인 연수생을 받아들이게 됐고 많은 연수생이 일본을 찾았다. 이 연수생들은 3년이라는 제한된 기간 조건부로 일본에 입국하지만 시는 통계상 이들을 외국인으로 파악했다. 신화교는 전전의 노화교와는 생활, 관습, 사고방식, 교육 등의 측면에서 다른 점이 많았으며 화교총회에 입회하는 자도 거의 없는 상황이다. 이리하여 하코다테의 화교 사회는 크게 2개의 집단으로 나뉘게 되었고 이런 현상은 도내의 각지에서도 문제가 되었다.

삿포로 화교는 개척사가 중국 화베이 지역의 농업 기술을 홋카이도 개척에 이용하기 위해 고용한 「고용 외국인」에서 시작되었다. 개척사는 산둥 성으로부터 10명의 농민을 2년 계약으로 고용하여 현재의 삿포로시 오카다마(丘珠) 부근을 개척하도록 했는데 이 사업은 많은 문제점을 안고 있어 결과적으로는 실패했으나 귀국하지 않고 일본에 남은 허사태(許士泰)는 오카다마 부근을 계속 개척하다가 훗날 귀화 신청을 통해 일본 국적을 취득, 순조롭게 농사를 계속한 결과 이 일대의 대지주로 성장했다. 그는 성공을 거둔 후, 고향인 산둥 성으로부터 농업유학생을 받아들였는데 이 유학생들이 삿포로 화교의 시초가 되었다. 통계상으로는 1904년 이후, 『홋카이도청 통계서』의 화교 직업란에는 학생이라는 기록이 있고 이는 1910년대까지 유지되고 있다. 어쩌면 이것이 산둥 성으로부터 삿포로로 건너온 농업 유학생을 말하는 것일지도 모르겠다. 유학생은 1920년대 들어 증가하기 시작하는데 이는 중화민국 이후의 유학생이며 허사태와의 관계에 대해서는 밝혀진 바가 없다. 국내 개방 이후에는 요리직이나 행상인들도 삿포로로 이주해 와 1930년대의 삿포로 화교의 인구는 100명을 넘었다. 또한, 홋카이도 제국대학 유학생도 증가해 삿포로는 유학생과 상인, 요리사를 중심으로 화교 사회가 형성되었다. 하지만 1930년대 이후에는 화교 인구가 급격히 감소하면서 대부분의 화교가 삿포로에서 모습을 감췄다. 종전 후, 홋카이도 제국대학에 유학 중이던 학생들이 중심이 되어 홋카이도 삿포로 화교총회를 설립했으나 당시, 학생을 제외하고는 전전부터 있던 화교는 거의 남아있지 않았기 때문에 전전의 화교 사회와 전후의 화교 사회는 단절되었다고 볼 수밖에 없다. 삿포로의 화교총회는 전후, 하코다테를 대신하여 화교 사회의 중심적 역할을 담당했고 국교정상화 이전에는 홋카이도뿐만 아니라 아오모리·아키타·이와테 등 동북 3현의 화교 사회를 대상으로 중국 대륙으로 도항하기 위한 수속을 담당해 왔다. 국교정상화 이후, 삿포로에 총영사관이 개설되어 여권과 비자 신청을 할 수 있게 되자 화교총회는 외교 수단의 창구로서의 역할에 거의 종지부를 찍게 되었다. 1980년대에는 중국대륙으로부터 많은 유학생이 일본으로 건너왔는데 그들은 신화교

라 불렸으며 직접 총영사관과 연락을 취하는 등 화교총회에는 의존하지 않고 생활할 수 있었다. 그들은 노화교와는 별도로 홋카이도 화교화인연합회를 조직하였고 노화교와의 교류는 거의 없었다. 최근 몇 년 동안, 홋카이도 삿포로 화교총회와 홋카이도 화교화인연합회의 부인부(婦人部)가 관계 강화를 목적으로 연대할 것을 발표했으나 구체적인 활동은 아직 없으며, 여전히 노화교와 신화교의 간극은 크다고 할 수 있다. 노화교 내부에서도 총회 운영이나 상호친목을 중시하는 전전 노화교와 시대의 변화에 대응하며 조직으로서의 활동을 중시하는 전후 노화교 사이에 의식의 차이가 존재한다. 게다가 전전 노화교의 인구가 감소함에 따라 전전 화교 사회의 전통과 관습, 즉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성립 이전의 중국 사회의 전통이 급격히 사라지고 있다. 삿포로 화교총회는 삿포로 시내에 있는 묘지에 1기의 화교 공묘를 소유하고 있었는데 유지비를 지불하면 공묘에 매장할 수 있었고, 당시까지 삿포로 화교 사회의 공유재산으로서 유지돼 왔다. 노화교에게는 정신적 의지가 되었으나 이 공묘에 대한 성묘 등의 행사에 참가자 수가 줄어드는 등, 지금까지 삿포로 화교가 유지해 온 몇몇 화교 사회의 관습이 사라져가고 있다. 화교총회의 이런 현실에 반해 신화교의 화교화인연합회는 유학생 증가와 더불어 입회자가 증가 추세에 있고 규모는 화교총회를 크게 웃돈다. 신화교는 직접 삿포로 총영사관을 통해서 방일, 귀국 수속을 하고 있기 때문에 삿포로 화교총회에 의존할 필요가 없으며 총영사관과의 연계를 중시하고 있다. 하지만 화교화인연합회 역시 가입자 증가를 비롯해 회원의 타지역 이동 등 기존의 화교 사회와는 또 다른 문제점을 내포하고 있다. 앞으로는 이러한 도내 신화교에 대한 조사가 필요할 것이다.

아사히카와 화교는 국내 개방 후, 하코다테로부터 오복행상이 진출하여 정착하면서 시작되었다. 아사히카와는 군대가 주둔하는 군사도시로 발전했고 이에 따라 인구도 증가해 갔다. 이런 아사히카와에 푸젠 성 출신의 오복행상이 정착했고 훗날에는 요리업이나 잡화상 등도 증가했다. 일반적으로 일본으로 건너온 화교는 초기의 해산물 거래상 이외에는 소위 말하는 3도업이 중심이었고 그 외에 잡화상이나 오복행상에 종사하는 자들이 있었다. 요코하마나 고베의 경우, 이 3도업에 종사하는 사람들의 비율이 높다고 알려져 있는데 홋카이도는 약간 달라서 요리업에 종사하는 사람은 많으나 이발업·재봉업에 종사하는 사람은 거의 없고 그 대신 모피 제조나 판매에 종사하는 화교가 많다는 것이 특징이다. 화교의 직업에 대해서는 일반적인 경향은 확실히 인정되나 지역이나 시기에 따라 직업의 내용이 달라 단순화시키기는 어렵다. 특히, 홋카이도에서도 하코다테·삿포로·아사히카와 이 세 도시는 각각 성장 배경이 달라 하나의 집단으로 취급하기에는 어려움이 따른다. 아사히카와 화교는 하코다테로부터 이주해 온 사람들이 중심이며 이주 후에도 화교끼리 혼인하는 등, 하코다테 화교와의 관계를 유지해 왔다. 홋카이도 내에는 하코다테의 푸젠 성 푸칭 현 출신자 간의 네트워크가 있었는데 이런 네트워크는 아사히카와 외에 도마코마이, 구시로, 기타미, 무로란 등에 퍼져 있었고 직업은 오복상인들이었다. 아사히카와 화교는 시내에 정착한 후, 다른 직업으로 전환하는 경우도 있었으나 기본적으로는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대규모적인 인구 변화는 없다. 타지역으로부터의 유입도 적으며 또한 타지역으로의 이동도 적어 아사히카와에 정착한 사람들이 그대로 화교 사회를 유지해 오고 있다. 아사히카와의 화교 사회는 이동이나 규모의 변화가 적고, 또한 총회로서의 행사·활동도 그다지 많은 편이 아니다. 2세·3세로 세대가 흘러감에 따라 일본 사회와의 연대가 강해지고 있고, 묘지도 총회가

아닌 개인이 소유하며 성묘 등의 행사를 총회 이름으로 실시하고 있지는 않다. 도내 타도 시와의 교류나 이동이 적은 아사히카와 화교는 도내에서 고립화의 길을 가고 있고 총회의 존속도 장담하기 어려운 상황이다.

홋카이도의 화교 사회는 삿포로를 제외하고는 회원수 감소와 고령화라는 문제를 안고 있다. 과거 홋카이도의 화교는 홋카이도 전역 화교 연대의 상징으로서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을 건설하기 위한 자금을 제공함으로써 단결의 힘을 보여줬다. 이어, 사실상의 토지 취득 자금을 전쟁 중의 너무나도 어려운 시기에 자금력 있는 사람이든 그렇지 못한 사람이든 본인에게 가능한 범위 내에서 원조함으로써 그들의 염원이었던 회관 건설을 위한 토지를 취득했다. 또한 1968년에 있었던 도카치오키(十勝沖)지진으로 인해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의 벽면 일부가 파손됐을 때도 화교총회가 홋카이도 전역을 돌며 화교로부터 자금을 원조받아 복구할 수 있었다. 이리하여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은 3번에 걸쳐 홋카이도 전역의 화교들의 협력을 얻어 지금까지 유지되어 왔다. 또한, 3 번째 자금 협력을 요청할 당시에는 동시에 홋카이도 일대 화교들의 상세 명부를 작성하여 전도 화교의 연대를 강화하기 위한 노력이 이루어졌다.

4. 마치며

홋카이도 화교는 일본 열도를 따라 북상하여 나가사키나 요코하마, 고베로부터 홋카이도로 이주하면서 독자적인 커뮤니티를 형성해 갔다. 하지만 당시의 홋카이도는 정부 주도로 개발이 진행 중이었고 지속적으로 일본인 이주도 이루어지고 있어 이 지역의 수요에는 한계가 있었고, 직업에 대해서도 많은 제약을 받게 되었다. 이것이 요코하마나 고베에 비해 이발사나 재봉사를 찾아보기 어려운 이유다. 홋카이도에는 해산물을 취급하는 상인 외에 요리사, 잡화상, 오복행상, 그리고 모피상이 통계 기록에 남아 있으며 대형 자본 소유 상인으로서가 아니라 개발이 진행 중인 홋카이도에서 수요가 있는 직업군에 적응하는 형태로 이주가 이루어졌다고 생각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다이쇼10년 이후, 통계자료상 여성과 어린이의 수가 증가하고 있다는 점에서 이 무렵에는 독신이 아닌 가족 단위 이주도 증가했을 수 있다. 이는 홋카이도를 찾는 화교가 단기 체제가 아니라 정착을 각오하고 이주해 온 것으로 생각할 수 있으며 이런 식으로 이주해 온 화교는 그 후, 홋카이도 내에 머무르지 않고 사할린이나 쿠릴 열도 등 일본 영내로 이동했을 가능성도 배제할 수 없다. 외교사료관에 소장되어 있는 자료에 따르면 일본 회사의 계잡이선의 승무원으로 고용된 중국인의 존재를 확인할 수 있는데 이를 통해 화교의 활동 범위가 육상에 국한되지 않고 해상으로까지 확대되었을 가능성이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즉, 화교의 활동 범위는 기존의 생각처럼 홋카이도에만 국한된 것이 아니라 사할린이나 쿠릴 열도 등 널리 동북아시아 해역까지 확대되었을 가능성이 있는 것이다.

제2차 세계대전 후, 일본의 패전으로 사할린과 쿠릴 열도는 소련의 군사 점령하에 놓이게 됨으로써 이들 지역을 포함해 동북아시아 해역으로 진출할 수 있는 길이 봉쇄되었다. 일본의 통치가 끝나고 행정이나 경찰 기능이 마비되었으며 이 해역에서 일본인들의 생활환

경이 격변하는 가운데, 화교는 지금까지의 우호국 입장에서 승전국의 국민이라는 입장으로 바뀌었고, 한편으로는 연합군으로부터 특별배급을 받을 권리는 인정받으면서 한편으로는 홋카이도로부터 사할린 등지로 이동하기는 극히 어려운 상황이 되었다. 소련군의 점령하에 놓이게 된 사할에서 일본인은 하코다테나 쓰루가시로 철수했는데 그 밖에는 한반도 출신자들의 철수에 관한 기록이 일부 남아 있지만 사할린 화교의 이동에 관한 공식적인 기록은 남아있지 않다. 다만, 2명의 사할린 화교가 전후에 일본인 내연의 처를 의지하며 상하이나 홍콩을 경유하여 홋카이도로 들어온 사례가 있었다고 하는데 일본 국내 자료상 이 밖의 사할린 화교의 전후 동향은 추적이 불가능하다.

전후 홋카이도에서는 화교는 도내에서만 이동했고, 도시부뿐만 아니라 군부를 포함한 홋카이도 전역으로 이동했다. 전전과는 달리, 홋카이도에서 사할린이나 쿠릴 열도로 이동할 수 없게 됨에 따라 활동 범위는 홋카이도 내부로 한정되면서 화교들은 도내 각지에 정착해 가기 시작했다. 중국 유학생을 제외하고는 홋카이도 화교 사회에서는 더 이상 이동은 없었으며 거의 도내에서만 화교 집단을 유지해야 했다. 홋카이도 화교는 여러 번 명부를 작성하면서 화교의 연대를 유지해 왔으나 점차 명부를 작성하기도 어려워졌다. 홋카이도는 하나의 행정 구역으로는 면적이 너무 광범위해 도내의 화교가 정기적으로 모여 구성원의 친목을 도모하고 집단을 유지하기에는 어려움이 따랐다. 그 결과, 화교도 2세에서 3세로 세대가 바뀌면서 화교 간의 연대가 약해졌고 일본 내 타지역의 화교와도 교류가 희박한 도내 각지의 화교는 점차 고립되면서 규모가 축소되어 갔다. 현재 화교총회를 유지하고 있는 하코다테와 삿포로, 아사히카와에서는 정기적으로 총회를 개최하여 화교 간의 친목을 도모하고 있으나 화교 사회 유지에는 많은 어려움이 있으며, 하코다테와 아사히카와에서는 화교 사회의 존속 자체가 위험에 처해 있다. 지난날, 홋카이도 화교의 연대를 상징하던 하코다테 중화회관은 내년엔 창립100주년을 맞이하지만 홋카이도의 화교 사회는 화교 사회의 유지·존속이라는 지극히 현실적이며 어려운 문제에 직면해 있다.

《참고문헌》

『하코다테市史』 (하코다테시)

『삿포로市史』 (삿포로시)

『아사히카와市史』 (아사히카와시)

『네무로市史』 (네무로시)

『사할린 종전사 연표』 (미완성 원고) 홋카이도 총무부, 1968년

진상매(陳上梅) 「이국에 살면서」 『내 안의 역사』 7 홋카이도 신문사, 1987년

임동춘(林同春) 『두 개의 고향 제일 화교로 살면서』 에픽, 2007년

시바 요시노부(斯波義信) 「하코다테 화교 관계 자료집」 『오사카대학문학부기요 제22호』, 1982년

「제일 화교와 문화 마찰-하코다테의 사례를 중심으로-」

야마다 노부오(山田信夫) 편 『일본 화교와 문화마찰』 간난도서점, 1983년

허정숙(許淑真) 「일본 노동이민 금지법의 성립~칙령352호를 중심으로」

『동아시아의 법과 사회』 규코서원, 1990년

「하코다테에서의 복청방 (福淸幫)」 『화교·화인사 연구의 현재』 규코서원, 1999년
오가와 마사키(小川正樹) 「메이지·다이쇼·쇼와 초기에 걸친 홋카이도 화교 사회의 형
성」 『사뽕(史朋)』 41호, 2008년

19世紀函館外国人居留地与華商

— 從函館華僑到北海道華僑 —

小川正樹（北海道函館ラ・サール高等學校）

〈目 次〉

- 一、前言
- 二、函館華僑
- 三、北海道華僑
- 四、結語

一、前言

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締結后，江戸幕府向外国开放日本的5个开港口岸和2个放市场，开始与外国的贸易。开港初期美国的捕鲸船和英国的贸易船来到日本并与日本商人进行交易，这类贸易船中还搭乘许多中国商人。中国商人最初是作为翻译和买办(经纪人)依附欧美商人而来的，但是后来逐渐摆脱欧美商人而独立开设店铺，与日本商人展开交易。中国商人初期是利用外国人所享有的有利地位，展开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商业活动，但是在1871年《日清修好条约》締結后，作为中国人(清国人)而受日本政府所控制。于是，在锁国体制下只住在长崎的中国商人，也逐渐向国内的开港口岸和开放市场流动，在各地形成中国人居住区。例如，在函馆，中国商人最初作为英国商人的随从而到来，并与日本商人展开交易，其后其人数和店铺逐渐增多，后来成为函馆外国人居留地的最大势力，甚至长崎、神户、横滨以及上海的商社也在函馆开设支店。

移居开港口岸的中国商人，其活动范围被限制在距港口约40公里以内的散步区域。中国商人以日本商人为代理人，将其派遣到海产品的产地进行交易，但是根据规定，外国商人超出外国人居留地即散步区域进行交易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其向日本国内市场的进军遭遇外国人居留地制度的阻碍。中国商人具备掌握中国大陆市场销路的有利条件，自开港伊始即壟断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特别是海产品贸易，但是随着海产品的产地逐渐转向远离函馆的北海道内各地的渔场，而道内渔场则由进出当地的日本商人所掌握，因此在明治初年的函馆，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展开激烈的主导权之争。虽然中国商人在资本力量、资讯数量和商业交易方面凌驾于日本商人之上，但是无法强化对产地的支配，在从产地收购方面不得不依赖于日本商人。再者，由于日本的商社在上海开设支店，并寻求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商人的压倒性优势逐渐丧失，在中国商人中也出现结束在日本的交易而回国的人。

二、函館華僑

函馆根据1854年締結的《日美和亲条约》等而成为对外国开港的口岸，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

约》缔结前后，美国船和英国船开始到函馆交易，搭乘这类外国船的中国人作为买办来到函馆，这就是函馆华侨的肇始。最初中国人凭借外国人享有的优越条件从事商业活动，但是在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缔结后作为与日本人平等的对象而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从事海产品交易的中国人商社进军函馆，主要是广东地区以及三江地区的出身者以连结中国大陆和长崎、神户、横滨的网络为武器，壟断函馆的海产品贸易。函馆港的国际贸易以对中国的海产品出口为中心，函馆的开港意味着与中国贸易之名副其实的开始。虽然说起外国人居留地大多无条件地呈现与欧美各国交流的印象，但是其实际情况是与亚洲的贸易，外国人居留地也有与亚洲交流的窗口，这个侧面是必须认识到的。在各居留地，较诸俄国人和英国人等，中国人所占的比率更高，因此居留地难以片面地等同于欧美社会。今后，旧的外国人居留地形象必须加以修正。

函馆的外国人居留地，最初是计划在大町海岸地带填海造地(筑岛)，设立仅2千余坪的地区让外国人居住。但是这块区域狭小，而且难以确保淡水的供应，因此外国商人纷纷反对，于是函馆奉行重新在地藏町(今丰川町)地区填海造地，建成约2万3千坪的外国人居留地。由于欧洲所爆发的萧条的影响，欧美商社从函馆撤退，日本人趁机在此地开设店铺。大町居留地则由中国人(华侨)居住，华侨接着从大町居留地向函馆市街逐渐扩大其居住区域，在从大町居留地到函馆山之间的地区形成小规模的中国人居住地。随着华侨人口的增加和商业交易的活跃，华侨设立同德堂作为相互扶助和办公事务机构，后改称同德堂三江公所，并购入位于当时富冈町3番地(现大町1番地)的洋楼4栋(最初由托马斯·布拉基斯顿借地建成)。这个地方至今还是函馆中华会馆所在地。三江公所因1907年大火而被烧毁，因此当时函馆华侨的中心人物张尊三计划在同一地块建设纯中国式样的中华会馆，除函馆华侨的资金之外，还获得北海道以及桦太(库页岛)华侨的支持，从而建成保留至今的函馆中华会馆。函馆中华会馆的地皮原为国有地，而不是华侨的私有地，但是在1942年，函馆商工会议所从政府购入这块土地并将其租给函馆华侨，从而实现事实上的土地之取得。当时购入土地的资金也是接受全道华侨提供的资金，因此作为全道华侨团结的象征，函馆中华会馆维持至今。

根据1894年的条约改正，1899年以后日本国内逐渐向外国人开放。此前，外国人的活动，包括商业交易活动，被限定在外国人居留地之内。在函馆，张尊三为了海带交易而向根室派遣代理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在法院审判中引起争端，而其争论的焦点是《日清通商章程》第十五款的解释。函馆的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最终大法院认定派遣代理人属于违法行为。换言之，外国人超出居留地进行商业交易是不被承认人。这类事例也见诸东京的华侨，可见条约改正以前外国人的商业活动被限定在条约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再者，日本政府还恐惧，由于条约改正，纯粹的中国劳工大量来日而对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威胁，因此在原则上开放日本国内的同时，还制定限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活动的法律。(敕令352号，内务省令42号)其中，中国人除原来在国内活动的海产商和三刀业(缝纫业、理发业、饮食业)之外只有杂货商和行商获得承认，而可能与日本人劳动力产生竞争的纯粹的中国劳工则被拒绝入境。

惟其如此，尽管伴随着限制，但是华侨也能够超越开港口岸的外国人居留地而向日本的国内移动。杂货商和吴服商等纷纷从外国人居留地向都市地区移动，接着挺进郡地区，从而扩大其商业范围，华侨社会逐渐在日本列岛扩张。尽管国内已经开放，但是外国人的国内移动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超出县境从事商业活动需要事前向官厅申报；假如忘记申报则可能被怀疑为间谍而被警察所挽留，并遭受严厉的审讯。有人在审讯过程中被夺去生命，因此在现实中，国内移动是玩命的行动。再者，以函馆而言，根据1899年制定的《要塞地带法》，对于函馆港及其周边地区的外国人的监视进一步强化，甚至因旅游而造访函馆的日本人也不得对港内拍摄照片，关于违反这项法令的外国人的报告还保存在外务省。不仅如此，函馆华侨在北海道的国内从事商业活动时还必须详细记录目的地、交易对象、行动路线等并与家属保持联系。假如特别高等警察到其家而其家属未能说明其行动，则

立即被警察强制带走并接受严厉的审讯。回顾当时，华侨的家属总是为特别高等警察的刑事警官可能到家而忧心忡忡。尽管如此，函馆华侨即使遭受各种限制也依然利用国铁等移动工具，以函馆为据点向道内各地展开作为吴服行商的活动。

三、北海道华侨

随着1899年实行内地杂居，函馆华侨开始向北海道各地进军，不仅移居小樽、室兰、钏路、根室、稚内等港湾城市，而且还移居札幌、旭川、带广、北见等内陆城市。到1930年代，不仅道内主要城市，而且还移居上川、胆振、网走等郡地区，即几乎移居北海道全境。惟其如此，在道内各地形成的华侨社会其性格各异，一以概之是不合适的，因此需要个别地探讨在各地区形成的华侨社会的性格。在北海道的华侨社会中，其规模比较大的是函馆、札幌、旭川三个城市的华侨社会，在此拟以其为对象进行探讨。

函馆华侨，其中心从开港之初的广东省出身者逐渐转变为浙江省等三江地区出身者的海产商为中心，从事海带等海产品交易。虽然由于商业习惯不同和壟断中国市场情报而经历了与日本商人和开拓使的激烈对立，甚至偶尔还发展为抵制运动，但是总体而言，明治时代华侨商人掌握向中国出口海产品的主导权，日本商人无法与其抗衡。函馆的经济繁荣依赖于海产品交易和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因此北海道厅以及函馆市、当地经济关连人士都积极评价函馆华侨的活动，对于其中心人物张尊三，不仅海产品贸易，而且还具体地指导道南地方渔村的高级食材鱼翅的制造过程；为了表彰其对渔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做的重大贡献，在张尊三归国前夕，当时的函馆市长以及商工会议所等政界、财界的实力人物举行盛大的送别会，可见在函馆当地，华侨的活动和人物得到高度评价。再者，日本政府也高度评价张尊三长期的活动及其日本社会的贡献，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决定授予其蓝绶褒章。由此可见，函馆华侨超越了与日本商人三番五次的对立和冲突而植根于日本社会，并且获得当地社会的信赖。不仅如此，函馆华侨还发挥了双重作用，即在将海产品的生产据点北海道与巨大的市场中国大陆连结起来的同时，将中国大陆以及神户、横滨与道内各地连结起来。

因1907年大火函馆的同德堂三江公所被烧毁后，函馆华侨不仅凭借当地而且还依靠北海道、乃至桦太地区华侨的支持，建设纯中国式样的函馆中华会馆，并且作为北海道、桦太之全体华侨团结的象征而维持下来。函馆中华会馆除设置关帝坛于中心部等而具有宗教设施的性格之外，还从事贸易目的的事务手续以及代替领事馆的外交手续等，兼具作为经济设施和政治设施之性格，发挥了作为全方位涉及北海道华侨生活之机关的作用。函馆中华会馆的运作是由从战前就住在日本国内的所谓华侨第一代和第二代之老华侨主导的，除了上述相关事务外，还负责举办新年会和结婚仪式等活动，与函馆华侨的生活密不可分。然而，函馆中华会馆也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推进世代交替，作为华侨的意识、想法、生活也逐渐发生变化。进而，随着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国内华侨必须在中华民国国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之间做出抉择。虽然战前即使渡海来到日本定居也不需要护照，而只要在日本国内的警察署履行简单的手续即可以生活，但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由于国籍选择问题，华侨分裂为中华民国国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再者，随着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人开始作为留学生来日，这类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还作为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滞留日本国内，因此被称为新华侨的中国人逐渐增加。进而，随着外国人研修制度付诸实施，在函馆及其近郊的町村也开始接收中国人研修生，许多研修生来日。这类研修生是根据三年的期限来日的，在函馆市的统计上视为外国人。新华侨与战前的老华侨在生活、习惯、想法、教育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而且几乎没有人参加华侨总会。惟其如此，函馆的华侨社会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集团，这个现象在道内各地区也日

渐成为问题。

札幌华侨肇始于开拓使为了将中国华北的农业技术利用于北海道开拓事业而雇佣的“外国雇员”。开拓使从山东省雇佣10个农民，合同时间为2年，由其担当现在的札幌市丘珠附近的开拓工作。虽然这项事业存在许多问题，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没有回国而留在日本的许士泰继续在丘珠附近的开拓事业，后来申请归化并取得日本国籍，顺利地推进农业经营而成长为该地区的大地主。他成功后从故乡山东省接收农业留学生，这些农业留学生成为札幌华侨的起始。在统计上，1904年以后《北海道厅统计书》之华侨职业栏目中包括学生的记录，这种情况到1910年代继续存在。他们大概是从山东省到札幌的农业留学生。留学生到1920年代继续增加，但是他们是中华民国的留学生，与许士泰的关系不得而知。内地开放以后饮食业者和行商也开始移居札幌，1930年代札幌华侨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人。再者，到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留学生也增加了，札幌以留学生、行商和饮食业者为中心而形成华侨社会。但是，1930年代后半叶华侨人口剧减，许多华侨从札幌销声匿迹。战争结束后，虽然以留学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学生为中心而成立北海道札幌华侨总会，但是当时源自战前的华侨除了学生以外几乎没有，因此不得不认为战前的华侨社会与战后的华侨社会是断裂的。札幌的华侨总会在战后取代函馆，发挥了华侨社会之中心的作用，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不仅以北海道而且以青森、秋田、岩手等东北三县的华侨社会为对象办理华侨前往中国大陆的手续。邦交正常化后，札幌开设了中国总领事馆，能够申请护照和签证，华侨总会充当外交手续之窗口的角色大体终结。1980年代许多留学生从中国大陆来日，他们被称为新华侨，直接与总领事馆联络，不依赖华侨总会也能够生活。他们与老华侨相区隔而组建北海道华侨华人联合会，与老华侨几乎不交流。近年北海道札幌华侨总会和北海道华侨华人联合会的妇女部发表了以加强合作为目的的合作声明，但是至今没有具体的活动，老华侨与新华侨的隔阂依然很大。在老华侨的内部，重视总会运作和相互亲睦之战前世代的老华侨，与因应时代变化而重视组织活动之战后世代的老华侨之间也存在意识上的差别。尽管如此，以战前世代的老华侨而言，随着其人口减少，战前华侨社会的传统和习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传统急速丧失。札幌华侨总会在札幌市内墓地拥有一座华侨公墓，只要支付维持费死者即能够埋在公墓，作为札幌华侨社会的公有财产维持至今。虽然对于老华侨而言依然是精神的居所，但是到这类公墓参与扫墓等活动的人日渐减少，札幌华侨维持至今的一些华侨社会的习惯正在丧失。相对于这种情形的华侨总会，新华侨的华侨华人联合会则随着留学生的增加，其入会者增加，其规模也逐渐超过华侨总会。新华侨来日和回国手续都是直接通过札幌总领事馆办理的，因此没有必要依赖札幌华侨总会，而是重视与总领事馆的联系。但是华侨华人联合会也由于加入者的增加以及会员移居其他地区，而存在与原来的华侨社会不同的问题。今后，需要进行以这类道内新华侨为对象的田野调查。

旭川华侨是随着内地开放后吴服商从函馆进入并定居而开始的。旭川作为军队驻扎的军都而发展起来，与此相伴随人口也逐渐增加。旭川最初是福建省出身的吴服行商定居，后来饮食业者和杂货商等也增多了。一般而言，来日华侨初期在海产品交易商以外，是以所谓三刀业为中心，此外还有从事杂货商和吴服行商的。在横滨和神户，从事三刀业的人所占比率比较高，而在北海道其倾向略有不同，其特征是饮食业从业者很多，而理发业和服装业从业者几乎没有，取而代之，从事毛皮制造和贩卖的华侨很多。以华侨的职业而言，虽然能够确认其一般倾向，但是其职业内容因地区和时期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是在北海道，由于函馆、札幌、旭川三城市的发展背景各不相同，因此这三个城市的华侨社会在性格、出身地、主要职业等方面也有差异，难以作为一个集团看待。旭川华侨以从函馆移居而来者为中心，移居后还通过华侨内部婚姻维持与函馆华侨的关系。在北海道的存在函馆之福建省福清县出身者的网络，这个网络还扩张到旭川以外之苫小牧、钏路、北见、室兰等地，其职业主要是吴服行商。旭川华侨在定居市内后虽然也有转换为其他职业的，但是至今

大体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变化。不仅从其他地区流入者很少，而且移居其他地区者也不多，总之定居旭川的人依然维持其固有的华侨社会。旭川的华侨社会人员移动和规模变化很小，而且总会的仪式和活动也不多。随着其世代向第二代和第三代交替，与日本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其墓地不是总会所有而是个人所有的，因此扫墓等活动也不是由总会组织实施的。与道内其他城市交流不多、人口迁移很少的旭川华侨走向了在道内孤立化的道路，总会的存续也面临严峻的状况。

北海道的华侨社会除札幌之外都存在会员减少和年龄老化的问题。从前，北海道的华侨向作为全道华侨团结象征之函馆中华会馆的建设提供资金，以展示其凝聚力。接着，在战争中的非常困难时期，为了募集事实上的土地取得资金，华侨不分贫富尽其所能援助资金，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会馆的地皮。进而，在因1968年十胜冲地震函馆中华会馆的墙壁部分受损时，华侨总会也是奔赴全道接受全道华侨的资金援助，最终得以完成修复工作。由此可见，函馆中华会馆三次仰仗全道华侨的合作而得以维持至今。此外，在第三次寻求资金协助之时，还编写了全道性的华侨详细名册，努力加强全道华侨的团结。

四、结语

北海道华侨沿日本列岛北上，从长崎以及横滨、神户移居北海道，形成其独自の社群。但是，当时北海道处在政府推进的开发过程中，日本人移民持续展开，不仅在地域的需要方面存在局限，而且其职业也受到许多限制，因此较诸横滨和神户，理发师和成衣铺难觅其踪迹。在北海道，除了海产商之外，饮食业者、杂货商、吴服行商以及毛皮商等均见诸统计记录，虽然不是拥有巨大资本的商人，但是适应开发过程中的北海道的需要，从而能够进行移民活动。接着，在大正十年以后统计资料显示女性和儿童的人数增加，可见不是单身而是家庭的移民也在进行之中。由此可见，来到北海道的华侨不是为了客居而到来、而是为了定居而移民；这样移居的华侨以后没有停留在北海道之内，而是还向桦太以及千岛群岛等日本领内的地区迁移，这种可能性也是不能否认的。根据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确认，日本公司的蟹工船存在作为船员而被雇佣的中国人，因此华侨的活动范围不只是在陆上，而且还可能扩大到海上。换言之，华侨的活动范围不只是原来所认为的北海道，而可能扩大到桦太及千岛群岛等广阔的东北亚海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战败，桦太和千岛被置于苏联的军事占领之下，进出桦太和千岛群岛等东北亚海域的道路被关闭了。在日本的统治停止、行政及警察机能瘫痪、该海域日本人生活环境剧变的过程中，华侨从此前友好国人的身份转变为战胜国人的身份，一方面其从联合国军接受特别配给的权利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其从北海道向桦太等地的移居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在被苏联军事占领的桦太，日本人撤回函馆和敦贺，此外朝鲜半岛出身者之撤回也见诸一部分记录，但是桦太华侨的移动情况没有见诸任何官方记录。只有2个桦太华侨在战后依靠日本人姘居妻子、经上海和香港而辗转来到北海道，除此事例之外，关于战后桦太华侨之动向，从日本国内资料无从寻觅其踪迹。

在战后的北海道，华侨只在道内移动，不仅在都市地区而且还在包括郡地区的全道各地移动。与战前不同，从北海道向桦太和千岛的移动已经不再可能，因此活动范围只局限于北海道，华侨在道内各地逐渐走向定居。除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北海道的华侨社会丧失其移动性，基本上只能在道内维持华侨集团。虽然北海道华侨几次编辑名册以维持华侨的联系，但是甚至编写名册也日渐困难。北海道作为一个行政区面积非常广大，道内的华侨难以定期集会以谋求成员亲睦并维持集团。结果，随着华侨逐渐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世代交替，华侨之间的联系日趋淡薄，与国内其他地区华

侨很少交流的道内各地华侨逐渐走向孤立，其规模也必然缩小。如今，虽然在维持着华侨总会的函馆和札幌、旭川，定期召开总会以谋求华侨之间的亲睦，但是华侨社会的维持极其困难；在函馆和旭川，华侨社会的存续本身也面临危机。曾经是北海道华侨之团结象征的函馆中华会馆来年将迎来创立100周年，而北海道的华侨社会在其维持、存续等极其现实的方面却面临严峻的难题。

参考文献

- 《函馆市史》（函馆市）
 《札幌市史》（札幌市）
 《旭川市史》（旭川市）
 《根室市史》（根室市）
 《桦太终战史年表》（未定稿），北海道总务部，1968年
 陈上梅：〈生于异国〉，《我的历史》7，北海道新闻社，1987年
 林同春：《第二故乡：在日华侨的生涯》，EPIKKU，2007年
 斯波义信：〈函馆华侨关系资料集〉，《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2号，1982年
 斯波义信：〈在日华侨与文化摩擦——以函馆的事例为中心〉，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岩南堂书店，1983年
 许淑真：〈日本劳动移民禁止法的成立——关于敕令352号〉，《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
 许淑真：〈函馆的福清帮〉，《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在》，汲古书院，1999年
 小川正树：〈明治、大正、昭和初期北海道华侨社会的形成〉，《史册》41号，2008年

1940年代後半における
日韓間の人の移動と米軍による監視

■ 小林 聡明 (大阪市立大) ■

1940年代後半における日韓間の人の移動と米軍による監視

小林 聡明（大阪市立大）

〈目 次〉

1. はじめに
2. 故郷への归还
3. 日常的実践としての密航
4. 日本社会からの追放としての送还
5. 監視される移動*
6. おわりに

1. はじめに

20世紀の初頭に出現した帝国日本は、日清戦争と日露戦争という二つの戦争を経て、その領域を拡大させてきた。内地に暮らす日本人は、「獲得された領土」である台湾や朝鮮、満洲に生活の場を求めていった。日本による併合後、植民地となった台湾や朝鮮においては、新たに創出された皇国臣民としての「日本人」が姿をあらわした。アジアでは、激しい構造変動が、帝国の内外で複雑な人の移動をともなうて生起していた。多くの内地住民が外地に移住しただけでなく、植民地住民もまた、日本当局によって強制的に、そして「主体的」に日本内地へと移動した。1944年までに11.6%の朝鮮人が、半島を離れ、离散の民（ディアスポラ）となっていた*1）。

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結した。日本は敗戦し、朝鮮は36年におよぶ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から解放された。8月末、ダグラス・マッカーサー元帥が、厚木飛行場に降り立った。日本は、ただちに米軍を中心とする連合国軍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GHQ/SCAP）により占領され、1945年9月から1952年4月まで約6年半にわたって続いた。一方、朝鮮半島は、日本から解放さ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ソ連と米国という二つの異なる強大国によって、再び占領された。

戦争の終わりは、世界中で大規模な人びとの移動を引き起こした。なかでも离散の民となっていた朝鮮人の移動は大規模に行われた。本報告は、敗戦時の日本で暮らしていた約200万人以上の朝鮮人の移動について、日本と朝鮮半島南部が米軍占領の経験を共有していた1945年からの3年間に絞って検討したい。ここでは、朝鮮人による境界を越えた移動の痕迹をたどりながら、そのダイナミズムを描き出すことで、移動をかたちづくった力の諸元に光をあてようとする。

本報告では、朝鮮人の越境的な移動を归还、密航、送还の三局面から捉える。归还や送还とは、日本から南朝鮮への移動を意味する。前者は主体的に選び取られ、希望をもってなされた移動であったが、後者は、日本社会からの追放を狙いとする強制的な移動であった。また、密航は南朝鮮から日本への自発的な移動であったが、不法行為としてGHQ/SCAPや日本政府による取締対象とされたがゆえに、緊張関係を孕むものであった。

1) カミングス、ブルース『朝鮮戦争の起源－解放と南北分断体制の出 1945 194年』巻、鄭敬謨、林哲、シアレヒム社1989年9

以上を踏まえ、本報告は1945年からの数年間になされた朝鮮人の移動が、どのように形づくられたのかを解明する。そして、米軍が彼ら・彼女らの移動を監視していたこと指摘し、それが生活世界そのものの把握につながっていたことを浮き彫りにしようとする。

2. 故郷への帰還

(1) 帰還の開始

1945年夏、日本は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に敗北した。日本で暮らす朝鮮人は、いっくも早い故郷・朝鮮への帰還を目指し、仙崎や下関、博多などの港に杀到した。日本政府は、敗戦直後から「外地」からの日本人引揚げに奔走した一方、在日朝鮮人の帰還には具体的な対策をとらず、冷淡であった。彼ら・彼女らが朝鮮に帰還するには、自ら漁船を調達するしかなかった。それができない人びとは、帰還船を待つしかなかった。9月末には仙崎や下関で2万人、博多では1万人以上の朝鮮人が滞留しており、衛生状態はきわめて悪化していた*2)。

GHQ/SCAPも朝鮮人の帰還に非協力的であった。日本人炭坑労働者が確保できるまで、朝鮮人炭坑労働者に朝鮮への帰還を思いとどませようとさえした*3)。だが、朝鮮人から強い反発を受け、GHQ/SCAPは彼らを早期帰還させるべく方針を转换せざるえなかった*4)。9月3日、朝鮮から日本人引揚者を乗せて博多に帰港した徳寿丸が、翌4日に在日朝鮮人を乗せて朝鮮に向かった。日本政府による初の帰還支援であった*5)。

解放直後から林立した大小300以上の在日朝鮮人団体は、帰還希望者への支援を活動の中心に据えていた*6)。10月15日に統一的な組織として発足した在日本朝鮮人連盟(朝連)は、帰還支援を綱領に掲げた。11月以降、GHQ/SCAPによる帰還対策が本格化し、定期的に帰還船が運航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GHQ/SCAPは日本政府に対して、朝鮮人や中国人のうち、復員軍人や強制連行者を優先し、遅くとも11月14日から一日1000人の割合で帰還させるよう命じた*7)。8月半ばから11月末までに、約55万人の在日朝鮮人が漁船などの手段で帰還し、約27万5千人がGHQ/SCAPの輸送支援を受け帰還した*8)。

(2) 南朝鮮における帰還対策

1945年9月7日、米陸軍第24軍団が仁川に上陸し、米軍政庁が設置された。同庁企画部は、ただちに朝鮮人の帰還と日本人の引揚げに関する計画立案に着手した。釜山港に朝鮮人帰還者に住居や食糧、移動手段を提供する企画部の出張所が開設された。だが指揮権や組織間の調整で混乱したため、帰還支援は十分に実施できなかった。9月23日、帰還支援業務が、企画部から外務部難

2) 『在日朝鮮人処遇の推移と現状』法務研修所編197年5

3) 朴庆植『解放後在日朝鮮人運動史』三一書房198年4

4) ワグナー、エドワード・W『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少数民族 190195年』湖北社197年66 6

5) 金太基『戦後日本政治と在日朝鮮人問題SCAの対在日朝鮮人政 194195』勁草書房199年10

6) 『総務部経過告』在日本朝鮮人聯

7) 「非日本人の日本よりの帰還に関する件SCAPIN 221941

8) ワグナー、前掲書13頁

民課に移管された。外務部は、南朝鮮の民間救護団体を活用した归还者支援を決定した。だが救護団体間での対立が絶えず、支援に支障がでていた。30日、エンダース外務部長は、朝鮮人归还者の救護にあたっていた諸団体を結集させ、援護団体中央委員会を発足させた*9)。南朝鮮での归还者対策は、外務部が主導し、民間救護団体や米軍政庁の各部門と連携するかたちで実施された*10)。

(3) 悪化する南朝鮮経済と帰還後の困難な生活

敗戦時、朝鮮駐留の日本軍や朝鮮总督府などの公的機関は、貯蔵していた膨大な統制物資を南朝鮮内の市場に放出・転売した。さらに莫大な政府精算資金が無制限に支出された。それにより、極度のインフレが発生するなど南朝鮮経済は大混乱に陥った*11)。

1945年8月半ばからの半月間で約130万人の朝鮮人が日本から朝鮮に归还したが、その大半が失業状態にあった。归还者への住居や食糧、就職の斡旋などが行われたが、南朝鮮の厳しい状況のなかで归还者が安定的な生活を築く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った。

12月、モスクワ三相会談が開催され、朝鮮の信託統治案が決定された。だが、それをめぐって賛成派と反対派の対立が激化した。政治経済的に混乱する南朝鮮社会の様子が、クチコミやメディア*12)を通じて在日朝鮮人社会にも伝えられた。彼ら・彼女らは今すぐの归还ではなく、日本への残留を選択し始めた。归还者数は大幅に減少した。

3. 日常的実践としての密航

(1) 生活への不安

米軍は、朝鮮から引き揚げる日本人と日本から归还する朝鮮人に対して、持出財産に制限を課した。携行できる範囲の荷物と1000圓以内の現金が持出可能とされた。日本からの資産流出と南朝鮮への圓貨の流入によるインフレへの防止が、理由であった。朝鮮人归还者は、これら僅かな財産をもとに、新生活を立ち上げることに大きな不安を感じおり、事実、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かった。彼ら・彼女らは、生き抜くために新たな手段を模索し始めた。それは、しばしば「密航」とよばれる日本への越境的な移動であった。

9) Repatriation from 25 Sept. 1945 to 31 Dec. 1945, USAFIK, XXIV Corps, G-2, Historical Section, Box34, RG554, NARA

10)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Reatriation through Port of Pusan, 30 Aug. 1946, American Red Cross, RG200, NARA

11) 『朝鮮経済年報』朝鮮銀行調査部194年II-3

12) 19411日、解放後初の在日朝鮮人による新聞として『朝鮮民衆新聞』が送還された。以後194年までの間12タイトル以上の新聞2タイトル以上の雑誌が創刊された。在日朝鮮人による新聞のなかに1万部以上を発行していたものもあった。在日朝鮮人によるメディアは、米軍占領下の日本において一定の存在感を示していた。(小林聡明『在日朝鮮人のメディア空間GH占領期における新聞の発行とそのダイナミズム』風響社200年

(2) 日本入国の制限

密航とは、ある種の障害や制限によって移動が妨げられている者が、通常的手段以外の方法でそれ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ある*13)。朝鮮人にとって、帝国日本における「国内」移動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占領期でも日本への渡航は困難であった。「障害」や「制限」は、南朝鮮と日本の両側で生じていた。

1946年2月19日、米軍政庁は事実上の出国制限措置である「朝鮮に入国または出国者移動の管理および記録に関する件」(法令第49号)を公布した。出国者に旅行証明書の取得を義務づけるものであったが、実際にはほぼ不可能であった。3月16日、GHQ/SCAPは本国に引揚げた非日本人(Non-Japanese)が、商業交通が利用可能になるまで許可無く、日本に戻ることを禁じた。日本への入国制限が実施された。正規の手続きを経ない日本入国は不法であり、それを試みる者は不法入国者、すなわち密航者と呼びならわされた。

1946年春から夏にかけて、朝鮮人密航者が急増した。この頃、南朝鮮で発生したコレラや自然災害が、政治経済的な混乱に拍車をかけていた。GHQ/SCAPは、朝鮮人密航者が日本にコレラをもたらす危険性があるとして、彼ら・彼女らの取締りを嚴格化した。6月12日、GHQ/SCAPは、不法入国した船舶や人を逮捕し、米軍官憲に引き渡すことを日本政府に命令した。7月15日には、日本政府は各省が連携して、密貿易や不法入国者の取締りにあたることを決定した。さらに英連邦占領軍(BCOF)は日本人通譯や協力者、地元警察などから情報を得ながら、朝鮮人密航者の取締りを積極的に実施した*14)。だが、コレラの発生が沈静化した後も、日本入国の制限は解除されなかった。敕令311号(1946年6月公布・7月施行)により、不法入国が「占領目的への有害な行為」として取締対象となり続けた。密航はもはや公衆衛生上の問題ではなく、占領体制を揺るがしかねない重大な犯罪とみなされ。

(3) 密航の動機

1946年7月、仙崎の引揚者收容所には毎日約150人の朝鮮人不法入国者が送られていた。すでに2000人が收容されていたが、500人が正規の手続きを経た归还希望者であり、1500人は密航者となっていた*15)。ある米軍報告書は、すべての密航者がもともと日本で暮らしていた朝鮮人であるとしたうえで、密航の動機に基づき、次のように説明した*16)。

第一に生活の困窮を動機に密航する人びとであり、密航者全体の80%を占めている。大部分が、日本に不動産や貯金を残したまま、南朝鮮に归还した人びとであった。彼ら・彼女らは、財産を現金化し、生活の糧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に日本への密航を試みた。第二に、日本に残した家族を連れに密航する人びとであり、約10%を占めている。日本敗戦時、南朝鮮状況を探るために、

13) 外村大「日本帝国の渡航管理と朝鮮人の密航」『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三編、不二出版200年3

14) モーリスズギ、テッサ「占領軍への有害な行動—敗戦後日本における移民管理と在日朝鮮人」『継続する植民地主義—ジェンダー・民族・人種・階級』岩崎稔他編68 7

15) Incoming Message from CG T Army to SCAP, July 23, 1946, Illegal Entry of Koreans into Japan, GHQ/SCAP Records, Box382, RG331, NARA

16) A Report on Stowaways”, August 19, 1946, Illegal Entry of Koreans into Japan, GHQ/SCAP Records, Box382, RG331, NARA

夫や親、息子が家族を残して先に归还するケースが頻繁に見られた。彼らは、家族全員を南朝鮮に归还させることを目的に再度日本に渡ろうとした。第三に、残りの10%を占める密輸を目的とした密航者である。報告書の説明以外にも日本にいた頃の生活のよさへの回想や日本の学校への入学希望が密航の動機となっていた*17)。

日本と南朝鮮の間には人とモノの不法な移動がみられ、GHQ/SCAPにとって重大な关心対象であった。後述する通り、朝鮮人だけでなく日本人も不法行為に参与していた。朝鮮人であれ、日本人であれ、密航や密輸は困難な状況で生きる人びとにとって、生き抜くための術であり、日常的実践となっていた。だが、占領下の日本社会では、朝鮮人の不法行為だけを強調する言説が立ち上がっていた。

4. 日本社会からの追放としての送還

(1) 圧力と喧伝による帰還促進

GHQ/SCAPや日本政府の基本方針は、在日朝鮮人を归还させることで、日本社会から彼ら・彼女らを一扫することにあった。GHQ/SCAPは、日本政府に命じて在日朝鮮人に归还希望の有無を登録させ、归还を希望しない者は归还の特権を喪失すると言明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残留を選択する者が大幅に増加し、さらに密航者も急増していた。方針とは逆の事態が進行するなか、朝鮮人の归还を促進する方法が編み出された。

① 朝鮮人への圧力

当初、日本政府は在日朝鮮人の归还に朝連の協力が効果的と見ていた。1946年5月20日、GHQ/SCAPは在日朝鮮人の归还は日本政府の責任であり、朝鮮人団体への責任の委任を禁じた*18)。以後、日本政府やGHQ/SCAPは、各都道府県の警察や現地の軍政部と連携し、在日朝鮮人にあからさまに圧力をか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ある県の主催で「朝鮮人归还促進に関する協議会」が開催された。席上、在日朝鮮人が日本社会で跳梁跋扈しており、日本当局が「舐められている感が多分にある」。舐められないよう断固たる処置をとれば、彼ら・彼女らは归还するだろうとの意見が出された。また、ある県が各市町村長宛に出した通达では、「終戦直後から一部朝鮮人等が跳梁跋扈し暗商人悪質ブローカーとなり或は幽霊人口等不正申告による重々配給等々社会の公安秩序を紊り敗戦日本の再建途上少なくない暗影を投じつつあることは周知の事実」とし、「彼等が敗戦と云ふ弱味につけこんで不正極まる生活手段」をとっている。それは、在日朝鮮人に「日本の方が住みよい」との判断を導いており、こうした「不健全なる思想行動」は、一扫すべきであると記されていた。在日朝鮮人に圧力をかければ、归还促進に係がるという発想は、政府から市町村レベルいたるまで貫かれていた*19)。

17) 法務研修所編、前掲書8

18) ワグナー、前掲書7

19) 朝鮮からの密航者への官憲による虐待、虐殺、大阪での居住証明問題、在日朝鮮人に対する財産税課税、特殊預金の封鎖などの方法でも圧力がかけられていた（朴庆植、前掲書117 11頁）

② 不法行為の喧伝

在日朝鮮人の追放圧力は、彼ら・彼女らが日本社会にとっていかに有害な存在なのかを喧伝することで、さらに勢いづいていた。日本社会には朝鮮人を追放しようとする言説が溢れていた。ある警察官は、朝鮮人少年に「朝鮮人は皆残って悪いことばかりして困る。(中略)早く归れ、何をばやばやしているか」と暴言を吐いた*20)。『朝日新聞』は、在日朝鮮人が暗市に根をはり、物資の流通や物価を混乱させていることで、日本人の感情を不必要に刺激しており、彼ら・彼女らは社会秩序を乱していると批判する社説を掲載した*21)。なかでも日本人メディアは、こぞって在日朝鮮人の不法行為を強調し、取締強化を訴える記事を書き立てた。

不法行為の喧伝は、政治家の口からも発せられた。1946年8月17日、進歩党の椎熊三郎は、在日朝鮮人の傍若無人ぶりを強調し、彼らが日本の治安に絶大なる不安をもたらすと主張した*22)。9月2日には、大村清一内相が「多数の朝鮮人は解放民族としてのあやまつた优越感をもつてをり、また戦時中の日本の彼らに対する圧迫に対して仕返しをするというくらいな反抗的な心持のものもある」と発言した。在日朝鮮人の存在を歴史的な文脈からふり返ることなく、追放を叫ぶ暴力的な言説がまかり通っていた。

(2) 送還の実施

① デモ参加者の送還

朝鮮人の追放圧力が強まるなか、彼ら・彼女らは生活の権利獲得をかけた抵抗運動を開始した。1946年12月20日、在日本朝鮮人生活権擁護全国大会が開催され、朝鮮人4万人が参加した。大会後、参加者の一部が予定通り、首相官邸に向けてデモ行進を行っていたところ、警察官側と激しく衝突した。GHQ/SCAPは、朝鮮人10人を首相官邸への乱入と警官への襲撃などの容疑で起訴した。彼らは懲役5年、罰金75000圓に処された。それは在日朝鮮人の活動や日本警察への在日朝鮮人の反抗に対する米軍第8軍の警告であった。判決は、朝連のほか、米軍政庁や南朝鮮内の革新勢力から強く批判されたため、懲役は1年に減刑され、罰金刑は撤回された*23)。だが、そこには朝鮮への送還という新たな量刑が追加されていた。翌年3月、解放された朝鮮人は、家族とともに南朝鮮に送還された。

② 「日本国民」の追放

GHQ/SCAPは、この強制的な追放に障害はないと判断した。実際には法的な問題は曖昧なままであった。GHQ/SCAPの基本的な見解は、日本に残留する朝鮮人は、正当に設立される朝鮮政府が朝鮮国民として承認するまで日本国籍を有するが、日本人という用語には含ま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在日朝鮮人は、日本国民(Japanese Nationals)である非日本人(Non-Japanese)とみなされた。ゆえに日本国民の日本からの強制的な追放は、法手続き上、問題のある措置であった。さらに在日朝鮮人の归还は、自らの意思に基づいて実施されねばならないとされており、被告ではあったが、本人の希望を無視した強制退去は、米国政府の指示から逸脱していた*24)。法

20) 『世紀新聞福』1942日付

21) 『朝日新聞』1941日付

22) 朴庆植、前掲書117 11頁

23) 金太基、前掲書31 31頁

24) 金太基、前掲書317 31頁

的な問題を曖昧にしたままなされた在日朝鮮人の強制的な送還は、これが初めてのケースではなかった。1946年7月には、すでに法的な手続きを経ることなく、朝鮮人密航者が強制送還されていた*25)。日本内務省も1947年2月以前に朝鮮人や台湾人に強制退去処分を下していた*26)。

③ 外国人登録令の施行

在日朝鮮人の強制的な送還は、外国人登録令の施行によって「合法化」された。1947年5月2日、最後の敕令として、在日朝鮮人の取締りを主目的とする外国人登録令が施行された。同令は、「日本国民」であるはずの朝鮮人を当分の間、外国人とみなし、外国人登録を義務づけた。「みなし」規定は、日本国籍を有する在日朝鮮人の居住権を否定し、国外退去を可能にする法的根据となった。在日朝鮮人の追放は、外国人登録令の施行により、「合法化」された。だが、それは確立された国籍法規の遵守を規定する日本国憲法第98条に違反する疑いが極めて強いものであった*27)。

(3) 送還に抵抗する在日朝鮮人

在日朝鮮人のなかには、自らが発行するメディアを通じて、日本政府や日本社会を批判し、送還圧力に抗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も見られた。朝連系の『解放新聞』は、解放民族としての体面も考えず、不法行為に手を染めている在日朝鮮人もいるが、十分な生活の糧を持っておらず、生活のためには致し方なかったと指摘したうえで、日本政府の対策が不十分であることを批判した*28)。『朝鮮人生活権擁護斗争委員会ニュース』は、こう主張した*29)。

われわれは密航者を擁護はしない。然し、数千或は2、3万にすぎない密航者を口実に、百万近い在留朝鮮人の、社会的活動を抑圧し基本的人権をジュウリンするとき居住証明を発行せんとして议会や新聞を動員しこれを世論化し、政治問題化せんとする所に、陰にかくれた、軍国主義者や、侵略者共の遠大にして巧妙なる陰謀や策略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在日朝鮮人は追放の社会的メカニズムを的確に把握していた。彼ら・彼女らは、日本政府や社会への批判だけでなく、在日朝鮮人自らに自制を呼びかけることで、追放圧力に対抗しようとした。民団系の『国際新聞』は、在日朝鮮人に強く自己反省を求め、日本人との友好の必要性を訴えた*30)。そこには在日朝鮮人の行動によって、日本人の感情が刺激され、追放圧力の高まりを抑止する狙いがあった。それは、在日朝鮮人が追放圧力をいなしながら、日本社会に居場所を確保しようとする政治的な実践であった。

25) モーリスズキ、前掲67-6頁

26) 194日「解放民族等の強制送還に関する内務省公安第一課庁通牒」

27) 大沼保昭『在日韓国・朝鮮人の国籍と人権』東信堂200年229-23頁

28) 『解放新聞』（東京1942日）

29) 『朝鮮人生活権擁護斗争委員会ニュース』（東京19412日付）

30) 『国際新聞』（東京1943日付）

5. 監視される移動*31)

(1) 米軍による通信検閲体制

戦前・戦後を問わず、朝鮮人の生活世界は日本列島と朝鮮半島を跨ぐ空間領域に成立していた。1945年からの数年間、この空間を支配していた米軍は、越境的な移動をする人びとを監視していた。それは、取締りや警備行動だけでなく、人びとが日常的に利用する手紙や電話などの通信物を検閲するという方法で行われた。こうした人の移動を監視する機能を組み込んだ米軍による通信検閲体制は、どのように構築されたのだろうか。

米軍政期南朝鮮で検閲作戦を展開したのは対朝鮮民間通信諜報隊（CCIG-K）であった。CCIG-Kは民間検閲支队（CCD）*32)の傘下部隊であり、第24軍団とともに9月8日に仁川に上陸した。南朝鮮での通信検閲は、1944年11月に統合参謀本部で策定された戦争終結後の占領地における作战計画（JCS873/3）に基づいていた。

CCIG-Kは、南朝鮮全域で電話、電報、郵便の検閲を開始した。だが、米国人検閲要員のなかで対日占領を想定して日本語の訓練を受けた者はいたが、朝鮮語を解す者は皆無であった。CCIG-Kは第24軍団参謀2部（G-2）や対敵諜報部隊（CIC）の協力を受け、朝鮮語の通信物を英译できる朝鮮人を採用しようとした。だが、望ましい人材が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ために、CCIG-Kは朝鮮人検閲要員に朝鮮語の通信物を日本語に翻译させた。さらにそれは、日系二世のCCIG-K要員によって英译され、検閲判断を仰ぐために上官に提出された。

検閲作業は、「監視対象者リスト」（Watch List）や「検閲要項」（Subject Matter Guide）などを用いて行われた。ここで報告すべき内容や問題のある通信内容が見つかり、送受信人の名前や問題箇所などを記したコメントシートを作成した。検閲対象は当初、在朝日本人の通信物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たが、引揚げの完了とともに、朝鮮人の通信物へと変化した。CCIG-Kが関心を拂ったのは、密輸や密航だけでなく、占領軍批判や共産主義などの政治活動に言及した通信物であった。通信検閲には、通信物の流通を制限するだけでなく、情報収集の目的も見られた。収集された情報はG-2やCICなどに伝達され、密輸や密航などの不法行為の取締りのほか、経済政策など占領政策の立案・策定にも活用された。

以下、検閲された手紙を見ていくことで、通信検閲体制が捉えた人やモノの越境的な移動について、その一端を浮き彫りにしてみたい。

(2) 検閲された手紙

① 在朝日本人の密航・密輸

在朝日本人のなかには、公式の引揚船を待ちきれず、暗船を利用して日本に引揚げようとする人びともいた。CCIG-Kが検閲した在朝日本人の私信には密航や密輸の企図が記されている。

1945年10月19日消印

A（日本在住）からB（釜山在住）への手紙

31) 報告者の博士論文『韓国通信検閲体制の形成』200年度一橋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に基づく。米国国立公文書館NAR)および韓国国家記録院で機密解除された資料を活用た。引用注は、拙論参照いただきたい

32) CC本隊は日本に上陸し、通信物とマスメディアの両方を検閲した

「密航船によって対馬に戻るときには、お金を隠して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が乗船する密航船は、千鳥丸、海王丸、キョシン丸（汉字不明）の何れかになります。（中略）日本にお戻りになるときは、船長に大豆や塩、米などを積むようにお伝え下さい。」

1945年10月15日消印

C（釜山在住）からDへの手紙

「釜山には多くの密航船を運営している会社があります。料金は公示してあって、だいたい150圓ほどです。暗船で行けば、軍警察や朝鮮人女性によるの検査を逃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中略）密航船は今月の16, 17, 18日に出航いたします。

追伸 お知恵があれば、たくさんのお金を持っ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在朝日本人の間では、制限額以上の財産持出の方法が話し合われていた。それもまた密輸行為であったが、こうした不法行為の企ては検閲を通じて米軍に把握されていた。

1945年10月20日検閲

G（釜山在住）からH（ソウル在住）への手紙

「日本の婦人方は、日本への引揚げに際し行われる所持品検査において、軍警察（MP）にお金を没収されないよう、下着や水筒のなかに隠しております。」

1946年1月29日検閲

I（日本在住）からJ（ソウル在住）への手紙

「米軍兵士は、釜山から日本に归还する日本女性や少女の検査を行いません。Kさん（日本人）がお金を隠し持てば、見つかる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

② 朝鮮人の密航・密輸

CCIG-Kが検閲した手紙は、密輸の実態を示していた。

A（庆尚南道在住）からB（日本在住、国籍不明）への手紙

「南朝鮮に来るときには、量の制限がないので、医薬品をたくさんも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それらは3500圓で売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C（莞島在住）からDへ（東京在住、国籍不明）への手紙

「対馬で日本圓による材木の購入を計画しております。対馬では1尺あたり20圓ですが、朝鮮では400圓もします。対馬で購入した材木を朝鮮にもって行って高値で売るつもりでおります。」

政治経済的な混乱状況で暮らす人びとのなかには、南朝鮮に見切りをつけ、日本に渡ろうとする者もいた。

E（南朝鮮昌善在住）の手紙

「朝鮮は解放さ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政府もなく、物価の高騰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ます。できる

なら、日本に行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釜山から日本に密航するFの手紙（1946年6月29日から7月27日の間に投函）

「最近日本から归还した同郷の1人が、もし日本から归还した朝鮮人の数が2000名ならば、日本に再び戻った朝鮮人は3000名にのぼるといいました。（中略）朝鮮に归还したときは嬉しかったですが、すべての金を失い、再び日本に戻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先述した米軍報告書は、密航者の大半が日本に残した財産の現金化を动机としていたと指摘した。だが、密航を試みたのは財産を日本に持つ者だけではなかった。CCIG-Kが検閲した手紙からは、財産もなく、絶望の淵に瀕した人びとが、生きるためのぎりぎりの選択として密航を試みる様子が浮き彫りになる。米軍の通信検閲体制は、越境的な人の移動を監視だけでなく、彼ら・彼女らの移動を形づくる生活世界を把握するシステム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た。

(3) 通信検閲体制の継承

1948年8月18日、CCIG-Kによる通信検閲は終了した。それとともに第24軍団司令部はCCIG-Kが検閲で使用した検閲台（Censorship Desk）や「監視対象者リスト」を韓国政府に譲渡した。まもなく逓信部によって始められるであろう通信検閲によって得られる共産主義者に関する情報の米軍への提供を期待してのことであった。

1948年12月1日、臨時郵便団束法が公布・施行され、それを法的根据とした郵便検閲が逓信部により開始された。臨時郵便団束法は、帝国日本の通信検閲体制を法的に支えた臨時郵便取締令を、そのまま復活させたものであった。臨時郵便団束法が制定された12月1日は、奇しくも治安維持法を敷き写した国家保安法が制定された日でもあった。

新たに開始された郵便検閲は、尹錫龟逓信部長官が言明したように、李承晩政权に敵対する「共産主義者」の摘発を目的としていた。郵便検閲は逓信部郵政局検閲課を中心に、全国各地の主要な郵便局で実施された。内容に問題があると判断された郵便物は、「事故郵便物」に分類され、「差押」あるいは「停止」の制限措置がとられた。「事故郵便物」は、1953年5月には311件であったが、朝鮮戦争休戦後の1954年1月には1316件、同年2月には4927年に急増していた。

李承晩政权期の郵便検閲も、情報の流通制限だけでなく、情報収集も目的としていた。収集された情報は、国务总理のほか、内務部や财务部、国防部など関連機関に伝達された。ここでは密航や密輸も重要な監視対象となっており、前者に関する情報は内務部に、後者は财务部や内務部、宪兵总司令部に伝えられた。韩国人の越境的な移動は、米军政期だけでなく、李承晩政权期でも検閲によって監視されていた。事実、1958年1月からの4ヶ月間で、「事故郵便物」（国内郵便）の9%が、同（国際郵便）の7%が密輸・密航に関するものであった。移動の監視機能を持ち、生活世界の把握を試みる通信検閲体制は、米军政期から李承晩政权期に継承された。このことの意味は、稿をあらためて論じたい。

6. おわりに

日本敗戦 / 朝鮮解放から数年間に見られた朝鮮人の移動は、归还と密航、送还与で表象される、重層的な力によってかたちづけられた。こうした力は、GHQ/SCAPや日本政府、地方自治体による行政的な権力だけでなく、政治家やメディアが立ち上げた在日朝鮮人に対する暴力的な言説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た。また、近代以降、日本人が持ち続けていた植民地主義的な意識も、朝鮮人に移動を強いる力を生み出していた。さらに南朝鮮社会の政治経済的な混乱が、人びとに移動を迫る要因となっていたことも忘れてはならない。こうした力が複雑に作用するなかで形成された朝鮮人の移動は、彼ら・彼女らの生活空間を一国家の枠組みに収まりきらない越境的な領域へと拡張させた。

1945年秋に日本と南朝鮮に進駐した米軍は、朝鮮人の移動を監視する機能をもった通信検閲体制を構築した。それは、人びとの越境的な移動を監視し、取り締まるだけでなく、移動を一つの構成要素とする彼ら・彼女らの生活世界を把握する狙いをたたみ込むものであった。本報告は、複雑な力によってかたちづけられた朝鮮人の移動が、米軍によって監視されており、それが李承晩政权期にも引き継がれ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た。

それでは、こうした権力による監視が、人びとの越境的な移動に、いかなる影響を与えたのだろうか。それは彼ら・彼女らの生活世界が編成される過程に、どのような意味をもたらしたのだろうか。こうした問いを持ちながら、朝鮮半島に系がりを持つ人びとの移動経験を叙述していくことが、今後の課題となる。それは移動といった人びとの日常的な営みを必須の構成要素とする東アジア世界の構造を歴史的な観点から解明していくうえで、大きな手がかりになる。

1940년대 후반 한일 간의 인적 이동과 미군에 의한 감시

고바야시 소메이 (大阪市立大)

〈目 次〉

1. 시작하며
2. 고향으로의 귀환
 - (1) 귀환의 시작
 - (2) 남한의 귀환 대책
 - (3) 악화되는 남한 경제와 귀환 후의 어려운 생활
3. 일상적 실천으로서의 밀항
 - (1) 생활에 대한 불안
 - (2) 일본 입국 제한
 - (3) 밀항의 동기
4. 송환 - 일본 사회로부터의 추방
 - (1) 압력과 선전에 의한 귀환 촉진
 - ① 한국인에 대한 압력
 - ② 불법 행위 선전
 - (2) 송환 실시
 - ① 데모 참가자 송환
 - ② 「일본 국민」의 추방
 - ③ 외국인 등록령 시행
5. 감시받는 이동*
 - (1) 미군의 통신 검열 체제
 - (2) 검열된 편지
 - ① 재한국 일본인의 밀항·밀수
 - ② 한국인의 밀항·밀수
 - (3) 통신 검열 체제의 계승
6. 마치며

1. 시작하며

20세기 초에 출현한 제국 일본은 청일전쟁과 노일전쟁이라는 두 전쟁을 거치면서 그 범위를 더욱 확대시켜 갔다. 일본 국내에 거주하는 일본인은 생활의 터전을 찾아 「획득된 영토」인 타이완이나 한국, 만주로 이동해 갔다. 일본에 합병된 후 식민지가 된 타이완과 한국에서는 새로이 창출된 황국신민으로서의 「일본인」이 모습을 드러냈다. 아시아에서는 극심한 구조 변동이 제국 안팎에서 복잡한 인적 이동을 동반하며 발생하기 시작했다. 일본 내의 많은 국민이 외지로 이주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식민지의 주민 또한 일본 당국에 의해 강제적으로, 그리고 「주체적」으로 일본 영토로 이동했다. 1944년 시점에서 11.6퍼센트의 한

국민이 한반도를 떠나 이산의 국민 (디아스포라) 가 되어갔다*1).

1945년 여름, 제2차 세계대전이 종결되었다. 일본은 패전했고 한국은 36년에 걸친 일본의 식민지 지배로부터 해방되었다. 8월말, D.맥아더 사령관이 아쓰기(厚木)비행장에 발을 디뎠다. 일본은 곧 미군을 중심으로 하는 연합군최고사령부 (GHQ/SCAP) 에 의해 점령 당했고 1945년9월부터 1952년4월까지 약 6년 반에 걸쳐 이런 상황은 계속되었다. 한편, 한반도는 일본으로부터 해방됐음에도 불구하고 소련과 미국이라는 두 개의 강대국에 의해 다시 점령당했다.

전쟁 종반부에는 전세계적으로 대규모적인 인구 이동을 일으켰는데 그 중에서도 이산의 국민이 되었던 한국인의 이동은 그 규모가 대단히 컸다. 본 보고에서는 패전 당시 일본에 살고 있던 약200만 명 이상의 한국인의 이동에 대해 일본과 한반도 남부가 미군 점령의 경험을 공유했던 1945년부터 3년 동안으로 기간을 좁혀 검토해 보고자 한다. 여기서는 한국인의 경계를 넘는 이동의 흔적을 좇으며 그 역동성을 그려냄으로써 이동의 형태를 만들어 낸 힘의 제원에 초점을 맞추고자 한다.

본 보고에서는 한국인의 국경을 넘는 이동을 귀환, 밀항, 송환의 세가지 측면에서 다룰 것이다. 귀환이나 송환이란, 일본으로부터 남한으로의 이동을 의미한다. 전자는 주체적으로 선택되어 희망을 가지고 이루어진 이동이었으나 후자는 일본사회로부터의 추방을 목적으로 하는 강제적인 이동이었다. 또한, 밀항은 남한으로부터 일본으로의 자발적인 이동이기는 하나 불법행위로서 GHQ/SCAP나 일본정부의 단속 대상이었으니 긴장 관계를 내포한 성격의 것이었다.

이상을 바탕으로 본보고는 1945년부터 수년간에 걸쳐 이루어진 한국인의 이동이 어떤 형태를 취했는지를 밝히고 있다. 그리고 미군이 그들의 이동을 감시하고 있었음을 지적하고, 그것이 생활 세계를 파악하는 역할을 했음을 강조하고자 한다.

2. 고향으로의 귀환

(1) 귀환의 시작

1945년 여름, 일본은 아시아 태평양 전쟁에서 패했다. 일본에 거주하는 한국인들은 하루라도 빨리 고향·한국으로 귀환하고자 센자키나(仙崎(시모노세키(下関), 하카타(博多)등의 항만으로 몰려들었다. 일본정부는 패전 직후부터 「외지(外地)」에서 일본인을 철수시키기 위해 분주했던 한편, 재일한국인의 귀환을 위해서는 구체적인 대책을 마련하지 않고 냉담한 반응을 보였다. 한국인들이 한국으로 귀환하기 위해서는 스스로 어선을 조달할 수밖에 없었으며 그럴만한 수단이 없는 사람들은 귀환선을 기다리는 수밖에 없었다. 9월말 현재, 센자키와 시모노세키에는 2만 명, 하카타에는 1만명 이상의 한국인이 체류하고 있었고 위

1) rucCuming조전쟁의 기해방과 남북분단체제의 출 1945 -194(The Origin of Korean War정경(鄭敬謨) 임철林 씨알의 19899

생 상태는 극히 악화되어 있었다*2).

GHQ/SCAP도 역시 한국인의 귀환에 비협조적이었다. 일본인 탄광노동자가 확보될 때까지 한국인 탄광노동자들에게 한국으로의 귀환을 미루게 하려고까지 했다*3). 하지만 한국인들의 강한 반발에 부딪혀 GHQ/SCAP는 그들을 조기에 귀환시키기 위해 방침을 바꿀 수밖에 없었다*4). 9월 3일, 한국으로부터 철수하는 일본인을 태우고 하카타로 귀향한 도쿠주마루(徳寿丸)가 이튿날인 4일에 재일한국인을 태우고 다시 한국으로 향했다. 일본정부의 첫 귀환 지원이었다*5).

해방 직후부터 우후죽순 생겨나기 시작한 크고 작은 300개 이상의 재일한국인 단체는 귀환 희망자에 대한 지원을 주요 활동 내용으로 삼았다*6). 10월5일에 통일적 조직으로 발족한 재일본조선인연맹(조련)은, 귀환지원을 강령으로 내걸었다. 11월 이후, GHQ/SCAP에 의한 귀환대책이 본격화되면서 정기적으로 귀환선이 운행되기 시작했는데 GHQ/SCAP는 일본정부에 대해 한국인이나 중국인 가운데 복원(復員)군인이나 강제 연행자를 우선시하여 늦어도 11월14일부터 하루 1000명의 비율로 귀환시키도록 명했다*7). 8월 중순부터 11월말까지 약55만 명의 재일한국인이 어선 등의 수단을 이용해 귀환했고, 약27만5천 명이 GHQ/SCAP의 수송지원을 받아 귀환했다*8).

(2) 남한의 귀환 대책

1945년9월7일, 미육군 제24군단이 인천에 상륙했고 미군정청이 세워졌다. 미군정청 기획부는 즉각 한국인의 귀환과 일본인의 철수에 관한 계획입안에 착수했다. 한국인 귀환자에게 주거지와 식량, 이동수단을 제공하기 위한 기획부 출장소가 부산항에 설치되었으나 지휘권이나 조직 간의 조정을 둘러싸고 혼란스러운 상태였기 때문에 귀환 지원은 충분히 이루어지지 못했다. 9월23일, 귀환 지원 업무가 기획부에서 외무부 난민과로 이관되었다. 외무부는 남한의 민간구호단체를 활용한 귀환자 지원을 결정했다. 하지만 구호단체 간의 대립이 끊이지 않아 지원에 지장을 주었다. 30일, 앤더스 외무부장은 한국인 귀환자 구호를 담당하던 각 단체를 결집시켜 구호단체중앙위원회를 발족시켰다*9). 남한에서의 귀환자 대책은 외무부가 주도하고 민간구호단체나 미군정청의 각부문과 연계하는 형태로 실시되었다*10).

2) 재일한국인 처우의 추이와 현범무연수소1975

3) 박경(朴慶植)해방후 재조인 운동산이치쇼보三一書1984

4) 에드워드 와그일본에서의 한국소수민 190195고호쿠샤湖北19766-6

5) 김태(金太基)전후 일본 정치와 재조인 문SCA의 대재조인정 194195게이소쇼보勁草書19910

6) 총무부경과보재일본조선인연

7) 비일본인의 일본발 귀환에 관한 SCAPIN-221941

8) 와그 앞의 책,13

9) "Repatriation-from 25 Sept. 1945 to 31 Dec. 1945, USAFIK, XXIV Corps, G-2, Historical Section, Box34, RG554, NARA

10)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Repatriation through Port of Pusan, 30 Aug. 1946, American Red Cross, RG200, NARA

(3) 악화되는 남한 경제와 귀환 후의 어려운 생활

패전 당시, 한국에 주둔하고 있던 일본군이나 한국총독부 등의 공적 기관은 저장해 두었던 막대한 통제 물자를 남한 내 시장에 방출·전매했다. 또한 막대한 정부 정산 자금이 무제한으로 지출되었다. 이에 따라 극도의 인플레이션이 발생하는 등, 남한의 경제는 커다란 혼란에 빠지고 말았다*11).

1945년 8월 중반부터 보름 만에 약130만 명의 한국인이 일본으로부터 한국으로 귀환했으나 대부분이 실업 상태였다. 귀환자를 위해 주거지나 식량, 직장 등을 알선해 주었지만 남한의 극심한 상태 속에서 귀환자가 안정적인 생활을 꾸려나가기란 불가능한 일이었다.

12월, 모스크바3상회의가 개최되었고 한국에 대한 신탁통치가 결정되었다. 하지만 이를 둘러싸고 찬탁파와 반탁파의 격렬한 대립이 일어났다. 정치경제적으로 혼란스러운 남한사회의 모습이 입에서 입으로 혹은 매스 미디어*12)를 통해 재일한국인사회에도 전해지게 되었다. 일본에 살고 있던 그들은 당장의 귀환이 아니라 일본 잔류를 선택하기 시작했으며 그 후 귀환자의 수는 급속히 줄어들기 시작했다.

3. 일상적 실천으로서의 밀항

(1) 생활에 대한 불안

미군은 한국에서 철수하는 일본인과 일본으로부터 귀환하는 한국인에 대해 반출재산에 제한을 두었다. 소지할 수 있는 범위의 짐과 1000엔 이내의 현금만이 반출 가능했다. 일본으로부터의 자산 유출과 남한으로 엔화가 유입되는 데 따른 인플레이션을 방지하겠다는 것이 그 이유였다. 한국인 귀환자들은 이 적은 재산을 가지고 새로운 생활을 시작하는데 불안을 느꼈고 사실, 그러기가 쉬운 일도 아니었다. 그들은 살아남기 위해 새로운 수단을 모색하기 시작했다. 그것은 종종 「밀항」이라 불리는, 일본의 국경을 넘는 이동이었다.

(2) 일본 입국 제한

밀항이란 일종의 장해나 제한에 의해 이동에 제한을 받는 자가 통상적인 수단 이외의 방법으로 이를 실현하는 것을 말한다*13). 한국인에게 있어 일본에서의 「국내」 이동이 그랬

11) 조경제연조은행조사194II-3

12) 19411해방 후 첫 재일한국인이 발행한 신문으로서조민중신이 창간되었다. 이후,194년까지12타이틀 이상의 신문,2타이틀 이상의 잡지가 창간되었다. 재일한국인이 발간하는 신문 가운데는1만부 이상 발행되는 신문도 있었다. 재일한국인에 의한 매체는 미군 점령하의 일본에서 어떤 존재감을 보여주었다.고바야시 소小林聡)재조선의미디 공GH점령기의 신문 발행과 그다이나미후쿄샤風響200年

13) 도노무라 마사루外村일본제국의 도항 관리와조인의 밀」일본제국을 둘러싼 인구이동의 국제사회아라라기 신조蘭信) 후지不)출2003

던 것처럼 점령기에도 일본으로의 도항은 쉽지 않았다. 「장해」와 「제한」은 남한과 일본 양쪽에서 모두 발생하고 있었다.

1946년 2월 19일, 미군정청은 사실상의 출국제한 조치인 「한국에 입국 혹은 출국자의 이동 관리 및 기록에 관한 건」(법령 제 49호)을 공포했다. 출국자는 의무적으로 여행증명서를 발급받도록 했으나 실제로는 거의 불가능했다. 3월 16일, GHQ/SCAP는 본국으로 철수한 비일본인(Non-Japanese)이, 상업교통을 이용할 수 있게 되기까지 허가 없이는 일본으로 돌아갈 수 없도록 했는데 이로써 일본 입국이 제한을 받게 되었다. 정규 수속을 밟지 않은 일본 입국은 불법이며 이를 시도하는 자는 불법입국자, 즉 밀항자로 불리게 되었다.

1946년 봄부터 여름에 걸쳐, 한국인 밀항자가 급증했다. 이 무렵, 남한에서 발생한 콜레라와 자연재해가 정치경제적인 혼란에 더욱 부채질을 했다. GHQ/SCAP는 한국인 밀항자가 일본에 콜레라를 전염시킬 우려가 있다 하여, 한국인에 대해 더욱 엄격한 단속을 펼쳤다. 6월 12일, GHQ/SCAP는 불법 입국한 선박이나 사람을 체포하여 미군관현에 인도할 것을 일본 정부에 명령했다. 7월 15일, 일본정부는 각 성이 연계하여 밀무역이나 불법 입국자를 단속하기로 결정했다. 또한 영연방점령군(BCOF)은 일본인 통역과 협력자, 현지 경찰들로부터 정보를 입수하면서 한국인 밀항자를 적극적으로 단속했다*14). 하지만 콜레라가 잠잠해진 다음에도 일본 입국 제한은 해제되지 않았다. 칙령 311호(1946년 6월 공포·7월 시행)에 의거해 불법입국은 「점령 목적을 위한 유해한 행위」로서 계속 단속의 대상이 되었다. 밀항은 이제 공중위생상의 문제가 아니라 점령체제를 약화시킬 수 있는 중대한 범죄로 간주되기 시작한 것이다.

(3) 밀항의 동기

1946년 7월, 센자키의 귀환자 수용소로는 매일 약 150명의 한국인 불법입국자가 보내졌다. 이미 2000명이 수용되어 있었는데 이 가운데 500명이 정규 수속을 밟은 귀환희망자였고 1500명은 밀항자의 신분이었다*15). 어떤 미군 보고서는 모든 밀항자는 원래 일본에 살던 한국인이라고 전제한 후, 밀항의 동기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이 설명하고 있다*16).

첫째, 곤궁한 생활 때문에 밀항하는 사람들이며 밀항자 전체의 80퍼센트를 차지한다. 대부분이 일본에 부동산이나 저축을 남겨둔 상태이며 그들은 재산을 현금화해서 생활에 보탬을 목적으로 일본 밀항을 시도했다. 둘째, 일본에 남겨둔 가족을 데려가기 위해 밀항하는 사람들이며 전체의 약 10퍼센트를 차지한다. 일본 패전 당시, 남한의 상황을 살피기 위해 남편이나 부모, 자식이 가족을 남겨둔 채 먼저 귀환하는 경우가 빈번했는데 그들은 가족 전원을 남한으로 귀환시킬 목적으로 다시 일본으로 건너오려 했다. 셋째, 남은 10퍼센트를 차지하는 밀수 목적의 밀항자다. 보고서의 설명 외에도 일본에서의 좋았던 생활에 대한 회상

14) 테사-모리스 스즈키점령군에게 유해한 행패전 후 일본의 이민관리와 재조」 계속되는 식민지주권민 인계와사키 미노루岩崎稔)편 8-7

15) Incoming Message from CG T Army to SCAP, July 23, 1946, Illegal Entry of Koreans into Japan, GHQ/SCAP Records, Box382, RG331, NARA

16) "A Report on Stowaways, August 19, 1946, Illegal Entry of Koreans into Japan, GHQ/SCAP Records, Box382, RG331, NARA

이나 일본 학교 입학 희망이 밀항의 동기가 되었다*17).

일본과 남한 사이에는 인적, 물적으로 불법적인 이동이 있었으며 GHQ/SCAP로서는 중대한 관심의 대상이었다. 앞으로 서술하게 될 내용처럼, 한국인뿐만 아니라 일본인 역시 불법 행위에 관여하고 있었다. 한국인이든 일본인이든 밀항이나 밀수는 어려운 상황에서 살아가는 사람들에게 있어 생존을 위한 방법이었으며 일상적 실천이었다. 하지만 점령하의 일본 사회에서는 한국인의 불법행위만을 강조하는 경향이 짙었다.

4. 송환 - 일본 사회로부터의 추방

(1) 압력과 선전에 의한 귀환 촉진

GHQ/SCAP나 일본정부의 기본 방침은 재일한국인을 귀환시키는 것이었으며, 일본 사회로부터 그들을 일소하는 것이었다. GHQ/SCAP는 일본정부에 명해 재일한국인에게 귀환을 희망하는지의 여부를 등록하게 하였고 귀환을 희망하지 않는 자는 귀환의 특권이 상실된다고 말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일본에 잔류하기를 선택하는 사람이 크게 증가했고 게다가 밀항자까지 급증했다. 오히려 방침에 거스르는 사태가 진행되는 가운데 한국인의 귀환을 촉진하는 방법이 강구되었다.

① 한국인에 대한 압력

당초, 일본 정부는 재일한국인의 귀환을 위해서는 조선의 협력이 효과적이라고 판단하고 있었다. 1946년 5월20일, GHQ/SCAP는 재일한국인의 귀환은 일본 정부의 책임이며 한국인 단체에 대해 책임을 위임하지 못하도록 했다*18). 이후, 일본정부와 GHQ/SCAP는 각 도도부현의 경찰과 현지의 군정부와 연계하여 재일한국인에게 노골적으로 압력을 넣게 되었다. 어떤 현의 주최로 「조선인 귀환 촉진에 관한 협의회」가 개최되었는데 이 자리에서 재일한국인은 일본사회에서 마구잡이로 날뛰고 있으며 일본당국이 「우리를 얹잡아보는 것 같다」. 우리를 우습게 보지 못하도록 단호한 조치를 취하면 그들은 귀환할 것이라는 의견이 나왔다. 또한, 어떤 현이 각 시정촌장 앞으로 보낸 통달에서는 「종전 직후부터 일부 조선인 등이 마구잡이로 날뛰며 악질적인 암거래 상인이나 브로커로 일하거나 혹은 유령인구 등 부정 신고를 통해 이중삼중으로 배급을 받는 등 사회의 공안질서를 해치고 패전 일본의 재건에 적지 않은 어두운 그림자를 드리우고 있음은 주지의 사실」이라며, 「그들이 패전이라는 우리의 약점을 노리고 극히 부정적인 생활 수단」을 취하고 있다. 이는 재일한국인에게 「일본이 더 살기 편하다」는 판단을 하게 만들고 이러한 「불건전한 사상행동」은 일소해야 한다고 기록하고 있다. 정부에서부터 시정촌 단위까지 재일한국인에 압력을 가하면 귀환을 촉진시킬 수 있을 것이라는 발상은 공통적이었다*19).

17) 법무연수소 앞의 8

18) 와그 앞의 7

② 불법 행위 선전

재일한국인 추방 압력은 그들이 일본 사회에 있어 얼마나 유해한 존재인가를 선전하기 시작하면서 더욱 거세졌다. 일본 사회에서는 한국인을 추방하자는 분위기가 팽배했다. 어떤 경찰관은 한국인 소년에게 「조선인이 모두 남아서 나쁜 짓만 하고 있어 곤란하다. (중략) 빨리 돌아가라, 뭘 꾸물거리고 있느냐」 며 폭언을 퍼부었다*20). 『아사히 신문』은 재일한국인이 암시장에 뿌리를 내리고 물자 유통이나 물가에 혼란을 초래함으로써 일본인의 감정을 불필요하게 자극하고 있으며 그들이 사회의 질서를 어지럽히고 있다는 내용의 사설을 실었다*21). 특히 일본 매체는 하나같이 재일한국인의 불법행위를 강조하며 단속 강화를 호소하는 기사를 내보냈다.

불법행위 선전은 정치가의 입에서도 나왔다. 1946년 8월 17일, 진보당의 시이쿠마 사부로(椎熊三郎)는 재일한국인의 방약무인함을 강조하며 그들이 일본의 치안에 절대적인 불안을 초래한다고 주장했다*22). 9월 2일에는 오무라 세이이치(大村清一) 내무대신이 「다수의 조선인은 해방민족으로서의 잘못된 우월감을 가지고 있으며, 또한 전시 중에 일본이 그들을 압박한 것에 대한 복수라 할만한 반항적인 마음을 가진 자들도 있다」 는 발언을 했다. 재일한국인의 존재를 역사적인 문맥에서 돌아보는 게 아니라 추방을 부르짖는 폭력적인 언행이 횡행했던 것이다.

(2) 송환 실시

① 데모 참가자 송환

한국인 추방 압력이 거세지는 가운데 그들은 생활의 권리 획득을 건 저항 운동을 시작했다. 1946년 12월 20일, 재일본조선인생활권옹호전국대회가 개최되었는데 한국인 4만 명이 이 대회에 참가했다. 대회 후, 참가자 일부가 예정대로 수상관저를 향해 데모 행진을 시작했고 경찰관 측과 격렬한 충돌이 일었다. GHQ/SCAP는 한국인 10명을 수상관저 난입과 경찰 습격 등의 혐의로 기소했으며 그들은 징역 5년, 벌금 75000엔에 처해졌다. 이는 재일한국인의 활동이나 일본 경찰에 대한 재일한국인의 반항에 대한 미군 제8군의 경고였다. 판결은 조선 외, 미군정청과 남한 내의 혁신 세력의 강한 비판으로 인해 징역은 1년으로 감형되었고 벌금형은 철회되었다*23). 그러나 여기에는 남한으로의 송환이라는 새로운 형이 추가되어 있었다. 이듬해 3월 석방된 한국인들은 가족과 함께 남한으로 송환되었다.

② 「일본 국민」 의 추방

19) 한국발 밀항자에 대한 관헌의 학학 오사카에서의거주증명문 재한국인에 대한 재산세과특수예금 봉쇄 등의 방법으로도 압력이 가해졌박경 앞의 117-11

20) 세기신후쿠오)194년일

21) 아사히신194월일자

22) 박경 앞의 117-11

23) 김태 앞의 313-31

GHQ/SCAP는 이 강제 추방에 장애물은 없을 것이라 판단했다. 실제로 법적인 문제는 애매한 상태였다. GHQ/SCAP의 기본적인 견해는 일본에 잔류하는 한국인은 정당하게 설립된 한국정부가 한국 국민으로 승인할 때까지 일본 국적을 갖지만 일본인이라는 용어에는 포함되지 않는다는 것이었다. 재일한국인은 일본 국민 (Japanese Nationals) 인 비일본인 (Non-Japanese) 으로 간주되고 있었다. 따라서 일본 국민을 일본으로부터 강제 추방한다는 것은 법적 절차상 문제 있는 조치였다. 또한 한국인의 귀환은 본인의 의지에 따라 이루어져야 하는 것으로 되어 있으며 피고이기는 하지만 본인의 희망을 무시한 강제 추방은 미국 정부의 지시에 어긋나는 것이었다*24). 법적인 문제가 애매하게 남아있는 상태에서 이루어진 재일한국인 강제 송환은 이것이 처음은 아니었다. 1946년 7월에 이미 법적인 절차를 무시한 채 한국인 밀항자가 강제 송환된 적이 있다*25). 일본 내무성도 1947년 2월 이전에 한국인과 타이완인에게 강제 추방 처분을 내린 바 있다*26).

③ 외국인 등록령 시행

재일한국인 강제 송환은 외국인등록령의 시행으로 「합법화」 되었다. 1947년 5월 2일, 최후 칙령으로서 재일한국인 단속을 주목적으로 하는 외국인등록령이 시행되었다. 외국인등록령은 「일본 국민」 인 한국인을 일정 기간 외국인으로 간주하여 의무적으로 외국인등록을 하도록 했다. 「간주」 규정은 일본 국적을 갖는 재일한국인의 거주권을 부정하고 국외 추방을 가능하게 하는 법적인 근거가 되었다. 재일한국인 추방은 외국인등록령의 시행으로 「합법화」 가 된 것이다. 이는 확립된 국적법규 준수를 규정하는 일본 헌법 제 98조에 위배되는 성격이 극히 강한 것이었다*27).

(3) 송환에 저항하는 재일한국인

재일한국인 중에는 본인이 발행하는 매체를 통해 일본 정부나 일본 사회를 비판하고 송환 압력에 대항하려는 움직임도 있었다. 조련계인 『해방 신문』 은 해방 민족으로서의 체면도 고려하지 않고 불법행위에 가담하는 재일한국인도 있지만 기본적인 생활을 꾸려가기 위해 어쩔 수 없었다고 지적한 후, 일본 정부의 대책이 불충분하다고 비판했다 28). 『조선인생활권옹호투쟁위원회 뉴스』 는 이렇게 주장했다*29).

우리는 밀항자를 옹호하지는 않는다. 하지만 수천 혹은 2,3만에 불과한 밀항자를 구실로 백만에 가까운 재일조선인의 사회적 활동을 억압하고 기본적 인권을 유린하는 거주증명을 발행하고 의회나 신문을 동원해 이를 여론화하며 정치 문제화시키려는 것은, 음지에 숨어 있는 군국주의자나 침략자들의 원대하고도 교묘한 음모와 책략이 아닐까.

재일한국인은 추방의 사회적 메커니즘을 정확하게 파악하고 있었다. 그들은 일본정부나 사회에 대한 비판뿐만 아니라 재일한국인 스스로에게도 비판의 목소리를 냄으로써 추방 압

24) 김태앞의 317-31

25) 테사모리스 스즈 앞의 67-6

26) 194해방민 등의강제송환에 관한 내무성공안제일과청 통」

27) 오누마 야스아키大沼保재일한한국인의 국적과 인도신도東信200229-23

28) 해신』 도1942일

29) 조인 생활권옹호 투쟁위원회 뉴』 도19412일

력에 대항하도록 했다. 민단계인 『국제신문』은 재일한국인을 향해 강하게 자기 성찰을 요구하며 일본인과의 우호의 필요성을 강조했다*30). 이 신문은 재일한국인의 행동으로 인해 일본인의 감정이 자극을 받게 하여 추방 압력을 약화시키려는 목적이 있었다. 이는 재일한국인이 추방 압력을 피하면서 일본 사회에서 자리매김을 하기 위한 정치적 실천이었다.

5. 감시받는 이동*31)

(1) 미군의 통신 검열 체제

전전·전후를 불문하고 한국인의 생활 세계는 일본 열도와 한반도를 넘나드는 공간 영역 위에 성립되어 있었다. 1945년부터 수년간, 이 공간을 지배했던 미군은 국경을 넘는 자들을 감시해 왔다. 이는 단속이나 경비 행동뿐만 아니라 사람들이 일상적으로 이용하는 편지나 전화 등, 통신물을 검열하는 방법으로 이루어졌다. 이러한 인적 이동을 감시하는 기능을 갖춘 미군에 의한 통신검열체제는 어떻게 구축되었을까.

미군정 시기에 남한에서 검열 작전을 전개한 것은 대조선민간통신첩보대(CCIG-K)였다. CCIG-K는 민간검열지대(支隊)(CCD)*32) 산하 부대이며 제24군단과 함께 9월8일에 인천에 상륙했다. 남한에서의 통신검열은 1944년 11월에 통합참모본부(JCS)에서 책정된 전쟁 종결 후의 점령지에서의 작전계획(JCS873/3)에 근거를 두고 있었다.

CCIG-K는 남한전역에서 전화, 전보, 우편을 검열하기 시작했다. 하지만 미국인 검열 요원 가운데 대일본 점령을 상정하고 일본어 훈련을 받은 자는 있어도 한국어를 해석할 수 있는 자는 한 명도 없었다. CCIG-K는 제24군단참모2부(G-2) 혹은 대적첩보부대(CIC)의 협력을 얻어 한국어로 된 통신물을 영역할 수 있는 한국인을 채용하려 했다. 하지만 원하는 인재를 발견하지 못했기 때문에 CCIG-K는 한국인 검열요원에게 한국어 통신물을 일본어로 번역하도록 했다. 그리고 이는 일본계2세인 CCIG-K요원에 의해 영어로 번역된 후, 검열판단을 위해 상관에게 제출되었다.

검열작업은 「감시 대상자 리스트」(Watch List)나 「검열 요항」(Subject Matter Guide) 등을 활용하여 이루어졌다. 여기서 보고해야 할 내용이나 문제가 있는 통신내용이 발견되면 송수신인의 이름이나 문제가 있는 부분 등을 기록한 서류를 작성했다. 검열 대상은 당초에는 주로 재한국 일본인의 통신물이었으나 철수 완료와 함께 한국인의 통신물로 바뀌어갔다. CCIG-K가 관심을 가진 것은 밀수나 밀항뿐만 아니라 점령군 비판이나 공산주의 등, 정치 활동을 언급한 통신물이었다. 그리고 통신검열에는 통신물 유통 제한뿐만 아니라, 정보 수집의 목적도 있었다. 수집된 정보는 G-2나 CIC등으로 전달되어 밀수나 밀항과 같은 불법

30) 『국제신문』 도1943일자

31) 보고자의 박사논문『한국통신검열체제의 형200년히토쓰바시대대학사회학연구』에 기초한다. 미국립문서보관NAR 한국국가기록원에서기밀 해제된 자료를 활용했다. 인용한 주출론을 참고해 주기 바란다

32) CC본대는 일본에 상륙해 통신물과 대중 매체 양쪽을 검열했다.

행위 단속 외에 경제 정책 등 점령 정책의 입안·책정에도 활용되었다.

이하, 검열된 편지를 통해 통신검열체제가 포착한 국경을 초월한 인적, 물적 이동에 대해 그 일면을 살펴보도록 하자.

(2) 검열된 편지

① 재한국 일본인의 밀항·밀수

재한국 일본인 가운데는 공식적인 철수를 기다리지 못하고 밀항선을 이용하여 일본으로 돌아가려는 사람들도 있었고 CCIG-K가 검열한 재한국 일본인의 편지에는 밀항이나 밀수를 기도하는 글이 있었다.

1945년 10월19일 소인

A (일본 거주) 가 B (부산 거주) 에게 보내는 편지

「밀항선을 타고 쓰시마로 돌아갈 때는 돈을 숨겨가지고 오십시오. 당신이 승선할 밀항선은 치도리마루(千鳥丸), 가이오마루(海王丸), 경신마루(한자 불명) 가운데 하나입니다. (중략) 일본에 돌아오실 때는 선장에게 콩이나 소금, 쌀 등을 선적하라고 전해주십시오.

」

1945년 10월 15일 소인

C (부산 거주) 가 D에게 보내는 편지

「부산에는 밀항선을 운영하는 회사가 많이 있습니다. 요금은 공시되어 있는데 대개 150엔 정도입니다. 밀항선으로 가면 군경찰이나 한국인 여성에 의한 검사를 피할 수 있습니다. (중략) 밀항선은 이달 16, 17, 18일에 출항합니다.

추신 머리만 잘 쓰면 많은 돈을 가지고 올 수 있습니다.」

재한국 일본인 사이에서는 제한된 금액 이상의 재산을 반출할 수 있는 방법이 떠올랐다. 이 또한 밀수행위였으나 이러한 불법행위 기도는 검열을 통해 미군에 의해 파악되고 있었다.

1945년 10월 20일 검열

G (부산 거주) 가 H (서울 거주) 에게 보내는 편지

「일본 부인들은 일본으로 돌아갈 때 실시되는 소지품 검사에서 현변 (MP) 에게 돈을 몰수당하지 않도록 속옷이나 물통에 숨기고 있습니다.」

1946년 1월29일 검열

I (일본 거주) 가 J (서울 거주) 에게 보내는 편지

「미군 병사는 부산에서 일본으로 귀환하는 일본여성이나 소녀는 검사하지 않습니다. K씨 (일본인) 가 돈을 소지한다면 아마 발각되지 않을 겁니다.」

② 한국인의 밀항·밀수

CCIG-K가 검열한 편지는 밀수의 실태를 보여주고 있다.

A (경상남도 거주) 가 B (일본 거주, 국적 불명) 에게 보내는 편지

「남한에 올 때는 양적 제한이 있기 때문에 의약품을 많이 가져오십시오. 3500엔에 팔 수 있습니다」

C (완도 거주) 가 D (도쿄 거주, 국적 불명) 에게 보내는 편지

「쓰시마에서 일본엔으로 목재를 구입할 계획입니다. 쓰시마에서는 1척 당 20인데 한국에서는 400엔이나 됩니다. 쓰시마에서 구입한 목재를 한국으로 가져가 고가에 판매할 생각입니다.」

정치경제적인 혼란 상황에서 사는 사람들 중에는 남한 생활을 접고 일본으로 도항하려는 자도 있었다.

E (남한 창선 거주) 의 편지

「한국은 해방이 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정부도 없고 물가도 하늘 높은 줄 모르고 치솟고 있습니다. 가능하면 일본으로 가려고 합니다.」

부산에서 일본으로 밀항하는 F의 편지 (1946년 6월 29일부터 7월 27일 사이에 보낸 편지)

「최근 일본으로부터 귀환한 고향 사람 한 명이 만약 일본에서 귀환한 한국인의 수가 2000명이라면 다시 일본으로 돌아간 한국인은 3000명일 거라고 말했습니다. (중략) 한국으로 귀환했을 때는 기뻐지만 모든 돈을 잃고 다시 일본으로 돌아가기로 했습니다.」

앞서 기술한 미군보고서는 밀항자 대부분이 일본에 남겨둔 재산을 현금화 하려는 동기를 가지고 있다고 지적했다. 하지만 밀항을 기도한 것은 일본에 재산이 있는 자들만이 아니었다. CCIG-K가 검열한 편지를 통해 재산도 없고 절망의 구렁텅이에 빠진 사람들이 살기 위해 어쩔 수 없이 밀항을 선택했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미군의 통신검열체제는 국경을 넘는 인적 이동을 감시했을 뿐만 아니라 그들이 왜 이동을 해야만 하는지, 그들의 생활세계를 파악하는 시스템으로서 기능했다.

(3) 통신 검열 체제의 계승

1948년8월 18일, CCIG-K에 의한 통신검열은 종료되었다. 그와 더불어 제24군단 사령부는 CCIG-K가 검열에서 사용했던 검열대 (Censorship Desk) 나 「감시 대상자 리스트」 를 한국 정부에 양도했다. 곧, 체신부에 의해 시작될 통신검열을 통해 얻어질 공산주의자에 관한 정보를 미군에 제공하리라 기대했던 것이다.

1948년 12월1일, 임시우편단속법이 공포·시행되었고 체신부는 이를 법적 근거로 한 우편 검열을 시작했다. 임시우편단속법은 일본의 통신검열체제를 법적으로 가능하게 하는 임시우편단속령을 그대로 부활시킨 것이었다. 임시우편단속법이 제정된 12월 1일은 공교롭게도 치안유지법을 그대로 모방한 국가보안법이 제정된 날이기도 했다.

새로이 개시된 우편 검열은 윤석구(尹錫龜) 체신부장관이 밝힌 것처럼 이승만 정권에 대적하는 「공산주의자」 적발을 목적으로 하고 있었다. 우편검열은 체신부 우정국 검열과를 중심으로 전국 각지의 주요 우체국에서 실시되었다. 내용에 문제가 있다고 판단되는 우편물은 「사고 우편물」로 분류되어 「압수」 혹은 「정지」라는 제한 조치가 내려졌다. 「사고 우편물」은 1953년 5월에는 311건이었으나 한국전쟁 휴전 후인 1954년 1월에는 1316건, 같은 해 2월에는 4927건으로 급증했다. 이승만 정권기의 우편검열 역시 정보의 유통 제한뿐만 아니라 정보 수집이라는 목적을 갖고 있었다. 수집된 정보는 국무총리 외에 내무부나 재무부, 국방부 등 관련기관으로 전달되었다. 여기서는 밀항과 밀수도 중요 감시 대상으로 삼고 있어 전자에 관한 정보는 내무부로, 후자는 재무부나 내무부, 헌병총사령부로 전달되었다. 한국인의 국경을 넘는 이동은 미군정기뿐만 아니라 이승만 정권기에도 검열을 통해 감시를 받았다. 사실, 1958년 1월부터 4개월 동안 「사고 우편물」(국내우편)의 9퍼센트가, 「사고 우편물」(국제우편)의 7퍼센트가 밀수·밀항에 관한 것이었다. 이동을 감시하는 기능을 가지며 생활상을 파악하기 위한 통신검열체제는 미군정기에서 이승만 정권기로 계승된 것이다. 이에 관한 의미는 다른 기회를 통해 논하기로 하자.

6. 마치며

일본 패전 / 한국 해방으로부터 여러 해에 걸쳐 나타난 한국인의 이동은 귀환과 밀항, 송환으로 나타나는 중층적인 힘에 의해 이루어졌다. 이러한 힘은 GHQ/SCAP나 일본정부, 지자체에 의한 행정적인 권력뿐만 아니라, 정치가나 언론 매체가 내건 재일한국인에 대한 폭력적인 담론에 의해 구성되어 있었다. 또한 근대 이후, 일본인에게 존재하던 식민지주의적인 의식도 한국인이 이동을 강행할 수 있는 힘을 만들어냈다. 게다가 남한 사회의 정치경제적인 혼란이 사람들로 하여금 이동을 선택하게 하는 요인이 되었다는 것도 잊어서는 안 될 것이다. 이런 힘이 복잡하게 작용하는 가운데 형성된 한국인의 이동은 그들의 생활공간을 한 국가라는 틀 안에 가두지 않는 국경을 초월한 영역으로 확장시켰다.

1945년 가을에 일본과 남한에 주둔하기 시작한 미군은 한국인의 이동을 감시하는 기능을 갖는 통신검열체제를 구축했다. 이는 사람들의 국경을 넘는 이동을 감시하고 단속할 뿐만 아니라 이동을 하나의 구성요소로 하는 그들의 생활 세계를 파악하고자 하는 목적을 지닌 것이었다. 본보고는 복잡한 힘에 의해 만들어진 한국인의 이동이 미군에 의해 감시당했고, 그것이 이승만 정권기에도 계속되었음을 지적했다.

그렇다면 이런 권력에 의한 감시가 사람들의 국경을 넘는 이동에 어떤 영향을 주었을까? 그것은 그들의 생활 세계가 편성되는 과정에 어떤 의미를 주었을까? 이러한 의문을 가지고

한반도와 관련된 사람들의 이동 경험을 서술해 나가는 것이 앞으로의 과제라고 생각한다. 그것은 이동이라는 사람들의 일상적인 행위를 필수적 구성요소로 삼는 동아시아 세계의 구조를 역사적 관점에서 분석해 가는데 중요한 실마리가 될 것이다.

1940年代后半期日韩间人的移动与美军的监视

小林聪明 (大阪市立大)

〈目 次〉

- 一、前言
- 二、回归故乡
- 三、作为日常实践的偷渡
- 四、作为从日本社会被驱逐的遣返
- 五、被监视的移动
- 六、结语

一、前言

20世纪初出现的帝国日本经过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战争，进一步扩大其范围。在内地生活的日本人开始前往“获得的领土”台湾以及朝鲜、满洲寻求生活场所。在被日本吞并后成为殖民地的台湾和朝鲜，作为新被造出的皇国臣民之“日本人”也展现其姿态。在亚洲，激烈的结构性变动与帝国内外复杂的人的移动相伴而发生。不仅许多内地居民移居外地，而且殖民地居民也被日本当局强制地、然后“主动地”向日本内地移动。到1944年，11.6%的朝鲜人离开朝鲜半岛，成为离散之民(diaspora)。¹⁾

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朝鲜摆脱长达36年的日本殖民地统治，获得解放。8月底，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飞抵厚木机场。日本立即被以美军为中心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总(GHQ/SCAP, “盟总”)占领，从1945年9月到1952年持续约6年半时间。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尽管从日本获得解放，但是再次被苏联和美国两个不同的大国占领。

战争的结束在全世界引起大规模的人的移动，其中已成为离散之民的朝鲜人的移动也大规模地进行。本文拟以战败时在日本生活的约200万人以上的朝鲜人的移动为对象，探讨1945年以后3年时间里日本与朝鲜半岛南部所共有的美军占领经验。在此拟在探寻朝鲜人越境移动之痕迹的同时描述其动力，阐明促成移动之各种力的元素。

本文拟从归国、偷渡、遣返三个侧面掌握朝鲜人的越境移动。所谓归国和遣返，意味着从日本向南朝鲜的移动。前者是主动选择的、为了希望而进行的移动，后者则是以驱逐出日本社会为目标的强制性移动。再者，偷渡虽然是从南朝鲜向日本的自发性移动，但是作为非法行为，成为GHQ/SCAP和日本政府取缔的对象，因此包含着紧张关系。

总之，本文拟阐明从1945年开始数年时间朝鲜人的移动是如何形成的，并指出美军对他(她)们移动的监视情形，描绘其与生活世界本身之认识的联系。

1) 布鲁斯·卡明期：《朝鲜战争之起源：解放与南北分裂体制的出现，1945~1947年》，第一卷，郑敬谟、林哲译，Sialbim(出版社)，1989年，98页。

二、回归故乡

(一) 归国的开始

1945年夏, 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在日本生活的朝鲜人以迟早尽快返回故乡朝鲜为目标, 大量涌仙崎以及下关、博多等港口。日本政府在战败之初为了从“外地”撤回日本人而奔走, 但是对于在日朝鲜人之归国态度冷淡, 没有采取具体对策。他(她)们在返回朝鲜时只能自行寻找渔船, 没有办法的人只能等待归国船员。9月底, 在仙崎和下关滞留的朝鲜人达2万人以上, 在博多滞留的朝鲜人达1 万人以上, 卫生状况极端恶化。²⁾

GHQ/SCAP对于朝鲜人归国也持不合作的态度。在日本人煤炭工人能够保障之前, 甚至停止考虑将朝鲜人煤炭工人之返回朝鲜问题。³⁾然而, 由于受到朝鲜人的强烈反弹, GHQ/SCAP不得不转向使其尽早归国的方针。⁴⁾9月3日, 德寿丸搭载撤回的日本人从朝鲜回到博多港, 翌年搭载在日朝鲜人航向朝鲜。这是日本政府最早的援助朝鲜人归国的努力。⁵⁾

解放后初期林立的大小300个以上的在日朝鲜人团体, 在支援希望归国者的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⁶⁾。10月15日, 作为统一组织而成立的在日本朝鲜人联盟(朝联), 提出以支援归国为纲领。11月以降, GHQ/SCAP的归国对策确实付诸实施, 归国船员定期出航。GHQ/SCAP对日本政府下达命令, 要求在朝鲜人和中国人中以复员军人和强制捕虏者为优先, 至迟从11月14日开始每天必须送1000人归国。⁷⁾从8月后半期到11月底, 约55万在日朝鲜人通过渔船等手段归国, 约27万5千人受到GHQ/SCAP的运输支援, 返回朝鲜半岛。⁸⁾

(二) 南朝鲜的归国对策

1945年9月7日, 美国陆军第24军在仁川登陆, 接着设置美军政厅。美军政厅企划部立即着手研究朝鲜人归国与日本人遣返计划。企划部在釜山港开设办事处, 向朝鲜人归国者提供住处、粮食和交通工具。但是由于指挥权和部门间协调混乱, 对归国的支援难以全面付诸实施。9月23日, 归还支援业务从企划部移交外务部难民课。外务部决定利用南朝鲜的民间救难团体支援归国者。然而, 救难团体之间的对立不断, 成为支援活动的障碍。30日, 恩达斯外务部长召集承担朝鲜人归国者救护工作的各团体, 成立援护团体中央委员会。⁹⁾南朝鲜的归国者对策, 以外务部为主导, 采用以民间救护团体与美军政厅各部门合作的方式加以实施¹⁰⁾。

(三) 恶化的南朝鲜经济与归国后的困难生活

战败后驻留朝鲜的日军和朝鲜总督府等公权力机关, 不仅将所囤积的庞大的统制物资向南朝鲜内

2) 法务研修所编: 《在日朝鲜人待遇之推移与现状》, 1975年, 55页。

3) 朴庆植: 《解放后在日朝鲜人运动史》, 三一书房, 1989年, 46页。

4) 埃德华·W·瓦格纳: 《日本的朝鲜人少数民族, 1940~1950年》, 湖北社, 1975年, 66~67页。

5) 金太基: 《战后日本政治与在日朝鲜人问题——SCAP之对在日朝鲜人政策, 1945~1952年》, 劲草书房, 1997年, 102页。

6) 在日朝鲜人联盟: 《总务部经过报告》。

7) <关于非日本人由日本归还之文件>, SCAPIN-224, 1945年11月1日。

8) 埃德华·W·瓦格纳: 《日本的朝鲜人少数民族, 1940~1950年》, 湖北社, 1975年, 137页。

9) “Repatriation—from 25 Sept. 1945 to 31 Dec. 1945”, USAFIK, XXIV Corps, G-2, Historical Section, Box34, RG554, NARA.

10)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Repatriation through Port of Pusan”, 30 Aug. 1946, American Red Cross, RG200, NARA.

的市场放出和转卖，而且还无限制地支出庞大规模的政府精算金。惟其如此，南朝鲜爆发极度的通货膨胀等，经济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¹¹⁾

在从1945年8月后半期开始的半个月时间，约130万朝鲜人从日本归国，但是其大半处于失业状态。虽然千方百计为归国者提供住所以及粮食、工作，但是在南朝鲜严峻的情势中，归国者是不可能构筑稳定的生活的。

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召开，决定对朝鲜的信托统治案。然而，围绕着该问题，赞成派和反对派的对立逐渐激化。在政治经济方面混乱不堪的南朝鲜社会情形，通过小道消息和新闻媒体¹²⁾传到在日朝鲜人社会。惟其如此，他(她)们不是选择立即归国，而是开始选择滞留日本。归国者人数大幅度减少。

三、作为日常实践的偷渡

(一) 对生活的不安

美军对于从朝鲜返回的日本人和从日本归国的朝鲜人，对其带出财产进行限制。只有随身行李以及1000日元以内现金可以携带出境。其理由是防止从日本的资产流出以及因日元流入南朝鲜导致通货膨胀。朝鲜人归国者对于仅以这些财产为基础开始新生活倍感不安，而且事实上也不容易。他(她)们开始为了渡过时艰而摸索新的手段。这就是通常被称为“偷渡”之向日本的越境移动。

(二) 日本入境的限制

所谓偷渡，就是因某种障碍和限制而无法移动的人，采取通常手段以外的方法而实现移动。¹³⁾对于朝鲜人而言，正如在日本帝国的“国内”移动似的，在占领时期向日本的移动也是困难的。“障碍”和“限制”出现在南朝鲜和日本两方面。

1946年2月19日，美军政厅公布事实上的出国限制措施《关于朝鲜入境及出境者移动之管理和登录的文书》(法令第49号)。根据规定，出国者必须取得旅行证明文件，但是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3月16日，GHQ/SCAP对于撤回本国的非日本人(Non-Japanese)，若无利用商业交通之许可，禁止其返回日本。向日本的入境限制付诸实施。不经过正规的手续入境日本是非法行为，以身试法者被称为非法入境者、即偷渡者。

1946年春夏之交，朝鲜人偷渡者急速增加。此时南朝鲜爆发的霍乱和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经济的混乱。GHQ/SCAP以朝鲜人偷渡者可能将霍乱带入日本的危险性为理由，采取更加严格的取缔措施。6月12日，GHQ/SCAP命令日本政府逮捕非法入境的船舶和人员，并将其引渡给美军官宪。7月15日，日本政府决定由各省(部)联合、承担走私贸易以及非法入境者的取缔工作。进而，英联邦占领军(BCOF)从日本翻译以及合作者、当地警察等获得情报，积极实施对朝鲜人偷渡者的取缔工作。¹⁴⁾然而，在霍乱疫情稳定后，日本入境限制依然没有解除。根据敕令311号(1946年6月公布，

11) 朝鲜银行调查部：《朝鲜经济年报》，1949年，II-33。

12) 1945年10月10日，解放后最早由在日朝鲜人创办的报纸《朝鲜民众新闻》开始发行。此后，至1949年共创刊120个以上的报纸和20个以上的杂志。在日朝鲜人主办的报纸中也有发行达10万份以上的。

在日朝鲜人创办的媒体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显示了一定的存在感(小林聪明：《在日朝鲜人的媒体空间 - GHQ占领时期的报纸发行及其动力》，风响社，2007年)。

13) 外村大：〈日本帝国之渡航管理与朝鲜人之偷渡〉，兰信三编：《围绕着日本帝国的人口移动之国际社会学》，不二出版，2008年，31页。

7月实行), 非法入境作为“对占领目的有害的行为”, 继续成为取缔的对象。偷渡不是被视为公众卫生问题, 而是被视为可能动摇占领体制的重大犯罪。

(三) 偷渡的动机

1946年7月, 每日约150人的朝鲜人偷渡者被送到仙崎的返还者收容所。在已被收容的2000人中, 500人是有正规手续的归国希望者, 1500人是偷渡者。¹⁵⁾由于所有的偷渡者都是原来在日本生活的朝鲜人, 因此某美军报告书针对其偷渡动机做出如下说明。¹⁶⁾

第一, 因生活穷困而偷渡的人, 占全部偷渡者的80%。其大部分是在日本还有不动产和储蓄, 但已返回南朝鲜的人。他(她)们是为了将财产转化为现金或生活所需的粮食而偷渡日本的。第二, 为了与留在日本的家属团聚而偷渡的人, 约占10%。日本战败时, 为了探明南朝鲜的情势, 丈夫、父亲、儿子等将家属留在日本而先行归国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以将全体家庭成员返回南朝鲜为目的而再次偷渡进入日本。第三, 其余10%是以走私为目的的偷渡者。除了报告书的说明以外, 其他偷渡动机还有, 因回想起在日本时代的美好生活以及希望进入日本学校生活而偷渡的¹⁷⁾。

日本与南朝鲜之间人和物的非法移动屡见不鲜, 对于GHQ/SCAP而言成为重大的关注对象。如后所述, 不仅朝鲜人而且日本人也涉及非法行为。无论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 偷渡和走私对于生活在困难中的人而言, 都是渡过归艰的手段, 也因此成为日常的实践。然而, 在占领下的日本社会, 只强调朝鲜人之非法行为的言论甚嚣尘上。

四、作为从日本社会被驱逐的遣返

(一) 压力和宣传导致之促进归国

GHQ/SCAP和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在于促使在日朝鲜人归国, 从而将他(她)们从日本社会清除出去。GHQ/SCAP命令日本政府对在日朝鲜人登记其是否希望归国, 宣称不希望归国者将丧失归国的特权。尽管如此, 不仅选择留在日本者大幅度增加, 而且偷渡者也急速增加。在与政策方向相反的事态发展过程中, 终于提出促进朝鲜人归国的方法。

(1) 对朝鲜人的压力

当初, 日本政府认为朝联的合作对于在日朝鲜人的归国不无效果。1946年5月20日, GHQ/SCAP指出在日朝鲜人之归国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禁止将其责任委托给朝鲜人团体。¹⁸⁾此后, 日本政府和GHQ/SCAP与各都道府县的警察及当地军政部门携手, 直截了当地对在日朝鲜人团体施加压力。有的县主持召开“促进朝鲜人归国协议会”, 其提出的意见称, 在日朝鲜人在日本社会跳梁跋扈, 日本当局“痛感饱受轻视”; 为了不被轻视, 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使他(她)们归国。有的县向各市町村长

14) 德萨·莫里斯-铃木: <对占领军有害的行动——战败后日本的移民管理与在日朝鲜人>, 岩崎稔等编: 《继续的殖民主义——绅士、民族、人种、阶级》, 68~70页。

15) “Incoming Message from CG 8th Army to SCASP”, July 23, 1946, Illegal Entry of Koreans into Japan, GHQ/SCAP Records, Box 382, RG 331, NARA.

16) “A Report on Stowaways”, August 19, 1946, Illegal Entry of Koreans into Japan, GHQ/SCAP Records, Box 382, RG 331, NARA.

17) 法务研修所编: 《在日朝鲜人待遇之推移与现状》, 1975年, 85页。

18) 埃德华·W·瓦格纳: 《日本的朝鲜人少数民族, 1940~1950年》, 湖北社, 1975年, 72页。

发出通告信称,“众所周知,终战后开始,一部分朝鲜人等跳梁跋扈,成为黑市商人和恶质掮客,或者通过幽灵人口等不正申报重复分得配给,诸如此类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在战败后日本的重建途上投下不少阴影。”“彼等抓住所谓战败的弱点,采取如此不正至极的生活手段”。并宣称,这在日朝鲜人中导致“住在日本好”的判断,这种“不健全的思想行动”应该一扫而光。由此可见,将对在日朝鲜人施加压力与促使其归国联系起来的想法,从政府一直贯彻到市町村层级。¹⁹⁾

(2) 非法行为之宣传

对在日朝鲜人的驱逐压力,是通过宣传他(她)们对日本社会而言如何成为有害的存在,从而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从日本社会中驱逐朝鲜人的言论此伏彼起,甚嚣尘上。有的警官对朝鲜人青少年口出狂言称:“朝鲜人留下来只会作恶,令人头疼。(中略)快点滚回去吧,呆头呆脑干什么呢?”²⁰⁾《朝日新闻》刊登社论,批判在日朝鲜人植根于黑市,导致物资流通和物价的混乱,从而不必要地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他(她)们扰乱了社会秩序。²¹⁾尤其是日本人媒体众口一词,强调在日朝鲜人的非法行为,大书特书诉求强化取缔的报导。

关于非法行为的喧嚣也出自政治家之口。1946年8月17日,进步党的椎熊三郎强调在日朝鲜人旁若无人,宣称他们给日本的治安带来绝大的不安。²²⁾9月2日,大村清一内相发言称:“多数朝鲜人怀有作为解放民族的错误的优越感,而且还有报复战争期间日本对其压迫之阴暗的反抗心态。”不是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反思在日朝鲜人的存在,而是鼓噪驱逐之暴力言论泛滥成灾。

(二) 遣返之实施

(1) 示威参加者之遣返

随着朝鲜人之驱逐压力与日俱增,他(她)们开始展开争取生活权利的抵抗运动。1946年12月20日,在日朝鲜人生活权拥护全国大会召开,朝鲜人4万人参加。会后,部分参加者根据预定走向首相官邸进行示威游行,与警察方面发展激烈冲突。GHQ/SCAP以乱入首相官邸和袭击警察等嫌疑起诉10个朝鲜人。他们被处以劳役5年和罚款75000日元。这是美军第8军对在日朝鲜人的活动以及在日朝鲜人反抗日本警察的警告。这项判决除朝联之外,还遭到美军政厅以及南朝鲜内革新势力的强烈批判,因此减刑为劳役1年,撤销罚金。²³⁾然而,追加了将其遣返朝鲜的新刑罚。翌年3月,被释放的朝鲜人及其家属被遣返南朝鲜。

(2) “日本国民”之驱逐

GHQ/SCAP判断这种强制性遣返是没有障碍的。实际上,其法的问题是模糊不清的。GHQ/SCAP的见解是,留在日本的朝鲜人,虽然在由正当设立的朝鲜政府承认为朝鲜国民之前拥有日本国籍,但是不包含在所谓日本人一词中。在日朝鲜人被视为具有日本国籍(日本国民, Japanese Nationals)之非日本人(Non-Japanese)。惟其如此,从日本将日本国民强制性地驱逐,²⁴⁾在法律手续上是有问

19) 施加压力的方法还包括:虐待和虐杀从朝鲜来的偷渡者、在大阪的居住证明问题、征收在日朝鲜人的财产税、冻结特殊存款等(朴庆植:《解放后在日朝鲜人运动史》,三一书房,1989年,117~118页)。

20) 《世纪新闻》(福冈),1946年5月23日。

21) 《朝日新闻》,1946年7月13日。

22) 朴庆植:《解放后在日朝鲜人运动史》,三一书房,1989年,117~118页。

23) 金太基:《战后日本政治与在日朝鲜人问题 - SCAP之对在日朝鲜人政策,1945~1952年》,劲草书房,1997年,313~316页。

题的处置方式。再者，在日朝鲜人之归国必须基于本人的意思，虽然是被告，但是无视本人愿望的强制离境也是违背美国政府的指示的。在法的问题暧昧不清的情况下强制遣返在日朝鲜人，并不是以此为开始的。早在1946年7月，在未经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朝鲜人偷渡者即遭到强制遣返。²⁵⁾日本内务省对朝鲜人和台湾人也下达了1947年2月以前强制离境的处分。²⁶⁾

(3) 《外国人登录令》之实行

在日朝鲜人的强制性遣返根据《外国人登录令》的实行而被“合法化”。1947年5月2日，作为最后的敕令，以在日朝鲜人之取缔为主要目的《外国人登录令》付诸实施。该令将理应是“日本国民”的朝鲜人暂时视为外国人，规定其进行外国人登录的义务。“视为”之规定成为否定具有日本国籍的在日朝鲜人的居住权、并可能迫使其离境的法律根据。在日朝鲜人之被驱逐，由于《外国人登录令》的实行而被“合法化”。然而，《日本国宪法》第98条明确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国籍法规，因此这与宪法规定相违背的的嫌疑是极其强烈的。²⁷⁾

(三)抵抗遣返的在日朝鲜人

从在日朝鲜人中也可以看到通过其发行的媒体，批判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抵制遣返压力的行动。朝联系统的《解放新闻》指出，虽然也有不顾作为解放民族之体面，而染指非法行为的在日朝鲜人，但这是因为没有充足的生活的粮食、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批判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充分。²⁸⁾《朝鲜人生活权争取斗争委员会通讯》如此主张：

我们不保护偷渡者。然而，以不过数千或两三万偷渡者为借口，压制近百万在留朝鲜人的社会活动并践踏其基本人权，如拒不发放居住证明，而且动员议会和报纸大肆吵作，而不是视之为政治问题，这其中难道不隐藏着军国主义者以及侵略者之重大而狡猾的阴谋和策略吗？²⁹⁾

我们不保护偷渡者。然而，以不过数千或两三万偷渡者为借口，压制近百万在留朝鲜人的社会活动并践踏其基本人权，如拒不发放居住证明，而且动员议会和报纸大肆吵作，而不是视之为政治问题，这其中难道不隐藏着军国主义者以及侵略者之重大而狡猾的阴谋和策略吗？！

在日朝鲜人确实把握驱逐的社会机制。他(她)们不仅批判日本政府和社会，而且还呼吁在日朝鲜人自制，以对抗驱逐压力。民团系统的《国际新闻》强烈要求在日朝鲜人自我反省，并提出与日本人友好相处的必要性。³⁰⁾其中包含的目标是抑制由于在日朝鲜人的行动而刺激日本人的感情，进而导致驱逐压力的提升。这是在日朝鲜人一方面消解驱逐压力，另一方面确保其在日本社会的生活天地的政治实践。

24) 金太基：《战后日本政治与在日朝鲜人问题 - SCAP之对在日朝鲜人政策，1945~1952年》，劲草书房，1997年，317~318页。

25) 德萨·莫里斯-铃木：〈对占领军有害的行动 - 战败后日本的移民管理与在日朝鲜人〉，岩崎稔等编：《继续的殖民主义——绅士、民族、人种、阶级》，67~68页。

26) 〈关于解放民族等之强制遣返给内务省公安第一课的通牒〉，1947年2月5日。

27) 大沼保昭：《在日韩国、朝鲜人之国籍与人权》，东信堂，2004年，229~230页。

28) 《解放新闻》{东京}，1946年9月20日。

29) 《朝鲜人生活权争取斗争委员会通讯》(东京)，1946年11月29日。

30) 《国际新闻》(东京)，1946年9月30日。

五、被监视的移动³¹⁾

(一)美军的通信审查制度

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朝鲜人的生活世界都是在跨越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空间领域而成立的。在从1945年开始的数年时间，支配这一空间领域的美军监视着越境移动的人们。美军不仅采取取缔和警备行动，而且还诉诸审查人们日常使用的信件和电话等通信的方法。那么，美军为了监视这类人的移动而推行的通信审查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呢？

在美军政时期之南朝鲜展开审查作战的是对朝鲜民间通信谍报队(CCIG-K)。CCIG-K是民间审查支队(CCD)³²⁾的下属部队，随第24军于9月8日在仁川登陆。在南朝鲜的通信审查，是根据1944年11月联合参谋本部制定的在战争结束后占领地的作战计划(JCS873/3)。

CCIG-K开始在南朝鲜全境实施电话、电报和邮政审查。然而，美国审查人员中虽然也有预想到对日占领而受到日语训练者，但是根本没有能解朝语者。CCIG-K接受第24军参谋二部(G-2)以及对敌谍报部队(CIC)的协助，拟采用能将朝语通信物译为英语的朝鲜人。然而，由于无法找到所希望的人，因此CCIG-K向上级提出由朝鲜人审查人员将朝语通信物译为日语，然后由日裔第二代之CCIG-K人员将其译为英语，以进行审查判断的。

审查作业根据“监视对象名单”(Watch List)和“审查要点指南”(Subject Matter Guide)进行。只要发现存在应该报告之内容和问题的通信内容，就摘编寄收信人姓名以及问题要点。审查对象，虽然最初重点是在朝日本人的通信物，但是随着其返回日本的完成，转变为朝鲜人的通信物。CCIG-K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走私和偷渡，而且还有涉及批判占领军和共产主义等政治活动的通信物。在通信审查中，不只见对通信物流通的限制，而且还可见收集情报之目的。所收集的情报交给G-2和CIC等，除了用于取缔走私和偷渡等非法行为外，还用于经济政策等占领政策的立案和制定。

以下试通过解读被审查的信件，以呈现被通信审查制度所揪住的人和物之越境移动之一端。

(二)被审查的信件

(1)在朝日本人的偷渡、走私

在朝日本人中也有未等待官方撤回船，而欲利用黑船返回日本的人。CCIG-K所审查的在朝日本人的私信记载了偷渡和走私的企图。

1945年10月19日收寄

A(住在日本)致B(住在釜山)的信

“搭偷渡船回对马时，请偷带些钱。您搭的偷渡船，不知是千岛丸、海王丸、KyoshisoI(汉字不明)丸中的哪条船。(中略)回日本时，告诉舰长多载些大豆、盐和米之类。”

1945年10月15日收寄

C(住在釜山)致D的信

“在釜山有许多经营偷渡船的公司。费用是公开的，大概是150日元。乘黑船去的话，可以逃脱宪兵和朝鲜人女性的检查。(中略)偷渡船将于本月的16、17、18日出航。”

31) 以本文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通信审查体制之形成》(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2009年度)为基础。利用了美国国立档案(NARA)以及韩国国家档案的解密资料。有关引注，参照拙文。

32) CCD本队在日本登陆，负责审查通信物件和大众传媒两类。

“附记，如有办法，可以多带些钱来。”

由此可见，这些在朝日本人正在商量带出限额以上财产的办法。这虽然是尚未进行的走私行为，但是这类非法行为的企图通过审查已经被美军所掌握。

1945年10月20日审查

G(住在釜山)至H(住在首尔)的信

“日本的女人，为了在返回日本之际进行的携带物品检查中，其金钱不被宪兵所没收，而将其藏在内衣和水壶里。”

1946年1月29日审查

I(住在日本)致J(住在首尔)的信

“美军士兵对从釜山回到日本的日本妇女和少女不进行检查。K君(日本人)如果偷带钱来，大概不会被发现吧。”

(2) 朝鲜人的偷渡、走私

CCIG-K所审查的信件显示了走私的实际情形。

A(住在庆尚南道)致B(住在日本，国籍不明)的信

“来南朝鲜时没有数量的限制，请多带些医药品来。这些可以卖3500日元。”

C(住在莞岛)致D(住在东京，国籍不明)的信

“打算在对马用日元买些材木。在对马1尺只要20日元，而在朝鲜高达400日元。在对马买进的材木，带到朝鲜后可以高价出售。”

在混乱的政治经济状态下生活中的人中，也有打算离开南朝鲜前往日本的。

E(住在南朝鲜昌善)的信

“尽管朝鲜已经解放了，但是没有政府，物价高涨。可能的话，还是想去日本。”

从釜山偷渡到日本的F的信(1946年6月29日至7月27日间投递)

“最近从日本归国的一个同乡说，如果从日本归国的朝鲜人的数量是2000人，那么重返日本的朝鲜人可能达到3000人。(中略)虽然回朝鲜的时候兴高采烈，但是丧失了全部钱财，因此决心再次回到日本。”

前引美军的报告书指出，偷渡者大半是以将留在日本的财产转化为现金为动机。然而，企图偷渡的并不只是在日本有财产的人。CCIG-K所审查的信件显示了既没有财产、又面临绝望深渊的人寻求将偷渡作为谋生之最后选择的情形。美军的通信审查制度，不仅监视着越境的人的移动情形，而且还发挥了作为认知促成他(她)们移动的生活世界的系统的机能。

(三) 通信审查制度之继承

1948年8月18日，CCIG-K承担的通信审查宣告结束。与此同时，第24军司令部将CCIG-K在审查时使用的审查台(Censorship Desk)和“监视对象名单”移交韩国政府。其后不久，递信通信部开始进行通信审查，并期待由此获得的关于共产主义者的情报能够提供给美军。

1948年12月1日，《临时邮政查禁法》公布实施，以此为法律依据，递信部开始进行邮政审查。《临时邮政查禁法》是从法律的角度支撑日本帝国的通信审查制度之《临时邮政取缔令》

的复活。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制定《临时邮政查禁法》的12月1日，也是制定日本《治安维持法》之翻版《国家保安法》的日子。

重新开始的邮政审查，诚如尹锡龟递信部部长所言明，其目的在于揭发敌对李承晚政权的“共产主义者”。邮政审查以递信部邮政局审查课为中心，在全国各地的主要邮局付诸实施。内容被判定有问题的邮件被归类为“事故邮件”，采取“没收”或“不投递”的限制措施。“事故邮件”1953年5月为311件，而到朝鲜战争停战后的1954年1月急增为1316件，同年2月剧增为3927件。

李承晚政权时期的邮政审查不只是限制情报的流通，而且还以情报收集为目的。所收集的情报，除了国务问题之外，还传达给内务部以及财务部、国防部等相关机关。其中偷渡和走私也是重要的监视对象，关于前者的情报传给内务部，而关于后者的情报则交给财务部以及内务部、宪兵总司令部。韩国人的越境移动，不仅在美军政时期而且在李承晚政权时期，也通过邮政审查而受到监视。事实上，在从1958年1月以后的4个月时间，“事故邮件”(国内邮政)的9%以及“事故邮件”(国际邮政)的7%涉及走私和偷渡。具有监视移动之机能并尝试把握朝鲜人生活世界的通信审查体制，从美军政时期传承到李承晚政权时期。关于其意义，拟另文论之。

六、结语

从日本战败和朝鲜解放后数年时间所出现之朝鲜人的移动，表现为归国以及偷渡、遣返，是由各种力综合作用造成的。这种力不只是GHQ/SCAP以及日本政府、地方自治体所具有的行政权力，而且还是由政治家以及媒体所鼓噪的对在日朝鲜人的暴力言论所构成的。再者，近代以降日本人始终具有的殖民地主义意识，也产生了推动朝鲜人移动的力量。进而，南朝鲜社会混乱的政治经济情势，也是迫使朝鲜人移动的要因，这也是不能忘记的。在这些力复杂的作用中形成的朝鲜人移动，向无法将他(她)们的生活空间编入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内的超越国境的领域扩张。

1945年秋进驻日本和南朝鲜的美军，建构了具有监视朝鲜人移动之机能的通信审查制度。这不只是监视人的越境移动并予以取缔，而且隐藏着把握他(她)们以移动为一个构成要素之生活世界的目的。本文指出，由复杂的力所造成的朝鲜人移动受到美军的监视，而这种监视还被李承晚政权时期所继承。

那么，这种权力进行的监视对于人的越境移动造成何种影响呢？这种影响对于他(她)们的生活世界的形成过程具有何种意义呢？今后的课题，就是带着这些疑问，论述与朝鲜半岛有联系的人们的移动经验。这对于从历史的观点阐明以移动之人群的日常行为为构成要素的东亚世界的构造，无疑是重要的线索。

同順泰文書를 통해 본 近代轉換期
朝鮮華商의 他者認識

■ 姜玢亞 (慶北大) ■

同順泰文書を 통해 본 근대전환기 朝鮮華商의 타자인식

강진아 (慶北大)

〈목 차〉

1. 한말 화교의 진출과 同順泰號
2. 동향의식과 국민의식의 경계
3. 政治와 致富 사이
4. 청일전쟁을 바라보는 이중의 시선

同順泰號는 漢城, 仁川, 全州 등 국내 각지에 지점을 두고 일본, 중국의 개항장과 무역업을 경영했던 한말의 대표적인 華商이다. 동아시아 무역 네트워크 연구와 화교 연구의 활성화와 더불어, 서울대학교 奎章閣과 古文獻資料室의 同順泰號 관련 文書(이하 同順泰文書로 약칭)의 발굴로 최근 본격적인 연구가 시작되었다.¹⁾ 동순태문서는 동순태호로 보내온 각종 영수증, 발송장과 각 지점 및 거래처와의 상업서신으로 구성되어 있는데,²⁾ 특히 상업서신에는 일반적인 시장 상황과 상거래에 관련한 정보 이외에도, 19세기 말 화상이 조선에서 상행위를 영위하면서 조선인, 일본인과 부딪치는 여러 갈등과 관청과의 협조 및 반목 등도 상세히 기술되어 있어 흥미롭다. 그 안에는 강건한 동향의식과 초보적인 국가의식뿐 아니라, 조선의 內政과 국제관계에 대한 관찰도 엿볼 수 있다. 이번 발표에서는 1894년 淸日戰爭을 전후한 시기의 문서를 중점적으로 검토하여, 동순태호의 시선을 통해 조선화상의 타자인식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 1) 대표적인 연구로 한국, 미국, 일본에 다음과 같은 연구가 있다. ; 강진아, 「中日무역마찰의 전개와 朝中關係의 변화-1920년대-1930년대를 중심으로」, 『근대전환기 동아시아 속의 한국』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2004. 강진아, 「근대 동아시아의 초국적 자본의 성장과 한계 -재한화교기업 동순태(同順泰)(1874?~1937)의 사례-」, 『경북사학』 27, 2004; 강진아, 「동아시아경제사 연구의 미답지 : 서울대학교 중앙도서관 고문헌자료실 소장 朝鮮華商 同順泰號關係文書」, 『동양사학연구』 100, 2007; 강진아, 「廣東 네트워크와 조선화상 同順泰」, 『사학연구』 88, 2007; 강진아, 「근대전환기 한국화상의 대중국무역의 운영방식-동순태보호기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동양사학연구』 105, 2008; 강진아, 「韓末 彩票業과 華商 同順泰號- 20세기 초 동아시아 무역 네트워크와 한국 -」 『중국근현대사연구』 40, 2008; Kirk Wayne 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石川亮太, 「ソウル大学所藏『同泰來信』の性格と成立過程-近代朝鮮華僑研究の端緒として-」, 『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 32, 2004 ; 石川亮太, 「開港後朝鮮における華商の貿易活動-1894年の淸國米中繼貿易を通じて」, 『中國近代化の動態構造』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4; 石川亮太, 「朝鮮開港後における華商の対上海貿易-同順泰資料を通じて-」, 『東洋史研究』 63-4, 2005.
- 2) 서울대학교 奎章閣 소장 동순태문서는 『進口各貨倉口單』(8책, 1891년, 1895-1900년, 1903년), 『甲午年各埠來貨置本單』(2책, 1894-1895년), 『乙未來貨置本』(1책, 1895년), 『同泰來信』(19책, 1889, 1894, 1903, 1905년) 총 4종 30책이며, 서울대학교 고문헌자료실 소장 동순태문서는 『同順泰往復文書』(전 35권)와 『同順泰號』(1권) 총 2종 36권이다.

1. 한말 화교의 진출과 同順泰號

조선으로 華商의 진출이 본격화된 것은 일반적으로 1882년 10월 朝淸商民水陸通商章程의 체결 이후로 본다. 1888년 3월부터 上海-煙臺-仁川 노선이 개통되어 정기선이 운항되면서 화상의 진출은 크게 늘었고, 그 중에서도 수적으로는 山東省 출신이 최대였다.³⁾ 그렇지만 청일전쟁을 전후한 시기에 경제적으로 세력이 컸던 것은 오히려 廣東省 출신의 華商들이었다. 그 대표적인 화상이 廣東省 高要縣 출신의 譚傑生이 운영한 同順泰號이다.

조선의 화교도 다른 지역 화교와 마찬가지로 출신지에 따른 동향집단으로 조직되었는데, 크게 北幫(山東, 直隸 출신), 廣幫(廣東省 肇慶府 출신), 南幫(江浙 출신)의 세 그룹이 있었다. 수적으로는 山東省 출신이 많았지만, 무역의 중심지인 仁川의 경우, 1883-1884년 인천 소재 중국 상인 235명 중에서 광동적 상인이 74명이나 되었으며, 자본력에서 산둥인을 압도하였다.⁴⁾ 同順泰號 經理 譚傑生은 일찍부터 廣幫의 리더였다.⁵⁾ 同順泰號는 최대 주주이자 거래처인 上海 同泰號 梁綸卿을 매개로 鄭觀應, 唐廷樞 등 廣東 香山縣 출신의 買辦官僚과 연계되어 있었고, 또한 다시 이들을 매개로 韓末 중국의 한국정책에 커다란 영향력을 행사하던 洋務派 관료와 긴밀한 관계에 있었다.⁶⁾

동순태호는 한말 최대의 화상이었을 뿐 아니라, 1892년 두 차례에 걸쳐 조선에 대한 차관을 공여할 정도로 정치적인 활동도 전개하였다(1, 2차 同順泰借款).⁷⁾ 이 차관은 사실 중국 정부로부터 직접 차관을 꺼리던 조선 정부를 고려해, 실제로는 상해 중국해관의 出使經費項目(즉 외국에 주재하는 청 외교관의 경비)에서 차관을 제공하면서 조선거류의 화교자본인 同順泰號가 명의를 제공한 것이었다. 이처럼 화려한 경력의 同順泰號의 성원들, 특히 經理 譚傑生을 통해, 당시 화상의 눈에 비친 한말 한성과 인천의 群像이 어떠했는지 살펴보자.

2. 동향의식과 국민의식의 경계

동순태문서의 서신 왕래에서 뚜렷이 드러나는 것은 강렬한 동향의식과 경쟁 상대였던 山東幫에 대한 경계였다. 동순태의 주력 업종인 비단, 金砂에서 산동방의 수급 상황에 따라 인천과 한성에서의 가격이 하락하기도 하고 상승하기도 했으며(사료 A-1, A-2), 인천과 한성 사이의 화물 선적을 둘러싸고도 때로는 경쟁이 벌어졌다(사료 A-3).

특히 1894년에는 중국 쌀을 상해에서 수입해 와서 조선 현지에서 팔거나 일본에서 파는

3) 古田和子, 『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 東京大學出版會, 2000, p. 92.

4) 譚永盛, 『조선말기의 청국상인에 관한 연구-1882년부터 1885년까지』, 단국대학교 사학과 석사논문, 1976, p. 52.

5) 楊昭全, 孫玉梅 著, 『朝鮮華僑史』,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1991, p. 107.

6) 상해를 매개로 한 동아시아의 廣東네트워크(Canton-Network)와 同順泰號, 양무과 관료와의 관계에 관해서는 강진아, 「廣東네트워크와 조선화상 同順泰」(『사학연구』 88, 2007)가 자세히 분석하고 있다.

7) 金正起, 「조선정부의 淸 차관도입(1882-1894)」, 『韓國史論』 3, 1976, pp. 453-468.

사업이 크게 성행했는데, 이 과정에서 산동방과의 경쟁은 생생하게 문서에 나타난다(사료 A-4, A-5). 원래 淸朝는 쌀 수출을 금지해왔으나, ‘屬國’인 조선에 기근이 들자 조선 측과 원세개의 요청으로 이홍장이 특별히 주선하여 상해에서 무관세 쌀 수출을 허가했던 것이다. 그런 만큼 수속도 특수하여, 總署(용산에 있던 總理朝鮮通商交涉事宜 袁世凱의 집무처)에서 허가, 발행한 米照(수입허가증)를 龍署(용산에 있던 漢城 업무 사무처)에서 신청, 수령하여 상해로 가져가서 上海 道臺에서 도장을 받아 비로소 쌀을 수입할 수 있었다. 1894년의 미 무역은 원래 동순태호가 앞서서 개척했는데, 이윤이 크게 남는 것을 보고 산동인들도 뛰어드는 바람에 상해의 쌀 구입가는 높아지고 인천에서 조선인이나 일본인들에게 파는 값은 떨어졌다. 따라서 동순태호는 산동인의 동향을 예의 주시하고 있었다(사료 A-6).

그럼에도 동순태호는 산동인에 대해 강한 우월의식을 가지고 있었는데 이러한 우월의식은 시장 경쟁력에서 廣幫이 가진 우위에서 나오는 것이기도 했다. 조선의 廣幫은 上海를 비롯해 일본 각 지에 진출한 廣東 네트워크를 기반으로 활동하고 있었으므로 동아시아 전반의 시장 정보의 입수에서 앞서 있었으며, 廣東籍 買辦資本家들과의 인적 유대로 官에도 두터운 인맥을 자랑하고 있었다. 따라서 산동인은 일본인이 쌀 구입을 갑작스럽게 취소하는 위약을 일으켜도 양보를 할 수 밖에 없거나, 가격도 시세보다 낮게 팔아야 했다(A-7, A-8). 그 해 4월 7일에 동순태 인천 지점의 譚晴湖는 한성 본호의 譚傑生에게 보낸 편지에서, “오늘 일본인이 山東幫 瑞盛(號)에게서 1천 包, 共和順에게서 2천 包, 恒順昌에게서 2,800 包를 샀는데, 일본 斗에 6.2毛 (=0.62元)로, 포대까지 포함한 가격이다. 이 가격으로는 겨우 본전치기인데, 그들(산동방)이 해외 개항장 시황을 알지 못하니 급하게 팔아버리려는 것도 이상할 것이 없다(今日日本人有與東幫瑞盛買1千包, 共和順2千包 恒順昌2800包 每日斗6.2毛, 連袋在內核, 此價僅可保存, 伊不知外埠市, 怪不得急於脫手)”고 말하고 있다. 그러면서도 “周鶴雲가 와서 화물 선적을 묻는데, 나는 일부러 상세하게 오사카 시황이 좋지 않도록 말하여, 그가 산동방에게 전하도록 해서 (그들이) 더욱 급하게 물건을 팔게 했다.(周鶴雲來求貨 俾 我故意詳說坂市不好, 使其告東幫知, 更欲急賣也)”라고 덧붙이고 있어, 강한 경쟁의식을 보여 준다⁸⁾.

1894년의 쌀 무역과는 달리 산동방의 선점 분야에 후발로 진출하는 경우도 있었다. 糖姜은 원래 산동방이 烟台에서 구입해서 조선에 팔았는데 수익이 높은 것을 알고 譚傑生은 糖姜의 원산지인 汕頭로부터 직접 구입을 시도하여 가격 경쟁력을 확보하였다(A-9, A-10)

사업상의 경쟁 외에도 산동방과의 경쟁은 조선 주재 청국 관헌과의 인맥이나 자존심 싸움으로도 드러났다. 1894년 2월 25일 일처리로 인천에 와 있던 譚傑生이 한성 본호에 보낸 편지에는 “이번 달 28일이 袁總辦(=袁世凱)의 부인(老太) 생일인데, 생각하건대 各幫 商人도 總署(원세개 집무처)에 가서 축하를 드려야 하는데, 古幹庭에게 부탁하여 山東幫이 어떻게 할 건지 물어봐서, 本幫도 그들과 같이 해야 하니, 절대 남보다 못해서는 안 됩니다.(本月廿八日、袁總辦考太之生日、料各幫商人、到署道喜、祈托古幹庭、打聽山東幫如何、本幫依他一樣而為、切不可落人之後也)⁹⁾라고 하고 있다. 또 그 해 4월에는 조선 주재 청국 관헌에

8)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7. 『同泰來信』 6卷.

9) 譚傑生→○泉亨, 1894.2.25. 『同泰來信』 5卷.

서 각 幫에게 巡捕房의 건설비용을 위해 재원을 염출하도록 하는데, 이때 연락을 받았던 인천 지점의 譚晴湖는 광방 책임자였던 譚傑生에 연락하여 “유영사가 (光緒) 19년 四厘捐을 내라고 한 일은, 만약 北幫이 냈으면, 우리 廣幫은 안 낼 수 없으니, 신속히 용산 영사에게 물어보라(劉領事要繳十九年四厘捐之事, 如果北幫交去, 我廣幫不能不交, 祈速問過龍山領事)”고 독촉하고 있다.¹⁰⁾

산동인에 대해서 “山東人”, “東幫”, “山東幫”이라고 지칭하면서 대체로 경쟁의식과 우월의식을 드러내는데, 이러한 의식은 “中國人”이라는 용어에도 투영되어 있는 점이 주목된다. 앞서 쌀 무역에서 일본 선박회사에 쌀을 적재해 고베로 보내는 사안에서 운반비 교섭이 벌어지는데, 역시 인천지점 점원인 譚廷廣은 譚傑生에게 보낸 2월 1일 편지에서 “오후 周月松이 와서 말하기를, 절대로 깎지 말라고 하니, 이 사람이 마음으로 무엇을 바라는지 모르겠습니다.(下午周月松來云, 要寔不扣, 未知此人心中如何欲,)”라고 말했다¹¹⁾. 그런데 이틀 뒤에 보낸 편지에서는 “쌀을 오사카로 실어 보내는 일은, 本號에 쌀이 있으므로 제가 직접 일본인과 만나서 상의해야 할 것으로, 중국인에게는 상세히 알리지 말아야 합니다. 그 사람됨이 믿기 어려우므로, 역시 그를 경유해서 처리하지 않는 것이 좋겠습니다(裝米往坂, 爲本號有米, 我當往與日人面斟, 不與中國人詳知, 因此人難靠, 亦不用經由他)”¹²⁾(강조는 인용자)라고 쓰고 있다. 아마도 앞서의 주월송을 가리키는 말인데, 그를 中國人이라고 부른 것에서, 당시 조선화상의 인식 속에 “中國人”이란 1905년 미국 보이콧운동 때와 같이 단결의 상징은 아니었음을 엿볼 수 있다.

3. 政治와 致富 사이

동순태는 조선 주재 중국 관헌과 조선 관헌 모두와 긴밀한 인적 유대를 맺고 있었다.¹³⁾ 그 유대의 내용은 다양한데, 청의 주재관헌과 조선정부를 도와 일본에 배를 주문하는 일을 돕기도 하고¹⁴⁾, 동순태 차관의 매월 상환금을 인천해관에서 대리 수령하여 袁世凱의 總署에 넘기는 일을 하기도 하였다(B-1, B-2). 또 청 본국에서 조선 주재관에 보내는 공금도 대행을 하였으며 그 송금 금액이 일시에 2만 량이나 되는 사례도 있다(B-3, B-4). 조선 주재관들은 일본을 거쳐 상해를 통해 귀국하는 경우, 동순태호의 거래 네트워크를 따라 그 지점 내지 거래처에서 借金하고 후에 償還도 그 네트워크를 따라 결제되는 사례도 있다(B-5, B-6). 이상의 사례들은 청말 국가은행이 부재한 상황에서 일종의 공금 관리의 은행 역할을 한 경우이다. 이런 경우 이외에도 청 주재관들은 개인적인 청탁도 하였다. 袁世凱의 여섯째 동생의 월급 관리를 한성 동순태호를 통해 상해 동태호에 부탁한 사례가 그것인데, 여

10)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3. 『同泰來信』 6卷;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5. 『同泰來信』 6卷.

11)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1. 『同泰來信』 5卷.

12)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3. 『同泰來信』 5卷.

13) 지면상 조선 관헌 대상의 대출 관련 분석은 생략한다(사료 대출1,2,3,4 참조)

14) 陳如三 → 譚傑生, 1894.1.23. 『同泰來信』 5卷; 陳如三→譚傑生, 1894.1.9. 『同順泰往復文書』 1권.

기에서 동순태호는 1894년 4월 시점에서 원세개가 곧 이임할 관리라는 이유로 그의 청탁을 수차례나 거절하고 있는 점도 흥미롭다(B-7).

동순태호는 이런 官과의 특수 관계를 致富에도 활용하였다. 앞서 쌀 수출에서 동순태호는 인천에서 쌀을 일본인에게 파는 것만으로는 산동방의 대거 참여로 큰 이익을 보지 못하자, 일본으로 직접 가져가 팔 구상을 하게 되었다. 원래 상해에서 온 쌀은 조선에서만 팔게 되어 있었다(B-8). 하지만 그는 唐紹儀에게 부탁하여 袁世凱에게 쌀의 수출을 허락해 달라고 부탁하였다. 즉 원래 중국에서 조선에 오는 쌀은 기근 해소를 위해 특별히 면세수출 허가를 한 것이지만, 2월부터 이미 조선은 일본의 압력으로 쌀 수출 금지를 해소하여 일본인들이 이 쌀을 일본에 가져가 큰 이익을 얻고 있으므로, “중국 상인의 이익을 나눠가져가고 있다(分我商人之利)”는 것이다. 따라서 중국 상인도 일본으로 이 쌀을 팔 수 있도록 부탁한 것이었다. 원세개는 원래는 “규칙에 어긋나고 李鴻章에게 알려지면 문책을 받겠지만(于條規有碍, 防中堂知之受責)”, 인천에 도착해서 수입을 보고하고 米照를 제출하고 난 다음에는 어디에 가서 누구에게 팔든 상관하지 않겠다고 약속해 주었다.¹⁵⁾ 이후 米照의 발급 과정에서도 수속을 빨리 하도록 袁世凱에게 청탁하거나 공식적으로 미조 발급을 중단한 뒤에도 정식 수순을 밟지 않고 특별 추가 발행을 받고 있다(B-9, 10, 11).

그러면서도 조선에서 상업 활동의 비호라는 면에서 청 주재관에 대한 평가는 그다지 높지 않았다. 산동인이 일본인과의 교역에서 일방적인 과기로 손해를 본 일을 두고, 譚傑生은 上海 同泰號 經理 梁綸卿에게 보낸 편지에서, “일본인과 교역하면 뒤집어엮기 일쑤고 신용이 없습니다. 비록 계약금을 받고 물건이 나갔고 돈도 확실히 받았으니 확실한 거래였다고는 하나, 만약 도리를 바로 잡고자 일본인에게 소송을 건다면 일본 관리는 상민을 비호하며 도리를 따지지 않고 결국 우세를 점할 진데 중국 관리는 일처리에 무능하고 겁이 많아(소송을 걸면) 반드시 손해를 보게 되니, 관을 믿고 일을 하기는 실로 미답지 못합니다.”(與日人交易, 真是反覆無信, 虽收了定銀, 將貨出去, 收清楚銀, 乃是實事, 如揜正道理, 與其打官司, 而日本官庇護商民, 不講道理, 總要占上風, 而中國官無才能辦事畏懼, 必然虧, 靠官辦事, 實不足持)¹⁶⁾라고 말하고 있다.

그렇지만 조선에서 활동하는 화상의 大國意識과 중국 관헌의 위세는 결코 치부에 무용한 것이 아니었다. 동순태호 조선지점의 보고서에서 당시 동학군을 진압하기 위해 파견된 중국군과 원세개의 親兵이 전주 지점에 자주 들러 장사를 묻고 갔는데, 이를 전주 책임자가 譚傑生에게 보고하는 내용은 의미심장하다. “예전에 徐나리와 袁大人(=袁世凱)의 여러 親兵도 저희 상점에 와서, 여러 상황에 대해 물어보았습니다. 이제 丁나리(=丁得鵬)도 역시 저희 상점에 와서 한담을 나누면서 장사가 어떤지 미수금이 있는지 물어보았습니다. 저는 그에게 지금도 아직 빚이 천여 吊이 있는데 못 받고 있다고 말했습니다. 이번에 두 나리가 저희 상점에 오셔서 앉아서 한담을 나누고 간 것이 저희 상점의 위풍이 높아지는데 도움을 주었습니다. 조선인들이 중국의 높은 사람 몇 명이 와서 저에게 (이것저것) 묻고 갔다고 많이 말들을 하고, 조선인들이 저를 두려워하는 마음이 커졌습니다. 저는 이 관청의 위세를

15) 譚傑生→梁綸卿, 1894.2.10. 『同順泰往復文書』 15卷.

16) 譚傑生→梁綸卿, 1894.4.2.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빌어 외상을 진 각 상점들에게 독촉할 것이니, 아마 미수금도 잘 건힐 것입니다. 이 역시 東家(주주, 역기서는 한성 동순태)의 홍복입니다.”(前者徐老爺與各袁大人之親兵, 亦有到來本號, 問及各事情如何. 今丁老爺亦到來本號, 閒談問生意如何, 有賒賬否, 弟對他說, 今尚有欠賬仟餘吊, 尚未收妥. 今得兩位老爺到本號來, 安座閒談, 助本號之威風. 朝鮮人多有說及, 中國幾個大人到來問及我, 朝鮮人多有畏懼我之心, 弟趁(=趁)此官威追問各欠號, 料亦各賬好收, 亦是東家之鴻福也)¹⁷⁾ 즉 은밀한 방식으로 政治는 致富를 도울 수 있었다.

4. 청일전쟁을 바라보는 이중의 시선

1894년 음력 4월부터는 서신에 점점 동학군에 관한 기사가 늘어났다. 동학군에 대한 譚傑生의 시각은 상당히 호의적이라는 점이 주목된다. 譚傑生은 "조선의 민심이 떨어진 것은 모두 평소에 관리의 착취로 원한이 쌓인 지 오래되었기 때문으로, 따라서 인심이 반란을 생각하게 된 것이다. 생각건대 東學黨이 이처럼 사람이 많아졌는데 관병은 겨우 천, 2천에 불과하니, 비록 총포의 우세가 도운다고 하나, 아마도 중과부적일 것이다(但朝鮮民心離散, 皆因平日官抽剝積怨日久, 故人心思亂, 計東學黨如此衆成, 而官兵僅得千餘貳千, 虽槍炮利便, 恐寡不能敵衆)¹⁸⁾"라고 보았다. 또 “관의 압박으로 민변이 일어났다면, 오로지 官과 대적하고, 장사하는 이들에게는 해가 없을 것 같으나, 보건데 난민들이 세를 믿고 약탈을 하면 아무 것도 남지 않게 될 것 같으니, 정말 앓아도 누워도 불안하고 마음이 칼로 찌르는 것 같다(如果是官逼民變, 專與官作對, 似于做生意無碍. 看有亂民, 藉勢搶劫, 料化爲烏有, 眞是座臥不安, 心如刀刺也)”¹⁹⁾고 하면서도, “듣기로 동학은 기치를 내걸기를 지금까지도 호국안민(護國安民)을 내세우며, 이들 밝은 무리는 결코 약탈을 하지 않아 인심이 평상시처럼 편안하다고 하니, 만약 이것이 사실이라면, 그들은 백성과 함께 해악을 제거한다고 크게 명분을 만들 수 있을 것이고, 또 유적의 행위를 배우지도 않을 것이다. 그러나 일이란 방비하지 않을 수 없으니, 내 생각에 국왕이 멍하니 손을 놓고 있지는 않을 것이니 장래 전주에서 전투가 일어나 전장이 된다면 정말 걱정스럽다(但聞東學起旗, 至今乃出護國安民, 玄徒并無搶劫, 所以人心安靖如常, 料是眞言, 因他大書名目與民除害, 又未必學流賊之行爲, 但事不可不防, 卜國王未必據然罷手, 防將來交兵在全州爲戰場之地, 誠是可慮耳)²⁰⁾고 하여 동학군에 대해서는 상당히 동정적이지만, 전쟁 자체가 사업에 일으킬 파장을 염려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면서도 담길생은 “朝鮮王은 동학을 토벌할 힘이 없으므로 반드시 중국에 병사를 청하여 도와달라고 할 것이니, 이는 필연적인 형세이다. 조선은 중국의 屬國이니, 역시 반드시 병사를 파견하여 도와주어야 한다. 그러나 동학이 중국병사가 온다고 들으면 중국인을 원수로 여겨 이를 빙자하여 재물을 약탈할 지도 모르니 걱정스럽지 않을 수 없다((但朝鮮王無力量勦滅, 必請中國兵來幫助, 此乃勢所必然. 朝鮮是中國屬國, 亦必發兵來相幫也. 但恐

17) (全州支店)劉時高(?) → 譚傑生, 1894.?? 『同順泰往復文書(交貨尺牘)』 1권.

18) 譚傑生 → 邵蘭圃,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19) 譚傑生 → ○泉亨, 1894.4.28. 『同泰來信』 6卷.

20) 譚傑生 → ○泉亨, 1894.4.28. 『同泰來信』 6卷.

東學聞有中國兵到，與中國人爲仇敵，并藉端搶劫財物，不可不慮)”²¹⁾고 하여, 사업의 유지를 위해서도 반드시 파병이 이뤄져야 한다고 여러 곳에서 확신하고 있었다. 놀랍게도 譚傑生은 평화 해결의 희망을 袁世凱에게 걸고 있는데, “듣기로 국왕이 袁總理(=袁世凱)에게 전주로 가서 (동학당을) 설득을 해달라고 부탁하여 그 날로 이미 길을 떠났다고 하는데 진짜인지 모르겠다. 그는(=袁世凱) 평소에 펍 조선인의 인심을 얻고 있으니, 혹시 한 번 유세를 하러 갈 수 있다면 모두가 안심할 것이다.(袁總理聞 國王托其往全作說客 卽日已起程未知是否 他似平日素得朝鮮人心, 或可一說卽行, 均皆安慰也)”²²⁾고 하고 있어, 원세개에 대한 조선인의 평가가 높다고 확신하고 있었다.

1894년 5월이 되면 청군과 일본군이 모두 인천과 한성에 파병하여 바야흐로 전운이 감돌기 시작하였다. 이때의 서신에는 거의 매일 각 군의 자세한 동향이 적혀있는데, 譚傑生은 거래처의 陳達生에게 보낸 편지에서, “상인들은 이런 사태에 연루되어 피해를 입을까 두려워 정말 자도 먹어도 불안합니다. 조선은 반란이 많고 위험한 나라로, 일본과 러시아가 오래도록 점거하고자 노렸는데, 중국 관료들은 모두 안락함만 탐했으니, 생각건대 중국이 다시 기를 펼 날은 없을 것 같습니다. 일이 사단이 나기에 이르렀으니 인천에서 장사를 하는 것을 보호받는 것도 비관적이고 반드시 연루되어 피해를 입을 것이니, 제 마음도 역시 까맣게 탐니다(商人恐防受累, 眞是寢食不安. 朝鮮是危亂之邦, 日俄久欲占據, 中國官場皆是偷安, 料無振作之日, 怕事以至生事, 悲觀保護在仁港(?)做生意, 必然受累, 弟心亦是恢恢(=灰?)也.(譚傑生→陳達生, 1894.5.19. 『同順泰往復文書』 19卷)”라고 하고 있다.

그런데 조선을 바라보는 이러한 우월적 시선 속에서도, 상업서신에서 결국 확인되는 전쟁을 바라보는 시선은 전쟁 자체나 본국인 淸에 대한 걱정보다는 오로지 상업 활동의 유지 여부와 가산의 보호라는 철저히 상인의 시선이였다. 파병이 이뤄지지 않은 4월에서도 담걸생은 “조선국 동학난으로 만약 軍務로 쌀을 조달할 일이 있어, 唐領事(=唐紹儀)가 나와 상의할 일이 있다면, 즉시 전보를 쳐서 나에게 알려라. 전보를 치면 한성으로 돌아가겠다.(朝鮮國東學亂或有軍務米办, 如唐領事有事與我商量, 祈卽行電達知我 卽返漢矣如. 打電報返漢城)”²³⁾고 하여 전쟁을 또 하나의 치부의 기회로 바라보았다. 인천 지점의 譚晴湖는 일본이 파병하자 중국과의 전쟁을 점치면서도, “전쟁이 인천과 한성에서 벌어지면 모두 걱정스러운 일이다. 본호의 쌀은 시급히 일본으로 많이 부치는 것이 어떠하냐(事見仁漢, 均屬可憂. 本號之米, 急欲多付東洋奈何)”²⁴⁾고 하여 군량미가 될 수 있는 쌀을 일본에 옮기도록 하였다. 상해 동태호의 梁綸卿 역시 22일 한성으로 전보를 보내 피난을 권유하면서, 혹시 재산상의 손실이 생기면 “문제를 일으킨 나라(起事國)”에 배상을 청구한다며 어디까지나 전쟁의 쌍방과 거리를 둔 제3자의 입장을 취했다.²⁵⁾

烟台로 철수하기 직전 인천에 남아있던 譚傑生은 재물을 조계대로 옮겨놓으면서, “듣기로 각국(=각국 공사)은 인천과 한성에서는 전투를 벌이는 것을 불허하고 병사를 조계로 들

21) 譚傑生→○泉亨, 1894.4.29. 『同泰來信』 6卷.

22) 譚傑生→○泉亨, 1894.4.29. 『同泰來信』 6卷.

23) 譚傑生→○泉亨, 1894.4.29. 『同泰來信』 6卷.

24) 譚晴湖→譚傑生, 1894.5.9. 『同泰來信』 6卷.

25) 譚傑生→梁綸卿, 1894.5.27. 『同順泰往復文書』 19卷.

일 수 없도록 했다고 하니, 만약 그것이 사실이라면 큰 문제는 없을 것이다(聞各國云不准在仁漢地方開戰, 及不能兵到租界, 如果是眞, 似亦無碍也)”²⁶⁾ 고 하였다. 梁綸卿과 일맥상통하는 무국적의 商人的 시각이라 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26) 譚傑生→梁綸卿, 1894.5.27. 『同順泰往復文書』 19卷.

【첨부 자료】

A. 산동방과의 경쟁

A-1

山東幫의 비단이 많이 와서 생각건대 (우리 물건의) 회전이 어려울 것 같다(「東幫疋頭多來, 料難得回好也」). [譚]晴湖 字 → 譚傑生(啓者/傑生三弟 看), 1894.1.21. 『同泰來信』 5卷.

A-2

金砂는 (상해에서 주신) 전보를 받은 후에 시가에 따라 (조선에서) 매입하려했는데, 산동인들이 (동전) 160吊에서 165吊까지 가격을 올려놓는 바람에, (은량) 37량까지는 불려야 매입할 수 있습니다. 보내주신 전보의 (은량) 36.2량으로는 이문이 맞지 않으므로, 감히 무리하여 매입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요 이틀 사이 산동인이 잠시 (금사 구입을) 중단하고 있으므로, 가격이 7吊나 8吊쯤 떨어질 지도 모르겠습니다.(金砂自接電後, 本欲照市而作, 但山東人由160吊搶至165吊, 要打至37匁方能承本, 照來電36.2匁亦不合寸, 故不敢強作....近兩日山東人暫止手, 價則跌7.8吊未知.) (譚傑生→梁綸卿, 1894.2.5. 『同順泰往復文書』 14卷)

A-3

말씀하시는 각 화물을 서울에 돌려보낼 건에 대해서는, 어제 山東人의 화물이 많아서 앞다투어 [배에] 선적한데다가, 本號에는 인력이 모자라는 바람에 아직 선적하지 못했습니다 (詳付各貨返漢, 因昨日山東人貨多奪裝, 于本号人力不及, 所以未能裝上)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21. 『同泰來信』 5卷.

A-4

24일(음력 1894년 2월 24일)과 28일에 미선이 모두 6척 약 6-7만 석 가량이 (인천에) 도착하여 해관 부두에 쌓인 것이 산과 같은데, 일본인은 기다리고 사지 않으니, 아마도 (쌀값이) 크게 떨어질 것 같다. 본호에서 방출한 3천 포는 매 일본 斗에 6.5毛이니, 이문을 따져 보면 남는 것이 없다. 왜냐하면 상해에서 산동인들이 대거 쌀을 구매하는 바람에 매매가가 2모로 올랐고, 인천은 가격이 3모 내외로 떨어졌으니, 정말 양쪽으로 다 수지가 맞지 않는다.(廿四至廿八日共到米船六艘, 約六七萬石之譜, 海關碼頭堆積如山, 日本人縮手未買, 料有大跌之勢. 本號放出三千包, 每日斗6.5毛, 核寸無利, 因上海山東人湧辦立起價二毛, 仁川跌價三毛外, 真是兩頭不化寸) 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A-5

이번에 온 쌀은 맵쌀과 찰쌀을 불문하고 入價가 다 비싼데, 왜냐하면 상해에서 산동인들이 다투어 구매하는 바람에 1석 당 약 1모씩 올랐고, 영국 파운드화도 비쌌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置本을 작성해 보면 지난 번 보다 入價가 비싸다. 하지만 물건은 질이 좋으니, 17吊까

지 가격을 올릴 수 있을 지도 모르겠고, 혹은 지난 번 가격인 16.5吊라도 역시 팔도록 해라. 이문을 따져보아도(核寸) 여전히 남는 것이 있으므로 빨리 팔아치우는 것이 상책이니, 쌓아두고 비용이 나가는 것은 면해야 한다. 만약 조선인들이 다시 가격을 깎으려 하면 잠시 물건을 가지고 있고 그들이 사지 않는 것을 걱정하지 마라. 생각건대 조선 참쌀도 이 정도 가격이다. 주의하도록 하라.(今水所來之米, 無論大米粘米, 入價均貴, 因在申山東人湧办, 故每石立升一毛外, 且英洋亦貴也. 故列置本, 比前幫, 入價高矣. 但貨頗佳, 未知加板17吊否, 或扳回前盆16.5吊, 亦要放之. 因核寸仍是有利, 以早脫爲上, 免至擱下耗息 或朝人再殺價, 則暫守之, 不憂其不買, 料朝粘米有如此之相宜也. 祈會意焉)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참쌀은 원래 판로가 넓지 않아 소량을 가져오면 높은 이익을 얻을 수 있는데, 지금 산동인들이 참여하여 쌀을 구매해오니 부화뇌동하여 많이 가져와 안 팔리고 쌓이는 우환이 생길까 방비하고 있습니다.(粘米原是銷流不廣, 如少到則利得厚利, 今山東人入手則办米, 防雷同多到, 則有久責之患)譚傑生→梁綸卿, 1894.2.10. 『同順泰往復文書』 15卷

A-6

듣기로 이들(산동인)은 (일본)우선회사와 협의하여 쌀 10만 포를 선적할 수 있는 品川丸을 세내어 인천에 오면 쌀을 싣고 오사카로 가기로 하였는데, 운반비는 1포 당 5毛(=0.5元)라고 한다. 어제 저녁에 이 회사(=일본우선회사)가 그들[산동인 5,6개 상점]을 大佛亭으로 초대하여 술을 마셨다고 하니, 아마 틀림없을 것이다. (聞得伊與郵船會社, 租品川丸[可裝10万包]來仁裝米去大阪, 水脚每石五毛寸, 昨晚該會社請他[山東人五六家]到大佛亭飲酒, 料必不錯也)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 『同泰來信』 6卷.

A-7

산동인은 네 상점이 합하여 일본인에게 쌀 2만포를 팔았는데, 그저께 이미 협상하여 5천포만 팔기로 하고, 계약금은 (위약에도 불구하고) 약정대로 받지도 못했던 데다가 나머지 1만 5천포는 아예 없던 일로 하고 일을 마쳤으니, 산동인 들이야말로 양보의 극치라고 하겠다.(山東人合四家賣與日本人米貳萬包, 前日已講妥○○出五千包, 定銀照寸不能罰, 餘一萬五千包, 不要作爲了事, 山東人可謂相就之極也)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 『同泰來信』 6卷.

A-8

怡泰號가 義生盛을 대신해서 米照 110장을 수령한 것은, 아마 필시 山東人이나 일본인이 부탁해서 한 것인데, 4월말이 지나도 인천해관에서 관세를 받을 지 어떨지는 알 수 없다. 만약 관세를 징수한다면, 아마 이문이 남지 않을 것이다.(所詳怡泰代義生盛領米照壹百十張, 料必山東人或日本人托办, 未知過四月底到仁海關要收稅否耳. 如果要實稅, 似亦不化寸也)

譚傑生→邵蘭圃,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A-9

糖姜은...이미 汕頭의 거래처에 편지를 써서 구매를 부탁했으니, 만약 (물건이) 상해에 도착하면 바로 (인천으로) 부쳐주십시오. 현지에서 구매를 하면 어쨌든 연태에서 사오는 것보다 나을 것이니, 아마도 산동방에 대적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糖姜...致信托汕友作办, 如到申即轉付下, 諒在地头作办, 總宜于在烟台办來, 料可與山東幫敵手矣)譚傑生→梁綸卿, 1894.2.5. 『同順泰往復文書』 14卷

A-10

糖姜은 조선에서 잘 팔려 산동인이 많이 취급했는데, 우리 상점은 거래처에 부탁하여 (산두) 현지에서 구매해 오므로, 어쨌든 연태에서 오는 화물에 비해서 유리할 것입니다. (4溫車糖下船, 祈即付下, 此是通行之物, 從少而作, 不憂無銷路也. 糖姜朝地多行, 山東人多作, 我號托友在地头作办, 總比烟台來貨相宜) 譚傑生→梁綸卿, 1894.3.3. 『同順泰往復文書』 16卷

B-1

永泰輪船帶上信壹函, 并銀壹箱, 內計日洋壹千四百六十二元九角三分(1362.93元), 札紙壹百五十元(150元), 共1612.93, 此箱有火漆印封固, 計關照蘭圃兄帶提单, 往龙山驗收可也. 所代收十八次仁關借款, 原是2592.19元, 今在仁用去九百餘元, 祈在漢買洋錢, 或札紙補足, 乃送去. 千祈不可延後, 免至他再追討也. 今列上總署賬房、龙署賬房各单一紙, 祈打圖章, 連銀一應送去, 就是. 通惠公司昨年借總署洋貳千九百八十元(2980元), 每月行息一分寸, 虽立单是寶銀, 他原是交洋錢來, 況我前有明提公司無元寶進出, 將來亦是還洋錢耳. 況現時公司無洋錢存, 須俟收得鄭秉下船價, 方能清還也. 總署尙存本號庫平銀四千匁, 如果三月底緊用要提去多少, 或尽提去, 須早日關照, 以得及早預備, 便無失悞也. (譚傑生→○泉亨, 1894.2.26. 『同泰來信』 5卷.)

B-2

인천 해관을 대신해 받은 돈이 시일이 경과된 지 오래되어, 날짜에 맞추어 總署 賬房에 보내야하므로 다시 연기할 수 없다. 만약 금액이 부족하고 약간 모자라면, 하루 이틀 늦추어 채워 넣으면 된다. 내일 산동신국에 부탁해서 4백 원을 부칠 것이니, 보충해 쓰도록 해라. 오늘 오후 海關 信箱에 부탁해서 부치려고 했으나 해관의 배달은 야간에 이뤄지므로 안전하지 못한 것 같아 마음을 놓을 수 없었다(代收仁關揭款經已日久, 祈早日送去總署賬房, 不可再延, 如果不够交, 尙欠若干, 或遲一二日, 找足亦可, 准明日托山東信局帶上四百元, 以備交用. 今午本欲托海關信箱帶上, 因海關帶信夜行, 似不穩陣, 故不放心也)譚傑生→邵蘭圃, ○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B-3

오늘 劉 仁川領事가 말하기를 袁大人(=원세개)로부터 전보가 와서 본호에 미선이 인천으로 왔는지를 묻고, 그(=원세개)에게 (송금받아야 할) 공금 2만 량이 있으니, 본호에게 상해 동태호로 전보를 쳐서, 동태호가 상해 道臺에게 대신 받도록 하라고 했다고 하여. 네가 알았다고 하였다. (今仁川領事劉着去, 云及袁大人有電到, 問本號有米船來仁否, 伊有餉銀貳萬

兩, 着本號打電去申同泰, 代爲向滬道領取, 我已答應他) 譚晴湖→譚傑生, 1894.3.11. 『同泰來信』 5卷.

B-4

袁總辦(원세개)이 江海關(상해 해관) 銀의 수령을 위탁한 일은 申號(=상해 동태호)도 대신 수고를 해주겠다고 허락했으므로, 오늘 王鳴山에게 편지 한 통을 써서 그에게 이 일이 어떻게 수령하게 될 지를 알려주었다. 먼저 그 영수증을 작성하여 인천으로 보내 다시 상해로 부쳐 대신 수령하도록 해라.(袁總辦委收江海關之銀, 申號亦允代勞, 今交王鳴山信壹函, 亦告知他此事如何有收, 祈先將此單付仁轉寄去申代收. 至于與其訂合同, 要蓋圖章, 千祈不可亂爲, 防有上當. 但推不能做主便合矣. 他亦不能怪汝也)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2. 『同泰來信』 6卷.

B-5

領事 唐紹儀가 오늘 배로 (상해에서) 고베로 갔는데, 작은 기선이 있는가 보아서 바로 한성으로 간다고 한다. 상해에서 빌려간 은 5백 원은 한성에 가면 돌려준다고 하니, 액수대로 받기 바란다. 또 (고베) 祥隆號에게 편지를 보내 그(당소의)가 얼마나 빌려갔는지 물어보고 알려주기 바란다(唐領事紹儀, 今船去神戶, 看(?)此小火船後, 卽來漢云, 在申借去銀5百元, 云到漢交回, 祈照收. 又致信祥隆招呼, 他有借支多少, 後達.) 梁綸卿→譚傑生, 1894.1.28. 『同順泰往復文書(交貨尺牘)』 1卷

B-6

부쳐온 唐領事(=唐紹儀)의 滙銀信, 袁總理(=袁世凱)의 收銀單은 이미 잘 받았다. 즉시 진동선으로 (상해로) 부치겠다.(所付來唐領事 滙銀信袁總理收銀單 經已收到 卽由鎮東船)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B-7

袁總理(=袁世凱)의 여섯째 동생이 龔欽差의 출사에 수행원으로 가게 되었는데 매일 상해 해관 印冊房에서 安家銀 50匁을 받는데, 袁總理가 상해 동태호에 부탁해서 대신 돈을 받아서 저축해 두었다가 4-5개월 후에 동생이 편지로 알려주면 그 돈을 河南으로 보내달라고 함. 동순태 담걸생은 제가 보건데 그는 장차 이임할 관리이고 또 상해점은 바빠서 거기에 신경 쓸 여가가 없을 것이므로 바로 수차례 거절했습니다. 하지만 그(원세개)는 달리 부탁할 다른 상점이 없다며, 만약 신경이 쓰이고 가게 일에 지장이 있으면 잠시 4-5개월 만 대신 해주면, 그가 8월이나 9월에 溫處道로 부임할 때 상해를 거쳐 가면서 다른 사람에게 처리를 부탁하겠노라고 합니다. 현재 저는 아직 승낙을 하지 않았습시다만, 형님께서 찬성 여부를 바로 알려주시면 답변을 할 수 있겠습니다.(“弟見他將離任之官, 且申號事忙防不暇與其照管, 以直推之數次矣. 他云無別號可托, 如果費神及有沮碍舖事, 則暫行與其代办四五个月, 俟他八九月去溫處道上任, 經由上洋, 再托別人辦理云. 現弟仍未曾答應, 與其代办, 如兄台合意與否, 祈卽示知, 以得回覆.) 譚傑生→梁綸卿, 1894.4.2.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B-8

지금 衙門에서 諭單이 내려와, 華商이 쌀을 다른 부두로 옮기는 것을 불허하고, 조선에서만 팔도록 했습니다만 숙부께서는 어떤 대책이 있으신지 모르겠습니다. 편지로 알려주시기 바랍니다(今因衙門有諭單下來, 不准華商運米往別埠, 准在朝地宜沽之, 未知叔台如何設. 祈即來音示知).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9. 『同泰來信』 5卷.

B-9

합계 쌀 1萬 石의 米照 1백 장이 아직 발행이 되지 않았으면 시일이 늦어지지 않도록 다시 王鳴山과 高潤軒에게 부탁하여 袁憲(袁世凱)을 면담하여 부탁드려 바로 발급받도록 해서, 하인에 주어 인천으로 보내 鎮東船 출발 시간에 맞추어야 하니, 연기되어 일을 그르치지 않도록 하는 것이 중요하다.(領取米照壹百張, 計壹萬石, 如果未曾發出, 防延擱趕之不及, 須再托王鳴山及高潤軒, 面求袁憲, 即之發下, 以得交姑兒帶回仁, 趕付鎮東船, 萬望延遲悞事爲要)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B-10

袁大人(원세개)이 未照를 바로 발급을 해주지 않아 받지 못했다고 했는데, 이 문제는 내가 한성에 돌아간 뒤에 상의하도록 하자(所詳, 袁大人不轉發未照, 當未領就是, 容當回漢商量可也)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B-11

미조는 이미 발행을 중지하여, 산동방이 다시 얻고자 하였으나 수령하지 못했습니다. 본 호는 아문과 잘 알고 지내므로, 한 두 친구의 협력을 얻어 袁總憲(袁世凱)에게 사정하여, 사무실의 손을 거치지 않고 뒤로 발급받았으니, 다른 사람들이 모르도록 하십시오. 지금 이미 수령한 미조 140장을 何英傑兄에게 맡겨 가져가게 했으니, 살펴 받아서 쓰시기 바랍니다.(米照經已止發, 山東幫欲有再取而不能領, 本號相熟衙門, 得力一二友在袁總憲求人情, 不經門房之手, 暗中而取, 不俾別人知也. 今已取使壹百四十張托何英傑兄帶上, 祈查收用) 譚傑生→梁綸卿, 1894.3.16.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대출-1

이흥선(=흥선대원군)의 돈은 만약 그가 보내주면 받아라. 그는 皮藤(?)이기 때문에, 이익을 탐해서는 안 된다(李興善之錢, 如他交來則收之. 因他是皮藤, 不宜貪此利也)譚傑生字 → ○泉亨, 1894.2.27.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2

흥선대원군의 차금은 만약 돈을 다 갚으면 (담보로 잡은) 집문서와 물건을 그에게 돌려주어라. 金叔奇가 전에 빌려 간 은 3백 元의 상환 날짜를 4월 말까지로 미루는 것은 만약 담보가 확실하면 그렇게 해도 무방하다. 洛瑞가 빌려간 은전은 반드시 독촉하여 받아내야

하니 이자에 욕심을 내서는 안 된다. 돈이 없다면 (담보로 잡은) 그 집을 팔도록 해라.(李興善之賸, 如果還清則將屋契及物件, 交還于他. 金叔奇前借去洋三百元, 轉票至四月底止, 如根穩則不防爲之耳. 洛瑞之銀, 須要追收, 不可貪此利, 如無銀則追其賣屋)(譚傑生→○泉亨, 1894.2.26.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3

전보국의 某某가 빌려간 자금은 이번 달 말이 기한이므로 반드시 받아내서 급할 때 써야 하며 다시 이자를 받는다고 시일을 미루어서는 안 된다. 정병하가 덜 낸 물건 대금 및 최봉식의 이자는 만약 아직 가져오지 않았으면 가서 독촉해야 한다. 이후 그의 하인이 와서 외상거래를 하려해도 인정에 얽매어서는 안 되고 현금 거래를 하거나 물건이 없다고 거절하도록 해라.(電報局○○○所借之款, 本月底到期, 須要追收, 以应急用, 不宜再轉利, 鄭秉夏所欠之貨錢及崔鳳植之利, 或未曾交來, 必要去追問, 以後他差人來賒貨, 不宜順人情講, 明現錢或推其無貨亦可也)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4

通惠公司所借之款, 必俟鄭秉夏交船價然後能還總署, 俟我回漢乃商酌, 厲鑑菴前所借之洋, 既已清還本, 俟將來還足利錢然後, 交回揭數于他, 料不防拖欠也. 金益相及崔鳳植所欠之利, 如未交來, 須要及早清收, 免至拖欠, 是爲至要(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通过同顺泰文书所见之近代转换期朝鲜华商的他者认识

姜玟亚 (慶北大學)

〈目 次〉

- 一、韩末华侨的进出与同顺泰号
- 二、同乡意识与国民意识的界线
- 三、在政治与致富之间
- 四、观察清日战争的两重视线

同顺泰是韩末代表性的华商，它在汉城、仁川、全州等地设置分号，并与日本、中国的开港口岸经营贸易。随着东亚贸易网络研究和华侨研究日趋活跃，最近根据首尔大学奎章阁及古文献资料室的同顺泰关联文书(以下简称同顺泰文书)的发现而展开正式的研究。同顺泰文书包括同顺泰号收发的各种收据、发货单以及与各分号和交易处的商业书信，尤其是商业书信中除一般的市场行情以及商业交易情形之外，还详细记述19世纪末华商在朝鲜从事商业活动时所遭遇的与朝鲜人、日本人的矛盾以及官厅的协助及反目等，饶有趣味。从中不仅可以窥见强烈的同乡意识和新萌生的国家意识，而且还可以窥见其对朝鲜内政和国际关系的观察。本文拟重点探讨1894年清日战争前后时期的文书，以求通过同顺泰号的视角考察朝鲜华商的他者认识。

一、韩末华侨的进出与同顺泰号

一般认为，华商正式进出朝鲜是从1882年10月《朝清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缔结以后开始的。1883年3月上海—烟台—仁川航线开通，船只定期往返，华商的进出大增，在人数方面以山东出身者为最多。但是在清日战争前后时期，在经济上势力庞大的反而是广东省出身的华商。其代表性的华商是广东省高要县出身的谭杰生经营的同顺泰号。

朝鲜华侨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也是根据出生地组织为同乡集团，大体分为北帮(山东人、直隶人)、广帮(广东省肇庆府人)、南帮(江浙人)三个集团。虽然在数量上以山东省出身者居多，但是以贸易的中心地仁川而言，1883~1884年在仁川的235个中国商人中，广东籍商人达74人，在资本力方面压倒山东人。同顺泰号经理谭杰生早年就是广帮的首领。同顺泰号以其最大的股东兼交易对象上海同泰号梁纶卿为媒介，与郑观应、唐廷枢等广东香山县出身的买办官僚联系；进一步以他们为媒介与对韩末政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洋务派官僚建立密切的关系。

同顺泰号不仅是韩末最大的华商，而且还展开政治活动，在1892年甚至两次向朝鲜提供借款(第一、第二次同顺泰借款)。该借款事实上是顾虑朝鲜政府忌讳直接从中国政府借款，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上海海关出使经费项目(即驻外清外交官的经费)提供借款、由在朝鲜居留的华侨资本同顺泰号提供名义。以下拟通过如此繁华和强大的同顺泰号华商、特别是其经理谭杰生，考察当时华商眼中所看到的韩末汉城和仁川之群像。

二、同乡意识与国民意识的界线

在同顺泰文书之书信往来中所突出展现的是强烈的同乡意识以及对竞争对手山东帮的警戒。在同顺泰的主业丝绸和金沙领域，根据山东帮的收支状况，仁川和汉城的价格或者下跌或者上升(史料A-1, A-2)，而且围绕着仁川与汉城之间货物的运送问题，有时还展开竞争(史料A-3)。

特别是在1894年，从上海输入中国大米以在朝鲜当地销售或在日本销售的行业盛行，在此过程中与山东帮的竞争生动地见诸文书之中(史料A-4, A-5)。虽然原来清政府禁止大米的输出，但是获悉“属国”朝鲜饥谨，应朝鲜方面和袁世凯请求，李鸿章特别周旋而批准从上海免税输出大米。惟其如此，手续也是特殊的，需要向龙署(设在龙山的汉城业务办公室)申领总署(设在龙山的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袁世凯的官衙)发行的米照(输入许可证)，带到上海由上海道台签章，然后才能输入大米。1894年的米贸易原来是同顺泰号率先开拓的，由于看到利润丰厚的山东帮也投身进来，上海的大米收购价上涨，而在仁川向朝鲜人和日本人的销售价却下跌了。故此，同顺泰号格外注意山东人的动向(史料A-6)。

尽管如此，同顺泰号对山东人具有强烈的优越意识，而这种优越意识堪称源自在市场竞争力方面广帮所拥有的优势地位。朝鲜的广帮以进出上海以及日本各地的广东网络为基础展开活动，因此在获得全东亚的市场情报方面遥遥领先，而且还凭借与广东帮买办资本家等的人际纽带关系，在官界具有雄厚的人脉。所以，山东人不得不让步而突然取消日本人购米的合约，或者以比市场行情低的价格销售(史料A-7, A-8)。同年4月7日，同顺泰仁川分号谭晴湖致信汉城本号的谭杰生称：“今日，日本人有与东帮瑞盛买1000包，共和顺2000包，恒顺昌2800包。每日斗6.2毛，连袋在内，核此价仅可保存。伊不知外埠市，怪不得急于脱手。”同时还称：“周鹤云来求货，我故意详说坂市不好，使其告东帮知，更欲急卖。”由此可见强烈的竞争意识。

与1894年的米贸易不同，还有后发制人而进入山东帮先占领域的情况。糖姜原来是由山东帮从烟台输入而在朝鲜销售的，收益颇好。对此了如指掌的谭杰生寻求从糖姜的原产地汕头直接输入，以确保价格竞争力(史料A-9, A-10)。

在商业上的竞争之外，与山东帮的竞争还表现为与驻朝鲜清国官宪的人脉和自尊心之争。1894年2月25日，到仁川处理事情的谭杰生致信汉城本号称：“本月28日，袁总办考太之生日，料各帮商人到署道喜。祈托古干庭打听山东帮如何，本帮依他一样而为，切不可落人之后也。”再者，同年4月，驻朝鲜清国官宪为了筹集巡捕房建设费用而要求各帮务必提供援助，此时接到消息的仁川分号谭晴湖与谭杰生联系，督促称：“刘领事要缴19年四厘捐之事，如果北帮交去，我广帮不能不交，祈速问过龙山领事。”

对于山东人，广帮称之“山东人”、“东帮”、“山东帮”，一般而言显示了竞争意识和优越意识，而这种意识还投影在所谓“中国人”之用语中，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在前述米贸易中，因向日本船舶公司雇船运载大米之事而就运费展开交涉，这次还是仁川分号职员谭廷赓于2月1日致信谭杰生称：“下午周月松来云，要毫不扣，未知此人心中如何欲？”然而，他们在此后的信中写道：“装米往坂，为本号有米，我当往与日人面斟，不与中国人详知，因此人难靠，亦不用经由于他。”(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些言辞恐怕是针对前述之周月松而言，从称其为中国人可以窥见，当时朝鲜华商的意识中尚无与1905年抑制美货运动时期相同的所谓“中国人”之团结象征。

三、在政治与致富之间

同顺泰与驻朝鲜清国官宪以及朝鲜官宪都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这种纽带关系的内容是多样的，如帮助清国驻朝鲜官宪和朝鲜政府向日本订船，每月从仁川海关代收同顺泰借款之还款并移交袁世凯的总署(史料B-1, B-2)。再如清国供给驻朝鲜官员的公款也是由其代理的，其汇款金额一度达到2万两(B-3, B-4)。在驻朝鲜官员经日本到上海而归国时，也有利用同顺泰交易网络而向其分店乃至交易处借款，尔后再通过其网络还款结算的情况(B-5, B-6)。以上事例显示，在清末不存在国家银行的情况下，它发挥了一种公款管理的银行作用。除这类事例之外，清驻朝鲜官员也有个人的委托事项，如袁世凯六弟的月薪通过汉城同顺泰号委托上海同泰号管理即属此例。然而，顺泰号在1894年4月以袁世凯是行将离任的官员为理由，数次拒绝他的委托事项，这也是饶有趣味的。

同顺泰号还将这种与官界的特殊关系运用于致富。在前述米输出贸易中，同顺泰号看到由于山东帮大举介入，仅仅依靠在仁川向日本人卖米无法获得大的利益，因此提出直接运米到日本销售的构想。原来从上海运来的大米只能在朝鲜销售(B-8)。尽管如此，他委托唐绍仪向袁世凯请求许可大米之输出。亦即，原来从中国运来朝鲜的米是为了解决朝鲜饥馑而特别批准免税输出的，但是自2月开始朝鲜已经因日本的压力而取消大米输出的禁令，日本人将这类大米运到日本获得巨大利益，所谓“分我商人利”是也。惟其如此，中国商人也希望将这类大米卖到日本。袁世凯原来担心“于行规有碍，防中堂知之受责”，此后约定在到达仁川申报输入并提交米照后对运往何处卖给何人一概不管。此后在米照的发放过程中，还向袁世凯请求从速办理手续；在中断正式的米照发放后，则不经正常的程序而特别追加发放(B-9,10,11)。

与此同时，在朝鲜之商业活动的保护方面，对清驻朝鲜官员的评价并不高。谭杰生列举山东人在与日本人交涉中因单方面毁约而遭受损失，致信上海同泰号经理梁纶卿称：“与日人交易，真是反复无信，虽收了定银，将货出去，收清楚银，乃是实事。如揜正道理，与其打官司，而日本官庇护商民，不讲道理，总要占上风。而中国官无才能，办事畏惧，必然吃亏。靠官办事，实不足持。”

尽管如此，在朝鲜活动之华商的大国意识和中国官宪的优势地位对于致富而言决不是毫无用处的。根据同顺泰号朝鲜分号的报告，当时为了镇压东学军而派到朝鲜的中国军队和袁世凯亲兵经常顺便到全州分号询问生意情形，全州分号负责人向谭杰生报告的内容意味深长。其报告称：“前者徐老爷与各袁大人之亲兵，亦有到来本号，问及各事情如何。今丁老爷亦到来本号，闲谈问生意如何，有赊账否。弟对他说，今尚有欠账千余吊，尚未收妥。今得两位老爷到本号来安座闲谈，助本号之威风，朝鲜人多有说及，中国几个大人到来问及我，朝鲜人多有畏惧我之心，弟趁(=趁)此官威追问各欠号，料亦各账好收，亦是东家之鸿福也。”换言之，政治以隐密的方式助致富一臂之力。

四、观察清日战争的两重视线

从1894年阴历4月开始，书信中关于东学军的记事逐渐增多。谭杰生对于东学军的视角是相当好意的，这点值得注意。谭杰生认为：“但朝鲜民心离散，皆因平日官抽剥，积怨日久，故人心思乱。计东学党如此众成，而官兵仅得千余贰千，虽枪炮利便，恐寡不能敌众。”而且还认为：“如果是官逼民变，专与官作对，似于做生意无碍。看有乱民，藉势抢劫，料化为乌有，真是座卧不安，心如刀刺也。”同时表示“但闻东学起旗，至今乃出护国安民，玄徒并无抢劫，所以人心安靖如常，料是真言。因他大书名目与民除害，又未必学流贼之行为。但事不可不防，卜国王未必据然罢手，

防将来交兵，在全州为战场之地，诚是可虑耳。”由此可见，虽然对东学军颇为同情，但是忧虑战争本身对其事业造成的冲击。

与此同时，谭杰生还认为：“但朝鲜王无力量剿灭，必请中国兵来帮助，此乃势所必然。朝鲜是中国属国，亦必发兵来相帮也。但恐东学闻有中国兵到，与中国人为仇敌，并藉端抢劫财物，不可不虑。”诸如此类确证，他认为为了维持事业，必须派兵。出人意料的是，谭杰生将和平解决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称：“袁总理闻国王托其往全作说客，即日已起程，未知是否？他似平日素得朝鲜人心，或可一说即行，均皆安慰也。”即，他确信朝鲜人对袁世凯的评价很高。

到了1894年5月，清军与日军都向仁川和汉城派兵，战云开始密布。此时的书信几乎每日记述各军的详细动向，在谭杰生致交易处陈达生的信中称：“商人恐防受累，真是寝食不安。朝鲜是危乱之邦，日俄久欲占据，中国官场皆是偷安，料无振作之日。怕事以至生事，悲观保护。在仁港(?)做生意，必然受累，弟心亦是恢恢(=灰?)也。”(谭杰生致陈达生，1894年月19日，《同顺泰往夏文书》19卷)

然而，在这种观察朝鲜的优越视线中，最终在商业书信中确认之观察战争的视线是，较诸对于战争本身或祖国清国的忧虑，毋宁说只关注能否维持商业活动和保护家产之彻底的商人视线。在尚未派兵的4月，谭杰生即已经说：“朝鲜国东学乱或有军务米办，如唐领事有事与我商量，祈即行电达知，我即返汉矣，如打电报返汉城。”由此可见，他将战争视为又一个致富的机会。仁川分号的谭晴湖在日本派兵后评估其与中国的战争称：“事见仁汉，均属可忧。本号之米，急欲多付东洋奈何？”要求将可能成为军粮的大米运送日本。上海同泰号的梁纶卿也于22致电汉城劝说避难，并称如果受到财产上的损失，可以向“起事国”请求赔偿，采取到无论如何都与战争双方保持距离的第三者的立场。

在撤回烟台之前留在仁川的谭杰生将财产转移到租界存放，并称：“闻各国云不准在仁汉地方开战，及不能兵到租界，如果是真，似亦无碍也。”这不能不说是与梁纶卿一脉相通的无国籍商人的视角。

【첨부 자료】

A. 산동방과의 경쟁

A-1

山東幫의 비단이 많이 와서 생각건대 (우리 물건의) 회전이 어려울 것 같다(「東幫疋頭多來, 料難得回好也」). [譚]晴湖 字 → 譚傑生(啓者/傑生三弟 看), 1894.1.21. 『同泰來信』 5卷.

A-2

金砂는 (상해에서 주신) 전보를 받은 후에 시가에 따라 (조선에서) 매입하려했는데, 산동인들이 (동전) 160吊에서 165吊까지 가격을 올려놓는 바람에, (은량) 37량까지는 불려야 매입할 수 있습니다. 보내주신 전보의 (은량) 36.2량으로는 이문이 맞지 않으므로, 감히 무리하여 매입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요 이틀 사이 산동인이 잠시 (금사 구입을) 중단하고 있으므로, 가격이 7吊나 8吊쯤 떨어질 지도 모르겠습니다.(金砂自接電後, 本欲照市而作, 但山東人由160吊搶至165吊, 要打至37匁方能承本, 照來電36.2匁亦不合寸, 故不敢強作....近兩日山東人暫止手, 價則跌7.8吊未知.) (譚傑生→梁綸卿, 1894.2.5. 『同順泰往復文書』 14卷)

A-3

말씀하시는 각 화물을 서울에 돌려보낼 건에 대해서는, 어제 山東人의 화물이 많아서 앞다투어 [배에] 선적한데다가, 本號에는 인력이 모자라는 바람에 아직 선적하지 못했습니다 (詳付各貨返漢, 因昨日山東人貨多奪裝, 于本号人力不及, 所以未能裝上)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21. 『同泰來信』 5卷.

A-4

24일(음력 1894년 2월 24일)과 28일에 미선이 모두 6척 약 6-7만 석 가량이 (인천에) 도착하여 해관 부두에 쌓인 것이 산과 같은데, 일본인은 기다리고 사지 않으니, 아마도 (쌀값이) 크게 떨어질 것 같다. 본호에서 방출한 3천 포는 매 일본 斗에 6.5毛이니, 이문을 따져 보면 남는 것이 없다. 왜냐하면 상해에서 산동인들이 대거 쌀을 구매하는 바람에 매매가가 2모로 올랐고, 인천은 가격이 3모 내외로 떨어졌으니, 정말 양쪽으로 다 수지가 맞지 않는다.(廿四至廿八日共到米船六艘, 約六七萬石之譜, 海關碼頭堆積如山, 日本人縮手未買, 料有大跌之勢. 本號放出三千包, 每日斗6.5毛, 核寸無利, 因上海山東人湧办立起價二毛, 仁川跌價三毛外, 真是兩頭不化寸) 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A-5

이번에 온 쌀은 맵쌀과 찰쌀을 불문하고 入價가 다 비싼데, 왜냐하면 상해에서 산동인들이 다투어 구매하는 바람에 1석 당 약 1모씩 올랐고, 영국 파운드화도 비쌌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置本을 작성해 보면 지난 번 보다 入價가 비싸다. 하지만 물건은 질이 좋으니, 17吊까

지 가격을 올릴 수 있을 지도 모르겠고, 혹은 지난 번 가격인 16.5吊라도 역시 팔도록 해라. 이문을 따져보아도(核寸) 여전히 남는 것이 있으므로 빨리 팔아치우는 것이 상책이니, 쌓아두고 비용이 나가는 것은 면해야 한다. 만약 조선인들이 다시 가격을 깎으려 하면 잠시 물건을 가지고 있고 그들이 사지 않는 것을 걱정하지 마라. 생각건대 조선 참쌀도 이 정도 가격이다. 주의하도록 하라.(今水所來之米, 無論大米粘米, 入價均貴, 因在申山東人湧办, 故每石立升一毛外, 且英洋亦貴也. 故列置本, 比前幫, 入價高矣. 但貨頗佳, 未知加板17吊否, 或板回前盆16.5吊, 亦要放之. 因核寸仍是有利, 以早脫爲上, 免至擱下耗息 或朝人再殺價, 則暫守之, 不憂其不買, 料朝粘米有如此之相宜也. 祈會意焉)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참쌀은 원래 판로가 넓지 않아 소량을 가져오면 높은 이익을 얻을 수 있는데, 지금 산동인들이 참여하여 쌀을 구매해오니 부화뇌동하여 많이 가져와 안 팔리고 쌓이는 우환이 생길까 방비하고 있습니다.(粘米原是銷流不廣, 如少到則利得厚利, 今山東人入手則办米, 防雷同多到, 則有久責之患)譚傑生→梁綸卿, 1894.2.10. 『同順泰往復文書』 15卷

A-6

듣기로 이들(산동인)은 (일본)우선회사와 협의하여 쌀 10만 포를 선적할 수 있는 品川丸을 세내어 인천에 오면 쌀을 싣고 오사카로 가기로 하였는데, 운반비는 1포 당 5毛(=0.5元)라고 한다. 어제 저녁에 이 회사(=일본우선회사)가 그들[산동인 5,6개 상점]을 大佛亭으로 초대하여 술을 마셨다고 하니, 아마 틀림없을 것이다. (聞得伊與郵船會社, 租品川丸[可裝10万包]來仁裝米去大阪, 水脚每石五毛寸, 昨晚該會社請他[山東人五六家]到大佛亭飲酒, 料必不錯也)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 『同泰來信』 6卷.

A-7

산동인은 네 상점이 합하여 일본인에게 쌀 2만포를 팔았는데, 그에게 이미 협상하여 5천포만 팔기로 하고, 계약금은 (위약에도 불구하고) 약정대로 받지도 못했던 데다가 나머지 1만 5천포는 아예 없던 일로 하고 일을 마쳤으니, 산동인 들이야말로 양보의 극치라고 하겠다.(山東人合四家賣與日本人米貳萬包, 前日已講妥○○出五千包, 定銀照寸不能罰, 餘一萬五千包, 不要作爲了事, 山東人可謂相就之極也)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 『同泰來信』 6卷.

A-8

怡泰號가 義生盛을 대신해서 米照 110장을 수령한 것은, 아마 필시 山東人이나 일본인이 부탁해서 한 것인데, 4월말이 지나도 인천해관에서 관세를 받을 지 어떨지는 알 수 없다. 만약 관세를 징수한다면, 아마 이문이 남지 않을 것이다.(所詳怡泰代義生盛領米照壹百十張, 料必山東人或日本人托办, 未知過四月底到仁海關要收稅否耳. 如果要實稅, 似亦不化寸也)

譚傑生→邵蘭圃,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A-9

糖姜은...이미 汕頭의 거래처에 편지를 써서 구매를 부탁했으니, 만약 (물건이) 상해에 도착하면 바로 (인천으로) 부쳐주십시오. 현지에서 구매를 하면 어쨌든 연태에서 사오는 것보다 나을 것이니, 아마도 산동방에 대적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糖姜...致信托汕友作办, 如到申即轉付下, 諒在地头作办, 總宜于在烟台办來, 料可與山東幫敵手矣)譚傑生→梁綸卿, 1894.2.5. 『同順泰往復文書』 14卷

A-10

糖姜은 조선에서 잘 팔려 산동인이 많이 취급했는데, 우리 상점은 거래처에 부탁하여 (산두) 현지에서 구매해 오므로, 어쨌든 연태에서 오는 화물에 비해서 유리할 것입니다. (4溫車糖下船, 祈即付下, 此是通行之物, 從少而作, 不憂無銷路也. 糖姜朝地多行, 山東人多作, 我號托友在地头作办, 總比烟台來貨相宜) 譚傑生→梁綸卿, 1894.3.3. 『同順泰往復文書』 16卷

B-1

永泰輪船帶上信壹函, 并銀壹箱, 內計日洋壹千四百六十二元九角三分(1362.93元), 札紙壹百五十元(150元), 共1612.93, 此箱有火漆印封固, 計關照蘭圃兄帶提单, 往龙山驗收可也. 所代收十八次仁關借款, 原是2592.19元, 今在仁用去九百餘元, 祈在漢買洋錢, 或札紙補足, 乃送去. 千祈不可延後, 免至他再追討也. 今列上總署賬房、龙署賬房各单一紙, 祈打圖章, 連銀一應送去, 就是. 通惠公司昨年借總署洋貳千九百八十元(2980元), 每月行息一分寸, 虽立单是寶銀, 他原是交洋錢來, 況我前有明提公司無元寶進出, 將來亦是還洋錢耳. 況現時公司無洋錢存, 須俟收得鄭秉下船價, 方能清還也. 總署尙存本號庫平銀四千匁, 如果三月底緊用要提去多少, 或尽提去, 須早日關照, 以得及早預備, 便無失悞也. (譚傑生→○泉亨, 1894.2.26. 『同泰來信』 5卷.)

B-2

인천 해관을 대신해 받은 돈이 시일이 경과된 지 오래되어, 날짜에 맞추어 總署 賬房에 보내야하므로 다시 연기할 수 없다. 만약 금액이 부족하고 약간 모자라면, 하루 이틀 늦추어 채워 넣으면 된다. 내일 산동신국에 부탁해서 4백 원을 부칠 것이니, 보충해 쓰도록 해라. 오늘 오후 海關 信箱에 부탁해서 부치려고 했으나 해관의 배달은 야간에 이뤄지므로 안전하지 못한 것 같아 마음을 놓을 수 없었다(代收仁關揭款經已日久, 祈早日送去總署賬房, 不可再延, 如果不够交, 尙欠若干, 或遲一二日, 找足亦可, 准明日托山東信局帶上四百元, 以備交用. 今午本欲托海關信箱帶上, 因海關帶信夜行, 似不穩陣, 故不放心也)譚傑生→邵蘭圃, ○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B-3

오늘 劉 仁川領事가 말하기를 袁大人(=원세개)로부터 전보가 와서 본호에 미선이 인천으로 왔는지를 묻고, 그(=원세개)에게 (송금받아야 할) 공금 2만 량이 있으니, 본호에게 상해 동태호로 전보를 쳐서, 동태호가 상해 道臺에게 대신 받도록 하라고 했다고 하여. 네가 알았다고 하였다. (今仁川領事劉着去, 云及袁大人有電到, 問本號有米船來仁否, 伊有餉銀貳萬

兩, 着本號打電去申同泰, 代爲向滬道領取, 我已答應他) 譚晴湖→譚傑生, 1894.3.11. 『同泰來信』 5卷.

B-4

袁總辦(원세개)이 江海關(상해 해관) 銀의 수령을 위탁한 일은 申號(=상해 동태호)도 대신 수고를 해주겠다고 허락했으므로, 오늘 王鳴山에게 편지 한 통을 써서 그에게 이 일이 어떻게 수령하게 될 지를 알려주었다. 먼저 그 영수증을 작성하여 인천으로 보내 다시 상해로 부쳐 대신 수령하도록 해라.(袁總辦委收江海關之銀, 申號亦允代勞, 今交王鳴山信壹函, 亦告知他此事如何有收, 祈先將此單付仁轉寄去申代收. 至于與其訂合同, 要蓋圖章, 千祈不可亂爲, 防有上當. 但推不能做主便合矣. 他亦不能怪汝也)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2. 『同泰來信』 6卷.

B-5

領事 唐紹儀가 오늘 배로 (상해에서) 고베로 갔는데, 작은 기선이 있는가 보아서 바로 한성으로 간다고 한다. 상해에서 빌려간 은 5백 원은 한성에 가면 돌려준다고 하니, 액수대로 받기 바란다. 또 (고베) 祥隆號에게 편지를 보내 그(당소의)가 얼마나 빌려갔는지 물어보고 알려주기 바란다(唐領事紹儀, 今船去神戶, 看(?)此小火船後, 卽來漢云, 在申借去銀5百元, 云到漢交回, 祈照收. 又致信祥隆招呼, 他有借支多少, 後達.) 梁綸卿→譚傑生, 1894.1.28. 『同順泰往復文書(交貨尺牘)』 1卷

B-6

부쳐온 唐領事(=唐紹儀)의 滙銀信, 袁總理(=袁世凱)의 收銀單은 이미 잘 받았다. 즉시 진동선으로 (상해로) 부치겠다.(所付來唐領事 滙銀信袁總理收銀單 經已收到 卽由鎮東船)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B-7

袁總理(=袁世凱)의 여섯째 동생이 龔欽差의 출사에 수행원으로 가게 되었는데 매월 상해 해관 印冊房에서 安家銀 50匁을 받는데, 袁總理가 상해 동태호에 부탁해서 대신 돈을 받아서 저축해 두었다가 4-5개월 후에 동생이 편지로 알려주면 그 돈을 河南으로 보내달라고 함. 동순태 담걸생은 제가 보건데 그는 장차 이임할 관리이고 또 상해점은 바빠서 거기에 신경 쓸 여가가 없을 것이므로 바로 수차례 거절했습니다. 하지만 그(원세개)는 달리 부탁할 다른 상점이 없다며, 만약 신경이 쓰이고 가게 일에 지장이 있으면 잠시 4-5개월 만 대신 해주면, 그가 8월이나 9월에 溫處道로 부임할 때 상해를 거쳐 가면서 다른 사람에게 처리를 부탁하겠노라고 합니다. 현재 저는 아직 승낙을 하지 않았습시다만, 형님께서 찬성 여부를 바로 알려주시면 답변을 할 수 있겠습니다.(“弟見他將離任之官, 且申號事忙防不暇與其照管, 以直推之數次矣. 他云無別號可托, 如果費神及有沮碍舖事, 則暫行與其代办四五个月, 俟他八九月去溫處道上任, 經由上洋, 再托別人辦理云. 現弟仍未曾答應, 與其代办, 如兄台合意與否, 祈卽示知, 以得回覆.) 譚傑生→梁綸卿, 1894.4.2.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B-8

지금 衙門에서 諭單이 내려와, 華商이 쌀을 다른 부두로 옮기는 것을 불허하고, 조선에서만 팔도록 했습니다만 숙부께서는 어떤 대책이 있으신지 모르겠습니다. 편지로 알려주시기 바랍니다(今因衙門有諭單下來, 不准華商運米往別埠, 准在朝地宜沽之, 未知叔台如何設. 祈即來音示知).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9. 『同泰來信』 5卷.

B-9

합계 쌀 1萬 石의 米照 1백 장이 아직 발행이 되지 않았으면 시일이 늦어지지 않도록 다시 王鳴山과 高潤軒에게 부탁하여 袁憲(袁世凱)을 면담하여 부탁드려 바로 발급받도록 해서, 하인에 주어 인천으로 보내 鎮東船 출발 시간에 맞추어야 하니, 연기되어 일을 그르치지 않도록 하는 것이 중요하다.(領取米照壹百張, 計壹萬石, 如果未曾發出, 防延擱趕之不及, 須再托王鳴山及高潤軒, 面求袁憲, 即之發下, 以得交姑兒帶回仁, 趕付鎮東船, 萬望延遲悞事爲要)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B-10

袁大人(원세개)이 未照를 바로 발급을 해주지 않아 받지 못했다고 했는데, 이 문제는 내가 한성에 돌아간 뒤에 상의하도록 하자(所詳, 袁大人不轉發未照, 當未領就是, 容當回漢商量可也)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B-11

미조는 이미 발행을 중지하여, 산동방이 다시 얻고자 하였으나 수령하지 못했습니다. 본호는 아문과 잘 알고 지내므로, 한 두 친구의 협력을 얻어 袁總憲(袁世凱)에게 사정하여, 사무실의 손을 거치지 않고 뒤로 발급받았으니, 다른 사람들이 모르도록 하십시오. 지금 이미 수령한 미조 140장을 何英傑兄에게 맡겨 가져가게 했으니, 살펴 받아서 쓰시기 바랍니다.(米照經已止發, 山東幫欲有再取而不能領, 本號相熟衙門, 得力一二友在袁總憲求人情, 不經門房之手, 暗中而取, 不俾別人知也. 今已取使壹百四十張托何英傑兄帶上, 祈查收用) 譚傑生→梁綸卿, 1894.3.16.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대출-1

이흥선(=흥선대원군)의 돈은 만약 그가 보내주면 받아라. 그는 皮藤(?)이기 때문에, 이익을 탐해서는 안 된다(李興善之錢, 如他交來則收之. 因他是皮藤, 不宜貪此利也)譚傑生字 → ○泉亨, 1894.2.27.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2

흥선대원군의 차금은 만약 돈을 다 갚으면 (담보로 잡은) 집문서와 물건을 그에게 돌려주어라. 金叔奇가 전에 빌려 간 은 3백 元의 상환 날짜를 4월 말까지로 미루는 것은 만약 담보가 확실하면 그렇게 해도 무방하다. 洛瑞가 빌려간 은전은 반드시 독촉하여 받아내야

하니 이자에 욕심을 내서는 안 된다. 돈이 없다면 (담보로 잡은) 그 집을 팔도록 해라.(李興善之賸, 如果還清則將屋契及物件, 交還于他. 金叔奇前借去洋三百元, 轉票至四月底止, 如根穩則不防爲之耳. 洛瑞之銀, 須要追收, 不可貪此利, 如無銀則追其賣屋)(譚傑生→○泉亨, 1894.2.26.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3

전보국의 某某가 빌려간 자금은 이번 달 말이 기한이므로 반드시 받아내서 급할 때 써야 하며 다시 이자를 받는다고 시일을 미루어서는 안 된다. 정병하가 덜 낸 물건 대금 및 최봉식의 이자는 만약 아직 가져오지 않았으면 가서 독촉해야 한다. 이후 그의 하인이 와서 외상거래를 하려해도 인정에 얽매어서는 안 되고 현금 거래를 하거나 물건이 없다고 거절하도록 해라.(電報局○○○所借之款, 本月底到期, 須要追收, 以应急用, 不宜再轉利, 鄭秉夏所欠之貨錢及崔鳳植之利, 或未曾交來, 必要去追問, 以後他差人來賒貨, 不宜順人情講, 明現錢或推其無貨亦可也)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4

通惠公司所借之款, 必俟鄭秉夏交船價然後能還總署, 俟我回漢乃商酌, 厲鑑菴前所借之洋, 既已清還本, 俟將來還足利錢然後, 交回揭數于他, 料不防拖欠也. 金益相及崔鳳植所欠之利, 如未交來, 須要及早清收, 免至拖欠, 是爲至要(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同順泰文書を通して見た近代轉換期の朝鮮華商の他者認識

カン・ジナ（慶北大学校史学科助教授）

同順泰号は、漢城（ソウル）、仁川、全州など国内各地に支店を置き、日本、中国の開港場と貿易業を經營した韓末の代表的な華商である。東アジア貿易ネットワーク研究と華僑研究の活性化に伴い、ソウル大学校奎章閣と古文獻資料室の同順泰号関連文書（以下、同順泰文書と略称）の発掘により、最近本格的な研究が始まった。同順泰文書は、同順泰号に送られてきた各種領收証、發送状と各地点および取引先との商業書信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が、特に商業書信には、一般的な市場の状況や商取引に関する情報以外にも、19世紀末、華商が朝鮮で商行為を営みながら朝鮮人や日本人と衝突したさまざまな葛藤や、官庁との協調および反目なども詳しく記述されていて興味深い。その文書からは、強硬な同郷意識や初期的な国家意識だけではなく、朝鮮の内政と国際関係に関する観察もうかがうことができる。今回の発表では、1894年の清日戦争を前後する時期の文書を重点的に検討し、同順泰号の視線を通して朝鮮華商の他者認識を明らかにする。

1. 韓末華僑の進出と同順泰号

朝鮮に華商の進出が本格化したのは一般的には1882年10月の朝清商民水陸通商章程の締結以後だとされている。1888年3月から上海—烟台—仁川路線が開通され、定期船が運航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と、華商の進出は大きく増え、なかでも数的には山东省出身者が最大だった。しかし清日戦争を前後する時期に経済的に勢力が大きかったのは、むしろ广东省出身の華商たちだった。その代表的な華商が广东省高要県出身の譚杰生が運営する同順泰号である。

朝鮮の華僑も他の地域の華僑同様に、出身地ごとの同郷集団を組織したが、大きく北幫（山東、直隸出身）、廣幫（广东省肇慶府出身）、南幫（江浙出身）の3グループがあった。数としては山东省出身者が多かったが、貿易の中心地である仁川の場合、1883-1884年の仁川所在中国商人235名中、廣東籍の商人が74名にもなり、資本力で山东省人を圧倒した。同順泰号經理の譚杰生は早くから廣幫のリーダーだった。同順泰号は最大株主であると同時に取引先である上海同泰号の梁綸卿を媒介にして鄭觀應、唐廷樞など廣東香山县出身の买办官僚と連携しており、また、さらにこれらを媒介にして、韓末、中国の韓国政策に大きな影響力を行使していた洋务派官僚と緊密な関係にあった。

同順泰号は韓末最大の華商だっただけでなく、1892年、2回にわたって朝鮮に対する借款を供与するなど政治的な活動も展開した（1、2次同順泰借款）。この借款は実は、中国政府から直接借款を受けることをはばかった朝鮮政府を考慮して、実際には上海の中国海關の出使經費項目（すなわち外国に駐在する清国の外交官の經費）から借款を提供し、朝鮮居留の華僑資本である同順泰号が名义を提供したものだった。このように派手な経歴をもつ同順泰号の成員、特に經理の譚杰生を通じて、当時の華商の眼に映った韓末の漢城と仁川の群像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だった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2. 同郷意識と国民意識の境界

同順泰文書の手信往来にはっきり表れているのは、強烈な同郷意識と競争相手であった山東幫に対する警戒であった。同順泰の主力業種である絹、金砂において、山東幫の需給状況に伴って仁川と漢城での価格が下落したり上昇したりし（史料A-1、A-2）、仁川—漢城間の貨物の船積をめぐっても時には競争が起こった（史料A-3）

特に、1894年には中国米を上海から輸入してきて、朝鮮現地で売ったり、日本で売ったりする事業が盛況だったが、この過程での山東幫との競争は生々しく文書に表れている（史料A-4、史料A-5）。もともと清朝は米の輸出を禁止してきたが、「属国」である朝鮮に飢饉が起こると、朝鮮側と袁世凱の要請により、李鴻章が特別に周旋して上海から無関税で米を輸出することを許可したのである。それだけに手続きも特殊であり、总署（龍山にあった总理朝鮮通商交渉事宜袁世凱の執務處）で許可、発行した米照（輸入許可証）を龍署（龍山にあった漢城の業務事務處）で申請、受領して上海へ持って行き、上海の道台で印章を受けてはじめて米を輸入することができた。1894年の米貿易はもともと同順泰号が先立って開拓したが、利潤が大きいのをみて山東人たちも参入したため、上海の米購入価格は高騰し、仁川で朝鮮人や日本人に売る値段は下落した。したがって同順泰号は山東人の動向を鋭意注視していた（史料A-6）。

にもかかわらず、同順泰号は山東人に対して強い优越意識をもっていたが、このような优越意識は市場競争力で廣幫がもっていた上位から生まれるものでもあった。朝鮮の廣幫は上海をはじめ、日本各地に進出した廣東ネットワークを基盤に活動していたので、東アジア全般の市場の情報を入手することで上位に立っていたし、廣東籍の買弁資本家たちとの人的紐帯によって官僚にも厚い人脈を誇っていた。したがって山東人は、日本人が米の購入を急に取り消す違約を起こしても让步をするしかなかったり、価格も相場より低く売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りした（A-7、A-8）。その年の4月7日に同順泰仁川支店の譚晴湖は、漢城本号の譚杰生に送った手紙で、「今日、日本人が、山東幫の瑞盛（号）から1千包、共和順から2千包、恒順昌から2,800包を買ったが、日本の斗で6.2毛（=0.62元）で、炮台まで含んだ価格である。この価格では元金を維持するのがやっとなのに、彼ら（山東幫）は海外の開港場市況を知りえないので、すぐに売ってしまおうとすることもおかしい話ではない（今日日本人有与東幫瑞盛買1千包、共和順2千包恒順昌2800包毎日斗6.2毛、連袋在內核、此價仅可保存、伊不知外埠市、怪不得急於脱手）」と言っ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周鶴云が来て、貨物の船積みを寻ねるので、私はわざわざ詳細に大阪の市況が良くないように言い、彼が山東幫に伝えるようにして、（彼らが）さらにもっと急いで品物を売るようにした（周鶴云来求貨價 我故意詳說坂市不好、使其告東幫知、更欲急賣也）」と付け加えており、強い競争意識を示している。

1894年の米貿易とは異なり、山東幫が先行して獲得している分野に後発として進出する場合もあった。糖姜は、もともと山東幫が、烟台で購入して朝鮮に売っていたが、収益が高いことがわかったと、譚杰生は糖姜の原産地である汕頭からの直接購入を試み、価格競争力を確保した（A-9、A-10）。

事業上の競争以外にも、山東幫との競争は、朝鮮駐在清国官憲との人脈や自尊心の争いとしても現われた。1894年2月25日、仕事の処理で仁川へ来ていた譚杰生が漢城本号に送った手紙では、「今月28日が袁总弁（=袁世凱）の夫人（老太）誕生日だが、思うに、各幫の商人も总署（袁世凱の執務先）に行ってお祝い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古干庭に依頼して、山東幫がどのようにするのか尋ねてみて、本幫も彼らと同様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ず、絶対人後に落ちてはなりません（本月廿八日、袁总办考太之生日、料各幫商人、到署道喜、祈托古干庭、打听山東幫如何、本幫依他一样而为、切不可落人

之後也)」と述べている。またその年4月には、朝鮮駐在清国官宪から、各幫に巡捕房の建設費用のために財源を捻出するよう連絡があったが、このとき連絡を受けた仁川支店の譚晴湖は廣幫責任者であった譚杰生に連絡し、「劉領事が、（光緒）19年、四厘捐を出しなさいとしたことは、もし北幫が出したら、われわれ廣幫は出さ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ので、速やかに龍山領事に尋ねるように（劉領事要十九年四厘捐之事、如果北幫交去、我廣幫不能不交、祈速问过龍山領事）」と督促している。

山東人に対し、「山東人」、「東幫」、「山東幫」と指称しながら、概して競争意識と优越意識を表しているが、このような意識は「中国人」という用語にも投影されている点が注目される。米の先物貿易で日本の船舶会社に米を積載して神戸へ行かせる事案で、運搬費交渉が繰り返されるが、やはり仁川支店店員である譚廷賡は、譚杰生に送った2月1日の手紙で、「午後、周月松が来て話すには、絶対に引き留めないようにと言うので、この人は心の底で何を望んで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下午周月松来云、要寔不扣、未知此人心如何欲）」と述べている。ところが2日後に送った手紙では、「米を大阪へ送ることは、本号に米があるので、私が直接日本人と会って相談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なので、中国人には詳しく知らせてはなりません。その人柄が信じがたいので、やはり彼を経由して処理しないのが良いです（装米往坂、为本号有米、我当往与日人面斟、不与中国人详知、因此人难靠、亦不用經由他）〔下線は引用者による強調〕」と書いている。おそらく前記の周月松を示す言葉であるが、彼を中国人と呼んだことからわかるように、当時の朝鮮华商の認識において「中国人」というのは、1905年のアメリカボイコット運動のときのように団結の象徴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をうかがうことができる。

3. 政治と致富のあいだ

同順泰は、朝鮮駐在の中国官宪および朝鮮官宪すべてと緊密な人的紐帯を結んでいた。その紐帯の内容は多样だが、清の駐在官宪と朝鮮政府を手助けして日本へ船舶を注文することを助けもし、同順泰借款の毎月の償還金を仁川海関で代理受領し、袁世凱の总署に渡すことをしもした（B-1、B-2）。また清本国から朝鮮駐在官に送る公金も代行をし、その送金金額が一度に2万兩にもなる事例もある（B-3、B-4）。朝鮮駐在官たちは、日本経由で上海を通して帰国する場合、同順泰号の取引ネットワークに従い、その支店ないし取引先で借金し、後に償還もそのネットワークに従って決済される事例もある（B-5、B-6）。以上の事例は、清末の国家銀行が不在な状況において、一種の公金管理の銀行の役目をした場合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場合以外にも、清の駐在官たちは個人的な請托もした。袁世凱の6番目の弟の月給管理を、漢城同順泰号を通じて上海の同泰号に依頼した事例がそれであるが、ここで同順泰号は1894年4月時点で袁世凱がまもなく離任する官吏であるという理由で彼の請托を何回も断っている点も興味深い（B-7）。

同順泰号はこのような官との特殊な関係を致富にも活用した。米の先物輸出で、同順泰号は仁川で米を日本人に売るだけでは、山東幫が大挙して参加することで大きい利益を得られないと見るや、日本に直接持って行って売ることを構想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ともと上海から来た米は朝鮮でだけ売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B-8）。しかし彼は、唐紹儀に頼んで袁世凱に米の輸出を承諾してくるよう頼んだ。すなわち、もともと中国から朝鮮へ来る米は、飢饉を解消するために特別に免税輸出の許可をしたものであるが、2月から、すでに朝鮮は日本の圧力によって米の輸出を解禁し、日本人たちがこの米を日本に持って行って大きい利益を得ているので、「中国商人の利益を分けて持っている（分

我商人之利」という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中国商人も日本にこの米を売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頼んだのであった。袁世凱は、もともとは「規則を违え、それが李鴻章に知られれば問責を受けるが(于条規有碍、防中堂知之受責)」、仁川に到着して輸入を報告し、米照を提出した後では、どこへ行って誰に売っても関係ないと約束してやった。以後、米照の发给过程でも手続きを早めるように袁世凱に请托したり、公式に米照の发给を中断した後にも正式な手順を踏まずに特別追加发行を受けたりしている(B-9、10、11)。

そうはいても、朝鮮での商业活动の庇护という面で清駐在官に対する評価はあまり高くなかった。山东人が日本人との交易で一方的な破棄によって損害を被ったことをめぐって、譚杰生は上海同泰号の經理である梁綸卿に送った手紙で、「日本人と交易すれば、契約をひっくり返すのが常で、信用がありません。たとえ契約金をもらい、品物が出て金銭も確かにもらったので确实な取引だったというが、もし道理をただそうと日本人に訴訟を起こしたら、日本の官吏は、民众を庇护し、道理をたださず、結局优势を占めるのに対し、中国の官吏は仕事の処理に无能で、臆病で、(訴訟を起こせば)必ず損害を被るようになるので、官を信じて仕事をするのは実に不安です(与日人交易、真是反覆无信、虽收了定銀、将货出去、收清楚銀、乃是实事、如揜正道理、与其打官司、而日本官庇护商民、不讲道理、总要占上风、而中国官无才能办事畏惧、必然●[贝+舌]亏、靠官办事、实不足持)」と述べている。

ところが、朝鮮で活动する华商の大国意識と中国官憲の威勢は決して致富に寄与し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かった。同順泰号朝鮮支店の報告書で、当時东学軍を押えるために派遣された中国軍と袁世凱親兵が全州支店によく立ち寄って商売について尋ねていたが、これを全州責任者が譚杰生に報告する内容は意味深長である。「以前、徐殿と袁大人(=袁世凱)の多くの親兵も当商店へ来て、さまざまな状況について尋ねていました。いま、丁殿(=丁得鵬)もやはり当商店へ来て杂谈をしながら、商売がどうか、未收金があるのか尋ねていました。私は彼に今でもまだ借金が千余りの吊があるが受け取っていないと言いました。今度、二人の下士官が当商店へいらして、座って杂谈をしていくことが当商店の威风を高める助けになりました。朝鮮人たちが、中国の位の高い人が何人も来て私に(あれこれ)尋ねていったと盛んに話し、朝鮮人たちが私をおそれる気持ちが大きくなりました。私はこの官庁の威勢を借り、つけをした各商店に督促するつもりなので、おそらく未收金もよく集まるでしょう。これはやはり东家(株主、ここでは漢城同順泰)の鴻福です(前者徐老爺与各袁大人之親兵、亦有到来本号、问及各事情如何、今丁老爺亦到来本号、間談問生意如何、有賒賑否、弟对他说、今尚有欠賑千余吊、尚未收妥、今得两位老爺到本号来、安座間談、助本号之威风、朝鮮人多有说及、中国几个大人到来问及我、朝鮮人多有畏惧我之心、弟趁(=趁)此官威追问各欠号、料亦各賑好收、亦是东家之鴻福也)」。すなわち間接的な方式で政治は致富に寄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

4. 清日戦争を見通す二重の指針

1894年陰历4月からは、书信にますます东学軍に関する記事が増えた。东学軍に対する譚杰生の視角は、とても好意的であるという点が注目される。譚杰生は、「朝鮮の民心が離れていったのは、みな平素の官吏の榨取によって怨恨が積もって久しいからであり、したがって人心が反乱を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思うに 东学党がこのように信者が多くなったが、官兵はやっと千、2千にすぎないので、たとえ銃炮の优势が助けになると言っても、おそらく众寡敌せずであろう(但朝鮮民心离散、皆因平日官抽剥积怨日久、故人心思乱、计东学党如此众成、而官兵仅得千余二千、虽枪炮利便、

恐寡不能敌众)」と見ていた。また、「官の圧迫により民変が起きたとするなら、もっぱら官を相手にして商売する者たちには害がなさそうだが、見ると、难民たちが勢を頼んで掠奪をすれば何も残らなくなるだろうから、本当に居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ず、心が刀で突かれるようだ（如果是官逼民变、专与官作对、似于做生意无碍、看有乱民、藉势抢劫、料化为乌有、真是座卧不安、心如刀刺也）」としながらも、「聞くところ、东学は旗印を掲げるのを今までも护国安民を立て、これらの公正な连中は決して掠奪をしなくて人心が平常時のように安らかだというので、もしこれが事実なら、彼らは民とともに害悪をとり除くとして、大きく名分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はらずであり、また流賊の行為を学ぶこともないであろう。しかし仕事というものは、備え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私の考えに国王が呆然と手をこまねいてはしないだろうから、将来全州で战斗が起きて战场になるなら本当に心配である（但闻东学起旗、至今乃出护国安民、玄徒并无抢劫、所以人心安靖如常、料是真言、因他大书名目与民除害、又未必学流贼之行为、但事不可不防、卜国王未必据然罢手、防将来交兵在全州为战场之地、诚是可虑耳）」といて、东学军に対してはかなり同情的だが、戦争自体が事業にもたらす影響を忧虑していることをうかがうことができる。そうはいっても、譚杰生は、「朝鮮王は东学を讨伐する力がないので、必ず中国に兵士を要請して援助を求めるはずだから、これは必然的な形勢である。朝鮮は中国の属国なので、やはり必ず兵士を派遣して援助して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し东学は、中国兵士が来ると聞けば中国人を仇に思い、これにかこつけて財物を掠奪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心配し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但朝鲜王无力量剿灭、必请中国兵来帮助、此乃势所必然、朝鲜是中国属国、亦必发兵来相帮也。但恐东学闻有中国兵到、与中国人仇敌、并藉端抢劫财物、不可不虑）」として、事業の維持のためにも必ず派兵に至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さまざまところで確信していた。驚くべきことに、譚杰生は平和解決の希望を袁世凱にかけており、「聞くところ、国王が袁总理（＝袁世凱）に全州に行って（东学党を）说得をしてくれるよう依頼し、その日にすでに旅立ったというが、本当なのかはわからない。彼（＝袁世凱）は、普段非常に朝鮮人の人心を得ているから、もし一度游説をし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みなが安心するでしょう（袁总理闻、国王托其往全作说客、即日已起程未知是否、他似平日素得朝鲜人心、或可一说即行、均皆安慰也）」と述べており、袁世凱に対する朝鮮人の評価が高いと確信していた。

1894年5月（阴历）になると清軍と日本軍がみな仁川と漢城に派兵し、まさに戦雲が漂い始めた。この時の书信には、ほとんど毎日各軍の詳しい动向が書かれているが、譚杰生は取引先の陈达生に送った手紙で、「商人たちはこんな事態にかかわって被害を被るか気がかりで、本当に寝食も心細いです。朝鮮は反乱が多くて危ない国であり、日本とロシアが長い間占据しようと狙ったが、中国官僚たちはみな安乐だけを貪ったから、思うに中国が再び一安心する日が来ることはなさそうです。ことが事件の端緒にまで至ったから、仁川で商売するのに保護を受けることにも悲観的で、必ず巻き添えを食らって被害を被るであろうから、私の心もやはり真っ黒く苛立ちます（商人恐防受累、真是寝食不安、朝鲜是危乱之邦、日俄久欲占据、中国官场皆是偷安、料无振作之日、事以至生事、悲观保护在仁港(?)做生意、必然受累、弟心亦是恢恢（＝灰?)也）」と述べている。ところで朝鮮を眺めるこのような优越的視線のなかでも、商業书信で結局確認される戦争を眺める視線は、戦争自体や本国である清に対する心配よりは、ひたすら商業活動の維持の可否や家産の保護という徹底した商人の視線だった。派兵に至っていない4月でも譚杰生は、「朝鮮国の东学乱で、もし军务として米を調達する仕事があって、唐领事（＝唐绍仪）が出て相談することがあったら、直ちに電報を打って私に知らせなさい。電報を打てば漢城に帰る（朝鮮国东学乱或有军务米、如唐领事有事与我商量、祈即行电达知我、即返汉矣如。打电报返汉城）」として、戦争をまた一つの致富の機会と見通した。仁川支店の譚晴湖は、日本が派兵すると中国との戦争を占いながらも、「戦争が仁川と漢城で开かれれば本当に心

配なことである。本号の米は至急日本へ大量に送ることはどうなのか（事見仁汉、均属可忧、本号之米、急欲多付东洋奈何）」として、军粮米になりうる米を日本に移すようにした。上海の同泰号の梁纶卿もやはり22日、汉城へ电报を送って避难を劝めながら、もし财产上の损失が生じれば、「問題を起こした国（起事国）」に赔偿を请求するとして、あくまでも战争当事者の双方と距离を置いた第三者の立場をとった。

烟台へ撤収する直前、仁川に残っていた谭杰生は财物を租界内に移しながら、「聞くところでは、各国（＝各国公使）は、仁川と汉城では战斗をすることを许さず、兵士を租界へ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たというので、もしそれが事実なら大きな問題はないだろう（闻各国云不准在仁汉地方开战、及不能兵到租界、如果是真、似亦无碍也）」と述べた。梁纶卿と一脉相通する无国籍の商人的视角とせざるをえない。

【첨부 자료】

A. 산동방과의 경쟁

A-1

山東幫의 비단이 많이 와서 생각건대 (우리 물건의) 회전이 어려울 것 같다(「東幫疋頭多來, 料難得回好也」). [譚]晴湖 字 → 譚傑生(啓者/傑生三弟 看), 1894.1.21. 『同泰來信』 5卷.

A-2

金砂는 (상해에서 주신) 전보를 받은 후에 시가에 따라 (조선에서) 매입하려했는데, 산동인들이 (동전) 160吊에서 165吊까지 가격을 올려놓는 바람에, (은량) 37량까지는 불려야 매입할 수 있습니다. 보내주신 전보의 (은량) 36. 2량으로는 이문이 맞지 않으므로, 감히 무리하여 매입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요 이틀 사이 산동인이 잠시 (금사 구입을) 중단하고 있으므로, 가격이 7吊나 8吊쯤 떨어질 지도 모르겠습니다.(金砂自接電後, 本欲照市而作, 但山東人由160吊搶至165吊, 要打至37匁方能承本, 照來電36.2匁亦不合寸, 故不敢強作....近兩日山東人暫止手, 價則跌7.8吊未知.) (譚傑生→梁綸卿, 1894.2.5. 『同順泰往復文書』 14卷)

A-3

말씀하시는 각 화물을 서울에 돌려보낼 건에 대해서는, 어제 山東人의 화물이 많아서 앞다투어 [배에] 선적한데다가, 本號에는 인력이 모자라는 바람에 아직 선적하지 못했습니다 (詳付各貨返漢, 因昨日山東人貨多奪裝, 于本号人力不及, 所以未能裝上)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21. 『同泰來信』 5卷.

A-4

24일(음력 1894년 2월 24일)과 28일에 미선이 모두 6척 약 6-7만 석 가량이 (인천에) 도착하여 해관 부두에 쌓인 것이 산과 같은데, 일본인은 기다리고 사지 않으니, 아마도 (쌀값이) 크게 떨어질 것 같다. 본호에서 방출한 3천 포는 매 일본 斗에 6.5毛이니, 이문을 따져 보면 남는 것이 없다. 왜냐하면 상해에서 산동인들이 대거 쌀을 구매하는 바람에 매매가가 2모로 올랐고, 인천은 가격이 3모 내외로 떨어졌으니, 정말 양쪽으로 다 수지가 맞지 않는다.(廿四至廿八日共到米船六艘, 約六七萬石之譜, 海關碼頭堆積如山, 日本人縮手未買, 料有大跌之勢. 本號放出三千包, 每日斗6.5毛, 核寸無利, 因上海山東人湧办立起價二毛, 仁川跌價三毛外, 眞是兩頭不化寸) 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A-5

이번에 온 쌀은 맵쌀과 찰쌀을 불문하고 入價가 다 비싼데, 왜냐하면 상해에서 산동인들이 다투어 구매하는 바람에 1석 당 약 1모씩 올랐고, 영국 파운드화도 비쌌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置本을 작성해 보면 지난 번 보다 入價가 비싸다. 하지만 물건은 질이 좋으니, 17吊까

지 가격을 올릴 수 있을 지도 모르겠고, 혹은 지난 번 가격인 16.5吊라도 역시 팔도록 해라. 이문을 따져보아도(核寸) 여전히 남는 것이 있으므로 빨리 팔아치우는 것이 상책이니, 쌓아두고 비용이 나가는 것은 면해야 한다. 만약 조선인들이 다시 가격을 깎으려 하면 잠시 물건을 가지고 있고 그들이 사지 않는 것을 걱정하지 마라. 생각건대 조선 참쌀도 이 정도 가격이다. 주의하도록 하라.(今水所來之米, 無論大米粘米, 入價均貴, 因在申山東人湧办, 故每石立升一毛外, 且英洋亦貴也. 故列置本, 比前幫, 入價高矣. 但貨頗佳, 未知加板17吊否, 或扳回前盆16.5吊, 亦要放之. 因核寸仍是有利, 以早脫爲上, 免至擱下耗息 或朝人再殺價, 則暫守之, 不憂其不買, 料朝粘米有如此之相宜也. 祈會意焉)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참쌀은 원래 판로가 넓지 않아 소량을 가져오면 높은 이익을 얻을 수 있는데, 지금 산동인들이 참여하여 쌀을 구매해오니 부화뇌동하여 많이 가져와 안 팔리고 쌓이는 우환이 생길까 방비하고 있습니다.(粘米原是銷流不廣, 如少到則利得厚利, 今山東人入手則办米, 防雷同多到, 則有久責之患)譚傑生→梁綸卿, 1894.2.10. 『同順泰往復文書』 15卷

A-6

듣기로 이들(산동인)은 (일본)우선회사와 협의하여 쌀 10만 포를 선적할 수 있는 品川丸을 세내어 인천에 오면 쌀을 싣고 오사카로 가기로 하였는데, 운반비는 1포 당 5毛(=0.5元)라고 한다. 어제 저녁에 이 회사(=일본우선회사)가 그들[산동인 5,6개 상점]을 大佛亭으로 초대하여 술을 마셨다고 하니, 아마 틀림없을 것이다. (聞得伊與郵船會社, 租品川丸[可裝10万包]來仁裝米去大阪, 水脚每石五毛寸, 昨晚該會社請他[山東人五六家]到大佛亭飲酒, 料必不錯也)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 『同泰來信』 6卷.

A-7

산동인은 네 상점이 합하여 일본인에게 쌀 2만포를 팔았는데, 그저께 이미 협상하여 5천포만 팔기로 하고, 계약금은 (위약에도 불구하고) 약정대로 받지도 못했던 데다가 나머지 1만 5천포는 아예 없던 일로 하고 일을 마쳤으니, 산동인 들이야말로 양보의 극치라고 하겠다.(山東人合四家賣與日本人米貳萬包, 前日已講妥○○出五千包, 定銀照寸不能罰, 餘一萬五千包, 不要作爲了事, 山東人可謂相就之極也)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 『同泰來信』 6卷.

A-8

怡泰號가 義生盛을 대신해서 米照 110장을 수령한 것은, 아마 필시 山東人이나 일본인이 부탁해서 한 것인데, 4월말이 지나도 인천해관에서 관세를 받을 지 어떨지는 알 수 없다. 만약 관세를 징수한다면, 아마 이문이 남지 않을 것이다.(所詳怡泰代義生盛領米照壹百十張, 料必山東人或日本人托办, 未知過四月底到仁海關要收稅否耳. 如果要實稅, 似亦不化寸也)

譚傑生→邵蘭圃,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A-9

糖姜은...이미 汕頭의 거래처에 편지를 써서 구매를 부탁했으니, 만약 (물건이) 상해에 도착하면 바로 (인천으로) 부쳐주십시오. 현지에서 구매를 하면 어쨌든 연태에서 사오는 것보다 나을 것이니, 아마도 산동방에 대적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糖姜...致信托汕友作办, 如到申即轉付下, 諒在地头作办, 總宜于在烟台办來, 料可與山東幫敵手矣)譚傑生→梁綸卿, 1894.2.5. 『同順泰往復文書』 14卷

A-10

糖姜은 조선에서 잘 팔려 산동인이 많이 취급했는데, 우리 상점은 거래처에 부탁하여 (산두) 현지에서 구매해 오므로, 어쨌든 연태에서 오는 화물에 비해서 유리할 것입니다. (4溫車糖下船, 祈即付下, 此是通行之物, 從少而作, 不憂無銷路也. 糖姜朝地多行, 山東人多作, 我號托友在地头作办, 總比烟台來貨相宜) 譚傑生→梁綸卿, 1894.3.3. 『同順泰往復文書』 16卷

B-1

永泰輪船帶上信壹函, 并銀壹箱, 內計日洋壹千四百六十二元九角三分(1362.93元), 札紙壹百五十元(150元), 共1612.93, 此箱有火漆印封固, 計關照蘭圃兄帶提单, 往龙山驗收可也. 所代收十八次仁關借款, 原是2592.19元, 今在仁用去九百餘元, 祈在漢買洋錢, 或札紙補足, 乃送去. 千祈不可延後, 免至他再追討也. 今列上總署賬房、龙署賬房各单一紙, 祈打圖章, 連銀一應送去, 就是. 通惠公司昨年借總署洋貳千九百八十元(2980元), 每月行息一分寸, 虽立单是寶銀, 他原是交洋錢來, 況我前有明提公司無元寶進出, 將來亦是還洋錢耳. 況現時公司無洋錢存, 須俟收得鄭秉下船價, 方能清還也. 總署尙存本號庫平銀四千匁, 如果三月底緊用要提去多少, 或尽提去, 須早日關照, 以得及早預備, 便無失悞也. (譚傑生→○泉亨, 1894.2.26. 『同泰來信』 5卷.)

B-2

인천 해관을 대신해 받은 돈이 시일이 경과된 지 오래되어, 날짜에 맞추어 總署 賬房에 보내야하므로 다시 연기할 수 없다. 만약 금액이 부족하고 약간 모자라면, 하루 이틀 늦추어 채워 넣으면 된다. 내일 산동신국에 부탁해서 4백 원을 부칠 것이니, 보충해 쓰도록 해라. 오늘 오후 海關 信箱에 부탁해서 부치려고 했으나 해관의 배달은 야간에 이뤄지므로 안전하지 못한 것 같아 마음을 놓을 수 없었다(代收仁關揭款經已日久, 祈早日送去總署賬房, 不可再延, 如果不够交, 尙欠若干, 或遲一二日, 找足亦可, 准明日托山東信局帶上四百元, 以備交用. 今午本欲托海關信箱帶上, 因海關帶信夜行, 似不穩陣, 故不放心也)譚傑生→邵蘭圃, ○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B-3

오늘 劉 仁川領事가 말하기를 袁大人(=원세개)로부터 전보가 와서 본호에 미선이 인천으로 왔는지를 묻고, 그(=원세개)에게 (송금받아야 할) 공금 2만 량이 있으니, 본호에게 상해 동태호로 전보를 쳐서, 동태호가 상해 道臺에게 대신 받도록 하라고 했다고 하여. 네가 알았다고 하였다. (今仁川領事劉着去, 云及袁大人有電到, 問本號有米船來仁否, 伊有餉銀貳萬

兩, 着本號打電去申同泰, 代爲向滬道領取, 我已答應他) 譚晴湖→譚傑生, 1894.3.11. 『同泰來信』 5卷.

B-4

袁總辦(원세개)이 江海關(상해 해관) 銀의 수령을 위탁한 일은 申號(=상해 동태호)도 대신 수고를 해주겠다고 허락했으므로, 오늘 王鳴山에게 편지 한 통을 써서 그에게 이 일이 어떻게 수령하게 될 지를 알려주었다. 먼저 그 영수증을 작성하여 인천으로 보내 다시 상해로 부쳐 대신 수령하도록 해라.(袁總辦委收江海關之銀, 申號亦允代勞, 今交王鳴山信壹函, 亦告知他此事如何有收, 祈先將此單付仁轉寄去申代收. 至于與其訂合同, 要蓋圖章, 千祈不可亂爲, 防有上當. 但推不能做主便合矣. 他亦不能怪汝也)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12. 『同泰來信』 6卷.

B-5

領事 唐紹儀가 오늘 배로 (상해에서) 고베로 갔는데, 작은 기선이 있는가 보아서 바로 한성으로 간다고 한다. 상해에서 빌려간 은 5백 원은 한성에 가면 돌려준다고 하니, 액수대로 받기 바란다. 또 (고베) 祥隆號에게 편지를 보내 그(당소의)가 얼마나 빌려갔는지 물어보고 알려주기 바란다(唐領事紹儀, 今船去神戶, 看(?)此小火船後, 卽來漢云, 在申借去銀5百元, 云到漢交回, 祈照收. 又致信祥隆招呼, 他有借支多少, 後達.) 梁綸卿→譚傑生, 1894.1.28. 『同順泰往復文書(交貨尺牘)』 1卷

B-6

부쳐온 唐領事(=唐紹儀)의 滙銀信, 袁總理(=袁世凱)의 收銀單은 이미 잘 받았다. 즉시 진동선으로 (상해로) 부치겠다.(所付來唐領事 滙銀信袁總理收銀單 經已收到 卽由鎮東船) 譚晴湖→譚傑生, 1894.4.21. 『同泰來信』 6卷.

B-7

袁總理(=袁世凱)의 여섯째 동생이 龔欽差의 출사에 수행원으로 가게 되었는데 매일 상해 해관 印冊房에서 安家銀 50匁을 받는데, 袁總理가 상해 동태호에 부탁해서 대신 돈을 받아서 저축해 두었다가 4-5개월 후에 동생이 편지로 알려주면 그 돈을 河南으로 보내달라고 함. 동순태 담걸생은 제가 보건데 그는 장차 이임할 관리이고 또 상해점은 바빠서 거기에 신경 쓸 여가가 없을 것이므로 바로 수차례 거절했습니다. 하지만 그(원세개)는 달리 부탁할 다른 상점이 없다며, 만약 신경이 쓰이고 가게 일에 지장이 있으면 잠시 4-5개월 만 대신 해주면, 그가 8월이나 9월에 溫處道로 부임할 때 상해를 거쳐 가면서 다른 사람에게 처리를 부탁하겠노라고 합니다. 현재 저는 아직 승낙을 하지 않았습시다만, 형님께서 찬성 여부를 바로 알려주시면 답변을 할 수 있겠습니다.(“弟見他將離任之官, 且申號事忙防不暇與其照管, 以直推之數次矣. 他云無別號可托, 如果費神及有沮碍舖事, 則暫行與其代办四五个月, 俟他八九月去溫處道上任, 經由上洋, 再托別人辦理云. 現弟仍未曾答應, 與其代办, 如兄台合意與否, 祈卽示知, 以得回覆.) 譚傑生→梁綸卿, 1894.4.2.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B-8

지금 衙門에서 諭單이 내려와, 華商이 쌀을 다른 부두로 옮기는 것을 불허하고, 조선에서 만 팔도록 했습니다만 숙부께서는 어떤 대책이 있으신지 모르겠습니다. 편지로 알려주시기 바랍니다(今因衙門有諭單下來, 不准華商運米往別埠, 准在朝地宜沽之, 未知叔台如何設. 祈即來音示知). 譚廷廣→譚傑生, 1894.2.9. 『同泰來信』 5卷.

B-9

합계 쌀 1萬 石의 米照 1백 장이 아직 발행이 되지 않았으면 시일이 늦어지지 않도록 다시 王鳴山과 高潤軒에게 부탁하여 袁憲(袁世凱)을 면담하여 부탁드려 바로 발급받도록 해서, 하인에 주어 인천으로 보내 鎮東船 출발 시간에 맞추어야 하니, 연기되어 일을 그르치지 않도록 하는 것이 중요하다.(領取米照壹百張, 計壹萬石, 如果未曾發出, 防延擱趕之不及, 須再托王鳴山及高潤軒, 面求袁憲, 即之發下, 以得交姑兒帶回仁, 趕付鎮東船, 萬望延遲悞事爲要)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B-10

袁大人(원세개)이 未照를 바로 발급을 해주지 않아 받지 못했다고 했는데, 이 문제는 내가 한성에 돌아간 뒤에 상의하도록 하자(所詳, 袁大人不轉發未照, 當未領就是, 容當回漢商量可也)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B-11

미조는 이미 발행을 중지하여, 산동방이 다시 얻고자 하였으나 수령하지 못했습니다. 본 호는 아문과 잘 알고 지내므로, 한 두 친구의 협력을 얻어 袁總憲(袁世凱)에게 사정하여, 사무실의 손을 거치지 않고 뒤로 발급받았으니, 다른 사람들이 모르도록 하십시오. 지금 이미 수령한 미조 140장을 何英傑兄에게 맡겨 가져가게 했으니, 살펴 받아서 쓰시기 바랍니다.(米照經已止發, 山東幫欲有再取而不能領, 本號相熟衙門, 得力一二友在袁總憲求人情, 不經門房之手, 暗中而取, 不俾別人知也. 今已取使壹百四十張托何英傑兄帶上, 祈查收用) 譚傑生→梁綸卿, 1894.3.16. 『同順泰往復文書』 17卷

대출-1

이흥선(=흥선대원군)의 돈은 만약 그가 보내주면 받아라. 그는 皮藤(?)이기 때문에, 이익을 탐해서는 안 된다(李興善之錢, 如他交來則收之. 因他是皮藤, 不宜貪此利也)譚傑生字 → ○泉亨, 1894.2.27.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2

흥선대원군의 차금은 만약 돈을 다 갚으면 (담보로 잡은) 집문서와 물건을 그에게 돌려주어라. 金叔奇가 전에 빌려 간 은 3백 元의 상환 날짜를 4월 말까지로 미루는 것은 만약 담보가 확실하면 그렇게 해도 무방하다. 洛瑞가 빌려간 은전은 반드시 독촉하여 받아내야

하니 이자에 욕심을 내서는 안 된다. 돈이 없다면 (담보로 잡은) 그 집을 팔도록 해라.(李興善之賬, 如果還清則將屋契及物件, 交還于他. 金叔奇前借去洋三百元, 轉票至四月底止, 如根穩則不防爲之耳. 洛瑞之銀, 須要追收, 不可貪此利, 如無銀則追其賣屋)(譚傑生→○泉亨, 1894.2.26.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3

전보국의 某某가 빌려간 자금은 이번 달 말이 기한이므로 반드시 받아내서 급할 때 써야 하며 다시 이자를 받는다고 시일을 미루어서는 안 된다. 정병하가 덜 낸 물건 대금 및 최봉식의 이자는 만약 아직 가져오지 않았으면 가서 독촉해야 한다. 이후 그의 하인이 와서 외상거래를 하려해도 인정에 얽매어서는 안 되고 현금 거래를 하거나 물건이 없다고 거절하도록 해라.(電報局○○○所借之款, 本月底到期, 須要追收, 以应急用, 不宜再轉利, 鄭秉夏所欠之貨錢及崔鳳植之利, 或未曾交來, 必要去追問, 以後他差人來賒貨, 不宜順人情講, 明現錢或推其無貨亦可也)譚傑生→○泉亨, 1894.2.30. 『同泰來信』 5卷.

대출-4

通惠公司所借之款, 必俟鄭秉夏交船價然後能還總署, 俟我回漢乃商酌, 厲鑑菴前所借之洋, 既已清還本, 俟將來還足利錢然後, 交回揭數于他, 料不防拖欠也. 金益相及崔鳳植所欠之利, 如未交來, 須要及早清收, 免至拖欠, 是爲至要(譚傑生→○泉亨, 1894.3.2. 『同泰來信』 5卷)

中国的东亚意识与东亚叙述

■ 徐秀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中国的东亚意识与东亚叙述

徐秀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次〉

- 一、中国的东亚意识
- 二、建立东亚叙述的合理性及其存在问题

一、中国的东亚意识

相对于韩国和日本，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亚洲意识”（包括“东亚意识”）比较淡薄。据说几年前日本曾对一些国家的亚洲意识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的，越南有84%，韩国有71%，日本有42%，中国只有6%。¹⁾韩国学者白永瑞教授在《在中国有亚洲吗？》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判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亚洲’”。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把中国放在东亚的范围里来思考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观念，即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而对周围邻邦的关心却很少。²⁾

不过，即使是白教授本人，也认为这样的说法是过甚其言。说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亚洲，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过对亚洲的讨论，只不过没有把它作为中心而是作为一个边缘问题来讨论。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中国学者对于“东亚关系史”尤其是“东亚文化交流史”有长期的研究，研究重心在古代史领域体现为中国文明向朝鲜、日本的传播及其在当地的流变与创新，在近代史领域则侧重中日关系，尤其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及其影响，文化交流方面注重西方文化经过日本向中国的“倒流”。中国学者对朝鲜半岛的关注确实比较少。这些研究的长期进行，是“东亚史”名称下各类学术活动渐趋活跃的基础。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分别举行过多次以“东亚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内容涉及城市史与环境史、农业史、科技史、绘画史、实学等方面，三国学者在共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科书编写方面的合作十分活跃，并且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可以预期，中国学者对东亚史的关注会趋向加强，至于是否可能把东亚史作为“中心问题”来讨论，取决于对“中心问题”的定义。一般而言，历史问题不大可能成为全民关心的中心议题；在历史学领域，对本国史的关注程度又往往高于外国史和国际关系史。但在某种范围和某种程度上，东亚史成为知识界和民众关心的中心问题，则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东亚意识”会比较淡漠？我觉得以下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与这个问题相关。

首先，从文化传统看，中国长期以天下中心自居，将对外关系看作国内关系的延伸，以文化的亲缘性区分周边地区 and 国家的亲疏远近，而没有明确的地域区分概念。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有四个基础：强调对不同民族（部族）的怀柔而不是奴役；用文化优势来吸引和改造周边民族；文化的标准，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与扩大的特点；中国统一王

1) 转引自杜芳琴《崛起中的亚洲妇女学述评——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4期，第149页

2) 白永瑞：《在中国有亚洲吗？——韩国人的视觉》，《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视觉”疑为“视角”之误

朝建立之后,其实行的对外政策是在以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夏”、“华”、“中国”和“天下”都有一个由周天子直辖地逐步扩大到全国的演变过程,它反映出中国的民族、国土和文化等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各种文明的融合,对民族、国土和文化的认识都在进步和发展。从这些观念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周边民族只要接受周的礼仪制度,便能够获得周王朝和中原诸侯的承认,逐渐融入其中,成为其一部分。因此,“夏”、“华”、“中国”和“天下”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柔软地适应时代的变迁。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以文化为区别标准的古代观念中,没有形成具有明晰边界的区域观念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在近代,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是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从区域角度加以思考的重要性并不充分。

白永瑞教授把近百年的东亚形象地譬如为受诱惑而穿上红舞鞋的少女,这双“红舞鞋”就是“强国梦”。他认为,若形成“真正意味”的东亚视角,将有助于东亚各国从这种大国梦魔缚中解脱出来。⁴⁾在此,白教授对“强国梦”赋予了某种虚幻的色彩。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从20世纪初开始,民间层次上关于亚洲地区联合的构想与活动就已开始出现,但大部分都是短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远离一般民众的现实生活。在20世纪,对东亚人来说,国民国家的形成就意味着走上了适应近代时势之路,否则,就会陷入亡国的危机之中。”⁵⁾这一表达与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没有差别,对于近代的中国人来说,一直处于被“开除球籍”的恐惧中,“救亡压倒一切”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即使是现在,东亚叙述也不是中国知识界关心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的问题太多太大,国家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等都比处理邻国关系迫切和重要,这确实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问题。有中国学者指出,对于“高句丽历史”问题,中国知识界没有韩国知识界那样关注,那“是因为它没有成为首要的问题”,“中国社会尽管已经在视野里包含了东亚邻国,但很难把邻国的中国想象问题化。只要没有走到这个阶段,亚洲视野就不够真实。”从另一方面说,东亚叙述之所以未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的议题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恐怕是因为大陆不具备像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那样的危机感。再者,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和策略上讲,战后几十年中,在冷战结构中的东亚、亚洲论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有实际意义的是“第三世界”论述。⁶⁾

第三,在近代,面对西方国家的挑战,东亚各国的应对方式和命运不同,并未构成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命运共同体”。

在回答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缺乏“亚洲意识”这个问题时,李长莉教授的答案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地缘关系的不同”。韩国及整个朝鲜半岛是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东亚内环地区,作为韩国人,如果以韩国为中心而向外环顾世界的话,首先挡在面前的就是西面的中国大陆和东面的日本,如果不通过中国和日本,韩国无法直接与世界连接。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形。所以,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联系以后,韩国和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东亚意识和连带感就是很自然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四面八方周边有约20个邻国,因而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产生有单一向度、边界清晰的核心地域连带感。此外,中国和韩国在19至20世纪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关系也不相同,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也长期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作为殖民经营的主要目标,因而东亚关系

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第一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4) 白永瑞:《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第8期,第3、6页。

5) 白永瑞:《超越20世纪型东亚文明与国民国家:韩民族共同体的选择》,《当代韩国》2000年春季号,第11页。

6) 白永瑞、陈光兴、孙歌:《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12月,第42、43、44页

一直是韩、日两国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则长期面对列强诸国的环伺和纷争，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列强诸国。如果说近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之义是民族独立的话，韩国的民族独立是通过在东亚地域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而取得的，而中国的民族独立则要通过反抗世界——列强诸国的斗争才会取得。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必须直接面对世界的性格，相比之下，与只属一翼的东亚地域的连带感会显得淡薄一些。⁷⁾

第四，在近代，中国遭受的最大伤害（实质的和心理的）来自同属东亚的日本，为日本侵略张目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的灼伤性记忆，这种创伤至今难以愈合。

对于“东亚共荣圈”，中国知识界具有充分的警惕，只要浏览一下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目录，就会发现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警惕和批判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知识界的这种警惕和戒备与民众的认识和情绪是完全合拍的。最近日本鸠山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在日本深得人心，中国官方也予以正面回应，但只要看一下中国网民的评论就会发现，大多数网民将此与“大东亚共荣圈”相联系，戒备心极重。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历史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自行消解，“死的拖住活的”，历史对现实构成巨大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比较德国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处理方式仍然是有益的。德国历届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承认是明确的、彻底的，国民的压倒性意见同样是承认历史上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坚决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再生的勇气。有德国学者指出，“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已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他们胆敢说出口对纳粹有利的話，第二天他就得下台”。以至于谴责纳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家不小的压力。德国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与纳粹主义有关的历史，以牢记历史教训。⁸⁾日本政治领袖对战争责任也有过明确的表述，在日本学者和各界民众中，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是有力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和行动，这些言论和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在日本社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⁹⁾在中日这两个东亚重要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东亚合作必然会蒙上阴影，中国民众的东亚意识也不可能积极而明朗。

二、建立东亚叙述的合理性及其存在问题

在东亚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白永瑞教授，在阐述建立东亚历史叙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比较强调这种叙述对于西方霸权的超越（当然他也有另外的关切）。他说：“东亚历史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彻底变革或叫作‘重大革命’的时候了。”他指出，东亚三国的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自20世纪开始渐次建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但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史学体系有着很浓厚的殖民性色彩。一方面，东亚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深受西方历史学影响，三国除了本国史之外，世界史都是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中心的，这显然是当时欧美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映。另一方面，东亚近代史学首先在日本建立，其中主要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的东洋史，是以日本向大陆侵略的志向为背景的。20世纪东亚诸国的分科式史学学术体系，都是以国民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本国史、亚洲史及世界国别史为分科界限的。他认为这已经不适应今天认

7) 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读书》2005年第4期，第40—41页

8) 《对纳粹主义的批评不是一蹴而就——访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6月21日

9) 步平：《中日为何要共同进行历史研究》，新华网，2007年1月16日；《东亚地区能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

识世界的需要, 在各国联系日益增强、国民国家的界限日益弱化的今天, 以往的这种分科化的史学体系应当解体, 而代之以综合化的史学体系。¹⁰⁾

就我所知, 中国学者对于东亚叙述合理性的思考, 与白永瑞教授的角度不大一样, 一般不从超越西方霸权、重构史学体系的角度进行; 对于白教授提出的用以取代原有历史叙述的“知性实验的东亚”构想, 中国学界反应谨慎。李长莉即指出, “知性实验的东亚”构想, 用来重新清理东亚文化遗产, 用以考察现时人们所关注的诸如“东亚价值”一类的问题, 可能是很有效的。但她显然不认同将这一观点作为“史学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 而更倾向于将它作为史学新辟的一个路向, 它也可以发展成与原有史学领域并行但又很独特的新研究领域。¹¹⁾

中国学者一般从以下两个角度论证东亚叙述的合理性: 一, 事实的角度, 即指出东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 二, 现实和未来的角度, 即强调建立东亚叙述对于东亚和平发展的意义。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 “东亚”不是想象的产物, 不是一个作为西方殖民话语折射的共同体, 而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确实存在的高度互动的区域。韩升教授指出, “东亚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 是历史形成的事实,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它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概念, 更不是从西方全球殖民分区策略所设定的概念转换而来的自我认同。”他认为构成东亚基本文化基础的要素, 除了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的四大要素, 即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外, 还应该加上教育和技术两个要素。¹²⁾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中, 他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理论以及汉唐间各时期的对外政策, 详细考察了迄止唐代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 尤其措意于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的频繁互动, 将一个有机联系的古代东亚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

由杨军、张乃和教授主编的《东亚史》同样将东亚区域作为“实体”加以研究。该书全面叙述了东亚的形成过程和相互关系, 在编写体例上则突破了按国别进行叙述的传统模式, 而按区域叙述自古至今的东亚史。¹³⁾学者评论该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¹⁴⁾论者认为, 该书的编写体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 以前者为主。作者将东亚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天山南北、东北亚与东南亚七大区域, 在叙述中国史时, 也侧重按区域叙述, 以避免与中国通史雷同。二是侧重互动关系, 不仅在叙述东亚各国的历史时加入对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 古代部分还专设东亚与世界这样的章或节, 来叙述东亚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评论者认为, 这种划分模式是符合东亚历史进程的脉络的, 从而构建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的区域结构, 并且也没有忽视文化过渡区域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

在纵向演进方面, 作者将东亚历史分为七个时期: (1) 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 世纪末), 在这一时期, 东亚唯有中国一个国家, 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 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2) 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 世纪末—8 世纪末), 东亚出现其他国家, 出现了国家间的互动, 这一时期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羁縻体制当中。(3) 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 世纪末—13 世纪末), 这一时期, 封贡关系开始出现, 并且蕴育着东亚的封贡体系。(4) 封贡体系时期(13 世纪末—1874 年)

10) 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读书》2005年第4期,第38 39、42页

11) 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读书》2005年第4期,第42页

12)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第53 54页

13) 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从史前至20世纪末》,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一〈东亚史〉》,《史学集刊》2006年第9期。该书所称东亚地区比通用概念宽泛得多(虽然作者认为他们使用的概念更具普遍性),指的是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1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

14) 朱寰:《序》,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从史前至20世纪末》

这一时期是东亚封贡体系盛极而衰的时期,封贡体系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来开始走向解体。(5) 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东

亚开始走向条约体系,但是西方势力的长期存在以及东亚内部主导地位的争夺使得东亚并未真正建立起条约体系。(6) 冷战时期(1945—1992年),东亚处于两极对峙的国际体制中,但是内部的互动逐渐加强。(7) 后冷战时期(1992年—),这一时期到目前仍未结束,东亚的区域整合在加深,也遇到了相当的困难。¹⁵⁾

中国学者习惯于从“实体”的角度来考察东亚史,而对于带有一定“虚拟性”、“流动的不确定性”的概念则比较谨慎。这与相信历史的客观性、公正性、资政价值的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一脉相承。

东亚确实有共同的历史,对共同历史进行挖掘和整理,是建立东亚叙述的强大基础。同时,东亚也确实面对相互关切的现实和未来,东亚和平繁荣的需要成为学者关注东亚叙述的又一个重要出发点。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区域化潮流是东亚学者所关切的。白永瑞教授说,“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民族国家的作用日益减小,地域圈再次受到重视,特别是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最近的东亚已经到了不得不思考的境地了。面对美国所力劝的以‘美国模式’为范本的新自由主义,对应之策是寻找能够克服世界市场模式的替代方案,这并不只是为确保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如果东亚人能够找到(也许必须找到)它,那时东亚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可利用的资源的宝库了。”¹⁶⁾对此,中国学者也有认同,如步平教授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亚地区都面临着对上述曾经影响亚洲认识空间的过程进行反思的共同任务,也都在寻找作为东亚(亚洲)的自我。东亚周围的世界在国际化和区域合作进程上的突飞猛进,也不能不使东亚各国的政府与国民产生强烈的紧迫感。”¹⁷⁾李长莉教授也从全球化的角度观察东亚意识的觉醒:“全球化引起世界经济和文化地图重组,跨国界和网络化联系增强,地域特征和地域意识突显,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世界体系学派’,东方的东亚地区出现亚洲意识和东亚意识的觉醒,乃至近年日本和韩国史学界兴起重构东亚历史等思潮,都可以说是史学界对于全球化变动的回应。”¹⁸⁾

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回应是从东亚共同面向世界这一意义上立论的,而从处理东亚各国内部关系的角度,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看法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和平共处,必须尝试建立超越国境的共同的历史认识。在中国学者身上,这种焦虑感和使命感表现得尤为充分。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在东亚国际社会,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历史问题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东亚的国际关系,对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能否解决邻国间的历史问题,能否在不同国家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成为东亚地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¹⁹⁾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的历史认识,关键在于日本因素,具体说,对日韩两国而言,是如何消解由日本侵略造成的历史伤痛的问题,对日本而言则是如何反省历史的问题。因此,建立东亚叙述,旨在建设亚洲和平,重点则在战争责任的认定。

为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中、日、韩三国学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样有影响的历史读物。至少在我这个中国历史学者看来,这本书是非常成功的尝试,如果我们不看该书的编纂说明,事实上难以发现本书是由三国学者共同撰写的,无论是内容的选择、体例的确立,还是主要观点的陈述,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具有新意

15) 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一〈东亚史〉》,《史学集刊》2006年第9期

16) 白永瑞:《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第8期,第8页

17) 步平:《东亚地区能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第6页

18) 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读书》2005年第4期,第38页

19) 步平:《东亚地区能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第4页

并以普及为目的的作品。这个例子证明，共同的历史叙述是可能的。这本由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历史参考书，在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上做出了榜样，是促进亚洲和平的积极行动，对促进历史事实的共有和促进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的建立、从而建设亚洲的和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国际影响。

由此可见，建立东亚叙述有充分的合理性，而且，三国学者已经进行了成功的示范。但在建立东亚叙述的过程中，也还面临不小的困难。

东亚的区域范围如何确定，就是一个问题。

前已述及，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东亚”，基本上是指中、日两国和朝鲜半岛，从地理上讲应该是“东北亚”，只是习惯上称“东亚”而已。这一界定主要是基于文化的共同性及区域内部的活跃互动。从文明的共同性而言，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古代都使用汉字，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基础，似乎应该归入同一区域，但在古代，越南与日本、朝鲜没有密切的交流，直到相当晚的时代，双方的交流主要还需要通过中国中介，因而难以构成一个各方内在联系紧密、在历史发展上相互影响甚大的区域。而中、日、韩三国不仅具有文明的共同性，而且互动活跃，将三国归为一个研究单位是适当的。²⁰⁾

不但如此，从解决近代遗留的历史问题的角度，将这三国（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研究者的视野朝向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合作，或者朝向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的多样性问题时，这样的东亚概念就不一定适用。从国际战略的角度，主张15+1东亚概念的学者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战略布局作了如此设想：通过西部大开发使中国西部各省与中亚五国形成一个经贸区，通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经贸区，通过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使中国东南各省与东南亚各国形成第三个经贸区，并通过中国广大的幅员与资源，将这三个经贸区联接在一起，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东亚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只有当东亚各国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在政治上逐渐发出同一个声音时，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外在阻力才会被削弱，东亚东部边缘的几块冷战碎冰才能最终被融化，新型的东亚共同体才会由理想化为现实。因此，为了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从战略上需要超越东亚地域的视野，要向“西”看，向“南”看，而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东亚东部的环形地区。²¹⁾

另一方面，即使看来理所当然地属于东亚的中国，其归属也不是毫无疑义的。孙歌教授说，“谈东亚问题时，中国是无法完全放进去的。中国基本上只有东边的儒教地区可以归到东亚里。西藏、新疆在文化上应该属于西亚。……东亚的提法是谁的？其实，‘东亚’的提法应该是日本和韩国的。对于中国来说，‘东亚’这个思路在有些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并不总是有效的。比如不能用它来谈中国西部、西南部的区域。”所以，“东亚”作为绝对的前提是要质疑的。²²⁾这大概也是白永瑞教授反对“实体”的东亚，而主张“知性实验的东亚”的理由之一吧。

不过，“什么是东亚”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只要研究者在相关讨论中先行界定，就不难建立起言说的共同基础。比较难以处理的是“民族国家叙述”的强大覆盖性和穿透力。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各国历史学的“中心叙述”，它不仅仅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历史的实际。但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叙事方式，与区域史的建构、与超越国境的历史对话的形成确实存在先天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可以从中国学

20)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后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21) 杨军：《中、日与东亚共同体：从历史到现实》，《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第16页

22) 白永瑞、陈光兴、孙歌：《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12月，第45页

者对大力主张破除民族国家叙事、摆脱“大国梦魔缚”的白永瑞先生的东亚研究的评论中看到。

白永瑞教授的东亚论述，颇强调在“真正意味的东亚视角”形成中韩半岛的作用。他指出，“必须使被忽视的‘周边’的主体包含到考虑范围内，才会有助于形成真正意味的东亚视角，同时也有助于从二十世纪的强国梦中解脱出来”。而“周边的主体”，应当包括（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不少的民族和国家以及国家内部的小地区在内。“这里要着重强调韩半岛的作用。”因为韩半岛实际上对东亚的命运产生着中国人和日本人不曾真正认识到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历史的和现实的。“近现代史上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韩国战争等对东亚命运的影响，以及韩半岛南部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是指向未来的。韩“半岛南北的对峙状态分明是东亚地区协作体构成的决定性障碍，因此韩半岛的今后发展方向，尤其是解决分裂的课题，正像中国的一国两制的实验所部分实现的那样，必须超越既存的以国民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扩展到地域的思考方式。”²³⁾“现在，在帝国的记忆上相对较为自由，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小中心’作用，对其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一经验过的韩国，也许可以在各个中心之间起到调节者及和平和繁荣的促进者的作用，与此相应地进行一些内部改革，那么我们韩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历史中自然也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²⁴⁾

白教授对韩半岛作用的强调，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韩国东亚话语产生的背景是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自信、进而寻求表达东亚共同文化认同的新的模式，并指出白永瑞教授的“双重周边视角”看东亚也掩饰不住其背后浓郁的韩国民族主义的色彩。“相对于中日两国，韩国在东亚历史上没有作为中心国的体验，白永瑞的东亚史彰显了韩国在东亚体系中独特的重要地位，创建未来东亚体系的重担，应首选韩国。”²⁵⁾事实上是将其归入了民族主义的话语系统，与白教授所表述的希望形成超越国民国家共识的追求恰成反面。

笔者完全相信白永瑞教授超越本国史、超越民族国家叙述的诚意，但在阅读白教授的有关论述时，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与上述批评者同样的感觉，可见民族主义对历史学者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所以，如何平衡民族国家叙述和区域叙述，会是研究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中国学者对东亚史的关注在逐渐加强，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展示了这一研究的乐观前景。这一研究的推进，不仅将对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将深刻地影响现实国际关系的处理，深刻地影响东亚的未来发展。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东亚历史研究产生更丰硕的成果。

2009年9月30日，北京

23) 白永瑞：《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第8期，第6页。

24) 白永瑞：《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第14页

25) 孙雪岩：《试析韩国学者白永瑞的“东亚论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46、49页。

중국의 동아시아 인식과 동아시아론

취슈리(徐秀麗) (중국사회과학원 근대사연구소)

〈目 次〉

1. 중국의 동아시아 의식
2. 아시아론 수립의 합리성 및 문제점

1. 중국의 동아시아 의식

한국, 일본과는 상대적으로 중국 지식층과 보통 국민들의 “아시아 의식”(“동아시아 의식” 포함)은 희박한 편이다. 몇 년 전, 일부 국가의 아시아 의식에 관한 일본의 조사에 따르면 베트남은 84%, 한국은 7%, 일본은 42%, 중국은 6%만이 자신이 “아시아인”이라고 의식한다는 결과가 나왔다. 한국 학자인 백영서(白永瑞)¹⁾교수는 《중국에 아시아가 있는가?》라는 글의 첫머리에 “중국인의 마음 속에 ‘아시아’는 없다.”라고 판단하였다. 그는 중국의 지식인들은 중국을 동아시아의 범주에 넣어 생각하지 않는다고 했다. 즉, 중국 지식인들은 중국이 세계와 직접 대면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주변국에 대한 관심이 적다는 것이다.²⁾

하지만 백교수 본인조차도 이러한 주장이 다소 과장되었다고 인정하였다. 즉, 중국인의 마음 속에 아시아가 없다는 것은 중국인이 아시아에 대해 전혀 토론한 적이 없다는 것이 아니라, 아시아를 중심이 아닌 주변문제로 인식하고 토론했다는 것이다. 이것은 합리적인 판단이다. 중국 학자들은 “동아시아 관계사” 특히 “동아시아 문화 교류사”를 오랫동안 연구해왔지만, 연구의 중심은 고대사의 경우에는 중국 문명의 조선과 일본 전과 및 그것의 현지에서의 변화와 창의성에 있었다. 근대사 영역에서는 중일관계 특히 양국간 전쟁과 그 영향에 치중되어 있었고, 문화 교류 분야에서는 서양문화가 일본을 거쳐 중국으로 유입되는 “역류” 현상에 주목하였다. 한반도에 관심을 기울인 중국학자는 확실히 적은 편이었다. 이러한 연구가 장기간 진행된다면 “동아시아 역사”라는 명칭 하에 각종 학술 활동이 점차 활발해지는 기반이 될 것이다. 최근 중국 대륙과 대만 일본 그리고 한국이 각각 여러 차례에 걸쳐 “동아시아 역사”를 주제로 한 학술회의를 개최하였다. 회의 내용은 도시 역사와 환경사, 농업사, 과학기술사, 회화사 및 실학(實學) 등으로, 3국 학자들은 공동 역사 연구와 역사 교과서 편찬 등 분야에서 매우 활발히 협력하였으며, 이미 많은 성과를 거두었다. 중국 학자들이

1) 두팡친(杜芳琴)필기하는 아시아 여성학 논한 중국 학자의 시각(崛起中的亞洲婦女學述——一名中國學者的視角) 재인, 마르크스주의와 현실(馬克主義與現)》, 2009년 제4기, 149쪽

2) 백영서 : 중국에 아시아는 있는?—한국인의 시각(在中國有亞韓國人的視角, 동방문화(東方文)》 2004년 제4기

동아시아 역사에 더욱 많은 관심을 기울일 것으로 보이지만, 동아시아 역사를 “중심 문제”로 토론할 수 있을지 여부는 “중심 문제”를 어떻게 정의하느냐에 달려있다. 일반적으로 역사 문제는 전국민이 관심을 기울이는 중심 의제가 될 가능성이 적다. 역사학에서는 종종 외국의 역사와 국제관계사보다는 본국 역사에 대한 관심도가 높다. 그러나 일정 범위와 정도에서 동아시아 역사가 지식계와 민중들의 중심 관심사가 되는 것은 가능하다.

그렇다면 중국의 “동아시아 의식”은 왜 비교적 희박한가? 본인은 아래와 같은 여러 가지 측면의 요소가 모두 이 문제와 관련이 있다고 생각한다.

우선, 문화적 전통이라는 측면에서 중국은 오랜 세월 동안 세계의 중심이라고 자처해왔기 때문에 대외관계를 국내관계의 연장선상으로 인식했으며, 문화적 혈연관계로 주변 지역과 국가와의 친밀도를 구분했기 때문에 명확한 지역 구분 개념이 없었다.

한 학자는 중국 고대의 대외 관계 이론은 다음의 4가지에 기초하고 있다고 지적했다. 다른 민족(부족)에 대한 회유이지 노역이 아니라는 것을 강조한다는 것, 문화적인 우세로 주변 민족을 흡수하고 개조하였다는 것, 문화적 기준은 중화민족이 끊임없이 발전시키고 확대시킨 특징이라는 것, 중국에 통일 왕조가 세워진 후 실행된 대외정책은 과거 민족관계 처리 방식에 기초해서 발전된 것이라는 점이다. 여기에서 “문화”는 매우 중요한 의미를 갖는다. 중국 역사상 “하(夏)”, “화(華)”, “중국(中國)”과 “천하”라는 어휘들은 모두 천자가 직접 다스리는 지역이라는 개념에서 점차 전국을 의미하는 개념으로 확대되는 과정을 거쳤다. 이는 중국의 민족과 국토 및 문화 등의 개념이 결코 절대불변의 것들이 아니며, 모두 끊임없이 심화되고 확장되는 동적인 과정을 갖는다는 점을 반영해주는 것이다. 여러 문명의 융합과 함께 민족과 국토 및 문화에 대한 인식도 진보하고 발전하였다. 이러한 관념에서 문화라는 요소가 매우 중요한 작용을 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주변 민족이 주(周)나라 예법(禮法)을 받아들이기만 하면, 주나라 왕조와 중원 제후(諸侯)들의 승인을 받아 점차 융화되어 그들의 일부분이 되었다. 따라서 “하(夏)”, “화(華)”, “중국(中國)”과 “천하”는 매우 강력한 포용력으로 시대의 변화에 유연하게 적응하였다.³⁾ “하늘 아래 모든 곳이 왕의 땅 아님이 없으며, 땅의 모든 물가에 이르기까지 왕의 신하 아님이 없다.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라는 생각과 문화를 구분 기준으로 삼던 고대 관념에서 명확한 경계가 있는 지역 개념이 형성되지 못한 것은 매우 자연스러운 것이었다.

둘째, 근대 중국이 직면한 당면과제는 강대한 민족 국가 건설이었기에, 지역이라는 관점에서 생각해야 할 중요성이 충분하지 않았다.

백영서 교수는 최근 100년간의 동아시아를 유혹을 받아 빨간 구두를 신은 소녀에 비유했는데, 이 “빨간 구두”는 바로 “강대국의 꿈”이다. 백교수는 “진정한 의미”의 동아시아 시각이 형성된다면 동아시아 각국이 이 강대국이라는 악몽에서 벗어나는데 도움이 될 것이라고 밝혔다.⁴⁾ 여기에서 그는 “강대국의 꿈”에 어떤 비현실적인 색채를 가미하였다. 하지만 그의 다른 글에서는 “20세기 초부터 민간차원의 아시아 지역 연합 구상과 활동이 이미 나타나기

3) 한성(韓昇): 《동아시아 세계 형성사론(東亞世界形成史)》, 제1장중국 고대 대외 관계 이론의 형성과 발전(中國古代對外關係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푸단대학출판사(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년, 35쪽

4) 백영서: 《21세기를 앞두고 다시 동아시아를 생각하다(世紀之交再思東亞)》, 독서(讀)》, 199년, 기, 제 3쪽과 6쪽

시작했지만, 대부분 단명했다. 이는 일반 민중의 현실 생활과 괴리가 있었기 때문이다. 20세기, 동아시아인들에게 국민국가의 형성은 근대의 시대적 흐름에 적응하는 것으로 그렇지 못할 경우 망국의 위기에 빠지게 된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⁵⁾라고 하였다. 이러한 주장은 중국 학자의 일반적인 인식과 다르지 않다. 근대 중국인들이 줄곧 “지구에서 살 권리를 박탈당하는” 공포 속에서 “구국 운동이 모든 것에 우선한다”라고 생각했던 것은 역사의 필연이었다.

지금도 동아시아론은 여전히 중국 지식계가 관심을 갖는 중대한 문제가 아니다. 이는 중국 자신의 문제가 너무 많고 너무 크기 때문이다. 즉 국가의 안정, 경제 발전, 민족의 화합, 공평한 사회, 환경보호 등등이 모두 주변국과의 관계보다 절박하고 중요하기 때문에, 동아시아론은 중국의 주된 관심사가 아니다. 한 중국 학자는 중국 지식계가 한국 지식계만큼 “고구려사” 문제에 관심을 갖지 않는 것은 “고구려사 문제가 가장 중요한 문제가 아니기 때문”이고 “중국 사회가 이미 동아시아 주변국을 자신의 시야에 포함시키기는 했지만, 주변국이 상상하는 중국을 문제화하기는 어렵다. 그 단계에 이르지 않는 한, 아시아 시각의 진실성은 부족할 수 밖에 없다.”라고 지적했다. 다른 측면에서 볼 때, 동아시아론이 중국 대륙 지식계의 의제에서 중요한 위치를 점유하지 못하고 있는 것은 중국 대륙이 한국이나 일본 혹은 대만과 같은 위기감이 없기 때문일 것이다. 게다가 국제관계의 현실과 책략이라는 면에서 볼 때, 전쟁 후 몇 십 년 동안 실질적인 의미를 가진 것은 “제3세계”론이지 냉전구조 속의 동아시아와 아시아론은 아니었다.⁶⁾

셋째, 근대에 서양 국가의 도전에 직면한 동아시아 각국의 대응 방식과 운명은 각기 달랐다. 따라서 어떤 학자가 말했던 것과 같은 “운명공동체”를 형성하지는 못했다.

왜 중국 지식인의 “아시아 의식”이 결여되어 있는가라는 질문에 답변할 때, 李長莉 교수는 “가장 기본적인 원인은 지연(地緣)관계가 다르기 때문이다.”라고 답변했다. 한국과 한반도 전체는 중국과 일본 사이에 위치하고 있으며, 한국인으로서 만약 한국을 중심으로 세계로 눈을 돌린다면, 우선 바로 눈 앞을 가로막고 있는 서쪽의 중국 대륙과 동쪽의 일본이 보인다. 중국과 일본을 통하지 않으면, 한국은 세계와 직접 연결될 수 없다. 일본 역시 비슷한 상황이다. 따라서 19세기 중엽 세계와 연결된 후, 한국과 일본은 자연스럽게 강한 동아시아 의식과 유대감을 갖게 되었다. 하지만 중국은 다르다. 중국은 국토가 넓어 주변에 대략 20개의 인접국이 있었기 때문에 한국과 일본처럼 하나의 방향성을 가진, 경계가 명확한 핵심 지역 연대감이 생길 수 없었다. 또한 중국과 한국은 19세기에서 20세기에 이르는 세계 식민주의 체제 속에서의 관계 역시 서로 다르다. 한국은 오랫동안 일본의 식민지였으며, 일본 역시 오랫동안 한반도와 중국을 식민 경영의 주요 목표로 삼았기 때문에, 동아시아 관계는 줄곧 한국과 일본 두 나라의 주요 관심사였다. 그러나 중국은 오랫동안 열강 제국 서로간의 분쟁으로, 직접적으로 세계 열강들과 대면할 수 밖에 없었다. 만약 근대 국민국가의 가장 중요한 의미가 민족 독립이라면, 한국의 민족 독립은 동아시아 지역 내 일본

5) 백영서 : 《20세기형 동아시아 문명과 국민 국가를 뛰어넘어 : 한민족 공동체의 선택(超越20世紀型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 : 韓民族共同體的選擇)》, 당대한국(當代韓), 200년 춘계호, 제11쪽

6) 백영서, 천광성(陳光興), 쑤거(孫歌) 동아시아론의 가능성에 관해(關於東亞論述的可能)》, 서성(書) 200년 12월, 42-4

식민주의자들에게 항거하여 투쟁으로 얻어낸 것인 반면, 중국의 민족 독립은 세계—여러 열강들에게 투쟁하여 얻어낸 것이다. 바로 이러한 생존 환경 때문에 반드시 세계와 직접적으로 대면하려는 중국의 성격이 형성되었으며, 한 쪽 날개에만 속하는 동아시아 지역이라는 연대감은 상대적으로 희박할 수 밖에 없었다.⁷⁾

넷째, 근대 중국에 가장 심각한 상처(실질적인 것과 심리적인 것)를 준 나라는 같은 동아시아에 속하는 일본이다. 일본 침략 행위의 명분 역할을 한 “대동아공영권(大東亞共榮圈)” 이론은 현재까지도 중국 민중들의 기억 속에 깊은 화상처럼 아물지 않고 남아 있다.

중국 지식계는 “동아공영권”을 매우 경계했다. 중일 관계 분야의 연구 목록을 열람하면 “대동아공영권”에 대한 경계심과 비판이 매우 중요한 위치를 차지하고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또한 지식계의 이러한 경계심과 조심성은 민중의 인식과 정서와도 완전히 부합되었다. 최근 일본 하토야마 유키오 총리가 “동아시아 공동체”를 제의해 일본에서 호평을 받았고, 중국 정부 역시 긍정적인 화답을 하기는 했지만, 중국 네티즌의 평론만 살펴봐도 대다수의 네티즌들이 이를 “대동아공영권”과 연계시켜 상당히 경계하고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이러한 사실은 역사 문제는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사라지거나 저절로 해소되는 것은 아니라는 점을 다시금 상기시켰다. “죽은 자가 산 자의 발목을 잡는” 것으로, 역사가 현실의 거대한 장애물이 되는 것이다. 이러한 점에서 침략 전쟁에 대한 독일과 일본의 처리 방식을 비교해 보는 것은 여전히 상당히 유익하다. 독일 역대 정부는 명확하고 철저하게 전쟁 책임을 인정하였고, 국민 의견 역시 역사상 다른 나라에게 피해를 주었으며 이러한 일이 다시 발생하는 것을 결연히 방지해야 한다는 입장이 압도적이어서, 독일 민족의 굳건한 자기반성의 힘과 재생의 용기를 드러냈다. 한 독일 학자는 “독일은 매우 깊이 나치주의를 반성하고 있다. 자신들의 역사를 이렇게 자아 비판하는 것은 과거에는 없었던 일이다.” “독일 정치가가 반드시 준엄하게 나치주의를 비난하는 것은 이미 그들의 의무가 되었다. 만약 정치가가 대담하게 나치에 유리한 말을 조금이라도 한다면, 다음 날 사퇴해야 한다.”라고 지적하였다. 나치주의에 대한 비난을 해야 한다는 것은 독일 정치가의 큰 스트레스로까지 발전했다. 독일 학생들은 많은 시간을 들여 나치주의 관련 역사를 공부하며 역사의 교훈을 깊이 새긴다.⁸⁾ 일본 정치 지도자 역시 전쟁 책임에 대해 명확히 이야기 한 바 있으며, 일본 학자와 각계 국민들 중에 진지한 반성과 사죄를 하는 진보 세력이 힘을 갖고 꾸준히 노력을 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전후 일본에는 시종일관 침략 전쟁의 책임을 인정하지 않고 침략 전쟁의 역사적 사실을 부인하는 언론과 행동이 있으며, 심지어 일부 정치가들이 이러한 언론과 행동을 지지하고 용인하며 이들이 일본 사회에서 강대한 세력을 형성하고 있다는 것 또한 부인할 수 없는 사실이다.⁹⁾ 중국과 일본 이 두 개의 동아시아 주요 국가간 역사 문제가 완벽하게 해결되기 전에는 동아시아 협력에 어두운 그림자가 드리울 수 밖에 없으며, 중국 민중의 동아시아 의식 역시 적극적이고 명확해질 수 없다.

7) 백영서, 李長 :《동아시아사학 재건再造東亞史學》, 독서讀書》, 200년, 기, 40-4쪽

8) 나치주의자에 대한 비평은 하루 아침에 이루어진 것이 아니독일 국제 교과서 연구소를 방문하고對納粹主義的批評不是一蹴而就的——訪德國國科研究所》, 남방인물주간南方人物周刊》 200년 6월 21

9) 부평步平 : 《중국과 일본은 왜 공동 역사연구를 하려 하는가中日爲何要共同進行歷史研究》, 포털사이트 신화(新華)네트워크, 2007년 1월 16일 :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미래지향적인 역사인식을 수립할 있는가東亞地區能否建立面向未來的歷史認識》, 중국도서평론中國圖書評論》 2007년 제11

2. 동아시아론 수립의 합리성 및 문제점

동아시아 연구 분야에 중요한 영향력을 갖고 있는 백영서 교수는 동아시아 역사론 수립의 필요성과 중요성을 이야기 할 때, 이러한 역사론은 서양의 패권주의를 초월하는 것이라고 강조하는 편이다.(물론 그는 다른 관심사항도 갖고 있다.). 그는 “동아시아 역사는 이미 ‘중대 혁명’이라고 불리는 철저한 변혁을 반드시 해야 할 시기에 접어들었다.”라고 했다. 그는 동아시아 3국의 근대 역사학 학술 체계는 20세기부터 점차적으로 수립되기 시작하였고, 한 세기 동안 발전하면서 현재까지 이르렀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지금 우리가 비판의 눈길로 되돌아 보면, 이러한 역사학 체계에 식민주의적 색채가 매우 짙게 나타난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한편으로는 동아시아 근대 역사학 학과 체계의 수립과 형성이 서양 역사학의 영향을 받아, 세 나라가 본국의 역사를 제외한 세계사는 서양 구미 국가를 중심으로 하였는데, 이는 분명히 당시 구미 식민주의 패권이 반영된 것이다. 또 다른 측면에서 동아시아 근대역사학은 우선 일본에서 수립되었기 때문에, 그 중 중국과 한국을 주된 대상으로 한 동양사는 일본의 대륙 침략이라는 포부를 배경으로 기록되었다. 20세기 동아시아 각국의 분과식(分科式) 역사학 학술 체계는 모두 국민 국가를 기본 단위로 삼고, 자국의 역사, 아시아의 역사, 그리고 세계 국가별 역사라는 분과 경계선을 두었다. 그는 이는 이미 현재 세계 인식에 있어 필요한 것에 부응하지 못한다고 판단했다. 각 국간 연계는 강화되고, 국민 국가의 경계선은 날로 약화되어가고 있는 오늘날, 과거의 이러한 분과식 역사학 체계는 와해되고, 종합적인 역사학 체계가 이를 대체해야 한다는 것이다.¹⁰⁾

본인이 알고 있는 바에 의하면, 동아시아론의 합리성에 관한 중국 학자들의 생각은 백영서 교수의 시각과 그다지 같지 않기 때문에, 일반적으로 서양의 패권을 뛰어넘는다거나 역사학의 체계를 재구성하는 연구를 진행하지는 않는다. 백교수가 제기한 원래의 역사론을 대체할 “지성 실험의 동아시아” 구상에 대해 중국 학계는 신중한 반응을 보이고 있다. 李長莉는 “지성 실험의 동아시아” 구상으로 동아시아의 문화 유산을 다시금 정리한다면 현대 사람들이 관심을 갖는 여러 “동아시아 가치”와 같은 문제들을 고찰하는데 매우 효과적일 것이라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이 교수는 이 관점이 “역사학 혁명”의 핵심 이념이라고 분명하게 인정하지는 않았으며, 역사학의 새로운 영역을 개척하는 노정표에 더 가깝기 때문에 원래의 역사학 영역과 병행되지만 매우 독특한 새로운 연구 영역으로 발전할 수 있다고 하였다.¹¹⁾

중국 학자들은 보통 아래의 두 가지 관점에서 동아시아론의 합리성을 논증한다. 첫째, 사실의 관점으로 동아시아가 객관적으로 존재하는 “실체”라는 것이며, 둘째는 현실과 미래의 관점으로 동아시아의 평화적인 발전에 있어서 동아시아론 수립이 갖는 의미를 강조하는 것이다.

10) 백영서, 李長: 《동아시아사학 재건再造東亞史學》, 독서讀書》 200년 기, 38-3쪽과4

11) 백영서, 李長: 《동아시아사학 제》, 독》 200년 기, 4

보편적으로 중국 학자들은 “동아시아”는 상상의 산물이 아니며, 서양 식민 언어가 반영된 공동체가 아닌, 역사와 현실 속에서 확실히 존재하는 서로 매우 유기적인 지역이라고 여긴다. 한성(韓昇) 교수는 “동아시아가 공동의 문화적인 기초를 지니고 있는 문명 지역이라는 것은 역사적인 사실로서, 그 근원은 천 여 년 전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간다. 이것은 결코 외부에서 강요된 개념이 아니며, 서양 세계 식민지 전략에 설정된 개념이 전환되어 받아들여진 것은 더더욱 아니다.”라고 하였다. 그는 동아시아 기본 문화의 기초를 구성하는 요소는 일본 학자 니시지마 사다오(西島定生)가 제시한 한자, 유학, 율령(律令)제도와 불교라는 4대 요소를 제외하고도, 교육과 기술이라는 두 가지 요소를 더해야 한다고 밝혔다.¹²⁾ 《동아시아 세계 형성사론(東亞世界形成史論)》이라는 책에서 그는 중국 고대의 대외관계 이론 및 한나라와 당나라 사이 각 시기의 대외 정책을 분석하여, 당나라 시대까지 동아시아 세계의 형성 과정을 자세히 고찰하였다. 특히 중국과 한반도 및 일본 사이의 빈번한 상호 유기적인 관계를 염두에 두고 유기적으로 연계된 고대 동아시아 세계를 독자들 앞에 펼쳐 보였다.

양권(楊軍)과 장나이허(張乃和) 교수가 책임 편집한 《동아시아사(東亞史)》 역시 동아시아 지역을 “실체”로 보고 연구한 것이다. 이 책은 동아시아의 형성 과정과 상호 관계를 전반적으로 서술하였으며, 편집 체제 면에서 국가별로 서술하던 전통적인 방식에서 벗어나 고대부터 현대까지의 동아시아 역사를 지역별로 기술하였다.¹³⁾ 학자들은 이 책이 “우리 나라 학술계 최초로 공개 출판된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역사 전문서적으로 무에서 유를 창조해냈다.”, “창조적인 작업”이라고 평했다.¹⁴⁾ 필자는 이 책의 편집 체제가 다음과 같은 두 가지 큰 특징을 갖는다고 생각한다. 첫째, 지역별 서술을 위주로 하되, 지역별 서술과 국가별 서술을 서로 결합시켰다. 작자는 동아시아를 황하(黃河) 유역, 장강(長) 유역, 몽고(蒙古) 초원, 칭짱(靑藏) 고원, 텐산(天山) 남북, 동북아와 동남아 이렇게 7대 구역으로 나누고, 중국 역사를 서술할 때 역시 지역에 치중하여 서술함으로써 중국통사(通史)와 같아지는 것을 피했다. 둘째는 상호 관계에 중점을 두었다는 점이다. 동아시아 각국의 역사를 서술할 때 각 국간 상호 유기적인 관계에 대한 분석을 첨가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고대 부분에서는 동아시아와 세계라는 장(章)이나 절(節)도 만들어 그 자체로 하나의 전체인 동아시아와 세계 다른 부분과의 관계를 서술하였다. 평론가는 이러한 구분 방식은 동아시아 역사 발전 맥락에 부합하며, 이로써 중국을 핵심으로 하는 동아시아의 핵심과 외연이 이중으로 동글게 둘러싸인 지역구조를 만들어 냈고, 문화 과도기 지역의 특수한 정치와 경제 및 문화적인 생태도 소홀히 하지 않게 되었다고 하였다.

종적 발전이라는 측면에서 작자는 동아시아 역사를 7개 시기로 나누었다. (1) 초기 동아

12) 한성(韓昇) : 동아시아 세계 형성사 후기東亞世界形成史論·後記》, 제53-5

13) 양, 장나이허 주편 : 동아시아기원전에서 20세기 말까지東亞史——從史前至20世紀末》, 창춘출판사(長春出版社) 200년 : 천징옌陳景彦 : 귀중한 창조, 명확한 유감—<동아시아사> 논평可貴的創新, 明顯的缺憾——評〈東亞史〉》, 사학집간史學集刊》 200년 기. 이 책에서 이야기하는 동아시아 지역은 통용되는 개념보다 매우 넓어(작자는 그들이 사용하는 개념이 더 보편적이라고 생각함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 대륙과 섬 및 동아시아와 동남아시아를 포함하는 15개 국가와 1개 지역으로 중국, 북한, 한국, 일본, 몽고, 인도네시아, 브루나이, 필리핀, 싱가포르, 말레이시아, 베트남, 라오스, 캄보디아, 태국, 미얀마와 아시아의 러시아 지역을 가리킨다

14) 주환朱寰 : 서序》, 양권과 장나이허 주편 : 동아시아기원전에서 20세기 말까지

시아 세계(상고시대—기원전 3세기 말). 이 시기 동아시아의 유일한 국가는 중국이었다. 이 시기에는 중국만이 다른 지역과 상호 작용을 하였기 때문에 국가간의 상호 작용이라고는 할 수 없다. (2) 지역 구조 형성 시기(기원전 3세기 말—8세기 말). 동아시아에 다른 국가가 나타나 국가간 상호 작용이 생겼다. 이 시기의 특징은 주로 중국의 기미(羈縻)* 체제에서 드러난다. (3) 다민족 국가가 경쟁적으로 발전하는 시기(8세기 말—13세기 말). 이 시기에 조공 관계가 나타나기 시작했고 동아시아의 조공 체계가 태동되고 있었다. (4) 조공 체계 시기(13세기 말—1874년). 이 시기는 동아시아 조공 체계의 성행 및 쇠락 시기로, 조공 체계는 서양 세력의 동양 진출과 함께 와해의 길을 걷기 시작했다. (5) 조약(條約) 체계 시기(1874—1945년). 동아시아가 조약 체계를 길을 걷기 시작했다. 그러나 서양 세력의 장기간 존재와 동아시아 내부의 주도권 쟁탈전으로 동아시아는 진정한 조약 체계를 수립하지 못했다. (6) 냉전시기(1945—1992년). 동아시아는 양극 대치라는 국제 체제 속에 처해 있었지만 내부의 상호 작용은 점차 강화되었다. (7) 탈냉전시기(1992년—). 이 시기는 현재까지도 계속되고 있으며, 동아시아 지역의 통합이 심화되었고, 많은 어려움에도 직면했다.¹⁵⁾

중국 학자는 습관적으로 “실체”라는 관점에서 동아시아 역사를 고찰하며, 일정한 “허구성”과 “유동적인 불확실성”을 가지고 있는 개념에 대해서는 비교적 신중한 자세를 취한다. 이는 역사의 객관성과 공정성 및 정치적 가치를 믿는 중국 전통의 역사학 관념과 일맥상통한다.

동아시아가 공동의 역사를 가지고 있는 것은 분명하기 때문에 이를 발굴하고 정리하는 것은 동아시아론 수립의 탄탄한 기초가 된다. 또한 동아시아 역시 서로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는 현실과 미래에 직면해 있는 것이 분명하기에, 동아시아의 평화로운 변형이라는 필요성은 학자들이 동아시아론에 관심을 기울이는 중요한 출발점이기도 하다.

동아시아 학자들은 세계화와 함께 다가온 지역화의 흐름에 관심을 기울이고 있다. 백영서 교수는 “자본주의가 전세계에 확산됨에 따라 민족 국가의 역할이 나날이 감소되면서 지역권이 다시 한 번 주목을 받고 있다. 특히 경제 위기에 처해 있는 최근의 동아시아는 더 이상 이 문제를 생각하지 않을 수 없는 지경에 이르렀다. 미국이 강권하는 ‘미국 방식’을 모델로 하는 신자유주의에 대한 대처 방안은 세계 시장 방식을 극복할 수 있는 대체 방안을 찾는 것이다. 이는 결코 세계 시장에서의 경쟁력을 확보하기 위해서만은 아니다. 만약 동아시아인들이 그것을 찾을 수 있다면(아마 반드시 찾겠지만), 그 때 동아시아인들의 역사적 경험은 이용 가능한 자원의 보고가 될 것이다.”¹⁶⁾라고 하였다. 중국 학자들 역시 이에 동의하였다. 부평(步平) 교수는 “경제 글로벌화라는 배경 속에서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모두 앞에서 언급된 일찍이 아시아 인식 공간에 영향을 주었던 과정에 대한 반성이라는 공동의 임무에 직면해 있으며, 또한 동아시아(아시아)로써의 자아를 찾고 있다. 동아시아 주변 세계의 국제화와 지역 협력의 빠른 발걸음으로 인해, 동아시아 각국 정부와 국민들은 강한 긴박감을 느낄 수 밖에 없게 되었다.”¹⁷⁾라고 하였다. 李長莉 교수 역시 세계화라는 관점에서 동아시아 의식의 각성을 관찰하였다. “세계화로 세계 경제와 문화 지도가 재편되고, 탈(脫)

15) 천정연 : 귀중한 창조, 명확한 유감—<동아시아사> 논》, 사학집》 200년

16) 백영서 : 《21세기를 앞두고 다시 동아시아를 생각하다》, 독》 199년 기,

17) 부평 :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미래지향적인 역사인식을 수립할 수 있는》, 중국도서평》 200년 1기,

국경과 네트워크 연계가 강화되면서 지역 특징과 지역 의식이 두드러지게 되자 서양 역사 학계에 ‘세계 체제 학파’가, 동양의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는 아시아 의식과 동아시아 의식의 각성이 나타났다. 이에 따라 최근 일본과 한국 역사학계에 동아시아 역사 재구성이라는 사조가 생겨났는데, 이러한 모든 것들은 세계화 변동에 대한 역사학계의 화답이라고 할 수 있다.”¹⁸⁾

동아시아가 함께 세계를 지향한다는 의미에서 “세계화”와 “지역화”에 대한 화답을 이야기 한 것이지만, 동아시아 각국의 내부 관계 처리라는 점에 대한 지식계는 중요한 견해는 바로 미래의 평화 공존을 실현하기 위해 반드시 국경을 초월한 공동의 역사 인식을 수립하도록 시도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중국 학자들에게 이러한 초초함과 사명감이 특히 두드러지게 나타난다. 한 학자는 “최근 몇 년간 동아시아 국제 사회, 특히 중국과 일본 및 한국과 일본 사이에 역사 문제를 둘러싼 비교적 격렬한 논쟁이 발생했다. 역사 문제에 대한 의견 불일치는 일정 정도 동아시아 국제 관계에 영향을 주어, 중일관계와 한일관계의 정상적인 발전에 부정적인 영향을 미치게 된다. 이웃 나라간의 역사 문제 해결 여부와 각기 다른 국가들 간 공동의 미래지향적인 역사 의식 수립 여부는 많은 동아시아 지역민들이 관심을 갖는 문제이다.”¹⁹⁾라고 하였다. 미래지향적인 공동 역사 의식 수립의 관건은 일본이다. 구체적으로 말해, 중한 양국에게는 일본의 침략이 초래한 역사적인 상흔을 어떻게 해소할 것인가 하는 문제이고, 일본에게는 어떻게 역사를 반성할 것인가 하는 문제인 것이다. 따라서 동아시아론 수립의 취지는 아시아의 평화이며, 전쟁 책임의 인정이 그 중점 사안이다.

공동의 역사인식을 수립하기 위해 한중일 3개국의 학자들이 각고의 탐색을 통해 좋은 성과를 거두어 《동아시아 3국의 근현대사(東亞三國의近現代史)》라는 영향력있는 역사서를 출판했다. 적어도 중국 역사학자인 본인이 보기에 이 책은 매우 성공적인 시도이다. 만약 우리가 이 책의 편찬 설명을 보지 않았다면, 사실 이 책이 3국 학자들의 공동 집필이라는 것을 발견하기 어려웠을 것이다. 내용의 선택이든 체제의 확립이든, 또한 주요 관점의 논술이든 모두 중국 학자가 편찬한 보급을 위한 창의적인 작품이라고 볼 수 있을 정도이다. 이는 공동의 역사 서술이 가능하다는 것을 증명하는 예이다. 3국의 학자들이 공동 편찬한 이 역사참고서는 미래지향적인 공동 역사 인식 수립이라는 면에서 모범이 되었으며 아시아의 평화를 촉진시키는 적극적인 행동으로써, 역사적 사실 공유 촉진과 미래지향적인 역사 인식 수립 촉진 및 아시아의 평화 건설에 긍정적인 의미와 국제적인 영향을 주었다.

이로써 동아시아론 수립이 충분히 합리적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또한 이미 3국 학자들이 성공적인 시범을 보여주었다. 그러나 동아시아론 수립 과정에서 적지 않은 어려움에 직면하게 되기도 한다.

동아시아 지역 범위 확정의 문제가 바로 그것이다..

앞에서 언급했듯이 중국 학자들 마음 속의 “동아시아”는 기본적으로 중일 양국과 한반도를 의미하고, 이는 지리적으로는 “동북아시아”인데 단지 습관적으로 “동아시아”라고 할 뿐이다. 이러한 정의는 주로 문화의 공통성 및 지역 내부의 활발한 상호 작용에 근거한 것이

18) 백영서, 李長: 《동아시아사학 제》, 독》 200년 기, 3

19) 부평: 《동아시아 지역은 미래지향적인 역사인식을 수립할 수 있는》, 중국도서평》 200년 1기,

다. 문명의 공통성이라는 점에서 중국 조선 일본 베트남은 고대에 한자를 사용해 대체로 비슷한 문화적 기초를 갖고 있어 동일 지역으로 귀속시켜야 할 것 같다. 하지만 고대에 베트남은 일본 및 조선과는 밀접한 교류가 없었으며, 상당히 늦은 시기에 이르러서야 양측의 교류는 주로 중국의 중개를 통해 이루어졌다. 따라서 내적으로 긴밀히 연결되고 역사 발전 측면에서 서로의 영향이 매우 큰 지역을 구성하기는 어려웠다. 반면 중국 일본 한국 3국은 문명의 공통성을 갖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상호 작용도 활발해서 3국을 하나의 연구 단위로 보는 것이 합당하다.²⁰⁾

그 뿐만 아니라, 근대가 남긴 역사 문제 해결이라는 관점에서, 이 3국(과 한반도 북부)을 하나의 전체로 보아 연구하는 것이 적당하다.

그러나 연구자의 시야가 세계화 시대의 지역 협력을 바라보고 있을 때, 혹은 각국간 그리고 각국 내부의 다양성 문제를 바라보고 있을 때, 이러한 동아시아 관념이 반드시 적용되는 것은 아니다. 국제 전략적 관점에서 15+1 동아시아 개념을 주장하는 학자는 중국의 동남아시아 지역 전략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은 가상을 한다. 서부대개발(西部大開發)을 통해 중국 서부의 각 성과 중앙아시아 5개국을 하나의 경제무역구로 만들고, 동북의 오래된 공업기지를 진흥시켜 동북아에 또 다른 경제무역구를 세우며, 발달한 동남 연해 지역을 통해 아세안과의 협력을 강화시킴으로써 중국 동남부 각 성과 동남아 각국의 제3의 경제무역구를 설치하여 광대한 중국 영토와 자원을 이용해 이 3개의 경제무역구를 연결시켜 동아시아 공동체 형성 및 동아시아와 다른 지역의 상호 작용을 추진한다는 것이다.……동아시아 각국이 공동의 경제 이익에 기초하여 정치적으로 점차 같은 목소리를 내어야 동아시아 공동체 형성에 대한 외부 저항이 약해지고, 동아시아 동부 변경의 몇몇 냉전의 얼음 조각들이 최종적으로 녹아 새로운 형태의 동아시아 공동체라는 이상이 비로소 현실이 될 것이다. 따라서 동아시아 공동체 건설을 위해 중국은 전략적으로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시야에서 벗어날 필요가 있다. “서쪽”을 보고 “남쪽”을 봐야지, 주의력을 동아시아 동부의 환형(環形) 지역에만 집중시켜서는 안된다.²¹⁾

또 다른 측면에서 당연히 동아시아에 속한다고 보이는 중국이라도 동아시아로의 귀속에 전혀 의문이 없는 것은 아니다. 쑨거(孫歌) 교수는 “동아시아 문제를 이야기 할 때, 중국을 완전히 포함시킬 수는 없다. 중국은 기본적으로 동쪽의 유교지역만을 동아시아에 귀속시킬 수 있을 뿐이다. 시짱(西藏)과 신장(新疆)은 문화적으로 서아시아에 귀속시켜야 한다.……동아시아라는 표현은 누구의 것인가? 사실 ‘동아시아’라는 표현은 일본과 한국의 것이어야 한다. 중국이 ‘동아시아’라는 이러한 사고는 어떤 상황에서는 유효하기도 하지만 항상 유효한 것은 아니다. ‘동아시아’라는 말로는 중국의 서부와 서남부 지역을 논할 수 없다는 점이 바로 그 예이다.”라고 하였다. 따라서 “동아시아”가 절대적인 전제라는 것에 의문을 가져야 한다.²²⁾ 이는 아마 백영서 교수가 “실체”로써의 동아시아에 반대하며 “지성 실험의 동아시아”를 주장하는 이유 중의 하나일 것이다.

20) 한성 : 동아시아 세계 형성사 후》, 푸단대학출판사 2009년, 제53쪽

21) 양권楊) : 중국과 일본, 그리고 동북아 공동체 : 역사에서 현실로, 與東共同從歷史到現》, 사학집간集刊》 200년 기, 1

22) 백영서, 천광성, 쑨거 동아시아론의 가능성에 관해關於東亞論述的可能性》, 서성書城》 200년 12월, 4

하지만 “무엇이 동아시아인가”라는 문제는 그래도 비교적 쉽게 해결할 수 있다. 연구자들이 관련 토론에서 먼저 정의를 내리면 언어의 공동 기초를 수립하기 어렵지 않다. 처리하기 비교적 어려운 것은 “민족 국가 서술”의 강력한 포괄성과 침투력이다.

근대 이후, 민족 국가 건설은 각국 역사 발전의 주축이자 각국 역사학의 “중심 서술”이었다. 이는 서양 어휘인 패권의 산물일 뿐만 아니라 실제 역사를 반영하기에 더욱 중요하다. 그러나 이러한 민족 국가를 주축으로 하는 서술 방식이 지역사(地域史)를 구성하고 국경을 초월하는 역사와 대화를 하기에는 확실히 선천적으로 공존성이 부족하다. 이러한 공존성 부족은 민족 국가 서술 제거와 “대국의 악몽”에서 벗어날 것을 힘써 주장하는 백영서 선생의 동아시아 연구에 대한 중국학자의 평론에서 볼 수 있다.

백영서 교수의 동아시아론은 “진정한 의미의 동아시아 시각” 형성에 한반도의 역할을 매우 강조하고 있다. 그는 “반드시 소홀히 했던 ‘주변’의 주체를 고려 대상에 포함시켜야 진정한 의미의 동아시아 시각 형성에 도움이 될 것이며, 또한 20세기 강대국의 꿈에서 벗어나는데 도움이 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주변의 주체”는 (중국 국경 내 각 소수 민족을 포함한) 많은 민족과 국가 및 국가 내부의 작은 지역을 포함해야 한다. “여기에서 한반도의 역할을 힘을 주어 강조하고자 한다.” 한반도는 실질적으로 동아시아의 운명에 중국인과 일본인이 진정으로 인식해본 적이 없는 중대한 영향을 미치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영향은 한편으로는 역사적이고 현실적이다. “근현대사의 갑오 청일전쟁, 러일전쟁, 중일전쟁, 한국전쟁 등이 동아시아의 운명에 미친 영향과 한반도 남쪽 지역의 무시할 수 없는 경제적 역할은 말하지 않아도 아는 것이다.” 또 다른 측면은 미래지향적인 것이다. 한“반도 남북의 대치 상황은 분명히 동아시아 지역 협력체 구성의 결정적 장애이다. 따라서 앞으로 한반도의 발전 방향, 특히 분단 해결의 과제는 중국의 일국양제(一國兩制) 실험이 부분적으로 실현되는 것처럼 반드시 기존의 국민 국가 위주의 사고 방식을 뛰어 넘어 지역으로 확대된 사고 방식으로 대체되어야 한다.”²³⁾ “현재 제국의 기억에서 상대적으로 비교적 자유롭고 역사적으로도 ‘작은 중심’의 역할을 했었기에, 그 가능성과 한계성을 하나 하나 경험해 온 한국은 각 중심 사이에서 조절자와 평화 변영의 촉진자 역할을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에 상응하는 몇몇 내부 개혁을 한다면 우리 한국이 자연스럽게 21세기 동아시아 역사에서 매우 중요한 위치를 점유하게 될 것이다.”²⁴⁾

한반도의 역할을 강조한 백교수는 중국 학자의 비난을 받았다. 비평자는 한국에 동아시아 어휘가 등장한 배경은 경제 발전과 더불어 자신감이 생기자, 더 나아가 동아시아 공동 문화 의식을 나타내는 새로운 방식을 찾고자 하는 것이라고 하였다. 또한 백영서 교수의 “이중 주변 시각(雙重周邊視角)”으로 동아시아를 본다는 것은 역시 그 배후에 한국 민족주의 색채가 매우 짙게 깔려 있음을 숨길 수 없다고 지적했다. “중일 양국에 비해 한국은 동아시아 역사상 중심국의 역할을 한 경험이 없다. 백영서의 동아시아 역사는 동아시아 체제에서 한국의 독특하고 중요한 지위를 부각시켰으니, 미래 동아시아 체제 창건이라는 중대한 임무는 마땅히 한국이 최우선적으로 맡을 수 밖에 없다.”²⁵⁾는 것이다. 이는 사실상 백영

23) 백영서 : 《21세기를 앞두고 다시 동아시아를 생각하다》, 독》 199년 기,

24) 백영서 : 동아시아 지역 질서, 제국을 넘어 동아시아 공동체로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개방시대開放時代》 200년 기, 1

서 교수의 주장을 민족주의 담화 시스템에 귀속시킨 것으로, 국민 국가를 초월하는 공감대를 형성하고자 하는 백영서 교수의 지향점과는 정반대이다.

필자는 본국의 역사와 민족국가 서술을 초월하고자 했던 백영서 교수의 진심을 전적으로 믿는다. 그러나 백교수의 관련 글들을 읽을 때, 많건 적건 위에서 언급한 비평자와 같은 느낌을 받게 되니, 민족주의가 역사학자들에게 얼마나 심각한 영향을 주었는지를 알 수 있다.

따라서, 어떻게 민족 국가 서술과 지역 서술의 균형을 맞출 것인가는 연구자들이 직면한 거대한 도전이 될 것이다.

동아시아 역사에 대한 중국 학자들의 관심이 점차 높아지고 있다. 중국 일본 한국 3개국 학자들의 밀접한 교류와 협력은 이 연구의 전망이 낙관적이라는 것을 보여준다. 이 연구의 추진은 학술 연구에 중요한 영향을 줄 뿐만 아니라 현실 국제 관계 처리에도 심대한 영향을 줄 것이며, 미래 동아시아의 발전에 깊은 영향을 미칠 것이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우리는 동아시아 역사 연구가 더욱 풍성한 성과를 거두기를 기대한다.

2009년 9월 30일, 베이징

25) 쑤쉬에옌(孫雪岩) : 한국 학자 백영서의 동아시아 분석試析韓國學者白永瑞的“東亞論述”》, 산둥사범대학 학보(山東師範大學學報)》 200년 기, 46, 4

“大东亚”想像 ：以近代中国话语为中心

■ 雷 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大东亚”想像：以近代中国话语为中心

雷 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次〉

- 一，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观
- 二，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
- 三，汪伪的“大亚洲主义”
- 结 尾

在近代“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东亚”遭到“西方”的侵略，东亚传统以“中国”为“天下中心”、四方来朝的“朝贡体系”逐渐崩溃瓦解，“大东亚主义”或曰“亚细亚主义”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日本产生的一种以欧美和世界为参照物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当东亚诸国采用“亚洲”、“东亚”概念时，即意味着采取了近代或曰西方的空间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观的“天下”模式。

一种思想体系产生后，在其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历程中，往往会产生无比复杂的变异、流派，而与社会、国家、国际关系、历史变迁紧密相联的思想体系，在与纷繁无比、剧烈变动的现实的互动中，其变化性及体系内部的差异性更为繁复，甚至难以厘清。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从形成、发展到消亡，一直与东亚“华夷秩序”的格局变动、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密切相关，因此百余年间经历了一个复杂异常的历史过程。所以，对此思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将其条分缕析，确有意义。多年来，此课题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本文的研究焦点却不是作为主体的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而是作为客体的近代中国对“亚细亚主义”的解读。换言之，本文将“客体”作为“主体”，即近代中国作为主体对来自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反应。

进一步说，由于“亚细亚主义”的复杂性、多义性，大多研究者长期以来对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的重点在厘清其早期是否具有反抗西方侵略的客观进步性质、哪些思想家具有反西方侵略的进步性哪些思想家具有支持日本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动性、它是从何时开始变成侵略思潮。日本学者竹内好、狭间直树都认为“亚细亚主义”具有复杂性，既有反抗欧美侵略的一面，又有与侵略亚洲各国“重合”或曰发展为侵略理论的一面。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此更有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细致的研究。¹⁾

但本文并不“斤斤计较”于日本“亚细亚主义”中哪位思想家“进步”、哪位思想家“反动”、它何时具有反西方侵略的“进步性”、何时开始变成具有侵略性的反动思潮，而是“聚集”于近代中国、将原本的“接受者”作为“主体”看待。因为思想的“价值”总是相对于主体需求而言，是主客体间的复杂互动，忽视或轻视“接受者”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动性，就难以更深刻地理解、解释许多思想体系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深受哲学诠释学影响的现代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存在于历时态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中：“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使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

1) 有关这一问题的最近的争论与研究见：盛邦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亚洲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最重要的研究专著为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²⁾如果说文学、文艺作品尚且要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积极参与”才有意义，那么，一种与“接受者”存亡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对外关系理论，则更要注重“接受者”的理解、诠释和“积极参与”，更应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理解其意义。因此，本文拟对孙中山、李大钊和“汪伪”对日本“亚细亚主义”的观点略作考察。

简言之，本文是从思想流传的“接受史”、“效果史”角度，对近代中国的“亚细亚主义”话语略作研究，以期能对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乃至对“东亚”历史的研究和理解更加深刻。³⁾

一，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观

自1895年广州举事失败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长期以日本为发动革命的根据地。在日期间，他与日本朝野各种人士交往密切，其中许多人支持甚至参加了他的革命活动。他在日本居留活动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日本“亚细亚主义”兴起之时，孙中山自然也受到他们的这种思想的影响，而且受影响的程度之深、时间之长，格外引人注目。

1897年，他旅居日本横滨时，结识宫崎寅藏。宫崎对孙中山的事业大表理解、全力支持，孙中山兴奋地说：“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君等之来缔交于吾党，是其证也。夫吾党所以努力奋发，以期不负同胞之望。”⁴⁾

辛亥革命后，他这方面的言论更多。

1913年2月他到日本访问，对日本各界和中国留学生发表十多次讲话和演说。他在这些及稍后在国内的演讲中都从历史、文化、种族、经济、地理等方方面面强调中国、日本应共同“携手”反抗“欧西”之侵略。他说：

“中国日本两国数千年来亲密关系，种族、文字相同。两国之外交，不宜依随世界列国之共同行动，当恢复古来亲密之关系。中日两国宜取一致行动，以保障东亚之利益。”⁵⁾“中国将来经济及实业之发达，实为日本之利”，“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关系极古，深望此后两国民之结合。”⁶⁾“亚洲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二，今日一部分屈服于欧人势力范围之下。假使中日两国协力进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光荣之历史。”“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应在我辈黄人。”⁷⁾“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有保持之义务”，“现今在亚洲之独立国，即日本及中国二国，而维持现今之东亚和平，犹不能不多所望于日本，日本及中国实兄弟之国也。”“但单只日本一国，亦决不能终久维持东亚之大势，当与中国扶助，携手进步。”⁸⁾“希望此后东亚最强之日本与东亚最大之中国，于经济界互相提携，互相扶助。日本维新岁月较中国久，一切有所经验，吾国人希指导之日尚长也。”⁹⁾“中日两

2) 〈德姚、〈美霍拉勃著，周金元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4～2页

3) 由于本文主旨不是研究“亚细亚主义”或“大东亚”思想体系在日本的产生与变化，因此不拟详细考察这种思想的源流、各思想家、思想流派的异同，故本文根据行文需要，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另外，我知道，如果对“亚细亚主义”或“大东亚”思想体系在近代朝鲜的“接受史”、“效果史”也作备考察研究，对这一思潮及“东亚”的理解将更全面、深刻，但能力所限，本人未对朝鲜情况作任何研究，至为遗憾。

4)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5) “在日本大冈育造之主持的宴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7页。

6) “在东京实业家联合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页。

7)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7、26页。

8)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页。

9) “在日本邮船公司招待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页。

国青年学生，实将来最有望之人，愿各勤所学，以尽其天职。诸君之天职，为保障东亚之名誉，维持东亚之局势，不受异种人之侵害。愿诸君以此义相结合，而互担此任于双肩也。”¹⁰⁾相信他们提出的大亚洲主义表明：“我两国人本出同种同根，决无相异之理”，因此希望中日两国“自今而后，益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则岂不愉快哉！”¹¹⁾

信奉、支持、宣传大亚洲主义，必须面对、回答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一次次侵略。对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当原谅此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东亚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纵有些小齟齬，亦须顾全大局，不能成一问题。日本从前对于中国，行侵略政策，亦见中国国势大不可为，假使受制于欧洲，则日本以三岛海国，决难巩固，故不得已”而侵略中国。“假使从前无日本，则东亚前途必不可问，东亚地方，得留与我辈成就革命事业，都是日本之力”。日本“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我们中日两国，最宜联合一致进行。将来能联合、能亲交与否，这种责任，都在学生诸君身上。”“消灭冲突，解释误会，共同谋亚东大陆之幸福，同为东亚之主人翁。”¹²⁾

由于对日本朝野政要的大亚洲主义抱有相当希望，所以孙中山认为这次访日非常成功，回国后乐观地对国民党干部说：“现在日本在朝在野之政客，均有世界的眼光与智识，且抱一大亚洲之主义。明知东亚大国惟我中华，日本凭三岛立国，地域相接，与中华有唇齿相依之利害关系，若中华亡，日本亦终不适于生存。日人为自卫计，在形式谓之为赞成中华民国，在事实上即是维持日本帝国。故日人对于中华政治之革新，政府与人民均表同情。”“至于日本与民国原为兄弟之邦，利害与共，苟有缓急，必不漠视。兄弟东游归来，所见如此。望同志诸君逢人解释，使中日感情亲密，共享和平，则东亚大局幸甚。”¹³⁾

1917年，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孙中山将大亚洲主义比作美国的门罗主义，大加赞赏：“夫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其门罗主义，统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¹⁴⁾

但是，从1913年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到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再到1917年孙中山领导发动反段护法运动，孙中山一直期盼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政府不仅未支持孙中山，反而支持孙中山的对手。最终，孙中山转而寻求苏俄的支持并得到响应，开始“联俄”政策。这些，必然使他的“亚洲主义”发生某些变化，当然，他并未抛弃“大亚洲主义”。

1919年4月，孙中山接见日本记者时谴责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尔日本人非亚细亚人也”，“尔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人乎？”¹⁵⁾同年6月，国人反对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特权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孙中山就此事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说：“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¹⁶⁾

1923年10月，曾经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犬养毅入阁作邮电兼文部大臣，有拟促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之意，孙中山闻之狂喜，忙致长函。此信大意可概括为三层：第一，他批评、谴责了日本长期

10) “在日本日华学生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21页。

11)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

12)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27页。

13) “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1—52页。

14) “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95页。

15) “与日本记者大江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16)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以来对朝鲜、中国的侵略。亚洲人民在反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中曾“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但日本的穷兵黩武侵略邻国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第二，开始突破“种族论”。他认为未来的战争将不会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是欧亚之间的战争，将是“公理与强权”之战。第三，在这场战争中，苏俄是“受屈”的亚欧人民之友，日本将在“列强”与“受屈者”之间作出选择，他提出日本应支持中国革命、承认苏俄、实行亲中亲苏政策，而且日本的“兴废存亡，端系乎此”。第四，仍对日本抱有希望，认为日本毕竟是东亚国家，有“王道文化”的悠久传统，在公理、正义的号召下有可能幡然悔悟，舍去步欧洲帝国主义后尘之旧路，转而扶持亚洲各国。¹⁷⁾

1924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日本舆论大哗，国内反美情绪浓厚，孙中山认为这是促使日本“为黄种人而觉醒的好机会”，于是在10月特派参谋长李烈钧常驻日本，要其在日本按他的理念筹组“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¹⁸⁾此议自无结果，但却促成了同年11月孙中山经日本前往北京、在日本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这篇演讲，是孙中山晚期的“亚洲主义思想”的充分反映，主要观点如下：一，亚洲文化优越论。“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得到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象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而亚洲的衰落、亚洲各民族先后受欧洲各国的侵略压制只是近几百年的事。二，亚洲人要做亚洲的主人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渐成亚洲第一个独立强国，是亚洲复兴的起点。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三，亚洲文化“王道”论、欧洲文化“霸道”论。世界文化有两种，一是欧洲的霸道文化另一是亚洲的王道文化。欧洲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它重功利、重武力，压迫亚洲，使之不能进步，因此是“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以仁义道德为本，不压迫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亚洲固有的文化就是仁义道德。是“王道”。但是苏维埃俄国最近的新文化极合于东方的新文化，“所以它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四，日本面临“王道”“霸道”的选择。“讲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但是，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亚洲也会出现“行霸道的国家”。“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¹⁹⁾

显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尽管晚期有所调整，如对日本的失望、对日本侵略的严厉批评、对联俄的强调等，但几十年来孙中山确实一直深受“大亚洲主义”的影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或者说孙中山所理解的“大亚洲主义”中有一个基本点却几十年没有变化，而且这一点正是孙中山信奉“大亚洲主义”的根基，即希望以日本为首的“大亚洲主义”能从外部助力，改变中国专制的政治制度而实行宪政，希望日本支持近代中国与西方接轨的制度变革。进一步说，他希望“黄种人”的亚洲，反对“白种人”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但并不反对“白种人”的政治制度，相反，“黄种人”也要实行“白种人”（欧美）的政治制度。

1897年他与宫崎寅藏谈话时即对那种认为中国国情、中国国民性不适合民主共和制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力劝宫崎等支援他的反清革命，宫崎等人想救中国“四万万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而拥护之者”，只有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些目的才能达到，“此事成，其余这问题即迎刃而解矣”。²⁰⁾

17) “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6页。

18) “致李烈钧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页。

19)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1—409页

1903年，对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支那保全论”，孙中山则坚决反对。所谓“支那保全论”产生于1898年10月的东亚同文会成立大会，其主旨是强调日中两国“文化相通，风教相同”，从两国“同文同种”、“唇齿辅车”，号召两国面对欧美列强的侵略面前从政府到民间都应公平相待、守信互利，两国应巩固邦交、加强两国友谊，提出日中联合，共同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此时日本已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去台湾，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由于日本羽翼未丰，在瓜分中国的“盛宴”中不可能它理想中的份额，甚至有可能因中国被瓜分而失去与西方的缓冲，所以提出“支那保全论”。1903年，据“八国联军”血洗北京、辛丑条约签订未久，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中，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亡国之险。但这时，孙中山却明确反对“支那保全论”，因为此时“保全支那”，即“保全”清政府。他认为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是腐朽已极的异族政权，不值得保全，而清廷的汉族官员均为汉奸，“策保全支那者，若欲借此种忘本性，昧天良之汉奸而图之，是缘森木求鱼”，中国“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现在自由之义、民权之风已成世界潮流，“支那人独无观感奋发思图独立者乎”？所以“欲筹东亚治安之策以何而可？曰：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所谓“势”、“情”，就是中国人民因顺世界的自由、民权之大势而成为独立的公民，而不是专制制度的臣民、奴才，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大亚洲主义所希望的“东亚治安”。²¹⁾

1911年7月，孙中山拟由美赴日，就近策划中国革命却被日本政府所拒，他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说：“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独惜近日吾国少年志士，每多误会贵国之经营满洲为不利于支那，此种輿情殊非将来两国之福也。”对自己这次被日本政府所拒至为遗憾，深为不安。“君者吾故人之一也，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輿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事业，俾支那能复立于世界之上，与列国平等，则吾党受日本之赐多矣，汉族子孙百代必永志大德不忘也。”²²⁾

1917年夏，孙中山在领导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护法运动时致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希望日本能“援助正义”、支持中国的革命党人，抛弃支持北洋军阀政府的政策，这才是中日两国“真正之提携”、“真正之亲善”的关键，“东亚之平和可期也”。²³⁾

1919年6月，他在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谴责日本侵华时还强调：“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仍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国官僚，而挫民党，不禁痛之”。²⁴⁾

1920年6月，他在致日本政府陆相田中义一的信中激烈谴责、批判日本长期侵略政府，并明确说明了中国人民反日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支持中国国内的守旧势力：“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近年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恶感日深，根本原因，实由于日本之政策与民国国是不相容，故国人咸认日本为民国之敌”。²⁵⁾

1923年10月他给犬养毅的信中仍劝说道：“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而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夫日本之维新实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二者本属一贯，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对于支那革命何可步武欧洲而忌我害我耶？”他还建议日本应学苏俄

20)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21) “支那保全分割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9—224页。

22) “复宗方小太郎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3—524页。

23) 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

24)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25) “致田中义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277页。

那样帮助亚洲各国发动革命，“为日本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计，倘支那无革命发生，日本当提倡而引导之”，“至于支那革命已经发动，日本当倾其全国之力助成之，以救支而自救”。中国人之所以会对日本反感，“乃日本对于支那之革命，十二年来，皆出反对行动；反对失败，则假守中立以自文。从未有彻底之觉悟，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为日本立国于东亚之鸿图者。”²⁶⁾

简言之，“大亚洲主义”在孙中山的话语中一直与中国国内状况紧密相联，成为他反清、护法，追求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话语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大亚洲主义”在鲜明反对欧美列强侵略的同时，却不否认其“对内”的基本价值观和制度。而且，只要支持他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并不介意“大亚细亚主义”由日本领导或曰主导。

二，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

1912年秋，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与另一位同学一同担任学会编辑部长。年底，该会即出版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将两个月前日本出版的中岛端所著、共12万字22章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全部译出，并逐段附加按语或眉批，严加驳斥，因为《支那分割之运命》从各种角度论证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很快即将灭亡、所以主张分割中国，只能实现东亚之门罗主义，亚洲只有日本之大和民族才能担负起统一东亚之天职。《〈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用译者曰、按语、眉批等形式，对中岛端的所有论点一一反驳，对其中的“东亚之门罗主义”这一章，则斥之为不过是“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辞”。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是集体成果，因此无法断定哪些按语和眉批为李大钊所写，但作为编辑部长，此书的译、评、出版、发行诸事则由李大钊主其事，因此该书的观点和言论，可以看作也是李的思想，而对“东亚之门罗主义”的批评，自然也可看作是李的观点。事实上，李大钊以后对此问题的观点，基本没有根本性变化。

从1914年1月到1916年5月，李大钊在日本留学近两年半，对日本、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自然所知更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在欧洲争战激烈，无暇东顾，日本趁机更加紧了对“东亚门罗主义”或“远东门罗主义”的宣传，主张“亚洲人的亚洲”。1917年2月下旬和4月中旬，李大钊接连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极东们罗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这三篇文章，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新中华民族主义》²⁷⁾中，李大钊认为“日本近来之倡大亚细亚主义”与德国提倡大日耳曼主义、俄国提倡大斯拉夫主义、英国提倡大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美国的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过，李大钊表示：“顾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旨领何在，吾不得知。但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斯非吾人夜郎自大之说，以历史地理考之，此种断案乃逻辑上之必不可逃者也。”而且：“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他认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混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他认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

26) “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404页。

27) “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286页。

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

由于主张中国在“大亚细亚主义”中的主导、领导地位，李大钊必然对日本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表示怀疑，在《极东们罗主义》²⁸⁾（即远东门罗主义）一文中，他就要人们警惕这种“极东们罗主义”。他认为，近几十年来“极东”地区能维持基本平和的局面，主要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但是：“今忽有一国焉，欲在亚东效们罗氏之宣言，是否与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相背而驰？此等世界的大问题，是否可由一国乘欧战方酣之日自由宣言，遂足定为铁案？乃至为是宣言者，是否有此决心与实力，足以贯彻到底？欧战终结后，是否因此宣言致有引起世界大战之虞？凡此种种问题，均为宣言者今日所当熟思而审虑者也。语云：‘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倡言‘极东们罗主义’者，其慎诸！”虽然他是从远东门罗主义打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平衡格局，有可能带来新的大战角度提醒人们警惕，但“今忽有一国”虽未点名，但显指日本，此文重点其实是要人们警惕日本。

在《大亚细亚主义》²⁹⁾中，李大钊再次强调“大亚细亚主义”只能以中国为领导，主导，如果其他亚洲国家强要当“主人翁”，“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的，而召殄灭之祸”。而中国“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当然，中国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吾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而以亚细亚为吾中国人之亚细亚，以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同时，他直接“点名”日本，要人们警惕其侵略性：“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则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

这三篇文章表明：一，此时李大钊接受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概念。二，在大亚细亚体系中起主导作用、成为“主人翁”的应是中国，而不能是亚洲其他国家。三，中国的主导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此点与孙中山有某种相似之处，即“大亚细亚主义”不仅具有“外部性”，还使其具有中国国内改革的“内部性”。四，由隐而显地指出要警惕日本借此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野心。五，一直保留了白种人与黄种人对立的种族论话语。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³⁰⁾一文，表明他的思想在这一年又三个月内发表了根本性变化。

所谓“Pan……ism”即“大……主义”，李大钊现在认为：“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服于其肘腋之下焉。”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军阀与军阀、党派与党派之间都可能会有这种关系。在列举了包括“大亚细亚主义”在内的当时世界上和中国国内形形色色的“大……主义”后，李大钊的结论是：“凡此者，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不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他进一步分析说自己“于此发见二种奇迹焉”：第一，世界上其他国家主张的“大……主义”都是向外扩张，“为扩充之主义”，而中国的“大……主义”为“缩小之主义”。因为“强大优越之民族”多争取

28) “极东们罗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90—291页。

29) “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06—108页。

30) “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44—247页。

向外发展，因为无论是其民族精神还是国家定位都“助其争之本能”，所以国民一致对外竞争；“独自弱小之国，其民似皆能自觉其懦弱无能”，不敢梦想对外竞争，所以“惟有对内以自相残杀焉耳”来“发泄其好争之性者”。由此，他针对“吾国”更深入地分析说：“吾国之持‘大……主义’者，包涵于此‘大’之范围，固不嫌其大，而统驭此‘大’之中心，则不嫌其小，且欲其愈趋愈小，至于一身而止焉。”或是恐人不明白，他又形象地说，就是中国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统治范围象几何学中的圆周一律，越大越好，而自己则象圆心，全部权力只集中于自己这一点。“此中心点者，初犹划定某一地域，某一党派以当之，递嬗而集极于某一人身矣。以地域或党派为中心者，其主义犹为大某地主义，大某派主义；以某人为中心者，递嬗而成大某人主义矣。夫至大某人主义，实现于一国，必为专制之君主，实现于各省，必为割据之群雄。前者有如洪宪之皇帝，后者有如今日之督军，皆‘大……主义’之产物也。”但历史越来越证明：“凡持‘大……主义’以侵陵他人者，其结果必遭失败而无疑。”

为反对并论证“大……主义”必然失败，李大钊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Democracy。他写道：“与‘大……主义’适居反对者，则为Democracy。是语也，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前者尚力，后者尚理；前者重专制，后者重自由；前者谋一力之独行，后者谋各个之并立，此其大较也。”他以一战爆发以来的历史论说Democracy节节胜利，已成历史潮流。所以：“潮流所至，持‘大……主义’者，莫不退避三舍，凡足为其进路之障者，莫不一扫而空之。为时代之精神，具神圣之权威，十九世纪生活上之一切现象，皆依Democracy而增饰彰采。”“近更藉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之力，自西徂东，拯我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情眠之亚洲，以竟其征服世界之全功。”袁世凯、段祺瑞的成败皆由其是顺应还是背逆Democracy而定，因此他们的成与败，其实都是Democracy的胜利。在文章的最后，李大钊乐观地写道：“Democracy于今日之世界，正犹罗马教于中世之欧洲；今人对于Democracy之信仰，正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之信仰。吾目所见者，皆Democracy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Democracy凯旋之声。顺Democracy者昌，逆Democracy者亡，事迹昭然，在人耳目。奈何今之人，犹纷纷树Pan……ism之帜，或依于其下以与Democracy为难，其不自取覆亡者鲜矣！吾不暇为失败之Pan……ism哀，吾但愿为胜利之Democracy祝！”

在李大钊由“大亚细亚主义”到稍后的“新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此文非常重要。这篇文章表明：一，已完全抛弃了“大亚细亚主义”，无论是日本主导、中国主导或是中日共同主导。二，认识到包括“大亚细亚主义”在内的所有“大……主义”的实质都是专制，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作了更尖锐的批判。三，“德先生”是反对专制、反对“大……主义”的锐利武器、并最终取胜。四，比较了“强大优越之民族”与“独自弱小之国”的国民性。这篇文章，尤其是前述三、四两点，是他作为核心成员之一的文化运动的直接反映。

1919年1月，他提出“新亚细亚主义”³¹⁾，其主旨与《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相同，只是将其具体化为“新亚细亚主义”的建构。之所以要提倡“新亚细亚主义”，是因为：“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与应该成立一个相类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亚细亚人应该提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他强调，他所提倡的“新亚细亚主义”“主张拿民族解放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他的预言中，“欧盟”已成现实，显示了他的远见；在各洲联盟基础上组成“世界联邦”，也可能是真正“全球化”的现实路径。总之，他的“新亚细亚主义”最终目的是“完

31)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69—271页。

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因此，对于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李大钊五个多月后却另有解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³²⁾1919年11月初，李大钊又写长文《再论新亚细亚主义》³³⁾，对此再作详细说明。概言之：“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压迫，才提倡新亚细亚主义，这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因此，“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他强调，新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无论何人何国何洲，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没有我们的仇敌”。所以：“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我们相信最善的世界组织都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最后，仍落实到“Democracy”上：“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这是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

在不长的时间内，李大钊从接受“大亚细亚主义”概念，提出中国应为“盟主”，到将其完全抛弃而提出具有强烈世界主义色彩、以全人类的平等、自由、解放为主旨的“新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将矛头指向专制制度、指向各国国内和亚洲内部的强权而不排外（指亚洲不排除欧美），这些都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成为“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一部分。

三，汪伪的“大亚洲主义”

任何一个政权总需要一套理论或曰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汪精卫政权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合法性”先天性缺失，因此更需要建构一套理论或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根据，“大亚细亚主义”便成为它的合法性建构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它的“大亚细亚主义”话语中，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不仅不是侵略，反而是提携、帮助、领导这些亚洲国家/黄种人反抗英美帝国主义/白种人殖民侵略的战争。它想以此话语系统来消解国人对它的“汉奸”、“卖国”认识和指责。同时，它又着意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阐释，以向世人显示自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继承人。

对汪政权上层人物的“大亚洲主义”的研究已多³⁴⁾，故本文拟对《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略作一研究，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些无名之辈，聚集此点可以透视某些“普通民众”是如何被这套话语系统操控的，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对这套话语系统作更深入的分析。

32)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全集》每第3卷，第67页。

33)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74—78页。

34)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韩〕裴京汉：“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张殿：“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史桂芳：《“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这本《论文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于1942年5月编辑出版。事情缘起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据主编者说：“新加坡是近代趋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藉以侵略远东的唯一根据地，在今年二月十五日友邦日本所占领……本会鉴于新加坡陷落，对于大东亚战事有特殊意义，故於三月五日开始登报征文。希望海内外人士对于新加坡陷落后这件事，发抒些感想与希望，并对于大东亚建设一方面，供献些较深切的意见……”³⁵⁾这本论文集，便是由“数千余件”应征稿中“精选”而出，共19篇，近20万字。

不用说，这19篇应征文章篇篇都对“皇军”从奇袭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赞歌，“在这一场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日本实力之坚强，也指出了东亚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却暴露出英美战斗力之薄弱，不堪一击，已由新加坡之后，完全戮穿其纸老虎了。”³⁶⁾同时，这些文章还不忘“自责”，“此时国人不必怀疑日本”，“人们只有以汪精卫先生的‘罪己精神’来责备自己……因为国人对于各种事业，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末日本只有来带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末日本只有来指导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当，那末日本只有反对你，纠正你”。³⁷⁾“目前的军事工作，日军当仁不让，肩负全责，可是我们国人，亦应该在其领导之下，努力从事后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奋斗，女子在内理家，如此男勤女俭，家庭始达美满，今中国亦就是处于妻子的地位，保卫后方，与日本协力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³⁸⁾此类文字通篇皆是，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论文都是以“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这一冠冕堂皇的“反对殖民主义”口号为其“理论基础”的。

一位作者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³⁹⁾这次战争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声，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些文章篇篇都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亚民族，显然已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友邦日本，为了挽救当前的颓势，便毅然发难了这一次的战争，担负起保卫东亚的重任”。⁴⁰⁾而且，这还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英美“金镑集团”“金权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经组织经济”的战斗。于是，除去人种、民族上的“正义性”外还有经济上的、阶级上的“正义性”。这次“大东亚圣战”的威力，证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其他民族则是命定的奴隶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此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将成为没落的观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释。”⁴¹⁾相反，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象“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⁴²⁾

许多文章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

35) 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页。

36) 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

37) 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页。

38) 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

39) 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

40) 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页。

41) 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

42) 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藉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⁴³⁾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⁴⁴⁾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东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谓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其实质是野蛮的，因此要以中国 / 东方文明来救世界、救人类、“为万世开太平”。“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复兴论”这类非常“民族主义”的说词，也可以这样为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服务。

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英美经济剥削和文化侵略是汪伪“大亚洲主义”的核心话语，但这恰恰使人看到，“反对殖民主义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人类的各种行为，包括罪恶，都需要并也真可以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辩”的“理由”；而理论，甚至非常正确的理论本身，也确可被滥用。因此，对各种理论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些慷慨激昂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檄文”还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却原来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

结 尾

源于19世纪中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或“东亚共同体”无疑是近代“西力东渐”背景下，既追寻“现代”又想保持“传统”的产物，其本身就非常复杂，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引起种种不同反应则更为复杂。它自产生起，既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派别、政治力量所利用，又在这一过程中汲取各种思想元素，而“形成”自己。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论述“民族”源起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民族”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⁴⁵⁾如果说“民族”如此，那么“大亚洲主义”或“东亚共同体”更是建构在地理空间相接与历史、文化、思想一致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孙中山、李大钊、汪伪政权对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不同态度、理解、论述、运用及其带来的不同后果说明，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想象”究竟被谁掌控、如何述说、怎样利用。

43) 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

44) 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

45) [美] 本尼迪克·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대동아’의 상상 : 근대 중국의 담론을 중심으로

레이이 (雷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목 차〉

- 一, 손중산의 ‘아세아주의’관
- 二, 이대조의 ‘신아세아주의’
- 三, 왕위의 ‘대아시아주의’
- 결 론

근대 ‘세계화’의 배경 아래서 전통적인 ‘동아시아’는 ‘서양’의 침략을 받았다. 동아시아의 전통은 ‘중국’을 ‘천하의 중심’으로 사방에서 ‘조공을 바치는’ 체계는 점차 와해되고, ‘대동아주의’ 혹은 ‘아세아주의’라고 하는 일본에서 나온 구미와 세계를 참조물로 삼는 사상 체계가 대두되었다. 사실상 동아시아 여러 국가가 ‘아시아’, ‘동아시아’의 개념을 도입할 때 이는 근대 혹은 서양의 공간적 개념을 도입하여 전통적인 ‘화하중심’관의 ‘천하’모델을 대체하였다.

하나의 사상 체계는 나타나 형성, 발전하여 소멸하는 과정에서 비할 수 없이 복잡한 변이, 유폴을 낳게 되고 사회, 국가, 국제 관계, 역사 변천과 긴밀하게 관련된 사상 체계는 복잡하고, 격렬하게 변동하는 현실과의 상호 작용 과정에서 그 변화와 체계 내부의 차이는 더욱 복잡해져서 정리하기가 어려울 정도이다. 근대 일본의 ‘아시아주의’는 형성, 발전에서 소멸에 이르기까지 줄곧 동아시아의 ‘화이질서’ 구도 속에서 변동했고, 국제 정세의 변화, 일본 국내의 사회와 정치 변동과도 밀접하게 관련되어 백여년간 매우 복잡한 역사적 과정을 거쳤다. 따라서 이 사상에 대해 상세히 연구, 분석하는 것은 매우 큰 의의를 갖는다. 오랜 기간 이 과제에 대한 연구는 부단히 심화되어 풍성한 성과를 거두었다. 그러나 본 논문의 연구 초점은 주체로서의 일본의 ‘아세아주의’가 아니라 객체로서의 근대 중국의 ‘아세아주의’에 대한 독해이다. 바꾸어 말하면 본문은 ‘객체’를 ‘주체’로 삼아 즉, 근대 중국을 주체로 삼아 일본으로부터 온 ‘아세아주의’에 대해 반응하고자 하는 것이다.

나아가 ‘아세아주의’의 복잡성, 다의성으로 인해 대부분의 연구자들은 오랜 기간 일본 ‘아세아주의’ 연구의 중점을 아세아주의 초기에 서양 침략에 대항하고자 하는 객관적인 진보적 성질이 있었는지 여부를 밝히는데 두었다. 어떤 사상가들은 반서양침략의 진보성을 가졌고, 어떤 사상가들은 일본이 기타 아시아 국가를 침략한 것을 지지하는 반동성을 지녔다. 그것은 언제부터 침략 사조로 바뀌었는지 일본 학자 다케우치 요시미, 하자마 나오키 등은 모두 ‘아세아주의’는 복잡성을 지니고, 구미침략에 대항하는 일면을 가졌고, 아시아 각국의 침략과 겹쳐지거나 침략 이론의 일면으로 발전하기도 하였다고 인식하였다. 최근 몇 년간 중국 학자들이 이에 대해 치열하게 논쟁하고, 상세히 연구하고 있다.¹⁾

1) 이 문제에 대한 최근의 논의와 연구에 대해서는 다음을 참조할 것. 盛畝: “1세기와 20세기 교차기의 일본 아시아주의, 역사연”, 2009년제3기, 其章: 일본대아시아주의탐색분—성방허(盛邦)선생과의 토론을

그러나 본문은 일본 ‘아세아주의’ 중 어느 사상가가 ‘진보’이고, 어느 사상가가 ‘반동’인지를 ‘따지고자’ 하는 것이 아니다. 이것이 언제 서방 침략에 대항하는 ‘진보성’을 지녔는지, 언제 침략성을 지닌 반동사조로 변모하기 시작하였는지가 아니라 근대 중국이라는 기존의 ‘수용자’가 ‘주체’로서 대해지기 시작하였는지를 알아보고자 하는 것이다. 왜냐하면 사상의 ‘가치’는 항상 주체의 필요에 의해 논의되기 마련이며, 주체와 객체 사이의 복잡한 상호 작용은 ‘수용자’의 이 과정에서의 주동성을 간과하거나 경시하여 많은 사상 체계의 역사 속에서의 실제 역할을 깊이 이해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 철학해석학의 영향을 받은 현대 수용 미학 이론은 문학 작품의 역사 생명이 과거 독자의 독서와 수용 가운데에 존재한다고 생각하고 있다. ‘작자, 작품과 독자의 삼각 관계 속에서 독자는 결코 단지 피동적인 일부분이나 단지 반응만 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반대로 그 자신이 바로 역사의 능동적인 구성이라는 것이다. 일부 문학 작품의 역사적 사명은 만약 수용자의 적극적 참여가 없었다면 생각할 수 없다. 따라서 독자의 전달 과정을 통해서만이 작품은 비로소 하나의 연속성이 변화하는 경험의 시야 속으로 진입한다.”²⁾ 만약 문학, 문예작품이 아직도 ‘수용자’의 이해를 중요시하고 ‘적극적인 참여’만이 의의를 갖는다고 한다면 ‘수용자’의 존망과 밀접하게 관련된 하나의 사회 사조로서, 대화 관계 이론으로서 더욱 ‘수용자’의 이해, 해석과 ‘적극적인 참여’에 주목하게 될 것이고, 더욱 ‘수용의 역사’의 고나점에서 그 의의를 이해해야 할 것이다. 따라서 본문은 손중산, 이대조와 ‘왕위’의 일본 ‘아세아주의’의 대한 관점에 대해 고찰하고자 한다.

간단히 말해 본문은 사상이 전달되는 ‘수용의 역사’, ‘효과의 역사’의 관점으로 근대 중국의 ‘아세아주의’담론에 대해 초보적이나마 연구함으로써 일본의 ‘아세아주의’ 나아가 ‘동아시아’ 역사의 연구와 이해가 한층 깊어지기를 기대한다.³⁾

一, 손중산의 ‘아세아주의’관

1895년 광주 거사 실패 후, 손중산은 오랜 기간 해외에서 망명했고, 긴 시간 동안 일본을 혁명의 근거지로 삼았다. 재일 기간에 그는 일본 여야의 여러 인사들과 밀접하게 교류했고, 그 중 많은 사람들이 지지하였고 그의 혁명 활동에 참여하기까지 했다. 그가 일본에 머무르며 활동한 19세기 말과 20세기 초는 바로 일본 ‘아세아주의’가 시작된 시기였고, 손중산은

검하”, 역사연》200년제3기. 성방허盛邦: 일본아시아주의와 우익사조원—치치장戚其)선생에 대한 답변을 검하”, 역사연》, 200년기.杨栋梁、王美平: 일초기아시아주사조분—성방허盛邦), 치치장戚其) 선생과의 토론을 검하”, 일본학》200년제3기. 가장 중요한 연구 저작으로는王屏: 근대 일본의 아세아주》상무인서, 200년.

2) 독Hans Robert Jauss, 미Rober.Holu저, 寧,金元: 미학의 수용과 이론의 수》요녕인민출판사, 1987년판, 24~2p

3) 본문의 취지는아세아주 또는대동 사상 체계가 일본에서 생성, 변화를 연구하는 것에 있지 않으므로 사상의 원류, 각 사상가, 사상유파의 차이에 대해서는 상세히 논하지 않는다. 따라서 본문은 텍스트 작성의 필요에 의해 같은 의미로 이 두 가지 개념을 사용하였다. 그밖에 만약아세아주 혹은대동 사상 체계가 근대 조선에서의수용,교류에서 연구가 진행되고 있음을 알고 있으나 이 사조 및동아시아의 이해에 대해서 전면적으로, 심도깊게 논의하기에는 능력이 부족해 조선의 상황에 대해서는 연구하지 않았음에 유감을 표한다

자연스럽게 그들의 이러한 사상의 영향을 받게되었고 깊은 영향을 받게 되고, 기간이 길어지면서 더욱 주목하게 되었다.

1897년 그가 일본의 요코하마에 머무를 때 미야자키 도라조와 친분을 쌓게 되었다. 미야자키 도라조가 손중산의 사업에 대해 깊은 이해와 전폭적인 이해를 표하자 손중산은 흥분하면서 ‘나는 지나의 창생(백성)을 위해, 아시아 황인종을 위해, 세계의 휴머니티를 위해 혁명군을 일으켰으니 하늘이 반드시 도울것이라고 굳게 믿는다. 여러분들이 와서 우리 당과 친교(혹은 외교 관계)를 맺은 것이 바로 그 증거이다. 무릇 우리 당이 노력하고 분발하는 이유는 동포들의 기대를 저버리지 않기 위해서이다⁴⁾’라 하였다.

신해혁명 후 이와 관련한 연사는 더욱 많아졌다.

1913년 2월 그는 일본을 방문했을 때 일본 각계와 일본 유학생들에게 십여차례의 강연과 연설을 하였다. 그는 이 시기, 그리고 이 시기 이후 국내에서의 강연 가운데서 항상 역사, 문화, 민족, 경제, 지리 등 모든 분야에서 중국과 일본이 함께 ‘손 잡고’ ‘서구’의 침략에 대항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그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중국과 일본 양국은 수천년의 친밀한 관계가 있고, 민족, 문자가 같다. 양국의 외교는 세계 열국의 공동 행동을 따라서는 안 되며 고래의 친밀한 관계를 회복해야 한다. 중일 양국은 일치된 행동을 취하여 동아시아의 이익을 보장해야 한다.”⁵⁾ “중국이 앞으로 경제와 실업이 발달하면, 실로 일본의 이익이 된다.”, “중국과 일본 양국은 같은 민족, 같은 문자를 쓰고, 그 관계가 실로 오래 되어 향후 양국 국민들의 결합이 기대된다.”⁶⁾ “아시아 인구는 전 세계의 삼분의 이를 점하나 오늘날 일부가 유럽인 세력의 범위 아래 굴복하였다. 만약 중일 양국이 협력을 진행한다면, 세력이 팽창하여 하나의 아시아를 만들어 과거 영광의 역사를 회복하기 어렵지 않다.” “아시아 전체 유지의 책임은 마땅히 우리 황인종에게 있다.”⁷⁾ “아시아의 평화는 아시아 사람들이 유지할 의무를 갖는다.”, “오늘날 아시아의 독립국, 즉 일본과 중국 두 나라는 오늘날의 동아시아 평화를 유지하기 위해 일본에 더 많이 기대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일본과 중국은 실제로 형제의 나라다. ” “그러나 오로지 일본 한 나라만이 영원히 동아시아의 대세를 유지해서는 안 되고, 중국과 협력하여 손잡고 나가야 한다.”⁸⁾ “이후 동아시아에서 가장 강한 일본과 동아시아에서 가장 큰 중국이 경제계에서 상호 협력하여, 상호 도움을 주기를 희망한다. 일본 유신의 세월은 중국보다 길고, 모든 면에서 경험에 있어 우리 나라 사람들이 지도를 희망하는 시간이 아직 길다.”⁹⁾ “중국 일본 양국 청년학생들은 실로 앞으로 가장 유망한 사람들이니 모두 열심히 배우고, 그 천직에 최선을 다하기를 희망한다. 제군의 천직은 동아시아의 명예를 지키고, 동아시아의 세력을 유지하여 이민족의 침해를 받지 않도록 하는 것이다. 제군들이 이 의(義)로서 서로 결합하고, 이 임무를 서로 두 어깨에 져야 한다.”¹⁰⁾ 그들이 제기한 대아시아주의가 ‘우리 두 나라의 사람이

4) 미야자키 도라조와 평산주의 담화(1897년 8월 중하순), 손중산전제1중화서198년판,17p

5) 일본 오오카 이쿠조가 주재한 연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제3, 1

6) 일본 실업 연합 환영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 1p

7) 일본 동경 중국 유학생 환영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 2,2p

8) 일본 동아시아 동문화 환영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 1p

9) 일본 우편선 회사의 초대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 1p

10) 일본 중국학생단체 환영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 20-2p

본래 하나의 민족, 하나의 뿌리에서 나와 결코 서로 다른 이치가 있지 않음’을 나타냈다고 믿는다. 따라서 중일 양국이 “지금부터 앞으로도 함께 서구 열강의 침략을 공동 방어하고, 우리 동양이 동양인의 동양으로 침탈당하지 않도록 해야 한다!”¹¹⁾

대아시아주의를 신봉, 지지, 선전하려면 근대이후 일본이 중국을 계속해서 침략했던 것에 직면해야 하고, 답변해야 한다. 이에 대해 손중산은 중국이 마땅히 먼저 이전에 일본의 중국에 대한 침략을 용서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하였다. “일본과 중국은 이해 관계가 맞물리는 이웃 국가이고, 민족이 같고, 같은 문자를 사용한다. 전체 동아시아를 수호하는 계획은 서로 도와 진행해야 한다. 설사 작은 갈등이 있다고 하더라도 전체를 고려하여 문제를 만들어서는 안 된다. 일본의 과거 중국에 대한 침략 정책은 중국의 세력이 커서 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던 것이고, 구주의 속박을 받는 입장에서 일본은 섬나라이니 공고히 하기 어려워 어쩔 수 없이” 중국을 침략한 것이다. “만약 과거 일본이 없었다면 동아시아의 앞날은 반드시 물을 수 없었을 것이고, 동아시아 지방에서 우리 세대와 혁명 사업을 성취하는 것은 모두 일본의 힘이다. “일본은 “우리나라와 이해 관련이 있어 결코 동아시아를 침략하려는 야심이 없다. 역사상으로 관찰해 일본은 섬나라, 우리나라는 대륙 국가로 절대 서로 침해하지 않았다. 설사 근래에 침략의 거동을 면하지 못했다고 하더라도 부득이한 상황에서 나온 것이고 그 본심이 아니니 우리는 일본을 용서해야 한다. 우리 중일 양국은 연합하여 함께 진행하는 것이 가장 좋다. 앞으로 연합하고, 친교하는지 여부가, 이러한 책임이 모두 학생 계군에게 있다. ” “충돌을 소멸시키고, 오해를 없애고 아시아 동쪽 대륙의 행복을 함께 모색하여 함께 동아시아의 주인공이 되자.”¹²⁾

일본의 여야 주요 인물들의 대아시아주의에 대해 상당한 희망을 품고 있었기에 손중산은 이번 방일이 매우 성공적이라고 생각하여 귀국 후 낙관적으로 국민당 간부에게 “지금 일본 여야 정치가들이 모두 세계에 대한 안목과 지식이 있고, 대아시아주의를 품고 있다. 동아시아대국은 유일하게 우리 중국만이 있을 뿐이며, 일본은 3개의 섬에 근거해 국가를 세워 지역적으로 인접하므로 중국과는 밀접한 이해 관계를 갖는다. 만약 중국이 멸망하면, 일본 또한 마침내 생존하기에 적합하지 못하다. 일본인들은 자위를 위해서라도 형식적으로 중화민국을 찬성할 것이고, 사실상 바로 일본 제국을 유지하는 것이다. 고로 일본인은 중화정치의 혁신에 대해 정부와 국민들이 모두 동감을 표하였다.” “일본과 민국이 원래는 형제의 나라이고, 이해 관계가 일치하므로, 진실로 사정이 있다고 하더라도 반드시 그를 무시해야 할 것이다. 형제가 동쪽에서 놀다가 돌아오니 이와 같다. 뜻을 같이 하는 계군들이 사람들을 만나 설명하니 중국과 일본이 감정이 같고 친밀하다, 함께 평화를 누리니 아시아 전체가 복되다.”¹³⁾

1917년 『중국존망문제(中國存亡問題)』에서 손중산은 대아시아주의를 미국의 먼로주의에 비유하여 높이 평가하였다. “무릇 중국과 일본이 아시아주의로 태평양 서쪽의 부의 근원을 개발하고, 미국은 또한 그 먼로주의로 태평양 동쪽의 세력을 통합한다. 각자가 발전해 가니 백년동안 충돌의 걱정이 없다.”¹⁴⁾

11) 오사카 환영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4p

12) 동경 중국 유학생 환영회에서의 연”손중산전권26-2p

13) 상해 국민당 교통부 연회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권,51-5p

그러나 1913년 송교인의 피살과 손중산의 ‘2차혁명’부터 1915년 일본이 원세개에 ‘21조 요구’를 제기하기까지, 또 1917년 손중산이 단기서에 반대하여 호법운동을 시작할 때까지, 손중산은 줄곧 일본 정부의 지지를 기대하였다. 그러나 일본 정부는 손중산을 지지하지 않았을 뿐 아니라 오히려 손중산의 적수를 지지하였다. 결국 손중산은 소비에트 러시아의 지지를 구하였고 반응을 얻어내 ‘소련 연합’ 정책을 개시하였다. 이러한 것들이 필연적으로 그의 ‘아시아주의’에 변화가 일어나도록 하였다. 물론 그는 결코 ‘대아시아주의’를 포기하지 않았다.

1949년 4월 손중산은 일본 기자를 접견하였을 때 일본의 아시아 이웃 국가에 대한 침략을 비판하였다. “당신들 일본인은 아시아 사람이 아니다.”, “당신들 일본인은 유럽인을 위해 아시아 사람을 사용하고 침략하였으니 어찌 아세아 사람이라고 하겠는가?”¹⁵⁾ 같은 해 6월 나라 사람들은 일본이 독일을 이어 산동 특권을 계승하는 것에 반대하는 애국운동을 대대적으로 펼칠 때도 손중산은 이 사건에 대해 일본의 『아사히신문』 기자에게 ‘일본 무인들은 그 제국주의 야심을 드러내고, 그 유신 지사의 마음을 잊어 중국이 최소 저항력을 가진 방향으로 침략 정책을 발전시키니 중국과 일본의 입국 방침이 근본적으로 서로 포용할 수 없다.’¹⁶⁾

1923년 10월, 일찍이 손중산과 관계가 밀접했던 이누카이 츠요시는 입각하여 우전 겸 문부 대신이 되어 일본 정부가 중국에 대한 정책을 바꾸게 할 뜻을 밝혔다. 손중산은 이를 듣고 기뻐하여 서둘러 장문의 서신을 보냈다. 이 서신의 대의는 다음과 같은 세 가지로 요약된다. 첫째, 그는 일본이 오랜 기간 조선과 중국을 침략한 일을 비판, 질책하였다. 아시아 사람들이 구미의 강렬한 침략에 대항하는 과정에서 일찍이 ‘일본은 아시아의 구세주로 본 것이 없지 않았다.’, 그러나 일본의 이웃 국가에 대한 미루겨 침공이 전체 아시아 사람들의 인심을 잃도록 하였다. 둘째, ‘민족론’을 돌파하기 시작하였다. 그는 미래의 전쟁은 백인종과 황인종 사이의 전쟁도, 유럽과 아시아 사이의 전쟁도 아니고 ‘공리와 강권’ 사이의 전쟁이 될 것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셋째, 이번 전쟁에서 소비에트 러시아는 ‘굴욕을 받은’ 아시아와 유럽 사람들의 친구로서 일본은 ‘열강’과 ‘굴욕자’ 사이에서 선택을 하게 될 것이고, 그는 일본이 마땅히 중국 혁명을 지지하고, 소비에트 러시아를 승인하고 친중친소정책을 실행할 것을 제안하였다. 또한 일본의 ‘홍망성쇠는 바로 여기에 있다’. 네번째, 여전히 일본에 대해 희망을 갖고 일본이 결국은 동아시아 국가이며 ‘왕도문화’의 유구한 전통을 갖고 있어, 공리와 정의의 호소 아래 대오 각성하여 구주제국주의의 옛 길을 따르는 것을 버리고 아시아 각국을 지원할 수도 있을 것이라 생각하였다.¹⁷⁾

1924년 4월 미국 국회가 배일이민법을 통과시키자, 일본 여론이 떠들썩했고, 국내 반미 정서가 농후해졌다. 손중산은 이것이 일본을 ‘황인종으로서 각성시킬 좋은 기회’라고 생각하였다. 따라서 10월 참모장 이열균을 특별히 파견하여 일본에 상주하도록 하고 그가 일본에서 그의 이념에 따라 ‘아시아대동맹’을 기획하여 ‘백인종의 침략에 대항하도록 하였다’.¹⁸⁾

14) 중국준망문”, 손중산전권, 9p

15) 일본기日本記者大과의 답”, 손중산집외》상해인민출판199년, 23p

16) 일본 아사히 신문 기자의 질문에 답하”, 손중산전, 7p

17) 이누카이크츠요시에게 보낸 서”, 손중산전권, 401-40p

이 계획은 결과를 거두지 못하였다. 그러나 같은해 11월 손중산은 일본을 거쳐 북경으로 갔고, 일본 고베에서 유명한 ‘대아시아주의’ 연설을 발표하였다. 이 연설은 손중산 후기의 ‘아시아주의 사상’을 충분히 반영하였고, 주요 관점은 다음과 같다. 첫째, 아시아 문화 우월론. “나는 우리 아시아가 바로 가장 오랜 문화의 발상지라고 생각한다. 수천년 이전에 우리 아시아 사람은 이미 가장 높은 문화를 얻었다. 바로 유럽 최고의 국가, 그리스, 로마와 같은 고국(古國)의 문화가 모두 아시아가 전해온 것이다.” 그러나 아시아의 쇠락, 아시아 각 민족이 구주 각국의 침략과 압제를 받은 것은 단지 몇 백년간의 일일 뿐이다. 둘째, 아시아 사람이 아시아의 주인공이 되어야 한다. 일본은 메이지 유신 이후 점차 아시아의 첫 번째 독립 강국이 되어 와 아시아 부흥의 출발점이 되었다. 이어진 일변과 러시아의 전쟁 가운데서 일본은 러시아에 승리를 거두었고, 이는 아시아인의 유럽인에 대한 승리이고, 황인종의 백인종에 대한 승리이다. 셋째, 아시아 문화 ‘왕도’론, 아시아 문화 ‘패도’론. 세계 문화는 구주의 패도 문화와 아시아의 왕도 문화 두 가지가 있다. 구주 문화는 비록 과학의 문화이나 공리, 무기를 중시하여 아시아를 압박하여 더 이상 진보하지 못하게 하였으므로 ‘패도의 문화’이다. 동방문화는 인의도덕을 근본으로 하고 다른 사람을 압박하지 않는다. “우리는 현재 이 새로운 세계에서 우리의 대아시아주의를 건설하고자 한다. 무엇을 기초로 하여야 하겠는가? 바로 우리 고유의 문화를 기초로 삼아야 한다.” 아시아 고유의 문화는 바로 인의도덕, ‘왕도’이다. 그러나 소비에트 러시아국의 최근의 새로운 문화는 동방의 신문화와 지극히 부합한다. “따라서 이는 동방과 협력할 것을 더욱 요구하고, 서방과 결별하고자 한다.” 넷째, 일본은 ‘왕도’와 ‘패도’의 선택에 직면하였다. ‘대아시아주의를 논하는’ 목적은 ‘바로 아시아의 고통받는 민족으로서 어떻게 구주의 강성 민족에 대항할 것이냐 하는 문제’로, 간단히 말해 바로 압박받아온 민족을 위해 불공평함을 깨뜨리고자 하는 문제’인 것이다. 그러나 구주도 역시 피압박민족이 있고, 아시아에도 ‘패도를 행하는 국가’가 나타날 수 있다. ‘너희 일본 민족은 구미의 패도의 문화를 얻었고, 아시아 왕도 문화의 본질도 갖고 있다. 이제부터 세계 문화의 앞날에 대해 서양 패도의 매와 개가 될지, 아니면 동양 왕도의 방패와 성벽이 될지가 바로 너희 일본 국민이 진지하게 선택해야 할 것이다.’¹⁹⁾

분명히 19세기 말부터 1920년대 중기까지 비록 후기에는 일본에 대한 실망, 일본 침략에 대한 준열한 비판, 러시아와의 연합에 대한 강조 등 어느 정도 조정이 있었지만, 수십년동안 손중산은 확실히 계속해서 ‘대아시아주의’의 영향을 받았다.

그러나 주목할 만한 것은 손중산의 ‘대아시아주의’ 또는 손중산이 이해한 ‘대아시아주의’에는 수십년간 변하지 않는 기본점이 있다는 것이다. 이는 바로 손중산이 신봉한 ‘대아시아주의’의 근간, 즉 일본을 중심으로 한 ‘대아시아주의’가 외부의 조력이 되어 중국의 전제 정치 제도를 바꾸어 헌정을 실행하고 일본이 근대 중국이 서양과 궤를 같이 하여 제도를 변혁하기를 희망했다는 것이다. 나아가 그는 ‘황인종’의 아시아를 희망하여 ‘백인종’들의 아시아에 대한 식민 통치를 반대하였다. 그러나 ‘백인종’들의 정치 제도에 반대한 것은 결코 아니며, 반대로 ‘황인종’이 ‘백인종’(구미)의 정치 제도를 실행해야 한다고 생각했다.

18) 리리에권에게 보낸 전보에”, 손중산전1권, 18p

19) 고베상업회의소 등 단체에서의 연”, 손중산전1, 401-40p

1897년 그는 미야자키 도라조(宮崎寅藏)와의 대화에서 중국 국정, 중국 국민성이 민주공화제에 부적합할 것이라는 관점을 비판했다. 그는 ‘공화정치가 중국 같은 야만 국가에 부적합하다고 말하는 사람들이 있다. 이는 이해할 수 없는 말이다.’라고 생각하여 宮崎 등에게 그의 반청 혁명을 지원할 것을 강하게 권유하였고, 宮崎 등은 중국이 중국의 ‘4억 백성을 구하고, 황인종의 굴욕을 씻고, 내지인의 도를 회복하고 수호할 자’이므로 중국 혁명이 성공을 거두어야만 이러한 목적이 달성될 수 있을 것²⁰⁾이라고 생각했다.

1903년 일본의 ‘아세아주의’의 ‘지나보전론’에 대해 손중산은 결연히 반대하였다. 소위 ‘지나보전론’은 1898년 10월의 동아동문회 창립 총회에서 생겨났고, 그 취지는 일본, 중국 양국이 ‘문화가 상통하고, 풍속이 같아’ 두 나라가 ‘같은 언어, 같은 민족’, ‘입술과 치아처럼 상호 보완적’이라는 점으로 양국이 구미 열강의 침략 앞에서 정부에서 민간까지 모두 공평한 자세로 상호 신뢰하여 양국이 마땅히 외교를 공고히 하고, 양국의 우의를 강화하여, 일본과 중국이 연합하여 서방 열강의 침략에 공동으로 반대할 것을 제기하였다. 이 때 일본은 이미 갑오전쟁(중일전쟁?)에서 중국을 대파하여 중국과 ‘시모노세키조약’을 체결하여 대만을 할양시켰고, 중국은 열강에 의해 분할될 위험에 놓이게 되었다. 일본의 羽翼未丰는 중국을 분할하는 ‘잔치’가 그의 뜻대로 될 가능성이 없고, 심지어 중국이 나뉘어져서 서양과의 완충지대를 잃어버릴 수도 있다고 판단하여 ‘지나보전론’을 제기하게 되었다. 1903년 ‘8개국 연합군’은 북경을 피로 물들였고, 신축조약이 체결되고 얼마 지나지 않아 청 정부가 풍전등화의 상황에 놓이게 되어 위급한 상황 속에 중국은 열강에 의해 쪼개지는 망국의 위험에 놓이게 되었다. 그러나 이때 손중산은 ‘지나보전론’에 명확히 반대하였다. 왜냐하면 이때 ‘지나를 보전한다’는 것은, 즉 청정부를 ‘보전’하는 것이기 때문이다. 그는 중국의 청정부를 통치하는 것은 부패하기 이를 데 없는 이민족 정권으로 보전할 가치가 없고, 청 조정의 한족 관원은 모두 매국노라고 생각하였다. ‘지나를 보전하고자 하는 자들이 이처럼 근본을 잊은 양심 없는 매국노를 빌어 지나를 보전하려는것은 우물에는 숭늉 찾는 격이다. 중국은 “나라의 형세를 보아하니 보전할 수 없다.” 지금 자유의 의기와 민권의 바람이 이미 세계의 조류가 되었다. ‘지나 사람만이 독립을 도모하는 자가 없다는 말인가?’ 따라서 ‘동아의 치안’방책은 어떻게 이를 것인가? 말하길 지나 국민의 말을 들어야만 그 정과 세는 독립을 이루고, 새로운 지나를 만들게 된다. ’ 소위 ‘정’과 ‘세’는 바로 중국 국민들이 세계의 자유, 민권의 대세를 따라 독립한 공민이지, 전제 제도 하의 신민, 노예가 아닌 것이다. 이렇게 해야만 새로운 중국을 만들고, 진정으로 대아시아주의가 희망하는 ‘동아시아 치안’이 실현될 수 있다. ²¹⁾

1911년 7월 손중산은 미국에서 일본으로 가서 가까이에서 중국 혁명을 모색하고자 하였으나 일본 정부의 거절에 부딪혔다. 그는 한 일본 지인에게 보낸 서신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제가 보는 일본은 제2의 모국이나 마찬가지입니다. 단지 애석한 것은 최근 우리 나라의 소년 지사들이 귀국의 만주 경영이 지나에 불리하다고 오해하고 있으니, 이러한 여론이 앞으로 양국의 복이 되지는 않을 것입니다.’ 그는 자신이 일본 정부로부터 거절당한 것에

20) 미야자키 도리오와 평산주의 답”, 손중산전17p

21) 지나보전분할합”, 손중산전, 219-22p

대해 유감과, 큰 불안감을 느꼈다. “군은 나의 오랜 친구 중 하나이니, 알고 있는 명사들을 연합하여 일본과 지나 인민의 연락을 받기 제창하고, 귀국의 여론을 계도하고 귀국 정부에 유세를 펼쳐 지나 혁명 사업에 대한 동정을 표시하게끔 하기를 간절히 바란다. 우리 지나가 다시 세계에 서서 열국들과 평등해진다면 우리 당이 일본의 도움을 많이 받은 것이니 한족의 자손 만대가 큰 덕을 영원히 기억할 것이다.”²²⁾

1917년 여름, 손중산은 북양군벌 단기서 정부를 반대하는 호법 운동을 이끌 때 일본 수상 테라우치 마사타케(寺內正毅)에게 서신을 보내 일본이 ‘정의를 도와’ 중국의 혁명당 사람들을 지지하고, 북양 군벌 정부를 지지하는 정책을 포기할 것을 희망하였다. 이것이야말로 중일 양국의 ‘진정한 제휴’, 이며 ‘진정한 친선’의 관건이자, ‘동아시아 평화를 가능하게 한다.’²³⁾는 것이었다.

1919년 6월 그는 일본의 ‘아사히신문’ 기자와의 대화 중에서 일본의 중국 침략을 비난하면서 ‘나는 줄곧 중일 친선을 주장해온 사람이다. 근년간 일본 정부가 계속 우리나라의 관료를 여전히 돕고, 민당을 좌절시키니, 비통함을 금할 수 없다.’²⁴⁾고 하였다.

1920년 6월 그는 일본 정부의 육군장관(陸相) 다나카 기이치(田中義一)에게 보낸 서신 중에서 일본이 오랜 기간 정부를 침략한 것을 질책, 비판하고 또한 중국 국민들의 반일의 근본 원인은 일본 정부가 중국 국내의 수구 세력을 지지하기 때문이라고 명확히 설명하였다. ‘근대 일본의 동아시아에 대한 정책은 무력과 자본에 의한 침략을 골간으로 한다’, ‘그리고 중국에 대해서는 일본의 목적에 도달하기 위해 계속해서 수구 반대 세력을 지원하고, 혁신 운동을 억압한다.’, ‘최근 몇 년간, 중국 인민들의 대일 감정이 나날이 깊어진 근본적인 원인은 실로 일본의 정책이 민국의 국시에 부합되지 않기 때문이며, 따라서 국민들이 모두 일본을 민국의 적이라고 여기는 것이다.’²⁵⁾

1923년 10월 그는 이누카이 츠요시(太養毅)에게 보낸 서신에서 “일본 정부는 이 시기에 여전히 “일본 정부가 이 시기에 마땅히 의연하게 지나 혁명의 성공을 도우면, 내가 대내적으로는 통일을 할 수 있으며, 대외적으로는 독립하여 일거에 열강의 속박을 타파할 수 있다. 이로써 일본과 지나의 친선 관계를 기대할 수 있으니 동아시아의 평화가 영원히 지켜지게 된다.” “무릇 일본의 유신은 실제로 지나 혁명의 원인이니, 지나 혁명은 실제로 일본 유신의 결과이다. 양자가 원래 한 나무에 뿌리를 두고 동아시아의 부흥을 이루니, 그 이해 관계가 같고 밀접함이 원래 이와 같다. 지나 혁명에 대해 일본이 어찌 유익을 본받아 우리는 꺼려하고 해할 수 있는가?” 그는 또한 일본이 마땅히 소련과 러시아처럼 아시아 각국에 혁명이 일어날 수 있도록 해야한다고 건의하였는데 “일본 국가가 천년만년 태평하기 위한 장기 기본 계획으로, 지나에 혁명이 일어나지 않는다면 일본이 마땅히 이를 제창하고 인도해야 한다.”, “지나 혁명이 이미 일어났으니 일본은 마땅히 전력을 기울여 이를 이루도록 도와야 한다. 지나를 구하는 것은 바로 자신을 구하는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중국인이 일본에 반감을 가지게 된 것은 “지나의 혁명에 대해 일본이 12년 동안 줄곧 반대하는 행동을

22) 무나카타 고타로에게 보낸 서, 손중산전, 523-52p

23) 일본 수상 테라우치 마사타케에게 보낸 서, 손중산전, 108-10p

24) 일본 아사히 신문 기자의 질문에 답하, 손중산전, 7p

25) 다나카 기이치에, 손중산전, 276-27p

했고, 반대가 실패하자 가식적으로 중립을 지키면서 스스로를 기만했다. 철저한 각오로 의연하고 결연하게 지나 혁명을 도와 일본을 동아시아의 원대한 구상자로 세운적이 없기 때문이다.”²⁶⁾

요약하면, ‘대아시아주의’는 손중산의 말 속에서 줄곧 중국 국내 상황과 긴밀히 연결되어 그의 반청, 호법, 현대 민주공화국과 전제정치체도를 추구하는 발언의 일부분이 되었다. 따라서 그의 ‘대아시아주의’는 구미열강의 침략을 분명하게 반대하고 있지만, 그들의 ‘대내’적인 기본 가치관과 제도를 부인하지는 않았다. 게다가 그가 이끄는 혁명사업에 지지하기만 하면 그는 ‘대아시아주의’가 일본이 이끌거나 주도하는 것도 결코 개의치 않았다.

二, 이대조의 ‘신아세아주의’

1912년 가을, 당시 북양법정학당 학생이었던 이대조는 북양법정학회에 참여하여 한 학우와 함께 학회 편집부장을 맡았다. 연말, 이 학회는 2개월 전 일본에서 출판된 나카지마단(中島端)이 저술한 전체 22장 12만 글자에 달하는 『지나분할의 운명』을 모두 번역한 『지나분할의 운명』에 대한 반박』을 출판하였다. 또한 단락에 따라 역자주와 논평을 더하여 엄격히 비판하였다. 『지나분할의 운명』은 여러 각도에서 건국 후 얼마 지나지 않은 중화민국이 곧 멸망할 것이며, 중국 분할로 동아시아의 먼로주의를 실현할 수 밖에 없으며, 아시아에서 일본의 강대한 다이와 민족만이 동아시아 통일의 천직을 감당할 수 있다고 주장하였다. 『지나분할의 운명』에 대한 반박』은 역자의 말, 역자주, 논평 등의 형식을 통해 타카지마단의 모든 논점을 하나하나 반박했다. 그 중의 ‘동아시아의 먼로주의’라는 장에 대해서는 ‘일본이 동아시아에서 홀로 패권을 쥘려는 것의 대명사’에 지나지 않는다고 질책하였다.

『지나분할의 운명』에 대한 반박』은 공동의 결과물이므로 어떠한 역자주와 평론이 이대조가 쓴 것인지 단정하기 어렵지만, 편집부장으로서는 이 책의 번역, 평론, 출판, 발행까지 모든 과정은 이대조가 주재하였으므로 이 책의 관점과 논점은 그의 사상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또한 ‘동아시아먼로주의’에 대한 비평은 자연스럽게 이대조의 관점으로 볼 수 있다. 사실상 이대조의 이 문제에 대한 이후의 관점은 기본적으로 근본적인 변화는 없다.

1914년 1월부터 1916년 5월까지, 이대조는 일본에서 근 2년 반을 유학했다. 일본, 일본의 ‘대아세아주의’에 대해 자연스럽게 깊이 알게 되었다. 1차 세계대전에서 구미 각국은 유럽에서 치열한 전쟁을 벌이느라 아시아를 돌아볼 여유가 없었다. 일본은 이 기회를 틈타 ‘동아시아먼로주의’ 또는 ‘극동먼로주의’에 대한 선전 강도를 높여 ‘아시아인의 아시아’를 주장하였다. 1917년 2월 하순과 4월 중순에 이대조는 연이어서 「신중화민족주의」, 「극동먼로주의」, 「대아세아주의」의 세 편의 글을 발표하여 이에 대한 자신의 견해를 피력하였다.

「신중화민족주의」중 이대조는 ‘일본이 근래 주창하는 대아시아주의’와 독일에 제창한 대게르만주의, 러시아가 제창한 대슬라브주의, 영국이 제창한 대앵글로색슨주의와 미국의 먼

26) 이누카이 츠요시에게 보낸 서”, 손중산전, 403-40p

로주의와 마찬가지로 모두 민족주의 운동의 일부분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그러나 이대조는 ‘일본의 소위 대아시아주의라는 것의 취지가 어디에 있는지 우리는 알 수 없다. 그러나 우리 중화의 위대함은 아시아 전체 대륙을 포괄할 수 있음이고, 아시아 각국의 민족은 우리 중화와 혈연이 아닌 경우가 없고, 그 문명은 우리 중화가 시조가 아닌 경우가 없다. 오늘날 대아시아주의로 아시아 민족을 수습하고, 새로운 중화의 각성과, 새 중화 민족의 발흥을 버리고자 하니, 나는 감히 절대로 성공하지 못한다고 판단한다. 이는 우리가 거만하여 하는 말이 아니며, 역사의 이치로 그것을 고찰한 것이다. 이 판단은 논리적으로 틀릴 수 없다.’ 게다가, 아시아 동쪽에서 우리 중화민족의 지위가 이처럼 중요하니, 즉 우리 민족이 이 지위를 확보하고 아세아의 주인공이 되는 것인 마땅히 양도 불가한 권리이자 전가할 수 없는 책임이라고 본다. 이것이 바로 신민족의 자각이다.” 그는 “우리 나라의 역사가 가장 오래되었는데, 아시아에서 유래한 많은 민족이 합쳐져 융합되어 중화민족을 이루었기 때문에 지역 구분이 없고, 혈통이 전부 사라진 지 역시 오래되었다. 이는 실로 우리 민족의 원대하고 넓은 정신이 이 덕분에 이루어진 것이다.”라고 생각하였다. “무릇 중화민국에 속하는 사람이라면 모두 신중화민족이다. 그렇다면 앞으로 민국의 정치와 종교, 표준과 형벌은 당연히 이와 같은 취지로서 민족의 정신을 세워, 민족의 사상을 통일해야 할 것이다. 이 주의가 바로 신중화민족주의인 것이다. 반드시 신중화민족주의가 확실히 동아시아에 발양될 수 있고 난 다음에야 대아세아주의가 바야흐로 세계에 빛날 것이다. 그렇지 않다면 환상에 그칠 것이고, 꿈에 머물 것이다.”

중국이 ‘대아시아주의’에서 주도적, 영도적 지위를 차지하는 것을 주장하였기에 이대조는 필연적으로 일본이 제창한 ‘대아시아주의’에 의구심을 표하였고, 「극동면로주의」²⁷⁾ 가운데서도 그는 사람들이 이와 같은 ‘극동면로주의’를 경계할 것을 주장하였다. 그는 근 수십년간 ‘극동’ 지역이 기본적으로 평화로운 국면을 유지할 수 있었던 원인을 주로 문호 개방, 기회균등주의에서 찾았다. 그러나 “오늘날 돌연 한 국가가 아시아 동쪽에서 면로의 선언을 모방하고자 하니 이것은 문호 개방, 기회균등주의와 서로 반대가 아닌가? 이것은 세계의 큰 문제이니 일국이 유럽 전쟁을 빌미삼아 자유선언을 하고, 고착시키려고 하는 것이 아니겠는가? 나아가 선언을 하는 자가 이를 관철시킬 결심과 실력이 있는가? 유럽 전쟁이 종결된 후 이 선언이 세계대전의 우려를 가져오지 않겠는가? 무릇 이 모든 문제가 모두 선언하는 자가 오늘날 당연히 숙고하고, 생각할 것이다. 논어에서 말하기를 ‘한 마디로 나라를 흥하게 하고, 한 마디로 나라를 잃게 한다.’고 하였다. ‘극동면로주의’를 주창하는 자는, 신중해야 한다.” 비록 그는 극동면로주의로부터 문호 개방, 기회 균등 등의 균형 국면을 깨뜨렸지만 새로운 관점으로 사람들의 경계심을 일깨웠다. 그러나 ‘오늘날 돌연 한 국가’가 어느 나라인지 비록 지적은 하지 않았으나 일본을 가리키는 것이 분명하고, 이 문장의 중점 내용도 사실 사람들이 일본을 경계하도록 하기 위함이었다.

「대아세아주의」²⁸⁾에서 이대조는 다시 한 번 ‘대아시아주의’가 단지 중국을 지도자로 삼아 이끌 수 밖에 없고, 만약 기타 아시아 국가가 억지로 ‘주인공’이 되고자 하면 “구미열강의

27) 극동면로주, 이대조전, 290-29p

28) 대아세아주, 이대조전권, 106-10p

공격 대상이 되어 전명하는 재앙을 불러오게 될 것”이며, 중국은 “그 세력으로 전체 아세아의 세력을 대표할 수 있고, 그 문명으로 전체 아세아의 문명을 대표할 수 있고, 이것은 우리들의 과장이 아니라 또한 전세계가 공인하는 바라고 다시 한 번 강조하였다. 물론 중국의 주도적 지위가 결코 무조건은 아니며 “당연히 중화국가의 재건, 중화민족의 부활이 절대 핵심”으로, “우리 국민은 대아시아주의를 건설하겠다는 이상에 깨어 있다면, 먼저 스스로 각성한 우리들은 아세아주의의 책임을 아세아의 지위에 둔다. 그리고 아세아를 우리 중국인의 아세아로 삼아, 신문명을 창조하고, 새 국가를 건설하고, 세계에 존재하도록 하고, 서양의 문명 민족과 맞서도록 해야 한다.” 동시에 그는 직접 일본을 “거명”하여 사람들이 그 침략성에 대해 경각심을 갖도록 하고자 했다. “일본 국민이 만약 대아세아주의의 이상에 깨어 있다면, 먼저 우리 중화가 아시아의 큰 기반임을 인정해야 할 것이다.” “만약 대아세아주의의 가치를 가장하여 그 제국주의를 감추고자 한다면, 극동의 패권을 배척하고, 다른 나라의 사람이 자신의 땅을 약탈하는 것을 금하고, 다른 나라의 사람이 자신을 능욕하는 것을 거부해야 한다. 그 결과는 아마도 백인들의 질투를 불러올 것이므로 마침내 화가 전체 아시아 동포에게 이를 것이다. 즉 대아세아주의를 주창하는 것은 아세아의 큰 세력을 혼자서는 유지할 수 없고, 그 위급함을 재촉할 수 있어 비아시아인이 선전하는 바의 것이 아니므로 이에 일본인들이 이에 대해 주의를 기울일 것을 희망한다.”

세번째 문장은 다음과 같은 사실을 나타낸다. 첫째, 이 시기 이대조가 대아세아주의의 개념을 받아들였고, 둘째, 대아세아 체계 중에서 주도적인 역할, ‘주인공’을 맡는 것은 중국이지 아시아 기타 국가여서는 안 되며, 셋째, 중국의 주도적 역할은 결코 무조건적인 것이 아니라, ‘신문명, 신국가를 건설하고자’ 해야 한다는 신문화운동의 영향을 반영하고 있다. 이 점은 손중산과 모종의 유사한 점을 갖는다. 즉 ‘대아세아주의’는 ‘외부성’ 뿐 아니라 중국 국내 개혁의 ‘내부성’도 지녔다는 것이다. 넷째, 일본의 드러나는 아시아 국가 침략의 야심에 대해 경계할 것을 점차 명확하게 지적하였다. 다섯째, 백인종과 황인종의 대립과 같은 민족론 발언은 줄곧 보류하였다.

1918년 7월 이대조는 「Pan……ism의 실패와 Democracy의 승리」²⁹⁾라는 글을 발표하여 그의 사상이 이 1년 3개월 동안 근본적인 변화가 있었음을 나타냈다.

소위 ‘Pan……ism’, 즉 ‘대……주의’를 이대조는 이제 ‘이러한 주의를 견지하는 사람은 다만 자신의 욕구를 드러내어 강압의 세력으로 다른 사람을 압박하고, 그로 하여금 자신의 팔꿈치와 겨드랑이 아래에 굴복시키는데 우려함이 없다.’ 국가와 국가, 지역과 지역, 군벌과 군벌, 당파와 당파 사이에 모두 이런 관계가 있을 수 있다. ‘대아세아주의’를 포함한 당시 세계와 중국 국내의 각종 ‘대……주의’를 열거한 후, 이대조의 결론은 ‘무릇 이와 같은 사람은 그 범위의 폭과 구분의 성질이 모두 각기 다르나 그 독재의 정신은 다른 사람의 자유를 침범하고, 자신의 세력을 확장하는 것을 고유 범위 밖의 원칙으로 둔다. 따라서 ‘대……주의’자는 즉 독재의 감춰진 말이다.’ 그는 더 나아가 자신은 ‘여기서 두 가지 종류의 기적을 보았다.’고 설명했다. 하나는 세계의 기타 국가가 주장하는 ‘대……주의’가 모두 대외 확장의 ‘확장주의’이나, 중국의 ‘대……주의’는 ‘축소주의’라는 것이다. 왜냐하면 ‘강대하고 우월한 민

29) “Pan……is의 실패와 Democrac의 승”, 이대조전권, 244-24p

족’은 대부분 외부 발전을 취한다. 그 민족 정신이건, 국가의 위치건 모두 ‘그 투쟁의 본능을 돕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국민은 모두 대외 경쟁을 한다. “약소국만이 그 국민이 모두 그 유약하고 무능함을 스스로 깨달아’, 대외 경쟁을 감히 꿈꾸지 않는다. 따라서 ‘국내에서 스스로 싸워서’ ‘그 싸우기 좋아하는 성질을 발산한다’. 따라서 그는 ‘우리나라’에 대해 더욱 심층적으로 분석하여 ‘우리나라의 ‘대……주의’자들은 ‘대(大)’의 범위에 양해를 구하여 그 큰 것을 싫어하지 않고, 이 ‘대(大)’의 중심을 통솔하고, 그 작음을 싫어하지 않아 그것을 더욱 작게 하여 일신(一身)에 그치도록 한다.’ 혹시 사람들이 알지 못할까 염려하여 그는 중국의 통치자들이 자신의 통치범위를 기하학에서의 원주와 마찬가지로 크면 클수록 좋다고 생각하지만, 자신은 마치 원의 중심처럼 모든 권력을 자신에게 집중시키려고 한다고 비유적으로 설명하였다. ‘이 중심에 있는 사람은 처음에는 마치 어떤 지역을 명확히 구분하지만, 어떤 당파가 가로 막으면 점차 한 사람에게로 집중된다. 지역 혹은 당파가 중심이 되면, 그 주의는 마치 대…주의, 대특정파주의와 같다. 어떤 사람을 중심으로 점차 대특정인주의가 된다. 대특정인주의까지 미치지 못하고 한 국가에 실현되면 반드시 전제 군주가 되고, 각 성에서 실현되면 군웅할거의 국면이 된다. 전자로는 홍헌(洪憲) 황제가있고, 후자는 오늘날의 독군이 있는데 모두 ‘대……주의’의 산물이다.’ 그러나 역사는 ‘무릇 ‘대……주의’로 타인을 침략하는 자는 결국 틀림없이 실패를 맞이하게 된다.’는 것을 더욱 증명한다.

‘대……주의’를 반대하고, 이것이 반드시 실패한다는 것을 논증하기 위해 이대조는 매우 중요한 개념을 도입하였다. Democracy이다. 그는 이렇게 썼다. “ ‘대……주의’와 반대에 서는 것이 바로 Democracy이다. 이 말은 혹은 민주, 혹은 민치(民치)라고 번역된다. 실제로 구미에서 최근 이 말을 사용할 때는 ‘평등권 주의(平權主義)’의 뜻이다. 전자는 힘을 숭상하고, 후자는 이치를 숭상한다. 전자는 전제를 중요시하고, 후자는 자유를 중요시한다. 전자는 힘으로 독자적으로 행동을 모색하고, 후자는 각자의 공존을 모색한다. 이것이 그 큰 비교이다.” 그는 일차대전 발발 이후의 역사를 Democracy가 계속해서 거둔 승리로 논했고, 이미 역사의 조류가 되었다고 생각하였다. 따라서 ‘조류가 가는 바는 ‘대……주의’자는 회피 대상이 되었고, 그 진로의 방해가 되는 자는 쓸어버리지 않는 경우가 없었다. 시대의 정신으로, 신성한 권위를 지닌, 19세기 생활상의 모든 현상은 모두 Democracy에 의해 드러난다.’ ‘근래 기관포, 증기선, 신문, 전보의 힘을 대신하여, 서쪽에서 동쪽으로 이르러 수천년 전제 정치하에서 게으르게 잠자고 있던 우리 아시아를 구하여 그 세계 정복의 전체 공적을 마쳤다.’ 원세개, 단기서의 성패가 모두 그들이 Democracy에 순응했느냐, 역행했느냐에 따라 결정되었다. 따라서 그들의 성패는 사실 모두 Democracy의 승리이다. 이 글의 마지막에서 이대조는 낙관적으로 다음과 같이 썼다. ‘Democracy는 오늘날의 세계에 마치 로마가 중세의 유럽을 구한 것과 같다. 오늘날 사람들의 Democracy에 대한 신앙은 중세 유럽인들의 종교에 대한 신앙과 같다. 우리가 눈으로 본 것은 모두 Democracy 전승의 기치요, 우리가 귀로 들은 것은 모두 Democracy의 개선의 소리이다. Democracy를 따르는 자는 흥할 것이요, Democracy에 역행하는 자는 망할 것이다. 일이 분명함을 사람들이 귀와 눈으로 확인하였다. 어떻게 하다 오늘날의 사람들은 하나 둘 Pan……ism의 기치를 세우고, 혹은 그 아래에 의탁하여 그를 따라 실패한 자가 적은 Democracy와 원수가 되고자 하는가! 우리는 실패한 Pan……ism을 위해 슬퍼할 여유가 없다. 우리는 다만 승리한 Democracy를 축하할 뿐이다!’

이대조는 ‘대아세아주의’에서 조금 뒤인 ‘신아세아주의’ 사상의 발전 과정에서 이 글은 매우 중요하다. 이 글은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을 나타낸다. 첫째, 일본이 주도하건, 중국이 주도하건, 아니면 중국과 일본이 공동으로 주도하건 ‘대아세아주의’는 이미 완전히 버렸다. 둘째, ‘대아세아주의’를 포함한 모든 ‘대……주의’의 실질은 모두 전제정치로 중국의 전제주의에 더욱 첨예한 비판을 가하였다. 셋째, Democracy는 전제에 반대하고, ‘대……주의’에 반대하는 날카로운 무기로 승리를 거두리라는 것이다. 넷째, ‘강대하고 우월한 민족’과 ‘약소국가’의 국민성을 비교하였다. 이 글은 특히 전술한 세번째, 네번째 관점은 그가 핵심 구성원으로 있던 신문화운동에 직접적으로 반영되었다.

1919년 1월 그는 ‘신아세아주의’³⁰⁾를 제기하였다. 단지 ‘신아세아주의’의 구조 속에 더욱 구체화시켰을 뿐 그 요지는 「Pan……ism의 실패와 Democracy의 승리」와 같다. ‘신아세아주의’를 제창한 원인은 ‘세계 대세를 보니, 미주는 장래에 반드시 하나의 미주연방이 될 것이고, 구주는 반드시 하나의 구주연방이 될 것이다. 우리 아시아도 마땅히 하나의 유사한 조직을 세워야 한다. 이것이 모두 세계 연방의 기초이다. 아세아 사람은 마땅히 일종의 ‘신아세아주의’를 제창하여 일본 일부 사람들이 제창한 ‘대아세아주의’를 대신해야 한다. 그는 그가 제기한 ‘신아세아주의’가 ‘민족해방을 기초로 근본적으로 개조하여, 무릇 아세아의 민족이라면 타인에 의해 삼켜진 자 모두 해방되어야 하고 민족 자결주의를 실행한 후 하나의 대연합을 결성해 구미의 연합과 함께 세 세력을 구성 세계 연방을 함께 완성하여 인류의 행복을 증진시켜야 한다고 주장한다.’는 것을 강조했다. 따라서 1919년 5월 4일 시작된 북경 학생들의 애국운동에 대해서도 이대조는 5개월 후 다른 해설을 하였다. ‘이번 ‘5·4 운동’은 ‘대아세아주의’를 배척하고, 침략주의를 배척하지만 일본인을 원수로 삼는 것은 아니다. 이 세상에 강권으로 공리를 압박하는 자는 일본인이거나 아니거나 우리는 모두 배척할 것이다! 따라서 본인은 이번 운동을 애국운동으로만 보는 것은 합당하지 않고, 실로 인류 해방 운동의 일부분이라고 생각한다. 제군은 이 일을 진행하여 앞으로 세계에 복을 가져다 줄이 적지 않으니, 계속 정진하라!’ 1919년 11월초, 이대조는 또다시 「신아세아주의 재론」³¹⁾이라는 장문을 써서 이에 대해 상세히 설명하였다. 정리하면 ‘내가 주장한 신아세아주의는 구미 사람들이 세력으로 아시아 민족을 압박할까 두려워서가 아니라 일본의 대아세아주의에 대항하기 위해 제창되었다.’는 것이다. 따라서 일본 대아세아주의 압박을 받아 비로소 신아세아주의가 제창되었고, 이것이 아시아 민족해방운동의 첫 걸음인 것이다. 따라서 ‘대외가 아니라 대내를 겨냥한 것이다. 일본의 대아세아주의에 대한 것이지, 구미의 배아주의에 대한 것이 아니다.’ 그는 신아세아주의가 ‘세계주의에 반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세계주의에 순응하는 것’이라고 강조하여 “어떤 사람, 어떤 나라, 어떤 대륙이건, 강권은 우리의 적이고, 공리는 우리의 친구”이며, “아세아는 우리가 세계를 기획하고, 개조하기에 앞서 착수해야 하는 일부분이지, 아시아 사람이 독점하는 무대가 아니다. 인류는 모두 우리의 동포이며, 우리의 원수는 없다.” 따라서 “우리의 신아세아주의는 ‘자치주의’이고, 지역 민족 모두를 민주의 조직으로 삼는 주의이지, ‘배외주의’가 아니고, ‘봉쇄주의’도 아니다. 우리는 최선

30) 대아세아주의와 신아세아주, 이대조전권269-27p

31) 신아세아주의 재, 이대조전, 74-7p

의 세계 조직은 모두 마땅히 자치적이어야 하고, 민주화되어야 하고, 개성을 존중해야 한다고 믿는다. “마지막으로 “Democracy”를 실현시키는 데에 있어서 “세계의 어떤 인종, 어떤 국민이라고 하더라도 인류 동포의 지위에 서기만 한다면, 그 진정한 Democracy의 정신을 사용하여 공리를 지원하고 강권에 대항하는 사람이라면 우리는 모두 그를 가장 가까운 형제로 생각할 것이다. 우리는 그와 함께 노력하여 평등하고 자유롭고, 원근친소가 없는 세계를 창조하기를 원한다. 이것이 내가 주장하는 신아세아주의의 정신이다.”

길지 않은 시간동안 이대조는 ‘대아세아주의’ 개념을 받아들여 중국이 마땅히 ‘맹주’가 되어야 한다는 견해를 제기했다가 포기했고, 강렬한 세계주의 색채를 지닌, 전인류의 평등, 자유, 해방을 핵심으로 하는 ‘신아세아주의’를 제기했다. ‘신아세아주의’는 창끝을 전체제도와 각 국 국내와 아시아 내부의 강권을 겨냥하지 외국을 배척하는 것이 아니다(아시아가 구미를 배척하지 않음을 나타냄). 이러한 것이 모두 ‘신문화운동’의 영향에 반영되었고 ‘신문화운동 담론’의 일부분이 되었다.

三, 汪偽의 ‘대아시아주의’

모든 정권은 자신의 ‘합법성’을 변호할 이론 또는 이데올로기를 필요로 한다. 왕정위정권은 일본이 세운 괴뢰정권으로 선천적으로 ‘합법성’이 부재하였다. 따라서 정권의 합법성의 근거로 삼을 이론 또는 이데올로기를 구축할 필요가 더욱 절실했으므로 ‘대아세아주의’는 더욱더 정권의 합법성을 구축하는 주요한 사상적 자원이 되었다. 왕정위정권의 ‘대아세아주의’ 언사에는 일본이 중국 및 아시아 기타 국가에 대한 전쟁은 단지 침략이 아니라 오히려 제후, 원조이며 이들 국가, 황인종이 영미 제국주의, 백인종의 식민주의 침략에 대항하도록 이끄는 전쟁이었다는 내용이 있다. 그들은 이 언사들로 체계적으로 중국인들의 그들에 대한 ‘매국노’, ‘매국’ 인식과 비판을 해소시키고자 하였다. 동시에 그들은 손중산의 ‘대아세아주의’ 사상을 해설하는 데 능하여 세상에 자신들이 진정한 ‘삼민주의’의 계승자라고 자처했다.

왕정위 정권 상층부 인물의 ‘대아시아주의’에 대한 연구는 이미 많으므로³²⁾, 본 논문에서는 『중국인의 일본군의 신도 (싱가폴) 점령 후의 감상 및 희망, 싱가포르 대동아 건설의 중심으로 전략 관련 논문집』 (이하 『논문집』)에 대해 연구를 진행하고자 한다. 왜냐하면 이들 ‘논문’의 저자는 모두 이름 없는 무리이므로 이들의 관점을 함께 보면 일부 ‘보통 사람들’이 어떻게 이러한 언어 시스템에 의해 조작되었는지를 살펴볼 수 있고, 또다른 관점에서 이 언어 시스템에 대해 더욱 깊이 분석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이 『논문집』은 왕위정권이 조직한 ‘중화민족반영미협회’가 1942년 5월에 편찬 출판하였다. 사건은 태평양 전쟁 발발 후 2개월 밖에 지나지 않은 상황에서 영국인이 100여년간 식

32) 石源华：왕위시기의동아연맹운, 근대사연》，198년기한배경한裴漢：왕위정권과대아시아주，민국파》，199년기。：“왕정위의대아시아주를 논하”，사학월》，200년。史桂芳：《같은 문자 같은 인의 구—일본의 가짜 동아시아연맹운동의 흥》사회과학문헌출판사 2002년판

민 통치해온 싱가포르가 같은 해 2월 일본군에 공격 함락당하면서 시작되었다. 주편에 따르면 ‘싱가폴은 근대 붕괴되어가던 자본주의국가로서 극동 지역을 침략하는 유일한 근거지로서 금년 2월 15일 우방인 일본에 의해 점령되어..... 본 회는 싱가포르가 함락된 것을 거울 삼아 동아시아 전사의 특수한 의의에 대하여 3월 5일부터 논문을 투고받기시작하였다. 국내외 인사들이 싱가포르의 함락 후 이 사건에 대해 감상과 희망을 소개하여 대동아 건설의 한 면에 대해 깊은 의견을 주기를 바라는 바이다.....’³³⁾ 이 논문집이 바로 투고된 ‘수천여건’의 원고 가운데서 ‘엄격히 선택된’ 것이고, 전체 19편에, 20만 글자에 달한다.

이 19편의 투고된 글들이 모두 ‘황군’이 진주만을 기습하고 싱가포르를 공격 함락시키기까지의 험악한 무공에 천편일률의 찬사를 내놓았음은 두말할 나위가 없다. ‘이 전쟁은 일본의 강력한 실력을 충분히 보여주었고, 동아시아 민족을 알뜰서는 안 된다는 점을 지적하였다. 반대로 영미 전투력의 한 번의 공격도 견뎌낼 수 없는 취약함을 노출했다. 싱가포르 이후 완전히 종이 호랑이가 되었다.’³⁴⁾ 동시에 이 문장들은 ‘자책’도 잊지 않았다. ‘이때 중국인들은 일본을 의심할 필요가 없었다.’, ‘사람들은 왕정위선생의 ‘자책감’으로 자신을 탓했다..... 왜냐하면 중국 사람들은 각 종 사업에 대해 노력하고 싶어하지 않거나 노력하지 않으려한다면, 일본이 너희를 이끌어 노력할 것이고, 만약 노력이 부족하다면 일본만이 너희를 지도하고, 재촉할 것이다. 만약 노력이 적절하지 못하다면, 일본만이 너에게 반대하고, 너를 고쳐 줄 것이다.’³⁵⁾ ‘현재의 군사 업무를 일본군인들은 적극적으로 나서 모든 책임을 진다. 그러나 우리 중국인들은 지도자 아래서만 후방 업무를 열심히 한다. 예를 들어 남자는 밖에 나가 일을 하고, 여자는 집을 보살핀다. 이와 같이 남자는 근면하고, 여자는 절약해야 가정이 원만하다. 오늘날 중국이 바로 아내의 지위에 있다. 후방을 지키고, 일본과 협력하여 대동아 전쟁의 사명을 완성하는 것이다.’³⁶⁾ 이러한 내용이 곳곳에 있어 수를 헤아리기 어려울 정도이다. 모든 이러한 논문이 모두 ‘대동아 전쟁’은 황인종이 백인종의 수백년 식민 통치에 반대한다는 고귀한 ‘반식민주의’ 구호를 그 ‘이론적 기초’로 삼고 있다.

한 저자는 다음과 같이 썼다. ‘이번 대동아 전쟁은 단지 일본의 영미에 대한 전쟁이 아니라 황인종의 백인종에 대한 해방전쟁으로 아세아 각 민족이 자본주의, 침략 국가에 대한 총동원 전쟁이며, 우리 황인종이 영미제국주의의 압박에서 해방되어 우리 아시아 민족이 구미 빈족 통치의 족쇄에서 벗어나기 위한 투쟁이다. 아세아주는 황인종의 아세아이므로, 마땅히 우리 아세아 사람이 함께 협력하고 제휴해야 한다.’³⁷⁾

이번 전쟁은 ‘약소민족해방’의 발단으로 민족 해방의 물결을 대표한다. 이들 글은 모두 영미제국주의, 자본주의를 대표로 하는 백인종 강세 문명의 수백년에 거친 황인종 약세 문명에 대한 식민, 반식민, 식민통치에 준하는 종종 죄악을 열거하였고, 아편 전쟁 이후로 중국의 정치, 경제, 문화 등 모든 분야에 대한 압박과 약탈을 강조하였다. ‘이와 같은 상황 속에서 동아시아 민족은 이미 존망의 시기에 놓였음이 분명하다. 우방 일본이 당시의 쇠퇴해

33) 王伯庸：서”，논문》 p

34) 天，논문》 4p

35) 如，논문》 6p

36) 朱疇，논문》 7p

37) 孫，논문》 3p

가는 상황을 구하기 위해 결연히 이번 전쟁을 무릅써서 아시아를 보호하는 중임을 맡았다.’³⁸⁾ 게다가 이는 국제 자본주의, 영미 ‘금권주의’에 반대하여 자본주의의 경제를 폐지하기 위한 전투이다. 따라서 인종, 민족의 ‘정의’외에 경제, 계급상의 ‘정의’도 있다. 이번 ‘대동아 성전’의 위력은 ‘서양인이 유행시킨 오로지 자신들만이 신의 선택된 백성이고, 하늘의 총애를 받는 아들이고 기타 민족은 운명으로 정해진 노예라는 개념이 완전히 잘못된 것이라는 사실을 증명했다..... 이후 백인들의 우월감은 몰락의 관념이 되고, ‘식민지 제도’ 또한 합리적인 해석을 잃었다.’³⁹⁾ 반대로 중국 군민의 항일 전쟁은 영미 식민주의의 일부분으로 ‘초토항전’, ‘항전건국’, ‘장기항쟁’, ‘유격전쟁’처럼 모두 ‘영미의 잘못된 항일 배일의 착오에 의존하여’ 제기된 나라를 잘못 이끌어 가는 구호요, 백성을 해치는 명사이다.’⁴⁰⁾

많은 글들이 영미의 ‘문화침략’, ‘문화식민’에 채찍질을 가하며 ‘중국인들이 영미의 자유주의 문화에 현혹되어 그 피상을 심히 부러워하느라 수천년 고유의 도덕을 헌신짝처럼 버리고 사람들을 따라 사람의 도리와 기율을 버리고 잘못됨이 쌓여가니, 국세가 날로 쇠퇴한다.’ ‘우리의 수천년 문화는 왕도를 그 특유의 정신으로 한다.....아편전쟁 이후에 이르러 영미 문화 침략이 나타난 이후 중국 사람들은 물질문명의 새로움에 충격을 받았고 군상들이 그 표피를 따르고자 하니 전통의 왕도 문화가 지게미와 쌀겨를 보는 듯하다.’, 이번 일본군이 신도를 공격 점령한 시기를 빌어서 ‘과거의 고질병인 영미공리주의 문화를 깨끗하게 씻어내고’, ‘왕도 문화로 그 오랜 병을 교정’하여, 중일 문화를 소통시키고 ‘공존공영의 신동아시아를 건설하자.’⁴¹⁾ 현재 ‘서양인은 서양의 문화가 인류 최고급의 문화라고 숭상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우리는 동방문화의 부주의와 비통일로 인하여 서양의 문화 앞에 고개를 숙일 수 밖에 없다. 그러나 앞으로 일본이 구미를 따르는 사상과 정책을 청산하여 중국은 민족해방 독립을 쟁취하는 노선을 전환하여 동방 문화는 이번 전쟁을 계기로 세계 문화에서 새로운 빛을 발하게 될 것이다.’⁴²⁾ 즉, 중국/동방문화만이 ‘문명’이고, 소위 서양 문화는 단지 물질 문명일 뿐이며, 그 실질은 야만적이므로 중국/동방문명으로 세계를 구하고, 인류를 구하고 ‘만세를 태평하게 하자’는 것이다. ‘동방문화우월론’ 또는 ‘동방문화부흥론’과 같은 매우 ‘민족주의’적 표현은 중화민족의 이익을 손상시키기 위해 복무하였다.

식민주의에 반대하고, 영미 경제 수탈, 문화 침략에 반대하는 것은 왕위의 ‘대아시아주의’의 핵심 언사였다. 그러나 이것은 사람들로 하여금 ‘식민주의 이론에 반대’하는 것으로 보여져서 또다른 더욱 야만적이고, 더욱 흉악한 식민주의에 의해 이용되었다. 이 사실은 다시 한 번 인류의 죄악을 포함한 각종 행위가 모두 고귀한, 심지어 ‘웅변적’이기까지 한 ‘이유’를 찾고자 한다는 것이다. 그리고 이론은 심지어 매우 정확한 이론 자체도 남용될 수 있다는 것이다. 따라서 각종 이론에 대해서 그 ‘스스로의 표명’으로 경솔하게 판단을 해서는 안 될 것이다. 그의 언사는 사실 결코 중요하지 않다. 관건은 누가 장악하고 또 어떻게 운용되는 가이다. 이러한 격렬한 ‘식민주의 반대’의 ‘격문’은 만약 구체적이고, 실제의 역사 내용과 시

38) 李景, 논문》10p

39) 李景, 논문》12p

40) 程守, 논문》1p

41) 논문》43—4p

42) 李景, 논문》12p

대 배경을 무시한다면, 만약 일본 침략이 중국을 포함한 아시아 각 국에 가져온 거대한 재난을 지운다면, 단지 이론에서 이론으로, 개념에서 개론으로, 텍스트에서 텍스트로, ‘새 이론’으로 ‘기존 이론’을 증명하고, ‘새개념’으로 ‘구개념’을 증명하고, ‘오늘날의 텍스트’로 ‘어제의 텍스트’를 증명하고 둘 사이의 어떤 유사점을 찾아낸다면 우리는 현재 유행하고 있는 ‘포스트 식민’이론으로 당시의 ‘대동아 성전’의 합리성, 정의성을 논증하고 해석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동시에 당시 중국, 조선과 동남아 각국 인민들의 일본에 대한 항전이 오히려 ‘백인종의 강세 문명을 수호하여 황인종의 약세 문명을 식민통치’하고자 했다가 ‘영미의 착각’에 의존해 항일 배일의 오류’를 저질렀다는 결론을 내릴 수도 있을 것이다.

결론

19세기 중엽 일본에서 기원한 ‘대아시아주의’ 혹은 ‘동아시아공동체’는 근대 ‘서방의 아시아 침략’의 배경 아래서 ‘현대’가 ‘전통’을 유지하고자 한 산물이며, 그 자체로 이미 매우 복잡하다. 근 1세기 동안 ‘수용자’로서의 중국은 여러 다른 반응을 불러왔고, 이는 더욱 복잡했다. 이는 탄생부터 형형색색의 사상유과와 정치 세력의 이용을 받았고, 이 과정 속에서 여러 사상 요소를 흡수하여 스스로를 ‘형성’했다.

미국 학자 베네딕트 앤더슨(Benedict Anderson)은 ‘민족’의 기원을 논술한 『상상의 공동체』에서 민족을 다음과 같이 정의했다. “그것은 일종의 상상의 정치 공동체이다. 또한 그것은 상상에 의해 본질적으로 제한(limited)되며, 동시에 주권을 향유하는 공동체이다.”⁴³⁾ 만약 ‘민족’이 이와 같다고 말한다면, 그렇다면 ‘대아시아주의’ 혹은 ‘동아시아공동체’는 더욱 지리 공간과 역사, 문화, 사상이 일치된 일종의 ‘상상의 공동체’일 것이다. 손중산, 이대조, 왕위정권의 이러한 ‘상상의 공동체’에 대한 다른 태도, 이해, 논술, 운용 및 그것이 가져온 다른 결과는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역시 이러한 ‘상상’이 누구에 의해 장악되고, 어떻게 표현되고, 어떻게 이용되는가라는 것을 설명한다.

43) 미Benedict Anderson저, 吳 : 상상의 공동—민족주의의 기원과 배》상해인민출판사20년판, 6p

「大東亜」想像：近代中国語を中心に

雷 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次〉

1. 孫文の「アジア主義」観
 2. 李大釗の「新アジア主義」
 3. 汪偽の「大アジア主義」
- 結 論

近代の「グローバル化」の下、伝統的な「东亚」は「西洋」の侵略を受け、そして东亚において伝統であった「中国」を「天下の中心」とし行ってきた「朝貢貿易」も次第に崩壊していくこととなった。「大东亚主義」或いは「アジア主義」はこのような背景の下、日本において生まれた欧米や世界を参照とする思想体系である。実のところ、东亚諸国が「アジア」、「东亚」という概念を採用したことは、近代的な空間概念、或いは西洋の空間概念を採用し、伝統的な「华夏中心」観における「天下」モデルと取って代え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た。

ひとつの思想体系が生まれ、それが形成され、発展し消滅する課程の中では、往々にして非常に複雑な変異や流派が現れる。そして社会や国家、国際関係、歴史変遷と密に関連する思想体系は、繁杂で変化の激しい現実の荒波の中で、その変化や体系内部の差異も更に複雑になっていき、整理しにくくなるのである。

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は形成、発展、そして消滅に至るまで、ずっと东亚の「華夷秩序」の構造変革、国際形成の変化、日本社会そして政治変動と密接に関係していた。このため、百余年の間複雑で異常な歴史的過程を経ることとなった。故にこの思想について深く詳細な研究をし、筋道を立てて緻密に分析することは、非常に意義のあることである。长年、この課題は深く掘り下げて研究がなされ、多大な成果を残してきた。しかし本稿の焦点は主体的な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ではなく、客体的な近代中国の「アジア主義」の解读にある。言いかえれば、本稿は「客体」を「主体」とするのである。近代中国を主体とし、日本から来た「アジア主義」に対する反応に焦点を当てて見ていく。

更に進んで言うと、「アジア主義」の複雑性、多義性により、大部分の研究者が长年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に対して研究してきた重点は以下の問題を整理することにあつた。即ち、その初期に西洋の侵略に対する反抗という客観的で進歩的な性質を持っていたかどうか、どのような思想家が西洋の侵略に反対する進歩性を持っていたか、どのような思想家が日本が他のアジア国家を侵略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支持する反动性を持っていたのか、これらの思想はいつ頃侵略思想に変化したのか、といったことである。日本人学者竹内好や狭間直樹は「アジア主義」には煩雑性があり、欧米の侵略に逆らおうとする一面や、侵略したアジア各国と「重合」という、ともすると発展して侵略理論となり得る一面をも持っていたと考えている。近年、中国の学者もこれに対して更に激しく議論を戦わせ、仔細に研究している。¹⁾

1) この問題に関する最近の論争と研究は、以下を参照のこと：「19世紀と20世紀之交の日本亞洲主義」，《歴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亞洲主義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歴史研究》，2004年

しかし、本稿では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においてどの思想家が「進歩的」、どの思想家が「反動的」、いつ西洋の侵略に対する「進歩性」を持った、いつ侵略性の反动思潮に変わりだした、等といったことを細かに検討することはしない。集合的に近代中国、元来の「レシピエント」を「主体」として見做す。何故ならば、思想の「価値」は主体的需要に相對して言えば、主客体間の複雑な相互作用であり、「レシピエント」のこの過程における自発性を軽視することは、多くの思想体系が历史上起こした实际作用を深く理解し解釋する妨げとなるからである。深く哲学詮釋学の影響を受けた現代は美学理論を受容し、文学作品の歴史的生命は通時的讀者の阅读と承認に存在すると考えている。「作者と作品、讀者の三角关系において、讀者は單に受動的な部分、或いは反應を示すだけという存在ではなく、それ自身が歴史の能動的な構成物なのである。一部の文学作品の歴史的使命が、もしレシピエントの積極的な參與がないとすれば、それはおかしいことだ。なぜなら、讀者の伝達課程を通じてのみ、作品は連続的變化の経験視野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から。」²⁾もし文学や文学作品でさえ、「レシピエント」の理解と「積極的參與」に注意しなければ意義がないというならば、「レシピエント」の存亡と密接に關係している社会思潮や對外关系理論は、なおさら「レシピエント」の理解や解釋、そして「積極參與」に注意し、「受容史」の角度からその意義を理解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そこで本稿では孫文、李大釗と「汪偽」の日本「アジア主義」に対する观点について几つかの考察を加えたいと思う。

簡潔に言えば、本稿は思想傳播の「受容史」「效果史」の角度から、近代中国の「アジア主義」という言葉について多少の研究を試み、日本の「アジア主義」及び「东亚」歴史に關する研究と理解が更に深ま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ものである。³⁾

1. 孫文の「アジア主義」観

1895年廣州における武装蜂起に失敗して以降、孫文は長期的に海外に亡命し、長きに渡って日本を革命活動の本据地とした。日本に滞在中、孫文は日本の朝野の様々な人々と密接に交流し、その中の多くの人が彼を支持し、彼の革命活動に参加した。彼が日本に滞在し活動していた19世紀末から20世紀初頭、日本はまさしく「アジア主義」が興った時であり、孫文も自然と彼らの思想的影響を受けた。その程度は深く、時間も長く、人々の注目を集めることとなった。

1897年、孫文が日本横浜に滞在中に、彼は宮崎寅藏（滔天）と知り合った。宮崎は孫文の事業に対して大いに理解を示し、全力で支持した。宮崎は孫文に興奮しながらこう述べた。

「支那の民の爲、アジア人の爲、世界人道のため、革命軍を興すことを天は必ず助けて下さるだろう。君達が我らと交流を結んでくれたこと、それが證據だ。我らは努力奮起し、同胞の希望にこたえよう」⁴⁾

第3期。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と右翼思潮源流——兼對戚其章先生的回應」，《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楊棟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亞洲主義』思潮辨析——兼與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學刊》，2009年第3期最も重要な研究專書に、王屏の《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

2) (独)Hans Robert Jausほか、周寧、金元浦：接受美接理》遼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4～2

3) 本稿の主旨は「アジア主義」や「大东亚」思想体系の日本での発生と變化について研究することではないため、これらの思想の源流、各思想家、思想流派の異同については詳細な考察を加えない。本稿は文章上の必要性から、同じ意味で2つの概念を使用する。その他、「アジア主義」や「大东亚」思想体系の近代朝鮮での「受容史」「效果史」についても考察研究を加えれば、この思潮や「东亚」の理解についても更に全面的に奥深くなるであろう。筆者は未だ朝鮮の状況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ていないことを遺憾に思う。

辛亥革命後の彼は、このような言論が更に多い。

1913年2月、孫文は日本を訪れ、日本各界と中国人留学生に対し十数回の讲和と演説を行った。彼が国内で行った演説は、历史、文化、种族、経済そして地理等の方面で中国と日本は「手を携え」「西欧諸国」の侵略と戦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孫文は以下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日中两国には数千年の亲密な关系がある。种族、文字も同じである。两国の外交は世界各国に从って行动することをよしとせず、古来の亲密な关系を回复すべきだ。日中两国は行动を同じくし、それにより东亚の利益を保证するのだ」⁵⁾「中国が将来経済や实业の发展をした暁には、日本の利益となるだろう」「日中两国は同种同文で、关系もきわめて古い。今後两国が手を组むことを深く望む」⁶⁾「アジアの人口は、全地球の3分の2を占める。今日その一部は欧米人の势力范围の下に屈服している。もし日中两国が協力するならば、势力も扩大し、1つの大アジアを作り出し、以前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历史を取り戻すことは難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アジアの大局は我々アジア人の手にか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⁷⁾「アジアの平和は、アジア人が保持すべき义务である」「现在アジアの独立国は、日本と中国の2カ国であり、东亚の平和を维持するのは、日本に大いなる希望を寄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日本と中国は実の兄弟のような国なのである」「しかし日本だけが強いのも、东亚の大勢を维持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中国を助け、手を携え进步していかねば」⁸⁾「今後东亚最强の日本と东亚最大の中国が、経済界でお互い協力し合い、助け合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日本は中国よりも早く维新が起こり、経験があるが、我が国の国民は指導者を欠いて久しい」⁹⁾「日中两国の青年学生は、将来有望である。各々勉学に励み、その本分に尽くすことを愿う。诸君の本分とは、东亚を守るという名誉であり、东亚の局势を维持し、西欧人に侵害されないように尽くすことである。诸君はこの为に手を組み、互いにその双肩を担ってほしい」¹⁰⁾彼等が持ち出した大アジア主义を信じ、以下のように表明している。

「我等两国人は元々同种同根であり、理を异にするはずはない」そこで日中两国が「今後ますます提携共同して欧米列强の侵略を防ぎ、我等东洋を东洋人の东洋にするのだ。何と愉快なことか！」¹¹⁾

大アジア主义を信奉、支持、宣伝するには、近代以来日本が中国に対して行ってきた侵略について向かい合い、回答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これに対し、孫文は、これまで日本が中国に行った侵略行为について中国は許すべきであると考えた。「日本と中国は密接な关系を持つ国であり、同种同文である。东亚の大局を维持する計画は、助け合っておこなう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だ。些细な齟齬はあるかも知れぬが、大局を見据えれば、それらは问题にすべきではない。日本は以前中国に対して侵略的政策を行ったのは、中国の国势が完全に立ち行かないと知り、仮に欧州の掣肘を受ければ、日本という三島の海国では国を守りかた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がないので、やむを得ず」中国を侵略した。「もし日本が存在しなかったのなら、东亚の前途は言うまでもなく、东亚地方は我等と革命を成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であろう。皆日本の力の賜物なのである」日本は「我が国と利害关系にあり、东亚を侵略する野心などあるはずがない。历史的に見れ

4) “崎寅藏平山周の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5) “在日本大冈育造之主持的宴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7页。

6) “在东京实业家联合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页。

7) “东中国留学欢迎演”，中山全集》第，第27、2。

8)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页。

9) “在日本邮船公司招待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页。

10) “在日本日华学生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21页。

11)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

ば、日本は島国であり、我が国は陸国であり、お互いに侵害するはずがないのである。例え近年來侵略的行動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それは本当にやむを得ないものであり、本心ではないのだから、我々は日本を許すべきなのだ。我々日中两国は、連合し共に進むべきなのである。将来連合し、親密になれるかどうかという責任は、すべて学生諸君にかかっているのだ。衝突をなくし、誤解を解き、共に东亚大陸の幸せを祈り、そして东亚の主人公になるのだ」¹²⁾

日本朝野の政界要人の大东亚主義に対して相当な希望を持たせたことで、孫文は今回の訪日は非常に成功したと考え、帰国後楽観的に国民党幹部にこう伝えた。「現在日本の朝野の政客は、みな国際的な視野と知識を持ち、そして一大アジア主義を抱いている。东亚の大国は我が中華のみで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に分かるし、日本は三島立国の国。两国は相接しており、中華とは密接な利害关系にある。もし中国が滅びれば日本も生きてはいられないであろう。日本人は自衛のために、形式上は中华民国に賛成するとしながら、実際には日本帝国を維持しているので、日本人は中華の政治革新に対し、政府も人民も同情を示す」「日本と中华民国は元々兄弟国であり、利害を共にしている。もし何か緩急があれば、無視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はずだ。兄弟が日本から帰ってきて、見たことはこの通りだ。同志諸君がこの説明を聞いて、日中関係を密にし、平和を享受してくれれば、东亚の大局の幸いである」¹³⁾

1917年、『中国存亡問題』の中で、孫文は大アジア主義をアメリカのモンロー主義と比較して、大いに賞賛している。「中国と日本は、アジア主義を以て太平洋以西の財源を開発し、アメリカのモンロー主義は太平洋以东の勢力を統合し、各々成長を遂げる。これで長く衝突する惧れはないであろう」¹⁴⁾

しかし、1913年宋教仁が刺され、孫文は「二次革命」を发动、1915年日本は袁世凱に「21条」の要求を突きつけ、さらに1917年孫文は反段护法運動を发动した。彼は日本政府の支持を期待していたが、日本政府は孫文を支持しないばかりか、孫文の敵を支持した。最終的に、孫文はソビエトロシアの支持を求め反応を得、連ソ政策に轉換した。これらの出来事は、自然と彼の「アジア主義」に変化をもたらし、「大アジア主義」を捨てさせた。

1919年4月、孫文は日本の記者と接見した際、日本がアジア邻国に行った侵略に対して非難した。「諸君たち日本人はアジア人ではない」「日本人は欧米人に使われ、アジアを侵略した。どうしてアジア人といえようか？」¹⁵⁾同年6月、国民は日本がドイツから山东省の權益を奪い勢力下に置いたことに対して、激しい爱国運動を起こし、孫文もこの出来事に対して日本の「朝日新聞」の記者にこう述べた。「日本の軍人は、帝国主义の野心を夸示し、維新志士の本懐を忘れてしまった。中国を抵抗力が弱いとみて、その侵略政策を发展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中国と日本の国家建设方針は、全く相いれないものだ」¹⁶⁾

1923年10月、孫文と密接な関係であった犬養毅が入閣し、文相兼逓信大臣となった。犬養は日本政府の対華政策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おり、孫文はこれを聞いて非常に喜び、急いで書簡をしたためた。その内容は大体以下の通りであった。第一に、孫文は日本の長期にわたる朝鮮・中国侵略を批判し、譴責した。アジア人民は欧米列強の侵略に抗う中、「日本がアジアの救世主であると誰もが見做した」が、日本が好战的に邻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は、アジア全域の人々を失望させ

12) “东中国留学欢迎演”，中山全集》第，第26—2

13) “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宴会演”，中山全集》第，第51—5。

14) “中国存亡問題”，《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95页。

15) “与日本记者大江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16)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た。第二に、「种族论」を越えたこと。孫文は、未来の戦争は白人と黄色人の間の戦争でも、欧米とアジア間の戦争でもなく、「道理と強権」の戦争になるであろうと考えた。第三に、今回の戦争で、ソビエトロシアは「屈辱を受けた」アジアとヨーロッパの人々の友人であり、日本は「列強」と「屈辱を受ける者」の間で選択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日本は中国革命を支持し、ソビエトロシアを承認し、親中親ソ政策を実行すべきである。第四に、未だ日本に対して希望を持っており、日本は毕竟东亚の国家であり、「王道分化」の悠久の歴史を持っており、道德や正義の呼びかけの下、翻然と悔悟し、欧州帝国主義の後塵を拝することを捨て、アジア各国を支援してく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る。¹⁷⁾

1924年4月、アメリカ国会で排日移民法が通過し、日本世論は騒がしくなった。国内では反米の気風が高まり、孫文は、この出来事は日本を「アジア人として目覚めさせる好機である」と考えた。そこで10月に参謀長李烈鈞を日本に特別派遣、常駐させると、日本で彼の理念にそった「アジア大同盟」を計画組織し、「それによって白人の侵略に抵抗」しようとした。¹⁸⁾この主張は結果が出ずに終わったが、同年11月孫文が日本を経由して北京に向かい、日本の神戸で著名な「大アジア主義」の演説をすることを成功させた。この演説は、孫文の晩年の「アジア主義思想」を反映している。主な観点は以下の通り。一、アジア文化优越论。「私は我々アジアこそ最古の文化发祥地であると思っている。数千年前、我々アジア人は既に高い文化水准を得ていた。つまりギリシャやローマ等欧州最古の国家の文化は、すべてアジアから伝わったものだ」アジアの凋落やアジア各民族が次々と欧州各国の侵略圧制を受けたのは、ただこの数百年の出来事である。二、アジア人はアジアを主人公とすべきである。日本は明治維新以降、次第にアジア初の独立強国となった。アジア復興の起点である。その後の日露戦争で、日本はロシアに勝利した。これはアジア人の欧州人に対する勝利であり、黄色人の白人に対する勝利である。三、アジア文化「王道」論と欧州文化「霸道」論。世界文化には2種類ある。1つは欧州の霸道文化であり、もう1つはアジアの王道文化である。欧州文化は科学の文化であるが、利益や武力を重視し、アジアを抑圧、進歩を阻止した。このため、欧州文化は「霸道の文化」なのである。東洋文化は仁義と道德を本义とし、人を抑圧しない。「我々が現在この新しい世界で我々の大アジア主義を作るには、何を基礎とすべきか。我々固有の文化を基礎とすべきである」アジア固有の文化とはつまり仁義道德である。これが「王道」なのだ。しかし、ソビエトロシアの最近の新たな文化は、積極的に東洋の新文化に融合しようとしている。「故にソビエトロシアは東洋と手を携え、西洋と一線を画そうとしている」。四、日本は「王道」か「霸道」かの選択に直面している。「大アジア主義を語る」目的は「すなわちアジアの苦しんでいる民族のために、どのように欧州の強勢に立ち向かうかという問題」、「簡潔に言うと、つまり抑圧されている民族のために考えるという問題」。しかし、欧州にも抑圧された民族はいるし、アジアにも「霸道を行う国家」が現れるであろう。「日本民族は欧米の霸道文化を得るとともに、アジアの王道分化の本质をも持っている。今後世界文化の前途に対し、西洋の霸道の鷹犬となるか、或いはアジア王道の干城となるかは、日本国民の詳密な考慮と慎重な選択にか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¹⁹⁾

19世紀末から20世紀20年代中期にかけて、後期は明らかに日本に対する失望、侵略についての厳しい悪評、ソビエトロシアに対する強調のように調整するところがあるとはいえ、数十年来孫文は確かに深く「大アジア主義」の影響を受けて続けてきたのである。

17) “致犬養毅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6页

18) “致李烈鈞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页。

19) “对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1—40页

しかし、注意に値するのは、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或いは孫文が理解していた「大アジア主義」中には、数十年間変化しなかった基本的な重点があり、その十点はまさしく孫文が信奉していた「大アジア主義」の根干であった。すなわち日本を首領とした「大アジア主義」が外部から助けることで、中国の専制政治を宪政制度に改革し、近代中国が西洋と系がる制度の変革を支持してくれるよう希望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更に一步進んで言うと、孫文は「黄色人」のアジアは、「白人」がアジアに対する植民統治に反対しても、「白人」の政治制度には反対せず、逆に「黄色人」も「白人」（欧米）の政治制度を実行す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たのである。

1897年孫文は宮崎寅藏と谈话した際、中国国情や中国国民性は民主共和制に向かないという見解に対して、批評した。「人々は或いは共和政体は支那という野蛮の国には向かないというかもしれないが、これは情勢を察せず言うだけである」。宮崎らに熱心に孫文の反清革命を支援するよう頼み、宮崎らは中国を救い、「四万苍生、东亚黄色人の雪辱を晴らし、天下の人道を回復しこれを支持」しようとした。中国の革命が成功しなければ、これらの目的は達成しない。「この事が成ればその他の問題は簡単に解決するであろう」20)。

1903年、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の「支那保全論」に対して、孫文は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た。いわゆる「支那保全論」は1898年10月の东亚同文会の創立大会で生まれ、その主旨は日中两国の「文化相通、风教相同」、两国の「同文同种」や「密接な关系」を強調しており、两国が欧米列強の侵略に面し、政府から民間に至るまでが公平に待遇し、約束を守り互いに利益を得るべきであると呼びかけている。两国は国交を強固にし、亲善を強めるべきであるとし、日中连合を打ち出し、共に西洋列強の侵略に対抗しようと述べている。この時日本はすでに日清戦争で中国に勝利し、「下关条约」に调印し、台湾を割让することを中国に迫っており、中国は列強によって分割される危机に面していた。日本は経験が浅かったことから、中国を分割する「宴」の中で、理想通りの分け前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ばかりか、中国が分割されたことで西洋との缓冲を失う危険性があった。そこで「支那保全論」を持ち出したのである。1903年、「八国连合军」が北京を荒らし、北京议定書を締結したこと、清政府は不安定な情勢に立たされた。その中で中国は列強によって分割されるという亡国の危机に面していた。しかしこの時、孫文ははっきりと「支那保全論」に反対していた。何故ならばこの時「支那を保全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即ち清政府を「保全」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孫文は、中国を統治する清政府は腐りきった异民族政权であり、保全する価値がないと考え、また、清政府の汉族官员はみな汉奸であり、「支那を保全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が、もしもこれを借りて本性を忘れ、良心のない汉奸がこれを企てているのだとすれば、それは『木に縁りて鱼を求む』である」中国は「国勢について言えば、保全する理由などない」。现在自由の义や民权の风潮はすでに世界の潮流になっているが、「支那人には独立しようと奋起するものがないというのだろうか」。「东亚の治安の策をどのように計画すべきか。曰く、ただ支那国民の声を聞き、その情勢によりてこれをたて、新たな支那を作りあげるだけである」所谓「情勢」というのは、すなわち中国人民が国际的自由や、民权の大勢に従って独立した公民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それは专制制度下の臣民でも奴婢でもない。この様にしようやく新たな新中国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り、ようやく大アジア主義が望む所の「东亚治安」が真に实现するのである。21)

1911年7月、孫文はアメリカを経由し来日しようとしていた。中国革命の計画が日本政府に拒絶されたことについて、孫文は日本の友人にあてた手紙の中でこ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自分は

20) “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21)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9—224页。

日本を第二の故郷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る。ただ、最近我が国の多くの少年志士が、貴国の満州経営について、支那を不利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と誤解していることを残念に思う。このような世論は真に将来两国の爲にならない」。孫文は自らが今回日本政府に拒絶されたことに対して、遺憾であり、深く不安を感じていた。「君は私の知己の1人である。支那革命事業に同情するよう知り合いの名士と手を結び、日本と支那人民の交流を提唱し、貴国の輿論を導き、貴国の政府に働きかけて欲しい。支那が世界に復歸し、列国と平等になれば、この日本の恩恵にたいして、漢民族は子孫孫末代まで永遠に忘れないであろう。」²²⁾

1917年夏、孫文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の护法運動に反対していた際に、日本の首相寺内正毅に書簡を出し、日本が「正義を援助」し、中国の革命党人を支持して、北洋军阀政府の政策を支持することを放棄してくれることを望むとした。それこそ日中两国の「真の提携」と「真の親善」の鍵であり、「东亚の平和が期待できる」。²³⁾

1919年6月、孫文は日本の『朝日新聞』記者の談話で、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を非難した際、こう強調した。「私はこれまで誰よりも日中親善を主張してきた。しかし最近になっても日本の政府は未だに我が国の官僚を助け、民党を挫こうとする。心を痛めずにはいられない」²⁴⁾

1920年6月、孫文は日本政府陆军大臣田中義一に宛てた書簡において、日本が長期的に政府を侵略したことを激しく非難、批判した上で、中国人民の反日の根本的な原因は日本政府が中国国内の保守勢力を支持していることだと明確に説明した。「近代日本の东亚に対する政策は、武力的、資本的な侵略を基本としている」、「中国に対して、日本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ため、常に保守的反对勢力を育て、革新運動を押しえつけている」、「近年来、中国人民の対日感情は日に日に悪化している。その根本的な原因は、日本の政策と民国の国是と相いれないことによるもので、中国人は日本の事を民国の敵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のだ。」²⁵⁾

1923年10月、孫文は犬養毅に宛てた書簡中でやはりこの様に勧めている。「日本政府は今決然と支那の革命が成功するよう助け、国内を統一し、国外に対しては独立一挙し列強の束縛を解き放つ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べきだ。そうすれば日支親善に希望が持て、东亚の平和も永遠に保てるであろう」、「日本の維新は確かに支那革命の原因であり、支那革命は日本の維新の結果である。二者は元々一貫しており、东亚の复兴を成すことを以てしている。その利害は元々同じく密接なのに、日本は支那革命に対し何故欧州に追隨し自らを忌み傷つけるのか？」孫文はさらに日本はソビエトロシアに学び、アジア各国を助け革命を发动させるべきだと建议した。「日本国家が永久に繁榮するためにも、もし支那に革命が起こらなければ、日本は提唱しこれを引导すべき」であり、「支那の革命が既に起ったのなら、日本はその力をこれに傾け、援助し、支那を助けることで自らを救うべきである」。中国人が日本に反感を抱くのは、「すなわち日本が支那の革命に対して、12年来反对行動を取ってきたからだ。反对に失敗すると、偽りの中立を保った。未だ嘗て躊躇うことなく、支那の革命を助け、日本が东亚の远大な計画者として立国するという徹底的な覚悟をもったことがないとした」。²⁶⁾

つまり、「大アジア主義」は孫文の言葉の中ではずっと中国国内の状況と密接に相关しており、彼が反清、反护法、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を追究する言葉の一部分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22) “复宗方小太郎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3—524页

23) “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

24)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25) “致田中义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277页。

26) “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404页

このことから、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は鮮明に欧米列強の侵略に反対すると同時に、「対内」の基本価値観と制度を否定していない。そして、孫文が統率した革命事業を支持さえすれば、彼は決して「大アジア主義」が日本によって統率されようが主導されようが構わ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2、李大釗の「新アジア主義」

1912年秋、やはり北洋法政学堂の学生であった李大釗は北洋法政学会に参加し、他の学生と一緒に学会の編集部長を務めた。年末、この学会は『「支那分割の運命」反駁』という本を出版した。これは2か月前日本で出版された中島端が著した、12万字22章からなる『支那分割の運命』を全て译し、ひと区切りごとに注释や评语を加え、厳しく反駁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支那分割の運命』は様々な角度から、成立して間もない中华民国は近いうちに灭亡すると论证し、中国を分割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おり、东亚のモンロー主義が実現できるのは、アジアには日本の大和民族しか东亚を統一するという大事を成せるものがないとしていた。『「支那分割の運命」反駁』は注释や评语等という形式を用い、中島のあらゆる论点に対し逐一反駁し、その中の「东亚のモンロー主義」という章で、ただ「日本は东亚という代名词を独占しようと試みている」だけに過ぎないと咎めた。

『「支那分割の運命」反駁』は集団での成果であり、このことからどの注释と评语が李大釗の手によるものなのかは判断できない。しかし編集部長であり、この本の译、评、出版から发行に至るまでの诸事は李大釗が主动したものであり、本书の观点と言论も李の思想であろうと见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东亚のモンロー主義」に対する批评も、恐らく李の观点であろう。实际、李大釗は以降この问题についての观点を基本的に変え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1914年1月から1916年5月まで、李大釗は日本に2年半近く留学し、日本や日本の「大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自然と深く知ることとなった。第1次世界大战で欧米各国はヨーロッパで激しく争い、东洋に構う暇などなかった。日本はこの机に乗じて、「东亚モンロー主義」や「远东モンロー主義」の宣伝に一层力を入れていき、「アジア人のアジア」を主張した。1917年2月下旬から4月中旬、李大釗は『新中华民族主义』『极东モンロー主義』『大アジア主義』の3篇の文章を相次いで发表し、自らの见解を示した。

『新中华民族主义』²⁷⁾中で、李大釗は「日本が近来提唱する大アジア主義」はドイツが提唱する大ゲルマン主義、ロシアが提唱する大スラブ主義、イギリスの大アングロサクソン主義、そしてアメリカのモンロー主義と同じく、すべて民族主义运动の一部であると考えた。しかし、李大釗は以下のように记している。「日本のいわゆる大アジア主義は、その主旨がどこにあるのか、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が、しかし我々中华の广さは、ほとんどアジアの全土を包括しており、アジア各国の民族は、我々中华の血が流れないものはないし、その文明も中华を開祖としないものはない。今大アジア主義を以てアジアの民族を整理しようとするなら、新中华の觉醒と新中华民族主义の勃兴がなければ、成功するはずないと断言できる。これは私の身の程知らずな发言などではなく、历史地理から考えれば、この断言はロジック上の必然である。」そして、「我が中华民族の东亚での地位がこのように重要であるからには、我が民族はそれ故に地位を保证され、アジアの主人公となって、不可让与の权利を持ち、また不可转嫁の责任を持つとみなされるべきであ

27) “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286页。

り、これはすなわち新民族の自觉である。」李大钊は「我が国の歴史は最も長く、アジア由来の数多くの民族は冶金されて中华民族となった。境界を分けず、血統が全て无くなって久しい。この事実、我が民族が深く豊かな精神を铸造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ある」と考えた。彼は「凡そ中华民国に籍を置く人は、みな新中华民族である。そうであるならば今後民国の政教刑法は、この旨によって民族の精神を建国し、民族の思想を統一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主義こそ、新中华民族主義である。必ず新中华民族主義は东亚を奮い立たせ、大アジア主義は世界で光り輝く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である。そうでなければ、ただの幻想であり、ただの寝言である。」

中国の「大アジア主義」中での主导、指導を主張したことから、李大钊は必然的に日本が提唱する「大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疑いを示し、『极东モンロー主義』²⁸⁾（すなわち远东モンロー主義）文中で李は、人々はこの種の「极东モンロー主義」を警戒すべきであるとした。彼はこの数十年来「极东」地区が基本的には平和であったのは、主として门户開放と机会均等主義にあるとした。しかし、「今突如と一国が現れ、东亚でモンロー氏の宣言を真似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门户開放や机会均等主義と相背いていないだろうか。これら世界的大問題を、一国の欧州大战たけなわに乗じての自由宣言によって鉄案としてよいのか。更に宣言者について、その決心と實力は、最後までやり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なのか。欧州大战が終結した後、この宣言が世界大战を引き起こす恐れはないのだろうか。これらの問題は、宣言者が今熟慮すべきことである。「一言をもって国を興し、一言を持って国を滅ぼす」である。「极东モンロー主義」を唱えるものは慎むべきだ」。李大钊は远东アジアモンロー主義が门户開放や机会均等の均衡を打ち碎き、新たな大战を招くという角度から人々に警戒を呼び挂けたが、しかし「今突如として一国が現れ」と、名前は挙げていないにしてもこれは明らかに日本を指しており、この文の重点は実のところ人々に日本を警戒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大アジア主義』²⁹⁾の中で、李大钊は再び「大アジア主義」はただ中国が指導、主导できるのであり、もしその他のアジア国家が「主人公」になろうと強要するのならば、「欧米列強の非難の的となり、坏滅の災いを引き起こすであろう」。そして中国は「その勢力は全アジアの勢力を代表することができ、その文明は全アジアの文明を代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は私の自画自賛ではなく、现实に公認されることなのである」。当然、中国の主导地位は無条件ではなく、「中华国家の再建と中华民族の復活は絶大なキープポイントである」、「我が国民は大アジア主義の理想を打ち立てる覚悟がある。まず我等がアジアに対して持つ責任と地位を自觉すべきであり、アジアを中国人のアジアとし、新たな文明を創造し、新たな国家を再建する。そして世界に存立し、西洋の文明の民族と相対立させるのだ」。同時に、彼は直接日本を「指名」し、人々にその侵略性を警戒させた。「日本国民は確かに大アジア主義の理想を打ち立てる覚悟があるなら、まず我が中华がアジアの大局を担う礎であると認めねばならない」、「もしも大アジア主義の旗印がその帝国主义に彩られ、极东の霸权を奪い、他国民の略奪を禁止し自らは略奪し、他国民の屈辱を拒絶し自らは屈辱を加えるならば、その結果は必ず白人の妬みを招き、最終的には全アジアの同胞にも災いをもたらすであろう。すなわちその唱える大アジア主義は、アジアの大勢を維持できないばかりか、灭亡を招く危険性があり、特にアジア人が提唱すべきことではない。日本人には深く注意してほしい」。

この3篇の文章は以下のことを表明している。一、この時李大钊は大アジア主義の概念を受容していたこと。二、大アジア体系中で主导をとり、「主人公」となるのは中国であるべきで、ア

28) “极东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90—291页

29) “大アジア主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06—108页。

ジアの他の国家ではない。三、中国の主导的役割は無条件のものではなく、「新文明を創造し、新国家を再建する」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これは新文化运动の影響を反映している。この点は孫文とある種の相似点がある。即ち「大アジア主義」は「外部性」を持つだけでなく、中国国内の改革という「内部性」を持たせている。四、陰に陽に日本がこれを借りてアジアのその他の国家を侵略しようとする野心を警戒するよう説いている。五、終始白人と黄色人が対立する種族論を保留している。

1918年7月、李大釗は『Pan……ismの失敗とDemocracyの勝利』³⁰⁾という文章を発表し、彼の思想はこの1年と3か月内で根本的な変化があったことを表明した。

いわゆる「Pan……ism」は即ち「大……主義」であり、李大釗は現在「この主義を持つものは、自己の欲望を欲しいままに追求し、強圧的勢力を用いることも顧みず、他人に強制し自らの下に屈服させる」。国と国、地区と地区、军阀と军阀、党派と党派の間にはみなこのような関係を持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大アジア主義」を含め、当時世界及び中国国内での様々な「大……主義」を列挙した後、李大釗が出した結論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った。「凡そこれらは、その範囲の大小、区分の性質は違えども、基本的に専制の精神であり、他人の自由を侵犯することで己の勢力を固有の範囲以外に拡張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故に「大……主義」は、専制の隠語である」彼は更に一步踏み込んで分析し自らを「この発見には2つの奇迹がある」としている。第1に、世界の其他国家が主張する「大……主義」は全て外に向かって拡張し、「扩充主義である」。そして中国の「大……主義」は「縮小主義」である。「強大で优越の民族」が多く競って外に向かい発展したので、その民族精神や国家定位に構わず「斗争本能に火をつけ」、国民が一致し对外競争を行いだしたのである。「弱小国家の国民は皆、自分たちは弱く无能であると思い」、对外競争を使用等とは思ふこともできず、「国内で共食いをする事」で、「その好戦的本能を排泄」しようとした。そこで、彼は「自らの国」に対して深く分析をしてこう記している。「我が国の「大……主義」は、この「大」の範囲を多めに見れば、无论その大きさを厭わず、「大」の中心を統べる。小ささを厭わず、さらにますます小さくまとまろうとし、一身に至るものである」。或いは、この言葉が分かりにくいことを恐れ、彼はこのようにも形容している。つまり、中国の統治者は、自らの統治範囲が幾何学の圓周の如く、大きければ大きいほどよく、自分は圓心のように、すべての権力が自分に集中す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この中心は、初めはある地域、ある党派をもって描かれており、次第に個人へと集中していった。地域や党派を持って中心するその主義は大某地主義、大某派主義の如くであり、某人を中心とするものは、大某人主義へと移り変わっていった。大某人主義へと至ると、一国において实现すれば専制君主となり、各省においては实现すれば割据の軍雄となった。前者は洪宪の皇帝であり、後者は今日の督軍であり、みな「大……主義」の産物である」。しかし歴史はいよいよもって証明している。

「凡そ「大……主義」を持ち他人を侵略するものは、必ず失敗するに違いないのだ」。

「大……主義」が必然的に失敗すると反対、论证するため、李大釗は非常に重要な概念を導入した。デモクラシーである。彼は述べる。「「大……主義」と反対するものは、デモクラシーである。これは民主、民治とも译され、欧米で最近使用される言葉で、即ち「同权主義」の意味である。前者は力を重んじ、後者は理を重んじる。前者は専制を重んじ、後者は自由を重んじる。前者は力による独裁をはかるが、後者は各々が并立することをはかる。これが大略である」。李大釗は战争勃发以来の歴史を以て、デモクラシーの勝利を述べ、すでに歴史の潮流であるとした。故に「潮流がいたるところ、「大……主義」を持つものは、みな三舎に退避し、凡そその進路を

30)“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244－247頁

阻むものは、みな一扫された。これは時代精神であり、神圣な权威を持っている。19世紀の生活のすべての現象は、皆デモクラシーによって彩られている。」「近年では更に机关炮、汽船、メディア、電報の力を借りて、西洋から東洋へともたらされ、数千年に渡り専制の横行によって惰眠をむさぼっていたアジアを救い、以てその世界を征服するという完全な手がらを立てたのである」。袁世凱や段祺瑞の成敗は皆デモクラシーに順応するか背くかにかかっており、このため彼等の成敗は実はみなデモクラシーの勝利である。文章の最後で、李大釗は楽観的にこう述べている。「デモクラシーは今日の世界において、正しく中世欧州におけるローマ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今日の人々のデモクラシーに対する信仰は、中世ヨーロッパ人の宗教に対する信仰と同じである。私が見えるところ、すべてデモクラシーの勝利旗が立ち、聞こえるところ、すべてデモクラシーの凱旋の音が上がる。デモクラシーに従えば栄え、デモクラシーに逆らえば滅びる。実績は耳目にも明らかである。どうして今日の人は次から次へとPan……ismの旗を揚げ、或いはその下でデモクラシーは難しいとして、自ら滅びを招こうとするのか。私は失敗のPan……ismに哀悼し、勝利のデモクラシーに祝福を送ろう！」

李大釗の「大アジア主義」からその後の「新アジア主義」思想の発展過程の中で、この文は非常に重要である。本篇の文章は以下の事を表明している。一、日本主導や中国語主導、或いは日中共同主導かに系らず、すでに完全に「大アジア主義」を捨て去っている。二、「大アジア主義」を含めあらゆる「大……主義」の实质は全て専制であると認識し、中国の専制主義に更に鋭い批判を加えている。三、「ミスター・デモクラシー」は専制や「大……主義」の鋭利な武器と勝利に反対している。四、「強大で优越の民族」と「弱小国家」の国民性を比較している。この文章、特に前述の三と四の2点は、彼が核心的成員の1人となる新文化運動の直接反映である。

1919年1月、李は「新アジア主義」を提議し³¹⁾、その主旨は『Pan……ismの失敗とDemocracyの勝利』と同じで、ただそれを具体化し「新アジア主義」として打ち立てたものである。「新アジア主義」を提唱したのは、「世界体制を見ると、アメリカは将来必ずアメリカ連邦となるであろう。欧州は必ず欧州連邦となるであろう。我々アジアもこのような1つの組織を成立すべきで、これはすべて世界連邦の基礎である。アジア人は「新アジア主義」を提唱し、日本の一部分の人が提唱する「大アジア主義」に代えるべき」だからであった。彼は、彼が提唱する「新アジア主義」は「民族解放を基礎する、根本的な改造である。凡そアジアの民族が、并合させられたものを全て開放し、民族の自決主義を実行する。その後、1つの大連合を結成し、欧米の連合と3つに分かれて成立し、共に世界的連邦を完成、人類の幸福を促進する」のだと強調した。彼の予言中、「欧州連合」はすでに現実のものとなり、彼の遠見を明らかにした。各大陸連盟の基础上には「世界連邦」が組織され、本当に「グローバル化」の現実路線となる可能性があった。つまり、彼の「新アジア主義」の最終目的は「世界の連邦を完成し、人類の幸福を促進する」ことであった。このことから、1919年5月4日に北京の学生の愛国運動が起こったことに対し、李大釗は5か月余りの後、他の解説を加えた。「今回の「五四運動」は「大アジア主義」の排斥であり、即ち侵略主義の排斥であって、日本人に深い恨み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の世には強権で以て公理を抑圧するものがある。日本人であろうとなかろうと、我々は等しくこれを排斥せねばならない！我が愚見によってこの度の運動は愛国運動に過ぎないと思えるのは、适当ではない。これは実は人類の解放運動の一部分なのである。諸君のこの行動は、将来世界に対して大きな幸福をもたらすであろう、頑張れ！」³²⁾1919年11月初め、李大釗は長文『再論新アジア主義』³³⁾を著し、

31)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269—271页。

32)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67页。

これに対して再び詳細な説明を行った。概括すると、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私が主張する新アジア主義は日本の大アジア主義に反対して唱えたもので、欧米人が勢力を用いてアジア民族を圧迫することを恐れて説いたのではない。」日本の大アジア主義の圧迫を受けたので、新アジア主義を提唱した。これはアジア民族の解放運動の第一歩である。このことから「これは対内のもので、対外のものではない。日本の大アジア主義に対したもので、欧米の排アジア主義に対したのではない。」彼は、新アジア主義は「世界主義に背くものではなく、世界主義に順応するものである」と強調した。「何人、何国、何大陸を問わず、強権は我々の敵であり、公理は我々の友である」。「アジアはわれわれが世界改造を計画するにあたって先行着手する部分であり、アジア人が独占する舞台ではない。人類はみな我々の同胞であり、我々の的はいない。」

そこで「我々の新アジア主義は、「自治主義」であり、地域民族をみな民主的组织化する主義であり、「排斥主義」でも「閉鎖主義」でもない。我々は最高の世界組織は皆自治であり、民主化されたものであり、個性を尊重するものだ」と信じている。」最後に、やはり「デモクラシー」の上に落ち着いて、「世界のどんな种族も国民も、人類同胞の地位に立ち、真のデモクラシー精神を持ち、公理を支え、強権に反抗する人々は、みな親しい仲間だと考えている。我々は心から彼等と共に努力し、平等で自由、距離のない世界を創造したいと願っている。これが私の主張する新アジア主義の精神である。」

短い時間のうちに、李大釗は「大アジア主義」概念を受容し、中国は「盟主」となるべきだと提唱する考えから、完全にそれを捨て、強烈な世界主義の色合いを持ち、全人類の平等、自由、解放を主旨とした「新アジア主義」を提示するに至った。「新アジア主義」は矛先を専制制度と各国国内とアジア内部の強権に向け、排斥せず（アジアは欧米を排斥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指す）、これらはみな「新文化運動」の影響を反映し、「新文化運動言論」の一部となった。

3、汪偽の「大アジア主義」

如何なる政权であろうと、ある理論や意識形態で自らの「合法性」の弁護を必要とする。汪精衛政权は日本が支援した傀儡政权であり、「合法性」は先天的に欠如していた。このことから更に理論や意識形態を打ち立て自らの「合法性」の根据とする必要があった。「大アジア主義」こそこの合法性となり、主要な思想資源であった。この「大アジア主義」は、日本の中国及びアジア諸国に対する戦争は侵略ではないばかりか、これらアジア諸国と提携し、彼等を帮助し導くことであるとしていた。また、黄色人の英米帝国主义に対する反抗であり、白人が植民地化し侵略戦争を仕掛けたことに対する反抗でもあった。大アジア主義はこのような言葉を借りて国民の「漢奸」、「卖国」などという認識と批判を解消しようとした。と同時に、注意深く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思想の解釋をし、世の人々に自分こそが真の「三民主義」の継承者であると明示しようとした。

汪政权上层部の人間の「大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研究は多いため³⁴⁾、本稿では『国民の日军新島占領後の感想及び希望、シンガポールが落ちて大アジア建設の枢軸となったことに対する論

33)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74—78页

34)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韩〕裴京汉：“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兴：“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史桂芳：《“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文集』（以下『论文集』）について些かの研究をしようと試みることにする。この「論文」の作者は皆无名の人々であることから、「一般民众」はどのように情報操作されたのか見通す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また、他の角度からこのシステムに対して一层深い分析を加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

『论文集』は汪伪政权が组织した「中华民族反英米协会」によって1942年5月に編集出版された。ことの起こりは太平洋戦争の勃发から2か月ばかりで、イギリス人が百年余り植民統治したシンガポールがこの年の2月に日本軍に陥落されたことによる。主編者によれば、「シンガポールは近代崩坏に向かった資本主義国家が远东を侵略するために利用した唯一の根据地であり、今年2月15日に友国日本によって占领された……本会はシンガポール陥落に鑑みて、大东亚战争に対し特別な意味をもち、3月5日に新闻にて文章を募り始めた。国内外の人々がシンガポール陥落後のこの出来事に対して、感想や希望を述べ表し、大东亚建设の方面について、深い意見を提供してくれることを望む……」³⁵⁾この论文集は、「数千件余り」の募集稿から「精选」したもので、全部で19篇、20万字近くからなる。

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19篇の募集原稿は全て「皇軍」について真珠湾攻撃からシンガポール陥落の赫赫たる武功について賛美し、「この戦争で、日本の実力が如何に坚强か十分に示し、また东亚民族侮るべからずということを指摘した。逆に、英米战斗力の薄弱を暴露し、その軍一撃に堪えず、シンガポールを経た後、完全にその紙に書いた虎を倒したのである」³⁶⁾同時に、これらの文章は「自责」することも忘れていない。「今国民は日本を疑う必要はない」、「人々は汪精卫氏の「自らを責める精神」を以て自分を非难するほかない……なぜなら国民は各種の事业に対して、仮に努力したくないとか努力できないとすると、日本が努力させるしかなく、仮に努力が足りないならば、日本が国民を指導、促すほかない。仮に努力が适当でないのなら、日本が反対し、修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³⁷⁾「目下の军事业は、日本軍が自らすべきことを積極的に行い、責任を一手に引き受けている。我々国民は、その指導の下、里方の作業に従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例えば男子は外で奮闘し、女子は家庭を切り盛りする。この様に、男勤女儉に努めれば、家庭は丸くおさまる。今の中国はすなわち妻の地位に立ち、銃後を守り、日本と協力し、大东亚战争の使命を完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³⁸⁾文章を通じてこの調子であり、枚挙にいとまがない。これらの論文は全て「大东亚战争」は黄色人種が白人の数百年の植民統治に反対する、表向きは立派な「反植民主義」の号令をその「理论基础」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ある作者はこ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る。「今回の大东亚战争は、日本の英米に対する戦争というだけでなく、黄色人の白人に対する解放戦争であり、アジア諸民族の資本主義や侵略国家に対する总动员战である。我等黄色人が英米帝国に受けている抑圧を解放し、我がアジア民族が欧米民族に统治されている束縛を振り切る。アジアは黄色人のアジアであり、我等アジア人の手で、共に協力し提携されるべきである。」³⁹⁾今回の戦争は「弱小民族解放」の发端であり、民族解放の奔流を代表している。これらの文章は全て英米帝国主义や、資本主義が代表とする白人強制文明数百年来の黄色人弱勢文明に対する植民、半植民、准植民統治の罪状について列举している。アヘン戦争以来中国の政治、経済、文化など多方面に対する抑圧と榨取を強調し、「これらの情況下

35) 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页

36) 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

37) 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 页。

38) 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

39) 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

で、东亚民族は、すでに存亡の危機という瀬戸際に面している。友邦日本は、これまでの劣勢を救うため、決然と今回の戦争を蜂起し、东亚を守る重大な責任を負ってくれたのである。」⁴⁰⁾そのうえ、これは国際資本主義や英米の「金磅集団」「金权主义」に反対し、「资本主义の経済と経済组织を废止する」戦争である。ここにおいて、人種や民族的「正当性」以外にも更に経済的、阶级的「正当性」が存在する。今回の「大东亚圣战」の威力は、「西洋人が広く行うところの、自らを神に選ばれた民だとし、その他の民族は运命に定められた奴隶だとする概念が、完全に間違いであり……今後白人の优越感は没落し、「植民制度」も合理的解释を失う」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⁴¹⁾翻って、中国军民の抗日战争は英米植民主义の一部であり、「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は全て「英米の错觉に依存した抗日排日の误谬」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た「国を誤ったスローガンであり、民を害する名词」なのである。⁴²⁾

多くの文章は更に英米の「文化侵略」「文化植民」に対して酷评を加えている。「国民は英米の自由主义文化に目がくらみ、その外见を羨み、数十年の固有道德を惜しまず、弊履の如く打ち捨てて外道に走ろうとするのなら、五常五伦は规律を失い、邪気が积もり、国势は日替わりするであろう」。「我が国数千年の文化は、王道をその精神とし……清代に英米文化が侵入してきた後、国民は物质文明の新奇さに兴奋するようになり、その见かけを竞って真似、伝統的な王道文化を槽糠の如く见做した」。今回日军の新岛攻击の机を借りて、「以前の英米功利主义文化という恶习をきれいに洗濯」し、「王道文化を以てその持病を矫正すべき」である。そして日中文化に通じ、「共存共荣の新东亚を建设」すべきだ。⁴³⁾现在「西洋人は未だ西洋文化は人类最高の文化であると思っており、我々は东亚文化の不注意と不统一から、西洋文化の前に平身低头するほか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後日本が欧米に追随した思想や政策を清算し、中国は民族解放独立を勝ち取る路线へと変わったのである。东方文化はこの戦争を契机とし、世界文化で新たな异彩を放つのだ。」⁴⁴⁾それはつまり、中国・东洋文明こそが「文明」であり、所谓西洋文明は单なる物质文明であり、その实质は野蛮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このことから中国・东洋文明を以て世界を救い、人类を救い、「万世泰平」の世の中にせねばならない。「东方文化优越论」或いは「东方文化复权论」というこれらの非常に「民族主义」的な言叶は、このように中华民族の服务利益に対して重大な损害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

植民主义や英米経済榨取と文化侵略に反对することは、汪伪の「大アジア主义」の核心であったが、これは正しく「反植民主义理论」は別種の更に野蛮で凶暴な植民主义が利用するところとなると見せつけていた。この事实は、人类の行动は罪恶を含み全てが様々な见せかけは非常に「说得力のある」「理由」を見つけだす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を再び说明している。そして理论は、非常に正确な理论本质であっても、乱用されることがありうるのである。そこで、各种理论については、絶対にその「自己说明」だけで轻々しく判断してはいけないのである。その理论の言叶は实のところ重要ではなく、键となるのは理论が谁に掌握されているか、どのように运用されているかなのである。

これらの侃侃諤諤たる「反植民主义」の「宣战布告书」は更に以下の事を说明している。もし、具体的な历史内容と时代背景を无视し、或いは日本侵略が中国含む东亚各国にもたらした重大な灾难をふき取って、理论から理论、概念から买い年、文章から文章だけを用いて、「後理

40) 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页。

41) 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

42) 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43) 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

44) 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

論」から「前理論」、「新概念」から「旧概念」、「現在の文章」から「昔の文章」を検討し、二者の類似点を探し出せば、我々は今日非常に広く行われている「後植民」理論で当時の「大东亚圣战」の合理性と正当性を论证し、注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同時に、当時の中国や朝鮮と東南アジア諸国の人民が日本に対して血を浴びつつ抗战したのは、「白人強勢文明の黄色人種弱勢文明に対する植民統治の拥护」、「英米の错觉に依存した抗日排日の誤謬」の結論であったのだ。

結 論

19世紀中叶日本に起こった「大东亚主义」或いは「东亚共同体」は間違いなく近代「西力东渐」の背景下で、「現代」を追い求めつつも「伝統」を保持しようとした産物である。その本質は非常に複雑で、この百年来、「レシピエント」となった中国が様々な異なる反応を引き起こし益々複雑となっている。それは生み出されてから、色々な思想分派や政治の力に利用され、またその过程中各種の思想元素をくみ取り、自分を「形成」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

アメリカの学者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Benedict Anderson）は「民族」起源を论述した『想像の共同体』中で、「民族」の定義について「それは一種の想像の政治共同体である——そしてそれは想像によって本質上有限（limited）にされており、同時に主権を享有する共同体である」としている。⁴⁵⁾もしも「民族」がそのようであるならば、「大アジア主义」や「东亚共同体」は地理空間において歴史、文化、思想一致と相接する「想像の共同体」であるだろう。孫文、李大釗、汪偽の政权の「想像の共同体」に対する異なる態度、理解、论述、运用、及びそのもたらした異なる結果は、最も重要なのはやはりこの種の「想像」は毕竟誰に掌握され、如何に述べられ、どのように利用されるかなのだという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45) [米] 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著、吳叡人訳：《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韓國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과 ‘東아시아史’ 科目

■ 장세운 (東北亞歷史財團) ■

韓國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과 ‘東아시아史’ 科目

張 世 胤(東北亞歷史財團 研究委員)

내용요약 :

2000년대 초 한국과 중국, 한국과 일본, 중국과 일본 사이에 상호간의 역사인식 문제를 둘러싸고 한때 갈등이 발생하기도 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이러한 갈등과 대립을 해소할 수 있는 방안의 하나로 한중일 3국의 역사를 ‘東아시아史’라는 範疇로 收容하여 학생들에게 가르치는 방안이 제기되었다.

당시 韓國의 教育人的資源部(현재는 教育科學技術部, 以下 教育部로 略稱)에서 지난 2007년 2월 발표한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안」은 韓中日 3국 가운데 처음으로 ‘동아시아사’라는 새로운 과목을 선택과목으로 채택하였다. 이에 따라 韓國의 2~3개 출판사에서 현재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를 개발하고 있으며, 추후 검정심사를 거쳐 2012년에는 정식 교과서로 사용될 예정이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실제로 고등학교 2~3학년 과정에서 선택과목으로 수업이 이루어질 예정이다. 이를 위해서 ‘동아시아사’의 구체적인 教授要目を 選定하고 적절한 교과서를 개발해야 할 필요가 있다. 또한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교육에 필요한 여러 가지 자료를 개발하고, 구체적인 수업의 방식도 多樣하게 論議할 필요가 있다.

한편 2008년 2월 李明博政府가 등장하면서 과거 盧武鉉政府의 역사교육 강화 방침과 구별되는 교육과정 개편안이 최근 발표되었고, 이에 대한 논의가 한창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今年 9月 末에 발표되어 논란이 되고있는 ‘2009년 개정교육과정(試案)’은 학습자의 學習負擔 輕減이란 목표하에 科目數를 줄이는 등 盧武鉉政府의 역사교육 강화 방침을 반복하는 내용으로 알려져 있다. 이에 따라 ‘동아시아’ 과목이 예정대로 2012년부터 고교 교육과정에서 실제로 채택될지에 대해 논란이 벌어지고 있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을 올바르게 가르치기 위해서는 현실적으로 많은 어려움과 제약이 가로놓여 있는 실정이다. 예를 들면 ‘동아시아’의 개념과 지리적 범위문제, 한중일 3국 각국의 인식과 정서의 차이, 正體性的의 有無與否, 효과적인 수업교재나 연구서의 부족 등 ‘동아시아사’의 연구와 교육과정에 상당한 문제점과 현실적 어려움이 있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이러한 現實的 難關에도 불구하고 ‘동아시아사’ 연구와 교육의 必要性和 妥當성은 크다고 많은 사람들이 그 의의를 강조하고 있는 것도 사실이다.

한중일 동아시아 3國은 갈등요인도 잠재되어 있지만, 오히려 진정한 이해와 상호연대, 평화공존의 필요성이 그 어느 때보다 절실하다 할 수 있다. 올해 9월 16일 일본에서 ‘아시아중시’를 표방한 하토야마 유키오(鳩山由紀夫) 총리가 취임하고, 그와 執權 民主黨이 ‘東아시아 共同體論’을 제기하면서 한중일은 상당기간 和解 무드(mood)가 造成될 展望이다. 특히 日本 外相의 『한·중·일 공동 역사교과서』 제안은 동아시아의 역사갈등과 영토(영해) 문제 해결에 하나의 실마리를 제공하고 있다.

물론 ‘동아시아공동체’의 구상배경과 그 실체에 대해서도 다양한 논의가 있으며, 공동 역사교과서나 교재(부교재) 개발이 한중일 합의하에 추진된다면 實現까지는 오랜 忍耐와 對話의 期間이 필요할 것이다. 李明博政府의 ‘實用重視’ 정책 基調下에서 중국의 ‘東北工程’이나 일본의 ‘歷史教科書 문제’ 등에 대한 대응방안의 하나로 2007년부터 준비되고 있는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일단 예정대로 개설될 것으로 알려져있지만, 장기적으로 존속할 수 있을 지는 아직 확실히 斷言할 수 없다.

한국에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개설되고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가 발간되며, 이 책으로 한국 학생들이 한국은 물론 中國日本베트남(越南) 등 동아시아의 역사와 문화, 사람들의 교류와 상호이해에 대해 학습하는 構想은 분명 새로운 試圖임에 틀림없다. 발표자는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을 중국과 일본에서도 수용하여 자라나는 학생들에게 교육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해본다. 『한중일 공동역사교과서(혹은 교재)』가 발간되어 3국의 학생들이 이 책으로 이웃나라를 제대로 이해하고 참다운 역사의식을 형성할 수 있는 방안도 고려해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내용요약 :

현대 역사학의 보편적 추세는 ‘시대에 뒤떨어진(?)’ ‘민족주의’나 ‘국가주의’의 역기능을 강하게 비판하며 자유롭고 창의적이며 다양한 역사관을 강조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아직 ‘남북통일’이라는 民族至上의 課題가 남아있고, 주변 열강의 틈바구니 사이에서 생존하며 발전을 도모해야 할 운명을 안고 있는 한국사회의 경우 ‘트랜스내셔널 히스토리(Transnational History)’의 서술은 그 보편성과 필요성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 많은 문제점이 있다고 본다. ‘동아시아사’도 超國家(超國籍)的 歷史認識의 한 사례이지만, 역사학계는 물론 일반인들에게까지 이러한 역사인식이 확산되기까지는 상당한 시일이 소요될 것으로 예상된다. 왜냐하면 한국학계의 기초연구 부진과 다양성의 부족, 민족주의적 역사인식의 전통 등 여러가지 사정으로 收容할만한 조건이 아직 성숙치 않았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이다. 또한 한국 국민이나 일반 대중들에게는 歷史의 普遍性보다는 韓國史 固有의 獨自性이나 ‘歷史主權’이란 感性的 用語나 그 概念이 상당한 說得力과 呼訴力을 갖고 있다고 보는 이유도 있다.

韓國社會의 現實을 고려할 때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신설은 분명 一種의 冒險이라 할 수 있다. ‘동아시아사’는 중국의 ‘동북공정’이나 일본의 역사교과서 문제 등 동북아시아의 역사갈등에 나름대로 대응하기 위해 신설된 과목으로 學界나 언론, 市民運動 團體의 의견이 반영되어 있으며, 정부의 의도가 일부 반영된 것이기도 하다. 또한 이 과목에 대한 다양한 쟁점과 비판이 제기될 수 있다.

그러나 한국학계나 정부의 차원에서 ‘民族主義的 情緒’나 ‘主體的 視覺’을 強調하는 方向의 對應이 아닌 보편적 시각 및 이웃과의 교류·협력을 강화하는 方向으로의 對應이란 점에서 상당히 높게 평가할 부분이 있다. ‘동아시아’ 과목에 대한 평가는 다양한 형편이다. 그러나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지금까지 國家史나 一國史 중심으로 진행되어온 한국의 역사교육 방향을 개선할 가능성을 제기하였다는 점은 충분히 인정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과연 韓國史와 世界史의 境界를 초월하여 ‘동아시아사’라는 공동의 정체성을 형성하고, 동아시아 지역 세계에 대한 이해를 넓히며, 동아시아 지역의 평화와 공동번영을 도모한다는 본연의 개설목적 성취할 수 있을 지는 아직 알 수 없다. 또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고등학교 교육 현장에 올바르게 자리잡기 위해서는 해결해야 할 과제도 많다. 그러나 韓國의 歷史教育 現場에서 동아시아 科目이 確固하게 자리잡는다면 향후 中國과 日本의 歷史教育에도 일정한 影響을 미칠 것으로 豫想되기 때문에 이 과목의 擴散과 定着을 위한 積極的 關心과 支援이 必要하다고 하겠다.

키워드 : 성장극, 성장중심, 역동적 상호관계, 도시 경제 관계

1. 緒言 - 最近 韓國(社會)의 歷史教育 強化措置와 ‘東아시아史’ 開設

2000년대 초 한국과 중국, 한국과 일본, 중국과 일본 사이에 상호간의 역사인식 문제를 둘러싸고 한때 갈등이 발생하기도 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이러한 갈등과 대립을 해소할 수 있는 방안에 대해 다양한 논의가 진행된 바 있다. 그런데 그러한 주요한 해소방안의 하나로 한·중·일 3국의 역사를 ‘동아시아사’라는 範疇로 收容하여 학생들에게 가르치는 방안이 제기되었다. 이러한 방안은 2005년 5월에 한·중·일 3국에서 동시에 간행된 역사부교재 『未來를 여는 歷史』로 具體化되기도 하였다.⁴⁶⁾

한국의 교육인적자원부(현재는 교육과학기술부, 이하 교육부로 약칭)에서 지난 2007년 2월 발표한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안」(중전에는 ‘제8차 교육과정’으로 알려짐)에는 한·중·일 3국 가운데 처음으로 ‘동아시아사’라는 새로운 과목이 선택과목으로 채택되었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실제로 고등학교에서 선택과목으로 수업이 이루어질 예정이다. 이를 위해서 ‘동아시아사’의 구체적인 教授要目を 選定하고 적절한 교과서를 개발해야 할 필요가 있다. 또한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교육에 필요한 여러 가지 자료를 개발하고, 구체적인 수업의 방식도 多樣하게 論議할 필요가 있다. 이에 따라 斗山出版社 등 2~3개 출판사에서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를 개발하고 있으며, 추후 검정심사를 거쳐 2012년에는 정식 교과서로 사용될 예정이다.

2006년 11월 한국 교육부는 2012년부터 고등학교 역사교육에 “동아시아사”(선택)를 신설하고 중1~고1 사이에 履修하는 國民共通 基本科目(必須)이었던 ‘國史’와 世界史(사회 속의 한 영역)를 통합하여 “歷史” 과목으로 개편하기로 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지난 60년간 國史-世界史의 二分法으로 편성된 역사교육과정이 ①역사, ②세계사(科目名: 世界歷史의 理解), ③동아시아사, ④韓國史(과목명: 韓國文化史)의 네 영역(그중 ‘歷史’만 必須, 나머지는 選擇)으로 구분되어 시행되는 것이다. 종래의 韓國史와 世界史라는 二分法體制를 넘어 한국사와 세계사를 상호 관련지어 파악함으로써 韓國史의 自國中心主義를 극복하고 소위 ‘世界化 時代’의 세계사 인식을 심화하는데 기여할 것으로 기대된다.⁴⁷⁾

그러나 한국학계의 연구성과는 解放以後 60여년 동안 상당한 발전을 이룩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개별적인 各國史 연구의 集積에 불과한 경향이 있어 『역사』는 커녕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을 편성하고 서술하기에도 불충분한 상태에 있는 실정으로 평가된다. 역사학계의 연구도 역사교육도 이처럼 各國史 단위로 진행되어온 상황에서 새로운 ‘동아시아사’를 구성해야 하는 韓國學界의 상황은 역사교육이 역사연구를 먼저 앞질러 가는 형편이라고 설명되고 있다. 일반적으로 한국의 역사인식과 역사교육이란 관점에서 보면 東洋史는 自國史를 뺀 아시아(Asia)史를 가리킨다. 이에 비해 장차 신설될 ‘동아시아사’는 自國史를 포함한 地域史를 추구하는 것으로 알려져 있다. 따라서 동아시아사 교육을 검토하려면 먼저 동아시아사의 範圍問題, 그리고 과연 동아시아사가 하나의 역사서술 單位로 成立할 수 있는가 하

46) 중국에서는 《東亞三國의 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 編, 『東亞三國의 近現代史』(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로 출판되었다.

47) 柳鏞泰, 「한국의 동아시아사 認識과 教育 - 東洋史 연구 60년을 통해서 본 동아시아사」, 『韓中日 東아시아史 教育의 現況과 課題』 2008년 6월 14일 東北亞歷史財團·아시아平和와歷史研究所·成均館大 東아시아歷史研究所 개최 ‘동아시아사’ 교육 국제심포지엄 발표논문집, 11쪽.

는 문제가 검토되어야한다는 문제가 제기되기도 한다.⁴⁸⁾

한편 2008년 2월 李明博政府가 등장하면서 과거 盧武鉉政府의 역사교육 강화 방침과 구별되는 교육과정 개편안이 최근 발표되었고, 이에 대한 논의가 한창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최근 논란이 되고있는 ‘2009년 개정교육과정 시안’은 학습자의 學習負擔 輕減이란 목표하에 科目數를 줄이는 등 盧武鉉政府의 역사교육 강화 방침을 반복하는 내용으로 알려져 있다.

필자는 이러한 배경에서 한국사회의 중국·일본 등 주변국과의 역사갈등 등에 대한 對應이라고 생각되는 ‘역사교육 강화’ 및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개설 관련 내용을 먼저 概略적으로 검토코자 한다. 이를 위해 최근 한국의 역사교육 과정과 교과서 검인정제도를 간단히 概觀하고, 아울러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에 따라 새로 開發된 ‘동아시아사’ 模型單元의 내용과 그 限界 등에 대해서도 검토하고자 한다.

2. 韓國 教育當局의 歷史教育 強化政策

中國·日本의 教育課程 改編과 教科書 改正에 副應하여 한국의 역사관련 교육과정도 새롭게 개편될 예정이다. 즉 추후 시행될 예정인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안」에서는 전반적으로 학생의 수업부담을 덜어주고, 과목을 통합하는 전반적 추세를 반영할 것으로 전망된다. 한국사와 세계사과목을 통합하여 ‘역사’ 과목으로 통합하는 경향도 중국과 매우 유사하다. 다만 중국의 ‘동북공정’ 추진과 ‘다민족(多民族) 통일국가론’, 일본 후소샤(扶桑社) 등 일부 우익세력의 역사교과서 출판동향과 관련하여 한국 교육부는 2006년 말에 역사교육을 강화하겠다는 방침을 밝혔다.

즉 교육부는 2006년 12월 말 言論 및 學界, 일부 市民運動 團體 등의 의견을 수렴하여 역사과목 교육 강화방안을 발표하였는데, 학계와 교육계의 비상한 관심을 불러일으켰다. 이에 따르면 현재 한국의 중·고교에서 명목상 ‘사회’ 과목에 포함돼 있는 국사와 세계사를 ‘역사’ 과목으로 통합하고 별도과목으로 독립시킨다고 했다. 또 고교 2·3학년 선택과목으로 ‘동아시아사’를 신설하였다.⁴⁹⁾ 그러나 올해 9월 29일 ‘2009년 개정교육과정’ 시안이 발표됨으로써 이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개설될 지는 아직 미지수이다.

2006년 말 당시 교육부 차관은 “동아시아사 新設은 최근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사이에 조성되고 있는 歷史葛藤을 극복하고 共同의 歷史認識을 만들어 가자는 趣旨”라며 “주5일 수업으로 학교 수업이 줄어드는 상황에서 역사 수업시간을 늘린 것은 劃期的 措置”라고 설명했다.⁵⁰⁾ 이러한 일련의 조치가 예정대로 시행될 경우 한국 중고교 현장에서 역사교육의 質·量 모두 획기적으로 제고될 것으로 전망된다.

「2007년 개정(8차) 교육과정안」은 2007년 2월 고시되었다. 중학교 1학년은 2010년, 중학교 2학년과 고교 1학년은 2011년, 중학교 3학년과 고교 2·3학년은 2012년부터 각각 적

48) 柳鏞泰, 위의 글, 11~31쪽.

49) 『京郷新聞』 2006년 12월 27일자, 1쪽.

50) 위와 같음.

용된다. 초등학생은 현재 6학년 1학기 사회교과 안에서 ‘국사’ 관련 내용을 배우지만, 2009년부터는 5학년 1·2학기에 배우게 된다.⁵¹⁾ 이에 따르면 오는 2010년 중1 학생은 사회(地理·一般社會) 과목과는 별도로 역사(국사 + 세계사) 과목을 주당 1~2시간 배우게 된다.⁵²⁾ 한국 교육당국의 이러한 역사교육 강화조치는 중국과 일본 등의 한국사 관련 동향에 대한 일련의 대응조치로 해석할 수 있다.

3. 한국의 第7次 教育課程과 ‘2007年 改正 教育課程’의 歴史科 教育課程

근래 한국 교육부는 지속적으로 國定圖書를 줄여나가는 대신 檢認定 教科書를 擴大하겠다는 方針을 維持해왔다. 이에 따라 검(인)정 교과서는 확대되었다.

2002년부터 시행된 현재의 제7차 교육과정에서 검정대상으로 공고한 중·고교 교과과목의 교과서 종류는 무려 187종이나 된다. 그러나 고등학교 과정의 역사과목 교과서는 2종에 불과하다. 현행 ‘교과용도서 규정’은 국정도서를 1종, 검정도서를 2종으로 규정하고 있다.⁵³⁾

현재 시행되고 있는 7차 교육과정에서는 고등학교 1학년 때 ‘國史’ 과목을 필수로 학습하고, 2~3학년때는 ‘심화선택’ 과목으로 한국근현대사 또는 세계사를 학습하게 되어있다. 중학교에서 ‘국사’는 사회과로 통합되어 있으나, 실제로는 국사과목으로 독립되어 必須科目으로 운영되고 있다.⁵⁴⁾ 고등학교의 경우 한국은 前近代史인 ‘국사’가 필수로, ‘近現代史’가 선택으로 되어있다. 필자는 근현대사를 필수로 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본다. 제7차 교육과정에서는 고교 1학년때 ‘국사’ 과목을 1·2학기에 매주 2시간씩, 연간 4단위 68시간(사회 10단위 170시간에 포함) 학습한다. 또 2학년 또는 3학년 때는 심화선택 과목인 ‘한국 근·현대사’ 과목을 1·2학기에 연간 6내지 8단위(매주 3~4시간)를 학습하고 있다.⁵⁵⁾

7차 교육과정 가운데 역사과 선택중심 과정의 큰 문제점은 ‘한국 근·현대사’ 과목을 선택과목으로 설정함으로써 국민 공통기본 교육과정의 ‘국사’ 과목이 주로 近代 以前까지만 다루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이에 따라 고등학교 2~3학년에 편제되어 있던 한국 근·현대사 내용이 고교 1학년 ‘역사’ 과목에 포함되도록 개정이 추진되었다. 이수 단위수도 제7차 교육과정에서는 6~8단위로 과목별로 차이가 있었으나, 선택 중심 교육과정 개정시에는 6단위로 통일하되 2단위를 가감할 수 있는 餘地를 두었다.⁵⁶⁾

이에 따라 2011년부터 시행되는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에서는 고교 1학년 때 필수

51) 위와 같음.

52) 『朝鮮日報』 2006년 12월 27일자, 2쪽.

53) 「교과용 도서에 관한 규정」(大統領令 제20740호) 附則 제2조, ‘教科用圖書 名稱變更에 따른 經過措置’(대한민국 법제처 홈페이지(www.moleg.go.kr ; 검색일 2009년 9월 27일).

54) 교육부에 따르면 1학년부터 10학년까지의 10년 동안에는 國民 共通基本 教育課程을 編成運營하게 되어있다. 이에 따라 중학교 사회과의 국사 영역은 별도의 교과용 도서가 편찬되고 교원도 배치하도록 규정되었다(교육부, 『초·중등학교 교육과정 - 교육과정의 편성과 운영』(교육부 고시 제1997-15호), 2000, 22-29쪽).

55) 교육부, 『초·중등학교 교육과정 - 교육과정의 편성과 운영』, 17쪽.

56) 韓國教育課程評價院(Korea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 Evaluation), 『역사과 선택과목 교육과정 改正試案 研究開發』(2006년도 교육과정 개정연구 委託課題 答信報告)의 「研究要約」, 2006, 12

과목으로 ‘역사’를, 2~3학년때 역시 심화선택과목으로 한국문화사, 세계역사의 이해,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가운데 한 과목을 선택하여 학습하도록 바뀌었다. 수업시수는 7차 교육과정과 유사할 것으로 추정된다. 이를 <표 1>과 <표 2>로 정리하면 다음과 같다.

<표 1> 제7차 교육과정 고교 역사과목 과정 구분

共通必須科	국사(한국사)	
	每週 2시간(4단위 총 68시간)	
深化選擇科	선택 I : 韓國 近・現代史	선택 II : 世界史
	매주 3~4시간 (6~8단위 최대 총136시간)	매주 3~4시간 (6~8단위 최대 총136시간)

출처: 교육부, 『초중등학교 교육과정 — 교육과정의 편성과 운영』
(교육부 고시 제1997-15호), 2000, 17쪽). ※ 수업 1교시는 50분임

<표 2>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 高敎 歷史科目 課程區分

共通必須科	역사		
	每週 3時間(6단위+2단위, 총 102시간 기본)		
深化選擇科	선택 I : 韓國文化史	선택 II : 世界歷史의 理 解	선택 III : 東아시아史
	매주 3~4시간(6단위+2단위, 총 102시간 기본)		

출처: 교육인적자원부, 「고등학교 교육과정(1)」, 서울: 대한교과서주식회사, 2007.7, 160~214쪽 및 한국 교육과정평가원, 『역사와 선택과목 교육과정 개정시안 연구개발』(2006년도 교육과정 개정연구 위탁과제 답신보고)의 「연구요약」, 2006.12를 참고로 작성.

비고: 역사 - 2011년, 한국문화사·세계역사의 이해·동아시아사 - 2012년부터 적용됨.

周知하는 바와 같이 歷史敎科書는 학생들의 정치·역사적 의식이나 역사관, 세계관을 형성케 하는데 매우 중요한 역할을 수행한다. 따라서 그 내용은 한 사회 또는 국가의 역사의 식과 이데올로기를 반영하게 마련이다. 그런 점에서 역사교과서는 잘 편찬되고 학생들에게 흥미를 유발할 수 있어야 한다. 그러나 한국의 역사교과서 역시 매우 많은 문제점을 안고 있는 것이 사실이다.⁵⁷⁾

「2007년 개정교육과정」의 고등학교 1학년(제10학년) 과정에서는 ‘역사’ 과목이 신설되어 한국사와 세계사 영역을 통합하여 배우게 되어있지만, 실상 내용은 한국근현대사 중심의 교육과정이라 할 수 있다.⁵⁸⁾

57) 역사교과서의 의미와 서술 및 분석의 기준 등에 대해서는 李炳連, 「歷史 敎科書의 意味와 敍述基準 그리고 分析의 基準에 關하여」, 『史叢』 52(2000), 161~191쪽 참조.

58) 교육인적자원부, 「高等學校 敎育課程」, 서울: 대한교과서주식회사, 2007.7, 161~166쪽. 주요 목차만 소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우리역사의 형성과 발전, 조선사회의 변화와 서구 열강의 침략적 접근, 동아시아의 변화와 조선의 근대 개혁운동, 근대국가 수립운동과 일본제국주의의 침략, 일제의 식민지 지배와 민족운동의 전개, 전체주의의 대두와 민족운동의 발전, 냉전체제와 대한민국 정부의 수립, 대한민국의 발전과 국제정세의 변화, 세계화와 우리의 미래.

주목되는 사실은 이 ‘역사’ 과목의 제9장 ‘세계화와 우리의 미래’ 부분 내용 가운데 ④절에서 “동북아시아의 영토문제, 역사갈등, 과거사 문제 등을 탐구하여 관련 나라와의 바람직한 관계를 모색하는 자세를 가진다.”⁵⁹⁾라고 명시한 것이다. 이 서술내용은 원칙적으로는 긍정적이며 바람직한 목표를 지향하고 있다. 현실적으로 갈등문제를 해결키 위한 충분한 교육효과를 거두기 위해서는 敎師들의 철저한 事前學習과 關聯 參考資料의 充分한 涉獵, 다양한 敎師用 指針書와 學生들을 위한 補助敎材가 活用되어야 할 것이다.

「2007년 개정교육과정」의 역사과 선택 중심 교육과정에서 ‘한국 문화사’는 한국문화의 전개를 주제별 통사로 구성하되, 주변 국가들과의 관계 속에서 한국문화가 형성 발전되어 온 과정을 이해함으로써 한국인으로서의 正體性을 涵養하기 위한 선택과목으로 규정하였다. ‘세계역사의 이해’는 세계사의 전개과정을 이해함으로써 세계를 이해하고 현대 사회에서 일어나는 여러 문제들을 역사적 시각에서 해결하는 능력을 기르는 과목으로 규정하였다. 아울러 세계사의 繼起的 이해를 강조하였고, 세계사의 전개를 주제 중심의 비교사로 구성한다는 구성 방식을 제시하였다.⁶⁰⁾

현재 교과서의 위상은 급속히 변하고 있는데, 과거처럼 지식의 기준이고 지식의 기본이라는 인식보다는 이제 “학습의 가이드북(Guide Book)”이라는 역할로 바뀌어야 한다고 본다.⁶¹⁾ 근래에 역사과 교과서에 대한 비판으로부터 촉발된 국민적 관심은 사회적 변화의 반영이며, 이러한 관심은 새롭고 긍정적 효과를 낼 수 있는 교과서 제작으로 연계되어야 할 것이다.

4. 韓國의 敎科書 檢認定 制度

한국의 교과서 검인정 제도는 현행 「교과용 도서에 관한 규정」(대통령령 제20740호)에 따라⁶²⁾ 시행되고 있다.

다만 교육부(장관) 인정도서의 경우에도 신청한 도서의 내용이 “민주적 기본질서에 위배되거나 특정의 정당·종교를 지지하는 등 교과용도서로서 사용이 부적당하다고 우려되는 경우”에는 敎科用圖書審議會의 審議를 거쳐야 한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⁶³⁾ 다만 認定圖書는 추후 국정도서 또는 검정도서가 있게 되거나 교육과정의 변경 등으로 당해 인정도서를 사용하기 곤란하게 된 경우에는 인정도서의 인정을 취소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이 경우에 따른 취소는 통보 후 1년이 경과한 날부터 그 효력을 가진다고 하였다.⁶⁴⁾

59) 교육인적자원부, 「고등학교 교육과정」, 166쪽.

60) 한국교육과정평가원, 『역사과 선택과목 교육과정 개정시안 연구개발』(2006년도 교육과정 개정연구 위탁과제 답신보고)의 「연구요약」, 2006, 12, ,

61) 위와 같음.

62) 전문은 대한민국 법제처 홈페이지(www.moleg.go.kr ; 검색일 2009년 9월 27일) 참조. 이 규정은 2002년 6월 25일 공포되었고, 2004년 6월 19일, 2008년 2월 29일 일부가 개정되었다. 2008년 2월 25일 새정부 출범과 함께 ‘교육인적자원부’에서 ‘교육과학기술부’(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goly)’로 개칭되었다.

63) 제16조 1항.

64) 제17조 3,4항

주목되는 사실은 “교육부장관이 국정도서를 개편할 필요가 있다고 인정될 때에는 이를 개편할 수 있다.”라고 명시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⁶⁵⁾ 또한 2008년 2월 29일 개정된 교과용 도서의 ‘수정’ 조항에 따르면 “교육부장관은 교과용도서의 내용을 수정할 필요가 있다고 인정될 때에는 국정도서의 경우에는 이를 수정하고, 檢定圖書의 경우에는 著作者 또는 發行者에게 修正을 命할 수 있다.”고 明示하고 있다.⁶⁶⁾

이러한 정부의 교과서 집필자나 출판사에 대한 수정지시는 검정도서 뿐만 아니라, ‘인정도서’의 경우에도 거의 동일하게 행사할 수 있도록 규정하고 있다. 즉 이 법률 제26조 2항의 규정에 따르면 “認定圖書의 認定을 한 教育部長官은 인정도서의 내용을 검토하여 修正이 필요하다고 인정하는 때에는 當該 認定圖書의 著作者에게 修正을 要請할 수 있다.”라고 명시하고 있는 것이다.

현재 한국 중·고등학교에서 사용하고 있는 검정교과서의 檢定은 교육부 산하의 국책연구기관인 ‘한국교육과정평가원’에서 담당하고 있고, 각 과목별로 전문가들로 구성된 ‘檢定委員會’를 조직하여 구체적 검정작업을 진행하고 있다.⁶⁷⁾ 다만 檢定 教科書가 발표된 뒤에도 검정위원회에 참여한 인사들의 명단은 공개하지 않고 있다.⁶⁸⁾

검정통과 교과서의 採擇은 <그림 1>과 같은 3단계 절차를 거치게 되어있지만, (역사)과목 담당 교사들의 모임인 ‘教科協議會’의 영향력도 무시하지 못할 수준이다. 왜냐하면 학교 운영위원회나 교장은 과목 담당 교사들보다 전문성이 떨어지기 때문이다. 그러나 최근 이른바 特定 教科書의 ‘좌편향’ 시비가 일어나면서 교육부의 압력을 의식한 해당 학교 관할 구역의 교육감이나 교육청, 학교장 등의 개입이 이루어지는 경우도 있다. 물론 해당 과목 교사들은 학교 현장의 자율성을 침해하는 것이라는 입장에서 반발하는 경우가 많다.⁶⁹⁾

<그림 1> 한국의 검정 교과서 채택 절차

1단계 : 推薦
同一教科 모든 教師가 참여하는 教科協議會에서 3種을 선정해 順位없이 추천
▼
2단계 : 審議
學校 運營委員會는 推薦된 檢定圖書를 심의하고 순위를 정해 校長에 通報
▼
3단계 : 確定
學校長은 선정할 檢定圖書를 最終 확정

출처 : 『한겨레신문』 2008년 9월 10일자, 10쪽.

65) 제27조 ‘개편’의 정의 조항

66) 위 「교과용 도서에 관한 규정」 제26조 1항.

67) 검정에 대한 상세한 내용은 韓國教育課程評價院 홈페이지(www.kice.re.kr) 참조.

68) 歷史學會 編, 『韓國近現代史 教科書의 ‘獨立運動史’ 敍述과 爭點』, 서울: 景仁文化社, 2006, 327~328쪽.

69) 『한겨레신문』 2008년 9월 10일자, 10쪽 참조.

5. 高等學校 2種圖書 歷史科目 檢定基準

2001년 6월 한국의 교육부에서 공포한 ‘고등학교 2종도서 검정기준’은 공통 기준과 각 과목의 도서별 기준으로 구분되고 있다. 2종도서는 검정도서를 말한다. 기본적으로 이 검정기준은 2002년부터 시행된 제7차 교육과정에서 검정통과하여 사용된 교과서의 검정기준으로 현재까지 적용되고 있다. 따라서 향후 시행될 것으로 알려진 「2007년 개정교육과정」의 검정도서 기준으로도 큰 변화없이 적용될 것으로 판단된다. 공통 기준은 모든 2종도서(검정도서)에 적용할 수 있는 보편적 기준으로서 대한민국의 법질서와 교육과정 총론 및 교과용도서 집필상의 유의점과 관련된 기준을 제시하고 있다.

각 도서별 기준에서 교과서의 심사 영역은 教育課程의 遵守, 內容 選定 및 組織, 교수·학습 방법 및 평가, 表現·表記, 編輯 및 外形 體制, 獨創性의 6개 영역으로 구분하였다. 教師用 指導書의 경우에는 교육과정 및 교과서 안내, 구성 체제 및 내용, 교수·학습 방법 및 평가, 資料의 活用과 案內, 표현·표기, 編輯體制, 독창성의 7개 영역으로 구분하였다.⁷⁰⁾

『韓國近現代史』圖書의 경우 위 검정기준의 ‘內容選定 및 組織’ 審査領域中 ⑧번 “國史 教育 內容展開의 準據案에 依據하여 執筆하였는가?”라는 審査觀點이 들어있다. 또 ‘공통검정기준’에는 ‘헌법정신과의 일치’ 심사영역 가운데 “대한민국의 국가체제를 부정하거나 비방하는 내용이 있는가?”하는 심사관점, 또 ‘내용의 보편타당성’ 심사영역에는 “학문상의 오류나 정설화되지 아니한 저작자의 개인적 편견이 포함되어 있는가?”라는 심사관점이 있다. 때문에 교과서 집필자들은 이러한 검정기준을 통과하기 위하여 예민하게 신경을 쓰지 않을 수 없다. 기본적으로 檢認定 通過 教科書는 이처럼 教育部의 要求를 充實히 反映한 것이다.

6. 韓國의 ‘東아시아史’ 科目 開設(豫定)과 그 特徵

1) 開設 背景

‘동아시아사’는 2006년 12월 교육부가 발표한 역사교육 강화 방안의 일환으로 신설한 고등학교 선택 과목이다. 교육부의 공식적 설명에 따르면 이 과목 개설목적은 동아시아 국가들 사이에 조성되고 있는 ‘역사갈등’을 해소하고, 미래지향적인 역사교육을 통해 동아시아 평화와 번영의 기반을 마련키 위한 역사인식을 함양하기 위해서이다. 그러나 이러한 사유 외에도 1990년대 초반 이후부터 활발히 제기되었던 학계의 동아시아사 譚論과 한·중·일 3국의 공동 역사교과서 발간 등의 활동도 ‘동아시아사’의 개설에 영향을 끼쳤다고 볼 수 있다.⁷¹⁾

70) 교육인적자원부, 「2002년도 검정대상 도서 : 제7차 교육과정에 따른 고등학교 2종도서 검정기준」, 2001.6, 1쪽.

71)金正仁, 「東아시아史의 挑戰과 摸索」, 『第50回 全國歷史學大會 歷史教育部 發表集-改正 教育課程과 世界史 教育』, 역사교육연구회(2007년 6월).

「개정 교육과정」 試案 研究陣은 ‘동아시아사’의 개설에 대해 “一國史, 民族史의 관점을 넘어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역사 전개 과정을 객관적이고 거시적인 관점에서 가르치겠다는 전향적인 의지의 표현이며 미래의 동아시아 평화와 번영의 기반을 마련하는 일”⁷²⁾이라고 그 필요성을 강조하고 있다.

2) 과목의 性格과 目標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에서는 동아시아에 대해 “과거부터 지역 내 共同體 相互間의 緊密한 交流를 통해 文字, 思想, 制度 등에서 나름의 正體性을 形成해왔으며, 오늘날 국제 사회에서 차지하는 비중이 증대되고 있는 力動的인 歷史 및 地域 單位”라고 설명하고 있다.⁷³⁾ 동아시아의 지역적인 범위에 대해서는 구체적으로 언급하지 않고 있는데, 교육과정 개발자들은 한국, 중국, 일본 외에도 베트남, 몽골, 티베트 등을 포함한 지역으로 규정하고 있다.⁷⁴⁾

‘동아시아사’의 성격에 대해서는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 전개된 인간 활동과 그것이 남긴 문화유산을 역사적으로 파악하여 이 지역에 대한 理解를 增進하고, 나아가 지역의 共同發展과 平和를 追求하는 眼目과 자세를 기르기 위해 개설된 選擇科目”이라고 定義하고 있다.⁷⁵⁾ 韓·中·日의 歷史認識 葛藤을 평화적으로 해결할 목적으로 상호이해를 촉진하는 내용을 강조하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3)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特徵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특징은 논자에 따라 다양하지만 다음과 같이 정리할 수 있다.⁷⁶⁾

첫번째 특징은 主題中心의 構成이다. 동아시아사를 시간의 흐름에 따라 6개의 單元으로 구성하고 각 단원마다 3~5개의 주제(內容 要素)를 제시하는 주제중심의 구성 방식을 택하고 있다.

둘째, 전체를 여섯 시기로 時代區分하고 있다. 동아시아사 전체의 관점에서 커다란 사회 변화를 기준으로 하여 6기로 구분하고 각 시기를 하나의 단원으로 하고 있다. 각 단원은 차례대로 先史時代~紀元 前後, 紀元 前後~10世紀, 10세기~16세기, 16세기~19세기, 19세기 中盤~1945年, 1945년 이후~현재까지의 시기를 취급하고 있다.

셋째, 單元의 명칭은 동아시아사의 展開過程과 各 時期의 特徵을 把握할 수 있게 제시하고 있다. 단원명은 각 시대마다 동아시아 사회의 共通된 特徵을 나타내는 概念을 사용하고 있다. 그에 따라 동아시아사의 전개과정이 제시되고 있다.

72) 安秉佑, 『東아시아史 教育課程 試案 開發』, 『2006年度 東北亞歷史財團 學術研究課題 研究結果報告書』, 2007.

73) 『교육인적자원부 告示 제 2007-79호(別冊 4)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1)』, 166쪽.

74) 金正仁, 앞의 논문 참조.

75) 『교육인적자원부 告示 제 2007-79호(別冊 4)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1)』, 166쪽.

76) 教育人的資源部·서울特別市 教育廳, 『歷史教科書 模型單元 開發 高等學校 동아시아사』 2008, 56~58 쪽 및 權五鉉, 「동아시아사, 새로운 도전은 성공할 것인가?」, 『韓國 歷史教育 概要』, 韓國敎員團體 總聯合會 주최 제3회 韓·中·日 平和敎材實踐交流會 ‘歷史教育 現況’ 發表文[2008.9.29]

넷째, 科目의 目標를 고려해서 單元의 內容要素가 選定되어 있다. 각 시기에서 가장 중요한 요소라고 판단되는 주제, 지역적 양상을 비교하기에 적합한 내용,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갈등과 교류를 사실 그대로 인식할 수 있는 사건이나 인물, 긴밀한 교류를 통해 공통의 문화유산이 축적되었음을 이해할 수 있는 事案 등을 중심으로 선정하고 있다.

4)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 試案開發

① 경과

-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 중 『역사』 과목 독립 및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개설('06.12)
- 계획수립 : '교육과정 試案'의 방향과 범위 설정('06.12)
- 연구개발 : 교육과정 試案 개발 및 학계 전문가의 검토('06.12~'07.2)
- 토론회 : 학계, 교육계 전문가의 의견 수렴('07.2)
- 개발 완료 : 동아시아사 시안 개발('07.2.10)
- 심의회 검토 : 歷史科 教育課程 審議會에서 검토하여 최종 확정⁷⁷⁾

위에서 볼 수 있는 것처럼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 시안 개발이 매우 급박하게 추진된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② 동아시아사 教育課程 開設의 意義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예정대로 추진된다면 2012년부터 한국의 고등학교 역사교육 현장(고교 2학년 과정)에 적용될 예정이다. 최근 한·중·일 3국 사이에 간헐적으로 전개된 바 있는 역사(인식) 갈등 문제를 시야를 넓혀 普遍的 觀點에서 슬기롭게 극복하며, 새로운 역사교육 과정을 통해 동아시아의 평화로운 미래를 열어나가는 데 기여한다는 목표를 갖고 개설될 예정이다. 한·중·일 3국 사이의 교류는 현재에도 매우 활발하며, 상호 경제의존도도 매우 높다. 또한 동남아시아 지역 여러 국가와의 관계도 더욱 밀접해지고 있다. 이러한 교류 및 상호의존 관계는 더욱 심화될 것으로 예상되며, 주변국과의 교류 및 국제관계의 심화는 장기적으로 동아시아를 하나의 지역공동체로 발전시키는데 貢獻할 것으로 예상된다. 향후 동아시아는 하나의 지역 단위로 통합될 가능성도 있다.⁷⁸⁾

동아시아에서 한·중·일 3국은 역사적으로도 밀접한 관계를 맺어왔으며, 공통의 문화유산을 갖고 있다. 향후 '동아시아 지역공동체'의 형성을 전망하는 가운데, 동아시아를 하나의 역사 단위로 설정하는 작업은 일면 모험적이면서도 의미있는 일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물론 이러한 작업을 위해서는 다양한 연구방법론의 개발이나 精緻한 연구성과의 축적이 필요하지만, 이미 '동아시아론'과 같은 여러가지 譚論이 제기되기도 했고, 현재에도 동아시아 3국은 自國史를 연구·교육하면서 다른 나라와의 관계를 비중 있게 다루고 있는 실정이다.⁷⁹⁾

그러나 현재 (동)아시아 어느 나라에서도 '동아시아사'를 정규 교육과정의 독립된 한 과목으로 가르치지 않고 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한국에서 역사인식 문제를 둘러싼 이

77) 동북아역사재단 보도 참고자료(2008.5.19) 『동아시아사관련 주요내용』 1쪽.

78) 위와 같음.

79) 위와 같음.

웃나라와의 역사갈등이나 견해차를 해소하기 위한 한 방편으로, 그리고 중국과 일본 양국에 대한 올바른 역사인식과 동아시아지역 인식, 아시아에 대한 ‘아이덴티티(正體性)’ 형성을 위해 상대적으로 중국과 일본에 비해 약소국인 한국이 ‘동아시아사’를 고등학교에 개설하는 것은 특별한 의미가 있다 하겠다. 더구나 一國史나 民族史의 觀點을 넘어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역사문화의 발전과정을 객관적이고 거시적인 관점에서 가르치겠다는 의욕적인 목적은⁸⁰⁾ “트랜스 내셔널 히스토리(Transnational History)”를 향한 전향적인 의지의 표현이라고 평가할 수 있다. 현재 한국 역사학계는 ‘동아시아사’에 憂慮를 表明하기도 하지만, 이 과목에 거는 期待 또한 상당한 실정이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교육이 성공적으로 수행된다면 동아시아의 역사 및 영토·영해 갈등을 해소하는 데 일정하게 기여할 것으로 본다. 나아가 동아시아 지역 협력체 또는 동북아 공동체를 형성하며, 이를 토대로 이웃나라에 대한 올바른 인식을 제고하고 동북아의 평화와 공동번영을 도모하는 데도 기여할 것이다. 물론 ‘동아시아’의 개념과 지리적 범위, 한·중·일 3국 각국의 인식과 정서의 차이, 또한 효과적인 수업교재나 연구서의 모색 등 ‘동아시아사’ 연구와 교육에 관한 여러 가지 문제와 쟁점도 산적해있으나, 추후 충분한 논의를 거쳐 일정한 합의를 도출해야 할 것이다.⁸¹⁾

5) ‘동아시아’ 과목의 目標와 內容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동아시아 지역의 역사 전개 과정을 주체적이고 개방적인 관점에서 종합적이며 체계적으로 이해하여 이 지역의 특성과 과제를 올바로 인식하는 데 목표를 두고 있다고 한다. 다양한 관점에서 자료를 활용하여 역사적 사고력과 역사의식을 기르고, 나아가 동아시아 지역의 발전과 평화에 이바지하는 자세를 가지도록 하기 위해 다음과 같은 다섯가지 목표를 설정하고 있다.

- ① 객관적이고 균형 잡힌 시각으로 동아시아 지역사를 파악하여 역사를 주체적으로 이해하는 안목을 기른다.
- ② 각 시기 사회와 문화의 특징을 드러낼 수 있는 공통적이거나 연관성 있는 요소를 주제별 접근 방식을 통해 이해한다.
- ③ 동아시아 역사와 문화의 다양성을 탐구하여 그 특징을 파악하고, 他者를 理解하고 尊重하는 態度를 涵養한다.(밑줄은 필자)
- ④ 各 時期에 展開된 交流와 葛藤 要素를 探究하여 問題 解決의 方向을 摸索하는 姿勢를 가진다.(밑줄은 필자)
- ⑤ 주제와 관련된 자료를 비교, 분석, 비판, 종합하는 활동을 통해 歷史的 思考力을 伸長시킨다.⁸²⁾

80) 위와 같음.

81) 이러한 동아시아 과목 개설의 여러가지 문제점 등에 대해서는 柳鏞泰, 「한국의 동아시아사 認識과 教育 - 東洋史 연구 60년을 통해서 본 동아시아사」 및 金澤民,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과 교과서 개발방안」 참조. 이상 두 논문은 『韓中日 東아시아史 教育의 現況과 課題』 2008년 6월 14일 東北亞歷史財團·아시아平和와歷史研究所·成均館大 東아시아歷史研究所 개최 ‘동아시아사’ 교육 국제심포지엄 발표논문집 수록 논문, 11~31 및 59~71쪽 참조.

82) 교육인적자원부,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 209~210쪽.

위의 5종 목표 가운데 3항과 4항의 밑줄친 부분이 매우 주목된다. 이 부분은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개설의 배경과 현실적 필요성을 드러낸 것으로 본다. 한국 교육부의 ‘교수·학습 방법’ 목표설정에 따르면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학습 내용에 따라 사실·개념·주제·인물·비교 학습 등을 다양하게 활용하고, 학생들의 능동적인 학습 활동을 위해 토론, 발표, 논술, 조사, 사례 연구 등 다양한 교수·학습 기법을 활용한다는 것이다.⁸³⁾

동아시아사 과목에서 서술할 주요 내용을 다음의 <표 3>으로 정리해보면 다음과 같다.

<표 3> 동아시아사 주요 내용 체계

領 域	內 容 要素(成就基準)
동아시아 역사의 시작	○ 동아시아의 自然環境 ○ 先史文化 ○ 農耕과 牧畜 ○ 國家의 성립과 발전
인구 이동과 문화의 교류	○ 지역 간 인구 이동과 전쟁 ○ 고대 불교, 律令과 儒敎에 기반을 둔 통치 체제 ○ 동아시아 국제 관계
生産力の 發展과 支配層의 交替	○ 北方民族 ○ 농업 生産力の 발전과 小農 經營 ○ 文臣과 武人 ○ 性理學
국제 질서의 변화와 독자적 전통의 형성	○ 17세기 전후 동아시아의 전쟁 ○ 銀 流通과 交易網 ○ 인구 증가와 사회, 경제 ○ 庶民文化, 각국의 독자적 전통
국민 국가의 모색	○ 개항과 근대 국민 국가 수립 ○ 제국주의 침략 ○ 민족주의와 민족 운동 ○ 평화를 지향한 노력 ○ 西歐 文物의 收容과 變化
오늘날의 동아시아	○ (제2차대전) 戰後 처리 문제 ○ 동아시아에서의 분단과 전쟁 ○ 각국의 經濟成長과 정치 발전 ○ 葛藤과 和解

출처 : 教育人的資源部, 「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1)」, 大韓敎科書株式會社, 2007.7, 210~211쪽.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교육과정은 한국 고등학교의 현실적 수업단위를 고려하여 6개의 대주제를 두고 동아시아지역 전체를 비교·조망할 수 있는 주제별 서술방식을 취하고 있다. 이 때문에 試案의 검토과정에서 많은 교사들로부터 시대구분이 없거나 모호하다는 지적을 받았다.⁸⁴⁾ 그러나 ‘동아시아사’의 주제별 서술방식은 기존의 한국사나 세계사 과목에서 채

83) 위의 「고등학교 교육과정」, 213~214쪽.

84) 申聖坤, 「韓國 東아시아史 敎科書의 構成과 그 특징」, 『동아시아 歷史敎科書의 周邊國 認識』, 서울 : 동북아역사재단, 2008, 194쪽.

택하였던 시기구분과 通史式 접근과 차별성을 유지하려는 목적에서 비롯되었다. 또한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에 개설된 ‘역사(필수)’나 ‘동아시아사’와 같이 선택과목인 ‘한국문화사’, ‘세계역사의 이해’ 과목과 내용이 중복되는 것을 피하여 이 과목의 성격을 분명히 하고 학생들의 흥미를 유발하기 위해 주제별 서술방식을 채택하였다고 한다.⁸⁵⁾

한국의 제7차 교육과정에서 ‘세계사’ 과목을 개설한 고등학교는 15%에 불과하다. 그나마 선택하는 학생수는 계속 감소하고 있다.⁸⁶⁾ 교육계에서 ‘세계사 교육의 위기’라는 문제가 제기된 지 오래이다. 또한 한국학계의 동아시아사에 대한 연구성과가 충분치 않은 상황에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개설은 일종의 모험이라는 비판적 시각도 있다.

그러나 올해 9월 일본에서 ‘선거혁명’을 통한 정권교체가 실현되면서 한·중·일 “공동 교과서”가 거론된 바 있다. 따라서 이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卓上空論이 아니라 실제로 구체화할 가능성이 있다. 다만 우려되는 것은 현정부의 교육과정 개편안 논의가 진행되면서 이 과목의 실제 개설여부에 대해서 논란이 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6) ‘동아시아사’ 科目에 대한 諸見解

‘동아시아사’는 학계에서 논의가 미흡하였고, 특히 동아시아사에 대한 한국학계의 연구성과가 불충분한 가운데 迅速히 설치된 新設科目인 만큼 그에 대한 기대와 우려 등 다양한 평가가 존재한다. 그에 대한 비판적 견해를 간단히 정리해보면 다음과 같다.⁸⁷⁾

첫째, 무엇보다 ‘동아시아사’가 教育當局의 政策的 意圖로 너무 짧은 기간에 신설이 결정되고 試案도 ‘急造’된 것에 대한 우려와 비판이 존재한다. ‘拙速’으로 새로운 과목을 신설하기보다는 어떤 역사 과목이 어떤 學校級, 어떤 學年에서 開設되고 그 과목들을 통해서 무엇을 가르칠 것인지에 대한 좀 더 체계적인 연구에 기초하여 교육과정이 마련되어야 한다는 주장이다.⁸⁸⁾ 학계나 일선 교육자들에게 공감대가 형성되지 않은 새로운 교과 개발은 위험한 발상으로 경계해야 한다는 비판도 있다.⁸⁹⁾

둘째, 교과서를 어떻게 만들어야 할지 난감하다는 우려의 목소리도 있다. 동아시아사에 대한 학계의 연구도 충분하지 못한 가운데 ‘大綱化의 原則’에 따라 대단원과 성취 기준만이 제시되어 있기 때문이다. 집필에 참고할만한 前例도 없는 데다 동아시아사에 대한 일정 수준의 합의가 학계에서 도출되어 있지 못하기 때문에, 역사학과 역사교육계가 공동으로 교재 개발의 방향과 내용을 모색해야 한다는 주장이 있다.⁹⁰⁾

셋째, 동아시아사의 공간 범위가 模糊하다는 지적이 많다. 한국, 중국, 일본 이외의 베

85) 위의 논문, 194~195쪽.

86) 한국교육과정평가원, 『역사와 선택과목 교육과정 개정시안 연구개발』(2006년도 교육과정 개정연구 위탁과제 답신보고)의 「연구요약」, 2006.12, 33쪽.

87) 權五鉉, 앞의 글 참조.

88) 姜善珠, 「世界史 教育課程 代案 摸索을 위한 努力과 ‘世界歷史의 理解’의 討論文」, 『제50회 全國歷史學大會 역사교육부 발표집-改正 教育課程과 世界史 教育』, 歷史教育研究會(2007년 6월).

89) 柳源迪,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 토론편」, 『2006년도 동북아역사재단 학술연구과제 연구결과보고서』, 2007.

90) 鄭妍, 「동아시아사의 挑戰과 摸索의 討論文」, 『제50회 전국역사학대회 역사교육부 발표집-改正 教育課程과 世界사 教育』, 역사교육연구회(2007년 6월).

트남, 몽골, 티베트, 중앙아시아 등의 존재를 어떻게 다룰 것인가에 대한 언급이나 논의가 충분하지 못하다는 비판이다. 특히 19세기 이후 한국인 자신이 동아시아의 개념을 스스로 형성했던 경험이 없던 상황을 고려할 때 그 근거와 이유를 어떻게 설명할 것인지에 대한 고민이 필요하다는 의견도 제시되었다.⁹¹⁾

넷째, 고교 2~3학년 과정에 개설된 다른 선택과목 ‘世界歷史의 理解’와 ‘동아시아사’의 差別性을 분명히 해야 한다는 主張도 提起되었다. 時代區分의 方式 등은 다르지만 문화교류와 통합, 갈등 같은 주요 주제가 겹치고 전개 방식이 비슷하여 ‘세계역사의 이해’ 중 동아시아 부분만을 떼어 낸 것과 별다른 차별성이 없다는 지적이다.⁹²⁾ 그리고 ‘동아시아사’의 등장으로 ‘세계 역사의 이해’는 동양사 부분의 서술이 빈약해질 것이기 때문에, 아예 ‘동아시아사’는 없애고 ‘세계 역사의 이해’를 ‘동양의 역사’와 ‘서양의 역사’로 분과하여야 한다는 주장조차 나왔다.⁹³⁾ 반면 한편에서는 동아시아사는 일종의 국사(한국사)와 세계사(동양사)의 통합형 과목으로 세계사의 萎縮을 어느 정도 補完할 수 있는 科目이 될 수 있다는 의견도 나왔다.⁹⁴⁾

7. 『동아시아사』 模型單元 開發과 主要 內容

1) 개발 참여자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를 실제로 개발하여 사용하기 어렵다는 비판을 고려하여 教育部와 서울시 교육청의 주도로 2007년 6월부터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의 模型單元 開發이 추진되었다. 그 見本은 2008년 5월19일 東北亞歷史財團에서 公開되었는데 安秉佑 韓神大 教授(韓國史學) 등 13명이 試案을 마련했고, 金正仁 春川敎大 教授(社會科敎育科) 등 7명이 模型 單元을 만들었다.

개발 參與者를 보면 동아시아 敍述의 均衡을 維持하기 위하여 韓國史와 中國史, 日本史 전공자를 專攻時代를 고려하여 연구팀원으로 선정하였다. 또한 比較史적 知識을 共有하기 위해 독일의 歷史對話 專攻 교수, 韓·中·日 3國 共同敎材 開發 經驗이 있는 歷史敎師 3명, 敎育課程評價院과 教育部의 獎學士 등으로 연구진을 구성하였으며, 베트남사(越南史) 전공 교수가 부분적으로 참가하였다. 명단은 다음과 같다. 安秉佑(책임자, 韓國史, 韓神大) 金正仁(한국사, 春川敎大) 林相先(한국사, 東北亞歷史財團) 柳鏞泰(중국사, 서울대) 申聖坤(중국사, 漢陽大) 河棕文(일본사, 韓神大) 朴薰(일본사, 國民大) 金承烈(獨逸史, 慶尙大) 李仁石(京畿女高) 朴重鉉(良才高) 鄭妍(永樂高) 朴振東(敎育課程評價院) 申恒洙(敎育課程評價院)⁹⁵⁾

91) 韓明基, 「東아시아史 敎科에 對한 斷想」, 『2006年度 東北亞歷史財團 學術研究課題 研究結果報告書』, 2007.

92) 南廷蘭, 「歷史科 選擇科目 東아시아史 敎育課程 試案에 對한 討論」, 『2006年度 東北亞歷史財團 學術研究課題 研究結果報告書』, 2007.

93) 柳源迪, 「동아시아사 敎育과정 토론문」 참조.

94) 陳在瑄, 「2007年 改正 敎育課程과 世界史 敎育」, 『第50回 全國歷史學大會 歷史敎育部 發表集』, 歷史敎育研究會, 2007년 6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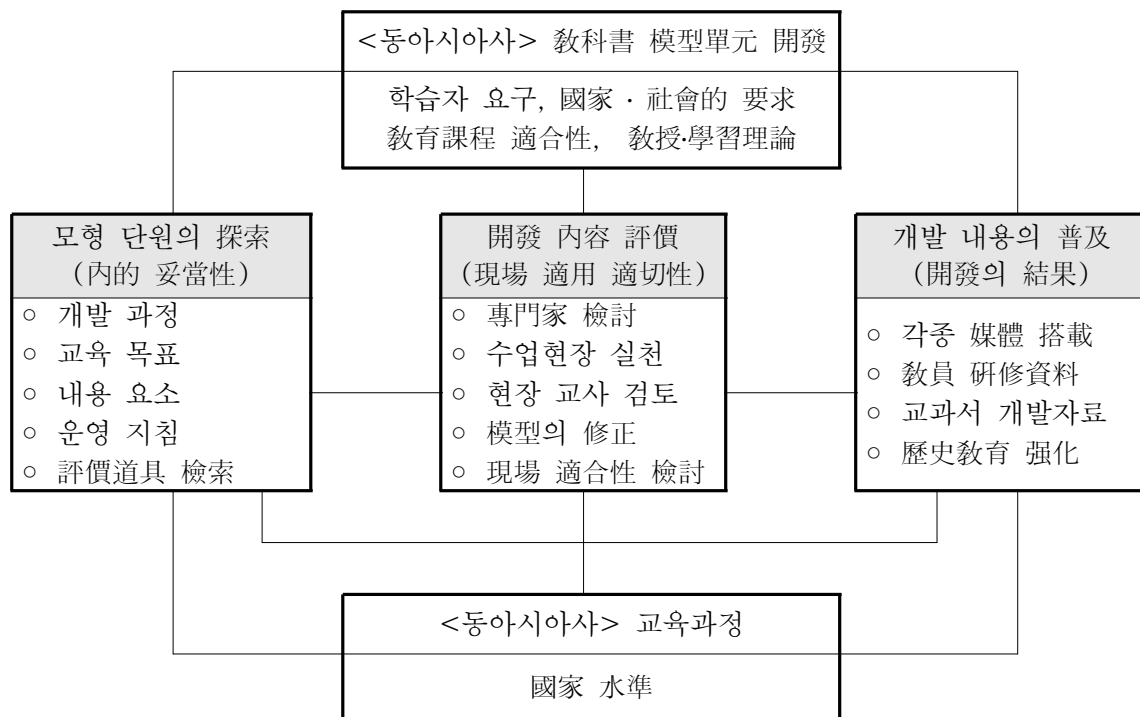
2) 내용 및 범위

① 연구내용

이 모형단원 개발 연구는 개정 교육과정의 중·고등학교 深化選擇 科目인 ‘동아시아사’의 샘플(sample) 단원을 제시함으로써 개정 교육과정이 성공적으로 정착할 수 있도록 하기 위해서였다. 이를 위해 역사교육 강화에 이바지할 수 있는 국가사회적 요구를 반영함과 동시에 學習者(學生)의 요구와 수업 실천이론을 반영하여 구성 체제를 검토했다고 한다. 自國史는 물론 他國史에 대한 인식을 深化할 수 있도록 교육과정 본래의 목적에 맞는 교과서 제작의 基盤을 제공함으로써 바람직한 고교 역사교육을 도모한다는 것이다. 또한 개발된 모형단원을 근거로 교육현장의 수업 실천 및 교원 연수를 통하여 역사교육 강화에 실질적으로 도움을 줄 수 있도록 하며, 역사에 대한 흥미를 振作하고, 역사의 의미를 吟味하며 실제의 삶 속에 실천할 수 있는 기반을 조성할 수 있도록 제작하기로 했다고 한다.⁹⁶⁾

이러한 연구 목적을 달성하게 위한 구체적인 연구 내용은 다음과 같다.⁹⁷⁾

〈그림 2〉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 모형 단원 개발 모형



출처 : 安秉佑 外, 『2006年度 東北亞歷史財團 學術研究課題 研究結果報告書』, 2007 및 동북아역사재단
보도 참고자료(2008.5.19) 『東아시아史關聯 主要內容』 4쪽.

95) 동북아역사재단 보도 참고자료(2008.5.19) 『東아시아史關聯 主要內容』 2쪽.

96) 위의 『東아시아史關聯 主要內容』 5쪽.

97) 『동아시아사관련 주요내용』 4~5쪽.

② 집필의 원칙

- 가) 주제 중심으로 서술을 하되, 전반적인 시대 상황을 이해할 수 있도록 한다.
- 나) 학생의 이해 수준을 고려하여 다양한 자료를 제공함으로써 흥미를 제고시킨다.
- 다) 跋文을 效果的으로 함으로써 各國의 相互發展과 葛藤關係를 이해할 수 있도록 한다.
- 라) 국가의 경계를 뛰어 넘어 視野를 동아시아 全體에 둘 수 있는 歷史的 感覺을 習得하도록 한다.
- 마) 人物學習을 통하여 각국에 처한 상황과 인권과 평화에 대한 가치를 체험하여 내면화할 수 있도록 한다.
- 바) 探究活動을 통하여 각국이 성취한 문화의 공통성과 상관성을 탐구하여 평화정착에 능동적으로 참여할 수 있는 자질을 함양할 수 있도록 한다⁹⁸⁾

3) 모형 단원의 구성 체제

* 단원의 구성 : 2장과 5장 단원이 시안개발 대상으로 채택되었다. 구성체제는 아래 <표 4>와 같다.

<표 4> 모형단원 구성체제와 체제 설명

單 元 名	모형 단원의 構成 體制	體制 說明
II. 인구 이동과 문화의 교류	그 때 이 시기에는	해당 단원의 시대적 상황을 이해한다
	본문의 기술	주제별로 서술해 간다
	생각해 봅시다.	서술된 내용을 다시 확인하는 코너(Corner)
	역사의 라이벌	당시 주요한 인물을 배치하여 시대상을 이해할 수 있도록 한다
	칼럼	文化의 比較, 事件, 최근 새롭게 부각되는 것 등 多樣한 主題로 配置한다
	탐구활동	가)주제와 관련된 遺蹟이나 遺物을 조사하여 발표한다 나)주제를 주고 이를 통한 役割劇, 카툰(cartoon, 諷刺 畫)의 제작 등 활동을 통하여 주제를 심화 이해 한다
	單元の 마무리	이 시대의 사건은? 지금 우리는...
V. 국민국가의 모색	다음과 같은 상황은 무엇을 의미하는 것일까?	당시 時代狀況을 알 수 있도록 한다.
	本文의 記述	上端에 주제와 관련한 자료를 제시하여 이것은 무엇인가라는 물음으로부터 내용이 전개되도록 한다.
	어떤 人物이 있었을까?	당시 주요한 인물을 배치하여 시대상을 이해할 수 있도록 한다
	칼럼(column)	문화의 비교, 사건, 최근 새롭게 부각되는 것 등 다양한 주제로 배치한다
	탐구활동 (내가 ○○이라면)	歷史上 實存의 人物이 되어 歷史의 追體驗 또는 想像的 理解가 가능하도록 하여 主題를 內面화시킨다
	단원의 마무리	年代記 퍼즐(puzzle) 맞추기

* 각 단원(2·5장)을 다른 형태의 구성체제로 한 것은 실제 교과서 제작에서 그렇게 한다는 것이 아니라 모형단원이 갖는 다양성을 통하여 보다 나은 교과서 체제를 검토·개발하기 위한 것이라고 함.

** 출처 : 동북아역사재단 보도 참고자료(2008.5.19) 『東아시아史關聯 主要內容』 6쪽.

4) ‘동아시아’ 모형단원 一部內容 檢討

‘동아시아사’ 模型單元이 各國 사이의 友好關係에 焦點을 맞췄다는 점은 注目할 만한 특징이다. 특히 模型單元은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기원 前後부터 10세기까지 朝貢과 冊封을 통해 友好關係를 유지한 것으로 해석했다. 조공·책봉 관계를 政治的 服屬으로 보는 既存 觀點을 脫皮해 各國이 安定維持라는 현실적 필요에 따라 전개한 外交行爲로 해석한 것이다. 여기에 조공과 책봉이 경제적 문화적 교류를 위한 매개로 활용됐다는 점을 덧붙였다.⁹⁹⁾

아울러 나라마다 自國 中心으로 이웃 나라를 대했다는 기술을 통해 역사의 상대성을 부각시켰다. 韓國의 三國時代에 대해서는 "高句麗는 百濟와 新羅 등을 屬國으로 여기고 朝貢을 받았으며, 百濟도 馬韓을 屬國으로 삼는 등 自國을 天下의 中心으로 생각하였다. 新羅도 스스로를 大國으로 인식하고 日本을 朝貢國으로 생각하였다"고 설명했다. 또 "日本은 新羅와 渤海를 朝貢國으로 看做하려다 摩擦을 빚기도 하였다. 독립한 베트남(越南)은 주변 국가들에 대해 自國을 宗主國으로 하는 朝貢關係를 强要하였다"면서 "이처럼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은 조공책봉 관계를 自國 中心의 外交形態로서 周邊國과의 關係에 활용하였다"고 평가했다.¹⁰⁰⁾

模型單元은 各國의 공통점과 역사의 兩面性도 조명하고 있다. 우리나라에 자랑거리가 있다면 다른 나라에도 내세울 만한 歷史나 文明이 있고, 다른 나라에 허물이 있다면 우리나라에도 흠이 있다. ‘동아시아사’ 모형단원은 이 점을 짚고 넘어간다.¹⁰¹⁾

예를 들면 모형 단원은 서양 국가들이 동아시아로 밀고 들어오기 전 동아시아 정세에 대해 "당시 동아시아 各國의 체제에는 몇 가지 문제점도 있었다"면서 "자기 문명에 대한 지나친 자부심 때문에 다른 문명의 우수한 점을 쉽게 받아들이려 하지 않았다"고 지적하였다.¹⁰²⁾ 淸은 西洋時計의 원리를 탐구하려 하지 않았고, 朝鮮은 望遠鏡을 적극적으로 이용하지 않았다. 또 日本은 體制가 安定되자 鳥銃을 폐기해 버렸다.¹⁰³⁾ 자기 文明에 대한 지나친 자부심으로 外部 文明의 우수한 점을 받아들이는 데 소극적이었던 점을 지적한 것이다.

이처럼 모형단원 연구진은 동아시아 各國의 歷史와 文化에서 共通點과 相關性을 찾는 데 주력하였다. 특히 '開港과 國民國家' 단원에선 19세기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이 처음에는 하나같이 다른 국가의 通商과 修交 要求를 거절했으나 軍事力의 劣勢로 결국 開港할 수밖에 없었던 점을 썼다. 淸이 가장 이른 1842년 영국과 난징조약(南京條約)을 맺었다. 이어 일본이 1858년 미국과 미·일 수호 통상 조약을 체결했고, 조선은 그러한 일본과 1876년 강화도 조

99) 『東아시아史』 2012年 高校 教科課程 新設, 『國民日報』 2009.4.15字 記事

100) 教育人的資源部·서울特別市 教育廳, 『歷史教科書 模型單元 開發』 高等學校 東아시아사 (2008), 20~21 쪽.

101) 『東아시아史』 2012年 高校 教科課程 新設, 『國民日報』 2009.4.15字 記事

102) 앞의 『歷史教科書 模型單元 開發』 高等學校 東아시아사 (2008), 31쪽

103) 위와 같음.

약을 맺었다.

모형단원은 이를 두고 "저마다 외국과 맺은 최초의 불평등 조약이었다"고 정리한 뒤 "그 후 동아시아 각국은 서양의 다른 나라들과 계속해서 유사한 조약을 맺는 한편 서로 간에도 조약을 체결하여 서양식의 새로운 조약 체제에 편입되어 갔다"고 설명했다.¹⁰⁴⁾ 특정 국가의 잘잘못을 따져보지 않고 피해자가 가해자가 되기도 하는 역사의 兩面性을 객관적으로 서술한 것이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歷史葛藤' 解決의 試金石 역할을 할 수 있을지는 아직 確言할 수 없다. 동아시아사는 고교 선택과목으로 採擇되는 과정에서부터 논란이 많았다. '親日·親中 歷史觀이 主가 되는 게 아니냐'는 우려, 한국사와 세계사 외에 또 하나의 역사 교과가 생겨나는 데 대한 부담 등이 제기되기도 했다. 교육과정 시안을 개발하는 단계에서는 동아시아사의 성격을 둘러싸고 연구진과 검토진 사이에 논쟁이 벌어졌던 적도 있다. 韓國과 韓民族을 중심으로 한 擴大過程을 동아시아사로 규정하자는 주장부터 韓·中·日 三國史를 並列적으로 구성해야 한다는 주장,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한 기존 東洋史 體制를 따라야 한다는 주장 등이 서로 맞서기도 하였던 것이다.¹⁰⁵⁾

‘동아시아사’에 대해 學校 現場의 關心은 높은 편으로 알려졌다. 모형단원 개발에 참여한 김정인 교수는 "동아시아사는 新生 教科目이라 학교들이 1순위 선택 과목으로 채택하기엔 아직 망설이지만, 2순위로는 단연 압도적인 비중을 차지한다는 조사가 있다"며 "교사 연수와 교수·학습법 개발, 풍부한 자료 제공이 前提된다면 호의적인 반응이 있을 것"으로 평가하였다.¹⁰⁶⁾

추후 개발될 單元인 '오늘날의 동아시아(第6章)'에서는 戰後處理 문제, 分團과 戰爭, 歷史葛藤을 다루며, 중국의 '東北工程'이나 獨島를 둘러싼 日本과의 葛藤도 서술될 것으로 전망된다. 이와 관련하여 연구에 참여한 金正仁 교수는 "교과서 개발 자체가 역사 갈등에 대한 대응이라는 정부의 방침과 관련이 있기 때문에, 역사 갈등에 대한 문제는 未來指向的인 教科書를 만든다는 틀 안에서 반드시 짚어 넣게 될 것"이라고 말했다. 또 "葛藤을 바라보는 우리의 觀點과 함께 中國과 日本의 歷史認識은 다르다는 점도 함께 설명하게 될 것"이라고 덧붙였다.¹⁰⁷⁾

104) 위의 책, 32~33쪽.

105) 「'동아시아사' 2012년 高校 教科課程 新設」, 『國民日報』 2009.4.15字 記事

106) 위의 『國民日報』 2009.4.15자 기사. 이 문제에 대해서는 黃芝淑, 「韓國 中·高教 歷史教師들의 東아시아史 教育 認識」, 『韓中日 東아시아史 教育의 現況과 課題』 2008년 6월 14일 東北亞歷史財團·아시아平和와歷史研究所·成均館大 東아시아歷史研究所 개최 '동아시아사'교육 국제심포지엄 발표논문집, 83~102쪽 참조.

107) 「'동아시아사' 教科書 무엇이 담기나」, 『聯合뉴스(News)』 2008.5.19 보도기사

5) 동아시아사 敎員研修 過程의 運營

한국의 동북아역사재단은 2007년 2월 발표된 「2007년 개정 교육과정」에 따라 ‘동아시아사’ 과목에 관심을 보이거나 향후 이 과목을 선택할 가능성이 있는 학교 교사들의 敎科目 指導에 대한 專門性 提高와 동아시아사에 대한 이해를 높이기 위하여 2008년부터 ‘동아시아사’ 교원 직무연수 사업을 실시하고 있다. 夏季 및 冬季放學 期間을 活用하여 1년에 2~3차례 중등학교(중·고등학교) 교원연수를 실시하고 있다.

이러한 교원 직무연수와 관련, 2008년 개설된 ‘동아시아사’ 교원연수 敎科 編成案 및 講師를 소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 제1강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 개발 概要 : 鄭妍(永樂高 敎師)
- 제2강 한국사 속의 동아시아 : 金正仁(春川敎大 敎授)
- 제3강 동아시아사와 중국 : 姜珍亞(慶北大 敎수)
- 제4강 일본의 동아시아사 인식과 동아시아사 : 朴重鉉(良才高 敎사)
- 제5강 동아시아사, 무엇을 어떻게 가르칠 것인가? 黃芝淑(新林高 敎사)

현재 동북아역사재단에서 운영하고 있는 과정별 교과 편성은 다음의 <표 5>와 같다.

<표 5> 과정별 교과 편성(수업방법은 강의)

순서	'08년 교과목 ('09년 교과목)	敎授 주요내용	時數
제1강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 개발 개요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 개발의 배경과 경과, 동아시아사 교육과정의 성격	3
제2강	한국사 속의 동아시아 (동아시아와 한국)	동아시아사 교과목을 통해 어떠한 韓國史像을 그려야 하는지 검토, 현행 한국 고교 『국사』 · 『한국근현대사』 의 중국·일본 서술 검토 등	3
제3강	동아시아사와 중국 (동아시아와 중국)	유럽(Europe)중심 사관에 대한 비판으로 전근대 중국경 제의 비중 강조 연구 소개, 중국 중심의 동아시아 국제 질서와 무역구조, 그리고 주변국들이 catch up 하는 과정	3
제4강	일본의 동아시아사 認 識과 동아시아사 (동아시아와 일본)	동아시아 속에서 일본을 어떻게 이해할 것인가, 현재 일본에서 동아시아를 어떻게 보고 있는가 등	3
제5강	동아시아사, 무엇을 어떻게 가르칠 것인가?	동아시아 담론, 동아시아를 보는 시각, 내용구성 사례 등	3

출처 : 동북아역사재단, 『2008년 중등교원 職務研修 동아시아사 역사아카데미』 · 『2009년 하계 동아시아사 교원연수』 (서울 · 大邱 研修敎材)

8. 『동아시아사』 모형단원 見本の 限界와 爭點

1) 모형단원 개발의 限界와 몇가지 提言

실제로 동아시아사 모형단원 개발 팀은 『동아시아사』 모형단원 개발의 한계점을 다음과 같이 實吐하고 있으며, 아울러 향후 바람직한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개발을 위하여 다음과 같은 몇가지 제언을 하고 있다.¹⁰⁸⁾

첫째, 동아시아사가 한국중심의 동아시아사인가, 아니면 韓·中·日 동아시아 三國志인가, 객관적으로 동아시아 전체상을 보려고 하는 것인가에 대한 지속적 문제제기가 있었다는 사실이다. 즉 한·중·일 3국을 병렬적으로 나열하는 三國志의 敘述을 止揚하기 위해 하나의 주제를 잡아 동아시아 전체상을 그려보고자 하였지만, 실제 집필과정에서는 내용 요소에 따라 가능한 것도 있었고, 어려움을 겪은 것도 있었다고 한다.

둘째, 서술할 수 있는 紙面의 한계가 지적되었다. 많은 原稿를 作成하였으나, 分量上의 이유로 또는 사진자료들과 입체적으로 연결시키지 못하는 아쉬움 때문에 모형단원에는 실리지 못했다는 것이다.

셋째, 집필과정에서 다른 나라의 寫眞 資料 및 原文史料를 확보하는 데에 큰 어려움을 겪었다고 한다. 사진자료를 바탕으로 원고를 쓴 결과 인터넷에서 다운(download)받은 것은 解象度가 낮아 印刷本에서 제대로 나오지 못하는 관계로 削除된 것들도 많았다고 한다. 다른 나라의 자료를 利用하고 選擇하는 데 어려움이 있어 不可避하게 한국의 자료를 중심으로 편집, 서술할 수 밖에 없었던 경우도 있었다.

넷째 “재미있게 밤새워 읽을 수 있는 교과서”를 지향했지만, 개발기간중 상당시간을 본문 내용서술에 집중하다보니, 흥미와 동기유발을 위한 아이디어나 서술방식 등에 대해 고민할 시간이 매우 부족하였다는 점이다.¹⁰⁹⁾

한국에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을 처음 개설하는만큼 상당한 위험부담과 어려움이 따르지만, 그만큼 중요한 의미가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동아시아사를 보는 열린 시각과 함께 동아시아 국제시민의 양성을 동아시아사 교과목의 한 목표로 삼아야 할 것”이란¹¹⁰⁾ 모형단원 개발 담당자들의 提言을 명심할 필요가 있다.

한편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원활한 시행과 정착을 위해서는 다음과 같은 몇가지 과제가 시급히 해결되어야 한다고 본다.

첫째, 자료의 원활한 확보를 위한 지원이 이루어져야 한다. 둘째 이 문제와도 관련이 있지만, 동아시아사가 정립될 수 있는 한국(중국·일본)학계의 연구성과가 지속적으로 축적되

108) 앞의 『歷史教科書 模型單元 開發』 高等學校 동아시아사』 2008, 80~81쪽

109) 위와 같음.

110) 위의 책 82쪽.

어야 한다. 셋째 『동아시아사』의 開設 背景과 目的, ‘동아시아사’의 구체적인 내용 이해에 대한 歷史敎師 研修가 이루어져야 한다.¹¹¹⁾ 셋째 문제와 관련해서는 이미 앞에서 설명한 바와 같이 발표자가 재직하고 있는 ‘東北亞歷史財團’에서 2008년부터 매년 ‘中等敎員 職務研修’를 실시하여 역사교사들을 상대로 상당한 도움을 주고있는 실정이다. 물론 연수대상 교사 숫자의 제한이나 시간적·공간적 제약으로 충분한 효과를 거두었다고 볼 수는 없지만, 이같은 사업이 매년 지속된다면 적지 않은 성과를 기대할 수 있을 것으로 본다.

2) 模型單元 開發 見本에 대한 批判

2008년 5월 ‘模型單元’의 公開에 앞서 2007년 10월 6일 韓國歷史敎育學會가 主擧한 學術大會에서 모형단원에 대한 중간 발표가 있었는데 그에 대한 토론을 權五鉉 교수(慶尙大 歷史敎育科)가 담당한 바 있다. 이 때 제기된 권오현 교수의 비판적 견해를 간단히 소개하고자 한다.¹¹²⁾

‘동아시아사’ 모형단원 개발은 교육과정에 제시된 ‘동아시아사’의 내용 요소들을 처음으로 구체화하여 모형단원을 개발하였다는 점에서 매우 중요한 의미가 있는 업적이다. 다만 모형단원은 큰 성과에도 불구하고 몇 가지 아쉬운 점이 지적되고 있다.

첫째, 과목의 설립 취지와 목적 등이 뚜렷하게 반영되지 못하고 있다는 비판이다. 모형단원의 내용 개관을 읽어보면, 동아시아 각국의 문화 교류나 상호 관련, 비교 등에는 중점을 두어 서술하고 있으나 “지역의 공동 발전과 평화를 추구하는 안목과 자세”를 드러내어 강조하고 있는 부분은 쉽게 찾아내기 어렵다는 것이다. 본문 서술에서 강조하기에 어려움이 있다면 칼럼이나 자료 등을 활용하여, 공동발전 및 평화추구와 관련된 대표적인 사례나 인물 등을 소개하는 것도 필요하다고 본다.

둘째, 서술 방식과 사용하는 용어 등이 결코 쉽거나 재미있지 않다는 것이다. 본문의 경우 여전히 압축적인 설명식 문장이 많으며, 어려운 역사 용어와 단어가 빈번하게 등장한다. 특히 한 단원은 본문을 서술하고 자료를 뒤에 나열하는 형태로, 또 하나는 자료를 제시하여 주제를 探究式으로 전개하는 방식으로 두개의 단원 구성을 각각 다른 형태로 개발하려고 시도했지만, 실제로는 큰 차별성이 없다고 본다.

셋째, 칼럼, 읽기 자료, 탐구 활동이 일관된 원칙에 의해 구성되지 못하고 있으며, 차별성도 뚜렷하게 부각되지 못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칼럼의 경우, 문화의 비교, 사건, 최근 새롭게 부각되고 있는 것 등 다양한 주제로 배치한다는 원칙이 제시되고 있지만, 구체적인 서술 관점이 명확치 않다. 역사의 학습 방법과 기능, 자료 해석의 방법 등을 구체적인 사례를 통해 쉽게 배울 수 있는 탐구활동 교재의 개발이 시급한 것이다.

‘동아시아사’의 모형단원은 새로운 試圖에도 불구하고 기존 교과서의 한계를 뛰어넘는 획기적인 내용이나 형식을 갖추지 못했다는 점을 지적할 수 있다. 특히 연구 개발자의 대부

111) 위와 같음.

112) 權五鉉, 앞의 글 참조

분(7명 중 5명)이 이 과목의 성격과 목적 등을 제대로 반영한 교과서를 만들기가 어렵다고 실토하고 있는 사실은 問題라고 할 수 있다. 학문적 연구성과나 교육현장의 현실을 제대로 반영하지 못한 상황에서 급히 개설한 만큼, 교과서제작조차 힘들다는 呼訴가 제기되고 있는 것이다.

한국(동북아역사재단)에서 독일과 프랑스가 지난 2006년 여름에 공동 제작하여 현재 양국 학생들이 사용하고 있는 『역사 : 1945년 이후 유럽과 세계』 교과서를 한글로 번역하여 『독일 프랑스 공동 역사교과서 : 1945년 이후 유럽과 세계』라는 제목으로 2008년 9월에 발간하였다. 이 『역사』 교과서는 독일과 프랑스의 고등학생들을 위한 양국 최초의 ‘공동’ 역사교과서인 동시에, 사상 초유의 超國家的 歷史教科書라는 점에서 중요한 의미가 있다.¹¹³⁾ 잘 알려진 것처럼 역사 과목은 각국이 처한 주·객관적 상황에 상황에 따라서 이데올로기(ideology)가 반영되기 쉬운 과목이기 때문에 한국의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개설과 관련하여 이 共同 歷史教科書 發刊의 意味와 成果를 注目할 必要가 있다.

9. 中國과 日本의 ‘東아시아史’ 關聯 主要 研究成果

최근 중국에서 楊軍·張乃和 主編, 『東亞史 : 從史前至20世紀末』(長春 : 長春出版社, 2006)이라는 책이 출판되었다. 이 책은 512쪽에 달하는 방대한 분량으로서 중국학자 특유의 거시적이며 종합적 시각이 잘 반영되어 있다. 물론 ‘統一의多民族國家論’과 중국 중심의 文化傳播論 시각이 반영된 한계와 문제점을 지적할 수 있으나, 중국인의 입장에서 동아시아 역사를 어떻게 바라보고있는 지 이해할 수 있는 力著라고 평가할 수 있다.¹¹⁴⁾ 또한 楊軍·王秋彬 共著, 『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8)이 출판되었다. 이 책은 제1장을 ‘東亞前 國際體系’로 설정하여 고대 동아시아 국제체제가 아직 성립되지 않은 시기를 概觀하고 있다. ‘제2장 조선반도(한반도)의 邦國體制’, 제5장 宗蕃과 朝貢, 제6장 ‘평등’관계의 확립과 단절 등의 주요 장을 설정해 한중관계사를 개관하고 있다. ‘結語’가 “중국과 한반도 관계의 새로운 질서 구축”으로 되어있어 1992년 한중 수교 이후 급변하는 한중관계의 위상을 잘 반영하고 있다. 한중관계사를 ‘동아시아 국제체제’와 연계하여 고찰하고 있는 사실이 특징적이다.

또한 史學集刊編輯委員會 간행 『史學集刊』 2005年 2期(總99號)(2005.3.15 발행)에 “동아시아공동체(東亞共同體)”관련 특집이 실려있는 사실은 매우 意味深長하다. 특히 『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의 저자인 楊軍과 王秋彬의 글이 실려있음이 주목된다.¹¹⁵⁾ 중국학계에서 최근 동아시아공동체론이

113) 金承烈, 「독일과 프랑스, 歷史의 높은 國境을 뛰어넘다」, 『독일 프랑스 共同歷史教科書』, 휴머니스트(Humanist), 2009, 9쪽.

114) 이 책의 주요 내용(目次)은 다음과 같다. 第1編 早期東亞世界(遠古—公元前3世紀末), 第2編 區域結構的形(公元前3世紀末—8世紀末), 第3編 多族多國並存發展(8世紀末—13世紀末), 第4編 封貢體系(13世紀末—1874年), 第5編 條約體系(1874—1945年), 第6編 冷戰時代(1945—1992年), 結語 后冷戰時代.

115) 관련 내용과 필자는 다음과 같다. 『國際共同體』意味着什麼? / [英]巴里·布贊 外 著(1—6面); 『東亞共同體與日中關係的歷史及未來』 / [日本]阪倉篤秀 著, 程尼娜 譯(6—10); 『全球化, 民族國家與東亞認同』 / 田毅鵬(10—12); 『東亞文化傳統的多元與統一』 / 許兆昌(13—14); 『中, 日與東亞共同體從歷史到現實』 / 楊軍(15—16); 『東亞多元一體論』 / 張乃和(17—18); 『東亞共同體的觀念建構』 / 任東波(21); 『誰來引領東亞共同體: 歷史經驗與現實思考』 / 王秋

활발히 검토되고 있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한편 ‘동아시아’ 담론을 일찍이 제기하고 많은 연구성과를 축적한 일본의 경우 아직까지 동아시아 사 과목을 개설하지 못하고 있는 형편이다. 다만 일본 역사학계에서의 동아시아 이해를 검토하는 한 방안으로 현재 일본 이와나미서점(岩波書店)에서 간행중인 ‘시리즈 日本近現代史’편을 참고할 수 있다. 이 시리즈는 전10권으로 구성되어 있는데 2008년까지 제8권까지 간행되었다. 각 권을 한 명의 집필자가 담당하는 형태로, 에도막부(江戸幕府) 말기부터 현재까지를 취급하고 있다. 이 시리즈를 검토 대상으로 거론하는 이유는 첫째, 21 세기에 들어와 처음으로 간행된 본격적인 일본 근현대사에 관한 通史인 점. 둘째, 각 권의 내용이 최근 일본 역사학계의 동향을 잘 반영하고 있다는 점. 셋째, 이 시리즈의 특색의 하나로서 동아시아 및 植民地 問題가 중시되고 있다는 점을 들 수 있다.¹¹⁶⁾

한국의 ‘동아시아사’ 과목 개설과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의 순조로운 개발·편찬을 위해서는 중국과 일본의 주요 연구성과를 충분히 활용할 필요가 있다.

10. 最近 韓國의 ‘2009年 改正 教育課程’ 논란

한국 교육부는 최근 ‘글로벌(Global) 創意人才 育成’을 目標로 내세우면서 ‘2009년 改正 教育課程’ 市案을 今年 9月 29日에 發表하였다. 이 改正試案에 따르면 고교 역사 선택과목이 3개에서 2개로 줄어들고 고교 1학년 역사마저 선택과목으로 운영될 방침이다.¹¹⁷⁾

이에 대해 韓國史研究會와 韓國歷史研究會, 아시아平和와歷史教育連帶, 全國歷史教師모임 등 36개 역사교육 학계와 관련단체들은 2009년 10월 13일 서울市內 興士團 講堂에서 ‘2009년 개정교육과정 拙速 推進에 대한 역사(교육)학계의 立場’을 발표하고 現政府가 이른바 ‘拙速’으로 추진하고있는 교과과정 개정작업의 즉각적 중단을 요구하였다.¹¹⁸⁾

趙珖(高麗大 教授) 한국사연구회장은 이날 36개 단체를 대표해 발표한 성명에서 “일본의 잇따른 역사 교과서 왜곡과 중국의 동북공정으로 전 국민적 공감대가 형성돼 ‘역사교육 강

彬(21-23) 등.

116) ‘『시리즈(シリーズ) 日本近現代史』’ 全10卷의 제목과 저자를 소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①幕末·維新(이노우에 카츠오 井上勝生) ②民權과 憲法(마키하라 노리오 牧原憲夫), ③日清·日露 전쟁(하라다 케이이치 原田敬一), ④大正데모크라시(Democracy)(나리타 류이치 成田龍一), ⑤滿洲事變으로부터 日中戰爭으로(카토 요코 加藤陽子), ⑥아시아(アジア)·太平洋戰爭(요시다 유타카 吉田裕), ⑦占領과 改革(아메미야 쇼우이치 雨宮昭一), ⑧高度成長(타케다 하루토 武田晴人), ⑨포스트(ポスト) 戰後 사회(요시미 토시아 吉見俊哉), ⑩일본 근현대사를 어떻게 볼 것인가(미야지 마사토 宮地正人). 2008년까지 ①에서 ⑧까지 간행되었고 ⑨와 ⑩은 未刊이다(宮嶋博史, 「日本歷史學界における 東アジア論の現在」, 『韓中日 東아시아史 教育의 現況과 課題』 2008년 6월 14일 東北亞歷史財團·아시아平和와歷史研究所·成均館大 東아시아歷史研究所 개최 ‘동아시아사’교육 국제심포지엄 발표논문집, 185~186쪽).

117) 教育科學技術部 報道資料, 「2009 改正 教育課程’ 試案을 主題로 公聽會 開催」(2009.9.29); 「2009 改正 教育課程 歷史教育 萎縮」, 『韓國日報』 2009년 10월 14일자 A23쪽.

118) 「2009년 교과개정 즉각중단」, 『文化日報』 2009년 10월 13일 보도기사.

화'라는 2007년 교육과정 개정을 이끌어냈는데, 개정 시안은 이런 2007년 개정교육과정의 취지와 역사성을 무시해 버렸다"며 "개정 시안에 따르면 中·高等學校에서 모두 역사를 社會科 안에 道德과 함께 끼워 넣음으로써 역사과의 독립성이 훼손될 가능성이 커졌다"고 비판했다. 趙珖 教授는 "개정 시안대로 될 경우, 2007년 개정교육과정이 의도했던 계열성(중학교에서 前近代史 중심의 한국사와 세계사, 고등학교 1학년에서 근현대 중심의 통합역사, 2·3학년에서 「韓國文化史」·「동아시아사」·「世界歷史의 理解」중 選擇)이 모두 무너져 버릴 뿐 아니라, 자칫 고등학교에서 역사를 한번도 배우지 않고 졸업하는 학생이 나올 가능성마저 생긴 셈"이라고 憂慮를 表明하였다.¹¹⁹⁾

실제로 이 '2009年 教育課程'이 現實化될 경우, 2007년 개정교육과정에서 새롭게 등장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교육현장에 적용되기도 전에 없어질 가능성이 크다. 最近 日本 오카다 가쓰야(岡田克也) 外相이 언급한 『韓·中·日 共同 歷史教科書』의 必要性과는 相反되는 움직임인 것이다. 오카다 외상은 올해 10월 7일 東京 市內的 日本 外國特派員協會에서 講演하면서 하토야마 유키오(鳩山由紀夫) 총리가 아시아중시의 관점에서 제창하고 있는 '東아시아共同體' 構想에 대해 설명하는 한편, 韓·中 兩國과의 사이에서 역사 공동연구를 추진하고 『공통의 교과서』 製作을 未來指向的 檢討課題로 하는 方案을 밝혀 國內外 言論의 주목을 끌었다.¹²⁰⁾

趙珖 교수는 10월 13일 "2009년 개정교육과정은 역사교육을 현행 7차 교육과정보다 더 위축시키는 퇴행이자 입시 주요 과목인 國語·英語·數學을 위해 다른 과목을 희생시키겠다는趣旨로밖에 볼 수 없다"고 밝혔다.¹²¹⁾ 물론 이러한 비판에 대해 교육과학기술부는 이 개정 시안의 즉각적 시행을 부인하고 나섰지만,¹²²⁾ 과장과 우려는 쉽게 가라앉지 않을 전망이다.¹²³⁾ 학계와 교육현장에서 새 교과과정에 대한 반발이 거세지자 한국 교육당국은 고교 1학년 과정에서 '역사' 과목을 당초 계획대로 '필수'로 유지하겠다는 방침을 밝힌 것으로 알려졌다. 그러나 교육부는 올해 12월 경 이 개정안을 '教育課程審議會'의 審議를 거쳐 確定, 告示할 예정인데,¹²⁴⁾ 향후 새 교육과정이 어떻게 개정될 지는 확실히 알 수가 없는 상황이다.

11. 結論 - '東아시아史' 科目 開設의 意義와 向後 課題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을 올바르게 가르치기 위해서는 현실적으로 많은 어려움과 제약이 가로놓여 있는 실정이다. 예를 들면 '동아시아'의 개념과 지리적 범위문제, 한·중·일 3국 각국의 인

119) 위와 같음.

120) 日本 '지지(時事)通信' 2009년 10월 7일 보도기사. 이 소식은 『中央日報』 2009년 10월 8일자에 1면 톱으로 보도되었다.

121) 「2009년 교과개정 즉각중단」, 『文化日報』 2009년 10월 13일 보도기사.

122) 「"2009 개정 교육과정, 歷史教育 後退" - 36個 歷史 關聯團體 會見... 教科部 "確定된 것 아니다"」, 『東亞日報』 2009년 10월 14일자, A22쪽 참조.

123) 教育部의 改正案에 對한 批判的 見解로 韓相權, 「거꾸로 가는 歷史教育 政策」, 『京鄉新聞』 2009년 10월 12일자, 31쪽 참조.

124) 教育科學技術部 報道資料, 「2009 改正 教育課程' 試案을 主題로 公聽會 開催」(2009.9.29) 2쪽.

식과 정서의 차이, 正體性的의 有無與否, 효과적인 수업교재나 연구서의 부족 등 ‘동아시아사’의 연구와 교육과정에 상당한 문제점과 현실적 어려움이 있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이러한 현실적 난관에도 불구하고 ‘동아시아사’ 연구와 교육의 필요성과 타당성은 크다고 많은 사람들이 그 의의를 강조하고 있는 것도 사실이다.

최근 한국사회에서 ‘2009년 개정교육과정’(試案)이 발표되면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진로에 대해 다양한 논의가 진행되고 있다. 이 개정 교육과정에 대한 역사학계의 반발이 어떻게 수습될 지 그 귀추가 주목된다.

한·중·일 동아시아 3국은 갈등요인도 잠재되어 있지만, 오히려 진정한 이해와 상호연대, 평화공존의 필요성이 그 어느 때보다 절실하다 할 수 있다. 올해 9월 16일 일본에서 ‘아시아중시’를 표방한 하토야마 유키오 총리가 취임하고, 그와 집권 민주당이 ‘東아시아 共同體論’을 제기하면서 한·중·일은 상당기간 和解무드(mood)가 造成될 展望이다. 특히 日本 外相의 『한·중·일 공동 역사교과서』 제안은 동아시아의 역사갈등과 영토(영해) 문제 해결에 하나의 실마리를 제공하고 있다고 본다.

물론 ‘동아시아공동체’의 구상배경과 그 실체에 대해서도 다양한 논의가 있으며, 공동 역사교과서나 교재(부교재) 개발이 한·중·일 합의하에 추진된다면 實現까지는 오랜 忍耐와 對話의 期間이 필요할 것이다. 李明博政府의 ‘實用重視’ 정책 基調下에서 중국의 ‘東北工程’이나 일본의 ‘歷史教科書 문제’ 등에 대한 대응방안의 하나로 추진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과연 어떻게 될 것인가? 역사교육에 대한 과도한 ‘국가주의’는 배격되어야 하지만, 현실적으로 ‘국가주도 교육’의 한계를 벗어날 수도 없는 형편이다. 그렇다면 어느 정도로 국가(교육부 등)가 中高等學校 教育課程에 개입해야 하는가에 대해서도 다양한 論議가 가능할 것이다.

한국에서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개설되고 『동아시아사』 교과서가 발간되며, 이 책으로 한국 학생들이 한국은 물론 중국·일본·베트남 등 동아시아의 역사와 문화, 사람들의 교류와 상호이해에 대해 학습하는 모습은 분명 새로운 시도임에 틀림없다. 발표자는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을 중국과 일본에서도 수용하여 자라나는 학생들에게 교육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해본다.

『한·중·일 공동역사교과서(혹은 교재)』가 발간되어 3국의 학생들이 이 책으로 이웃나라를 제대로 이해하고 참다운 역사의식을 형성할 수 있는 방안도 고려해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현대 역사학의 보편적 추세는 ‘시대에 뒤떨어진(?)’ ‘민족주의’나 ‘국가주의’의 역기능을 강하게 비판하며 자유롭고 창의적이며 다양한 역사관을 강조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아직 ‘남북통일’이라는 民族至上의 課題가 남아있고, 주변 열강의 틈바구니 사이에서 생존하며 발전을 도모해야 할 운명을 안고 있는 한국사회의 경우 ‘트랜스내셔널 히스토리(Transnational History)’의 서술은 그 보편성과 필요성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 많은 문제점이 있다고 생각한다. ‘동아시아사’도 超國家(超國籍)的 歷史認識의 한 사례이지만, 역사학계는 물론 일반인들에게까지 이러한 역사인식이 확산되기까지는 상당한 시일이 소요될 것으로 예상된다. 왜냐하면 한국학계의 기초연구 부진과 다양성의 부족, 민족주의적 역사인식의 전통 등 여러가지 사정으로 收容할만한 조건이 아직 성숙치 않았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이다. 또한 한국 국민이나 일반 대중들에게는 歷史의 普遍性보다는 韓國史 固有의 獨自性이나 ‘歷史主權’이란 感性的 用語나 그 概念이 상당한 說得力과 呼訴力을 갖고 있다고 보는 이유도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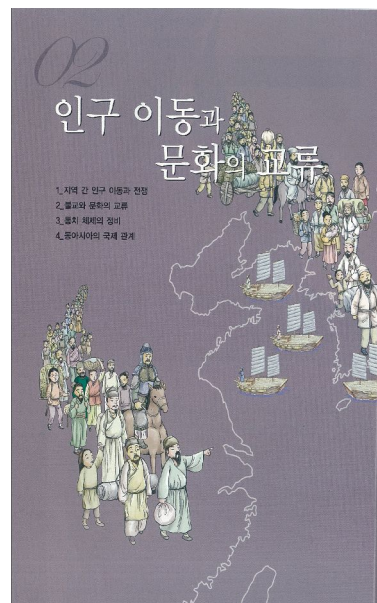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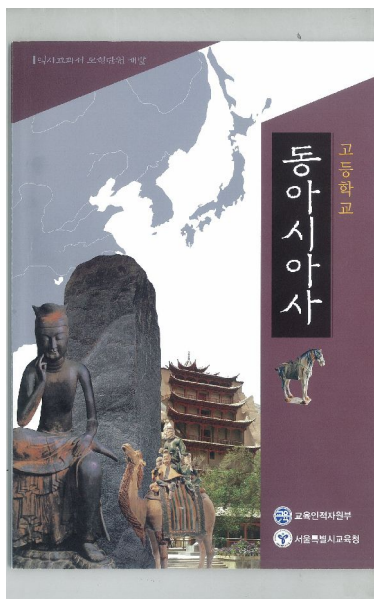
韓國社會의 現實을 고려할 때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의 신설은 분명 一種의 冒險이라 할 수

있다. ‘동아시아사’는 중국의 ‘東北工程’이나 日本의 歷史教科書 問題 등 東北아시아의 歷史(認識) 葛藤에 나름대로 대응하기 위해 신설된 과목으로 한국의 言論과 學界·教育界, 일부 시민운동 단체는 물론, 정부의 의도가 일부 반영된 것이기도 하다. 또한 이와 관련된 교육과정의 개발도 충분한 연구를 바탕으로 각계의 의견을 수렴하여 진행한 것도 아니라고 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이 과목에 대한 다양한 쟁점과 비판이 제기될 수 있다.

그러나 한국학계나 정부의 차원에서 ‘民族主義的 情緒’나 ‘主體的 視覺’을 強調하는 方向의 對應이 아닌 보편적 시각 및 이웃과의 교류·협력을 강화하는 方向으로의 對應이란 점에서 상당히 높게 평가할 부분이 있다고 본다. ‘동아시아’에 대한 평가는 비교적 다양한 형편이다. 그러나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지금까지 國家史나 一國史 중심으로 진행되어온 한국의 역사교육 방향을 개선할 가능성을 제기하였다는 점은 충분히 인정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은 과연 한국사와 세계사의 경계를 초월하여 ‘동아시아사’라는 공동의 정체성을 형성하고, 동아시아 지역 세계에 대한 이해를 넓히며, 동아시아 지역의 평화와 공동번영을 도모한다는 본연의 개설목적을 성취할 수 있을까? ‘동아시아사’ 과목이 고등학교 교육 현장에 올바르게 자리잡기 위해서는 해결해야 할 과제가 적지 않다. 韓國의 歷史教育現場에서 동아시아 科目이 確固하게 자리잡는다면 향후 中國과 日本의 歷史教育에도 일정한 影響을 미칠 것으로 豫想된다.

최근 西歐中心의 ‘世界化’가 急速히 進行되고 (韓國의 경우) 南北이 分斷되어있는 상황에서 ‘동아시아’ 또는 ‘동북아’의 地政學的 概念이 더욱 중요해지고, ‘동아시아인’으로서의 아이덴티티(正體性)를 갖는 것이 중요하다는 지적이 있다. 또한 동아시아를 地理的으로 固定된 實體로 보기보다는 文化·歷史的으로 구성된 범주로 柔軟하게 인식할 필요도 있다는 문제 제기도 있다.¹²⁵⁾ 따라서 이러한 인식과 어울려 ‘동아시아사’ 교육이 韓·中·日(越南?) 등지로 擴散될 必要도 있다고 본다.



125) 「西歐中心 世界化·南北分斷 狀況서 ‘동아시아’ 地政學的 概念 重要해져」, 『韓國日報』 2009년 9월 17일자 白永瑞 教授(延世大) 인터뷰 기사(A32쪽).

[提要]

韩国高中教育课程及“东亚史”科目

张世胤（东北亚历史财团）

二十一世纪初期，韩中、韩日、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出现了纠纷与分歧。为了解决这些纠纷与对立而提出的方案之一，就是把韩中日三国的历史收容在“东亚历史”的范畴之内，之后对三国的学生进行教育的方案。

2007年2月，当时韩国教育人的资源部（现教育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教育部）颁布的《2007年修订教育课程案》，在韩中日三国中首次采纳“东亚史”这一新的科目作为选修课程。之后，韩国的2~3家出版社正研究编制《东亚史》教科书。如果此教科书通过审核，计划将于2012年开始以正式的教科书而使用。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有必要具体选定“东亚史”的具体讲授要点并研究、编辑适合教育的教科书。同时，还需要收集、整理讲授东亚史时所必要的各种资料，有必要利用各种方式讨论具体的授课方式。

2008年2月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韩国就宣布，要实施与过去卢武铉政府加强历史教育的方针有区别的教育过程，最近还发表了其修订案，并对其正在进行研讨。2009年9月末，又颁布了旨在要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2009年修订教育过程（试行方案）》，此案又引起了争论。修订案也有推翻卢武铉政府所主张的减少学校科目数量、强化历史教育方针的内容。因此，从2012年开始“东亚史”科目能否按计划，在高中教育课程中被采纳还是议论纷纷。

目前，要对东亚史科目进行正确的教育，将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与制约。比如，对“东亚”的概念及其地理位置的范围、韩中日三国各自的认识及情绪的差异、民族特性的差异，以及教育意义明显的教材及研究书籍的短缺等因素，都是研究“东亚史”及教育课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及要解决的难关。虽然存在诸如此类的困难，还是很多的人强调研究“东亚史”及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韩中日东亚三国之间虽有潜在的分歧因素，但现在正值更切实地需要真正了解对方、相互合作、和平共存的时期。2009年9月16日，主张要展开“重视亚洲”外交的鸠山由纪夫被当选为日本首相，并同其执政党民主党一起提出“东亚共同体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韩中日三国之间将会形成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气氛。尤其是，日本首相提出的编辑《韩中日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建议，为解决东亚历史分歧及领土（领海）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当然，对“东亚共同体”的构思背景及其实体，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如果韩中日三国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之上，要研究整理并完成共同历史教科书或教材（附教材），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忍耐与相互进行对话、交流的时间。在李明博政府推进的“重视实用”的政策原则下，为了应对中国的“东北工程”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从2007年开始准备的“东亚史”科目，可以如期开设，但能否长期存延，目前还很难判断。

在韩国开设“东亚史”科目并出版《东亚史》教科书，而且韩国学生不仅可以学到中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而且还可以学到人与人之间应怎样进行交流、相互理解的构想，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企图。作为一个发表者，希望“东亚史”科目能够在中国和日本也被接受，使学生们得到学习、教育的机会。出版《韩中日共同历史教科书（或教材）》，韩中日三国的学生通过此教材，也可以一同研究如何真正了解邻国、形成真正的历史意识的方案。

现代历史学的普遍趋势是，强烈批判“落后于时代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逆性功能，强调自由自在的、具有创意性、多样性的历史意识。而韩国还有要实现“南北统一”的民族课题，并夹在周边列强之间谋求生存、发展。因此在叙述“跨国历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时，需要其普遍性和必要性，但韩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虽然“东亚史”也属于跨国(跨国籍)历史意识的范畴之一，但包括历史学术界在内，历史意识要扩散到普普通通的国民身上，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韩国学术界对基础研究的不振及多样性的缺乏，传统的民族主义历史意识，还没有形成能够收容“东亚史”的条件与社会气氛。而且韩国国民及大众比起历史的普遍性，对韩国历史内在的独立性及“历史主权”这一带有感性的用语或其概念，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考虑韩国社会情况，新设“东亚史”科目的确具有冒险性。“东亚史”是为了应对中国的“东北工程”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等东北亚的历史纠纷而设立的科目。它不仅反映了学术界、言论、市民运动团体的意见，还反映了政府的一些意图。今后，对此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批评，而且还会提出各种争论的焦点。

不过值得高度评价的是，韩国学术界与政府多采取的对应方向，并非是从强调“民族主义的情绪”或“重视主题(内容)的眼光”应对，而是从带有普遍性的眼光，加强教育与合作的方向予以应对。对“东亚史”科目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东亚史”科目提出了可以改善，直到目前为止以韩国历史或一个国家的历史为中心进行的韩国历史教育的可行性。

“东亚史”科目的开设目标，就在于超越韩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境界，形成“东亚”共同的民族特性，扩大对东亚地区的理解范围，谋求东亚地区和平与共同的繁荣。能否实现其目标，现在是很难进行判断。“东亚史”科目要在高中教育现场上站稳脚跟，有很多要亟待解决的课题。不过，如果“东亚史”科目在韩国的历史教育现场上得到成功，将给中日两国的历史教育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科目的落实及普及，予以积极的关心和有力的支持。

[要約文]

韓国の高校教育課程と科目としての「東アジア史」

張世胤（東北亜歴史財団）

2000年代初め、韓国と中国、日本と韓国、日本と中国との間で、相互の歴史認識に関する対立が生じた。そこで、こうした対立と葛藤を解消する方策の一つとして、日中韓3カ国の歴史を「東アジア史」というカテゴリーで捉えて生徒に教えることが提案された。

韓国の当時の教育人的資源省（現在の教育科学技術省）が2007年2月に発表した「2007年改正教育課程案」は、日中韓3カ国の中で初めて「東アジア史」という新しい科目を選択科目として採択した。これに伴い、韓国の2～3社の出版社が現在「東アジア史」の教科書を開発しており、今後、検定・審査を経て2012年には正式に教科書として使用される予定である。

「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は、実際に高校2～3年生で選択科目として授業が行われる予定である。そのために「東アジア史」の具体的なシラバスを策定し、適切な教科書を開発する必要がある。また、東アジア史の教育に必要な様々な資料を開発し、具体的な授業方法も多様に論議する必要がある。

一方、2008年2月に発足した李明博政権は最近、それまでの盧武鉉政権の歴史教育強化方針とは異なった教育過程改編案を発表し、これに対する議論が現在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る。今年9月末に発表され、論議になっている「2009年改正教育過程（試案）」は、学習者の負担軽減のために科目数を減らすなど、盧武鉉政権の歴史教育強化方針の内容を覆すものだと言われている。そのため「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が、予定通り2012年から高校の教育過程として実際に採択されるのかについて、議論が起きている。

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を正しく教えるためには、現実的に多くの困難と制約がある。例えば「東アジア」の概念と地理的範囲の問題、日中韓3カ国のそれぞれの認識と感情の違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有無、効果的な授業教材や研究書の不足など、「東アジア史」の研究と教育過程にかなりの問題点と現実的な困難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現実的な困難に関わらず、「東アジア史」の研究・教育の必要性和妥当性について、多くの人がその意義を強調しているのも事実である。

東アジアの日中韓3カ国には葛藤要因も潜在しているが、むしろ真の理解、相互連帯、平和共存の必要性が、いつにもまして切実になっていると言えよう。今年9月16日、日本で「アジア重視」を標榜する鳩山由紀夫総理が就任し、鳩山総理と与党・民主党が「東アジア共同体」を提案したことで、日中韓は今後かなりの期間、和解ムードが醸成されると考えられる。特に日本の外相による「日中韓共同歴史教科書」の提案は、東アジアの歴史的な葛藤と領土（領海）問題の解決に、一つの糸口を提供している。

もちろん「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想の背景とその実体についても様々な議論があり、共同歴史

教科書や教材（副教材）の開発も日中韓の合意に基づいて進めるなら、構想の実現までには、長期間に渡る忍耐と対話の時間が必要であろう。李明博政権の「実用重視」という政策基調に基づき、中国の「東北工程」や日本の「歴史教科書問題」などへの対応策の一つとして2007年から準備されている「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は、ひとまず予定通り新設される見込みだが、長期的に存続できるかは、まだはっきりと断言できない。

韓国で「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の開設に伴って教科書が発行され、その教科書で韓国の生徒が、韓国だけでなく日本、中国、ベトナムなど東アジアの歴史、文化、人的交流、相互理解について学習するという構想は、間違いなく新しい試みと言ってもよいだろう。本発表者は、「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が日本と中国でも採択され、育ち行く生徒らに教育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る。「日中韓共同歴史教科書（あるいは教材）」が発行され、日中韓3カ国の生徒がこうした教科書で隣国を正しく理解し、真の歴史意識を形成するための方策も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現代の歴史学の普遍的な傾向は、時代遅れの（？）「民族主義」や「国家主義」の悪影響を強く批判し、自由かつ創造的で多様な歴史観を強調している。しかし、いまだに「南北統一」という民族の至上課題が残っており、周辺の列強の狭間で生存しつつ発展を図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運命を持つ韓国社会では、「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 (Transnational History)」について語るには、その普遍性と必要性にも関わらず、まだ多くの問題点があると考ええる。「東アジア史」も超国家（超国籍）的な歴史認識の一例だが、歴史学界だけでなく一般の人々にもこうした歴史認識が広がるまでには、相当な期間を要すると予想される。なぜなら、韓国学界の基礎研究と多様性の不足、民族主義的な歴史認識の伝統など様々な事情によって、そうした議論を受け入れられるほどの条件が、まだ整っていないと考えるからである。また、韓国国民ら一般の人々にとって、歴史の普遍性よりも韓国史ならではの独自性、「歴史主権」という感性的な用語やその概念が、相当な説得力と訴求力を持つと考える理由も、そこにある。

韓国社会の現実を考えると、「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の新設は、明らかに一種の冒険と言えよう。「東アジア史」は、中国の「東北工程」や日本の「歴史教科書問題」など、北東アジアの歴史問題への対応の一環として新設される科目であり、学界、マスコミ、市民運動団体の意見が反映されており、政府の意図も一部反映されている。またこの科目に関して、様々な争点と批判が提起される可能性もあるだろう。

しかし、韓国学界や政府レベルで「民族主義的感情」や「主体的視点」を強調するのではなく、普遍的な視点や近隣諸国との交流・協力を強化する方向での対応という点は、非常に高く評価できよう。「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に対する評価は、現状では意見が分かれている。しかし「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が、これまで国家史や一国史を中心に進めてきた韓国の歴史教育の方向性改善の可能性を示したという点は、十分に認められるだろう。

「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が、果たして韓国史と世界史の境界を超えて「東アジア史」という共同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形成し、東アジア地域に対する理解を広めて、同地域の平和と共同繁栄を図るという本来の開設目的を達成できるかは、まだ定かではない。また「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が、高校の教育現場で正しく定着するためには、解決すべき課題も多い。しかし、韓国の歴史教育の現場で「東アジア史」という科目がしっかりと定着すれば、今後、日本と中国の歴史教育にも一定の影響を及ぼすと予想されるため、こうした科目の普及と定着のために積極的な関心と支援が必要だと言えよう。

歷史理解的單位

：1930年霧社事件的記憶與詮釋

■ 吳 密 察 (國立成功大學) ■

歷史理解的單位

－ 1930年霧社事件的記憶與詮釋 －

吳 密 察（國立成功大學）

一、前 言

一般当我们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个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的「单位」，而且这个「单位」经常是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检讨地存在著了。而且，当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的主体就存在那个「单位」当中的时候，历史就成为了我/我们的历史。这样的时後，历史很难成为这个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之主体的对象，而将会使原来应该成为被叙述、分析、理解、评价之对象的历史，与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之主体形成纠缠不清的反覆关系。

近代以来，「国家」与「民族」成为最经常被使用的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的单位。「国家」与「民族」成为我们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的重要概念，也同时形成了我们叙述、分析、理解、评价历史的框架。但是，「国家」与「民族」，对于既经存在过的经验（历史）来说，不但是一个後设的概念与框架，在时间之流中，它们也不是始终一样，而是变动不同的。

本文就是在透过近年来对于1930年一个被视为抗日事件的雾社事件之研究与诠释，来思考历史理解的复杂性。

二、所謂霧社事件

所谓的雾社事件，是指日本统治台湾的1930年底至1931年之一连串事件的整体。首先是1930年10月27日Seedeq赛德克族之6个Tkdaya部落（Mehebu、Truwan、Boarung、Suku、Gungu、Drodux）¹⁾，趁著台湾中部山地的雾社地区举行运动会，日本殖民高官群集之际，爆发的大规模抗日出草事件。此事件使日本人有134人被杀死亡（另有2名台湾人因身穿和服，因此被误杀死亡）、215人受伤，雾社地区多数的日本警察分驻所被蜂起的原住民攻击，雾社地区完全被原住民占领。接著的是，日本殖民政府於10月31日起，调遣大量军队、警察武力进入山地讨伐雾社地区之「反叛蕃」，原住民败走藏匿於深山密林的岩窟，日方军警以火炮、飞机对原住民藏匿之密林进行轰炸，原住民除少数妇人、老人、小孩投降之外，其余原住民因为经不起日方军警的攻击和持久的藏匿，纷纷自杀。此次征伐，原住民总计死亡644人（其中296人系死於自杀）。事後，日本官宪将6个部落的余生者及少数散居的Toda和Truku共561人，强制收容於Sipo与Drodux两个地方为「保护蕃」。1931年4

1) Seedeq原被劃歸Atayal泰雅族之一支，但2008年4月臺灣政府已經承認其為臺灣原住民獨立之一族。據說Tkdaya是他Atayal鄰支Doda稱呼Tgdaya時的說法，如果Tgdaya自稱的時後則是用Tgdaya。本文對這兩種拼音，乃是依方便混雜使用，並沒有嚴格的主從之分。

月25日清晨，在日本官宪的操纵和默许下，与Tkdaya夙有嫌隙的Toda、Truku壮丁袭击Sipo、Drodux的「保护蕃收容所」，结果有216名「保护蕃」在熟睡中被杀。1931年5月6日，抗日余生者298人中除了病患之外的278人，被强制安置於一个日本统治者规划的新部落川中岛。1931年10月15日川中岛驻在所召集106名余生者赴埔里参加归顺仪式，结果其中的38名被以「曾经参与雾社蜂起事件」为由下狱，最後这些人都「因病死於狱中」。

另外，为了使以下的叙述比较容易理解，在此需要将此事件相关的台湾原住民之分类，稍做说明。

台湾原住民被认为有好多「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学者和政府，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原住民分成数目不同的「族」），「族」之下再分成几个「亚族」，「亚族」之下再分成几个「群」，「群」之下则分成几个「部落」。一般来说，原住民对于群体的归属感，依照「部落」、「群」、「亚族」、「族」递减，甚至在日本统治时代之前，原住民还很难说有「族」的归属感。

雾社事件相关的原住民，最主要的是泰雅族赛德克亚族的雾社群，下图中以黑体字标示的，就是当初蜂起的六个部落，以斜体字标示的三个部落是当初拒绝跟六个部落一起起事的三个部落。

泰雅族

1. 泰雅亞族 (Atayal/Tayan)
 - A. 賽考列克群 (Seqoleq/)
 - B. 澤敖列群 (Tseole)
2. 賽德克亞族 (Sedeq/Sejiq/Sediq/Seediq)
 - A. 霧社群 (Tkdaya)
 - a. *Paran*
 - b. *Qacoq*
 - c. *Tkanan*
 - d. Tongan
 - e. Muwanan
 - f. Sipo
 - g. **Mehebu**
 - h. **Suku**
 - i. **Turuwan**
 - j. **Gungu**
 - k. **Turotux/Drodux**
 - l. **Boalon/un**
 - B. 道澤群 (Toda)
 - C. 太魯閣群 (Truku)

三、回顧霧社事件的研究

被认为是雾社事件研究的先驱成果，戴国辉编著『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资料』（东京：社会思想社，1981年）一方面在其『资料编』中收集了事件後日本殖民政府方面的报告书：（1）生

驹高常（拓务省管理局长）『雾社蕃骚动事件调查覆命书』、（2）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雾社事件志』、（3）台中州能高郡警察课『關於雾社事件的概要说明书』、（4）服部兵次郎（台湾军参谋陆军步兵大佐）『關於雾社事件』。囊括事件之後，日本中央政府的报告书和台湾总督府警察机关、台湾军方面的事件报告书。也就是当时必须面对抗日事件的日本统治者之政府机关的公式报告书。在其『研究编』，除了戴国辉所写的两篇呼吁後人应该认识雾社事件这种殖民地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章之外，还有：（1）小岛丽逸「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山地支配一到雾社事件为止」、（2）宇野利玄「台湾的『蕃人』教育」、（3）田中宏「台湾总督府的人力资源掌握与高山族政策」、（4）春山明哲「昭和与政治史上的雾社蜂起事件」、（5）松永正义「日本国内媒体界内的雾社蜂起事件反响」、（6）河原功「在日本文学史上雾社蜂起事件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论文基本上并没有正面研究雾社事件，而是在研究日本殖民政府对於台湾原住民的统治、教育政策，及雾社事件對於日本政界的冲击、媒体、文学對於雾社事件的报导与描写。这部關於雾社事件的前驱性研究，除了对雾社事件做出了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前述的基础报告书之复刻之外，收录於『资料编』中，春山明哲编「雾社蜂起事件日志」、河原功编「雾社蜂起事件关系文献目录」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重要基础工作成果）之外，还是只在雾社事件的外围梭巡，我们對於雾社事件的了解还是来自於当年殖民政府镇压者侧的报告书。因此，戴国辉编著『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资料』这部重要的先驱研究著作的意义，与其说是對於雾社事件做出了研究，倒不如说是反映了雾社事件研究的本质性困难。

雾社事件研究的本质性困难，首先要举出来的是，史料一边倒地是日本殖民政府所留下来的。除了上述那些官方在事件之後所做成的报告书之外，在总督府、军部和警察官厅的档案中，也留下不少当时调度军警投入征伐「凶蕃」的资料²⁾。透过这些日本方面的史料，我们可以重建事件发生之後总督府的作为与军队、警察进行征伐的细节。但是，因为蜂起的「凶蕃」几乎全部都已经在日方军警的镇压过程中被歼灭或自杀了，因此蜂起侧起事的原因、行动的准备等，都只能停留在日本官方於事後单方面所推测的程度。

由於从文字史料的存在情况来看，镇压者方面几乎壟断了对事件之性质与细节的发言权，因此如何让蜂起者、被镇压者、被杀者方面说话，就成为研究雾社事件时必须面对的方法论难题。为了使蜂起者、被镇压者、被杀者方面「发言」，战後诸多關於雾社事件的研究，就必须从收集证言开始。因此，除了一些以小说形式表述的雾社事件之外（这些小说大多在处理为何Mona Rudaw³⁾要领导族人展开蜂起抗日？花冈一郎、花冈二郎如何决定就死？⁴⁾），战後的雾社事件研究就是要让在事件中幸免一死的台湾原住民开口说话。⁵⁾自从1980年代之後，有关雾社事件的几本重要著作，例

2) 關於霧社事件的官方文獻數量極多，除了戴國輝前揭書所收錄者之外，山邊健太郎編輯『現代史資料 22 臺灣』（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年），也收錄了不少官方的相關資料。近年也有不少資料被復刻，例如收錄在春山明哲編解說『台灣霧社事件軍事關係資料』（東京：不二出版，1992年）之『昭和五年台灣蕃地霧社事件史』、『霧社事件陣中日誌』、『霧社事件關係陸軍大臣官房書類綴』、『昭和五年台灣霧社事件給養史』。至於臺灣總督府檔案，目前則以『石塚英藏文書』的形式，輾轉入藏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這些總督府的檔案，是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的秘書官山本光雄捐贈給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史料編纂所的小西四郎教授曾經對此批檔案做過簡要的介紹。山邊健太郎曾將其中的一部份檔案收入上揭『現代史資料 22 臺灣』。另外，軍部與外交檔案則藏於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 Mona Rudaw是 Mahebu部落的頭目，被認為是領導此次抗日蜂起事件的主要人物。

4) 花岡一郎、花岡二郎是受到日本殖民者刻意栽培的Seedeq原住民青年，接受日本的高等教育之後被派遣在霧社地方擔任警察，霧社事件蜂起後被發現留下遺書自殺。

5) 戰後截至1980年以前關於霧社事件的書目，可以參考：河原功「霧社蜂起事件關係文獻目錄」，收入戴國輝編著『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東京：社會思想社，1981年）。同樣是戴國輝領導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成員的中村ふじゑ，也長期在霧社地區對霧社餘生者進行口述採訪，她在2000年出版了長期關注霧社事件的調查研究成果：『オビンの伝言—タイヤルの森をゆるがせた台湾・霧社事件』（東京：梨の木

如：阿威赫拔哈著/许介麟编『证言雾社事件——台湾山地人の抗日蜂起』（东京：草风馆，1985年）、比荷瓦历斯（高永清）著/加藤实编译『雾社绯樱の狂い咲き一虐杀事件生き残りの证言』（东京：教文馆，1988年）、柳本通彦『台湾雾社に生きる』（东京：现代书馆，1996年）、林えだい『台湾秘话 雾社の反乱・民众側の证言』（东京：新评论，2002年），莫不是企图从与官方镇压者不同的角度来让事件残存者说话。

四、晚近被召唤出来的雾社事件記憶

但是，晚近台湾对于雾社事件的了解，则很令人惊讶地，是由一个对原住民文化有相当兴趣的青年漫画家开启的。1990年，一位年轻的漫画家邱若龙出版了一本他参考日本时代的官方报告书并加上部落调查而绘制的漫画书『雾社事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0年）⁶⁾。这本漫画书首次以比较精确的笔调将雾社事件的全貌叙述了出来。⁷⁾由于这是一部作者累积绵密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原住民服饰调查，精心绘画的具有相当事实考证的漫画，因此引起不小的回响，可以说这本漫画为台湾的雾社事件认识带进了新阶段。

1990年代末期，关于雾社事件的重要著作是邓相阳『雾社事件』（台北：玉山社，1998年）、『雾重云深——雾社事件後一个泰雅家庭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8年）、『风中绯樱——雾社事件真相及花冈初子的故事』（台北：玉山社，2000年）三连作。⁸⁾其中，『雾社事件』以日本时代的民族学著作和关于雾社事件的官方报告书为基础，整理了雾社一带的原住民之族群关系和雾社事件。『雾重云深』及『风中绯樱』则追踪多个日本殖民地时代雾社地区「理蕃」警察与台湾原住民政略结婚的家庭，及这些被认为造成雾社地区原住民蜂起之「理蕃」警察的子女在事件後如何背负著罪恶生活下来的故事。这种具有报导文学性质的雾社事件描写之能够出现，显然是作者经过长期、绵密的田野采访调查，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局限以日本殖民者侧的官方报告书、档案作为了解雾社事件的依据了。原本以日本non-fiction作家为主，以采集幸存者之证言为主要材料进行写作的方法，已经在台湾的作家身上展现出来，而且不论在采访的深度或广度上都令人有惊艳之感，尤其从「和蕃政策」⁹⁾入手的描写，颠覆了长期以来「原住民vs.日本殖民者」、「受害者vs.加害者」这种对于雾社事件理解的简单对立图式，为雾社事件的了解大大地扩大了视野。

也就在邱若龙、邓相阳关于雾社事件的著作相继出版大约同时期，原住民社会内部也有两项重要的历史采访工作正在进行。

一项是简鸿模、依婉·贝林夫妇，以十馀年的岁月所进行的Tkdaya部落生命史调查。简鸿模是关怀原住民文化与社会前途的宗教学者，依婉·贝林则是Tkdaya人，他们在1990年代晚期开始进行部落生命史的调查。十馀年来，陆续将Tkdaya的所有部落都逐户进行了系谱调查，并同时进行了口述的采

舍，2000年）。

6) 1993年，这本漫画书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邱若龙繪製，江淑秀、柳本通彦翻譯『霧社事件—台湾先住民(タイヤル族)、日本軍への魂の闘い』（東京：現代書館，1993年）。

7) 在此之前的1957年、1965年，霧社事件曾經被拍成電影『青山碧雪』、『霧社風雲』。1973年、1977年，鍾肇政、陳渠川曾經以小說方式描寫霧社事件：鍾肇政『馬黑波風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陳渠川『霧社事件』（台北：地球出版社，1977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學者李永熾也參考日本官方文獻，以小說的方式描寫了霧社事件：李永熾『不屈的山嶽：霧社事件』（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1977年）。

8) 三連作曾經由下村作次郎、魚住悦子摘譯為日文出版：『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日本警察官の家族たち』、『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0-2001年）。

9) 所謂和蕃政策，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政策性地推動，以日本人理蕃警察與原住民女子政略結婚的政策。

访。¹⁰⁾他们的采访「以老人的记忆回溯为优先，详实记载每位受访老人所能溯及的家族亲戚关系、原住民传统名字、中文名字、生死年代、教育程度、谋生职业、宗教信仰及重大历史事件参与等资料，最後由家庭图中的人物典故来叙述神话传说、Gaya、部落迁徙、传统生活等内容，藉此让过去百年来的部落文化活化与重现」（『清流』-17）。也就是说，这项「部落生命史」的采集工作，是以口述采访的方法，企图重建部落里每一个家族的系谱家族树，并记录可以采访得到的每一个人生涯里的重要事迹和回忆，因此它也同时得以展现近百年来原住民部落的历史及文化变迁。

雾社蜂起事件6部落的馀生者所被安置的「川中岛」，目前被称为清流部落。简鸿模、依婉·贝林与郭明正在『清流部落生命史』中对于雾社蜂起事件之6部落的馀生者的每一个家户都做了系谱调查与口述采访。三位调查者在调查之后指出，因为雾社事件的死伤太过惨重，清流部落各家族在雾社事件前的面貌（即1930年以前）已不可能，经常只能溯及迁居川中岛后的家族。不过，这个对清流部落的全面性调查，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例如，傅阿有（Tiwas Pawan）口述的「莫那·鲁道和他的歌」（『清流』，525-548），和几个老人关于雾社事件的直接证词。

简鸿模、依婉·贝林的调查势必要面对Seedeq族群当中重要的历史事件——雾社事件。这个调查，使原住民们有机会对于雾社事件表示看法。到底在八十年后，原住民们如何理解雾社事件呢？Mahebo等六个抗日部落的男人们几乎在事件中都死了，留下来的只是妇女和当时的小孩子们。他们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蜂起出草的情景和日本军警的讨伐，以及他们当时逃难的辛苦和恐惧。但是，这个调查也突显出另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如果抗日6部落的蜂起是值得肯定的英勇义举，那麽没有参加蜂起行动的其他Tkdaya部落，应该如何评价呢？简鸿模认为鉴于以往被日本殖民者征伐与挑动夙有嫌隙原住民同胞相残的教训，这些没有参加抗日而选择自保的部落应该要被尊重，「雾社事件中扮演折冲角色的Paran社头目Walis Buni不应被污名化，……故意模糊或忽略他挽救Tkdaya免遭灭族的努力」、「让Paran社逃过一劫的Walis Buni的明智与折冲，帮Tongan社拒绝参与雾社事件的头目Taba Kumu，他们保住Tkdaya命脉的功劳，不应被遗忘。」（『中原』，39）对于这些当年没有参与蜂起的Tkdaya来说，Mona Rudo并不是英雄，「面对陈年往事时，其感受是相当复杂的，往事不堪回首，多数的老人宁可选择遗忘，不再主动提起此事。」（『中原』，38）。

如果说，简鸿模、依婉·贝林所进行的是一种抹去伤痕的工作，那麽另一项比较大规模的雾社事件调查，则是充满著矛盾的张力。

Kumu Tapas（姑目·荅芭丝）在2000年至2002年间，就雾社事件做了86人次的口述采访工作。姑目认为截至目前为止关于雾社事件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译自日文的论著。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日本官方版的历史文献。其实，无论是日本学者、汉人学者、原住民菁英，或是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它们几乎都是在日本的官方版的文献上建立他们论述的基础。」（II-17）而且，她也批判以往即使有少数原住民从原住民的内部表述了雾社事件，但是这几个原住民菁英「他们所呈现的雾社事件的历史图像，循著日本官方文献〔诠释成是〕以Mona Rudaw作为领导人物，带领几个Tkdaya部落的抗日行动。」（II-17）这的确是非常严厉而激进的批判性意见。¹¹⁾因此，姑目决定不只采访那些经常代表原住民出面讲述雾社事件的原住民菁英，而将采访的对象包括「从历史文献已经稍有出现，后来汇聚在Gluban（川中岛、清流）部落的发动抗日六个Tkdaya部落，扩展到当时没有参加抗日行

10) 简鸿模、依婉·贝林『Alang Baiqe（眉溪部落）生命史』（埔里：中华民国台湾原住民同舟协会，2002年）、『清流部落生命史』（作者加入郭明正。2002年）、『中原部落生命史』（2003年）、『从杜鲁湾东迁花莲Tkdaya部落生命史』（2005年）

11) 根据Kumu Tapas的说法，她之所以积极进行赛德克人的口述采访是受到我于2000年10月21日「雾社事件七十週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席上发言的刺激。参照：Kumu Tapas（姑目·荅芭丝）『部落记忆—雾社事件的口述历史 II』（台北：瀚芦图书公司，2004年），页3。

动的Tkdaya部落，以及Toda与Truku地区赛德克部落人民的声音」（II-20）。结果，她分别访谈了86人次，访谈的对象包括赛德克Toda、Truku、Tkdaya共14个部落的原住民，这些人年龄最高的是90岁（也就是雾社事件发生时已经20馀岁），最小的是48岁（也就是战后才出生）。甚至还有少数布农族和平埔族原住民。她采访的内容，除了直接关于雾社事件之外，还包括受访者的生命史、赛德克部落的传统文化概念、日警统治下的部落生活、不同部落与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她希望「透过受访人口述史料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图像，许多属于个人性的零碎、片段、杂乱、多元、反覆、歧异的部落记忆，编织成一个雾社事件的部落观点」（II-17），这就是她的硕士论文，也就是『部落记忆—雾社事件的口述历史 I. II.』（台北：瀚芦图书公司，2004年）。

Kumu Tapas（姑目·荅芭丝）采访得到的这些口述，不但生动地表现了到目前为止仍然鲜活地留在原住民脑海中的雾社事件，而且呈现出不同的个人、人群对于数十年前发生之雾社事件的不同诠释。姑目说：「Seedeq对于雾社事件的历史，他们仍然持有相当分歧与多元的看法」（II-16）。姑目的这个雾社事件的口述调查，开始于对既有雾社事件叙述的反省与批判，终于开启了另一个一直被漠视的内部争议。如果姑目从不满意日本官宪版本的雾社事件，就必须从台湾原住民的内部去追究雾社事件，但是什么是台湾原住民的内部观点呢？姑目既然不满意从来以「原住民菁英」¹²⁾独占了雾社事件的叙述与诠释，那么要由哪些人来叙述、诠释雾社事件呢？Mahebo等抗日六部落，固然是雾社事件的主角，但是其余没有参与抗日的Tkdaya部落，是否就是英勇的雾社抗日事件之怯懦的「落跑者」呢？被日本官宪挑动攻击抗日六部落的「味方蕃」，是不是也有他们不同的雾社事件诠释呢？姑目的问题提起与口述采访，让一些以前隐藏在水面下的关于雾社事件的不同诠释一齐喷出了。可以说，姑目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事件姑目引起的争议，不能只是将视为是因为姑目自己的族群立场所致，¹³⁾它应该也是目前历史学的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五、結語

长期以来，像台湾原住民这种没有文字的民族之历史，都是由具有文字的他者（other），尤其是外来统治者（殖民者）所书写的。这些外来统治者（殖民者）的历史书写，当然充满了偏见与不足。如今我们虽然可以利用日本统治者的档案重建殖民者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征伐，却不能了解台湾原住民如何发动雾社事件。因此，原住民的历史，就成了被统治、被征伐的历史。所以，在原住民的内部找寻历史，便成为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

但是，原住民内部的历史如何获得呢？即使是原住民的内部，仍然存在著各种不同的雾社事件记忆与诠释。殖民时代以来的原住民菁英（其实，他们也就是当年与殖民者合作的人），在战后仍然是代表原住民讲话的主要人物，只是他们如今叙述的雾社事件历史重点改变了，诠释有了微妙的变化。不过，更根底的问题是到底历史叙述的单位如何划定呢？

近代历史学与近代nationalism的共生关系，已是一般的常识，而且也已经被加以反省。但是，实际从事历史叙述、分析时，尤其是面对殖民史的时候，以「殖民民族vs.被殖民民族」理解图式进行

12) 姑目所谓的「原住民菁英」似乎指的是类似花冈二郎的夫人（高彩雲）与其家族这种经常被徵询雾社事件的原住民。

13) 姑目自称是Toda。见其著书II-19。姑目所引发的争议，应该还只是开始。例如，简鸿模在其『清流部落生命史』中对于雾社事件七十週年的研討會中缺乏清流部落的人参加，而多由Doda、Truku发言，就质疑其正当性。见前揭书，页51-52。

历史叙述仍然是最常见的方式。战後初期的台湾，由於中国国民党强力地以中国民族主义覆盖了一切历史叙述，因此雾社事件被理解成是「中华民族台湾原住民反抗殖民地暴政」的英勇抗日事件，Mahebo的Mona Rudow就成为领导反抗的（中国）民族英雄。

但是上述「殖民民族vs.被殖民民族」理解图式中的「被殖民民族」显然是後设的，这个後设的「被殖民民族」如今遭受到严重的质疑。首先，中华民族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被创造出来，而且得到丰富意义的近代概念。这种20世纪才具有丰富的近代意义之概念，难以将当年处於殖民地状态的台湾含括进去，尤其与台湾的原住民之间就更加地遥远了。从目前透过口述采访所得的原住民之雾社事件记忆与诠释来看，不但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无法使用於雾社事件，即使「台湾原住民」这样的概念也难以用来理解雾社事件。原来，即使过了八十年，台湾的原住民内部對於当年的雾社事件这麼重大的历史事件，仍然还没有一个彼此都可以认同的叙述单位。

当历史叙述的单位不再是与民族主义的范畴（不论它是中国民族主义、台湾民族主义，或者是台湾原住民民族主义）相同时，自然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史」、「国家（民族）史」理解出现破绽。於是，随著大家脱离原来的民族主义范畴，另以其他的单位理解历史时，對於相同的一个历史事件，就会发展出全然不同的历史诠释。与「东亚史」的提法一样，目前台湾关於雾社事件的理解争议，可以说也是「後民族主义史学」的一种动向。

역사 이해의 단위

- 1930년 우사(霧社) 사건의 기억과 해석 -

우미차 (國立成功大學)

I. 들어가며

일반적으로 역사를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할 때, 우리는 역사를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하는 ‘단위’를 이미 상정하는 셈이며, 이 ‘단위’란 너무나 당연시되어 검토의 대상조차 되지 않는다. 또한 역사를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하는 주체가 그 ‘단위’ 안에 존재할 때, 역사는 곧 나/우리의 역사가 된다. 이러할 때 역사를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하는 주체의 대상으로 역사가 자리잡지 못하고, 본래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의 대상이 되어야 할 역사가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하는 역사의 주체와 서로 명료하게 구분되지 않는 반복 패턴을 보이게 된다.

근대 이후 ‘국가’와 ‘민족’이 역사를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할 때 가장 보편적으로 사용되는 단위가 되면서, 역사를 기술·분석·이해·평가하는 중요한 개념과 패러다임을 형성하였다. 하지만 국가와 민족이란 이미 존재한 경험(역사)에 비해 나중에 설정된 개념이자 패러다임이며, 게다가 시간의 흐름 속에서 늘 바뀌기 때문에 시종 일관하지 못한 존재이다.

본고는 1930년 항일 사건으로 간주되는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최신 연구와 해석을 통해서, 역사 이해의 복합적 측면을 고민하고자 한다.

II. 소위 우사사건

소위 우사사건이란 일본이 타이완을 통치하던 1930년 말에서 1931년까지 일어난 일련의 사건의 총칭이다. 먼저 1930년 10월 27일 Seedeq족의 6개 Tkdaya 마을(Mehebu, Truwan, Boarung, Suku, Gungu, Drodux)¹⁾이 타이완 중부 산간 우사(霧社) 지역에서 운동회가 열리면서 일본 식민지 고관이 모여드는 것을 노려 일으킨 대규모 항일 사건이다. 이 사건으로 일본인 134명이 사망하고(이 밖에 타이완인 2명이 일본 복식때문에 오인 사망), 215명이 부상을 입었다. 현지 일본 경찰 분주소(分駐所)가 봉기 원주민의 공격을 받으면서 우사 지역은 원주민에게 완전히 점령되었다. 일본 식민 정부는 10월 31일부터 군대와 무장 경찰을 대거

1) Seedeq은 본래 Atayal에 속하는 것으로 분류되었지만, 2008년 4월 타이완 정부는 이미 타이완 원주민이라는 독립된 종족으로 인정하였다. Tkdaya는 Atayal의 방계 Doda가 Tgdaya를 부를 때의 호칭으로, Tgdaya가 스스로를 부를 때에는 Tgdaya라고 한다. 본고는 이 두 가지 표기법에 대해 엄격하게 구분하지 않고 편의에 따라 혼용한다.

파견하여, ‘반도번(反叛蕃)’ 즉 반란 지역 토벌에 나섰다. 패주하던 원주민은 깊은 산중의 동굴로 숨어 들어갔지만, 일본 군경은 대포와 비행기로 그들이 숨어 있는 밀림에 폭탄을 퍼부었고, 소수 여성과 노인 및 아이들만 투항했을 뿐 나머지 원주민은 일본 군경의 공격과 장기간 봉쇄를 견디지 못하고 자살하였다. 이 토벌로 인한 원주민 사망자는 총 644명(296명은 자살자)이었다. 사후 일본 관헌은 6개 마을의 생존자 및 흩어져 살고 있는 소수 Toda와 Truku 561명을 강제로 Sipo와 Drodux 두 지역에 수용하고 ‘보호번(保護蕃)’으로 지정하였다. 1931년 4월 25일 새벽, 일본 관헌의 묵인과 조종 하에 예전부터 Tkdaya와 사이가 좋지 않던 Toda, Truku 장정이 Sipo, Drodux의 보호번 수용소를 공격한 결과, 216명이 자다가 살해되었다. 1931년 5월6일 항일 생존자 298명 가운데 병자를 제외한 278명이 일본 통치자가 지정한 새로운 마을인 환중(川中) 섬으로 강제 이주당했다. 1931년 10월 15일 환중 섬 주재소는 106명의 생존자를 소집해 푸리(埔里)로 데리고 가 귀순 의식에 참석시키면서, 그 가운데 38명을 ‘한 때 우사 봉기에 참여’했다는 이유로 감옥에 가두었다. 결국 이들은 모두 ‘옥중 병사’하였다.

여기서 이어지는 기술에 대한 이해의 편의를 위해, 이 사건에 관련된 타이완 원주민 분류에 대해 약간 설명이 필요할 것 같다.

타이완 원주민은 여러 ‘족(族)’으로 나뉘고(시대마다 민족학자와 정부는 서로 다른 기준에 따라 원주민을 여러 ‘족’으로 분류), ‘족’은 다시 몇 개의 ‘아족(亞族)’으로 나뉜다. ‘아족’은 다시 몇 개의 ‘군(群)’으로 나뉘며, ‘군’은 다시 몇 개의 ‘부락(部落)’으로 나뉜다. 일반적으로 원주민의 집단 귀속 의식은 부락, 군, 아족, 족의 순서로 체감한다. 일본 통치 이전 원주민에게 ‘족’에 대한 귀속감이 있었다고 보기는 어렵다.

우사사건 관련 원주민은 주로 Atayal[泰雅]족의 Sedeq[賽德克]아족 소속 Tkdaya [霧社]군으로, 아래 도표에서 볼드체로 표시한 부락이 봉기를 일으킨 6개 마을이고, 이탤릭체로 표시한 부락이 거사를 거부한 3개 마을이다.

泰雅族

1. 泰雅亞族 (Atayal/Tayan)
 - A. 賽考列克群 (Seqoleq/)
 - B. 澤敖列群 (Tseole)
2. 賽德克亞族 (Sedeq/Sejiq/Sediq/Seediq)
 - A. 霧社群 (Tkdaya)
 - a. *Paran*
 - b. *Qacoq*
 - c. *Tkanan*
 - d. Tongan
 - e. Muwanan
 - f. Sipo
 - g. Mehebu
 - h. Suku

- i. Turuwan
- j. Gungu
- k. Turotux/Drodux
- l. Boalon/un
- B. 道澤群 (Toda)
- C. 太魯閣群 (Truku)

III. 우사사건 연구 동향

우사사건 연구 분야에서 선구자적 성과는 다이귀후이(戴國輝)가 펴낸 『타이완 우사 봉기 사건(台灣霧社蜂起事件): 연구 및 자료』(도쿄, 社會思想社, 1981년)로, 「자료편(資料編)」에 사건 이후 일본 식민 정부 측의 ①이코마(生駒高常, 척무성 관리 국장)의 「우사변 소요 사건 조사 복명서(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査覆命書)」, ②타이완 총독부 경무국의 「무사 사건지(霧社事件誌)」, ③ 타이중(台中) 주 녕가오(能高) 군 경찰과의 「우사사건에 관한 개요 설명서(關於霧社事件的概要說明書)」, ④하토리(服部兵次郎, 타이완군 참모육군 보병 대좌)의 「우사사건에 관하여(關於霧社事件)」와 같은 보고서를 수록하였다. 모두 사건 수습 이후 일본 중앙 정부의 보고서와 타이완 총독부 경찰 기관 및 타이완군의 사건 보고서들로, 결국 당시 항일 사건에 맞섰던 일본 통치자의 정부 기관 공식 보고서인 셈이다. 한편 「연구편(研究編)」에서는 우사사건과 같은 식민지 소수 민족 문제에 대한 관심을 호소하는 자신의 글 두 편 외에, ①고지마(小島麗逸)의 「일본 제국주의의 타이완 산지 지배(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山地支配)—우사사건까지(到霧社事件為止)」, ②우노 리겐(宇野利玄)의 「타이완의 ‘번인’ 교육(台灣的『蕃人』教育)」, ③다나카 히로시(田中宏)의 「타이완 총독부의 인력 자원 장악과 고산족 정책(台灣總督府的人力資源掌握與高山族政策)」, ④하루야마 메데츠(春山明哲)의 「쇼와 정치사의 우사 봉기 사건(昭和政治史上的霧社蜂起事件)」, ⑤마쓰나가 마사요시(松永正義)의 「일본 국내 미디어의 우사 봉기 사건 반향(日本國內媒體界內的霧社蜂起事件反響)」, ⑥가와하라 이사오(河原功)의 「우사 봉기 사건의 재일 문학사적 자리매김(在日本文學史上霧社蜂起事件的位置)」 등이 수록되었다. 이러한 연구 논문들은 우사사건을 직접적으로 연구했다기 보다는, 일본 식민 정부의 타이완 원주민에 대한 통치, 교육 정책 및 무사 사건으로 인한 일본 정계의 충격, 미디어의 보도, 문학적 기술 등에 대한 연구였다. 따라서 다이귀후이의 책은 우사사건에 대해 기초 자료를 정리했다는 의미 외에(전술한 기초 보고서 외에 「자료편」에 수록된 春山明哲의 「霧社蜂起事件日誌」와 河原功의 「霧社蜂起事件關係文獻目錄」은 중요한 기초적 성과임), 아직 우사사건의 외곽만을 빙빙 돌고 있으며,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우리들의 이해 역시 당시 식민 정부 진압자들이 쓴 보고서에서 출발하고 있었다. 따라서 다이귀후이의 『타이완 우사 봉기 사건: 연구 및 자료』라는 선구자적 연구서의 의의는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연구에 있다가 보다는 우사사건 연구의 본질적인 어려움을 반영한 데에 있었다.

우사사건 연구의 본질적인 어려움이란 먼저, 사료가 일본 식민 정부가 남긴 일방적인 자료라는 사실이다. 사건 이후 정부 측에서 작성한 상기 보고서들 외에, 총독부, 군부, 경찰 문서 가운데에도 ‘홍변(兇蕃)’ 진압에 동원된 군경들의 자료들이 있다.²⁾ 이러한 일본측 자료를 통해 우리는 사건 발생 이후 총독부의 행동과 군대와 경찰이 수행한 진압의 세부적 상황을 이해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봉기한 ‘홍변’은 일본 군경의 진압 과정에서 거의 전부 섬멸되거나 자살했기 때문에, 봉기 측의 거사 이유나 행동 수칙 등은 일본 정부의 사후 일방적인 예단의 수준에만 머무르고 있었다.

문자 사료의 보존 상황을 감안할 때, 진압자 측이 사건의 성격과 세부 정황에 대한 발언권을 거의 독점하고 있다. 이에 따라 봉기를 일으킨 이들, 진압당한 이들, 살해당한 이들의 발언 청취가 우사사건 연구의 당면한 방법론적 난제가 되었다. 그들의 ‘발언’을 위해, 전후 우사사건 연구는 증언 수집부터 시작해야만 했다. 따라서 소설 형식으로 기술된 우사사건을 제외하고는(이러한 소설들은 대부분 왜 Mona Rudaw³⁾가 부족민들을 이끌고 항일 봉기에 나섰는가? 花岡一郎과 花岡二郎은 왜 죽기로 결심했는가? ⁴⁾등을 다루고 있다.), 전후 우사사건 연구는 사건의 와중에서 요행히 살아남은 타이완 원주민들의 입을 열도록 만들어야만 했다. ⁵⁾1980년대 이후 우사사건 관련 중요한 저서는 아웨이허바하(阿威赫拔哈)와 쉬제린(許介麟)의 『證言霧社事件 臺灣山地人の抗日蜂起』(東京, 草風館, 1985년), 비허와리스(比荷瓦歷斯, 高永清)의 저서를 가토 마코토(加藤實)가 편역한 『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一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證言』(東京, 教文館, 1988년), 야나기모도(柳本通彦)의 『台灣霧社に生きる』(東京, 現代書館, 1996년), 林えだいの 『臺灣秘話 霧社の反亂・民衆側の證言』(東京, 新評論, 2002년) 등이 있으며, 모두 진압자와는 다른 시각으로 사건 생존자들의 말문을 여는 작업들이었다.

2)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정부 문헌의 숫자는 방대해서, 다이귀후이(戴國輝)의 전계서에서 수록한 자료 외에, 야마베 겐타로(山邊健太郎)의 『現代史資料22 臺灣』(東京, みすず書房, 1971년) 역시 꽤 많은 정부 관련 자료를 수록하고 있다. 최근 많은 자료가 출판되고 있는데, 하루야마 메데츠(春山明哲)의 『台灣霧社事件軍事關係資料』(東京, 不二出版, 1992년)에 수록된 『昭和五年台灣蕃地霧社事件史』, 『霧社事件陣中日誌』, 『霧社事件關係陸軍大臣官房書類綴』, 『昭和五年台灣霧社事件給養史』 등이 그 예이다. 타이완 총독부 파일의 경우, ‘에이조 이시즈카 문서(石塚英藏文書)’의 형식으로 떠돌다가 현재 도쿄대학 사료 편찬소에 소장되었다. 이 총독부 문서는 타이완 총독 에이조 이시즈카의 비서 야마모토 미츠오(山本光雄)가 도쿄대학 사료 편찬소에 기증하였으며, 사료 편찬소의 고니시 시로(小西四郎) 교수가 이에 대해 간단하게 소개한 바 있다. 야마베 겐타로는 이 가운데 일부 파일을 상계서 『現代史資料22 臺灣』에 수록하였다. 이 밖에 군부와 외교 문서는 방위청 방위 연구소와 외무성 외교 사료관에 소장되어 있다.

3) Mona Rudaw는 Mahebu부락의 우두머리로, 항일 봉기를 이끈 주요 인물로 평가된다.

4) 하나오카 이치로(花岡一郎), 하나오카 지로(花岡二郎)는 일본 식민주의자가 길러낸 Seedeq 원주민 청년으로, 일본에서 고등 교육을 받고 난 후에 우사 지역으로 파견되어 경찰이 되었고, 우사 봉기 이후 유서를 남기고 자살한 채 발견되었다.

5) 2차 대전 이후 1980년까지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참고 저서 목록은 다이귀후이(戴國輝)의 『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東京, 社會思想社, 1981년)에 실린 가와하라 이사오(河原功)의 『霧社蜂起事件關係文獻目錄』, 참고. 또한 다이귀후이가 이끄는 타이완 근현대사 연구회 소속 나카무라(中村ふじゑ) 역시 장기안 우사 지역 우사 생존자를 대상으로 구술 인터뷰 작업을 진행하고 그 성과를 2000년 『オビンの伝言—タイヤルの森をゆるがせた台湾・霧社事件』(東京, 梨の木舎, 2000년)로 펴냈다.

IV. 최근 되살아난 우사사건의 기억들

하지만 최근 우사사건에 대한 타이완의 이해를 이끌어 낸 것은 놀랍게도 원주민 문화에 상당한 관심을 가진 청년 만화가였다. 1990년 젊은 만화가 추뤄룽(邱若龍)은 일본 정부 보고서와 마을에 대한 조사를 참고하여 그린 만화책 『우사사건(霧社事件)』(타이베이, 時報出版公司, 1990년)을 출판하였다.⁶⁾ 이 만화책이 우사사건의 전모를 처음으로 정확하게 그려냈다. ⁷⁾작가의 철저한 현장 조사를 바탕으로 특히 원주민 복식을 완벽하게 고증하여 상당히 사실적으로 그려낸 이 만화는 꽤 큰 반향을 일으켰다. 따라서 이 만화책이 우사사건에 대한 타이완의 인식을 새로운 단계로 끌어올렸다고 평가할 수 있다.

90년대 말, 우사사건에 관한 중요 저작은 덩상양(鄧相陽)의 『우사사건(霧社事件)』(타이베이, 玉山社, 1998년), 『무중운심(霧重雲深)－원주민 가족의 이야기(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타이베이, 玉山社, 1998년), 『풍중비앵(風中緋櫻)－진실과 하나오카 하즈코 이야기(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타이베이, 玉山社, 2000년)의 삼부작이다.⁸⁾ 이 가운데 『우사사건』은 당시 일본 민족학 저서와 정부 보고서를 기반으로 우사 일대의 원주민 부족 관계와 우사사건을 정리하였다. 『무중운심』과 『풍중비앵』은 일본 식민지 시대 우사 지역 ‘리번(理蕃)’ 경찰과 타이완 원주민의 정략 결혼 가정과 우사 지역 원주민 봉기의 원인으로 간주되는 이들 ‘리번’ 경찰 자녀가 사건 이후 어떻게 죄악을 짊어지고 살아가는가에 대한 이야기이다. 보도 문학의 특징을 가진 이러한 우사사건 기술의 출현은 저자가 장기간 세심하게 현장 인터뷰와 조사를 진행했기에 가능했으며, 동시에 더 이상 일본 식민자 측의 정부 보고서와 문서에만 의존해 우사사건을 이해할 필요가 없어졌다는 의미였다. 본래 일본 non-fiction 작가 중심으로 형성된, 생존자 증언을 모아 기술하는 방법이 타이완 작가를 통해 구현된 것으로, 인터뷰의 깊이나 폭이 모두 놀라웠다. 특히 ‘화번정책(和蕃政策)’⁹⁾에 주목한 기술은 그 동안 우사사건 이해 측면에서 ‘원주민 vs. 일본 식민주의자’ 또는 ‘피해자 vs. 가해자’와 같은 단순한 대립항을 전복시키면서, 우사사건 이해의 시야를 크게 확대하였다.

추뤄룽과 덩상양의 우사사건 관련 저서의 잇따른 출판과 거의 비슷한 시기에, 원주민 사회 내부에서도 두 가지 중요한 역사 인터뷰 작업이 진행되고 있었다.

하나는 첸홍모(簡鴻模)와 이완·바이린(依婉·貝林) 부부가 십여 년의 세월 동안 진행한 Tkdaya부락 생명사 조사였다. 첸홍모는 원주민 문화와 사회의 미래에 관심을 가진 종교 학자였고, 이완 바이린은 Tkdaya사람이었다. 두 사람은 90년대 말부터 마을 생명사 조사를 시

6) 1993년 이 만화책의 일역본이 일본에서 출판되었다. 邱若龍 그림, 江淑秀&柳本通彦 번역 『霧社事件－台灣先住民(タイヤル族)、日本軍への魂の闘い』(東京, 現代書館, 1993년)

7) 이보다 앞서 1957년과 1965년에 우사사건을 소재로 한 영화로 『靑山碧雪』과 『霧社風雲』이 있었다. 1973년과 1977년 鍾肇政과 陳渠川은 다음과 같이 소설 형식으로 우사사건을 기술하였다. 鍾肇政, 『馬黑波風雲』(타이베이, 商務印書館, 1973년), 陳渠川 『霧社事件』(타이베이, 地球出版社, 1977년) 이 밖에도 역사학자 李永熾 역시 일본 정부 문헌을 참고하여 소설 형식으로 우사사건을 기술하였다. 李永熾, 『不屈的山嶽：霧社事件』(타이베이, 近代中國雜誌社, 1977년)

8) 삼부작은 下村作次郎과 魚住悦子の 발췌 번역으로 일본어로 출판되었다. 『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 『日本警察官の家族たち』, 『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오사카, 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 2000-2001년)

9) ‘和蕃政策’이란 일본 식민 통치자가 정책적으로 일본인 리번(理蕃) 경찰과 원주민 여성의 정략 결혼을 추진한 정책이다.

작해, 십여 년 동안 모든 Tkdaya 마을을 가가호호 방문하여 계보를 조사하면서 구술 인터뷰를 진행하였다. 10) 그들의 인터뷰는 “노인의 기억을 더듬는 것을 시작으로, 기억해 낸 모든 혈연 관계, 원주민 전통 이름, 중국어 이름, 생몰 연대, 교육 수준, 직업, 종교, 역사 사건 참여 등 자료를 상세하게 기재하고, 마지막으로 가족 관계도 속 인물의 전고를 가지고 신화 전설, Gaya, 부락 이동, 전통 생활 등의 내용을 기술하는 방식으로, 과거 백년의 마을 문화를 재현하였다.”(『清流』-17) 이 ‘부락 생명사’ 채집 작업은 구술 인터뷰 방식으로 마을 모든 가족의 가계도를 그려내고, 인터뷰 가능한 모든 이들의 생애에서 중요한 사적과 기억을 기록한 것이다. 이에 따라 과거 백년 동안 원주민 부락의 역사와 문화 변천을 그려낼 수 있었다.

우사 봉기 사건의 6 부락의 생존자를 이주시킨 ‘환중 섬’은 현재 청류(清流) 부락이라고 부른다. 젠홍모 & 이완바이린 및 귀밍정(郭明正)은 『청류 부락 생명사(清流部落生命史)』에서 우사 봉기 사건을 일으킨 6부락의 모든 생존자 가정을 대상으로 계보 조사와 구술 인터뷰를 진행하였다. 조사 이후 세 명의 조사자는 우사사건의 피해가 너무나 처참해 청류 부락 각 가정의 우사사건 이전의 면모(즉 1930년 이전)까지 거슬러 올라가기란 불가능했고, 환중 섬 이주 이후의 가족사까지만 가능했다고 지적하였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청류 부락에 대한 종합적인 조사는 우리에게 매우 귀중한 자료를 제공하였다. 좋은 예는 바로 Tiwas Pawan(傅阿有)가 구술한 「모나 루다오와 그의 노래(莫那·魯道和他的歌)」(『清流』, 525~548)와 우사사건에 대한 노인들의 직접 증언이었다.

젠홍모 & 이완바이린의 조사는 Seedeq 족의 중요한 역사 사건인 우사사건과 직접 대면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이 조사로 원주민들은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의견을 표출할 기회를 갖게 되었다. 과연 80년 후, 원주민들은 우사사건을 어떻게 이해했을까? Mahebo 등 여섯 항일 부락 남자들은 거의 모두 사건의 와중에서 죽었고, 남은 이들은 여성과 당시 아직 어린아이였던 이들뿐이었다. 그들은 지금까지도 봉기 발생 정황과 일본 군정의 토벌 그리고 당시 피난살이의 공포와 아픔까지 생생하게 기억하고 있었다. 하지만 이 조사는 또한 다른 난처한 문제를 수면 위로 끌어올렸다. 만약에 항일 6부락의 봉기가 긍정적으로 평가되는 영웅적인 의거였다면, 봉기에 참여하지 않은 다른 Tkdaya 부락은 어떻게 평가해야 하는가? 젠홍모는 과거 일본 식민주의자의 진압과 선동으로 본래 사이가 좋지 않던 원주민 동포 사이에 일어난 상잔(相殘)의 교훈을 감안하여, 항일에 참여하지 않고 스스로를 보호하는 선택을 했던 부락도 존중받아야 한다고 생각했다. 따라서 “우사사건에서 절충적 역할을 맡은 Paran사 우두머리 Walis Buni에게 오명을 뒤집어 씌워.....Tkdaya가 멸족하지 않도록 애쓴 그의 노력을 일부러 모호하게 다루거나 과소평가해서도 안 되고”, “Paran사가 살계를 피하도록 이끈 Walis Buni의 지혜와 처신, Tongan사의 우사사건 참가를 거절한 우두머리 Taba Kumu 등 Tkdaya의 명맥을 보존한 그들의 공로는 잊지 말아야 하며,”(『中原』, 39) 당시 봉기에 참가하지 않았던 이들 Tkdaya에게 Mona Rudo는 영웅이 아니었다. “과거사를 구술하면서 과거를 마주 대할 때의 감정은 상당히 복잡했다. 과거를 돌이켜보기 힘들어하는 노인들은 차라

10) 簡鴻模&依婉·貝林的『Alang Baiqe(眉溪部落)生命史』(埔里, 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 2002년), 『清流部落生命史』(저자에 郭明正 추가, 2002년), 『中原部落生命史』(2003년), 『從杜魯灣東遷花蓮 Tgdaya部落生命史』(2005년)

리 잇기를 선택하고 다시는 스스로 그 일을 언급하지 않았다.”(『中原』, 38)

만약에 첸홍모 & 이완·바이런의 작업이 일종의 상처를 지워가는 작업이었다면, 보다 대규모로 진행된 또 하나의 우사사건 조사는 갈등과 긴장 속에 진행되었다.

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는 2000년부터 2002년까지 우사사건에 대해 86 차례의 구술 인터뷰 작업을 진행하였다. Kumu는 지금까지 우사사건 관련 저작 가운데 “절대다수는 모두 일어를 번역한 논저, 즉 모두 일본 정부의 역사 문헌이라고 보았다. 사실 일본 학자, 한족 학자, 원주민 엘리트 또는 지방 문헌 작업자를 막론하고 모두 일본 정부의 문헌을 기반으로 자신들의 구술 기반을 구축하였다.”(II-17) 게다가 Kumu는 과거 원주민의 내부에서 우사사건을 기술하는 소수 원주민 엘리트가 “일본 공식 문헌에만 의존하여 [해석한 결과] 우사사건의 역사 이미지를 Mona Rudaw가 몇몇 Tkdaya 부락을 이끌고 펼친 항일 행동으로 그려내는” 양상을 비판하였다.(II-17) 이는 매우 급진적이고 날카로운 비판이었다.¹¹⁾ Kumu는 원주민 대표로서 우사사건에 대해 기술하는 원주민 엘리트만 인터뷰할 것이 아니라, 인터뷰 대상에 “일찌기 역사 문헌에 조금씩 보이고, 후에 Gluban(川中島, 清流) 부락에 살게 된 당시 항일 6개 Tkdaya부락을 포함시켰다가, 당시 항일 행동에 참가하지 않은 Tkdaya부락 및 Toda와 Truku 지역의 Sedeq 인들까지 확장하기로” 결정했다.(II-20) 그 결과 Kumu는 총 86회의 인터뷰를 진행하였고, 인터뷰 대상은 Sedeq의 Toda, Truku, Tkdaya소속 총 14개 부락 원주민이었다. 이 가운데 최고령자는 90세(우사사건 당시 20대)였고, 가장 어린 사람이 48세(전후 출생자)였으며, 심지어 소수 Bunun[布農族]과 Pen-po[平埔族] 원주민까지 포함되었다. 인터뷰 내용은 우사사건에 직접적인 관련이 없어도, 생명사, Sedeq 부락의 전통 문화 개념, 일본 경찰 통치 하의 마을 생활, 각 마을과 종족 간의 상호 관계 등까지 아울렀다. “구술 사료로 드러내는 역사 이미지를 통해, 과편적이고 단절되고 뒤섞이고 중층적이며 반복되고 충돌하는, 수많은 개인의 마을 기억을 가지고 일종의 부락적 관점을 직조해내고자” 했다.(II-17) 이것은 Kumu의 석사 논문이자 따로 『부락 기억(部落記憶)—우사사건의 구술 역사(霧社事件的的口述歷史) I. II』(타이베이, 瀚蘆圖書公司, 2004년)로 출판되었다.

Kumu Tapas가 인터뷰하여 얻은 이러한 구술들은 지금까지도 원주민들의 뇌리에 생생하게 살아 있는 우사사건을 표현했을 뿐 아니라, 수십 년 전 일어난 우사사건에 대한 각 개인과 그룹의 서로 다른 해석을 드러내었다. Kumu는 “우사사건 역사에 대해 Seedeq은 여전히 상당한 이견과 다원적 견해를 유지하고 있었다.”(II-16)고 평가하였다. 우사사건에 대한 Kumu의 구술 조사는 기존의 우사사건 기술에 대한 반성과 비판에서 시작되어, 최종적으로 그 동안 무시해온 또 하나의 내부 논쟁을 일으켰다. 일본 관헌 버전의 우사사건에 만족할 수 없었던 Kumu는 타이완 원주민 내부에서 우사사건을 추적해야 한다고 하지만, 과연 무엇이 타이완 원주민의 내부 관점일까? ‘원주민 엘리트’¹²⁾가 우사사건의 기술과 해석을 독점하는 데 Kumu가 만족할 수 없었다면, 누가 우사사건을 기술하고 해석해야만 하는 것일

11) Kumu Tapas의 말에 따르면, 자신이 Sedeq인에 대한 구술 인터뷰를 진행한 것은 2000년 10월 21일 ‘우사사건 70주년 국제 학술 토론회’에서 나의 발언에 자극받은 때문이라고 하였다. 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 『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的口述歷史 II』(타이베이, 瀚蘆圖書公司, 2004년) 3쪽 참고.

12) Kumu가 지정한 소위 ‘원주민 엘리트’는 아마도 花岡二郎의 부인(高彩雲)과 그 가족과 같이, 원주민으로 자주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의견 개진 요청을 받는 이들을 가리키는 것으로 보인다.

까? Mahebo 등 항일 여섯 마을은 물론 우사사건의 주역이었지만, 항일을 하지 않은 나머지 Tkdaya 부락은 영웅적인 우사 항일 사건에 대한 비겁한 '낙오자'는 아닐까? 일본 관헌의 사주를 받고 항일 여섯 마을을 공격한 '미방번(味方蕃)'은 우사사건에 대해 그들 나름의 또 다른 해석을 가지고 있지는 않을까? Kumu의 의문이 구술 인터뷰의 질문이 되면서, 예전에는 수면 밑에 숨겨져 있던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서로 다른 해석을 한꺼번에 분출시키는 기폭제 역할을 하였다. Kumu는 문제를 해결하지 않았을 뿐 아니라 오히려 문제를 더 복잡하게 만들었다. Kumu가 일으킨 논쟁은 Kumu 자신의 민족적 입장에 기인했다고 단순화하기 보다는,¹³⁾ 현재 역사학이 직면해야 할 과제로 보아야 한다.

V. 글을 마치며

그 동안 타이완 원주민과 같이 문자가 없는 민족의 역사는 모두 문자를 가진 타자(other) 특히 외래 통치자(식민주의자)에 의해 쓰여졌다. 이러한 외래 통치자(식민주의자)의 역사 쓰기는 당연히 편견과 부족한 부분들로 가득하다. 이제 우리는 일본 통치자들의 문서를 이용해 타이완 원주민에 대한 식민주의자들의 탄압을 재구성할 수 있었지만, 타이완 원주민이 왜 우사사건을 일으켰는지는 이해할 수 없었고, 그 결과 원주민의 역사까지 억눌리고 관리받는 역사가 되었다. 그러므로 우리는 원주민 내부에서 역사를 찾는 방향으로 노력했다.

그러나 원주민 내부의 역사는 어떻게 획득되는가? 원주민 내부에도 우사사건에 대한 갖가지 서로 다른 기억과 해석이 여전히 존재한다. 식민 시대에 등장한 원주민 엘리트(사실 이들은 당시 식민주의자와 협력했던 자들이다)는 전후에도 여전히 원주민을 대표하여 발언하며, 이제 그들이 기술하는 우사사건의 포인트가 바뀌고 해석에 약간의 변화가 생겼을 뿐이다. 하지만 더 근본적인 문제는 역사 기술의 단위를 어떻게 설정하는가는 아닐까?

근대 역사학과 근대 nationalism의 공생 관계는 이미 상식이 되었고, 점차 성찰이 이루어지고 있다. 하지만 실제 역사를 기술하고 분석할 때 특히 식민지 역사를 다룰 때 가장 보편적인 방식은 여전히 '식민 민족 vs. 피식민 민족'이라는 이해 도식으로 역사를 기술하는 방식이다. 전후 초기 타이완에서 중국 국민당이 중국 민족주의를 모든 역사 기술에 강력하게 관철하였으므로, 우사사건은 '중화 민족 타이완 원주민이 식민지 폭정에 대해 항거한' 용감한 항일 사건으로 이해되었고, Mahebo의 Mona Rudow는 항거를 이끈 (중국) 민족의 영웅이 되었다.

하지만 상술한 '식민 민족 vs. 피식민 민족'이라는 이해 도식 속에서 '피식민 민족'은 보이는 그대로 뒤에 놓인다. 이 후치되는 '피식민 민족'이 이제 심각한 의문의 눈초리를 받게

13) Kumu는 스스로 Toda로 자처하고 있다. 저서 II-19 참고. Kumu가 일으킨 논쟁은 아직 시작단계일 뿐이다. 예를 들어 簡鴻模는 자신의 저서 『清流部落生命史』에서, 우사사건 70주년 세미나에 清流部落은 참석하지 않고 대부분 Doda와 Truku 측에서 발언한 것에 대해 그 정당성에 의문을 던졌다. 전게서 51~52쪽 참고.

되었다. 먼저, 중화 민족은 20세기 중국 역사 속에서 만들어져 함의를 획득한 근대적 개념이다. 이렇게 20세기에 비로소 근대적 함의를 가진 개념에 당시 식민지 상태에 있던 타이완을 포함시키기란 어려우며, 특히 타이완 원주민들과는 더욱 거리가 멀다. 현재 구술 인터뷰를 통해 획득한 우사사건에 대한 원주민의 기억과 해석을 보면, ‘중화 민족’이라는 개념이 적용 불가능할 뿐 아니라, ‘타이완 원주민’이라는 개념조차도 적용시키기 어렵다. 80년 전 일어난 우사사건과 같은 중대한 역사적 사건에 대해 타이완 원주민 내부에서 상호 받아들일 수 있는 기술 단위가 아직까지도 결여된 상태인 것이다.

역시 기술의 단위가 더 이상 민족주의 범주(중화 민족주의든 타이완 민족주의든 또는 타이완 원주민 민족주의든 상관없이)와 일치하지 않을 때, 우리가 그 동안 자연스럽게 써온 ‘민족(국가)사’나 ‘국가(민족)사’의 이해에 허점이 드러난다. 그리하여 모든 이들이 기존의 민족주의 범주를 벗어나면서 다른 단위로 역사를 이해할 때, 동일한 역사 사건에 대해 서로 완전히 다른 역사 해석을 발전시키게 된다. ‘동아시아사’라는 호칭과 마찬가지로, 현재 우사사건에 대한 타이완의 이해를 둘러싼 논쟁 역시 ‘포스트 민족주의 역사학’의 경향일 것이다.

International Conereence

역사적 관점에서

‘동아시아세계’의
아이덴티티와 다양성

국제학술회의 자료집(I)

발행인 : 정 재 정(동북아역사재단 이사장)

발행일 : 2009년 11월

발행처 : 동아시아연구자포럼, 동북아역사재단
102-705 서울특별시 서대문구 의주로 77
전화 02-2012-6047

<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

인쇄처 : 연화디앤피(02-2269-8620)

비매품